冀鲁豫边区

# 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

## 增订本

主　审　李运亨

主　编　谢忠厚
　　　　张圣洁
　　　　安炳增

河北人民出版社

**编　辑**　田苏苏　陈旭霞
胡克夫　谢　嘉
**校　对**　李桂芳　池笑琳

# 编 辑 说 明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一版、再版和《冀鲁豫边区宣教工作资料选编》问世以来，深受原在边区工作的老同志和原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部门的肯定和赞许。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当年冀鲁豫边区群运、宣教工作的情况，根据冀鲁豫党史工作组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决定继续编印《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增订本》，主要选收未曾收入的原边区各级领导同志的署名文章和有关资料。

《增订本》共收入历史资料、专题资料和回忆文章61篇，另收附件8份。所选各篇主要来自：（1）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关的报刊杂志；（2）原边区各级领导同志当年的报告、总结和发言，以及回忆录和其他署名文章；（3）原在边区工作过的老同志提供的历史资料；（4）原边区党史工作组编印出版的《党史资料选编》和《专题资料》。

对所选各篇历史资料，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对专题资料和回忆文章，我们本着尊重原作、文责自负的精神，未作内容上的修改和加工，仅依据原编辑细则做了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对所转载文章原编者的题解，我们做了适当的删减。虽然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但舛误之处仍在所难免，尚祈有关方面、各界读者不吝指教。

# 目　　录

编辑说明……………………………………………………（ 1 ）

## 第一部分　历史文献

晋冀鲁豫边区合作社条例………………………………（ 1 ）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
边区青联关于加强青联与军队朱德青年队
联系的决定……………………………………………（ 5 ）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
加强我们党报的党性……………………………黄　敬（ 8 ）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介绍减租增佃工作中的一种方式——集体
倒粮………………………………………………吕　冰（ 12 ）
（一九四三年三月）
在冀南地委书记联席会群众工作座谈会上的
发言………………………………………………黄　敬（ 19 ）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冀鲁豫边区农村合作社章程草案……………………（ 23 ）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鲁西南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初步调查…………陶　力（ 28 ）
（一九四三年）
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姜思毅（ 41 ）
（一九四四年六月）

关于滑县群众运动向中共平原分局的汇报
提纲……………………………………………纪登奎（ 44 ）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
冀鲁豫行署关于处理因灾荒买卖人口纠纷的规定………（ 60 ）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赵紫阳（ 62 ）
（一九四四年十月）
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
问题的指示……………………………………………（ 100 ）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冠北工作队总结……………………………………杨易辰（ 102 ）
（一九四五年一月）
介绍某庄合作社……………………………………吴振全（ 118 ）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
冀鲁豫边区农村合作社组织简章……………………………（ 134 ）
（一九四五年四月）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加紧生产工作的指示…………（ 139 ）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
齐滨县向庄合作社初步调查…………………………李春兰（ 143 ）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
工作的指示……………………………………………（ 148 ）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黄河工作给冀鲁豫
区党委的指示…………………………………………（ 154 ）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
全力进行复堤工程…………………………………………（ 157 ）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

救救23万修堤工人……………………………………………（ 160 ）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
沿河二［六］县修堤工人中涌现大批英雄模范…………（ 162 ）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冀鲁豫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武委会总会告
全体会员、团员和民兵书
为紧急动员起来参军参战打退蒋介石的
进攻…………………………………………………（ 166 ）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
濮县涌现大批担架英雄…………………………………（ 169 ）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冀鲁豫行署关于教育方针的指示信……………………（ 171 ）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莘朝县合作社村社工作初步总结报告…………………（ 174 ）
（一九四六年）
在社会部长联席会上的总结………………………刘晏春（ 189 ）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
指示…………………………………………………（ 194 ）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在地委民运座谈会上关于几个问题的
发言……………………………………………赵紫阳（ 199 ）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冀鲁豫区王、张、张、刘、赵关于扩兵、土地
改革等问题给薄一波同志的信…………………（ 209 ）
（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培养与使用妇女干部的指示…………（ 212 ）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让农民自己做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周　惠（ 215 ）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潘复生等来信的通知…………………（ 238 ）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
附：潘复生同志等就土改政策致张玺、运北、
晏春、云浦同志的一封信………………………（ 239 ）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
关于到达冀鲁豫经过及组织情形
向中央局的报告……………………李菁玉　陶希晋（ 243 ）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
附：（李）菁玉、（陶）希晋给（薄）一波的信
冀鲁豫工作团干部对冶陶会议的反映……（ 247 ）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

## 第二部分　专题资料

冠县抗战初期的农民
运动……………中共冠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249 ）
泰西"红五月"
运动……………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260 ）
濮范中心区的民主
民生运动………中共范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272 ）
微山湖区交通线……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280 ）
鲁西北艰苦卓绝的抗灾
救灾斗争………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287 ）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概述…………汪德荣（ 299 ）
冀鲁豫边区合作社工作简述……………………………（ 307 ）
冀鲁豫边区的宣教工作……………………………姜思毅（ 319 ）

巾帼英雄
——李秀真的革命事迹……………滑县妇女联合会（326）

## 第三部分 回忆文章

中共直南特委工作回忆……………………………黎 玉（343）
直南革命策源地——大名七师
革命史（节选）………………………………晁哲甫（352）
直南沙区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的革命斗争………王从吾（370）
在冀鲁豫边群众中坚持革命斗争…………………陈少敏（381）
濮阳盐民斗争………王从吾 高克林 张会之 吴宝合（388）
党领导的"王效白打烟款"始末…………………戴晓东（399）
实现我们的伟大使命………………………………曾宪辉（404）
阳谷县早期党的活动与群众工作…………………申云浦（414）
泰西地区党的发展与群众工作……………………李明实（421）
抗日战争时期滨河县发动群众的情况……………张延积（429）
回忆冀鲁豫边区各界参观团赴冀南抗日根据地
参观学习的情况………………………………刘东明（440）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纪登奎同志在鄄北……………常邦国（445）
苏鲁豫边区（湖西）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回顾
（节选）………郭影秋 郝中士 陈璞如 秦和珍（453）
回忆冀鲁豫边区人民在淮海战役中的
支前工作………………………………………韩哲一（471）
忆鄄城解放后的群众
运动………………………宇 光 谢春风 董兴武（487）
我们的青年工作团…………………………………魏 克（494）

## 第四部分 附 录

冀鲁豫区八年抗日战争财产损失统计表…………………（501）
（一九四六年五月）
第四专区各县人力畜力支差调查统计表…………………（503）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冀鲁豫〔黄〕河北地区战勤调查统计表…………………（505）
（一九四八年八月底）
冀鲁豫全区二年来支前实力负担统计……………………（507）
（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

冀鲁豫边区抗战颂歌……………………………王 鲁（508）

河北省联络组关于"群众运动"、"宣教工作"
专题征编情况向工作组的报告…………………………（523）
冀鲁豫党史文艺组八年
工作小结………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文艺组（527）
在《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再版
座谈会上的讲话………………………………杨泽江（536）

后记…………………………………………………………（541）

# 晋冀鲁豫边区合作社条例*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

**第一条** 本边区所有合作事业，均依本条例之规定办理之。

**第二条** 合作社之业务得为下列各款之一种或数种：

（一）生产合作：系社员经营种植、饲养、农田水利、牧畜、造林、纺织、酿造及各种工具日用品之制造等事业者。

（二）运销合作：系经营工农业生产品及山货联合运销者。

（三）消费合作：系供给农村日用品者。

（四）信用合作：系经营农工业生产之放款及农村储蓄者。

**第三条** 经营前条第二第三第四各款之合作社，其业务可不限于社员之间。

**第四条** 合作社之责任分下列三种：

（一）有限责任：社员以其所认股额为限，负其责任。

（二）保证责任：社员以其所认股额及保证金额为限，负其责任。

（三）无限责任：合作社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由社员负连带责任。

**第五条** 合作社非有社员15人以上，不得设立。

**第六条** 合作社得受政府下列之优待：

（一）贸易局及公营机关，对合作社之生产品，减收手续费，代理推销。

---

* 本文原载《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550—553页。

（二）贸易局及公营商业机关之货物，合作社有优先购用之权。

（三）贸易局对生产合作社供给原料减收手续费。

（四）有向政府及银行低利贷款之优先权。

（五）合作社股金一律免除资产负担。

**第七条** 社股无限，每股股金至少1元至多10元，在同一社内必须一律，社员认购股金每人至少1股，至多不得超过股金总额20%。

**第八条** 运销合作社社员认购社股除现款外，可按其运销之种类，以生产品折价为股。

**第九条** 股息至多不得超过月息8厘，如结算无盈余时，不发息。

**第十条** 合作社每3个月、6个月或一年结算一次，结算期以3、6、9、12月月底为准。

**第十一条** 合作社盈余除弥补累积损失及付息外，分配如下：

（一）公积金15%以上。

（二）公益金5%以上。

（三）职员奖励金10%以下。

（四）事业基金若干。

（五）社员分配金60%以下。

**第十二条** 前条社员分配金之分配标准如下：

（一）合作社业务限于社员者，按社员之交易额比例分配如下：

1、生产合作社按各社员每结算区内所得之工资，或所缴生产物价格比例分配之。

2、运销合作社，按所销各社员货物之多寡，比例分配之。

3、消费合作社，按各社员购买总额之多寡，比例分配之。

4、信用合作社，按各借款社员已交借款利息之多寡，及储金社员已支付之储款利息多寡，比例分配之。

（二）除生产合作社外，其他合作社业务不限于社员者按股金比例分配之。

（三）生产合作社如吸收不参加劳动之社员股金时，得于社员分配金中提定若干为其红利，但至多不得超过社员分配金总额20%。

（四）混合经营之合作社，亦可按实际情形将社员分配金分提若干部分按股金分配，其余部分按交易额分配。

**第十三条** 合作社设理事、监事各若干人，由社员大会选举之。

**第十四条** 社员大会为合作社最高权力机关，由理事会召集之，其职权如下：

（一）修改社章。

（二）决定本条例第二、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二等条款规定之事项。

（三）决定合作社业务计划。

（四）审核帐簿，检查资财。

（五）选举罢免合作社理事、监事及职员。

**第十五条** 社员大会开会时，不分股金多寡，每社员有一表决权。

**第十六条** 合作社因下列各项情形之一者，得宣告解散：

（一）章程所规定解散之事由发生。

（二）社员大会决议。

（三）与其他合作社合并。

（四）政府解散之命令。

前项第二款、第三款应有全体社员3/4以上出席，社员2/3以上通过。

**第十七条** 合作社之解散与合并，均须向原登记机关重新登记。

**第十八条** 两个以上同一性质之合作社，或同一区县之各种合作社，为业务上的便利协作，得自由合并，或组织合作社联合社。

**第十九条** 本条例之规定，均适用于合作社联合社。

**第二十条** 合作社须呈请县政府登记批准，发给许可证后，始得正式营业。前项许可证发给与否，均应于接到呈请后15日内批示。

**第二十一条** 合作社不得妨害或阻碍他人经营工商业务。

**第二十二条** 合作社违背边区各种法令及本条例之规定者，政府得勒令其改组或解散。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施行细则另定之。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有未尽事宜，得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提经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同意修正之。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经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施行。

# 边区青联关于加强青联与军队朱德青年队联系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

各专区、县青救：

青救与朱德青年队同是边区青年抗日团体。为了巩固青年统一战线，团结边区青年，推动整个边区青运发展，动员青年一代为坚持边区抗战渡过艰苦的两年，争取最后胜利计，特共同决定如下，望各级青救讨论执行。

一、组织联系

甲、部队朱德青年队可参加各级青救，为各级青联的团体会员。

乙、军区、军分区、县基干队青年干事，可被选为同级青年联合会之委员或常委，参加共同领导。

丙、全边区朱德青年队为边区青联之团体会员，为了工作更利于各旅团驻防区，当地青救应主动与之密切联系，以取得工作帮助。

丁、互相交换文件，互相参加有关会议。如军队青年服务会议、青年工作会议、竞赛会议，地方青救的常委会、联合会与代表会等。

二、地方青救与军队青救应在各方面工作上互相帮助，并应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219—221页。

保证互相帮助协定的实现。

甲、军队青年应即帮助地方青年团体者有以下各点：

1、在驻防区发展巩固青年儿童团体，培养干部，建立工作。

2、发展与训练青抗先（尤其是军事方面的），率领青抗先作战。

3、发展与训练青年武装，率领青年武装作战。

4、配合进行宣传动员与调查研究工作。

乙、地方青年团体应帮助军队青年：

1、组织慰问团、战时工作队。青年团帮助军队作战（侦察、宣传、抬担架），于战前战后慰问军队青年，密切军民关系。

2、优待抗属，发动青年参加抗日军。

3、动员逃兵归队，尤其是青年逃兵。

4、注意调查与锄奸活动。

丙、经常组织联欢会、参观露营及青年节日大会，以互相学习，亲密团结。

丁、共同反对敌人抓捕青年壮丁，侵犯青年利益。

三、各级相互联系中，军队帮助青年工作应注意尊重统一计划，地方青年团体对朱德青年队应随时提供意见，并应注意相互交换工作经验教训。

四、目前应注意的几种工作

甲、应进行传达讨论，务必〔使〕全体干部与会员深刻了解其意义并应保证其执行。

乙、征求部队青年加入青救，首先应在部队青年队中进行深入的动员讨论，以民主选举方式造成热烈的群众运动，并召开青年队员大会，进行队员宣誓，以通过此动员密切军队青年与地方青年的团结。在会议上，当地青年团体干部参加，应参加介绍地方青年活动情形。

丙、目前相互即应取得密切联系，相互交换意见经验，执行互相协定。部队青年干事可列席参加同级青救会议。俟今夏各县级青联改选时，应选派代表参加。

丁、“五四”中国青年节即〔将〕到来，军队青年团体、地方青年团体应取得密切配合，共同举行各种〔活〕动。

# 加强我们党报的党性*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黄　敬

《冀鲁豫日报》最近确实有了进步，显出了新气象。编排上开始比较活泼，标题注意到通俗，印刷也较前清楚。但目前在报社同志的面前正摆着一个难关，这就是改石印的事。因为改了石印以后，发行区域就要扩大，读者的范围也会更广阔，读者对于报纸的希望与要求也更增加了。现在区党委已经加强了对于报纸的领导，已提到党性的高度来注意党报，并且指示全党充分重视与利用我们的党报。这就加重了我们报纸的责任。改石印后必须满足这些要求和希望，才能真正担负起区党委交给党报的任务。

我们的报纸，在编辑采访通讯工作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点，这就是还没有跳出旧的一套束缚，还没有完全跳出资产阶级的报纸的圈子，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新型的党报工作。旧的报纸是单纯的表面的报道新闻，很少对新闻来负责反映与批判。新的报纸则不同，我们的报纸必须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站稳在这个立场上去分析与报道每个事情的发生，并且引导着人民走向正确的方向。这样，我们的报纸才能正确的反映生活，并指引群众改造这个生活。这一点我们做得很差。

要做到具有明确的党性，但又不是党八股，这首先就是和群众生活、群众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而不要把自己看成群众斗争的同情者。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时刻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生长在群

* 本文原载1943年3月31日《冀鲁豫日报》。

众之中，而又领导着群众的基本责任。从群众斗争的同情者底观点上来写新闻，在我们报纸上还很不少。带有这种观点的人，他们仅仅为着执行政治任务，或是以个人的同情来不关痛痒的描绘群众生活，他们所指的政治斗争又与群众的痛痒不相关连。他们总喜欢生活在不同凡响的云端，而他们应做的事，却在平凡的地下。他们政治上虽愿为群众斗争而服务，但对群众生活却缺乏任何真切的实感（他们所留恋的是和群众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他们理智和情感总是分离的，一个人同时跨在两个世界中生活。因此，他们对于群众中活生生的事实，缺乏强烈的情感和敏锐的知觉。他们的情感和群众的还不能合拍，还不能和群众的血泪融成一片，他们关心群众还极不深刻。因此，采访与报道新闻时往往是抽象的、空洞的，和群众的生活远远隔离着的，这就无怪乎不能摆脱干瘪无味的党八股的圈子。

其次，我们采取和处理任何新闻材料时，往往只从表面上形式上静止的观察与反映问题。只叙述了一些浮面现象，很少发掘到它内部的根源，以及它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很少研究与指出它的趋势；很少揭露它的性质的好坏，是应该赞成，还是应该反对。如果我们的新闻通讯仅仅是表面现象的罗列，缺乏明确的批判，这就不能提高党报的原则性，就不能担负起指导斗争的任务。这样的新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细密的经常注意到群众中的迫切要求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喜欢？又为什么难过？干部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我们的工作哪一样做好了？哪一样还没有做好？敌人已经干着什么？还要干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党报时时要留心的，时时要解决的问题。只是用“异常痛苦”、“光辉成绩”、“继续努力”等抽象词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深深钻到实际生活里去，不要只在外面参观，而要和群众的生活、党的生活紧密的系在一起，以热爱群众的心情与灵敏尖锐的知觉，来对待一个事情的发生，我们的新闻才能够锐敏

的实际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再次，在写作上面，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很多。我们报纸反映生活改造生活的目的，是为要群众能够清楚的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真实的遭遇；哪些遭遇使自己痛苦，哪些遭遇使自己快乐，哪些应该仇恨，哪些应该喜爱，这样才能鼓舞着群众去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把他们引导到革命斗争中来，这是我们写作的目的。但我们在写作时却常常违反了它。我们的写作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必须使读者在看到新闻以后，能与你有了同感，才能与你一同前进。取得这个同感很不容易，生活内容贫乏的，写出文章来固然不易取得；即使生活内容充实，若没有适当的写作形式来表现，那也还是作不到。因为不同生活的人，具有不同的思想感情，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生活习惯、言语、动作，都是不同的。我们“一读三叹”的东西，群众读起来并不见得也是那样津津有味。我们不能以艰深的词句和高奥的调头来自珍自赏。那种“曲高和寡”、“孤芳自赏”脱离群众的观点是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弱点，我们宣传工作者应该把它完全抛弃。如在通俗问题上，我们有的同志感到生动与通俗不能统一，认为一通俗就不能生动，没有力量，其实这种看法是有毛病的，我们必须认识生动是群众看着生动，而不是作者主观上看着生动。我们不能简单了解写点短句子的白话文就是通俗（当然这是重要的条件之一）。真正的通俗还要是群众所喜爱的。因之，不通俗就不能生动，要生动就必须通俗。要做到真正通俗生动，必须要熟习群众所爱好的形式，用群众语言把它表现出来。我们的报纸要做到读起来群众能听得懂，听得入耳，能够搔到读者或听者的痒处。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需要不断的创造出新的形式才能做到。同时，新的内容需要新的形式，但我们同志往往不从实际生活出发，不和当前的实际斗争联系，没有看到实际生活中不断涌现出新的内容，没有和群众的喜怒哀乐联系起来。因之

他们看不到群众生活中的血与肉，他就创造不出新的形式，只好去找已经过了时、血肉已经腐烂的骷髅了，只好去搬那些老新闻术语，什么“马革裹尸”、“光怪陆离”、“四字叹”了！这些“四字叹”不但群众听不懂，就是懂得的人，看了以后，也很难使他情感上有多少激动，印象是非常模糊的，这就是语言无味的八股。再加“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咬紧牙关”等等，按其内容来说，今天基本上还是现实的，在最初提出克服动摇、克服困难时是很能刺激人的；但今天斗争内容已经补充了更具体的东西，生活已经前进了，若仅仅把这些词句翻来复去地使用，不根据新的生活加以补充，就会成为滥调，对人再不能有什么刺激，不能产生什么印象了，这就是八股的另一种形式。所以我们在写作形式上，在使用词句上，必须不断的根据实际生活的变动来不断翻新我们的形式，才能不断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和有力的鼓舞，并且把我们的斗争生活丰富起来。

要以强烈的无产阶级情感，来关心群众生活，把我们的政治方向（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和群众的实际生活密切结合起来，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写作，找出群众最喜欢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这就是宣传工作人员的实际党性锻炼。

# 介绍减租增佃工作中的一种方式——集体倒粮*

（一九四三年三月）

吕　冰

倒粮是减租增佃工作中最紧张的一幕。因去年减租增佃工作我们进行的晚，且边区小种地多，粮食多已分过，故我们进行减租增佃工作，就必须倒粮（把粮食按减租增佃办法的规定倒给农民）。现把在濮、范比较成功的一种倒粮方式——集体倒粮的经验介绍如下：

**一、倒粮前要有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包括：**

1、对佃户的组织与动员。事先没有农会的地方或不准备先建立农会即倒粮的地方，要先把佃户分组组织好，每组选出他们自己的组长。事先已有农会的地方或打算先建立农会后倒粮的地方，要动员这些佃户全部参加到农会中去，按农会系统与编制组织起来。组织好后，再进行动员。动员的内容应该是：

（1）对政府二五减租、二五增佃命令的宣布及减租增佃的具体办法（联系到减租增佃后的出差问题，因地主常拿这个口号吓唬他们）。

（2）减租增佃的意义及减租增佃的应该（从说明剥削关系，启发阶级觉悟，到发动各阶级共同抗战）。

（3）如何达到我们的减租增佃的目的（着重在斗争的策略

* 本文原载冀鲁豫区党委出版的《党的工作》第13期。

教育及组织教育）。

（以上详见田洗文同志的《发动佃户》，在此不赘。）

2、对地主的拜访与分析。每村的主要地主要尽量的都能拜访过，告诉他减租增佃的日期及倒粮的具体办法，问他粮准备好了没有（因已在预先的主佃联席会上通知过他了），如没有准备好要赶快准备。他如在这时提出各种拖延的借口，除适当予以驳斥外，还应以“君子济贫不济富”、“识时务者为俊杰”等双关口调，激发其起模范作用，勿自找麻烦。同时，还应对其在倒粮中可能玩出的诡计，预先提高警惕，想出办法及对策。

3、对倒粮工具（如布袋、斗秤、算子）的准备及时间、地点的选择。倒粮时间要选择不逢集的日子及村内无婚丧大事的日子。倒粮地点要选择村内适中及群众常聚会的地方，以备把所倒粮都放在那里集中起来。

但主要的为对佃户的鼓动及动员，在临倒粮前要把全体佃户编为倒粮大队，选出他们自己的队长及代表（最好是原来的小组长）。向他们：1、宣布行动纪律，如：（1）不准贴里（即向东家的意思）、反动内奸；（2）不准装孬种，半路里退却，往后缩等；（3）不准装好人，在东家面前买好或不敢说话，什么屈也受（如少给粮食及给孬粮也要等）；（4）假设谁要违犯，应大家制裁等。2、指示对付地主的对策，估计地主可能的那一套，告诉他们应付的办法。特别重要的要坚定他们斗争的信心与决心，有“不斗则已，斗就必胜”的精神。

另外，如已有农会或支部的村庄，要布置农会会员或支部同志到时掌握群众舆论，注意群众不同的表现，同时开展我们的政治攻势，给倒粮工作以声援。

## 二、倒粮时要有周密的组织工作及机动灵活的处理问题的办法

上述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应立即建立倒粮组织，最好是

倒粮委员会或减租增佃委员会。除佃户外吸收村干（如村长、帐先、自卫队长、农会长等——但坏者不要，以防从中阻碍）、公正人士及我们工作人员到这一组织中来，以负计算、督促、检查、动员、调解之责（但应进步力量占优势，并预先规定好处理问题的办法）。这时我们须对倒粮的群众干部有计划的分配开，谁负责做前锋，领导群众去倒；谁负责作后卫，在粮食集中地点向群众做宣传解释；谁负责中间联络，以传达消息，观察周围动静等。一切分配好后，即开始倒粮。

倒粮开始后，在策略上应先倒开明地主的，以作表率，最后对顽固的下总的攻击。但有时顽固的臭硬，各地主都在观望他，看眼色行事，先倒他的也是必要的。这是"打蛇先打头，刨树先刨根"的办法，只要打开，即可通行无阻，因打草已惊蛇了。

在方式上，应一户一户的挨着去倒，不轻易放过。除重大问题外，有问题应立即解决，以防备其拖延。个别重大的问题最后处理，而免耽误时间影响全局，但放过后应随时向群众解释。这时应注意到每个佃户倒东家的粮食时，应尽量不让他出头，以免发生情面观点；到非出头不可时，就坚决出来，大家在后面作后援。这时地主可能说[要]出的花样有这些：

1、借口没粮拖延。不是说埋的严实不好扒，改日再说吧，就是说还在某亲戚存着哩，明天去弄吧，再不就是买也没买来，借也没借来，请求缓期或先给佃户打个条算我借他的吧。

2、收买佃户贴里少报。如濮县郭庄董如佩预先收买好，叫佃户少报6布袋(分18布袋，报12布袋)，因报的少就可少增呵！

3、威胁佃户迟报少报。如濮县董楼董永申在倒粮时对佃户三老虎说："你快说，你是分了350斤吧，说对就给你添，说不对就不给，快说！"但三老虎一时并说不上来，结果依了他，事后检查少算200斤。地主最会利用农民这个不会记帐不会算帐的弱点，来达到他威胁迟报少报的目的。

4、事先少倒或假倒，到时少倒或不倒。如濮县马陵集地主，事先把粮食给佃户送去，该1布袋（4斗）的给2斗，该2斗的给1斗，企图以此混过去。仁和村地主，硬说已倒了，是在哪日哪天，但其实没那事，后经我们与佃户个别谈话才得知。

5、借粮增□。如濮县郭庄地主董如光，事先把佃户的粮食借到他家，倒粮时再拿出来倒，实际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仍是佃户的粮食，此乃所谓“鬼□灯”的办法。

6、明倒暗退。这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借口预先借过东家的粮食现在还，当时送回一部或全部（多是一部）；另一种方式是倒了以后再偷偷的送了回去，如濮县明庄某佃户倒了粮后，为受不了地主的骂，白天倒的，晚上又送回去了。

7、强调副产物不增佃，曲解副产物。如濮县李店村长（地主成份）说：“落花生、棉花不增佃，是副产物。”实则他本年的主要收获物即那些。又如好些村庄红薯、萝卜不增，亦即这个原因。

8、给孬粮食。有的应倒谷子给秕子，或掺秕子，应倒高粱给焦草（高粱之另一种，比其坏者）或搂焦草，以及掺砂使水等。更有的卑鄙无耻的地主，为了倒粮单往集上或亲戚家专买孬粮的，故该增豆子，而给高粱或谷子。

9、大斗分，小斗增。在濮、范有老斗（即大斗）市斗（即小斗）之分，还有分场斗与官斗之分。一般的分场斗皆大，还有的用洋油桶的，但倒粮时却硬说分场斗或老斗没了，用新斗吧。这样地主便占了便宜。

10、临阵脱逃，借口上集或有事而走开，要小孩或女人来应付，甚或也有不□托人应付的。

11、利用泼妇抵赖，叫她与我们争吵，说没粮食，甚或说我们减租增佃工作的不对。

12、利用“哭”、“难”、“苦”求情，让佃户不好意思增。这办法郭庄董如光就用过。

对于这些花样，我们应取如何对策呢？主要为事先的预防及临时的机动。具体办法如下：

1、对于第一种花样，要事先问好佃户他东家是否有粮食及粮在什么地方。因地主的粮食都是瞒不过佃户的，到时他不拖延则已，一拖延我们就具体指出他的粮在什么地方，叫佃户去扒（濮县曾有好些地主挨了我们这一手）。如他家真没粮食时，就于倒粮前拜访地主，保证他准备好。

2、对于第二种、第四种、第五种、第六种花样，应事先把反佃户贴里的斗争做好，具体审查那个人可能怎样怎样。如发现可能被地主玩出哪些花样时，我们应预先予以揭发，站在阶级立场上去教育他；但不要过分打击他，应充分估计到他个人思想的落后及不得已的苦衷，启发他自动的说出来。如倒粮时才发现，则应当场揭破地主的阴谋，指出其为变相违法，应受法令制裁，这时他必转脸向上，承认个人错误，并立时纠正，以示真实。

3、对于第三种，我们应于做准备工作时，给每家佃户都算好，他分了哪些粮食，应增多少，什么粮食等。如估计他东家现已没那种粮食(如芝麻、豆子)，应择其最多者要，按市价合好。

4、对于第七种，应于事先或当时解释好，什么是副产物，并先问问佃户他今年收的主要的是什么东西。

5、对于第八种，应坚决的不要，并揭破其无耻。

6、对于第九种，应于事先准备倒粮工具时就问好是什么斗，换了斗按原斗折合，有时各户不用一律的斗也可以。

7、对于第十种，应于拜访时就严格把日期给他规定好，如到时还跑了，应于群众大会上公开揭破其躲的阴谋，并于其回来后，一定要他立刻增上，少增一点也不成。特别重要的地主，于倒粮头一晚，派干部到他家去，和他在一块，拉着他也可以，使他无可逃之机。

8、对于第十一种可置之不理，必要时可发动佃户家属去与

他争辩，在政治上去打击他。特别张狂者，我们亦可以“这是违法行为”申斥之。

9、对第十二种，应分清真假。如真者可少减或少增，我们从中调解；如假者，我们可发动佃户倒求情，倒请愿，说：“你苦我也苦，你苦还有碗饭吃，我苦现在家里断顿盖锅。”或“今年增你的粮，明年多给你拉磨”等。在这里最模范的一个例子，就是濮县二区李桥一个老太婆地主哭诉着不增，他的佃户说：“二奶奶！（因系本族）你先增吧，顾俺的命，过年你老真□了□，俺拉着棍子要饭去也得养活你老。”说的她没办法也就增了。

不过无论哪种对策，都要充分掌握到群众，通过群众形式实现，我们干部切不可包办代替，或过于强调政府命令，把群运成了干运，以致成了官运。

各户粮倒齐后，应全部集中到倒粮地点去，倒粮组织的全体人员亦应到那里去，并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斗争成果。

## 三、倒粮后要□很好的巩固工作及扩张斗争胜利的成果

1、在群众大会宣布斗争成果。如减租增佃经过及减租增佃的具体成绩，发[表]扬开明地主，批评顽固地主，个别佃户认真执行政府法令的精神更要发[表]扬，以提高他们的合法地位及威信。

2、具体检查粮食数目与成色。如哪户倒了些什么粮食，各多少，全村共倒了多少粮食，各样各多少，以及每样粮食的成色。过于恶劣者，应公布这是谁的东家的，使群众周知。

3、教育佃户，巩固提高斗争情绪。要向他们尖锐指出，今天之所以有这样成绩，是大家团结斗争的结果。今天我们的斗争还没完，还在开始，以后将有更大的斗争及更多的胜利在等待着我们，以防止“粮倒罢即百事大吉”的观点。同时对一天来斗争经过及每个人的表现，也要作详细检讨，以鼓励好的，批评坏

的，并指出他们将来应如何斗争及努力，特别叫他们警惕地主的反攻，如叫退粮及退佃等。

4、发动群众公正舆论，争取中间阶层同情。这工作要分配给佃户，支部、农会（没支部、农会的，只好佃户自己）都去做，让他们分头去与村内无直接关系的群众（如富农、中农、游民）进行个别谈话，征求他们意见，让他们同情这一斗争，误会及不了解的地方要给以耐心解释，求得他们在舆论上、态度上赞助我们。

5、趁热打铁，建立组织。没有党或没有农会的村庄，要抓紧以佃农小组为基础建立农会，把从斗争中发现的积极分子吸收为党员。吸收党员的条件不应过于苛刻，反对关门，吸收进来，再进行教育。在已有党或农会的地方，要抓紧扩大，不放松一切有利时机及一切积极分子。从这一斗争中，改造与健壮我们的支部及村会，使之担当起以后的战斗任务。

## 四、在倒粮中间我们干部应注意的问题

1、包办代替，不耐心发动群众，不是让农民去与地主斗争，而是我们干部直接去与地主斗争。

2、丧失阶级立场，做地主的尾巴，甚至受了地主的愚弄与利用而看面子，送人情，不积极去给佃户增粮。

3、不照顾村中的舆论，不分化地主的内部，结果丧失同情，阻力会来。

4、在倒粮后，不抓紧组织教育佃户，认为粮倒罢了，即万事大吉，单纯的经济观点，为减租增佃而减租增佃，忽视了发动群众的严重任务。

5、在斗争中，忘记了巩固与扩大党，不知道只有树立起坚强的农村支部，才是巩固斗争成绩的最好保证。

# 在冀南地委书记联席会群众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黄敬

群众工作基本毛病是包办代替，你所说所做的，他办不到，不是在群众前面一点。借粮谁不来不给谁粮吃，群众肚子向前，腿肚子却向后抽，有矛盾。“谁不进去不行，跟我来，不许背回家！”借粮胜利了，“没有我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我，不行吧？”

你借粮，群众发生的首先是应不应该借，有矛盾。肚子饿得要死，可不是应该借；可是宁饿死不做亏心事，人要有骨头，要本份到底，不能干那缺德事，这矛盾在那里斗争。

“忍为贵，有忍当中出太和，随遇而安，成事在人，富贵在天。”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问题，理直气壮，群众却感到“臊得慌，抬不起头来”，又惊又爱，这是说我们思想上和群众脱了节。酝酿阶段，是你的思想成为群众所接受、所了解、所掌握，根本没有这个酝酿，为什么群众跟你来？群众是肚子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并不是理直气壮，可是没办法，太不仁义道德了，是歪理，只好跟你去。

第二个问题是群众认为能不能去？我们有什么不能去，有枪有布告，是执政的党。群众敢不敢呢？要把户家、主家得罪了不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751—754页。

得了，敢得罪户家可不简单，退了地怎办？春耕不借给牲口怎办？碾子不让我用怎办？青黄不接不借给我钱怎办？他是村长要治我一下，花项多派我点怎办？他是飞的蹦的跑的跳的，找我岔怎办？政权优势，大家可看到“十字街跺脚，墙脚乱颤”。

经济优势，使不借磨、扇车、牲口、钱，这都要找人家通融，非靠人家不行。政治经验，又是地富多，文化水平〔高〕，门子多，同谁都说着了。思想上受地富麻痹很深。地主教育有很深刻的一套，乡村中的对联，都是宣传封建思想、英雄主义的，唱戏是小卒不行。在封建思想长期麻痹下被蒙蔽了，演《雷雨》时，警卫员说“鲁妈和〔蘩〕漪最坏”。什么都能原谅，就是妇女偷人不能原谅。

经济、政治、社会关系、文化、思想上优势都不是我们的，不易想象那样容易。时间又紧迫，把这大地区群众发动起来，群众在这样束缚下，斗争又要约束在统战范围以内，就需要帮助下层，即撑腰问题。自上而下方式多一些，先支起架子来，先从上层派下去。我是县抗联、区抗联到这村发动群众的，拿着区长介绍信，有公事村长就打锣，造花名册，一下子都组织起来，是单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妇救会大部分是老太太，有“破鞋”，出来是支官差。“八路军有了新样了，不组织不行”。那时这种方式对不对呢？对的，先定下，放个定钱先把合法地位占下。这时地主把持群众团体，先给他把持去，可是你是我的部下，我取得了合法地位。你有了接近群众的形式，才有可能改造他，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并不是群众已充分发动了，满足几百万会员。架子搞起来后，就要充实内容了，这时政府颁布许多法令，区干到村就要集中一点突击，即所谓打堡垒，即个别指导，选择全区统治力量最强的中心突破，区干集中进行调查。打堡垒的好处，是打了以后全区一片都可拉起来，因地主的统治力量最强，群众往往是文化水平较高，多半是大村，出来干部开展也比较快，别的

村都欢迎这个村。小村打开了，地主不服气，群众没信心。大村打开后，小村地主就孬了，小村群众信心也特别大。

做什么呢？从当时当地群众迫切要求出发，全区规定这一时期以减租为中心是可以的，可是死规定1至5日做什么就错了。实现这个中心，各有自己的特殊道路。

政府法令拿出来，开士绅座谈会，区长讲话都是撑腰的地方，但有一个条件，群众首先应该认为是对的才行。斗理，群众自己还有自我批评斗争的（不是把群众看成一堆）。群众一堆中间有很大不同，有积极分子，联系群众，这时要组织秘密农会。我们工作最大弱点是不善于推动积极分子联系中间落后分子。积极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他坚决要这样干的（积极分子也是具体的，中间也有差别）；中间分子是承认你的东西对，可是积极分子出来才跟上来；落后分子是你少数人动我还不来，或认为不对，在绝无危险时才参加，一遇风浪就溜走了。这是大体区分，但也并不是一堆。这问题是积极分子，另一问题并不是积极分子，是经常变动的。我们不善于区分这些群众，树立积极分子领导作用，使他们联系群众，而是寻找你们一堆，站在组织上指挥群众的，不是推动组织领导群众。农会小组□委员会根本是扯淡，一级级都是站在组织之上的，所以争取大多数争取不了，只反映少数人的意见，像挂火车钩自觉得不错，回头一看，只挂了一个，所以出现光杆主任，问题是没群众观点。

英雄主义，向来历史上只表现英雄的。这个表现英雄，我们受毒很深的，旧戏锣鼓点都是为英雄打的，是替英雄落泪的，群众力量表现不出来，都是个人万能，这影响我们看不见群众力量，看成一堆。一听，我们指挥的一堆，所以就不培养了，只要积极分子，并不是推动他去拉中间分子，这就是组织工作问题，这就造成区干与群众脱节，对村干包办代替，村干对群众又包办代替。村干怎样领导小组呢？小组怎样团结无组织群众呢？这方

面注意很少。包办代替一层层障碍着我们，这样结果是广大群众呼声不上来了，村干对这问题是不会了解的，群众说不行，"开他的会，斗他的争"，村干怎样对群众呢？问题就多了，于是群众不敢说话了，一级级都不敢说话，都是听上面的，为什么不脱离实际呢？

自下而上，就是从群众中集中上来；自上而下，就是向群众坚持下去。如果从群众中集中上来，就是主要是向群众坚持下去，不是机械对立。所以发动群众本身就包含有组织教育工作。任何时期都有组织教育工作。

发展里有巩固，巩固里也有发展。斗争中也有组织教育，发动群众斗争本身就有一个艰苦组织教育工作；组织教育中也有斗争，不能机械对立。

不断斗争论本身有毛病，斗争里还有休息，认为不断斗争才能发动起群众来不合适。斗争到一定时期，把重点放在巩固内部，是有这个阶段。整理内容依然有外部斗争，巩固内部就是外部斗争的反映，这和外部不是没有关联的。严格说，教育形式就是斗争。在战场上同样有组织教育工作，这个班调到那里去，就是组织工作，战场鼓动就是教育。

单纯酝酿是不可能的，即单纯教育不可能，所以提高群众要依靠他自己斗争经验教育，从斗争中总结出来教育他。教育万能论不对。

# 冀鲁豫边区农村合作社章程草案*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一条** 农村合作社之设立，以行政村组织为原则。

**第二条** 农村合作社设于某村者，即称某村合作社。

**第三条** 农村合作社以社员间经济上之互助与联合活动，扶植社员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与改善社会日常生活，促进农村生产，加强对敌斗争为宗旨。

**第四条** 合作社兼营下列各科业务：

（一）加工业务：

1、社员农业生产品之加工制造（如打油、轧花等）。

2、社员生产上及生活上必需品之制造（如制盐、制造农具、制造纺纱工具等）。

1、2 两点以社员个人或小组经营者为限。

3、为推动农村之副业，经营倡导性之生产（如改良各种农村副业，可由社内经营倡导）。

（二）运销业务：各社员之生产品或物品之委托运销或收买运销。

（三）供给业务：各社员生活上、生产上必需品之采购供给（如原料、工具、肥料、食料、燃料等）。

（四）信用业务：经营各社员之存款贷款，如吸收农村游资与鼓励农村储蓄及办理非社员之存款。

---

* 本文原载《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601—605页。

**第五条** 各社员对于社内债务所纳股金10倍之保证责任。

**第六条** 合作社须15人以上之社员始得成立，并须有政府之核准登记始得营业。

**第七条** 凡居住于各该村，年满16岁之抗日人民赞成合作社宗旨者，均得为各该村农村合作社社员。

**第八条** 股金暂定为鲁钞 5 元为一股，一次或两次缴纳。社员每人至少应担任一股。

**第九条** 合作社之最高权力机关为社员大会，由全体社员组织之。各社员不论股份之多少，一社员只有一表决权。社员超过100 人者，应以 5 人至 7 人组织社员小组，选举代表一人，组织社员代表会，代行社员大会之职权。

**第十条** 社员代表任期一年，重选得连任。

**第十一条** 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之职权：

（一）选举并罢免合作社委员。

（二）通过社章与修改社章。

（三）审查与通过合作社工作计划(社务计划及营业计划)。

（四）决定添设或停止重要业务。

（五）审查帐目财产与业务报告。

（六）审查与通过利润之分配。

（七）决定社内各种规程。

（八）社员之出社入社。

（九）其他重要事项。

前项各款如系经社员代表会决议，须经社员大会之追认。

(五)(六)两款得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选举3人至5人组织临时审查委员会，进行预审，提交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审查通过。

**第十二条** 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每两个月开常会 1 次。有社员代表会者，社员大会将延长为 6 个月开会 1 次。

社员大会经社员1/5以上之请求，社员代表会或合作委员会之

决议，得召开临时会，社员代表会经社员1/10以上或社员代表1/5以上之请求，或合作委员会之决议，得召开临时会。

**第十三条** 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之常会与临时会非有过半数之社员或代表，不得开会。议案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同数时取决于主席。

**第十四条** 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之召集由合作社委员会负责，开会时由主任任主席。

**第十五条** 各社员小组得随时罢免其代表。但当选为合作社委员者，须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罢免之。

**第十六条** 合作社委员组成合作社委员会，其职权如下：

（一）执行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之决议事项。

（二）执行上级社或筹备处之指示。

（三）决定各小组或各社员各项贷款之分配。但数目过大或系〔非〕一般性质者，应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通过。

（四）向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报告营业状况及各种帐目财产。

（五）决定合作社内各种工作制度。

（六）指导社员经济活动。

**第十七条** 合作社设主任、总务、营业、会计各1人，由合作社委员互推兼任。必要时得设干事若干，由合作社委员会决定之。各职员之职掌如下：

（一）主任：对外代表合作社，对内召开合作社委员会，开会时任主席，并领导全体社员执行决议与进行日常工作。

（二）总务：掌理社员之出社入社，社员登记，收受股金，向政府呈报登记，社员教育与指导社内各种工作制度、庶务等事项。

（三）营业：掌理生产、运销、供给、信用各业务及商品之存放。

（四）会计：掌理社内帐目及财产。

**第十八条** 合作社委员会，每半月开常会一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

**第十九条** 行政村由数自然村组成者，或村庄过大者，合作社为营业上之便利，得设立事务所或设分社(分社得独立经营)。

**第二十条** 合作社职员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如业务之需要，对职务过于繁重之职员，其生活得酌量给以津贴。

**第二十一条** 合作社成立后，凡合于本办法第七条之规定者，经社员2人以上之介绍，得向合作社委员会申请入社。

合作社委员会对于前项申请无异议者，得暂准其入社，于社员或代表大会开会时，提请追认。经否决者视为自始未加入，其因社员资格而得到之利益应予退还。

**第二十二条** 社员有遵守社章与约定之义务，但社员（个体或小组）依法出卖产品及购买货物，有其自由。合作社对社员有负扶植之责任，无强令社员卖给产品与强令买其货物之权。

**第二十三条** 新社员与旧社员之权利义务同。

**第二十四条** 合作社经营对社员之利润或手续费不得超过1分。对社员之贷款月利不得超过1%。委托运销手续费须少于出售价格，超出预定价格部分2/10。

**第二十五条** 社员向合作社买或贷之物品不得转让于他人。社员向合作社所贷之款，不得转让于他人。

**第二十六条** 社员向合作社请求贷款或货物须有社员2人之保证。借款人不能偿还时，保证人负连带责任。

**第二十七条** 合作社之损失，由社员共同负责。但因合作社职员过失所致之损失，应有合作社职员负责赔偿。

**第二十八条** 合作社之帐目，应每两个月于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开会时报告一次，每半年清结一次。

**第二十九条** 合作社之利润，每半年分配一次。其分配之标

准如下：

（一）20%为合作社基金。

（二）5%为职员奖金。

（三）10%为股金利息（简称股息）。股息按款数之多少、日期之久暂分配之。

（四）55%按各社员之交易额分配。交易额与红利之计算，应依不同业务往来分别计算，汇总发给社员。零星消费品之供给得不计交易额。

（五）10%为公益金。

**第三十条** 各社员得随时请求出社，但因社员身份向合作社所贷之款项及其他物品，应即偿还。所负之责任，截算至帐期终了之日为止。其应得利益除股金外，均不得享受。

**第三十一条** 社员不履行义务，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决议得为除名，其权义［益］准用前条之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正。

**第三十三条** 本章程经过边区合作社推行委员会通过，由边区合作社筹备处公布施行。

# 鲁西南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初步调查*

（一九四三年）

陶　力

## 一、租佃关系

### （一）绪言

鲁西南土地比较集中，地主、富农除了与小种地联合使用雇工以外，单独使用雇工经营者为数极少，即使有也是采取异常落后形式，并带有极浓重的封建习气。因此，雇工经营者，不管质和量，都较其他地区更为微弱，所以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成为农村中最主要的矛盾。

鲁西南的租佃关系，大体上同濮县、范县一样，有小种地和二八分成的承苗锄的经营地主（小种地和承苗锄在鲁西南各地的土名极不一致），有大种和课地的出租地主。这几种租佃形式所占比重如下：

| 项目 | 全村地亩总数 | 租地总数 | 租种地对总地亩数% | 小种地 | | 大种地 | | 课地 | |
|---|---|---|---|---|---|---|---|---|---|
| | | | | 亩数 | 占全部租地% | 亩数 | % | 亩数 | % |
| 菏泽7村 | 11608.7 | 4452.3 | 38.3 | 3344.4 | 75 | 602.9 | 13.9 | 505 | 11.4 |
| 东垣5村 | 9371.7 | 2402.1 | 25.6 | 1046.1 | 43.5 | 713.1 | 28.7 | 642.9 | 26.6 |
| 合计 | 20980.4 | 6854.4 | 32.2 | 4890.5 | 64.3 | 1316 | 19.2 | 1147.9 | 16.5 |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769—782页。

以采取小种制经营的土地为最多，大种地次之，课地又次之，并且小种地的比重是随着土地集中的程度加重而加重。小种地是地主自己集中经营，而大种和课地却是地主土地极零星的分割出租的佃户经营(即农民经营)，因此，课地和大种所占的地亩虽少，佃户的数量却最多，许寺和□□的统计也可说明。

| 项　　目 | 实有数 | % | 对全村土地之% |
|---|---|---|---|
| 全村土地 | 2124.8 | | 100 |
| 小种地亩 | 640.5 | 61.6 | 30.1 |
| 大种地亩 | 219.7 | 21.2 | 10.3 |
| 课地亩数 | 179 | 17.2 | 8.5 |
| 合　　计 | 1038.2 | 100 | 48.9 |

| 项　　目 | 实有数 | % | 对全村户之% |
|---|---|---|---|
| 全村户数 | 127 | | 100 |
| 小种户数 | 20 | 26.7 | 15.7 |
| 大种户数 | 21 | 28 | 16.5 |
| 课地户数 | 34 | 45.3 | 26.8 |
| 合　　计 | 75 | 100 | 59 |

### (二)各种租佃关系的内容及其剥削程度

甲、小种制的一般情形与剥削程度

小种地在鲁西南各地的土名不一，譬如在南华临河区的贾庄叫做拉鞭地，菏泽的孙花屯、张集、郭寨都叫小种地或三七分，许寺以及东垣王屯又叫做耙牛地。它的内容都差不多，但是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也有些分别。

一般的是，承种人（土称种地的）供给全部劳力，场里、地里活都管，并带有简单的手具，锄、镰或钐（割麦子用）。牲口、种子、肥料、农具由地主购备。

承种人中间一般的是没有分工，有活大家一起下手做，即使有分工也不明显。如菏泽的孙花屯，承种人多的地主有领活的一个人，吃七分股；有掌鞭的一个人，地多了有二鞭、三鞭，也是吃七分股。掌鞭的用的鞭梢是承种人共同凑钱买。普通的承种人吃六分股。

1、正副产物的劈头

| | 正产物分成 | 副产物分成 | 备注 |
|---|---|---|---|
| 南华贾庄 | 三七到底 | 高粱秆九一分，乱秆对半分 | 有的对半摊粪钱，有的不摊 |
| 菏泽孙花屯 | 三七到底 | 高粱秆二八分，乱秆对半分 | |
| 菏泽大张集 | 麦二八秋三□□ | 高粱秆二八分，不分乱秆 | |
| 菏泽耿寨 | 三七到底 | 高粱秆九一分，不分乱秆 | 三七摊粪钱 |
| 菏泽郭寨 | 三七到底 | 高粱秆九一分，不分乱秆 | |
| 菏泽水牛李 | 三七到底 | 高粱秆、芝麻秆、花柴九一分 | |
| 菏泽小彭庄 | 三七到底 | 高粱秆九一分，不分乱秆 | |
| 菏泽小王庄 | 三七到底 | 高粱秆九一分，不分乱秆 | |
| 菏泽许寺 | 三七到底 | 高粱秆九一分，不分乱秆 | |
| 东垣王屯 | 三七到底<br>二八五到底 | 高粱秆、芝麻秆、花柴<br>三七到底或二八五到底分 | 三七<br>二八五 摊粪钱 |

关于副产物的分成在大张集和耿寨一带，还有一段地主逐渐加重对佃户剥削的悲惨历史。据说，在大张集原来是高粱秆九一分，乱秆归佃户，耿寨是不分柴，乱秆归种地户，这是老辈子的规矩。大概在40年前，刮了一场大风，高粱大半都歪了，地主不愿按规矩了，从此就改成了现在的样子，佃户却吃了亏。

2、额外的无偿劳动的剥削

承种人按规定不给地主喂牲口，但是一般的还需要管打饮牲口的水、出粪、铡草、垫圈这一类的活。可是几年以来，规矩也改了不少。例如，菏泽的小彭庄，按规矩是地主喂牲口，现在呢，忙了东家喂，冬天成了种地的喂、地主只管饭的无酬劳动；从前铡草地主管饭，现在不管了；从前打饮牲口的水有固定的种地户担任，并且地主每年给一布袋粮食作为报酬，以后改成一串钱，现在取消了。有些地方，如南华贾庄，种地户还要管喂猪。

合麦秸垛、晒麦、扫雪以及给地主打杂差，是普遍现象。这还是表示了小种地承种人的半农奴的性质。近年来，有的地主甚至将合麦秸垛与晒麦子合成一天进行，以加强种地户劳动的紧张程度，并节省饭食。加重剥削的花样真是无奇不有的。这一带，在过去开耧动锄以前，地主尚须借给种地户每人1布袋到2布袋的粮食，叫做锄地粮(也称垫底粮、铺底粮、把锄粮)，收割以后偿还，无利，借什么还什么。但是也有的是“平斗借尖斗还”的，现在有些“麦芒水泡”的地主把这一规矩也取消了。

里打股的现象也有，不及濮县、范县之多，这同富农经营不发达是联系着的。里打股中的雇工里打股，多半是“两把奔（？）”的雇工，他们既需喂牲口管里活，又需要下地，所以做活的效力是远不如种地户，但也替地主里打一股分粮食。至于地主自己的里打股，则是“养老股”居多的。里打股一般地说是加重对承种人的剥削，“里打股，外自憋”，特别是在减租增佃以后。

鲁西南的小种地的种地户负担杂差之多，在边区来说，是相当严重的。但为什么在正产物与副产物的分成上比濮县、范县或清丰、南乐一带更大些呢？据我们了解是可以由以下的情形来说明。

第一、是由于里手的添加。这里有所谓取里手的规矩，这是普遍的现象，即承种一股整股地，都是两个人(男人和女人)，一个人独手活的“光棍股”只能吃五分股或六分股，里手吃三分股，里

手管拔苗、削谷子，帮助割砍庄稼、剥玉子等活，就是说一整股活所包括的劳动比濮县、范县加重了。这样一个承种人虽然所做的活同濮县、范县一带的承种人一样，而结果只能吃七分股，实际上只等于七九对二一的分成了。有些地主却可以以一个不顶事的女人或小孩以里手的名义，而吃三分或四分股的分成。

第二、"当槽"工粮的支付。在这里有的地主，如许寺、大张集，雇佣"当槽的"（不下地专管喂牲口的雇工）及做饭的女工，没有工资或是工资很少，而每年收成以后，从尚未分的大堆里给雇工1布袋或2布袋粮食，作为工资的一部或全部。做饭的女工在麦收时，也可以在地里拿几个麦捆子（最多能打麦3斗），这同样的是减少了种地户分成的办法。

3、承苗锄的特点

承苗锄这里也有，但是为数甚少，这也可以说明这里的富农经营是十分不发达的。一方面，据我们这次调查的10个村子，只有3个村子有这种租佃关系。

菏泽的孙花屯称为"播种地"，正产物与高粱秆都二八到底分成。菏泽的郭寨土称"播锄地"，正产物是秋二八分，麦不分正产物，由地主收割，副产物麦秋都不分。

东垣的王屯，土称"小耙牛地"，二八到底分正产物，不分柴。

承苗锄一般的规矩是只管锄与收割，不管耩、犁、耙，因此也不管打饮牲口的水、铡草、出粪、垫圈、打杂差等活，也就是说它在一般情形下是富农经营方式，封建束缚较轻。但是，这3个村的承苗锄，以上的活，只要地主管饭就必须做，成了只管饭的无酬劳动。正像郭寨的一个佃户所说的："既然想种地就得和掌柜的要好，掌柜的叫去哪能不去？除非你不想种地，那就没办法了。"这正表示了这里的封建束缚之严紧与富农的地主化色彩之浓厚，以及地主又如何以较进步的形式掩盖了加重剥削的实质。

乙、大种地的一般情形和剥削程度

大种地也有称之为“拥出地”或“赔牛地”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地主一切不管，一切生产工具与成本由佃户出，正产物对半分，副产物归佃户；另一种一切生产成本都是主佃各出其半，工具归佃户出，正产物对半分，副产物除草归佃户以外也对半劈。

负担问题也极不一致的，有的是里打差（即地主负担），有的是各出一半，有的是外打差。大致上在战前多半是里打差，战后一部分改成外打差了，是逐渐向外打差的方向发展。也有的是因为是外打差的关系，而改成倒四六分成者。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大种地的种地户在战后还有增加给地主打杂差者。如东垣的王屯，就是要大种地的佃户和小种地的承种人一样的只管饭而无酬地替地主送信、接送亲戚、赶集等，这样对大种地佃户的剥削就更加残酷了。

负担问题的外打差的办法，是实际上提高租率的办法。拿许寺来讲，去年每亩共负担米麦24.5斤，而大种地每亩收入平均麦72.4斤，秋72.6斤，2斤粗粮合1斤细粮，则每亩收126.9斤细粮。“二五”减租后，交租47.59斤，负担比减租的数目还大。以此计算，未实行减租的租率实际已达69.3%，减租后仍达56.8%，即使是倒四六分成的外打差，“二五”减租后成为三七分成者，由于佃户负担的结果租率已达49.3%。

由此可见，负担问题对减租的关系，是如何必须连带到一起处理。更可以看到，地主的如意算盘是打得怎样熟练了。鲁西南减租后的新租约上却规定为“除田赋由业主交纳外，其余负担仍按旧例”，这无疑是给外打差现象以合法存在的地位。

丙、课地的一般情形与剥削程度

课地是死租制，生产成本、工具，甚至负担，地主都不管，只收定额租的办法。不过还有少数课地是地主负担的。

课地的地租因地区和地质的好坏而有所不同。据我们调查的

几个村如下表：

| | |
|---|---|
| 大张集 | 每亩100斤麦秋各半，柴40至50斤；佃户负担。 |
| 郭寨 | 每亩一麦二秋（每斗30斤），柴50斤；地主负担。 |
| 小彭庄 | 每亩100或80斤麦秋各半，柴10个秫秸；佃户负担。 |
| 王屯 | 每亩一至二斗麦秋各半（每斗40斤麦），柴无（地质很坏，□地）；佃户、地主负担都有。 |
| 许寺 | 每亩100斤麦秋各半，地主负担。每亩80斤麦秋各半，佃户负担。 |

（注）以上只是各村大致情形，个别的因地质特好或特坏者，地租仍有增减，一个村以内情形也不完全一致。

课地的地租，无论丰收或歉年都须交租。它的租率仍以许寺为例计算：

按大种地去年收获量，麦72.4斤，秋72.6斤，租率为69%；

按小种地去年收获量，麦85.8〔斤〕，秋78斤，租率为57.5%；

课地的收获量，一般的是不会比大种地高的。

佃户负担，租额80斤者，“二五”减租后，租率仍达60%。

丁、战后租佃关系的新变化

抗战以前在鲁西南，课地是一种比较稀少的租佃形式，在抗战后才逐渐发展起来。菏泽许寺的演变是这样：

| 小种地业主 | 户 | 股数 |
|---|---|---|
| 战前原有 | 14 | 34 |
| 现在改成为大种课地 | 5 | |
| 现在小种减少大种增多者 | 1 | 1 |
| 现在仍是小种者 | 6 | 19 |
| 现在改成雇工经营 | 2 | |

课地发展的原因，首先是为了转嫁战时的负担。在各方面（敌、

我、顽）互相斗争的混乱的局面下负担繁重，土地简直成为累赘——地主为减轻自己的负担，就把土地外打差课出去了。

其次是抗战初期社会秩序不安定，地主为了避免牲口、工具损失，缩小自己的目标，把土地课出或大种出去的也不少。东垣王屯的一个地主这样说："前6年的时候，土匪乱得厉害，小种吧，怕土匪把牲口拉走，从□会起，就改成课地了。"这反映了社会秩序不安定给地主相当大的影响，使他们的生产情绪降低。他们不从积极地增加生产方面着眼，反过来却加紧了对佃户的压榨，以弥补其损失。另外，也反映了在战争环境里，小的生产者，是具有顽强的生活力，特别是实行了合理负担，适当数量的土地租入，对贫农是很有利的。

## （三）各种租种地经营的比较

甲、小种地的经营情形

小种地是由地主集中经营，因此经营的规模比较大些，而大种地和课地的经营则甚为分散。下面是东垣2个村，菏泽8个村地主农场面积及其经营的统计：

| 地主类别 | 户 | 自耕地 | % | 小种地 | % | 课地大种地 | % | 总计地亩 | % | 每户平均地亩 |
|---|---|---|---|---|---|---|---|---|---|---|
| 1—10 | 7 | 2 | 6.4 | 4 | 12.8 | 25.2 | 80.8 | 31.2 | 100 | 4.5 |
| 10—30 | 15 | 68 | 22.2 | 146.8 | 48 | 91.1 | 29.8 | 305.9 | 100 | 20.4 |
| 30—50 | 20 | 135.2 | 15.8 | 590.7 | 68.8 | 132.1 | 15.4 | 858 | 100 | 42.9 |
| 50—100 | 23 | | | 1306.6 | 72.6 | 493.7 | 27.4 | 1800.3 | 100 | 78.3 |
| 100—150 | 12 | | | 1226 | 81.8 | 273 | 18.2 | 1499 | 100 | 124.9 |
| 150—200 | 5 | | | 713.5 | 80.8 | 169.2 | 19.2 | 882.9 | 100 | 177.6 |
| 200以上 | 4 | | | 464.4 | 52.7 | 416.6 | 47.2 | 881 | 100 | 220.3 |
| 总计 | 86 | 205.2 | 44.4 | 4452 | 71.1 | 1600.9 | 25.6 | 6258.3 | 100 | 72.8 |

上表指示出，10亩以下的土地所有者，主要是采取课地大种的经营方式；30亩地以下者，或系缺乏劳动力，或系没有经营能力的孤寡，土地也不能全部自耕或小种，课地大种也占了一部分；至于50亩以上，特别是100亩至200亩的地主，小地主的经营方式已经逐渐成为主要的经营方式，而200亩以上的较大地主，课地和大种在其经营当中所占的比重又增加了。

100亩左右的地主，他们不仅是多半采取小种经营，并且还善于采取联合剥削的形式，这可以从下表中看出来。

**菏泽7个村的统计**

| 小种 | 小种亩数 | 股数 | | | 雇当槽雇工不打股者 |
|---|---|---|---|---|---|
| | | 外股 | 里股 | | |
| | | | 自力股 | 雇工股 | |
| 10—30 | 43 | 2 | 1 | | |
| 30—50 | 374.9 | 9 | 1 | 1 | |
| 50—70 | 492.8 | 11 | 1 | 5 | |
| 70—100 | 562.8 | 9 | 0 | 6 | |
| 100—150 | 1086 | 13 | 7 | 10 | |
| 150—200 | 529.5 | 15 | 0 | 1 | 2 |
| 200以上 | 464.4 | 12 | | | 3 |

小种地承〔种〕人平均每股承种20至30亩之间。

下表是菏泽许寺、桃横寨、东沙岗及东垣吕海、杨庄的统计：（见37页）

乙、大种地的经营情形

据菏泽许寺、桃横寨、东沙岗及东垣吕海、杨庄5村统计如下：（见37页）

每户平均在5亩以下的最多，其零散的程度可以想见。

| 承种地类别 | 股　数 | 承种地亩数 | 每股平均数 |
|---|---|---|---|
| 10亩以下 | 11 | 73.9 | 6.7 |
| 10—20亩 | 10 | 164.6 | 16.4 |
| 20—30亩 | 18 | 509.3 | 28.3+ |
| 30—50亩 | 14 | 626.0 | 44.7 |
| 合　计 | 53 | 1373.8 | 25.9+ |

| 租种地类别 | 户　数 | 租种地亩数 | 每户平均 |
|---|---|---|---|
| 10亩以下 | 22 | 79.8 | 3.6+ |
| 10—20亩 | 7 | 74.0 | 10.6 |
| 20—30亩 | 3 | 80.0 | 26.6 |
| 30—35亩 | 1 | 31.0 | 31 |
| 合　计 | 33 | 264.8 | 8.2+ |

丙、课地经营情形比之大种的经营更加零碎了。如下表：

| 租地类别 | 户　数 | 租种地亩 | 每户平均地亩 |
|---|---|---|---|
| 10亩以下 | 112 | 414.6 | 3.72 |
| 10—20亩 | 7 | 78.9 | 11.27 |
| 合　计 | 119 | 493.5 | 4.14 |

这种零碎的分割，会使土地、人力、工具的浪费程度更大了。

有些地方，像东垣的王屯倒也有大块承租经营的，那里大种的佃户，普遍都是自有地10至20亩的中农，甚至有多至40亩者。承租地亩多在20亩至100亩之间，按理说应该是接近富农经营了，可是地主的封建剥削未减轻，并且随着地主的破产，租种条件反

而愈加苛刻了。生产技术并未能继续向前推进，而生产量也未能提高。

丁、各种佃户的比较

小种地的承种人，多半是乡村中最贫苦的，其中无地的约占半数稍弱，有地的每人平均地亩也仅仅有 2 亩。而大种和课地的佃户，则比较稍好些，但每户占有10亩地以下的佃户也是占绝对多数。这说明他们自有的土地不够供家庭的消费，而又被自己的小块土地束缚，不得不在最苛刻的条件之下租种土地，下表即可证明。

**菏泽8个村、东垣2个村的佃户调查**

| | 小种地承种人 | | | | | 大种地承种人 | | | | | 课地承种人 | | | | | 大种和课地佃户，自有地多者，租地反而少，这是因为地租苛重的关系。生活有办法，就不愿租地。 |
|---|---|---|---|---|---|---|---|---|---|---|---|---|---|---|---|---|
| | 户数 | 人口 | 自有地 | 承种地 | 平均亩 | 户数 | 人口 | 自有地 | 承租地 | 平均亩 | 户数 | 人口 | 自留地 | 承租地 | 平均亩 | |
| 无地 | 4 | 21 | — | 84 | 22 | 2 | 6 | — | 8.2 | 4.1 | 2 | 11 | — | 9.7 | 4.85 | |
| 1—5 | 10 | 56 | 36.6 | 273.5 | 27.3 | 1 | 5 | 5 | 2 | 2 | 12 | 57 | 39.4 | 73.7 | 6.1 | |
| 5—10 | 6 | 36 | 45.3 | 129 | 21 | 4 | 15 | 28.6 | 14.9 | 3.9 | 18 | 104 | 135.9 | 107.1 | 5.9 | |
| 10—15 | 3 | 25 | 37 | 65 | 21.6 | 1 | 8 | 13 | 2 | 2 | 7 | 52 | 92.7 | 25.5 | 3.5 | |
| 15—20 | | | | | | | | | | | 2 | 17 | 37.8 | 9.8 | 4.9 | |
| 总计 | 23 | 138 | 118.9 | 551.5 | 23.9 | 8 | 34 | 46.6 | 27.1 | 3.4 | 41 | 241 | 305.8 | 225.8 | 5.5 | |

## （四）小结

总起来说，鲁西南的租佃关系，较其他地区更为落后，封建色彩更为浓厚。这主要的表现在，小种制中的取里手的剥削，承苗锄的不发达，种地户的无酬劳动之多（喂猪、扫雪），大种地

和课种地的租率苛重，甚至还有给地主打杂差的现象（这是其他地区所少见）。这表示了佃户某种程度的不自由，被束缚于土地上作为土地的附属品的程度较其他地区更甚。

在战争环境当中，因战争的影响，特别是合理负担及减租法令的执行，使这三种租佃形式起着很大的变化。

甲、以小种地来说，或是改为课地或大种，或是里打股的现象增多。改为课地或大种的目的，在地主来讲，是转嫁负担及战争中的损失，或者是为了抵抗减租法令，而用变更租佃形式的办法以保持其苛重的封建剥削。里打股的原因，则一方面是以吃养老股的办法来捞回减租中损失；另一方面则是真正地或不知不觉地参加了部分劳动，向着富农经营方式发展。我们应从限制其加重剥削使其名符其实地参加劳动当中，争取后一前途的实现。

乙、以大种地、租课地来说，战后虽然增加，经营分散是其弱点，但减租后对农民也并非不利的，因为这种租地，是佃户经营的（即农民经营）。一部分贫农或中农，因为生活的改善，有力自备成本、耕具，而能更多地租入一部分土地，只有［要］我们贯彻减租及合理负担，减轻其苛重的地租剥削以及残存的身份隶属关系的束缚，保护他们的永佃权，这［就］会繁荣了小农经营，使粗放的经营变为集约的经营。这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雏形的另一条道路，我们应努力争取。以上这两条道路是同时存在着的。

## 二、雇佣关系

这里纯粹的富农经营比较少，所以地主、富农的土地的雇工经营，多半是与小种地经营联合着，这形成鲁西南雇佣关系上的特点。

雇工中间分“当槽的”与“做活的”两种。

当槽的是土地、牲口较多，小种经营，而专门雇工管喂牲口的叫当槽的，做里活较多。

做活的，也叫做“两把奔(？)”，他既管喂牲口，又需要下地做活者就是这种雇工。一般的是喂马，土地、牲口较少，雇工替地主里打一股，或者是单独地雇工经营。雇工工资形式很复杂，有的是代种几亩地的办法，当槽的工资多是这种形式。地主分给三四亩地，由雇工自力小种，和其他佃户一样，采取三七到底分成，这几亩地所分谷物作为工资，农忙时，帮助小种地承种人套车、扛布袋，每季或半年可以从大堆上给他1布袋粮食，歉收时就没有了。这种工资的形式可以说是谷物工资，但又和力役、地租有什么分别呢？为了代种几亩地而给地主只管饭而无酬的喂牲口，喂牲口的代价只是管饭而已，独手人多是如此，因没人做饭，但如果是把管饭当作喂牲口的代价，代地这一点就和小种地承种人很难分别了。

去年许寺村当槽的，由代种地中分粮150斤，丰年可分400斤。做活的雇工代地的不多，但也有，多半是货币工资。去年工资在100至300元之间，今年有至2000元者，可是又能买多少粮食呢？工资的微薄可以想见。

这种形式的工资，很落后，又很普遍，在增资工作中是应当做特殊问题来研究的。

另外有做饭的女工，工资更少了，许寺的每人每年给10元，她们除了地主管饭，在麦收时可以在地里拾点麦子以外，没有任何报酬的。由于鲁西南的大地主较多，所以做饭的女工，占着不很少的一个数量。

# 发扬革命英雄主义*

（一九四四年六月）

姜思毅

今年的“七一”、“七七”纪念，军区只指示了一个工作：各部队开“连队群英大会”，其目的就在发扬革命英雄主义。

个人英雄与革命英雄有根本区别，前者力谋个人名利，后者力谋革命功利；前者是打击旁人，英雄自己，后者是联系群众，作群众的先导；前者是装模作样，自尊自称的，后者是在群众中自然涌现，为群众公认的。我们坚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大大发扬革命英雄主义。

历史是群众的历史，革命是群众的事业，工作成绩与经验都是广大群众所创造，不是少数人员干得来的。如果没有群众的斗争，历史如何前进？如果没有群众的创造，领导的办法从哪里来？群众是革命工作的原动力。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干好，唯有发扬起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扬群众中的英雄人物与英雄事迹。这就是我们革命工作的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

思想领导应该有反对黑暗，发扬光明，破坏坏的，建设好的两个方面。而对于革命同志与革命人民，基本上是歌颂与发扬其光明的一面。这即是说：我们反对一切个人地位、个人风头、个人名利观念，同时发扬一切公而忘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辛勤

---

* 本文最早发表在冀鲁豫军区《战友报》第64期（1944年6月25日）。摘自姜思毅《生命线的探索（政治工作五十年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劳动、克己奉公的英雄模范。我们破坏着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同时建设着革命英雄主义思想。而我们革命队伍之所作所为本来即是革命的英雄事业，革命同志的身心言行基本上都是光明正派的，即使有缺点，一般地说也是残余的、个别的和可以改进的。故对于他们，揭发“黑暗”与发扬光明不是“一半对一半”的事，发扬其革命英雄主义则是思想领导的基本任务。

但上面的道理，目前也许尚未为一部分同志所认识。这一部分同志一直没有眼睛向下，而是昂首望天，只在教导群众，不去学习群众，只当先生，不当学生，他的眼睛是没有什么群众，只有他自己！群众都不英雄，唯有他英雄！群众都落后无知，哪里会有什么值得发扬的创造？！或者他们面前只是一片“黑暗”，看不见光明，周围全是卑微愚蠢的，哪里会有什么“群英”？！于是他便只有成天搜索革命队伍里的“黑暗”，发泄其非无产阶级的牢骚与冷嘲热讽，从没有深入现实，深入群众，发现群众创造之伟大，总结群众经验，发扬革命典型，引导大家跟着这个榜样前进。或者，他们的工作被官僚主义架子、形式框子限制住了，不是发现不出任何的东西，便是只能发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群众中的精英创造与人物都被埋没了、限制了。或者他们的工作老犯着平均主义，不知道抓中心找典型，从典型着手，也难以把群众英雄发扬起来。

当前，边区部队中，还缺乏一种提倡、表扬、奖励、学习革命英雄主义的群众热潮。难道我们真是没有一点值得发扬的英雄事迹，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革命英雄吗？若干年前不说，就说近一年的吧！我们进行了反“扫荡”、反顽固派、保卫麦收等等多少胜利的战役与战斗！我们进行了多么艰苦卓绝的小部队活动！我们是怎样的渡着与渡过严重的灾荒，而又在广大平原上（无论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进行着生产？……这不是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干出来的吗？这其间不是有无数革命

英雄在起着伟大的作用吗？如果真是没有广大同志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我们斗争的坚持，胜利的取得，将会是不堪设想的。但对于这一些，我们发掘了多少？奖励了多少？我们总结了他们多少经验？我们足够地向他们学习了吗？我们做的是不够的！这就会影响到更多更大的英雄事迹与群众英雄的出现！影响到我们领导作风的改进，影响到思想教育的深入。今后再不能马马虎虎地下去了。显然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发扬，将会大大推进我们的思想建设。

革命英雄主义要通过具体事迹具体人物表现于行动中。故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即从表扬已有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工作模范着手。革命英雄也不是预定一个框子主观制造的，而是群众斗争中、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逐步提高、逐渐培育起来的。这一次连队群英会的工作，仅仅是开始，我们总结一些值得学习的模范事迹与人物，摸索一些经验，为今后必须做好的这一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经常性工作与举行更大规模的群英大会作个准备。其要求是不高的，但其意义却是重大的。愿边区全党全军立即在军区的指示之下动作起来，而不把它当作一件可有可无的纪念节日的临时工作。

# 关于滑县群众运动
# 向中共平原分局的汇报提纲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

**纪登奎**

滑县群运，从分局高干会后4月15日开始的，到现在已有半年时间，大体经过了两个阶段：

从4月15日至7月7日，普遍开展民主斗争，反恶霸，反贪污，查“黑地”；但也同时进行民主斗争，增佃、减租、增资等。这一阶段群众虽也初步发动起来，但基本上属于干部包办代替的。

7月总结了经验，到9月底，以深入开展“查减”运动为主，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纠正包办代替，充分走群众路线，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

我写了一篇《滑县查减运动简报》，已在报刊上发表了。我的汇报不再重复那些问题，〔只是〕汇报一些群运中我的若干体会，当然是些不成熟的东西。

我的汇报提纲如下：

一、民主斗争的政策问题；

二、斗争过程中的阶级变化和我们的政策；

三、关于争取中间力量问题；

四、在政策执行中发生的偏向；

五、阶级动态的分析；

六、“左”的倾向的滋长；

七、贫雇农查减运动的高涨；
八、“左”的原因与我们纠“左”时发生的偏向；
九、地主反攻与反复辟问题；
十、调整阶级关系；
十一、分配果实与休整工作；
十二、村政权的建设；
十三、树立农会贫下中农的优势；
十四、检查政策执行的情况与意见；
十五、大胆放手发动群众问题；
十六、查减运动与各方面工作结合问题；
十七、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问题。

## 一、民主斗争的政策问题

群众揭发的材料，有地主历史罪恶，有新的罪行，新仇旧恨要一起算，而我们的政策，主要是算新帐，一般不算老帐，这同群众思想发生矛盾。

所谓老帐，包括1938年敌人进攻时，国军南退，土匪又起，秩序混乱。我军进入，实行了某些“左”的政策，造成1940年“五五扫荡”的残局。1940年伪军占领区，汉奸、地主杀人、杀共产党员，地主向贫农报复打击，白色恐怖。群众对敌人的残酷镇压极端仇恨，要求打击这批恶霸、汉奸、还乡团要比对一般地主瞒“黑地”、贪污迫切的多。因此，对政策发生争论是必然的。

在干部与群众中展开争论的主要之点有：算老帐不算老帐？杀人是否要偿命？抗联为何不处理杀人问题（一般是农会斗争后把地主交政府处理）？对地主敲诈农民财产的损失是否赔偿？

这些问题，在人民中已成为普遍要求解决的问题（一般中小

地主也要求解决）。这就成为这次民主斗争中必须解决的政策问题。

我们的政策：

（一）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允许农民算老帐。发动农民揭发追究地主历史上的任何一件恶迹，特别是清算他们和敌伪勾结通敌的汉奸罪恶。只有如此，才是彻底的抗日的反封建的民主斗争，也是反对顽固势力，满足农民要求的最重要的政策。

有人讲，个别私仇是否追究？在农民与地主之间，从根本上说，无所谓个别私仇，而应当把所谓私仇提高到阶级的公恨〔上来〕。

（二）但是在算旧帐的时候，应当对地主加以区别。旧帐具有普遍性，大都是在敌人伪政权时期，日本人指挥干的（如杀人者都处以死刑，那要杀相当多的地主）。因此，应当区别罪大恶极的与一般的，对大顽固与小顽固，死心塌地的与可以回头的加以区别处理。

对一般地主，可按政府新颁布的新政策执行。对旧帐，说服群众可以斗争、处罚，一般不杀。

对大地主（顽固首要分子），主要的统治者，应发动群众新帐老帐、一切反革命行为一起算，并从重打击。

杀人不可过多。若按照每个地主的罪行，一个一个地看，都可杀。但杀人过多，不加区别，会造成赤白对立，对团结地主抗日，对统一战线，对争取中间势力都是不利的，甚至连一般农民也不会同情的。

我们一定要加以区别，杀几个罪大恶极者，对一般的分别以罚款、斗争。有些村对一般杀人案采用旧习惯，地主拿埋葬费、立碑，举行治丧仪式，使被杀的农户"消气"了。

在新的法令下达后的杀人（根据地内），一般都处以死刑。

（三）对农民财产损失，都赔偿给损失户，这样数量太多，

农民通不过。一般采取果实实行农民平分，损失多的可多分一点。

（四）特别对抗日政权在根据地建立后颁布了新的法令之后，顽固地主仍勾结敌人，杀人、倒算、瞒“黑地”、贪污、恶霸，最顽固的死心塌地的汉奸，十分孤立，各阶级各阶层都反对。应采取从重处理，并坚决镇压之，不杀不平民愤，根据地社会秩序也无法维持了，政府说话也没人听了。如开万人大会杀了杜老拨，可谓人心大快。

## 二、斗争过程中的阶级变化和我们的政策

从金木营斗争开始，在全区广泛推行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形式。接着，马吉林、黄庄、何寨、三区路寨、七区高平等村一个接一个的取得了胜利。但斗争的开展还不够迅速和普遍。我们确定采取更大的行动，对全区地主大头子岳朝中联合3000人进行了斗争。接着在寺台对全区头号恶霸杜老拨，联合〔组织〕1.5万余人、22个村庄联合行动，在大会上宣判，处杜老拨以死刑，全区局面打开了。

（一）顽固势力的几个重要首恶（岳朝中、杜老拨等人）遭到痛击。杜、岳等均被重罚，李×罚粮150石，黄×罚粮150石，岳朝中300石，朱×50石，马×15石。他们在政治上已完全孤立，连小偷、流氓、曾当过土匪的人也起来揭发他们这些顽固派。他们的公开统治虽然垮台了，但都转入了地下活动。

金木营的李生善，此人也是地主恶霸，贪污、反共，无恶不作，但愿低头认罚。我们采取罚而不杀的政策，这对全区类似犯有李生善罪恶而又表现愿意悔改者，是一种宽大政策的示范。群众要处死，我们说服了群众：“他不改，再杀不迟。”局面稳定下来了，中小地主一个也没有跑到敌区去。

地主分化。大部分愿抗日，同我们合作，不跑到敌人那边去，这对群众是有利的。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

由于对岳朝中、黄国体这些大恶霸都采取了罚而不杀的政策，取得了胜利，干部又偏到另一面，发生了宽大无边的苗头，引起群众不满。

我们决定对“五五扫荡”后，反攻倒算搞复辟的全县最大的首恶之一寺台杜博卿（外号杜老拨）狠狠打击。（其罪行：贪污粮食50余石，奸污妇女60多人，杀人20名，全村每家都被抢劫，等等。）采取全区农民数万人联合行动。斗争会上，控诉的人一下午未讲完，第二天再讲，群众情绪极度高涨，已无法控制。在万众一致高呼“杀”的口号声中，当场处以死刑，并以政府名义布告全县。

处死杜老拨的意义：清算了在敌人“扫荡”时地主反攻倒算罪行，给农民撑了腰；对已打过罚过（甚化［或？至？］罚的偏重一点的）地主是个拉，他们觉得对他们还是宽大的。这对促进全区地主分化作用颇大。

（二）对杜等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小地主、开明士绅都参加了。他们参加的动机各有不同：有的是狗咬狗，内部矛盾，家族私仇；有的是躲躲风头，怕连累自己；有的是掩盖自己的错误，求得群众原谅。不管他是什么动机，他们参加揭发，就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解除落后群众顾虑。他们这种分化，哪怕是暂时的，我们也要利用地主之间的矛盾，这对斗争是有利的。

在大顽固地主被打倒后，一般地主动态的具体表现：

1、他本身有错，怕斗，积极在农会内找依靠。一面收买村干部作靠山，一面收买农民作耳目。地主这种手段，确实对农会组织起了极大的腐蚀作用。

2、他们表面对我们很好，主动接近进步力量，要求从轻处

理，表示悔过。

3、也出现了一些开明的“开明士绅”，但一般的这种“开明”是采取的退却政策。他们给农会写信、捧场、送礼，招雇工当女婿。只要保住命，什么办法都可“开明”了。

4、在运动高涨中，地主家庭里分化出来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同地主家庭决裂，要求抗日，要求个性解放，要求进步、民主、自由。有相当一部分（约有数百人）参加了工作或参了军。争取团结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党的正确政策，不可把他们同地主同样看待。

半年来实践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

## 三、关于争取中间力量问题

召开开明士绅会议（实际是中小地主会议）。在会上，我们表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正确言行，批评了他们中一些人的错误，希望他们执行法令，合作抗日。在会上，允许他们说话，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主要的有：（一）李文亮处理，材料不确；（二）对岳朝中罚得过重；（三）斗争会不要打骂捆绑，政府为何不管？

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作了明确的答复：

（一）李文亮材料不确，我们可更正。其实是小斗换成大斗，把杂粮换成麦子。可改过了就是减轻了。但处理并不是不确。难道小斗、杂粮就可以剥削吗？

（二）岳朝中从重处理，不是农民的责任，是他自己顽抗的结果，后果自负。

（三）斗争时，打骂、捆绑、吐脸之类事，我们历来不赞成，我们主张摆事实讲道理。抗联同志禁止，亲自拦挡。在寺台大会上，你们也看见过，农民喊口号骂我们“包庇汉奸”！各位想

想，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如果是杀了你的父亲，打他几下你觉得怎么样？

有不少地主，包括你们在座的几位先生，都犯有逼死人命罪，政府都从宽处理了，群众打骂了杀人犯几下，怎么，你们要政府把他们都法办吗？当然，我们还是教育农民不要打人骂人，请不要误会，我们不是鼓动农民打人啊！

（四）政府不是不管，大家知道，如政府开人民法庭审讯，对杀人者要判死刑的。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少杀人，让群众调解。这实际上是一种宽大政策。

地主们听完答复的讲话，多数人表示："是这个理。"会上一致议定建立调解委员会，协助政府工作。六区白、杜、郭、刘、孙省等上层人士都参加了区政府调解工作。政府通过他们这些开明士绅出面调解，劝地主承认错误，接受罚粮，一般都起了积极作用。曾有两个"开明"人士，是党员，叫"红色士绅"，常常帮助我们推行"左"的政策，他们的意见有时比一般农民和干部都"左"，并不反映和照顾各阶级各阶层利益。不要以为"红色绅士"比一般开明人士意见都好。

## 四、在政策执行中发生的偏向

寺台全区联合行动，打击"杜老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农民运动在各地普遍而激烈地展开了。十几天就打击了38个地主头子，获得粮食62.136万斤，获得大洋35.05万元。又经过47天的斗争，进入麦收。我们对政策进行了一次检查，发现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无领导的农民自发斗争的村庄，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表现在：

（一）不注意合法斗争，不把斗争要求约束到当时党的政策范围内，提出了许多过高的经济要求，罚得过重。

（二）要求多杀人。开会时，会上大喊“杀！杀！”造成一般地主恐怖。

（三）罚得过重，甚至扩大恶霸范围。有一位开明人士说：“有产者，必被斗；被斗者，势必有倾家荡产之危险。”

全区处罚过重的倾向有逐步升级的趋势，其原因，不以对象错误罪行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尺度，而是各村互相竞赛，罚钱粮愈多愈好，战绩愈大，就愈受上级表扬。过左的偏向，使一些地主感到无出路，生存不下去，又恐慌而逃跑了。一个村跑了一个地主，这个村的农民就产生了怕变天的心理，每晚集中民兵，集体巡逻，睡不好觉。

（四）我们的干部也喜好一套激烈的斗争方式。有两种普遍的毛病：

1、斗争前扣押、捆绑、监禁。如果是罪恶大的地主，发现他有可能逃跑，农民自动起来扣押了，这是不可怕的。但现在成了一种流行方式，并不是农民的自觉行动，而是干部一句话，动不动就把地主扣押捆绑起来。中间人士批评我们“侵犯人权”。有的连罪行材料都没有调查清楚，用先扣起来的办法来取得，进行审讯，不承认就逼供。干部包办，农民随大流，并不当家。干部不走群众路线，不做艰苦的发动群众工作，这是不对的。

事实证明，胡营、黄庄、金木营、刘营等村，并没有采取斗争前先捆绑扣押，而是给他讲明政策出路，采用了必要的监视方法，不是都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吗？

2、斗争采取激烈方式，不是以理而是以力服人。许多村庄开的所谓讲理大会，实际上不摆事实讲道理，讲理不成，就动手，喊口号。其所以如此，一是因我们材料不实，对方不承认，农民不相信，无人出来作证；二是斗争会上，只是流氓、个别“勇敢分子”蛮干，会场群众情绪冷冷清清。

我们的干部总是自以为是，不懂农民群众是实事求是的，他们

对谁个劣，谁个非，哪些事是真的，哪些事是假的，一切是非曲直是有判断能力的。如干部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有事和群众商量，就不会脱离群众。

3、杀人风。“杜老拨”枪决后，一些干部和少数积极分子吹起一股杀人风。理由很多，如有人说“杀人偿命”，自古有之；有人说，“必须把反革命势力消灭；留着不杀，就留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基础”；有人说，“不杀，群众发动不起来”。干部借口群众要求，斗必杀。干部“左”的思想在滋长，他们不懂得杀人过多，特别是群众任意杀人（有人甚至高呼杀杜的三儿子），其后果是严重的。

## 五、阶级动态的分析

夏季检查中发现阶级动态趋于紧张。主要表现：（略）。

## 六、“左”的倾向的滋长

6、7月群众斗争普遍展开，十户八户小村也请愿、游行，几乎无村不斗争了，农民情绪很高涨。大的斗争就有30余起。“左”的偏向时有发生。主要的表现有：

一是乱斗，二是重罚，这两点最突出。

乱斗。例如东南户固一带，一些小村斗了3个医生、教员。王伍寨一带斗了一个开油坊的富农（工商业者），还有一个卖粉皮的商人，一个山楂果子小贩。万古斗“黑老虎”，而两个所谓“黑老虎”，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时期，都是我们的同盟者。

我们对中小地主不加区别，甚至打击了开明地主的代表人物。有的是乱斗，有的就是错斗，斗了工商业者、小商贩、知识分子、富裕中农、自由职业者。这是错误的。

于是，一些地主又开始逃跑了。逃亡者逍遥法外，在家的等着挨打。如岳朝阳跑了，却无事；岳朝孔没有跑，却天天挨斗。有些地主想出去躲风，不一定都是投敌。

重罚。一些地方没有执行党的统战宽大政策的决议，只片面地强调打，强调斗，而不讲拉，不讲团结抗日。

重罚的例子：王吉家贪污柳椽1100根、一间房上的瓦和梁檩，还贪污80元修汽车路的差夫费，罚粮200石。郭海芳，嫖女人，罚款20万元、粮20石，家中粮食几乎全部没收。

农民采取的办法，要地主自报认罚款，叫“自动”。如胡营一个地主瞒“黑地”10余亩，自动认罚粮3000斤和大洋5万元。有一个地主说，“自动”认罚可以不上台挨斗争。

还有一种形式，农民计算地富财富，有2/3或1/3的算法，把隐蔽的、公开的，动产、不动产，一并计算。如对某地主，土地50亩，估计家里埋藏银子元宝多少，再把地价压低。罚下来的数目，把土地卖光都不够，他又不讲，也不承认隐蔽财产，斗争常形成僵局。从表面上看，地主土地、房屋都给挤光了。

县里曾决定把经济处罚约束到政府的政令范围内，以法律规定最高额为限。如“黑地”一亩罚一倍；贪污100元，退赃加罚100元。减租、减息、增资，都有政策规定，但一般的在斗争高潮中很难执行政策。农民采取款折粮，粮折款，翻几番，一般实行重罚政策。

## 七、大规模查减运动展开，贫雇农提出更高要求，斗争向纵深发展

查减运动使佃雇农生活大大提高了，并掌握了村里的领导权，进一步刺激了贫农、中农的经济要求。斗争向纵深、多种形式、多种内容的方向展开。减租、减息、增资，债务（减息）、

土地纠纷，反贪污、查“黑地”，要求民主、反对压迫等等，以及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都提出来，出现了各种斗争形式并存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查减运动深入，农民起来了，促进了青年儿童运动的开展，青年组织已达全县80%的村庄，革命的歌声响遍全县每个角落。

在“家庭和睦”的口号下，妇女展开了反虐待的斗争。反小老婆，反童养媳，女工增资。反对虐待儿媳，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男女平等。对某个虐待妇女的老太婆也斗争，并罚200斤棉花。对农民内部的事情，这种作法太过分了。

当时蝗虫灾害严重，农会发动打蚂蚱，地主妇道人家太太、千金小姐不愿和农民一起劳动。农民火了，说“吃饱墩”的夫人、小姐们看不起劳动人民。对不出门打蚂蚱的，几乎全部受罚。妇女斗妇女，青年斗青年，儿童团也斗几个地主，罚西瓜，每个地主一个，儿童团“吃会餐”。

## 八、运动中发生“左”的原因与我们纠正“左”的毛病时发生的新的偏向

一

对某些“左”的现象，我们在纠正时处于被动地位，常常是农民要得多，干部主张少，地主表示愿意给，抗联与政府认为超出政令界限。这就同群众处于顶牛状态。

经济斗争已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问题，不是个少数人的问题。下面举几个例子：

中冉村，罚某地主粮300石，地主已承认出粮，而区干部主张罚50石（按犯错误性质政策规定）。农民不同意，经区干部再三说服，定为150石，农会仍不服，干部只好“执行上级指示”。区干部在群众中完全孤立了，他怒气冲天地当众宣布：“我不领导你们斗争了！”

孔村地主郭海芳，因嫖女人被农会罚款20万元。地主认帐，区干部说服减半，农会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条，不要钱可以，得游街示众；第二条，开斗争大会也行。如这两条地主嫌丢人，那就出款20万。农民估计，处罚减半是区调解委员会干的，骂调解委员"当了地主的走狗"，并喊了"赶走调解委员"的口号。

马棘林地主林丕国，罚粮80石，支书去说服，责问农民："你们不执行政府法令吗？"农民气极了，要把他捆起来，扔到坑里，抗联同志出面才解了围。

像以上所述的事，各地都有发生。

这一系列的事件，在干部中引起了普遍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要政策还是要群众？县委也争论激烈，但不是争论要不要群众，而是争论是照党的政策办，还是照群众的意见办。话虽好听一点儿，但实质是一样的，把党的政策与群众意见对立起来。

经过讨论，县委认为，党的政策强制群众执行，是要脱离群众的，强迫农民执行政令是不对的。我们共产党员既要党的政策，又要群众，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党的立场上，也就是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这是不矛盾的（当然，党的政策错了，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只能按照党的正确政策耐心地同群众商量，如群众多数不接受，我们没有权力强制他们执行，也不能和群众对立，只能让群众照他们的决议去作。如果群众意见确实是错的或是过分的，我们只能说服，不能作群众尾巴，也不和群众顶牛，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要相信多数群众在斗争的实践中，经过事实的证明，终究会了解我们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是代表他们长远利益的。

我们干部应保持正确立场，但又必须从当时群众水平出发，站在群众之中，不是站在群众头上指手划脚，也不是站在群众对立面"顶牛"，更不可跟在群众后面作群众的尾巴。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县委的意见向干部、农民传〔达〕下去后，双方态度都缓和

下来了，干群紧张状态基本上解除了。

究竟造成群众某些过火行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不能怪农民，原因是干部的"过急"观点，想在一个早上把农民生活改善好，采取对地主重罚，不是按照党的政策减租减息，减轻对农民的剥削，而是想一下子就消灭剥削。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群众开始有顾虑，就用过激的言词把农民激发起来，农民提出许多过高的经济要求，干部都答应。斗争结果，超越了党的政策，又反过来批评群众，而不检查自己，承担责任。这就引起农民不满，同群众对立起来。开始发动和斗争结束时，干部的言行是不一致的，丧失了农民的信任。

当然，在群众方面，由于查减运动，佃雇生活大大改善了，也确刺激了贫农、中农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眼热"了。这也是多数群众的情绪，确不是少数干部的情绪。

总之，领导的过急观点，农民对经济的过高要求，两者结合，形成了某些"左"的偏向。

## 九、地主反攻问题

最近几天，南屯、魏庄发生了两起地主反攻事件，这是个阶级动向的信号。

农村阶级阵线已分明，地主赤裸裸地公开反攻，已不可能，也不敢。地主采取了隐蔽的狡猾的方法，利用农民的内部矛盾，群干中宗族宗派矛盾，抓住干部的弱点，手头不净，男女关系，官僚架子脱离群众作风，挑动群众与干部内讧。

在农村，宗族、宗派矛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留下来的麻烦问题。对这类事，不可轻率从事。农村的阶级矛盾，常常被同姓家族、宗族的宗派掩盖着。在农民不觉悟的时候，常常对事不对人，不以阶级分，而从本家本族同姓分。两类矛盾交织在一

起，斗争姓张的地主，姓李的农民表现积极，而姓张的农民顾虑颇多，本家本姓，拉不开面子。我们的干部往往不注意宗派宗族的封建血统关系，常常依靠这条街姓李的贫苦人，斗另一条街姓张的地主。张家地主及穷人都结成一块，穷人怕你姓李的把我张家地主的东西分走了。加之村干部本身就有封建的宗族观念，包庇本家本姓的财主，地主乘机挑动，就把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宗族之间的矛盾。

南屯地主反攻得逞，农民失败的教训，正是如此。

地主反攻的另一个特点，是利用合法〔手段〕，搞第二农会、第二民兵模范班，而且常常比原来的农会、民兵表现还要积极（地主躲在背后操纵这些组织，他们从不出头），很会讨好上级，取得上级政府、武装部门的好感。

我们唯一正确的政策，是耐心教育，对农民进行基本的阶级教育，从ABC作起。什么是阶级？阶级是怎么产生的？谁剥削谁？谁养活谁？为什么种地的人没饭吃，没衣穿？不劳动的人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革命分两步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当把一部分积极分子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懂得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时候，才能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才能同本家族的地主决裂。有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同自己封建家庭父母决裂。因此，建立党的组织，实现党的领导，是农民取得胜利的唯一保证。

南屯的地主的反攻，教育了我们，我们在党支部领导下，团结了全体农民，揭开了宗族的面纱，地主反攻彻底失败了。全区地主的反攻都打退了。

# 十、调整阶级关系

敌人"扫荡"开始了，我们对地主的斗争应有张有弛。为了团结对敌，按照党的统战政策，应当对地主在打了之后拉一下。当时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先打后拉，有打有拉，拉中有打，打中有拉"。经过查减斗争，农民已处于优势地位。农民掌握了政权，有了武装，有了党的领导，完全有能力对地主搞统战。

我们的口号：人不分贫富，不分老幼，团结起来打日本！地主应立功赎罪。同敌人勾结的汉奸，应坚决镇压！

我们对紧张的阶级关系作了必要调整：

（一）对一般地主，采取轻斗轻罚，把事情结了，使他们放下心来。

（二）过去处理过重的，对他们的欠拖部分，适当减一点，或缓期交。是否可免，要看在〔反〕"扫荡"中、对敌斗争中表现而定。

（三）对佃雇农要强调努力生产，按政府规定交租，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四）对开明地主、积极抗日的，给以赞扬，政治上给出路，吸收参加"三三制"政府。

（五）对地主子女，特别是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尽大力争取他们参加抗日工作。

我们一面动员备战，一面调整阶级关系。由政府出面，开了一些地主会议（叫开明士绅会议），既听听他们的意见，又对他们讲讲党的政策，整个局势十分稳定。

有的地方，贫佃雇农帮助地主空室清野，藏粮埋物。农民说："这不叫剥削。"农会把敌情通告给地主，要他们同群众一道转移；农会派开明地主争取逃跑了的地主回家，并给以安全保证。

只小郑村就回来4个地主，街屯2个，大郑村1个，沙窝营6个，第六营6个，聂庄2个，孔村2个，岳营2个。全区只有陆齐涛、岳朝阳两个地主投敌未回来。

事实证明，敌人这次“扫荡”中，地主通敌者甚少。农民、民兵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对敌斗争很英勇。青年人成百集体参军。我们反“扫荡”胜利了，敌人失败了。凡群众发动充分的地方，损失极小。

这证明，我们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以下十一到十七各项因缺页及字迹不清，略）

**说明**：本文系由纪登奎于1985年9月根据当年纪录整理，滑县党史办刘守森对照原件进行了校勘，王长富、刘守森誊清后由纪登奎作了校正。

# 冀鲁豫行署关于处理因灾荒买卖人口纠纷的规定*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

自去年灾荒以来，买卖人口现象相当严重，有将自己女孩卖出做婢做妾做童养媳者，有把自己男孩卖出做养子者，有把自己的老婆卖出做妾做婢或与别人为正式夫妻者，也有的妇女未经自己及其丈夫允许被婆家或娘家卖出者，还有的妇女自愿离开家庭，到非灾区逃荒另找了配偶的。今者灾荒已过，纠纷日多，因此影响我抗日人民间的正常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安宁。兹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形，为适当地处理此种纠纷，特作如下规定：

一、凡因灾荒出卖自己的女儿做人之婢妾者，其买卖关系无效，除准卖主随时领回外，并由卖主拿出300斤以下之小米，作为该女之赡养费；为童养媳者准卖主随时领回，如男女双方已到结婚年龄，甘愿结婚者，政府亦不加干涉。

二、凡因灾荒将自己尚未出嫁之女儿出卖，已与买主成为正常夫妇关系者，如男女均到法定结婚年龄，在双方同意下得保持其夫妇关系，双方家庭不得妄加干涉。

三、因灾荒丈夫出卖其妻，或其妻商得丈夫之同意，自行离□，另与买主成为夫妇关系者，其去留由妇女自择。

四、因灾荒未经妇女本人及其丈夫之同意，被婆家或娘家卖出者，其买卖关系无效。经该女人或其丈夫之要求得恢复其原来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第330—331页。

之夫妇关系。

五、因灾荒将自己之子女卖出做养子女者，其买卖关系无效。其买时所出之款粮改为借贷关系，由卖主按原数偿还。

六、妇女以灾荒为借口，而擅自离开家庭另与他人结婚者，准原夫告诉，以妨害婚姻论罪。

七、以买卖人口为业和将已出嫁之女又卖给伪军伪人员当妻妾者，依法从重治罪。

八、夫妇串通或与娘门串通，以“放鹰”为业，卖出又跑回者，经买方告发，除应受刑事处分外，卖方并应赔偿买方之损失。

九、凡现存男女关系，并非正常现象者，任何一方得请政府解决之。

十、以上一、四、五、六、八各项规定，请求人得向被告居住所在地抗日政府起诉，如被告居住敌占区且为我诉讼力量所不及者，像第四项规定是娘家卖出的应由娘家酌情赔偿损失（用调解方式），但对其他各项的请求人则着重释解［解释？］或仲裁。

# 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

（一九四四年十月）

赵紫阳

滑县的群众，麦前展开了民主斗争，麦后进行了查减，开展了佃雇独立自主的运动。几千年被封建地主压迫的农民开始得到了解放，在某些地区（六区及七、九区一部分村庄）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动，短短的五六个月当中，农村中间真是两个样子。农民都是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成了咱们的天下。"过去在村上谁也看不起的人，现在都当起家管起全村的大事来了，有的竟作几个村的联合农会的主任、委员、代表，管起几个村的大事；而向来是赫赫有势的地主、劣绅，却对向来被自己脚下踏的人们低了头，农会说什么是什么，不敢打拗，并且还得提心吊胆，怕开会，怕斗他或再斗他，对从来自己仗势欺人的小孩子，也不得不谆谆嘱咐："小心点，免招惹是非。"地主们的尊严为农民的斗争打垮了。群众的生活也和往年不同了：春天正没办法时，斗争分了果实，许多没有卖东西，没有借高利贷，渡过了春荒；麦秋组织看青，分看青粮。尤其是佃户和雇工，生活更和往年不能比。六区大部分佃户吃到明年麦后都余粮，佃户要地已成一种风气，有的已要了。春天到现在，六个村佃户要地的33户，要地153亩多，而大部分都计划着今冬明春再要地。他们掌握了地经纪，有组织的压低地价。而卖地的却成了地主：有的被斗争了，地价抵罚款；有的为了躲负担，或卖地减少目标，怕群众斗争他；当

然还有卖地是为了威胁或报复佃户的。目前地主卖地也几乎成为一种风气了。总之，半年以来，农村是有了天大的变动。

然而，这种"反常"的大变动，不是容易的，群众是用了极艰苦的斗争挣下的。

## 清算不法地主恶迹的民主斗争

### 私仇与公愤

地主残酷的统治，对农民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和剥削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旧法所保障下的"合法"的压迫剥削的制度和习惯，且有即旧法亦不允许的罪恶行为；不仅有对农民一般的共同的压迫和剥削，且有对每个具体农民的特殊的压迫和剥削。这就造成农民对地主的"私仇""私恨"。这种"私仇""私恨"，正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具体表现。这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问题，正是残酷的阶级压迫。这种压迫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是极其复杂的，真是有"如海深""如山重"的，如杀人，诬告，非法捆打，侵占土地、庄院，借故勒索讹诈，强奸，挑词架讼，1940年地区变质后的通敌暗害等。农民在这种剥削压迫下面，有〔的〕因之破产，有〔的〕因之丢了性命。这种"私仇""私恨"，农民是死也不能忘记的。这种"私仇""私恨"，在群众看来，比加予群众一般的共同压迫的"公仇""公恨"（反"黑地"反贪污）要仇恨的多。农民首先体会到地主的压迫不是"公仇""公恨"，而是"私仇""私恨"，因为这是非常具体，与自己的利害关系非常明显的。过去的经验是农民一旦有了机会，是一定要报复和清算的。我们要让农民翻身，就必须允许农民来报自己的仇雪自己的恨；而群众不在自己能洗去了这些仇恨以后，也决不会认为是自己已翻了身的。

过去的民主斗争，内容为我主观的想象来限制了，仅强调了

"公仇""公恨"而忘掉了"私仇""私恨"，这是从上面来的，不是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出发的。"公仇""公恨"，反贪污反"黑地"既然是大家的仇恨，从来没有发言权的贫苦农民，自然不能成为领导者；因之，民主斗争的领导权就多半落到中间力量手里，广大贫农的积极性是不会很高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整天忍饥饿而奔波，□□劳动，从来很少参加村的政治活动。地主的贪污、行［徇］私舞弊，贫苦群众很少知道也并不知道，他们也没有时间和权力清算与过问这些事，在觉悟程度未到一定的水平时，常是不积极的。

滑县的民主斗争，是□重的组织农民对地主的"私仇""私恨"的，不是先从定见出发，"民主斗争就是限制于反贪污反'黑地'的斗争"，而是从农民对地主仇恨出发，把每个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组织起来，私仇结合起来，这就是大家的仇恨，把不同农民对地主不同的具体仇恨汇合起来，成为公愤的。这公愤，大家的仇恨，是建筑在每个农民的"私仇""私恨"的基础上的。但对农民共同的要求的"公仇"是否放弃不管呢？同样的，"公仇"既为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也是允许并赞助清算的，把"公仇"和"私仇"结合起来，把农民对地主压迫者的仇恨组织在一起，给他来个清算；农民是由"私仇"而认识到"公仇"，公仇和私仇相结合，一方面提高贫苦群众之积极性，也可以把广大的中农群众及中间势力组织到斗争中去，使地主完全孤立起来，成为"孤掌难鸣"。

滑县就是针对着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确定了民主斗争的内容及政策的。滑县的群众就在这样的斗争中，吐诉了多年不白之冤屈，报了自己多年要报而不能报的仇恨。冤既伸，仇既报，便人心大快。

### 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是为了斗争；但组织必须成为群众自己的事

情，不是单纯干部的捏合，而是群众自己结合。因此组织应是在群众“动”的当中进行，群众由小动度〔到〕大动，组织就由个别变为集体，脱离了群众的“动”是组织不起来的。

鼓动和调查是组织起来〔的〕两件大事，但鼓动和调查必须是〔在〕群众“动”的当中来进行。鼓动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及斗争勇气。过去一般的光是采用干部对群众的宣传和教育，但群众的觉悟和勇气不是用干部的教育就能解决全部问题，他只能在一定的水平上起他一定的作用。群众的勇气通常是看到了力量时才会提高。要群众看到力量，一方面是要干部坚决勇敢，给群众以勇气，以信心，采用农民喜好的方式，兴风作浪，敢作敢为，不能拿出书生习气、闺女作风，畏前惧后，琐碎复杂，使群众看到你的神气就增加三分犹疑；但最基本的是农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时，勇气才会提高，思想才会起大的变化。农民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现实的具体的力量），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胜利如何有把握，仍是不会轻易相信的。因此，鼓动还应有群众自己的鼓动，有行动给农民的鼓动。当群众未组织起来时，是感不到自己的力量的；当群众一旦组织起来后，互相坚定，互相鼓励，积极分子看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使自己更加积极起来，群众受到积极分子的影响，看到大家在一起，有了信心有了勇气，都看到了力量（力量即是大家），有了“群胆”。因此，鼓动工作必须是在群众自己“动”的情况下逐步提高，必须是群众教育群众，群众的行动教育群众，积极分子对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鼓动。我们有些地区采取了这个方法，群众积极性及勇气就提高了。有的把群众变得死的、被动的，不让群众“动”，在非常“静”的状态下，干部在耐心的（？）细致的（？）进行鼓动，他企图教育好群众再让他“动”，他企图拉长个别和小组鼓动时期，为了提高阶级觉悟，愈鼓动群众越觉办不了事，情绪更加低落了。群众说：“你说的再好，光我们几个也办不了事。”群众意见是对的，

深值我们反省。

调查是发掘和集中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但农民虽满肚子怨仇，在没有看到"时机已到"时，是不肯随便讲出来的，怕的是仇不能报，反招惹是非。农民只有在看到了力量，认为可以报时，才会吐诉出来。由此，调查亦必须在农民行动中来进行。在行动中，农民逐步提高了自己觉悟和信心，对地主的仇恨才会逐步的讲出来。首先发现积极分子，收集积极分子对地主的仇恨，依靠积极分子的积极活动、酝酿，一般的群众看到有人领头，便来参加，人力愈多，力量愈大，农民的胜利信心愈大，伸冤诉苦的也就愈多。许多这样的事情：在斗争将揭开的时候，农民又提出了自己的冤屈，揭发了地主更多的罪恶。有的在斗争大会上，看到了大家的力量，才提出了自己的冤屈。许多村庄，是先有一部分群众为了某一种仇恨而在组织、开会，准备斗争地主，由于这一部分群众的活动，刺激了另一部分群众提出其他的仇恨，这就是群众的要求是随着行动来提高的。在每一个斗争中，群众揭发地主的罪恶，都是愈来愈多的。要想不叫群众行动，依靠干部单纯的调查，是不会发揭［掘］群众更多的要求的。而我们有些同志，正是不了解这一点，单纯的调查，单纯的鼓动，而和群众的自我活动脱离起来，结果群众愈来对我愈冷淡。

群众在组织起来当中，由于怕地主发觉逃走或设法破坏，开始常采取隐蔽的活动。在这一阶段主要是组织骨干力量，主要是中农以下的贫苦农民，因为"都是自己人，干斗争，与地主说不着，不致跑风"；而对中农以上的群众及富农，除个别与要斗的地主有深仇者外，很少争取、活动他们，因为他们动摇，不敢干，不相信"穷唧咕"的"胡闹"会成功。在大部分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就是骨干力量已形成的时候，活动就由隐蔽转向了公开。这种公开活动主要是显示力量，猛烈的扩大组织力量，争取动摇的一齐来干。这一阶段非常短促，而又非常紧张，群众公开的开大

会，宣布要斗的地主的罪恶，全村实行了签名运动。而对要斗的地主即设法予以监视，有的派人监视、站岗，对罪恶极大的地主，干脆把他扣起来了。农村中，顿时显出了农民惊人的威力。大部分的中农看到胜利了，积极的跑到群众当中去，参加了斗争，提出了自己的仇恨，暴露了地主更多的黑暗和罪恶。中间力量看到大地主大势已去，怕在群众当中遭到了孤立，也赶快签名报到。即与大地主共同作恶的次要分子，怕祸延己身，也投降了群众，贡献材料，并允［应］许当场作证。总之，都争先恐后的签名，都怕被人看作与顽固分子一伙。于是农村的大多数站到群众方面，要斗的大地主遭到了孤立。因之，群众只有在“动”的情况下才能组织起来。群众在行动中显示了力量，提高了胜利信心，才能把动摇的、落后的群众带领起来。

总之，群众的组织与行动不能脱离。群众是在不断的由小动到大动，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起来是群众自己的事情，不是要群众不动的，等待着我们去组织去捏合。

**斗争热潮**

群众的斗争形式，采取说理叫“说理会”，也叫“诉苦会”。在这个大会上，真是有冤伸冤，有仇报仇。这种说理，与过去任何时的说理都不相同，是农民占绝对的优势，地主处于绝对劣势下进行的。农民有力量作后盾的。地主是在群众力量下面被迫来和群众说理的。

很明显的，不是这样的形势，地主当然不会允许农民来和他说理的。因此，说是斗理，又是斗力，理和力结合的非常明显非常具体。农民是讲理的，但因自己有了力量，就不能允许地主不讲理，不允许地主的强词夺理，当他恶理强辩时，群众就要以力量威胁之，“反对乱鸟理”（滑县土语）的口号就会普遍会场。群众的愤怒、威风，会迫使地主不得不低下头来。参加斗争的群

众，对出面说理诉苦的农民以有力的支持。群众的齐声呐喊、表决，群众性的对证，处处给地主以力量的威胁。平日会花言巧语，没理能说三分理的地主，在这种情况下，也竟目瞪口呆了，说理没有理，巧辩不允许，真是理穷词尽。群众愈来勇气愈大，地主精神上处处受到打击，气焰低了，不得不向群众承认了错误。农民胜利了。

斗争中，农民逐渐采取了联合行动。一村斗争，周围村庄的农民参加援助。一个时期，农民几乎整天忙于斗争了，今天应这个村庄之邀，明天赴那个村农民的请。每个斗争对象的罪恶和斗争中的窘态，农民到处传说着，大街小巷都是谈论着斗争，真是轰轰烈烈，风起云涌，大有"山洪爆发"之势。这种宏伟的行动，给农民思想上的变化极大，鼓舞了农民斗争热情、勇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有些村庄本来自己的斗争尚在就绪，参加了外村的斗争以后，鼓励了自己勇气，周围村农民的情绪，给他们自己以新的力量，情绪和勇气大大的提高了。斗争的村庄的农民看到外来援助的农民，信心和勇气更高了。农民觉得有了助手，有了靠山。积极分子在鼓励群众的斗争勇气时，常常提到外村农民的援助，农民的大联合："不要怕，咱村斗不过他，还有咱这一带的农会来帮咱。"地主怕的是农民的联合，地主到处反映是："有错说，叫怎样怎样，不要开会。""要开会咱村自已说，可不要叫各村来。"农民的联合行动，给地主精神上是很大的威胁，一到说理的场所，看到乌鸦鸦的一片陌生的面孔，先就软了三分。地主在广大的（不是一村，而是许多村庄的）群众面前失了体面，伤了尊严，骂名在农村中被广泛的传起来。这种互相援助、互相鼓励、互相观摩的联合，使农民的斗争经验更加容易提高和丰富起来。一村的斗争成功的失败的地方，在各地农民〔中〕展开了酝酿和讨论，成功的为各地农民所模仿。今古营的斗争形式，很快为各地农民接受了。农民学会了如何斗争，如何说理，

如何主持会议，而且，农民更发展和创造了新的东西，愈来愈好了。但联合必须建筑在群众自己的要求上，不能使干部勉强的结合，不然就要发生外村包办本村群众的斗争，或本村群众因怕别村分果实，给自己惹祸而反对。联合规范［模］的大小，要看斗争对象罪恶的大小及群众仇恨程度，不能小题大作，机械搬运。寺台村老卜［拨］为全区人民所仇恨，斗争时万人参加，全区人民都发泄了自己的仇恨，人心大快。

在讲理当中，有的较和平，有的则很激烈，吐唾沫，打耳光，摔萝卜，甚至乱打，至于漫骂、严词责斥更较普遍。斗争〔得〕地主低了头，向大家认了错，农民往往把他扣押起来，直到完全答复了农民的要求（罚、赔偿损失）并有人担保，规定期限，才予以释放；有的是有人担保不致逃跑，释放后再调解的。这些都是地主罪恶应该的报应。罪恶愈大，农民仇恨愈大，行动愈激烈。农民的眼睛是很清楚的，有轻有重，分别的很清楚。农民所以如此对待地主，正是过去地主曾数倍于今的对待了农民。今天农民翻了身，有了力量，当然是报仇雪恨的。过去我们曾对农民的这种行动表现了害怕，嫌太粗暴，太不文明，害怕刺激地主，想叫农民对地主客气些，文雅些，讲理不要用力。这样就束缚了农民，就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斗争热情，就不能在农民的充分行动中，鼓动出新的更大的力量，限制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保持了地主在农民面前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尊严（这种尊严不给以损伤，地主是低不下头来的）。是的，农民的暴力行动，确实有些不很文雅，确实使地主头疼，但这些正是农民自己仇恨、自己力量表现的形式。你说这是太粗暴了吗？农民就是依靠这个粗暴的暴力使地主低下头来的。农民用暴力的行动，丢了地主的体面，伤了地主的尊严，震动了地主的统治。农民亲眼看到，地主是在这种暴力的行动下面屈服了，不是依靠工作员，不是依靠政府有兵的逮捕扣押，而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制服了地主，自己获得

了胜利。农民的信心更加增强了，感觉到地主并不是不能在穷人面前低头的。因此，农民对地主的斗争，不是“文雅”所能解决问题的。客气是不能使地主低头的。地主向农民低头、屈服，非在农民力量面前感到恐怖和战栗后，才有可能。而这种暴力行动，正足以使地主感到恐怖和战栗的。或者是以群众自己的力量求得斗争的胜利，或者是依靠政府，依靠少数干部的蛮干，来打击地主，这是群众能否发动的关键。而滑县六区的群众，正是以自己力量取得了自己的胜利的。

关于群众的暴力的行动，曾认为是一种违背抗日秩序的行为，应当制止。地主也是以此来跳叫的，说什么“保障人权的法令”。但农村的社会秩序，在农民未翻起身来〔时〕，并非抗日的民主的秩序，〔而〕是地主封建剥削统治的秩序。农民的翻身、暴力，对这种秩序来说是一种“乱”；但“乱”——这种秩序不但没罪，反而有功，因农村民主秩序的建立，非要对旧的封建秩序先来个破坏，也就是非要“乱”一下不可的。群众的暴力行动，正是为了建立这种革命秩序。地主统治者不低头，这种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应当认识农民是要建立革命秩序，不是破坏革命秩序。农民运动一起，地主看来“不秩序”，农民看来恰是“秩序”的。

总之，对农民的行动，应当放手，大胆，不要束手束脚的限制群众，应当让群众在对地主的斗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勇敢和威力。这种勇气和威力愈大，对封建势力削弱愈加深刻，群众的解放事业的胜利愈有保证。但也不是要我们故意制造一些过激的斗争形式，让群众勉强表演，或强制群众进行激烈斗争。

## 关于“左”的问题

滑县群众之所以能够蓬蓬勃勃的运动起来，首先就在于滑县干部的思想。他们关心群众的痛苦，把群众的痛苦当作了自己的

痛苦。他们看到了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决心来为群众解除痛苦，敢于支持群众对自己压迫者的斗争和报复，对罪大恶极的地主愤恨异常，敢于让群众大大的斗他一下，不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群众还未发动就怕群众“左”，就先去警告群众“安分守己”，不要“过分”。经验证明：只有坚定的立场，不怕群众解放、翻身的人，才能带领群众去求解放求翻身。那些表面说是要发动群众，但脑子装满了害怕群众动的观念〔的人〕，他们照顾地主，比关心群众的地方还要多；这些人是只能限制群众的解放，决不会把群众发动起来的。然而，我们曾一度认为干部的这种思想是“左”的，是过分的，是只管发动群众不管统一战线的。是的，干部是主张重罚的，但对万恶的大地主重罚一些，有什么可怜悯的地方？当然，不可否认，对某些地主的处罚稍有过重之处，但这仅是个别的，是在工作中难以避免的缺点，决不应大惊小怪。

在干部的思想为群众接受以后（我们干部的思想对群众的斗争勇气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群众真的行动起来。由于群众的充分的动，更加鼓舞了群众的勇气及要求，群众大干起来了。群众某些“左”的行动产生了（对次要分子的重罚等），我们便害怕起来了，要群众停止这一行动。但发动起来的农民，就不是那样的容易包办了，没办法，就强迫群众，硬说服，所谓“宁要政策，不要群众”的论〔调〕来了。工作员奉了上头命令，硬向群众中坚持，群众便与工作员发生对立。不了解群众“左”的纠正，是要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上的，应在群众的行动中总结工作，大家讨论，逐步提高群众觉悟，来逐步引导群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某些村庄就是与群众共同讨论，开活动分子会，大家检讨中使群众接受了领导的意见。

群众行动起来，产生“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对于“左”不是熟视无睹，或继续助长“左”的发展，那样是危险

的，但亦不应泼冷水，强迫命令，这样亦是危险的。

**包办代替**

在群众斗争的准备阶段（即开始组织群众的阶段），还存在不少包办代替的毛病，主要的是准备工作即组织工作与农民的行动相脱离，把群众变成死的、被动的、孤立的，由我们的干部去摆布。我们干部幻想着一切准备停当，群众教育得阶级觉悟高了，再让他们动。因此，有的就强调所谓“稳扎稳打，零打细敲”，用了一套复杂的形式向农民身上套。但这是完全脱离了群众的，群众不行动，看不到力量，光说干，农民看不到干的样子，因此情绪低落。这种干部的摆布、不相信群众的结果，使组织群众不是群众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但群众不活动是组织不起来的，这在开始的一个时期，更加严重，以后转变快的地区，农民发动的快，转变慢的地区，把准备阶段拉得很长，但未把群众的积极性提起来。有个农民干部说：“这一套与农民口味不适合，农民是麻烦这种复杂的。农民是说干就干，非‘嗡’不行。”意思就是说，非要在行动中来组织不行。所以这样子，是春天检讨了过去的工作，把一切缺点归纳到鼓动工作不成熟，准备工作不细致，就是没有把群众教育好的关系，更加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复杂的幻想，真要企图把群众精雕细刻好不行。这一问题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我在岳营工作，就是在实行这种办法下遭到了失败的。其次，就是由于不敢放手使用积极分子。过去的村干新贵，使我们害怕了，还未动，就怕他包办，怕他突出，结果，就叫工作员代替了积极分子，每个干部分割一部分群众，群众之间很少联系，干部分割了积极分子与群众的联系，把他包办完了。由于这种原因，就使部分村庄培养不出领袖，群众中没有中心人物，组织就显得没有力量。

不从群众要求及水平出发，制造斗争，在脱离群众，成为少

数人的蛮干，三区较严重（从略，详三区问题）。在六区有个别制造过激的斗争形式的。群众不爱开联合大会，怕分果实，怕联合大会杀了顽固分子；我们偏搞联合斗争，结果群众由斗顽固分子变为讲情，喊反口号，本村群众与外村群众发生了对立。

在六区，主要村庄的农民已发动起来，宏伟的运动，刺激了周围村庄农民的斗争热情，纷纷酝酿要求斗争。这种形势，要求我们放手，掀起普遍的群众运动；但我们代替包办成性，害怕自发斗争，已发动的村庄，干部不敢离开，害怕离开〔而〕农民自己办不好。干部离不开，周围村庄的群众斗争没人去领导，又怕他们自己斗不好，因此就限制这些村庄的运动，要他等着。这样就把活活的群众的斗争热情冷下来，使农民更大规模更广泛的联合为我割裂了，群众更宏伟更普遍的运动在我限制下，受了很大的损失。此点，是六区工作上一个很〔大〕的损失，殊为可惜。

注：以上主要是滑县六区的材料。

## 佃雇独立运动

（内有滨河部分材料）

去年麦前，滑县在民主运动中，亦曾进行了佃雇的增佃增资工作，但由于主观上认为增佃增资已进行过了，即有不彻底处，亦属于零碎的，佃雇的要求估计不会很高，不可能造成大的运动，特别是民主斗争一起，干部视线完全转移到这一方面，对佃雇运动不感兴趣，因此，佃雇运动受到了限制，成为民主斗争中附属的斗争，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展，发动极不充分。麦后检讨了这一缺点，认识到佃雇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他们迫切要求着解决，佃雇在农村还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因此决定贯彻查减，开展佃雇独立的运动。

## 群众把自己的运动造成一个阶级的运动

群众是整体的，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农民暴动，会门蜂起），都是把自己结成一个伟大的力量，都是先运动起来的村庄的农民，发展其他村庄，如此村村发展，在运动中结合起来。这种形式□是农民自己所熟悉的，这种运动是群众自己的运动，是自己发展自己，因此运动带有非常大的威力，其规模及魄力是非常之大的。其速度亦常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抗战初期，我们的干部经验少，包办不了群众运动，因此有些地区群众也是这样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据说，过去白色恐怖时代的农民运动，也是这样搞起来的。但目前我们有了一套固定框子，不采取农民自己运动的经验，常常把群众运动以村为单位把他分割起来，一个或几个干部做一个村的工作，做了这个村再做那个村，每个村的群众都是孤立的被发动，因此群众要迅速的发动起来，一县就非有几百个干部不可。群众过去自己的运动是轰轰烈烈，我们现在的作法是零打碎敲，村与村的农民不是结成一体，先进村庄的农民与一般村庄农民不是联系的结合的，而是从村庄到干部到村庄，不是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的结合，因此群众不能在运动中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农民不能在宏伟的运动中来受到鼓舞，思想上不能起重大的变化，不容易造成运动的热潮。此次滑县和滨河的佃雇运动，领导上由于大胆，让他们自己充分动，因此他们又形成了阶级的宏大运动。这种运动的形式，有的采取联合——即联合大会，有的采取村村发展的攻村团，由攻村团再走上联合。联合的形式，□都是在过去已经过减租增佃、但还不彻底，各村工作发展上差不多平衡，在工作上没有很明显的领袖意义的村庄，他们采取了相互联合。

未联合前，先是分村酝酿，抗联干部到各村启发，或召开各村积极分子会，由他们回去找佃雇商讨，各村讨论各村的问题，

从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后再启发群众的联合要求，"不是一村的事，应当和外村共同商量商量，大家干才能成功"，然后由一村通知周围村之佃户及雇工来开会，共同商量。这种办法，是群众自己的要求，自己执行自己的要求。在群众看来，不是为了单纯给上边执行□令，而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是群众要求合理，合理变成合法，政府以法保障。我们的查减政策，不是先制造一套，硬到群众中坚持，是根据群众在讨论中提出的要求而确定的，我们的□是从群众中来，和群众要求相结合的。

联合的意义有两个：一是集中大家的意见，大家做出决议来；一是集中大家的力量，不仅看到一个村的力量，而且看到自己阶级的力量，以提高斗争的信心及勇气。大会的特点，是自己人召开，自己人主持，讨论自己的问题。许多大会开得很好，粉碎了不相信群众的那些人的说法，对干部的教育意义很大。大会讨论是否热烈，就看是否发扬真正的民主精神，是真正的让群众来商量呢？还是有一个民主的形式？由于我们一向的缺乏民主作风，群众没有和我们商量问题的习惯，干部一说话，群众就当作一种规定，内心不同意也不提，这些必须充分的照顾到的。经验证明：只要群众认为真正让他作主，他就会认真负责。联合大会的召开，对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思想上是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心不齐，大会以后心齐了"，"原来认为办不成，大会上却能办"。大会以前，群众有事找上级，现在群众有难题，常说："叫咱这一带的佃户雇工开会。"群众相互鼓励时，也是如此说："干吧，怕什么！有事咱这一带的都帮助。"群众在会后，开始依靠自己了。大会鼓励了群众的情绪与勇气，也提高了群众的要求。未开大会前，有的不积极，或仅倒今年的粮和柴，不倒去年的；大会后，连去年的也要倒。伟大的行动，给农民的鼓励意义是太大了！大会讨论了决议，规定了工作计划，这些决议是必须执行的，这些计划，是要按天完成的。这是群众自己的

纪律，是群众自己的一种民主集中。因为相互联合的各村，都是水平相差不多的，故个别先进的村庄强迫大多数较落后村的现象不易发生；但农民的共同意见，对极个别的村庄加以群众的强制，亦是不可怕的，因为这是统一行动中难避免的现象。

分村执行，佃雇有了自己的计划和决议，回去就普遍展开了斗争，农民并不等待我们，便自己行动起来。许多地方在联合大会后，干部忙于会议，未及时到村上，农民却在热烈斗争，或者已结束了斗争。他们自己斗得很好，真出了干部的意料之外。群众自己〔的〕事是能够自己去办的，而且办得好。有些村庄，干部早到了，农民为了贯彻自己的决议，要求立刻斗，但干部说"慢一点"，他要来进行"调查研究"一番，结果，群众不管干部，自己干起来。为什么要分村斗争，不采取联合斗争呢？因为各村的斗争对象不同，要求不是那样的划一，各村群众解决各自的要求，容易具体深入。正因为是群众自己的运动，采取的斗争形式就不是划一的，没有一个框子能套住他们，都根据斗争对象的不同及自己的经验、觉悟水平，发挥自己的创造。斗争形式真是多种多样的，但又都是非常自然的，便于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有的回去开群众大会宣布决议，第二天开始倒粮倒柴，或先集体搞一家，再分散各街倒各街的，这叫做"平楂"，先平了楂，其他的头就好剃了（就是打强点的意思）。有的先讲理，后倒柴粮。梁二庄佃户说："先揭他几条短处，压住他，提出要求，'要什么，有什么。'"就是先使地主政治上占下风，实行政治揭发。其他有开雇工联席会的，这多半是小村，地主没有什么统治威力，把他叫到庙台上，乱吵一起［气］，最后也把问题解决了。

分村斗争后，就开联合大会集体检查、庆祝，有在此大会〔上〕表扬模范的。佃户雇工经过斗争，情绪及觉悟更提高了，常提出新的要求，如□枪，改选农会主任，讨论要地，掌握地经纪，讨论防止地主的办法，有的自己还订了会规（指纪律及组织

生活）。总之，佃雇觉悟高了，真的站起来了，由于切身利益的体验，使他们〔有了〕民生民主及更高级的要求。

攻村团的组织形式，多系在白板地区及工作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采用的。一村群众运动起来，由群众自动的向外发展，村村波及，这种形式，农民是熟悉的，过去农民运动，大家〔都〕是这样波及蔓延起来的。

首先在突破一点，一个村的佃户雇工首先动起来，在斗争大会或是举行庆祝胜利时，通知周围的佃户雇工来参加（用行政力量通知他也可以的），目的在于使一般的佃户雇工的要求迅速生长起来。首先动起来的佃户雇工的地位，在一般的佃户雇工眼中抬高了，无形中居于领导的地位。参加斗争后，各村佃户雇工自己开始酝酿起来，积极分子开始明显。已动起来的佃户雇工虽然自己胜利了，但感到孤立，怕坚持不下去，怕地主说"人家外村都没有，就是咱村坏"，那〔拿〕话头威胁。因此，他们愿意别村也很快的干起来，大家联合一起，力量很大。因此，这时可以动员他们到外村发展，外村也欢迎他们去指导。这样村村发动起来，很快就成了运动的热潮，群众在热潮中，更加鼓动了自己的情绪和勇气。

滨河邵二寨，佃户雇工斗争胜利后，12个积极分子便到外村去活动，选了个团长名叫"攻村团"，开始向三个张故寨及牛庄活动，并且有的攻到滑县太平庄了（后来叫抗联同志叫回，因为是滑县地）。9天，张故寨、牛庄佃户雇工斗争起来。因离得很近，在一起举行了联合斗争。斗争后，影响更大，周围各村的佃户雇工情绪更高，纷纷要求4个村的积极分子再向外发展、活动，3天之内，10余个村的佃雇都斗争起来。在热烈的时候，有9个攻村团一齐出动，蓬蓬勃勃，大有疾风扫落叶之势。

攻村团之出动，是建立在群众要求之上，行政命令是要失败的。滨河一区，有些攻村团是训练班出来的，本村的事还未办

好，就去攻外村。外村不服气，说是看不起他："你要攻我村，我还想攻你村呢！"攻村团到外村，不是找村长、找农会，而是找佃户、找雇工，大家都认识，不要谈大道理，主要是介绍自己的经过，根据自己的经过，来解答佃雇的怀疑，很现实，很具体，群众容易相信；活动方式多系秘密的，斗争由本村的群众自己干。

滑县大子相和这种形式差不多，佃户雇工斗争后，波动了一串子相、三县堂和几个板城。大子相的佃户雇工在那一带地位提高了，雇工会主任王明月，因为斗争会他主持，那一带的佃户雇工都纷纷找他，叫他领着自己也办办。王明月的小屋里，整天挤满了人，都请他去领导。王明月分不开身，他有时找大子相佃户去，说："你是已经过阵了。"那一带的佃户雇工，就是这样运动起来的。群众在运动中结合起来，王明月成了那一带的领袖。

## 宏伟的运动中培养领导，建立领导组织和运动相适应

佃雇运动使我们领会了，只有真正是群众自己的运动，才能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群众一有了自己的领袖，则更能指导群众运动，他集中了群众意见，并带领群众前进。

领袖大批的产生涌现出来了，群众的事情就必须由群众自己去办理，由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领袖去直接领导。但领袖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要在领导的实践中不断锻炼；领导的威信，也只有在领导的事业进行中，才能建立起来。此次佃雇运动，由于我们大胆放手，一切事情由群众自己去处理，由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出现了许多英雄和才子。他们在自己领导中，又大大的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由于运动的规模的宏大，不是一村，而是许多联合的村庄，因此也就产生了地方的群众领袖。王明月经过佃雇斗争，能在他那一带几个村指挥几千人进行捕蝗运动，可以主持

几百人、几千人的大会，□能掌握自如，能处理几个村佃雇中的问题，且为大家所心服。这样的事情过去真是闻所未闻。他们所以能有这样的本领，就是在运动中丰富了自己的知识，锻炼了自己的本领。从此不难看出，过去的群众运动中，为什么不能涌现出大批的群众领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包办了，把群众领袖的事代替了，把他们借以锻炼能力的机会挤去了，一切位置我们盘据完，群众领袖自然露不出头来。

群众在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领导组织，组织与运动是结合的，是相互适应的。所谓组织，是组织群众的行动，是为了行动（斗争）；领导是领导行动，亦是为了行动。群众要减租增佃，就得组织领导这一行动。滑县群众是如何建立自己的领导呢？联合大会召开后，各村的积极分子马上显露出来，当场就建立了佃雇代表会，选择积极分子为代表。这个代表会的组织，就是为的领导群众这次的斗争。代表分了工，规定临时会议制度，这种方式是很好的。本来积极分子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来影响（领导之意）着群众，群众也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受其影响，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原来客观存在的，加以组织，就是把这客观存在但还是不自觉的状态变为自觉的，提高一步。这种领导机关是群众自己的，是建筑在群众当前要求的基础上的。群众是如何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呢？什么样的斗争，建立什么样的组织，组织是为了进行斗争。佃户雇工在一起斗争，在一起开会，因此就建立了佃户雇工会，或叫联合会。这种组织是在运动中自然形成的，群众认为是自己所需要的。代表会、佃雇会，虽都带临时性的，但却是建筑在当前的群众要求上。群众目前要这样行动，故要建立这样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与领导，都是应行动的要求而产生的。过去我们常是在群众行动中不建立组织，不建立领导，行动过去了，又来建立组织、建立领导。这些都是从我们的要求而非从群众的要求出发，组织和领导，好像不是为了群众的行动。

由此可看出，一个群众运动代表一部分人要求，有一部分人参加，产生一种领袖，与之相适应的，就有一种组织领导的建立，虽然是临时的，但正因是临时的，□恰是当前所需要的。

群众领袖既然产生，就应大胆使用。代表会已经建立，佃雇运动就应大胆交给他们领导，抗联干部仅应居帮助指导地位，帮助群众执行佃雇大会及代表会的决议，不应因分村工作，而割断其领导。这一点有的作的较好，有的仍是包办代替。群众的组织领导既然建立，就应逐步提高。滑县六、三等区，过去民主斗争中发动了贫农及中农，产生了领袖，此次民生斗争发动了佃雇，培养了自己的领袖。因此，群众的事应该交给群众自己的领袖去领导，过去抗联之小组，应宣布取消或改变性质，建立工农联合会，把群众领袖选举出来，正式转换了领导，抗联干部仅留一部帮助工作。

在滑县七区及滨河，仅在民生斗争中发动了佃户及雇工，因为广大的贫农及中农尚未发动和组织起来，故不能建立农民联合会，已发动的佃户雇工，仍受其自己的领袖——代表会来领导。抗联对佃雇的指导，通过其代表会，这样已发动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可独自进行自己的活动。为了培养扶植地方干部，抗联干部在各区之小组（等于小区之抗联），吸收代表会主要代表参加，准备在发动农民的民主运动后，再在运动中产生农民联合会。由以上的经验，说明在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领袖□大批涌现、农民情绪正在高涨之时，也正是提拔与扶植群众领袖之时机，应立即大胆使用，应给以岗位，给以权利，以提拔地方干部。在运动中培养扶植群众自己之领袖来领导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斗争坚持下去，佃雇日常生活的集体化

过去，已有许多的教训，当群众大的运动过去后，领导者常

麻痹起来，而地主则利用一切空隙来进行反攻。佃户及雇工，在日常生活〔中〕与地主有多方面的“交道”，经常出入其门，经常在地主面前进来出去，其关系几乎贯穿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当佃户雇工集体向地主斗争时，地主在群众集体的面前让了步，给群众要求以允诺；当斗争过去后，农民又恢复到分散的状态，因之，地主的“反攻”来了，允诺的东西不给了，佃雇的斗争果实巩固不住，大者退佃解雇，小者“精神封锁”，“比鸡骂狗”。特别是佃雇斗争果实中有一部分不是马上兑现的（有利习惯、取消超经济剥削等），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去贯彻，农民成为分散的，以个别对地主，必然斗争不过。斗争是要积极分子领头的，分散，则中间、落后的群众与积极分子失去了联系，便不能独立的单独进行斗争，这样便大大便利了地主的“反攻”。

克服这个弱点，要使佃雇的日常生活集体化，以集体生活来贯彻日常生活之斗争。雇工佃户都必须单独组织起来，雇工为工会，佃户单独在农会里划成小组，把佃雇的领袖和群众结合起来。过去佃户分散编到农会小组中，正是使领袖与群众隔离起来，助长了群众分散状态。佃雇的单独组织，内容就是讨论日常斗争，一人的事大家讨论研究商量，需要时，随时大家来援助。在有利习惯及超经济剥削的取消上，为了坚持下去，应尽量求得行动的一致，特别在开始，还未造成一种习惯时更属必要，直到地主承认了这个习惯为止。这样，便可互相鼓励，互相督促，互相长进，领袖更易带领大家。

朱口村（滨河二区）过八月节时，佃户雇工先开会，怕地主搞鬼（不请或请得薄），决定分组集体过节，每家地主把酒席送到规定的地方，每家地主只能有一个人去作陪。有一家地主仅上八个碗，没有八个碟，佃户集体传看，那地主丢了丑，不得不又端出了八个碟。出粪，各村都规定了统一的时期。每到出粪时，大家都在街上吃饭，地主没空可钻，不得不管饭。这是群众以集

体力量对付地主从中捣鬼的办法。虽然这样长期下去恐难坚持（佃户自己可能也感到束缚），但目前为造成习惯，这种办法确属必要。将来地主承认了，佃雇感到不必要这样作时，自然自己就会来改变的。

在滑县有些地区，佃户雇工的日常生活集体化，还未引起注意，可能给地主以空隙，将来在这方面可能更容易发生问题。

**从行动中逐步提高群众**

群众的要求及斗争内容，是随着群众的行动而渐渐提高的。群众在解决了当前的迫切要求后，新的要求会升涨起来，又成为迫切的要求了。我们应当是永远的从群众当前的要求作起，而又引导群众解决新的更高级的要求，这样便可引导群众步步提高。因为群众提高是一个过程，过程有长有短，但总是有个过程，过去我们是不了解此点的。我们什么都主张一次"彻底的"，但群众觉悟及要求却常常不是一下子能够接受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的。我们过去的毛病，就是硬要群众接受我们的全部要求，不然就不让他们行动，要他等着我们说服了再行动，于是硬鼓动、硬教育出来了，宣传鼓动工作的神秘观点也出来了。岂不知，不叫农民行动，农民是不能提高的，教育鼓动不能完全代替了他实践的经验的，硬叫群众彻底也是彻底不了的。从群众当前出发，即从不彻底处作起，行动起来，逐渐就会彻底的。佃户的要求，常首先是减租增佃，然后才是超经济剥削、有利习惯的及关于股份问题及其他不合理事情的解决，都应是逐渐的。我们常常不作则已，一作就样样俱全，非群众当前要求中集中上来的，而坚持下去，只能是硬塞。回想一年前，减租增佃未进行，即曾把各样各色的应有尽有的问题提出来，结果提和不提是一样。今年佃雇运动中就证明：中心区的佃户和边沿区的佃户要求就不同，群众没有走第一步，第二步就自然没有兴趣。即在中心区，开始要求亦

都是不同的，有的只愿倒今年的、不愿倒去年的，有的只愿倒柴倒粮，不愿提各种习惯。但这些要求一旦解决了，又提出了原先不愿意的要求。有些佃户雇工原来要求低，联合大会后要求就高了，这也就是从行动中提高了。佃雇经过了查减运动，要求更高了。七区提出民主、武装掌握地经纪。六区东南部斗争胜利后，提出了过去的问题，大种地使死牛，欠租卖了老坟地，去年没有增，这些都要求解决。有许多村的佃户雇工，提出过去的债务与地主"私仇"，由此则说出了过去的明减暗不减，而这些农民在行动前是不说的，行动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也提高了要求。

对落后及走里分子（指有贴里行为的佃户雇工言），应是从行动中逐步提高。一般的落后分子或走里分子，大都与地主有封建关系或是历史关系，他们没有了解地主的"苛"和"薄"，一般的地主对他们也确实没有对一般人的那样苛［刻］薄，因此对这些人不能要求过高。

在群众已经起来斗争时，首先就需要内部的团结和一致。群众愈是依靠自己干时，积极与落后的界线常愈明显。积极分子最怕孤立、怕涣散，因此对走里分子，常常很仇恨。群众说："要团结就要反走里。"群众为保持自己阵营的一致，是不允许有破坏行为的存在的，必然要用群众力量来打击威胁，直到他改正为止。许多的贴里分子，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停止了贴里，开始跟着大家走了，有的向大家悔过承认错误。群众为保持自己行动的一致，亦不允许有个别的走里及落后分子例外的，要用群众力量拉着他们一道走。争取落后分子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先孤立，只有孤立，他才能跟着走。落后分子拥有多数群众，斗争决搞不起来的。这种以群众力量强迫他们跟着走，并不是可怕的，它是群众中的一种民主集中制。但我们应指导群众，把被强迫的缩小到最小的限度，就是要照顾争取落后的。

落后分子、走里分子跟着走了，行动了，就要在行动中帮助他

了解地主的“薄”，来认识到斗争的正确，提高他们的觉悟。地主的小恩小惠的目的，是为了多剥削、少出东西，但当看到落后分子及走里分子也真的跟着大家来要东西了，地主必然是要来计较的，地主的“薄”就暴露了。群众了解了他的“薄”，就以“薄”对“薄”。七区不少的这种生动例子，许多的落后及原先走里的佃雇积极了，原因就是他原来认为自己掌柜“厚”，谁知一要东西就“薄”起来，于是佃户对地主也认起真来了，和大家一样，少一点也不行。有的说：“你这样和我算小帐，咱们干脆算个总帐吧！”把过去吃亏处，原来不愿说的都说了。有的看到别人斗争积极，很快从地主手里得到了东西。自己不积极，后来失望了，才知道：东家的“厚道”，没有斗争可靠，也积极起来。

总之，对落后分子及走里分子，首先就是以群众的力量拉他跟着走（要求不应太高，跟着走就行）。只要跟着走，就有机会使他看到地主“薄”，就会提高他们觉悟；不拉他跟着走，就没有了实践中提高的机会了。

### 佃户雇工的运动应当是独立的运动

要使佃户雇工得到充分的发动，必须使佃户雇工形成自己的独立运动。过去佃户雇工不能真正的被发动起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佃雇的运动为另一部分群众所代替，把佃雇运动当作了从属的次要的，因此佃雇不能在自己充分的运动中受到锻炼，看不到自己的独立力量，而培养不出自己的领袖来。滑县此次佃雇运动规模所以如此之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进行了独立的运动。同时因佃雇独立运动而造成自己暂时的突出或孤单，是群众发动过程中难免的现象，因为群众是由一部分的发动走上整个的发动，不能设想，一次、一个斗争就把所有的群众发动起来的。有的地区提出“混合性的斗争”来，以佃雇为主并发动非佃

雇的基本群众也来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一经发动，由于非佃雇的群众在数量上多于佃户及雇工，民主斗争的范围及规模常比民生斗争要大，很容〔易〕转向非佃雇基本群众为主的斗争，而把佃雇运动实际上变为从属的，影响其充分的发动。如果在佃雇斗争某一个地主时，刺激了一般贫农对他的仇恨，要求斗争，那时只有从群众要求出发了。但我们指导观念上，不应以为“混合性斗争”比佃雇自己运动好，而有意的去组织和启发它。

### 我们的“框子”是群众运动最大的障碍

滑县佃雇运动的初期，主要是以繁杂的形式来摆布群众，为了把群众教育得觉悟，拿出许多会议来让群众开，如××村光会议的名字就有六七种之多。群众为了斗争果实，被迫的应付着，但积极性自动性就一点也没有了。其次就是害怕群众斗争，用评议来代替，限制了群众斗争热情发挥；但自提出大胆放手以后，有些地区又把大胆放手当作一个“框子”，认为就是“大干”，就是粗枝大叶，于是又制定了“框子”来套群众，不叫群众酝酿，就来开联合大会，群众不要联合，就来联合，结果大会上不是群众的讨论，而是干部的“发言”，不是群众的热闹，而是干部的在那里“大干”。

滨河有些地区嘴说是放手群众运动，实际上有一个框子要强迫群众去戴。我们提出打退地主反攻，农民对地主反攻的认识是倒粮倒柴打了折扣，彻底倒粮倒柴就是反地主反攻，可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就是“倒苦水”。本来群众有苦水来倒是应该的，但没苦或不愿倒时也非得倒不行，不倒苦水就是不彻底，就应反对，就是走狗，于是出了逼倒苦水的现象。有些群众为了怕说走狗，或是怕不叫增佃，就来应付我们，没苦亦倒，把［使］诉苦成为笑话；有的因不愿倒苦水便不斗争了。

有些同志认为非倒苦水觉悟不能提高，但试问这种硬逼着

倒，觉悟就能提高吗？我们〔在〕这个固定的格式下脱离了群众，使有些群众本来在行动中可以逐渐提高，因怕倒苦水而停止了行动；这在另方面来说，正扩大了"走里"的人们，亦正便于地主的收买了。

在斗争普遍的掀起后，农民情绪高涨，要求减租、增佃、增资，纷纷欲动。而地主看增佃增资已不可免，为了避免大斗或罚，主动让步，愿意减租、增佃，找佃户，找雇工，向佃户要求不开大会，不揭短处，向群众承认错误（没有执行政府法令）。这给农民心理上以变化，而在今天地主请求下，气就消了不少。激烈的斗争形式必须有农民的仇恨作基础，在此种情况变化下，我们不改变斗争形式，仍非要一个一个的经过大会斗争诉苦不行。农民认为这是多余的，但我们决定，不经抗联允许，地主不得减，农民不得要，否则双方犯罪。有的农民已把粮食背到了家，又叫背回地主家里去，重新斗，开会，诉苦，但农民重又把粮食背回家里时，仍是那样多。农民到底不知道我们开会诉苦是为什么。在这种形式下，使农民的自发斗争变为"私了"的形式，因农民已感到不需要那样开大会了，但抗联又不允许，农民只有暗地和地主"私了"，共同欺骗我们，把农民的自发斗争逼得成为了秘密。

### 执行政策中的"乱"和"左"

因为群众充分的行动起来，政策的执行比较彻底，但由于群众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执行上不是那样的划一，就显得"乱"。比如关于股份问题，有一律推平的，有保持活头顶大股的，去里搭股之股份，有烂里边的，有加到外边佃户身上的，取消地主股份倒粮，有按股分的，有是光佃户分的。关于退佃问题，有复佃者叫赔偿一季，有叫赔偿一年的。关于恢复旧的习惯上，更是有的添了新规矩，有的恢复多，有的恢复少，真是规定不一，名目不一。总之，是很乱的。然而这种"乱"，我们认为是在群众轰

轰烈烈的行动下不可免的，因情绪不一，觉悟程度不一，很难那样的齐臻。我们不应大惊小怪。群众在大的运动下，破坏了旧的，建立新的，暂时的"乱"，往往是不可免的。

群众的行动，鼓舞了群众的要求，某些"左"的过高的要求，必然要产生的。某些地区群众要了棉衣，某些地区要了单衣，在热烈的行动鼓舞下，群众对过去的东西"打倒""取消"的更多一些。其次就是一般的对富农、小地主照顾不够。我虽然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叫喊着这个问题，但群众未有理我，一样的干下去了。这是群众策略水平的问题，群众未有体会到照顾他们的必要。群众在宏伟的运动中，强调团结一致，对大地主、小地主的不一致，会影响佃户内部的一致，会打击一部分佃户的积极性。

这种政策执行上的"乱"和"左"，在群众自己行动起来〔时〕，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应大惊小怪，更不应在群众热情正高时来"泄气"。七区、九区佃户运动后，我们进行了些工作，某些乱的现象已有改正；有些佃户在自己开会检查时，也指出了"顿出了圈"。这些现象，在群众的今后实际行动中，经过我们的教育，是会逐渐改正的。

# 关于滑县三区问题的教训

## 三区的历史

滑县三区，1940年曾短时期为我们根据地。有些零星党的工作，但非常薄弱，群众未有发动，但因打狗、拆楼、借款、乱杀人的盲干行动，得罪了地主，也脱离了群众。"五五"敌人大"扫荡"，地主首先搞起会团与我对立，我们被迫退出。以后就形成了长期武装对立的局面，地主亦长时期的（1940年下半年到1943年春）依靠武装在三区进行了专政的统治，与敌伪顽勾结，并在他们面

前求得合法。因此，这里就有许多的特点了：首先，地主阶级有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会团，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由于二年多的武装对立，对我有较深的仇恨。大地主有1940年组织变天的经验。1940年，滑县地主阶级首先在这里武装反对我们，因此变天思想特别大，认为我们的秩序不是不能推翻的，"变天"是有信心的。这与长期根据地的地主阶级是不相同的。过去在我退出滑县后，与敌伪顽曾进行了共同的统治，与他们有过朋友关系，而今天，他们的这些"朋友"并没有远去，还在根据地的边沿、甚至根据地的当中盘踞着，这就是他们的出路，不得已时的靠山。在地主阶级的内部，由于地主的武装统治，得以幸免伪顽直接盘踞下的破烂局面，秩序有某种程度的安定，保护了中小地主一部分利益。这与他区不同，因此中间势力与顽固势力分化并不明显。去年春天前的情况大概如此。

**去年的蛮干**

去年春，我们武装开始能出进三区会团区活动了。当时由于我们声势浩大及群众情绪的向我，□会团内部的矛盾，使地主并不敢公开与我继续对抗下去，并在我过往不究的口号下，大部的会团主要分子都留下，未有逃之夭夭，但对我恐怖怀疑却未减轻，注视我们究竟对他们作如何处置。利用其内部矛盾杀周烈文是正确的（会团最坏首领之一），但我杀周后，对当时的地主是一连串的实行了绝对打的政策，提枪，借粮，但因为是对整个的地主，除引起阶级关系不利的变化外，主要分子并未逃走。

去年秋提出发动群众，由于过去长期武装对立，曾给我们造成过很大困难。三区会团的复燃，是大众所担心的，都想把几个会团主要村的群众彻底发动起来，把几个主要分子彻底打垮，从此出发便忽视了三区的历史特点，及我们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未有某种程度的巩固，忽视了刚解放区域之群众的水平，领导上产生

了过急的心理，没有从群众水平逐步提高。几个明显的突出重点（都是过去之会团村，即几个主要头子的老家），安上大斗周玉明并牵上周凤明，在洛寨大斗方振宇，冢上放上了许多个干部，来势汹汹。大地主本心怀鬼胎，如此一来，看到我们的报复来了，因为过急，超群众水平，更显得是我们要斗他，不是群众要斗他。大地主自知欠我们不少的血债，既然我们报复，当然就非同小可，感到自己岌岌可危，生活不下去威胁了他们。但当时，局面刚刚打开，我们的优势还未为大地主所承认，他还像1940年一样，认为根据地仅是暂时的现象，不是不可以"变"的，周围有人向他招手，不是没有出路。这种情况下，他们考虑了自己"利""害"的问题，在家低头，或是听其危险，不如外逃。周凤明、周玉明、肖估之，就是这样情况下逃走的。从当时走的时候，还有些具体原因，如方振宇与县长谈了话，更加怀疑，肖估之因我要抓他妹夫（伪军），使他也害怕。但这仅是些具体原因。

**今年的蛮干**

今年春天，三区群众工作上，最主要的毛病是干部的"左"的蛮干。首先，我们企图组织群众斗几个尚留家未逃的□□主要分子，但这些分子，罪恶未那样明显，群众不斗，但干部总在想法要斗他们。群众发动不起来，干部在日常生活却给主要分子以不少的刺激（干部借故扣、捆）。在滑县六区斗争蓬勃开展后，县对三区也以六区的要求为要求，于是三区干部苦于搞不起斗争来。没有大的斗争，只有搞小的对象，小的对象也要搞起大的斗争，制造斗争的现象出来了。来流漓一个小村，群众不愿大斗，偏要大斗，联合斗，本村群众吓走了，只有干部和外村群众在斗争。万集群众不斗王××，我们非要斗不行，结果将王扣区，召集群众来斗，但群众仍是勉强的，形成我们和王斗，群众旁观，

罚了果实给群众，而王××在群众面前，并未伤了尊严。冢上找不到大斗争〔对象〕，便斗争和尚。这些硬斗的事情是很多的。

由于对次要分子的大斗重罚，由于我之蛮干，使留家的主要分子及大地主更感到自己的危机，虽然未打到他们的身上，但关系却日益紧张起来。他们对我们的“必斗”只有向严重方面想，没有丝毫侥幸的希望，对我们究〔竟〕何以对待他们，是不好捉摸的，因此极端警惕，在他认为稍有征候〔时〕拔腿就跑。这些征候，有些并非事实，足以说明关系的紧张。冢上“三李”，因我干部在大会上说“有些人没有事，看个报，造个谣”，而冢上看报的地主只有“三李”，于是恐怖起来，后来有人号房子，认为要抓他，便逃之夭夭了。×保几个地主突然向北乱跑，因听说要开会斗他，为我村干部阻回。北苑村黄化民，因为自己觉得我们要斗他，后为我干部扣了一次，害怕，跑了。刘××因为民兵扣了他一次而跑了。逃走的愈多，剩下的大地主愈觉得突出和危险，愈觉得自己被斗期间的逼近。×××说：“像我们这一号的快没有了，快该着咱们了。”主要分子一跑，次要分子就显□了，逃跑的愈多，对已经逃走的更是一种支持、鼓励，争取回头更加困难。这样，就造成了逃走的逍遥复逍遥，在家的挨打复挨打的形势了，更加助长了外逃。

所以造成“逃走的逍遥复逍遥，在家的挨打复挨打”的形势，主要我们在政策〔上〕有毛病，一是逃跑的未有从严。从严应从二方面，一是对敌斗争，使之借以生存、依靠的伪军不能逍遥活动，给其许多困难，迫使地主从根据地中找出路，不能那□放肆的投敌，一是逃走的代管，投敌没收其家产。这样一来，严于在家地主之被斗。但对敌斗争未有很好开展，家产也原封不动，因此显得外出投敌的逍遥复逍遥。其次，留在家的次要分子处罚过重（多是我们干部蛮干），更显得对逃走的不严。如果不逃走，也要弄个倾家荡产，他当然就不怕逃走后你没收或代管家

产。方老生斗后又走，就是处分太重，在家□□实也是把地卖完，不如逃走等着变天。对次要地主的严，使大地主更加害怕起来，不仅想到家产，□且害怕性命。总之，凡估计到〔活〕不下去的都跑了，特别是在外边有出路，有活下去的依靠，逃走与留下相比较，还是逃走对他有利。凡估计到可以生活下去的都留下了。土地主、小地主，虽有被重罚，但未倾家，出外没出路，"穷家难舍"的仍留下了。在外边没出路的情况下，根据地有一点出路也勉强留下。

由此看出：地主在经济上虽有保守性，便于控制，但我政策超出了保守的限度，即没财或很少财可保时，则会坚决起来。政治上顽强的地主，一向高高在上，有统治野心，是很难向群众低头的；特别在抗日秩序不够巩固的情况下，外边有出路，是不肯安分守己的，他不愿屈服群众，勉强求得生活下去，他要找到靠山，来踢翻我们的。因此，我们力量的大小，根据地是否巩固，对政策的执行上应是不同的。

地主的逃走和投敌，加深了群众中的恐怖及变天思想，投敌地主的武装威胁，深深印在群众的思想中，一想到"扫荡"，就想到地主的报复。特别是去年"扫荡"时，安上逃跑地主，配合伪军惨杀安上村干部的事实，给群众留下了可恐怖的印象。因此群众中就要分化，一部分积极分子滋长了蛮干，中间分子及落后分子，就要消极下来。去年曾轰轰烈烈的安上，现在连农会都开不起会来，许多会员不敢承认是农会员，家庭拉腿，连政府的贷款都不敢要了。目前安上只剩了一个农会主任和几个民兵了。由于地主纷纷外逃，群众斗争拖延不能解决，不能迅速得到果实，而却增加了精神上的负担（恐怖），而我们的动员工作是按先进村一样的要求，农村的阶级关系，呈现了长期的紧张而胶着的状态，群众就支持不下来，就要消沉。群众消沉，村干部就孤立，突出；强迫命令愈利害，就脱离群众，工作搞不好，问题愈来愈

多，我们的干部情绪就低落下来。

**流氓及民兵的投敌**

三区地主逃走之势未下，流氓投敌之风又起。流氓为什么投敌？检查所得，一般原因是：一、流氓在生活上没有出路，许多流氓欠帐甚多，没法偿还，旧的谋生道路已被破坏，新的生产道路又未提出。许多民兵中的流氓成份，老□枪不生产，过去乱缉私，现在不允许，看家粮取消，生活没办法，家中人责骂。二、流氓的被打击、被孤立。一般的流氓在村中都受到我们的排斥，不让参加农会，舆论上打击、讽刺。民兵夜间站岗不让跳墙头（这是极普遍现象），处处限制，处处打击，绝对孤立。本来，三区工作开始〔时〕，有一批流氓靠近了我们，有的参加了民兵，有的当了村干部；在反新贵时一部被打下来，一部因行动不轨被清洗。他们认为有功，不赏还罚，心怀不满，与新起的民兵及干部闹宗派，但又怕被斗争或清算他的错误，因此又恐怖。

由于这些原因，对我不满。政治上经济上感到没有出路，但外边有出路，伪军王树林（白道口伪军头子）有计划的收容他们，放纵他们，因此投敌的渐渐多起来。

此次清丰敌人"扫荡"时，民兵及流氓投敌更多。有些流氓因早有此意，乘机投敌；而大部分民兵是在恐怖变天、找出路的情况下投了敌人。投敌的民兵大部在我未发动群众的地区，民兵成份多系流氓，有的掌握在地主手里。"扫荡"后，谣言纷纷，王树林有计划的散〔布〕变天恐怖思想，并利用已投敌民兵纷纷活动。民兵在这种恐怖下，先放下了武装，有的被迫投敌，有的在恐怖下投敌的。

**未有尽力的开展对敌斗争，是我们最大的失策**

三区是处于白道口、周村、小寨、两门4个据点当中的一个

地区。入春以来，白道口、小寨的伪军王树林、吴兰田改变了活动方式，主要是夜间偷袭。由于投敌之地主及流氓的配合，给其夜间活动以许多便利。据云，投敌地主肖估之曾到冢上活动5次，但都未得逞；安上也九次进入村上庄。这给群众，尤其是给积极分子以很大的威胁，民兵成年不能分散回家住，村干部一到夜间不敢离开民兵，有的村干部夜间睡觉不让人知道地方。总之，白天好像秩序很安定，但一到夜间恐怖就来了。过去三区的民兵本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对敌伪这种夜间偷袭却感到没法对付，仅处于一种消极的分村防御状态，给吴兰田、王树林更加放肆的机会。三区群众中经常酝酿着伪新五军到三区打钉子，吴兰田安据点了，群众思想上时刻怀着恐怖，人心可谓有些“惶惶”。

由于对敌斗争不能有力的开展，给王树林、吴兰田以打击，更多的造成他们的困难，使他们不能与不敢这样放肆的活动，不能在实际的对敌斗争中，来显示我们的力量。三区地主、流氓的投敌，主要的出路就是吴兰田、王树林那里。我们对敌斗争表现得没有力量，更加显得地主、流氓有出路。吴、王的逍遥法外，放肆的活动，更加助长了地主、流氓外逃的信心，更加敢于依靠他们与根据地与群众对立，群众、根据地对他们控制的力量就愈小。逃走的增多，投敌的增多，更加壮了敌伪的气焰，活动更加积极，对我威胁愈大。这种形势，就更加助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敌伪成了逃走分子的支柱，依靠敌伪就可逍遥法外，就可乘机报复，增加了我们发动群众的许多困难。设若我们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更大的努力，给敌伪以更多更大的打击（包括群众的联防，主力的配合），使伪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自顾不暇，作别人的靠山自然更加困难，地主、流氓眼看他们危机四伏，自然不会当作自己出路；而另一方面，也显得根据地更加有力量，群众积极分子信心更高，自己阵营必然更加巩固。如此，地主流氓也会更加老实一些。此点应当是三区工作中最重要的一

个教训。

## 几个问题的提出

### 群众的解放事业是群众自己的

群众的解放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过去总是在怀疑着这个问题：群众会不会进行自己的解放事业呢？群众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滑县群众运动的实际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回答。如何才能成为群众自己的呢？根据滑县的经验，最基本的有两个问题：

其一，从群众当前的要求，从群众当前的水平出发。许多事实证明：当我们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及水平出发，群众认为是自己的，会积极的行动起来；当我们与群众当前要求及水平脱离时，群众认为不是自己的，就会不积极行动，你要勉强，只有去包办。过去我们常常不肯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出发，我们有一个要求，强迫群众行动。我们总觉得群众要求太低，其实是我们要求太高。一切事情我们常想一次作好，作彻底，但一切事情彻底都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我们常嫌群众水平低，其实正是我们脱离了群众。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群众是必须经过自己的行动、体验，才逐渐提高起来。这个行动、体验，是谁也代替不了的，非让群众自己去走一走不行。我们过去主张宣传鼓动万能的人，就是不了解这点。他认为宣传鼓动，可以代替群众实践，而可超阶段的提高群众。这种观点下，产生了单纯教育群众的观点，要把群众教育得完全接受了我们的主张，按着我们的格式时才允许行动，不然仍是教育，或是认为太落后，不理群众。这样，结果，不是包办群众作，强迫群众作，便是丧气灰心，群众仍然是提不高的。许多经验都证明：要提高群众，必须首先服从群众目前的"低"，在群众用行动来达到了自己的

上"低"，"高"的东西才会来到。我们同志们，光害怕提高不了群众，因此用我们的"高"来代替群众目前的"低"，但群众根本不动，"高"也无从来。可怕的不是目前的"低"，而是不叫群众去行动。只要行动起来，一定会提高的。上面好多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千真万确。群众如何才能行动起来呢？就是从群众当前的要求出发。因之，从群众目前要求，目前水平、经验出发，让农民行动起来，在行动中逐渐提高，是群众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二，就是放手群众运动。群众自己的运动，自己是有能力进行，滑县查减运动中已完全证明此点。群众事，应当让群众去讨论，让群众自己去主持，一定要相信群众能办，而且办的好。只有让群众去办，群众才能在行动中锻炼自己，领袖才能产生出来。即使群众开始自己办的不很好，或是犯了错误，也是不应当害怕的，因为开始办不好，慢慢就会办好的。由办的不好到办好，能力就是一个提高；犯了错误会改正的，由错误到改正，就是锻炼。你说谁能不犯错误呢？我们过去就是害怕群众办不好，他们的事不交给他们自己办，我们去包办，即使你办的好，但也不是群众的提高，那"好"有什么用呢？有些我们要求群众过高，摆布群众，更显得群众不会办，因此又提到了"从群众水平出发"问题。我们同志常怕群众自己不会开会，因此自己去主持。你说群众真的不会开会吗？群众中有很好的开会的办法，不过不同我们干部的那种开法，你硬叫群众去学干部开会，那群众可就有些□笨。所以，过去认为群众办不好，与不从群众出发、要求过高有很大关系。

放手让群众运动另一个内容，就是不害怕群众的运动，敢于让群众充分的动，不事先给群众来一个束缚，群众未有行动，不要先怕群众"左"，先来防止"左"。目前许多地区群众不能充分发动，就是这个问题在作怪。怕"左"的思想经常左右着他，

群众稍一动，他就害怕了，就来限制和束缚群众，给群众“泄气”。照他想的，一切是非常文明，非常圆满，但对群众却是一种限制。群众起来后，“左”的行动必然要发生，我们不应害怕，应在产生了“左”的行动后慢慢说服群众，不是镇压、强迫、泼冷水，也不是群众没有“左”时，你就去作防止“左”的工作，那只能增加群众的犹豫，减少群众的勇气，那只能限制群众运动。但不应把农民对地主斗争一些必要的手段，也都夸大说是“左”，那样只有叫群众不动，安心受地主的压迫。在我们领导上，应当多多用些力量，来支持和鼓励农民的斗争勇气和情绪，对农民行动中所造成的伟大成就，应当称颂，不应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来光拣他们的“毛病”。当然，这也不是要我们去故意叫农民〔犯〕错误。

**群众运动一般的过程**

群众是具体的，不同的群众有其不同的要求。虽然群众有其共同要求，但亦有其切身的特殊的要求，群众是从“私”才能认识到“公”的。因此，开始发动群众，很难以一种运动把整个的群众发动起来。常常是一种运动，代表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一部分群众参加，建立一定的组织；另一种运动，代表另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另一部分群众积极参加，又建立另一种组织；最后，群众在共同的要求下，发动了共同的运动，建立了共同的组织。但群众不经过部分的发动是难以走上整体的，群众的特殊具体的要求得不到解决，对共同的要求的解决亦难以积极的。佃雇不经过减租增资，□民主斗争是不积极的；贫农只有从私仇私恨中才能认识到对地主的公仇，就是证明。因此，一种斗争内容，只能代表某种群众要求，不能把〔用〕一种斗争幻想把所有群众发动起来，不能以这部分人的要求去代替那部分人的要求，不能以这部分人的运动代表那部分人的行动，互相之间都是

包办不得的。因此，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应是由分散走上统一的，统一的发动，必先经过部分的分散的发动才有可能。

组织是和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是由分散到统一，由部分的发动到整体的发动，因此组织如果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变为群众自己的组织，就应当是什么样的运动建立什么样的组织，应当是由分散的、部分的、临时的、多样的组织，在运动汇合起来时，才走上整体的、统一的。过去我们以一个固定的永远不变的组织来套向群众身上，因此成为组织是我们的，而不是群众的，是与群众自己运动相脱离的，不是相适应的，不是在运动中产生的。

由分散到统一，由部分到整体的过程中，一般的、正常的道路是什么呢？去年高干会区党委霖之同志的群运报告上曾提出了这个问题。一年的群众运动的实际，证明霖之同志的报告是正确的。滑县七区的运动，给了这一道路以具体的指引：

首先进行佃户雇工的发动，在佃户雇工较充分的发动后，佃雇的要求进一步的提高，从切身利益的需要，产生了民主的要求，改换村长，改换农会主任，掌握武装（七区）的要求提出了，佃雇在斗争中形成了独立的力量，有了领袖，已有能力来作为民主斗争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佃雇的发动，大大刺激了贫农、中农的要求。开始，贫农对佃雇斗争的利益感到嫉妒，对保障佃权不满意，对反抽地不满意，因为这样，自己就没有当佃户、雇工的机会，因此要求利益均沾，要排斥外来佃户，要挤较富裕些的佃户的佃权，要求大家轮流种地主的土地，有的则要求二五增看青粮，总之，是贫农的经济要求升长了。此时解决贫农的问题已提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成为当前的迫切问题。解决贫农的经济要求，有些同志在此时主张单纯的调整佃雇与贫农的关系，原因系害怕贫农与佃雇因佃雇得到利益而产生的裂痕。其实这种裂痕是在贫农要求提高，但未有方向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单纯的调整是解决不了，只能发展自己挤自己的现

象。此时惟一的道路就是把贫农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解决自己的要求，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是民主斗争。谁领导贫农进行民主斗争，答复了贫农升长起来的经济要求，谁就把贫农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上面已经谈到，佃雇已有能力来团结贫农进行民主斗争，因此以佃雇为核心来领导贫农中农进行民主斗争，在斗争中统一和团结起来，成为当前的急务。在民主斗争中，佃雇的领袖积极领导，获得了中农贫农的拥护，变成了全民的领袖，佃雇的核心作用就巩固的树立起来了。但民主斗争一起，贫农中也迅速会涌现出领袖的，我们应注意发现和提拔。民主斗争后的农村，就造成了以佃雇贫为核心的农村了，农村的领导权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了。七区群众运动的过程就证明了这一个过程的全部。

民主斗争与生产不可脱离，应紧紧的衔接起来，因民主斗争不能全部解决贫农的经济要求，尤其是赤贫和极贫部分。在群众进行民主斗争，分得了果实〔以后〕，应即时注意引导群众用之于生产（必须是可能与自愿），“坐吃山空”，将来生产时仍是一样的困难。我们同志们幻想把民主斗争告了阶段后再提生产，觉得群众有了资本，但“实际”告诉我们，贫农分了果实，不是放着等我们提生产，饥饿迫使他随时吃掉。因此，生产必须是与群众的民主斗争紧紧结合。是的，民主斗争深入下去也是一个过程，但不能深入完了以后再生产，应当相互结合。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生产与民主斗争脱离过久，群众要求没法解决，则容易因失望而低落，或是发展了乱斗。

这就是正常状态下的群众应走的道路。这一道路当然不是机械的，要刻板式的向群众身上套，基本上是群众要作什么，我们作什么，但不能否认我们启发、领导的作用。常常是一个地区的群众首先作了什么，对其他群众的某种要求会很快使之膨胀起来。这个地区进行了增佃，那个地方的佃户就启发自己增佃的要求；当民主斗争烽起时，群众的民主斗争要求就会很快升长起

来。因此，一定时期有一个最中心的运动，还是可能的。

在这个运动转到那个运动当中，领导与群众都需要一个认识和酝酿的时期，因此当中常不可免的要有一个低落与消沉的时期，但我们领导者的任务，在于把这个低落与消沉的时期缩短，使运动与运动当中的空隙愈小愈好。

**政策与力量**

一定的政策的实行，是建立在一定的力量基础之上的，撇开力量专谈政策是不行的。群众运动之政策，亦应照顾到我们的力量。在［把］滑县六区及三区对照一下，就不难明显看出这个问题来的。六区比三区的群众运动对地主的削弱更大，罚的重，打的狠，然而六区的地主向农会屈服了（当然不是说不反攻了），而三区地主却大批的投敌了。当然，其他原因很多，但基本的原因是我们力量不同。六区秩序巩固，使地主感到要打翻它是不容易的，离敌较远，没有出路，三区这些条件是远赶不上六区的。我们对三区的指导上最大的错误，是没有从三区出发，而是以［把］六区的要求搬到三区，因此把三区弄的问题很严重。这就教训了我们，不能乱搬家，要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以上所谈到的滑县的一些经验，各地如要运用时，希能特别注意此点。

一九四四年十月脱稿

# 冀鲁豫、冀南行署
# 关于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各专员、主任、县长：

兹将教育经费、教材问题作如下指示：

一、经费

1、冬学民校的办公费，由村款开支，其数目由民村〔村民〕议定，经区公所批准后按合理负担摊款（其有公共收入者由村教委会负责掌握）。

2、冬学教员为义务职，但其家庭贫苦、在教学上有成绩者，得按具体情况给以10斤至30斤小米之资助。其具体条件，由各专署自定。此项粮食，原则上由村款开支，但某些负担过重之村庄，经专署讨论后，可由边区粮开支。

3、初小、高小教员及校长之待遇，仍为薪俸制。除小米、烧柴之数量仍按以往之规定发给外，原则上每人每月最多再增发抗钞200元，专署可按地区性质，教员、校长之质量，拟定增发数目之等级，通令各县自〔民国〕34年1月份开始执行。

4、初小教员薪俸及办公费目前暂由边区粮款开支。其课本（民校同）费由村款供给，文具学生自备，但特别贫苦者可由互助募捐等办法解决。

5、高小及中学师范的经费由边区粮款及生产中解决。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第333—334页。

6、临时教师之报酬，得列入各该校经费预算内。其报酬之多寡，应按当时情况而定（如请一编筐教师以平常每编一筐所需时间及能获之利润多少为标准，不能太高或太低，此项生产品卖出后，之纯利应抽取一部分归入本校经费内）。

兼任教员之报酬，高小每小时 2 元，中学、师范每小时 3 元，亦得列入经费预算内。

“……（原字迹不清——编者）贫农与群众联系好的学生”，□由于各县高、初小学数目及各校人数不等，目前，“初小每县资□20人（伙食一半），高小每校 5 名到10名”，执行起来还有一些困难，我们决定各专署可在边区粮款内提出一定数目，作为奖励学习模范之用。各专署按各地教育情况确定各县学习模范的数目，各县再按具体情况分配各校的学习模范名额。每半年总结一次。详细办法由各专署制定，通令各县自〔民国〕34年度开始执行。

二、教材

因各级学校教材，本署一时难以编制妥善，在未发下新教材前，各地可根据分局文件精神及学制与课程分量，由教员一面讲一面编，编好后送县教育科转行署审核，其可用者每种给以 200 元至1000元之奖金。

以上各项望研究执行，其在执行中所发生之问题望及时报告。

礼！

冀鲁豫行署主任　任　晁哲甫

副主任　徐达本

贾心斋

冀南行署主任　任　孟夫唐

副主任　王任重

# 冠北工作队总结

（一九四五年一月）

杨易辰

## 壹、冠北赎地工作的基本总结

冠北赎地工作是在民主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一个多月的赎地工作中还穿插了一些民主斗争，末了的十几天又进行了突击发展党的工作，临结束又提拔了一批干部（100⁺ ）。今天说来除三个区打下了工作基础外，其他区在受到影响后也在初步发动，给我们的发展奠定了阵地。

### 第一部分　天灾人祸的危害造成了农民失掉土地

A、由于国民党齐子修、吴连杰匪军长期的盘踞在这个地方，同时结合国民党农村封顽势力在乡村里的黑暗统治，并结合了敌伪的抢掠和摧残，这样就使这个地区灾荒来的特别早、特别凄惨（造成无人区）。

后来的大旱灾是在以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灾人祸相继交迫，就造成了广大的无人区和惨绝人寰凄凉悲惨的景象。

一、国民党齐、吴匪军长期盘踞

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南下，吴连杰就盘踞在此。开始时他和国民党关系密切，后秦李寅等便钻进去，侵犯到农村。后来沈鸿烈当山东省主席，把这一带划成四专区，委他为保安二十二

旅，成了国民党特务直接掌握。①他每进一村即抢掠一光，继则盘踞，零碎敲诈吃喝，群众也就拆房卖屋应酬。②捉汉奸敲诈。如东王信林玉卿，吴到前他有90亩地，6000斤花，50石粮，有房26间，大车1辆，松树60棵，枣树40棵，五手粗杨树9棵，有佃户，有雇工，过的很整齐。该村林普亭、林玉亭与吴匪勾结，〔民国〕28年2月穷人出不起款项了，就叫他垫的，他卖了几亩地。后来要兵，于是林玉卿即去当兵，后受不了跑回来，被罚一桶洋油。后来林玉亭动员他卖地，他不愿卖，林玉亭即报告吴他是汉奸，罚粮5000斤、棉4000斤。后来又要款，因之树木余资光了。〔民国〕31年12月又因敲诈不能居住，逃到刘官庄，母、妻死二口，后便分散投亲友。林玉卿逃荒河南，死了一口人。后来〔民国〕32年春又要款，将房子拆的只剩1座，地45亩。后来祖父母与子都饿死了，地剩了30余亩。林玉亭兄弟们在吴部当官，经常借公家名义开假条勒索。该村房子拆的不像样子，死了200余户［口］人。③强占土地。葛庄葛西贤民国30年前有地80亩，被郭牛抓汉奸罚款卖20亩，为村摊派花20亩。另外有30亩好地连接吴连杰的地，吴想要，便将他抓了汉奸，要3万元，葛拿不起，于是将地给了吴连杰，这时剩了10亩，母亲和小孩饿死了。火烧营梁心贵有地160亩，两个老婆两个儿子，又有一个小孩。吴连杰的一个旅长王书容，因梁的地挨王的地，王便借故罚梁400元法币、马一匹。且梁负责喂，因突然牵马，马到的晚，又罚了一下。吴罚他70亩地，又将他两棵好树要去了。④不管大小官，利用婚丧嫁娶进行打网掠索，连生小孩的银器、尿布都给老百姓要。⑤抓人花钱赎。乔庄的大姑娘拉了好几车，要花钱赎。

齐子修民国28年先犯到辛集一带，继则犯马颊河两岸桑阿镇一带。1942年国民党尹雷亭、张尼又勾引齐匪到王练子一带。土皇部队也来了。齐子修的口号是，任放在博平，也不放六、八区。唐福楷下台，刘祖荣上台，犯六、八区。张柳舫组织反齐斗

争，齐集中三个旅进犯，终于被攻破，男女老小死的很多，小孩被劈的也很多。进去三天张柳邵就完了。原来是101户，经过齐烧杀剩下30户。齐子修所到之处烧杀两光，光王羡死1200多人，林木都被破坏。齐危害到300余村，所住之村四门落锁，二年不能耕种。张柳邵30余户家关门不能出去，饿的拾树叶吃。

饮马庄许见德，7口人，30多亩地，很勤俭，养牛一头，齐见了就要牵。许文因之便恨之，与其拚命，因之齐兵将老头打死。于是许见德带家人要饭，拾树叶吃。因拾树叶吃，被国民党局子打坏膀臂痛死了，其妻与子饿死了，现只剩下一个小妮，一个小子，两个小孩没吃的，其伯父卖地19亩养子，每亩只卖法币30元；现两小孩只剩8亩地，于是又没吃的，两小孩每逢做饭就哭。便带到河南要饭，9岁女孩当童养媳，小子给了别人。

齐子修为了破坏，有"火神爷拆房组"，抢女人，烧房子，一过而光。齐子修是国民党内三青团团长。

周自忠、冯二皮也如齐一样。周是王来贤的团长，后聘之南去后他便兼二二旅旅长。冯住范庄，周住辛集一带。他们向外发展，到处抓人罚款烧杀。打代里庄时，国民党保证进去不动一草一木，发展到七星屯，一烧二杀三光，勒索敲诈。打开石庄，一坑埋32人，房子烧光了。

二、封顽势力的敲诈掠夺

1、霸占掠夺土地：掌握村政权，额外摊派，掠夺土地，勾结上层国民党匪军榨取群众。

王羡董善修是个地主，民国9年只有9亩地，后来贩卖白面，外号叫"白面楼"，后来发展到两个老婆、四顷地，济南、临清有洋楼买卖。他老婆叫汉奸区长，花600伪票，雇6个腿子，他的枪放在局子里，每月出洋70元伪票，他一点不出负担；别人拿不上款则不准出门，许给他，用这法勒索地30余亩。被掠夺土地的有9户。东王信林普亭勒索的全村房子大部拆了，只剩他四

家，别人拆的房子都被他要了。

张八寨叫李子公的村长兼教练，〔民国〕23年腊月，金郎同丢了东西，叫李子公给问问。于是李便将金小群抓去吊打死，叫金郎同赔5亩地；地拿出，李子公要了。〔民国〕22年春因要款，李便将寨门锁了3个月。群众饿的起来爬着求他开门；他便立叫交东西才能出门。于是掠夺土地很多，有的地全部收去，有的妻离子散。金瞎将地卖光，带钱下东三省，走到寨门被将钱夺回，死活不明。

2、封建势力贪污恶霸使群众倾家荡产

韩义臣贪2070万元（潦草的算法），一般的是百万左右，小的30几万，这是不在话下的。贪污花样无奇不有，一般的是瞒昧"黑地"，不拿负担；"黑地"不拿公项，私敛私要，多敛少交，以少报多，大秤收，小秤出，假报损失，自己用的东西报到公项中。

张官寨的许记浩，每天十多个鸡子、两盒烟、一斤馍都有公项出，报招待皇协军。许记楷看庄稼丢了草帽，花公项买，买后进城叫皇协拿去又支公项买。后来因打架，衣裳扯了也支公项买，报长袍，他赶集招待朋友也报公项。一般村公所都有厨子，出门有打扇的。在这情况下人民倾家荡产的很多。贪污到了无微不至，依靠封建势力讹诈群众。小刘家庄有两个群众没饭吃，在吴部当兵，后来回来，便说不带枪不能回来，后来这两人从吴部背枪回来，先将枪要到手里，继则以敌人知道为名吓跑，屡次恫吓不得已，每人被罚1000元。

3、严重的封建剥削，在灾荒期间剥削更甚，雇工白吃饭，吃的饭是糠菜，有的工人饿死了，工资至高1000多元，低的100元。

辛集于庆林雇工20年没算过工资，弄的工人吃没吃穿没穿的。对佃户一般的租额很高。

高利贷也很厉害。东王信富农三户借贷麦子14斗，棉220斤；中农61户借麦221.8斗，钱11780元，棉1831斤，花生1651斤；贫农34户；借麦15斗，钱540元，棉1075斤，花生979斤。利息：三个月1斗还4斗，也有1斗米的。全村借麦310.8斗，还麦669.8斗，当时麦子每斗400元，米每斗200元，约折合米1339.6斗。借钱最低的利是“五分”“加一”的，借一还二的也有，有的借1元还2元3元的，借棉有还2斤到3斤的，每百元每天出利3元。因高利贷将土地失去的也很多，有的家破人亡。

由于国民党的齐吴匪军和农村的封建势力用自己的血手造成严重灾荒，另方面又反过手来利用灾荒，进行残酷的剥削。

辛集一个工人说：“活呢？除操腚不干。饭呢？屙的不吃。”地主则说：“乱年出英雄，灾荒出富户。”孙士志说，饿死东王庄，先卖房，后贱价买地。

三、敌伪的摧残和掠夺

敌人在边缘区实行的是资敌和配给，离敌人远的掠夺和烧杀。靠冠堂路的高庄堡，原有200多户人家，经过敌人的抢掠烧杀，仅剩下两三家。这两三家还是与皇协有亲友之谊的。司庞庄原有128户，728口人，死绝39户，97人。

四、天灾旱灾

荒旱是在人祸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人祸的危害，人们已无抵抗荒旱的力气了。受外来灾荒影响也很厉害，如棉花不能销售，棉贱粮贵，棉出不去粮运不来。

以上四点是冠北严重灾荒的原因。但主要是国民党匪军勾结封顽势力的摧残所造成的荒草野坡。

B、部分灾情的调查

赵庄120户，750人，绝户6户，死200人，逃亡70户，350人，剩下的35户，191人。（原文数字如此——编者）

火烧营70户，334人，绝户33户，死68人，逃的12户，188人。

陈庄130户，800人，绝户15户，死120人，逃出770人，剩2户9人。（原文数字如此——编者）

灾荒期间人的生活是很凄惨的。根据一般统计来说，在饥饿线上挣扎生活的人，一般的富农、富裕中农也仅是十分之一二的粮食支持，十分之七八是树叶和糠。

方兆功（富中）每天带花子窝窝去扛草子，脸是菜灰色的，四肢如柴。下雪后，吃红薯梗、叶藜、秆草，于是人死亡率就大了，路上死尸遍是，家里躺的也是死人，四条腿的动物吃光了，为吃一条狗打架，卖老婆、卖小孩吃小孩也就不稀罕了。有一个村打了3.5万斤兔子，有一个村打的兔子除吃的又换800斤馍。在这种情况下把土地贱价出卖了。

## 第二部分　赎地工作的性质

灾荒期间的土地地价是不合理的。地主封顽势力趁灾荒掠夺土地是不合理的。因之赎地是合理的，是群众的迫切要求。

一区12个村庄赎地的调查材料：

地主18户，买地户数9户，花（卖）地的2户，原有2035.15亩，要地（9户）241.1亩，花地（2户）30亩。

富农41户，要地的29户，花地的3户，原有地2428.61亩，29户要地460.65亩，花地74亩。

中农原有321户，要地的177户，花地的87户，原有地7560.62亩，要花552.08亩，赎地444.27亩。

贫农1115户，要地的290户，花地的498户，原有地8139.6亩，要地713.6亩，花地2732.2亩。

赤贫62户，花地的28户，花地165.5亩。

赎地工作是个特殊性质的民生斗争——因赎地与减租减息，

增资增佃同样是民生性质，同样是解决群众吃饭问题。农民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失掉土地就等于失掉一切，失掉土地后就无法生活，就使他必须妻离子散逃亡流离。没土地是群众的迫切痛苦，没有土地就没法生活。因之肯定的说赎地是民生性质的斗争。有一个村因赎地就在门上挂“烧纸燎旗”。大桑树庙上写着“不准赎地，赎地杀头，国民党来后要杀头”。群众就抱定了“明天杀头，今天也要赎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是目前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毛泽东同志说，农民革命中心就是土地问题）。

所谓特殊性表现在：

一、天灾人祸相继交迫，使农民无招架之功、还手之力来抵抗，于是严重灾荒突然而来，迫使农民失掉大部分或全部的土地，因之就非赎不可。

二、斗争对象不统一，群众各有各的对象，这样就使群众一同的发动与组织上就困难。

三、不仅是基本群众对待地主富农封建势力，不是两个阶级对立，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其中夹杂着基本群众同阶层的问题很多。不赎不行，斗争吧，也不行，因之很容易造成司法案件。我们发动群众的目的在于使基本群众团结起来，划分阶级界限，否则会造成偷鸡不成蚀把米。

因之赎地就有以下办法：

一、由于第二个特点：

1、根据行署法令，我们要加强群众的阶级教育，划分阶级界限，提高群众阶级觉悟，使群众认清敌友我。这点做到就给我们赎地工作上一个很大的顺利条件。经过阶级教育，由自在的阶级到自觉的阶级。在教育时联系到自己团结与认清友人的教育。

2、一定要做到群众自己讨论，小组解决问题。

3、要想发动群众，必须在赎地中穿插民主斗争，先赎大地主的地，后赎小户的地；在赎地中进行对地主反贪污、反恶霸、

反"黑地黑枪"的斗争，从此牵涉到赎地问题，先赎大户的地，然后进行自己的地就好解决了。基本群众商量赎地斗争时，其他群众则说"同是阶级兄弟，商商量量别瞪眼"。于是，也就解决了问题。

二、第二特点的解决三个办法：

1、进行阶级教育划分阶级。

2、根据行署的具体法令解决问题。

3、在组织工作上：不要单纯组织赎地户，连被赎户也组织进去。组织上只是组织基本群众，不组织非基本群众。基本群众不管赎地户及被赎户混合组织。这样便不能使地主把被赎户组织一个统一战线的阴谋实现。

## 第三部分　赎地工作怎样进行的

当时赎地工作过程共分三个：

一、冠北赎地是在反贪污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反贪污是抓重点的作赎地，赎地是由集中到分散（干部使用）。群众听说赎地，各处都要求，火一烧起，普遍燃烧，干部再集中使用力量是办不到的，就是干部分散，力量尚不够使用。因之就使用村里积极分子发动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因干部对法令尚不够十分明确，积极分子更不懂法令，于是就开〔办〕了积极分子训练班。我们要把群众中集中上来的意见正确的弄成法令去教育群众，要群众自己动作起来。这样一来，准备提干部〔的〕积极分子得到了锻炼。积极分子训练班二、四区都进行，六区是指定党员和可靠的村干社会关系参加训练班。这些人没领导过群众斗争，没经过锻炼，所以不起作用，影响工作进行，因之被赎地户没被发动，即赎地户也没很好发动。

四区路堂组的介绍：

初到这地区，群众不了解我们，封顽统治严密，硬拉几个群

众，也是听后鸦雀无声。过去连人住都不敢。5个干部掌握21个村庄，后来抓紧5个路堂，大桑树8个村开训练班。训练班开过后，群众仍然不敢动。后来便到侯固集去开会，借说书场里讲话，讲话很久再散，一散群众即围上干部问赎地事，告诉赎地情形，群众情绪很高。连讲3次，成了群众的迫切要求。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封建势力直接统治的。在当场发现积极分子，便利用他们去发动组织群众开训练班，进行赎地。经过这样过程，21个村只侯固一村，其他村都进行了赎地，发动了一下群众，发展了党。

训练班内的教育内容：

1、进行赎地是合理合法的教育，驳斥封顽势力造的谣言。

2、进行阶级教育，划分阶层，并将具体例子附加进去。

3、进行法令教育和法令的研究。

4、赎地手续与方法。

5、把干部来一个思想鉴定：看对赎地认识如何？阶级立场如何？

二、到村里以后这样进行赎地工作的：

一般的大部分都是先赎本村的，再赎外村的。村里评议委员会也就是积极分子对赎别村的地，一般大部分的基本的有宗派观念，都发生过，但都能纠正了。先赎本村与先赎外村的不同。

三里小屯，赎地是先赎本村为第一段，然后再组织本村与外村评议委员会，划分阶层先从本村作起，这样很容易正确，然后赎外村就好进行，也好掌握。否则本村不将阶层划好，很可能产生些毛病（“黑人”、“黑地”、阶层划的不正确）。其次经过本村划分阶层，对〔使〕群众也初步受到了阶级教育，了解到同阶层的弟兄应团结起来。这样便减轻了村干的宗派。这样与外村发生赎地问题，能够比较站稳阶级立场来处理问题。再者村干村里群众经过本村赎地，便可能使他们得到锻炼与提高，有了处理

问题的经验。

三、进行赎地工作一般的要经过下面的循环步骤：

1、进行阶级教育，明确划分阶层：先在村干、积极分子的联合会上进行阶级教育，明确懂得阶层的划分。然后进行以阶层具体例子来研究讨论，根据他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提出赎地的阶层。在村干、积极分子中弄通后，然后研究村里几个人的具体例子来划分，教育群众，发动小组讨论，把每人的阶层划分清楚。赎后把组织的群众讨论其阶层，把阶层划分清楚后，把意见交评议会讨论。经评议会讨论将不同意见再交到小组讨论。赎后再交评议委员会讨论。反复的讨论，使小组与评议委员会的意见一致。赎后在群众大会宣布评议结果，发生问题当场讨论。办的更好的是各阶层站队的方式（贫、中、富、地分开站），然后中贫农再归伙（互相握手欢迎）。评议后可贴榜。经过大家几天的争论酝酿，群众对阶层认识会更深刻。

2、进行法令的教育和法令的研究，讲法令必须细密，使每个群众都了解根据法令发生的复杂问题的处理。在研究法令的问题上，要村干、积极分子把复杂的问题提出来，当场解决，赎后再在群众会上讨论研究。群众会上，村干参加，帮助解决。村干及群众解决不了的，我们的干部再帮助解决。评议委员会的产生就在群众讨论大会上产生即可。

3、阶层及法令弄通后就开始赎地。开始赎地办法在那个地区是这样的：

（1）当小组会交换文契，有的双方自动交换，有的群众大会上交换。

（2）阶层法令都弄清了，然后提出三天交换文约，文约一交换赎地就完了。交换最好的还是在小组会上的方式最好，参加农会的以小组会交换，没参加农会的也须组成小组交换。

（3）交换文约后再开群众大会，宣布交换文约事情，解决

在下边解决不了的问题。赎地应先赎大户的，对大户的顽固的应组织群众发动斗争；然后再赎基本群众的，解决基本群众的内部问题。

4、赎地完后，有的开了和场会，这样在感情〔上〕又近了一步。

5、一般的工作是经过这四个过程。有些村庄群众没有发动，既无下层工作又无组织，应首先进行组织工作，先组织赎地户，然后再由赎地户组织被赎地户，及不赎不被赎的群众也组织进来，参加农会，但这并不是机械的。有组织的地方，但组织不普遍，可以经过赎地发展组织。

四、根据以上几个过程，我们提出几个问题作研究：

1、阶级教育和阶层划分问题

假如说我们在赎地工作中发动群众的话，阶层［级?］教育应是一个中心问题，划分阶层不但是为了赎地，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使基本群众从原来阶级提到觉悟程度(从自在的到自觉的）。发动群众也是革命的目的，鼓舞他们对被压迫的认识，认识和仇恨压迫者，认识被压迫的朋友团结起来，这样就使地主封顽势力造成的村与村、街与街的宗派打破，使基本群众团结起来（不管街与街、村与村）。我们发动群众是从经济斗争达到群众的觉悟，基本群众在政治上团结起来。

（1）划分阶层的原则和具体问题的解决：

①生产方式——看剥削关系（是被剥削还是剥削者）；

②土地多少；

③看家庭富力如何。

基本上是以生产方式为主。

冠北在划分阶层上：

①以政治条件为标准的——进步的中农成了贫农，不进步的中农成了富农。如贾曲村一个中农，因贪污顽固划成了富农。王

二庄抗战家属降低一级，一个排长由中农变成贫农，结果赎回地后成了富农。

②单纯以生产方式为标准——经营地主是富农的生产方式。二区有将鳏寡孤独降低一级，但生活条件有限制；但若把生活条件与家庭富力估计进去，降低一级不（好）。

③单纯以土地为标准——袁虎寨赵培村有8口人，70亩地，有3个完全劳动力，按土地说可以是富农，但全家都参加生产，也不放高利贷。我们干部根据土地划为富农了，我们〔认为〕基本上应划为富裕中农的成份。三里小屯有时期规定：3亩以下为贫农，5亩以下为中农，5亩以上是富农，10亩以上是地主。这样机械划分，有的会危害了经营富裕中农的生产情绪，但村干部要求按地划分。

④甘官屯：根据这四个条件来讲贫、中、富、地——吃的；穿的；劳动；在村里的地位。

阶级教育是这样进行的：冬天家里吃个豆腐，当家的吃个麦子，穿的是长袍大衫盖压风被的是地主富农，地主躺在炕上不做活，富农溜地边，在村里称爷的就是地主富农。

中农：吃黄窝窝，穿长袍，布不好，在村里显不着的是中农，忙时干活的也是中农。

贫农：吃黑窝，穿撅腚棉袄，整天出力，春天吃饭掺糠，天热流汗还穿棉裤，三四个人盖一条被子等就是贫农。

拿吃好吃孬穿孬穿好划分是不好的。

（2）阶层划分和阶级教育进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①进行教育与阶层的划分，目的是应达到明确基本群众的阶级认识，提高阶级觉悟，但应麻痹地主富农的阶级意识，不能使地主富农在阶级上觉悟起来。

广泛的使用群众路线，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②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这一街和那一街，

这一村和那一村阶级联合的很好，教育使群众放下自己狭隘的圈子。不管哪村与哪村，哪街与哪街，基本群众要团结起来。在赎地问题上可让这村赎地户参加外村赎地组中，大家都表示阶级兄弟的亲密的热情。

注意村干的宗派观点。

〔2、〕法令教育和法令研究的问题：

〔(1)〕法令的研究：

对行署法令我们应这样认识：

①在于买卖关系不正常不合理。根据群众的要求使土地不集中与农民失掉土地，行署赎地法令的颁布是很正确的。

②行署根据土地集中情形，根据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办法规定。在这里我们提出几个问题研究：

一是按行署法令中贫农同等阶层改当期二年，这一点在下层执行不通，群众不同意。我们用了群众意见将地"二一添作五"，群众很同意。

二是对流氓懒汉问题，他们必须向群众悔过自新，先改当期一年，待真正劳动改过后再赎回。

三是对汉奸家属问题，完全让赎或完全不让赎都不好，对汉奸大小亦应不一样看待，根据三个条件：是大地主；是中队长以上的官；是特务坑害群众的。三者有其一的都〔不〕准赎。如系小汉奸，且与家庭脱离关系，可按现在的成份计算，但他本人不算在成份内，或者把他应当分得的部分交基本群众赎，家里应和他假分家，争取时间可以一个月。

四是有可考据土地上面的动产是否赎的问题。

〔(2)〕在执行法令中间应注意下面三个问题：

政府法令就是党的政策，不管法令或政策都应从群众中来的，另方面我们应须要拿到法令去试验。法令不一定适应每个具体情况与每个具体地区，因此应改变法令，但还有偏向。

第一、我们应完全听取群众的意见，不向群众宣传赎地法令与复杂问题的处理办法。在具体问题上有非按法令执行不可，机械了解法令条文而不了解法令实质，于是群众意见发生，我们也不听，我们的法令就束缚了群众的意见。

第二、在执行法令中间应注意手续清白。因我们的法令使群众自己解决，由于自己解决，所以容易，手续便不清白，不清必定有争论。另外，为了弄清手续，容易弄成司法案件，弄成司法案件，这样便阻碍群众运动。解决的办法，只应经过群众提意见，解决后经过政府办理手续，主要的是群众自己处理问题。

第三、关于组织起来的问题

组织群众的原则——按照阶级路线来组织群众，采取赎地户及被赎户及不被赎地户混合组织的办法，一方面组织基本群众的团结，不造成赎地与被赎地户的对立，另方面可以阻止地主组织被赎户的统一战线，造成与基本群众的对立。

怎样在赎地中间把群众组织起来？在有群众组织的村庄，要拿现有群众组织作基础，发展赎地户和被赎地户，用讨论赎地法令的方式吸收参加讨论，组织或［成］小组，扩大组织。没有群众的组织的村庄，用研究会的办法组成小组，使赎地户与被赎地户和不赎不被赎的亦尽量参加，发展农会。不管有组织无组织的村庄，研究法令应首先以赎地户为主的入手，在赎地中寻找积极分子，作为发动组织群众的成员。

发展党和提拔干部问题，这是发动群众中的主要问题。

地主封顽势力对付我们赎地的办法及我们在赎地当中的斗争问题。地主对付我们赎地的办法：（甲）组织被赎户的封建联盟，一同反对我们的赎地工作。恐口无凭，有例子为证，张官寨被赎户的封建势力共十几户烧黄表叩头盟誓，对我们则坚不交文约；刘八寨王东郎收买几个腿子收集被赎户集中训练教育；张庄王汝梅以表示对被赎地户的关心，给被赎户生办法。在赎地户任吃点亏

只要把地赎回就可以。（乙）最普遍的办法，不交文约，造假文约；不交文约的使用量地的办法，对假造文约的对笔迹和中人证明。（丙)坚持不叫赎：地主富农不叫赎的可以斗争，基本群众可以说服，组织群众亲友劝说，加强阶级教育，万不得已可以用司法判决，但不是高压，而是在群众之前，政府和群众意见一致进行教育判决之。(丁)用封建余威高压造谣言欺骗威胁。我们应找威胁造谣的主谋人，狠狠的斗他一下。若这个村里工作没基础，封建统治严密，则先从别的村干起影响下发现积极分子再作起，另方面及时揭破谣言。谣言：“中央军快来了，要杀头”“敌人吴、肖（建国）知道了”“一个闺女不能嫁俩主”“借钱不准赎，卖东西不准赎，过期不能赎……”。(戊)私下暗增价，不经过登记，假开明，不讲阶层，先叫亲友将地赎出，先赎坏地留好地，这样阶层成份就改变了。我们在群众大会公布，私了不合法，暗增不算数，对假开明的我们应从最穷的赎起，按现有的成份计算。（己）掌握村政权，掌握评议委员会：法令不传达，曲解法令，降低自己的成份。我们的办法就用跳过村干和群众直接讲法令，找积极分子发动组织群众起来赎地。（庚）顶名买地，或假分家，或假合伙、假买、假要，主要是靠群众运动解决。

## 贰、大会讨论（略）

## 叁、各县问题（略）

经济问题的解决

1、目前买枪停止。

2、尽量争取赎地及反贪污罚款等以实物代换。

苹朝解决的办法：

1、枪停止买。已买的枪价由大家摊起来，并免得打击积极分子。

2、赎地改典赎少赎（少拿钱赎，以实物解决），贪污"黑地"等罚款，有以实物代之或以地代之。

3、抗属子弟的衣服供应还应解决。

4、负担上，关于商业负担问题希各县考虑告地委。

# 介绍某庄合作社*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

吴振全

刚踏入莘朝县境内的时候，和老百姓闲话中，随便问："你们这里哪村的合作社最好哇？"他们都是不加思索的马上回答："某庄的合作社最好！"的确，某庄的合作社是名不虚传——真好！

首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这是一个小而且贫的村庄，位于莘朝县西部。村内共有63户人家，男女群众252人。共原有土地952亩，负担地510亩。白姓58家，韩、黄、贺、罗、许5姓各1家。在阶级界线的划分上不明显，没有起过大的斗争，关系很一般化。富农4户22人，原有地227亩；富裕中农4家17口人，原有地165亩；中农15户52口人，原有地274亩；贫农35家147口人，原有地286亩；无产者5家14口人；没有地主。平均土地，富农1个人相当于贫农6个人的土地，是个头小脚大的村子。

该村离××集很近，所以，做各种小生意的有20余家，因而在生活上大部都能维持。

这个村因处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受到各种抗战工作的影响，在政民干部的长期帮助教育下，已逐渐进步，各救会的组织很早就建立起来了。现在，有农会员19人，青会员12人，妇会员20人，模范班12人。村政权也经过了改造，民主选举了村长。基本群众已树立了优势，可谓一个群众初步发动起来的村子。

---

* 本文原载《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608—624页。"某庄"指位于莘朝县西部的白庄。

# 合作社的产生与艰苦斗争的发展过程

这个合作社是在夏庄合作社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民国30年（1941年），夏庄在郭英同志的亲自扶助下建立了合作社，经过一年的惨淡经营获得了成绩，在群众的心目中打破了怀疑，树立了信仰。〔民国〕31年夏天，×庄白廷连老先生受到夏庄亲戚的宣传，初步认识了合作社的好处，深深感到在本村建立一个合作社的必要，在村里见人就宣传合作社的好处，号召大家集股。但因群众对合作社没有认识，虽经三四个月的宣传解释，仍未见效，相反地，还有人弄鼻弄眼地说："三老头（白廷连的外号）嘀咕咕，没有人听他的话，他着了合作社的迷了！"显然，是对他的宣传有些讨厌了。因时间很久不能见效，他并不灰心，就缩小了宣传范围，为达到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只在自己的大门里宣传，号召他的孙侄弟女集股。经他苦口婆心动员的结果，果然发生了效力，他的侄子白凌霄首先接受了，认识了建立合作社的好处，也帮助提倡。不几日之后，有不少人都想通了成立合作社的初步道理——大家成总的买东西（指日常使用的，如颜色、火柴等），回来零卖，又赚钱，自己用又方便。

民国31年（1942年）10月15日，共有36个人，自己成立了合作社。共集股470元，每股5元。当时入股最踊跃的是白凌霄（30多股）、白合亮（20股）、白凌汉（20股）。大家商量着成立了三个股：保管股（白合清负责），购买股（白合田负责），运输股（白合亮兼任）。社员中以中农最多，富农次之，贫农最少。至年底，在县抗联同志的帮助下，又增选合作社主任：正主任是白凌霄，副主任是白廷连。

合作社成立后，立即开始了营业，买了一批煮青、火柴、白布、麻糁饼等农民日常用品，供给本村社员与群众应用。在出卖

物品的价格上，社员与非社员严格区分，社员买时比市价低5%。开始营业时，资金运动［转］的很快，因为各种物品价格飞涨，卖的很快，有半个月的工夫，第一次买的东西就大部卖完了，煮青每合赚5元，火柴每包赚0.2元，麻糁饼每片赚3.3元……。至民国32年2月底止，在四个半月内，就赚了红利1800元，股金由470元发展到1700多元，发展了18个新社员，股金增加了250股。在这个时期内，富农感觉在社里买东西，又方便又便宜，很高兴，中农也高兴，而贫农消费很少，认为合作社对他利益不大，表现不满意。

民国32年2月以后，严重的灾荒到来了。到4月间，糠秕野菜都吃光了，贫苦群众因饿致死的断续发生。这时贫苦社员终日思想着社里的资本，眼巴巴的恨不得一下子吞到肚里。社干看到灾荒的残酷，决心将资本押到社里经营，从经营中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救他们不被饿死，便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在会上斗争的很尖锐。富农说："现在粮食正是涨价的时候，合作社是为了赚钱，不如再搁一搁卖了。"中农也有不少随声附和的。但贫农说："啥也没有换饿要紧！"争论了很长时间，结果真理战胜了。以后社干就根据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将全部资本变成钱，交给12个尚有经营技能的贫苦社员做买卖，合作社在其获利中抽30%。奈人多钱少不敷应用，又决定社员轮流使用资本。这样一来，就大大提高了贫苦社员的情绪。他们从实际的体验中尝到了合作社为群众服务的滋味。他们起初贩杂粮食，后来到南边（濮、范、朝一带）卖破烂衣服，换回粮食，从两个多月的经营中获利很大。这时粮食〔价〕也很高，他们很快的交回本来，以所得红利维持经营。在这个过程中，社干起到了"干部决定一切"的作用，不断的耐心的教育贫苦社员："不要吃掉资本，吃掉非饿死不可，如果做买卖，能赚钱就饿不死。"领导着社员们向灾荒作斗争，战胜了灾荒。估计在灾荒内共救活了30多个人。兹举出两个例子：

一、白合田（社干），家里5口人（母亲、妻、两个小孩和他），当灾荒到来后，家里没啥吃，大人小孩都饿得像个骷髅，以花生皮、红薯叶充饥。为救济他家，合作社贷给他1000元，作贩杂粮的资本。他把自己唯一的东西——1辆自行车，换了1个驴，用驴驮粮食。从3月初至4月底，每10天赶4个集，从张鲁集买回粮食，到王奉或帽子岩集去卖，共做了12趟，平均每趟赚2升多粮食，共赚了2斗8升。全家5口人都依靠他赚钱吃饭。到5月初，贩杂粮不赚钱了，就改成在家里卖零升米；他老婆开始到南边寿张、朝城去卖破衣服，换粮食回来。从5月初至7月底止（这年麦苗都被虫吃死了），5个月内共做了13趟，赚钱1万多元。因此，白合田家里不仅没饿死人，相反的，大大改善了生活，并从盈利中抽出1200元，买了5亩好地。现在，白庄一提起合作社支持群众渡过灾荒便说："要不是合作社，家里人早都饿死了！"脸上堆着感激的笑意与幸福的神情。

二、白如玉（社员），家里7亩沙地，4口人(妻、两个小孩与他）。灾荒严重时，把衣服、小驴等都卖着吃了，仍不济事，大孩饿得不会走路，快饿死；二孩想送给人家，但无人收留，想卖地，又无人买。正难的要死的时候，合作社里贷给他600元，作做买卖的资本。他即从事贩杂粮，情形和白合田相同。从3月初至4月底止，共赚了700多元。从5月至7月底止，又做了3个月卖破衣服的买卖，共赚了4000元。这样一来，救活了全家人的性命，并且又用1500元买了4亩半地。秋天农忙时，又用利钱700元，又买了1个小驴做活。在他还合作社钱时，由于心底里感激得过度，简直说不出话来了，是口吃的声音："要没有合作社的600元，也做不了买卖，赚不了钱，两个小孩早得饿死……。"

时至6月下旬，做买卖的贫苦社员都赚了钱，维持了家里的生活。大秋将要成熟，卖地的很多，地价也很贱，社干（因大多

数是中农，庄稼活也忙了）在思想上就动摇起来，支持贫苦社员生产呢？还是要点地呢？几个社干商量了一下，为了省事（这是不对的），就买了7亩当地，并籴了4斗麦子囤积起来。

是年12月，将地里收的及买的粮食卖出，够资本1.4万元，于16日开了社员大会分红，红利总额是1.2万元，分的比例是：60%的股金分红，30%的社干报酬，10%的基金。社员的股金分红按入股的早晚分4期（一月为一期）分：一期每股16元，二期每股12元，三期每股8元，四期每股4.7元。

分红后，各阶层的群众纷纷议论："某某沾合作社的光不小，合作社能顾穷人，又能分红。""为啥不早成立两年呢？要是早点成立，咱村还能饿死人吗？今年2000元的本，就救活了好几家人的性命。"白如章（灾荒时被饿死）的妻子亲自对白廷连说："你为啥不早成立合作社？！要是早成立，俺那口子也饿不死啦！"说时声泪俱下。

分红后，群众对合作社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扩大了影响。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增添了许多新社员与股金。从分红后至今年（民国33年）正月底，在两个月内添了新社员100人，股金2000元，区域由1村发展到35村（包括莘朝县西部、元城东部、冠县南部等地区）。此外，并有朝、莘、临、元、曲、馆等6县住××集的商人，集资500元入股。还有丘、馆、临、曲等4县逃往莘朝县的灾民，集资120元入股。

到2月，开始踏进了"官助"阶段，由抗联的领导及取得商店的帮助，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业务上由单纯的消费发展到运输及生产。先开始磨油，随后建立一个粪场（到4月底取消了），买了4个猪圈养。这期间，并组织了一个运输组，10余辆小车；6个妇女纺织组，30人；4个劳动互助组，19人。接着，运输队就代商店运粮、□棉花、贷粮、贷花、收布、卖平价粮、买农具、买布、兑换破票、买被套子等，得到一大笔报酬费。至5月

底才先后停止。这时，合作社的营业股就移到××集上，设了一个小门面。在这段经营中，由于营业范围逐渐扩大，群众获利也很大。

时间很快，瞬间麦收到来了。已组织起来的群众们，川流不息的经营着他们的业务无忧无虑。因富有者雇不到劳动力，大有荒地之感。合作社为从发展农业生产着眼，使剩余的劳动力转到生产上去，便动员说服运输小组停止运输，转向扎工。社员们接受了这个正确的意见，就组织了扎工队。用民主的方式，大家讨论了扎工办法，统一了工资：割麦子一天，管饭带6斤麦子；锄地一天，管饭带4斤谷子。办法公布出去后，富者对合作社大为不满，造谣说："工资过高！合作社领导村里分裂！制造斗争！扎工组是宗派团结！社干服务合作社是自私自利。"个别的社干也和富者站在一起，为吃"丸子"想尽一切办法打击合作社，联合起来孤立穷人，不在本村雇短工（其实外村的工资也不低），因而演出了两幕惨剧：

一、白凌云是个小知识分子，有两个老婆，一个小孩，共4口人，有地50亩。为怕将来增资，雇了一个老头。他今年种麦18亩。割麦时嫌工资过高，坚决不雇短工，只叫雇工一人割，割到第三天老头晕倒不能支持，仍不雇短工，为了加速工作效力，榨取剩余劳动力，他常用鼓励的口吻与竞赛办法。在炎热的天气中，加以饭不好又无水喝，老雇工终因疲劳过度，晕倒而死。

二、白凌月是白凌云的胞弟，俩人的土地人口差不多。他是反对合作社组织扎工的主力，夏锄时，他坚决不用短工，竭力使他的一个发育不成熟的孩子，做挑水、喂牛等繁重的工作。小孩子稍表不欢，黑脸一搭拉即加训斥。小孩整日俯首贴耳，心中有苦不敢说，天长日久疲劳过度患病，不几天也痛苦的死去了。

两人死后，街头小巷的人们纷纷低声细语："好不值过呀！

又花钱又死人，真是人财两空，白凌云、白凌月的算盘打错了。”“为了省几个钱，逼死两条人命，真没人心！”

一部分社干因受富者这一反对，加上做合作社工作与本人利益的矛盾（因做社内工作，耽误些本身的农业），思想上起了些不好的变化，感到冤枉，灰心丧气，不愿做合作社工作了。此时社内的营业形成无人管的状态，造成合作社发展前途的很大危机。

扎工组见本村这种局面气极了，一致认为是富户搞的鬼，把村里的工作弄坏了。所以，常激愤地说：“不给‘好’户扎工也饿不死，雇不雇不要紧，决不减少工资！”他们觉着合作社就是靠山，只要合作社存在就有活干。谁反对合作社，他们就反对谁！合作社内个别干部情绪不好，甚至怠工，对他们刺激很大，他们自动的提出来要给社干义务做活，使社干安心工作。社干听到后大受感动，情绪又马上高涨起来。这说明了合作社代表群众的利益，反对合作社即反对群众利益，但群众的利益是反对不下去的。

到6月29日，举行第二次分红(详见本文后部)。接着来的是秋天，富者对合作社又高兴起来，因有合作社的支持，村里穷人都有活干，都有饭吃，所以，在庄稼成熟了后，没有一家被盗的。这说明穷人过去觅摸的原因，主要为生活所迫、社会制度不良造成的。

8月以后，发展的更快了，相继建立了单纯的打油合作社、纺织合作社、雇主雇工打油合作社，分别介绍如下：

打油合作社：村社用9.5万元买的家具，并投资25万元，私人入股9万元，共营业资本34万元。每股500元，共社员40人。内部有11个工人，3个委员（主任、农业、组织教育）。分红的办法：除去工人的吃喝费用外，剩下的红利是：“人五钱五”分。用村社的家具的报酬是每百片饼中抽3片。

纺织合作社：共社员42人，股金2600元，每股50元，内有5个委员（正副主任、营业、组织教育、会计），34个参加劳动的人，共分8组：5个纺织组（每组5人），3个织布组（每组3人）。实行工资制，纺纱分三等作价：头等每斤（织8尺布）70元，二等每斤（织7尺半布）60元，三等每斤（织7尺布）50元；（由线到布）每尺5元（浆面由社内负责）。分红的办法：50%的劳动分红，30%的社干报酬，10%的股金分红，10%的公益金与基金。此社最大的特点是做到了三不闲：纺车不闲，人不闲，织布机不闲。

雇工雇主打油合作社：共资金9万元，每股50元，共18股。内部有7个工人，3个社干（正副主任，无会计），共作8股半算。合作的办法：雇主出资本，用牲口轧花生，管雇工吃饭，不出劳动力，雇工只出劳动力。分红的办法是：股金分红40%，劳动力分红60%，再将所得红额抽出30%给地主（此办法还在研究）。打油时用社的家具，报酬是每百片饼中抽5片。此社的好处是：一方面能利用农闲时赚钱，另方面又能和睦主雇间的关系。

白庄合作社简单的发展斗争过程就是如此。但还要告诉读者：在今年一年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全村65户人家都参加了合作社，获得很大的利益，改善了生活。现在虽到冬天，仍没有一家吃两顿饭的，都是一日三餐，吃的粗细净粮。并治富了家业，如白金奇，家里5个人参加了合作社，本年内赚了4万多元，于春天时买了8布袋谷子、1亩地、10棵杨树，还盖了3间新房。春天时，社干异常有信心的提出口号："保证全村穷人不卖1亩地！"现在，这口号实现了，全村没有一人挨饿与卖地的，唯有一个寡妇卖了8亩地，但在她娘家却另买了20多亩好地。从9月至今村里买外庄地1顷多。

# 组 织 概 况

（一）自去年分红后发展得很快，根据第二次分红时的统计，各阶层入股情形如下：

| 阶层 | 富农 | 中农 | 贫农 | 商人 | 团体 | 共计 |
|---|---|---|---|---|---|---|
| 社　员 | 24 | 168 | 174 | 9 | 48 | 539 |
| 股　额 | 2093 | 9024 | 3749 | 205 | 8595 | 26684 |
| 每股金额 | 5 | 5 | 5 | 5 | 5 | 5 |
| 总金额 | 10465 | 45120 | 19745 | 1025 | 42975 | 133420 |

由此表上看来，这个合作社包括了不同阶层、职业的社员。正因如此，参加合作社的动机与目的各有不同，今后对此合作社的领导与掌握上应高度警惕与注意。

（二）组织形式：有合作社委员会、代表委员会、社员大会、小组会，分别说明如下：

合作社委员会。是由合作社全体委员组成。其职权：执行社员大会及代表会之决议事项，执行上级社、抗联、工商局之指示；向社员大会或代表会报告营业状况及各种帐目财产；决定合作社内各种工作与制度。

社员大会。为合作社最高权力机关，由全体社员组成。各社员股金多少，一个社员只有一个表决权。其职权：选举或罢免合作社委员，审查与通过合作社计划，决定添设或停止重要业务，审查与通过利润之分配。

社员代表委员会：将社员划分若干小组，每组选一代表，组成社员代表会，代行社员大会之职权。

小组会：为便于教育社员及领导推行工作，将全体社员划成

32个小组，代表委员即为小组长。划分的原则，根据原有生产组织划分，如互助组、纺织合作社、运输队，即为社员小组，不另行划分。每组人数5人至9人不等。未有参加生产组织的社员要根据各救社的组织来划分。不满15岁的社员不划分小组。

（三）两个典型互助组的介绍

妇女纺织互助组（组长白兰菊），5人5户都是贫农，1老年、1壮年、3青年，生产工具有5个纺花车子与2个织布机，足足够用。换工的办法是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织布12尺算一个工；纺线分甲乙丙三等：甲等纺线4两算一个工，乙等纺线5两算一个工，丙等纺线6两算一个工；梶纬1斤及打够供一天织的屡付算一个工，拐斤半线算一个工（如用打车打2斤算一个工），浆布两个（洗、浆、落、经、点、□缯、絖）用两人每人算两个工。每个布共用12个工，也就互助起来，每人12天合布一个。否则个体纺织，一般较好的技术15天才能出一个布，显然的，互助起来每个布都可快3天。互助的好处能节省机头，两个布接在一块织，比一个一个的织节省，5个可节省一大尺。同时，可省7天半的时间，多织3尺半好布，省2两浆面（可做一个布料），并能发挥各个人的特长。它的纪律是谁耽误工谁补工，故意误工的进行批评与斗争，并罚工。

农商业互助组（组长白金城）。这是个运输兼社营小组，是自愿结合的，接受领导最好，成绩也较大。共有6个人，5家中有5人是贫农，1人是中农，都是壮年，有两个牲口。计工办法是每人算一个工，一个牲口算一个半工，共有9个工。实行工资制。做本组里的活管饭，并每个工3斤谷子。给外边扎工，每个工管饭带4斤谷子。在农业与商业上所获利润都搁在组内，以后按工的多少来分。无论做谁的活都计工，但本人做自己的活不计工。此组因多为贫农土地少，参加了互助，家里的土地仍有力量照管，所以他们觉着实行工资制方便。因而在农业上的互助较

少，商业互助多。他们虽无纪律，但没一个滑头的，任何时候都努力干，如因事不能参加误工一天，不管每个工该分钱多少，都扣粗粮3斤。

## 领导与活动情形

（一）怎样领导的？现在社内共有9个职员，5个委员，4个干事。委员是民选的，干事是在代表会上决议聘请的。领导的方式是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办法。有时有事情在委员会上决议，然后在代表会上通过；有时有了问题委员会上不作决议，先在代表会上提出讨论，然后各代表再在小组会上提出讨论，最后由社员大会通过。在领导上最重要的一点，是采取了掌握重点与培养核心——模范与典型人物，通过模范人物实现领导，也就是使用一般领导与个别领导相结合的方式。这种领导方式收效很大，如在运输队中培养了队长白金岐，通过他掌握运输队的工作，运输队进步很快，责任心逐渐提高。后来，负责人不跟着也不出错，米没掉过秤、掺过土，粮食不好不嫌麻烦的过风车，不计较待遇高低，后来白金岐被选为运输队的勤俭模范。纺织合作社内培养了白兰菊，由于兰菊的核心领导，纺织合作社进步很快。他们织的布在全区生产展览会上荣得甲等奖，兰菊被选为全区乙等勤俭模范。由培养勤俭与向勤俭学习的教育下，全村生产情绪提高了。此种新的领导方法，是由于全体社干的努力，与上级帮助指导的结果，才树立起来的，实值今后继续发扬。

（二）经营的方式。合作社内包括不同阶层、职业、年龄的男女社员，各有各的不同要求。合作社怎样经营才能适合这不同的要求呢？很长时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此社在实际的经营中感到，采用社营、组营、个体营三者混合的经营方式较好。

社营：社内干部经营较大的业务，是经营不了的。此社在消

费上，给商店代买代卖上，多是采取的社营。此方式社里获利大，入股多的沾光，可刺激富者入股多。

组营：小组经营社里的业务。此方式既可解决贫苦社员的生产困难，又能锻炼他们的经营能力，减轻社干的负担。此方式有两种：一是合作社内的货物低于市价卖给小组，小组出售后再还钱给社。赚了钱是小组的，社里不抽红利。因价格下跌赔了钱社里负担，保证小组的利润。一是贷款给小组，小组自己进行买卖，赚了钱社里按5%至20%的抽。赔了钱社里也同样的负担。此方式小组里获利大，社里获利小，是比较好的方式。

个体营：对无劳动力社员的一个照顾办法。社里的货物由他们代卖，或者贷款给他们作经营资本，不抽红利，这样支持了五六人。

总之，这三种营业方式虽要混合采用，方能适应不同的要求，但贫苦群众最多，且他们又是生产上最积极的分子，为支持他们应多采用组营方式。在这点上该社做的成绩很大。

（三）团结了商人，进行了价格斗争。消费股刚移到××集上时，因货物售价便宜，大小商人都捂着头皮害怕。对此情形社里马上作了研究，确定坚决执行反日反封建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营业方针。在这一正确的方针下，打击了投机取巧的奸商，支持与团结了小商人。现在小商人，特别是勤行的，都觉着合作社给他们方便，大多数入了社。过去集市上由于投机商人的操纵，致使价格暴涨暴跌，在此种情形下小商人与农民牺牲很大。但从这个社出现之后，这种现象逐渐减少了。在供不应求的价格暴涨时，社内便以较大的差额来卖货，规定一定的数目，谁也不能多卖。如价格暴跌时（常是商人制造的），社内便抬高价格或以公道价来买。如前些时商人联合起来对旧棉压价，合作社便每集喊出价格来，保证不落价，他们不买，合作社里买，结果商人都失败了。旧棉的价由每斤20元涨得55元，给小商人争取了不少利益。

（四）给贫农、抗属储蓄了一部资财，使他们经济上升。

互助组集资入股。参加互助组的绝大多数是贫农，这部分群众被生活所迫，遭受着封建势力的统治剥削，他们在粮价暴落暴涨中牺牲很大。而且又是多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生活，所以，工资陡上陡下上升很难。合作社深感贫苦群众有积蓄的必要，便教育互助组从自己的红利中抽出一小部分，入到合作社内储蓄。起初社员很难接受，认为这是负担。但后来因在生活上逐渐富裕起来，就有了储蓄的要求。计以组为单位积极入社的有：妇女纺织合作社6大斗麦子；第一互助组4大斗麦子与3500元；第三互助组1500元。赤贫的那一组毕竟未积蓄起来，这说明了不能饿着肚子储蓄，贫苦群众的中心问题是土地。

抗属粮入股。抗属领取优抗粮时，因找不到机关及时领取，致有时挨饿，影响干部及战士的情绪，又增加主管机关事务人员的负担。联社为解决抗属这一困难，特制出如下规定，此社首先执行了：整入零支，抗属一次领半年的粮食，一次入到合作社里，再以月为单位的按制度支出；入啥支啥，保证抗属一定数量的粮食，以防受物价涨落的影响；红利计算，粮食一次变价入股，以后不管粮价的涨落，每支一月的粮食，即退出一月的粮变价入股的股数；计算红利以月为单位，以每月股数为标准，每月股数所得之红相加之和为总的红利，在不分红之前该股在该月应得之红，不得计算成股；家住敌占区的流亡抗属方够资格。

此法之施行不仅与[于]抗属有利，也能壮大合作社的资本，但须很好掌握，没有基础的合作社不可执行。现在，这样入股的抗属已有8家了。

（五）此社的业务是在今年3月间才开始活跃的，在资本上有商店的帮助。但因干部力量有限，以及给商店代买、运、卖……力量上受到牵制，未得到有力量的发展。以今春2月起至8月底止，社营与组营共获利553350元，今春每斤谷子18元，可买谷子30748斤。如果一个人春季吃粗粮须60斤的话，便可支持512人的

生活。该村共252人，由此可见储蓄的情形了。

## 帐目与红利分配

合作社的帐目是很重要的问题，如帐目不清会影响股金与营业的开展。此社过去曾因会计问题作很大的难，现在是克服了。它的帐共有3本：

（一）分户底帐，内分几个科目：股金、公益股、各种损失、营业用具、经常费、往来款、消费股等，分节来记，如不够可随时增加。

（二）日记流水，凡关于出入的都要走这个帐，挨着记，每日再向底帐上过一次。

（三）现金出纳帐，凡现金都记此帐，现金因每月都有入的，另有社员与股金帐。消费股的共有两本帐：一本是售货登记，一本是购货登记。一般的说，有这几种帐就能将就行事了。今年6月29日举行的第二次分红，完全是根据社员的意见，民主讨论后才分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社员共423人，股金共131420元，股红共200494元，股红按7期(一月为一期)分，每股每期得红数为：第一期10.4元，二期8.6元，三期8.45元，四期6.85元，五期5.45元，六期4.45元，七期2.7元。办公费与损失费除外，在净红中各种抽红的比例数是：公益金与奖金(共16707元)共5%，基金(33413元)10%，职干报酬（83536元）25%，股红60%。各种不同科目的分法如下：

股红的分法是根据入股的早晚及入股的多少。合作社在分红之后每过一个月算一期，这样依次类推，每期所得之红及每期所入之股，分别记清楚，谁在哪一期入的股，分红就从哪期起；如在第三期入的股，不能分第一、二期内得的红；从入股那期起到结帐期止，每期应分之红相加之和——总的红额。这样分红的方法不致使早入股的吃亏，晚入股的沾光，可以随时吸收股金。

公益金与奖励金，对于扩大影响教育社员，与鼓励社员情绪、扩大股金上起很大作用。该社与［于］此次分红时，根据社员、社干的具体情形，作了民主的评议，分别奖励了对村社有贡献的人士，影响很好。

## 小　　结

（一）合作社发展的规律：资本由小到大，经营与分工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情的结合、群众的不信任，到民主政治的团结，能获利润，群众依靠；由富有者们的幻想，合作社逐渐走上正规，粉碎了他们的幻想。

（二）成绩收获：响应了上级的生产号召，组织4个男劳动互助组，8个女纺织互助组，并在互助中培养了两个勤俭模范；全村群众在互助组的领导与影响下提高了生产情绪，掀起向勤俭模范学习的空气，大家都认为生产是光荣的，过去的懒汉（如白秀岐）现在也积极生产了，接受上级的领导，壮大了合作社，在实际经营中获得了红利，解决了部分群众的生活与生产上的困难；调整了阶级关系，稳定了社会秩序。在今春生产运动中各村贫苦群众要求解决生产上的困难，群起向富者借资本，贫富间斗争很尖锐，并有的贫苦群众采取了非法手段，偷盗事件很严重，而此村看不到这种现象。特别是秋收时，没有一家被盗的，与往年相比，迥然不同。供给了小商人，今年很多小商人没有本钱，做生意常陷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局面，合作社就将货赊给他，待卖完后还钱，一宗压着一宗走，给了他们许多方便与帮助。因而过去不做买卖的，现在也做起买卖来了。

（三）缺点与偏向：1、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存在着浓厚的商人习气，法令观念、群众观念不强。“合作社的业务是为政治服务的，应是执行法令的模范”，对这点的认识是很不够的。

表现在某某屡次使用假钞，虽经不断的批评教育，仍无效。如卖茶叶（这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嗜好品），不仅卖，还走私漏税。这充分说明了无群众、无法令观念。2、发扬民主不够，制度观点不强。社内的业务问题多是干部自觉的，致有些地方犯主观的毛病，和大家的要求结合不起来。表现在今春妇女迫切要求纺织，而合作社很长时间未贷下去棉花，偏搞其他的事情。对制度的执行上就更差了，社干常吸烟揭火纸不记帐，会议也不及时开。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3、缺乏政治教育，接受领导不够。表现社干与社员不但不能在各种组织与各种活动中起模范作用，相反的，有时甚至起坏作用，如打蚂蚱时，借口合作社工作忙不愿去。又如各救组织现在都开不起会来。总之，合作社与政治任务脱节的现象很严重，值得今后高度的警惕。4、单纯的商业盈利，忽视农业生产，表现在社干不研究农业生产，个别小组也不愿从事生产，如今夏停止运输转向扎工，小组很难接受。

（四）几点体验：1、分一次红，合作社就壮大一次。两次分红的经验证明了这点。红不但分不出，还要扩大，第一次分红时由340股扩大到2400股，第二次分红时由26784股扩大到71977股。2、定型的合作社，社干可执行津贴带分红办法。现在合作社都是用的分红办法，此种办法容易发生两种偏向：不能保证社干一定数的利益，会影响干部情绪高低不稳；容易养成干部发财观点，因社营获利多分红大，业务不愿往小组里压。如执行津贴制，便可克服以上两点偏向。为鼓励社干工作情绪计，可执行津贴分红制。3、合作社是巩固互助组进行反封建经济斗争的靠山，没有合作社，互助组是很难巩固的。因在农村贫苦群众劳力过剩，富者劳力不足，贫苦群众无有合作社的支持，为生活所迫必向富者出卖劳力，富者则得以剥削。如有合作社支持贫苦群众剩余劳动力的活动，不向富者出卖劳动力可以，但富者不雇劳力不行，此时贫苦群众即可提高工资，进行反封建剥削的斗争。

# 冀鲁豫边区农村合作社组织简章*

（一九四五年四月）

**第一条** 农村合作社之设立，以每行政村组织一社为原则，村社如系综合性质，村社下可组织规模较小的专营性质的合作社，在群众自愿的情况下，几个村也可组织联合社。

**第二条** 农村合作社设于某村者，即称某村农村合作社，如经营一种业务的专营社，可根据业务性质定名。

**第三条** 农村合作社的宗旨为：

（一）组织社员经济上的互助与联合活动。

（二）扶植社员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以及其他经济活动，以改善社员生活，使其逐渐走向丰衣足食。

（三）加强对敌经济斗争。

**第四条** 合作社兼营下列各种业务：

（一）生产业务：发展农业与各种手工业生产，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提高劳动效率，改良技术，增加生产。

（二）运销业务：办理各社员生产品与公粮公物等之委托运销或收买运销。

（三）供给业务：办理各社员生活上、生产上必需品之采购供给，如原料、工具、肥料、食料，以及一切日常零售用品等。

（四）信用业务：经营各社员之存款贷款，鼓励农村储蓄，办理政府扶植群众生产之各种贷款。

---

* 本文原载《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624—628页。

以上各种业务，为了使社员进一步组织起来，应以社员小组经营为主。由于一般社员之保守、贫困和缺乏集体习惯，可进行个体经营。为推动、扶植、倡导社员小组与个体经营，必需进行村社经营，并使三者密切结合起来。

**第五条** 合作社须有15人以上之社员始得成立。凡居住该村之男、女、老、幼赞成合作社宗旨者，均得为社员（15岁以下者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社员对社内债务，不负任何责任。

**第六条** 合作社股金暂定为抗钞50元一股（可根据各地各村具体情况增加或减少）。每社员至少担任一股，多至无限，货币与实物皆可入股。

**第七条** 合作社之最高权力机关为社员大会，由全体社员组织之。各社员不论股份多少，一社员只有一表决权。如社员人数过多，应以5人至9人组织社员小组，选举代表一人，组织社员代表会，代行社员大会之职权。社员代表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

**第八条** 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之职权：

（一）选举并罢免合作社委员；

（二）审查与通过合作社工作计划；

（三）决定添设或停止重要业务；

（四）审查帐目财产与业务报告；

（五）审查与通过利润分配；

（六）决定社内各种规章；

（七）社员之出社入社。

以上（四）（五）两项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选举3人至5人，组织临时审查委员会进行预审，提交社员大会或代表会审查通过。

**第九条** 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每3个月开会一次。有社员代表会者，社员大会可延长为6个月开会一次。社员大会经社

员1/3以上之请求，或社员代表会与合作社委员会之决议，得召开临时会议。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没有过半数之社员或代表，不得开会。议案之决议，少数服从多数，人数相同时取决于主席。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之召开，由合作社委员会负责，开会时由主任任主席。

**第十条** 各社员小组得随时罢免其代表；但当选为合作社委员者，须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罢免之。

**第十一条** 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选举合作社委员3人至9人，组织合作社委员会。如村社下有专营性质的合作社，为了加强村社与专营社的密切结合，部分委员可由专营合作社单独选出，如纺织合作社选举纺织委员，互助大队或互助社选举互助委员，运输队选举运输委员等。

**第十二条** 合作社委员之职权如下：

（一）执行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之决议；

（二）执行上级社之指示；

（三）决定各小组或各社员各项贷款之分配。但数目过大，应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通过；

（四）向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报告营业状况及各种帐目财产；

（五）决定合作社内各种工作制度；

（六）指导社员各种营业活动。

**第十三条** 合作社设主任、社务、营业、会计各1人，必要时设副职，由合作社委员直接兼任。并斟酌情况各设干事若干人，由合作社委员会聘请。各职员分工如下：

（一）主任：对外代表合作社，对内召开合作社委员会，开会时任主席，并领导全体社员执行决议与进行日常工作。

（二）社务：办理社员之出社入社、社员登记、吸收股金、社员教育与指导社内各种工作制度、事务等工作。

（三）营业：领导生产、运输、供给、信用各种业务及物资存放。

（四）会计：管理社内各种帐目、财产及指导社员小组或个人之帐目。

上述主任、社务、营业、会计是合作社委员一般的分工。各村可根据业务生产情况，增设其他职务，如保管、消费、纺织、运输、互助等委员。

**第十四条** 合作社职员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如因业务之需要，职员可全部或一部分脱离生产。对职务过于繁重之职员，除提奖外，得给一定之薪俸。

职员之提奖，不可平均分配，得按能力大小，责任轻重，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民主决定。

**第十五条** 合作社委员会，每半月召开一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

**第十六条** 合作社成立后，凡合于第五条之规定者，经社员一人介绍，可向合作社委员会请求入社，经合作社委员会审查合格，得准其入社；如开除社员，由合作社委员会决议，并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通过。

**第十七条** 社员有遵守社章与规定之义务，但社员或小组仍有出卖产品及购买货物之自由，合作社无强迫干涉之权。

**第十八条** 合作社经营，对社员或小组应起扶植和调剂作用。在供给原料与日用品上，一般应比市价低。吸收成品一般应和市价同（但在合作社不赔钱的原则下，则应斟酌情形定价，总之叫社员不吃亏）。

**第十九条** 社员小组向合作社买或贷之货资，不得转让他人。贷物资时，以社员资格或组织保证即可。

**第二十条** 合作社之帐目，每3个月总结一次，并向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报告。

**第二十一条** 合作社之利润，每半年分配一次。如因营业范围较大，为了扩大股金，可斟酌缩短时间。其红利分配，除10%或30%作为职员提奖外，其余均为股息（即按股分红）。如在社员自愿的原则下，可扣一部分公益金与公积金，数目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临时决定。如合作社与社员或社员小组合股经营时，可根据业务性质、所需劳力多少、用资本之多少、经营时间之长短，双方协同规定分红办法。应多照顾劳动者的利益，但也不要与旧式合伙经营的分红规定距离太远。对一般贫农与赤贫者，可多采取贷款方式。

**第二十二条** 各社员得随时请求出社，但他向合作社所贷之款项及其他物品，应即偿还；所负之责任，截算至帐期终了为止；其应得利益除股金外均不得享受。

**第二十三条** 社员不履行义务，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决议开除，其权利义务之处置准用前条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经边区合作社筹备委员会公布施行，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之。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公布后，前边区合作社筹备处颁布之《冀鲁豫边区农村合作社章程草案》作废。

#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
# 关于加紧生产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

中央局讨论了中央关于1946年解放区工作方针指示后，认为我们在思想上对生产工作重视不够，几次会议多半着重于财政收支的讨论，重财政轻经济，总是在透支上，在增加人民负担上，或在量出为入上想办法，如何进行生产发展经济则没谈到过。反攻后，机关部队本身不仅没有注意到生产，还大批的支差，浪费民力，妨碍发动群众和群众冬季生产。解放区是疮痍满目，人民均呈疲劳现象。而我在1946年财政支出预算反极庞大，人民负担较之抗战期间任何一年更为加重。因此，中央局认为，这种局面是绝对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中央指示，反攻后加重了人民的财政负担，是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紧张工作加重了的，这只能说是过渡时期的办法，不能年年如此经常如此。中央又指出1946年中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轨道上去，民负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各地脱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以内。兵贵精不贵多。中央虽未明白指出精兵简政，但我们应有此思想准备。中央又指出减租与生产将最后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把生产的重要性提到最高度。这些原则是正确的，今天提出是完全必要的。

人民负担能力究有多大？何谓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根据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上）第31—34页。

太行区去年国民经济调查研究，赞皇等12个县13个村，1944年平均收入3石7斗2升半小米，该年是丰收十成年景(为30年来所未有)，是年太行区每百人养活3个人，人民负担占总收入的10.5%。1945年太行区七成年景（这是平均年成），每百人养活两个半人，人民负担占其总收入的11.5%，透支4万万元（结果当然也会转到人民身上）。人民对负担感到很重，部队生活很苦；人民养活不了两个半脱离生产的人员，部队在当时那种生活待遇上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大家均叫苦连天。事实证明，农村经济条件，养活不了3%的脱离生产人员。而太岳则追求此3%而吃了大亏（因人民贫困，财经工作更差）。冀鲁豫的经验也曾证明养活不了3%的脱离生产人员。其原因是农村经济条件，加之农村破产，财力枯竭。1946年为照顾部队、机关生活待遇，全区的机关部队的生活，提高到一般的水平（所谓一般，比过去好了，实际大大提高，一个党政军民公家人的生活标准，平均顶8.1的群众生活标准），规定除野战部队外，其他部队在集中作战条件下仍有菜金。生产任务每人每年在2000元以上（在太行合米约2石多）。照目前的编制和预算看，每百人养活脱离生产人员1.94人（即不到2个人），而人民的负担则较之抗战时期任何一年均大大加重了，占其总收入的19%，即小米5斗3升（除去间接税的话，则为15%）。根据太行赞皇等11个县12个村的调查，1944年每人平均消耗小米2石7斗零6，平均再生产投资量小米3斗零4，而七成年景的收入是小米2石6斗零7（这也说明抗战以来耕牛、农具损失，壮丁缺乏，生产大大减低），这样人民总收入除消耗外，连再生产投资也不够，何能负担？必须了解过去负担重，人民能勉强缴纳者，一则是抗战初期还有些积蓄，一是为了抗日战争。在抗战胜利后，人民是不愿负此重担的。最近在长治和武安（即白晋、平汉沿线），新收复区人民就反映对八路军的负担比敌伪还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万不可忽视。以上全部说明了老

百姓决不可能养活到2%的脱离生产人员。过去所订3%的原则，从过去数年经验及目前的现实均证明必须推翻。依据我们的研究、统计，如果群众大生产发动起来，则勉强可负担其总收入的10%到11%，即每百人可养活1.2人（不可能养活1.3人），加上机关部队实行毛主席所指示的第二个生产自给的标准，则至多也只能养活1.5%（即一个半人）。

根据中央去年11月7日指示，全区须进行广大的生产运动。1946年是进入和平发展的第一个年头，各级党政军均须有计划地指导帮助人民生产和加强机关部队的生产。今后应努力做出成绩，达到减轻民负、改善生活的目的。生产以农业为主，手工业、运输业为辅。提出深耕细作，耕三余一，发展生产，尽量发展互助组织，改造"二流子"，挨门挨户帮助群众订定生产计划。今年发放之农贷工贷，保证不准挪用，要完全用于生产。各地应坚决执行支差条件（已有联合布告发下），不违农时(此点极重要)，减少误工，调节民力。部队机关均须首长亲自动手参加生产（过去规定野战部队无生产任务，现亦应准备动手生产，以后要规定任务的），才能改善生活，减轻民负。部队机关生产目标，今年要实现毛主席在1945年所指示的第二个标准即自给50%。

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虽已开始，但还可能有很多波折，还有许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八年抗战，民穷财尽，耕牛农具被拉走，壮丁缺乏，恢复生产很困难。群众疲劳，情绪很大。民负必须减轻，必须不超过人民负担能力。而我又百事待举（新的建设开支，荣退军人、抗属、子弟、孤寡等的安置等），财政空前困难。如果不爱惜民力，节省物力，加紧进行生产，困难则将不可克服。

全党全军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参加生产，克服困难。部分干部只想到要求提高生活待遇，以为抗战胜利了生活即应提高，对人民负担不加过问，而滥用民力、支差支夫达到骇人听闻的程

度。反攻以来，仅武安一县，支差达320万工（主要不是用于平汉战役）。对生产则不亲自动手。有的甚至说，农业生产赔本，不如不生产，部队生产浪费兵力，不如不生产，公开倡导取消生产。而反攻后我进入中小城市以来，过事铺张请客宴会，糜费之风大张，不可终日。诸如此类不健康现象，必须克服。提倡生产与节约并重，发扬我艰苦作风等优良传统，则我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各级党委接到此指示后，应尽速讨论布置生产工作，并将布置情形摘要电告。

# 齐滨县向庄合作社初步调查*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

李春兰

怎起来的——去年6月倒粮以后，群众想做生意，没有本，又不好向地主借，村干部没有办法，后来连着开了几个会，接着开兑了2050元的本，又从商店贷了1万元，合作社成立起来了，干的是卖花生、推粮食。

群众不满乱反映，干部认错来转变——可是，干部遇事不与群众商量，有的又私自花了个钱，三弄两弄，把钱撒下去了，集中不上来了。群众不满，在街上乱酝酿："钱上哪儿去了？"这时候，亳州（水东区）牲口贱，群众都想贩牲口，对合作社更不满意。干部逼得没法了，开会作检讨，决定向群众认错，追究款子、改选。接着开了群众大会，选出正副经理、会计、总务和业务几个干部。光这群众还不信实，又规定两月一结帐。然后号召入股，共入了1万多元，好过主有的也入了，又贷了两万元，这时候共合有了4万多元的本。

有了本，都愿干生意，谁去干呢？干啥啊？干部一商量，让群众自议自提，共提出50多个人，又评议了一下，减掉了10几个好过点的，剩下30多个人，分了大班，轮着出去做买卖。

怎么分红？商量的是：人八钱一，花费和提奖，各占半分。花费是用的笔墨纸张灯油等杂支，提奖是奖励出力多的。

* 本文原载1946年2月19日《冀鲁豫日报》。

两个月赚了20多万元，分不分呢——两个月跑了20多趟，赚了20多万元。红利分不分呢？干部做难了，不分撵着往前走吧，怕落“反映”，分了吧，本又小了。大伙一研究，意见统一了，不管怎么得分，不分，群众就不相信了。一分下去，群众可欢喜了，就说：“真靠实，说到哪办到哪！”“要是这吧，俺不劈了，入到里头吧！”紧接着号召入股，登时集了1万多元，干部又下到各街群众里去动员，集了3万多元。

开酒店作中心业务，小买卖分组经营——七八月间，牲口买卖不中了，群众酝酿，把酒店作为中心业务，再零敲碎打的干点小买卖。可是，本不够，又遭难了。到群众里一酝酿，又鼓起了劲——“能干！非干不中！再集股！”于是又集了6万多元，共合有了12万元的资本。

有了本，怎做法，怎吃饭，怎分红？村干又下到群众里酝酿，集中起来：分红法，按劳力大小，本大小，比较定：人三分，钱五分五，基金一分，花费半分。在“人三分”当中，还有半分提奖，若是花费的半分提不了，归入基金。老师和小工是开给工资，老师一天200元，小工60元，吃饭是吃自己的红利。不买牲口，用人推麦推高粱，开给工资，7个人一天推1000斤高粱、240斤麦，开给500元。干了半个月，干部没给群众商量，私意成了“门市部”，又乱赊了10几万元，群众嗷嗷叫：“本都赊出去了，怎样赚哪！”乱要抽股，眼看要垮，干部又向群众大会认了错，改选了干部，规定“以后一律不准赊帐”，人们又都不抽股金了。

从这儿，零买卖也都干起来了。几个人一伙，会做啥做啥，啥有利做啥，自由结合，都合适，对脾气，总说一句：是个“合适干”。本，是自己兑，不够了，社里再贷点款。小组若是有走不动的时候，社里支持一下，借些款，过一两个月就能还上。

共成立了7个组，参加的131人，自己对本13万多元，社里贷了7.6万元，买卖有卖酒、烟、杂货，开染坊、贩牲口、推

粮食、开荒、卖盐、磨油、卖馍、明溜酒、推竹竿、卖青菜、纺织、给酒店推磨等等。

酒店扩大，酝酿互助——酒店扩大：现时政府增酒税了，干部和组长商量：干不干？都说干。可是本小干不起，开了个群众会，一下子兑了20多万元，选了30个工人，1个老师，吃各人的分红。分红办法，正在酝酿。又选了20个人踩曲（1月30个火，得使7500斤小麦，合1万斤面），工价是做1斤麦2元。

酝酿互助——向庄共180多户，120多整劳动力，27顷多地。合作社做买卖，占人太多了，地没法种，事摆在那儿——不互助干活不中，群众里酝酿成了个，都很着急，若是互助不成，一开春，买卖就做不成了！现时，正在研究群众互助办法。

看一看，利有多大！瞧一瞧，由穷变富——从农历五月到腊月初九，全社得净利320多万元，光全社的钱股分红，每千元分得1700元。人股分红，向其三组有分到1.5万元的人，酒店里一个人分1.8万元到2万元，小工也净落9000元。

向其三，落了1.5万多元，还有1000多元的股。从前一亩地没有，现时连斗争加合作生产，要了3亩半地，有吃有穿，做了个新棉袄，他喜的见人就说："要不是合作，我一辈子也到不了这样，死也忘不了这顶上的好处。"他一连3次当选生产英雄，受了3次奖，共得奖金1480元和一条毛巾。到处喊着："跟向其三学习！"他心里有多高兴吧！

张实柱，6口人，在先没有一亩地。他自己分了1.5万多元的红，他爹给酒店推粮食赚了8000多元，现时他有4亩多地了。

张克亮，5口人，在先只4亩多地，把鸡都卖了，他自己赚了2万多元，现时要到10多亩地，翻盖了堂屋，又买了头牛，买了口猪。

张连元，50多岁了，跟前俩儿，都参加了抗战。在先1亩地也没有，把坟地也卖了，现时要了3亩4分地，新盖了1间半屋

子，还娶了一个儿媳妇，老两口喜得合不上嘴。

学它啥——生产座谈会上，评议向庄合作社的好坏，有如下几条：

一、步步走群众路线。看得很清楚：向庄合作社凡是顺风的时候，就是领导走了群众路线，两次闹乱子，又恰好是没走群众路线。

二、遇事干部不能自专，要下到群众里去酝酿，问问群众，听听声气，依从群众。干部一时没走群众路线，群众不满，出了乱子，别怨群众，别打掩护，找因由来解宽自己。应该学向庄合作社的样子，干部虚心检讨自己，向群众认错，还实行改选，坚决转变，不这样事情办不好。

一定要群众自愿了再办，领导上别心急，事情无妨从小事做起，先从"自愿"了的群众做起，有几个人算几个人，兑几个款算几个款，不能强组织，硬摊股。引导群众自愿的顶好办法，是拿活样子给他看，要勤结帐，勤分红，赚了钱就分下去，紧接着号召入股，这样做法，容易打通思想，达到自愿，由小引大，大起来的快。

分红办法，没死法，由各组民主商定。买卖不一样，用钱用人的多少不一样，人力大小、技术孬好也不一样，分红的办法也不能一样。一时一个变化，分红办法也不能定住不变，反正是活的，依从群众决定。

三、分组经营，有整有零。小组经营随便，好办事，好领导，能干啥干啥，啥有利干啥——"合适干"。贫农只有小买卖经验，也容易当领导人，各组也好比赛，干的起劲，帐好结，红好分，钱转得也快，本也好兑，民主也好实行。可是也得有个大社，统一领导，调剂款子，联系各组。才一办也不一定非要大社，可是到后来，小组多了，有了成立大社的需要，就该及时成立起来。

四、副业合作要与农业互助合作结合。副业合作办好了，一引就引上和农业互助结合；同样，农业互助办成了，也容易引上和副业合作结合；也只有农业和副业相结合，才能得利多，才能忙闲不误做买卖。

五、干部公正、赤心。就是要有好干部，合作社的干部，应该过一时一改选（连选得连任）。

#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停战命令、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的公布和开始实现，是我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这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我们要力争其全部实现。但国民党反动派必欲其破坏。政协开幕后，法西斯分子在各地所发动的反苏反共反民主运动，及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通过的5条反动决定，就是为了推翻政协决议和挑动内战，以便维持其一党专制。根据目前国际反苏国内反共的情况估计，这一斗争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不经过严重斗争（新的内战危险是存在的），不把反动派的气焰压下去，和平民主的前途是没有保障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这一局面。停战以来，我各级组织多存在侥幸心理，斗志松懈，陷入麻痹状态，应引起严重警惕。群众运动也有一些消沉。为了百年大计，为了击退反动派的阴谋，中央指出关于减租与生产，务必在今年内取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对这两件事注意不足的地方，务必加以注意，务必派得力干部去指导。

从去年峰峰会议到现在5个月期间，我区执行中央11月7日指示所发动的诉苦、清算、减租、增资的群众运动有很大成绩。

根据经验证明，目前新解放区的群众运动，从诉苦复仇清算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上）第58—63页。

反奸开始，是合乎运动的规律的。这个运动的特征是它可以把八年来压榨群众的日军汉奸特务组织，现在正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接收培植之敌伪统治基础打垮（它封闭与打击群众运动，非打垮它，群众不敢动）；它可以动员广大劳苦群众和有民族义愤的人参加，它是统一战线的。但它打击到的对象则是封建地主及其爪牙（实际亦即国民党反动派的基础）。这个斗争带有总结过去（清算罪犯）开辟未来（减租减息）的作用。斗争规模宏大而深入，顺而易举。这个斗争很快就可自然而然地转变到赎地、清债和减租减息运动中去。这个斗争由于汉奸恶霸向群众坦白、赎罪、赔偿损失，群众热情最易激发起来。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有计划地发现并培养雇农贫农积极分子，提高其阶级觉悟和加强对其教育，作为下一阶段（即进入减租减息阶段）斗争的骨干是必要的。有些新解放区的领导同志未找到清算诉苦这一环节（中央和中央局均一再指出过），而仍根据过去经验，先搞雇佃贫独立运动，对中农均暂时搁置，不要他参加这一斗争，规定先培养雇佃贫为骨干，然后进行广泛的反贪污恶霸清算反奸工作，以为这可保证领导权不被坏人或中农富农夺走，结果走不通（群众要求首先清算汉奸战犯）或走的很慢（群众畏惧不敢动）。各地均需很快吸收这一经验，转变方向，从清算诉苦做起。

清算诉苦易于动员群众，但不可拉得过长（汉奸斗完了，恶霸斗完了，如还不转弯，再拖下去一定会斗到基本群众本身上来），应即时转入减租增资斗争。在减租增资运动中，应注意中央所说发动大规模的（不是局限于部分群众、个别地区）群众性的（就是反对束缚群众手足的右和干部代替包办的“左”）减租减息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束手束足，这一问题在我区基本上解决了（个别地区仍有束手束足的）。我们的弱点是：从领导上看，还没有用很大的力量、派更多的干部、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注意这一问题，有些地区部署力量时还有平均使用力量的现象

（什么工作都重要，不能抓紧群众这最重要的一环，放松一些其他次要的工作），而没有果断地坚决地集中力量在群众运动上。须知不能放松一些，就不能抓紧一些。因此使群众工作表现消沉，不活跃。有些地区执行中央突破一点创造典型的指示（这无疑是对的），总是慢腾腾的长期在几个村子里打圈子，规模狭小，借口干部不多（实际上是没有决心调动干部和没有信心提拔新干部）而拒绝去其他村领导斗争。群众已经自动起来斗争了（受到其他村庄斗争的影响，而自动仿照的干，是很自然的），还要下命令给群众说，等着吧，不要干，你们不懂政策或等我有空时去了再干吧，而不善于以斗争推动斗争，村带村的把运动推广到全县全区的规模去（冀鲁豫和豫北一带有此好经验）。有些地区过分地强调调查研究，总是借口情况不了解不敢发动群众，追求所谓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经验证明，初步调查研究之后，即可开始发动斗争，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再调查再研究，才能逐步深入了解情况，逐步深入运动。还有先搞通思想再进行斗争的理论，搞通思想（初步的）再进行斗争有好处，但搞得太长则会把运动推迟。经验证明，领导群运的干部要了解政策，要搞通思想，但思想不是一次就能搞通的，只有在斗争过程里，从政策到群众再到政策的多次反复中才能搞得更通，运动才能更深入。有些地区发展了均产均地的运动，它过分地打击了地主富农（所谓三亩推平，实际上即是从经济上完全消灭地主富农），也重重地打击了中农（中农不分斗争果实，中农亦在推平之列）。这是不合乎党的方针的。形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为反贪污反恶霸（有的地区把这叫做"民主斗争"）无止境、无限制，即无一定政策（下级干部叫做"没有边"），"群众创造一切"，"群众创造政策"，"群众创造法令"，跟着群众自发性跑，而误认为这是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殊不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包括提高集中的领导作用在内，并非跟着群众的尾巴跑。根据各区多

次斗争经验证明，以贫农为骨干的（中农除外的）农民自发运动（没有无产阶级政策领导的）只能产生均产主义，不能产生毛主席及中央历来所指示的，不但发动贫农雇农而且必须团结中农（中农也是基本群众），既能发动群众，也要使地主能生活下去，工商业家有利可图的结果。现在某些地区因"推平"，结果形成地主富农反对我们，中农怀疑我们，贫农雇农只伸手要东西，要斗争分果实，不事生产，以致雇农贫农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在新解放区不是首先进行诉苦复仇清算反奸运动，而是进行雇佃贫独立运动的地方，其危险更大（临漳一县被地主打死农民积极分子和农民领袖将近200人，浚县三区被打死30人），斗争空前尖锐，对我极不利。

上述各种偏向均应适当纠正，但纠正时，应该是用开座谈会、漫谈会或比较典型研究会等方式搞通思想，切不要简单批评，打击干部和群众的热情。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国民党法西斯派到处阴谋破坏政协决议，并不惜采取非法手段，组织暴乱、暗杀，以扰乱、破坏社会秩序。两月来，我区法西斯异常猖獗，农民积极分子被暗杀者屡见不鲜，阴谋暴乱的案件也已发生过。此种现象，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切不要以为和平实现而法西斯就会放下武器，不向我进攻。在群众运动中必须建立人民武装组织，只有政权和武装均为群众掌握时，才能巩固群众运动胜利的果实与奠定民主社会的秩序。

诉苦清算和减租运动中，均必须贯彻阶级教育，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某些区对此做得很好）；而在减租大体完毕的区域，群众运动的中心，则应转到生产方面去，开展大生产运动（关于生产，中央局已有过指示）。

反攻后，我占领一些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人斗争增多了。这对我们是旧课新题。根据各地现有材料，许多地方因经过

斗争，工人生活改善了，这是好的。但因斗争无止境，无一定政策，劳动条件提的过高，资本家无利可图，均不愿再干了，有的逃走了，有的关门了，对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很不利。工会与党的支部的方针，一般不是采取与厂方合作（不论公私合营）发展生产与繁荣经济为目的（如果这样做，好像就是不革命），而是以满足工人暂时的片面的利益为满足，搬运农村反对封建地主的方式来反对城市资本。对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战略任务认识模糊，对中国社会地主、资本家、商人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区别不开，只是笼统进攻（好像这样做才叫革命）。所以现在我占城市和工业区一般皆生产减低，根本谈不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对我极不利。这一现象之所以发展，是由于对我党工运历来未清算（大革命和内战时期的"左"），对过去经验接受带有盲目性，同时把这误认为是群众观点，有跳跃资本主义阶段的民粹派情绪，也带有盲目性。我党在解放区的工业方针，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又要使工商业家有利可图，是和厂方合作（不论公私合营）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共同任务。党的支部与工会，均应遵循这一工业方针。

中央指示应在6个月到10个月内放手发动群众，又指出减租生产务必在今年内取得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在半年到10个月内必须做出成绩。我们在减租发动群众工作上，还做得很不够。为此，中央局特决定进一步推动群众运动的办法如下：

一、大体确定老解放区以生产为主（未发动群众的地方仍以发动群众为主），新解放区以减租为主（群众发动后转入生产为主），相互配合进行，不应因任何工作而放松发动群众的工作。

二、区党委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在内）均须立即轮番到县区去检查半年来的诉苦清算减租增资工作，并帮助总结经验，纠正偏向，布置以后半年的群众工作。各负责同志不能借口其他事

故，贻误这一工作。

三、区党委或地委，均决定开办减租增资运动的短期训练班，抽调大批干部（300人至500人，人数各区自行规定）加以训练，派到农村中去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

四、军队应乘第一期精简前，抽调大批干部到区党委受训，参加减租发动群众工作。在这半年来，军队配合群众运动很不够，应补偿起来。

五、各地日报均应专辟一栏，讨论减租生产经验，用报纸推动减租工作。同时决定各区党委均出版一种刊物，命名为群运通讯，专门交流各地经验，以推动减租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黄河工作给冀鲁豫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

冀鲁豫区党委：

一、根据何幼奇同志报告，黄委会人员刚从菏泽回开封即公然撕毁"菏泽协议"，不管我区人民生命财产，竟自拟定两个月完成堵口工程合龙放水的计划；公然说迁移救济费由善后救济总署负责，脱掉国民政府的责任；下游仅拟加高培堤5公寸并且是匆迫草率从事，其对我之阴毒险狠，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别具意图已极显然。不应看作是偶然的，更不应看作仅仅是美国顾问的影响。实际自国民党计划改道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样打算的，始而并不与我商量即行动工；继而一面进行堵口工程，一面对我应付；现在连应付也表示不耐烦了。必须充分认识这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破坏解放区阴谋之一部分，与军事进攻相表里，特别在今天大内战危机严重时，其作用更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只有从这里认识问题，宣传动员群众，采取有效办法，才不致坠入诡计，自缚手足，贻误时机，终致对不起数百万人民。

二、黄委会及其工程组织有国民党官僚，有中外专家，其立场虽或有不同，而只为国民党指挥下的工具，没有自己决定权，则无疑问。其中虽不无较公正分子，可以争取同情我们，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对谈判所起作用应有正确认识。依靠谈判，信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上）第81—83页。

赖诺言而忽视寻找切实有效足以使之不得不就范的办法，麻痹自己并麻痹群众，是会吃大亏的。当前已有教训。

三、急须采取的实际有效办法是在我区上游截河筑坝。是否考城、东明之间可以这样作？惟如此才能迫使国民党有所畏忌而不敢蛮干，使它不能不多接受我们的要求，谈判才有力量。没有这样实际办法而空谈停止堵口坚持浚河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因为堵口工程它可以自由进行，我们没有办法停止它。要立即坚决这样做，当然也有许多困难，基本要靠人民力量，自力更生。只要群众思想动员作得好，切身利害会使各阶层团结一致，贡献人力物力克服困难。必要时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动员募集□材力量，政府给以可能的经济帮助。为了防止河那边人民与我对立，务要抓紧宣传我们的治河方针〔对〕大家有利，争取群众与我们一道反对国民党陷害人民的计划。与水东区及华中区都须取得联系共同动员，为一个治河目标奋斗。这是实际对人民负责的基本办法，也是有利于谈判的后盾。具体实施请仔细研究。

四、派5人去开封谈判可以，坚持下述方针，不怕破裂，如对方蛮横武断可以退席回来（当然要看问题的轻重）。

（1）坚持以前所告下游治河方针，工程完竣时才能合龙放水。

（2）要求立即停止堵口工程，集中力量于下游治河，俟下游工程将届完竣时再继续堵口工作。目前继续工作对我危险严重。

（3）趁薛笃弼来汴与会，力争参加黄河水利委员会，理由是上下游利害相关，鉴于此次违反协议，必须实施监督。

（4）明确提出迁移救济费应由国民政府负全责。昔之决口与今之改道都〔是〕由政府作的，人民意外损失理应国民政府负责。至联总协助应须政府提出。迁移救济费要确定数额（要具体准备）。

五、你们所拟宣传呼吁计划都应该作。公开谈判经过，揭露违约阴谋，一切说话站在几百万人民利害立场上，团结各阶层一致斗争。你们对谈判问题还只在小范围的少数人中讨论对策，这不好；要不仅在党内、政府内，还要在广大群众中讨论，不应是秘密的问题。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教育和动员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方针，造成激烈的情绪。大规模去开封请愿须考虑，避免群众无益流血反会打击群众情绪发生恐怖，并且其意义不过宣传暴露，这当然也必要，但必须真正作起足以防水淹的办法，配合以宣传暴露才能成为足以威胁敌人的武器。可以派些各阶层代表去开封，提出要求并从他们口中说出不得已则起而自卫。慎选代表，警惕被麻痹。

六、边府发通电，给国民政府、全国水利委员会及联总去电，并电延安向重庆力争，造成全国舆论。你们可以发动与外面有各种关系的人士写信呼吁。但须明确认识，基本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广大群众力量，有实际足以打破突然放水淹我的办法。其他均必要，应尽可能作，但其作用不过是配合。

希望你们迅速讨论与布置并望随时电告。

今后由边府对行署的指示，应在党内外讨论执行，中央局不另发指示。

# 全力进行复堤工程*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

自治河谈判获致南京协议，我赵、王两代表于25日返回菏泽，在他们回来的第二天，边区复堤工程马上动工了，全区动员了11.3万余工人，分3段动工，修补堤岸的残缺工程，仅东阿、齐河段在5天之内完成39万多方土。在4日召开的修防处、段长的联席会议上，确定了自本月10日起，沿河18个县份，动员21万人，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复堤工程。这就是说，边区人民已经用了自己的全副精力，忠实地执行了南京协议。但是国民党方面，对协议上明确规定："工程所需之器材工粮，优先尽速供给筹拨"，截至目前为止，只运到汽车4辆、仪器2套、面粉100吨而已。如此渺小的数字是绝对不能适应正在进行中的浩大工程的需要(已动工的21万人，仅工粮一项每天即需面粉270吨)，这使解放区人民对国民党方面执行南京协议的程度，不得不表示怀疑与焦虑。我们要求国民政府、联总、行总将工程所需之器材、工粮及时迅速运来，技术测量人员亦立即派来，否则会使工程无法进行，复堤计划势将遭受破坏。

首先我全区人民应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是处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来执行南京协议。虽然我们要加倍努力的进行复堤工程——这是全区人民自己的事情，是为了自救，为了使自己减少以至免除黄水之灾，但是8年来的敌灾、天灾，民穷财尽，使我们处在异常困难的苦境，必须要有大量的物资支援。南京协议已经答复

* 本文系社论，原载1946年6月12日《冀鲁豫日报》。

了我们公正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力请国民政府、联总、行总保证物资供给。

第二、我们干部要和群众一样，积极参加河工筑堤，全心全意为全区人民服务，对沿河700万人民生命财产负责。对施工工程，要作出精密周详的计划，珍惜人力物力，节工节料，节省时间，不要浪费一个人工、一件材料、一分时间。要按标准来做工，保证一定时间完成计划。

第三、要提高警惕，严防特务破坏。经验证明：只要解放区进行任何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情，特务分子必然会千方百计从各方面来进行破坏。我们必须预先警惕，在群众思想上首先有所准备，公安部门要结合河工，保卫工程的顺利进行。要建立必要的卫生设备，集中各地中西医生，设立治疗所，置备药品，适应群众的需要。

第四、大批壮丁上河工修堤，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必然影响生产。为了使生产少受以至不受影响，必须组织互助组织，留在家的青壮年配合半劳动力组织大互助，如濮县、内黄、卫河、寿张等县的互助组织，要大大发扬推广。这种互助方法一面使生产少受以至不受损失，同时使出外作河工的人无后顾之忧，安心工作。

第五、在河堤集中了几十万人，正是宣传教育的最好时机。要开展必要的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工作，要有专人负责。文教部门必须配备力量掌握领导这一工作，并动员乡间群众艺人大力推动文娱工作。

第六、河工的繁重、人力的浩大，更加重领导的责任。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必须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同时必须大力培养修堤的积极分子，发动组与组、村与村、县与县之间群众性的筑堤竞赛，表扬模范，创造出大批的筑堤英雄。昆吾七区的组织竞赛的方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第七、领导干部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应该请对河工有经验的人来作指导，要大量吸收群众中有治河经验的人参加领导，要尊重他们的意见，集思广益，发扬民主作风，来改进与丰富我们的领导，要克服狭隘关门的宗派作风。

# 救救23万修堤工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

我冀鲁豫边区自修防处、段长联席会议后，从6月10日以来，长达44.117万公尺之黄河复堤，已动员23万工人动工修堤。各地群众放弃了农忙期的生产，将自己大部甚至全部劳动力都上了河工，如郓北赤楼全村21个壮丁都上工了。在漫长的河堤上可以看到工人们光头赤背，冒烈日，气喘吁吁不停地在做工，这显示了我边区人民已怎样在用全副精力执行南京协议。

但我们的工程正面对着严重的困难，由于国民政府的物资供给没有保证，已大大的影响工程的进行。因工粮工款至今没有拨来，工人自带粮柴，致有些地区（如寿张）群众忙于置办粮柴，尚未上工。而修堤工具更普遍感到缺乏，如濮县的辛庄□一村统计，在过去伪孙良诚盘踞时损失铁锨50余张。□曾受8年敌伪摧残之寿张县，目前每日必需修堤工具□□5万具、小车3万辆，最高只能解决1/3，其他2/3必须救济援助。动工10天以来，由于工粮工款没有发下，工人饮食恶劣；加以工具缺乏，工作繁重，工人体力劳动过度；再由于工人没有帐棚休息，日曝夜露，致工人们疾病累累。据第二修防处濮县段16日统计，1.1万余工人中，病倒了百余人，南华段同日工人病死1名。虽然全线设有11处卫生所，但我解放区药品及医务人材的缺乏与困难，绝对不能适应目前急切的需要。

我们虽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陈述困难，商谈物资供给等问题，但对方却一味拖延应付，一直到今天只运来面粉300吨，其

* 本文系短论，原载1946年6月18日《冀鲁豫日报》。

他工款器材及药品，迄无运来消息。□国民党方面的花园口堵口工程，却不顾下游解放区复堤工程进行如何，正在积极赶筑桩坝，准备抛石挖引河，目前河口只堵剩下百公尺。这显然与南京协议的规定不符，也就不得不引起我全区人民的严重注意。

我们不得不向国民政府、联总、行总呼吁，向全国同胞呼吁。要求国民政府执行南京协议，保证物资供给，立即拨发工粮工款及器材。要求联总、行总救济患病工人的大批急需救济药品与医生，否则现在已开工的工程无法进行。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予我区23万复堤工人以正义的援助。

# 沿河二［六］县修堤工人中涌现大批英雄模范*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沿河18县23万群众，在粮款、器材、医药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修堤，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不少修堤英雄模范人物。兹摘要介绍如下：

**鄄城**

鄄城修堤自救运动中，出现了不少的模范。六区34个人获奖，4个小队得奖旗，7盘碳挂红。这些模范都是工人们自己选举出来的。赵庄、杨屯、张显庄、旧城集等4个小队得了奖旗。他们都提前5天完了工。别村都说他们干的硬，就像赵庄在这5天内，是一个劲的装满车子推土，并增加了2个夜工，起了3个五更，结果每人每天合3方土，比一般的工人多1方至1方半土。杨屯、张显庄的工人，每天拂晓就起来，干两三歇子活天还不明。这5个庄没有发生过矛盾。别的小队都说：“人家修的真强，咱也得和他比。”3个模范村干部和31个模范工人，各得奖毛巾1条。旧城集的邢二和阎庄张福贵，一推土就喊着：“装得大大的，推一下是一下的。”每逢该休息时，人家都离了坑子，他二人还得再推上两三车子土才休息。休息完了，未干活前，他二人先下手推两三车子土，还没有和别人吵过嘴。赵庄的推土英雄赵锡德，

* 本文原载1946年6月29日《冀鲁豫日报》。

曾累病了3次，别人劝他少推点土，他总是不听，他的病稍微好了后，马上又接着干。吴集张殿英带领的一盘硪，休息时间很少，也不唱歌，老是硬打。有时其他推土工人休息了，没有人平坑，他们就自已拿起锹来平，平好后再打。车庄朱敦记和大李庄吴梦须领导的两盘硪挂红后，其余的5盘硪就竞赛起来了，看谁打的硬，都喊着非挂红不可，结果，8盘硪中7盘挂了红。其中朱敦记的一盘硪打得最好，工人们评论说："该挂双红！"结果就挂了双红。五区二分队也选举了13个模范，每人各奖毛巾1条。王家平今年61岁，本来不该出差，但他对工作很热心，麦前他曾带着他村工人来修堤，并早完工回家。这次他被选为监工委员。

**南华**

南华临河区牛庄，经过3天的突击，已于今日（19日）报工，全村每人超过任务7方土，得了第一名。白虎集的肖廷龙拒绝别人换他的班，一连推了5天土。他推的土特别多，每车均在500斤左右，因此，他获得中队部的两次奖赏，人人称赞他是劳动英雄。因推大土车获奖的还有肖明海、彭耀岳、耿近为、郑明友等多人。代理庄和前长张的群众昼夜赶工，造成了每人每日2.5方土的最高记录，他两村都一连4天获得上写"劳动模范"的红色奖旗。他们把红旗高高的绑在柳杆子上，骄傲的欢呼着工作。第一天第四号硪挂了红，第二天又被第六号硪夺走了，第五号为硪竞了赛，8人中累得3个人两天没好好吃饭。工程股吴成信同志具体指导修工，亲自领车拉绳和群众同时上下工，已被公认为模范工作者，中队部决定予以物质奖励。

**东明**

东明城关区，是刚从汉奸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一个新区，但群众知道黄水比汉奸还要厉害。因此，他们虽生活异常困难，也积

极修堤。东关村11个穷人表现的最好，他们说："俺几个谁也没地，打堤是为大家，也为自己。"到第四天，城关区开大会，把几天的工程做了个评定，东关村、店子村占了第一名，各得奖烟20盒、胜利旗1面。乔来运、王好学当选为修堤英雄，各得奖烟5盒，并披红彩。最坏的是中门、四保，当场受了批评。

## 郓北

郓北八区郭垓郭清州，今年63岁，是第三分队的一位"老青年"，个矮矮的，弓弓的腰，脊背被太阳晒黑了。在推土、拉车、装车中，他和青年人摽着干，不分上下，甚至有时超过了青年。近几天来做工中，大家看他太累时，就叫他装车子，但他总是这样说："我这老骨头，非得跟你们年轻的摽不行。"说罢，他带着极瞧不起青年的样子，推着一推一拉的车子，飞也似的跑上了大堤。往往是早晨的时光，他身上的汗就像水洗的一样。自卫队员郭齐亮，也加劲了，他说："伙计！你们只管装吧，土车子再满，我再也干上堤去了。"他和"老青年"很自然的赛起来。全小队46个人在他俩的影响下，都百倍的战斗起来，不分昼夜的劳作。17日，天还不到半夜的时候，他们就起来推土了，"老青年"还是抓了第一。可是因为天太黑，路又不近，他跑来跑去把腿和脚弄肿了，当时他并不理会，脚继续肿，直到没法再拉车子的时候，他才下去休息了。他在7天中，共完成32.5方土。他临回家时说："要不是国民党，不会出这牛力，脚腿都肿了，我啥时也忘不了国民党给的灾！"

## 长垣

长垣八区朱口村朱建山，今年37岁。该村参加修堤的60多人，在村干领导和鼓励下，情绪都很高，最出色的就是朱建山了。人家推3车土，他就能推4车，并且每车不下二三百斤，比

别人多几十斤。每逢休息或下晌吃饭时，他总在人后，要比别人多推1车土才行。他遵守纪律，又能鼓动别人。他向别人说："打硪要吃劲，如不打结实以后开了口子，还是淹咱们。咱们不能像以前做公活，应付公事，监工的来了，就打的挂劲，监工的走了，就不干了。"有两个工人在休息时打着玩，打到谷地里，他赶忙拦住说："那胜歇歇啊，要打着玩，到没有庄稼的地里去。"就在这种情形下，全小队公选他为修堤模范。

**东垣**

东垣12里长的一段堤上，有34盘硪，打硪的歌声响成一片。果园村有3盘硪。他们因沙地不收麦子，现在虽吃着黑窝窝，又吃不饱，但他们的劲很大。种有半亩地、五六个小孩的李永见，在打硪的时候，跑南跑北给大家打气说："咱们要高高的打，打结实为的群众。"每次下工回来，他忙着编歌、教歌，嗓子都使哑啦。他亲自带那盘硪和李永和那盘打得很好，在14日经区中队评议挂了奖红。古传打硪有名的春亭村，这次来了5盘硪，差不多都是自动报名来的。他们说："咱们打不好不回家！"不等人家上工时他们就上工了，到堤上就不停的打。他们高唱着有节拍的打硪曲："高高打来，高高排唉啊唉！排个路实，永不开……"硪每次高起时，许连麻和小三毛就从硪底下钻。13日，经区中队评议许石好、许增永、许五成3盘硪挂上了光荣红彩。14日，许石好、许增永这两盘硪又插上了光荣旗。全段共34盘硪，他两盘占了第一。

# 冀鲁豫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武委会总会告全体会员、团员和民兵书*

## ——为紧急动员起来参军参战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

工农青妇会员、民兵和儿童团、姊妹团团员们：

才说要和平，蒋介石又来向咱们进攻了。

蒋介石怕咱们实行民主，减租减息，翻身斗争，有地种，有饭吃。他嫉恨咱们过好日子，他是全中国的地主恶霸头子，他独霸全国，祸害百姓，比咱村里的恶霸地主厉害多啦！

咱们才把卖国贼汪精卫收拾了，蒋介石却替了汪精卫，把全国大权，从天上到地下，全都卖给了美国反动派。他投靠美国反动派，仗着美国反动派的势向咱们解放区进攻，到处杀人放火，内战已在全国大打起来，咱们要爱国，要自卫，要紧急动员起来，打退反动派的进攻，争取独立、民主、和平。

咱们可不是好欺侮的，世界上有名能打善战的日本军阀都叫我们打败了，还怕老蒋啥！蒋介石虽然有美国帮助，可是他有三条大困难：一是人心不顺，他卖国、独裁、内战，犯了全国的众怒，人民不赞成他，就连资本家也受他的害，盼着共产党打垮他；二是士气不振，枪炮虽好，兵不能打，也不愿打内战；三是经济困难，钱粮缺少，国民党占的地方，到处闹灾荒，连国民党的财政部长都说没办法。咱们虽没外国帮助，可是有三大有利条

* 本文原发表于1946年8月25日《冀鲁豫日报》。

件：一是人心归顺；二是士气高涨，一个兵顶几个用；三是经济有办法，粮草充足。再加上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好，只要咱们齐心加劲干，就一定能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最近，蒋军进攻咱边区，南边陇海线上的自卫战已经打起来。咱们八路军打得好，收复了杞县、通许等几个县城，收复了陇海线路300多里。老蒋正在调兵遣将，大仗眼看就来。这个大仗，打得好坏，关系很大。咱们边区人民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参军参战，军民团结，要打大胜仗，多消灭蒋军，保卫边区，□争回和平。咱们工农青妇会员、民兵和儿童团、姊妹团团员，要做到别人头里，起模范作用。

（一）咱们年轻的工农会员和民兵同志们，要带头参军，参加正规军，不要挂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有志气。妇女会员和儿童团、姊妹团团员，要劝说自己的丈夫和哥哥参军，要做劝夫参军的模范妇女，劝兄参军的模范儿童。年老的工农青妇会员，也要送子参军，争取做模范父母。

（二）工农青妇会员和民兵，要积极参战、抬担架、送东西、破路破城、放哨送信、慰劳军队和伤兵等。各样战争动员工作要不怕困难，不逃跑，不擦滑，保证做好。出差时，不大吃二喝，不毁坏老百姓一点东西，向新区百姓讲说咱这儿的好光景。在村里要防止特务坏家伙造谣破坏。特别是民兵，在前方要大胆配合主力困扰蒋军，保护民夫的安全；在村里要盘查行人，留心内部，防备特务，防止地主坏蛋反攻，保护群众组织，安定后方。

（三）在家的工农青妇会员、民兵、儿童团、姊妹团团员，要带领全村群众，做好优待军属和参战出差家属的工作，帮助秋收、种麦、打水、□□，不叫军属作难，叫前方的将士好安心打胜仗。参军参战的人走了，村里劳动力少了，各顾各不行，要组织临时互助，秋收□□几家合伙，找投脾气的，自由组成，先给

军属和参战出差的家属做活。男女老幼齐下地，战时互助为前线，特别是妇女，还有儿童、老人也都一齐下地秋收，代替青壮年。

（四）工会会员们，要加油生产，多造枪炮子弹，多做鞋帽衣裳，供给前线；多印宣传品，叫每个人随时知道胜利消息和该做的事情。

（五）战争动员工作一完成，得了空儿，就接着斗争翻身，互助生产，有饭吃，有地种，大家齐心有组织，特务恶霸不敢动，参战才好办。后方巩固，前线才能打胜仗。

全体会员、民兵和儿童团、姊妹团团员们，为了保卫咱们的果实，保卫咱们的家乡，保卫咱们的边区，保卫咱们的好日子，为了争回和平，争得独立民主，咱们一齐动员起来干吧！胜利一准是咱们的！

# 濮县涌现大批担架英雄*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巨野战役中，濮县担架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创造了许多英勇的模范事迹，因而博得了部队的慰问、嘉奖及二分区指挥部的表扬。全县7个区，三区是模范中的模范，荣获一等奖。濮县的担架队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成绩，是由于领导上事先抓紧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他们在动员担架之前，首先在县里召开了群众、军属、士绅、伪顽家属与逃亡地主家属及小学教员等会，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把教员训练班组织成宣传队，下乡深入宣传。特别是动员从前线回来的担架队员，把他们在前线亲眼看到蒋军烧杀奸淫的暴行到处讲述。使群众都了解蒋介石打过来，咱的家就没了，激起大家保家自卫的热情，打垮坏分子的造谣破坏。于是，大家都积极的自愿去抬担架。全县并抓紧时间解决了土地问题，组织了种麦，解除了群众上前线的顾虑。所以，到达前线后，马上掀起了竞赛。一区担架队到达部队后，立即发动担架民兵，向别的区挑战，接着一、三区和四、七区提出竞赛，这就更加激发了大家的情绪，涌现出大批的模范和英雄。三区一中队队长祖建成，离敌人只有半里地，在敌机枪扫射下，他带领5副担架过河抢救伤员。他们随军12天，8天有战斗，有时一连抬三四趟，终于胜利的完成了任务。三区三分队于清泉，他是上次大杨湖战斗的担架英雄，这回一个夜里背下3个伤员。七区三分

* 本文最早发表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11月11日），摘自《战勤工作资料选》，黄河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332—333页。

队杨丙南，带着病两天抬了3趟，还把自己的袄给伤员盖上。五区四分队黄国喜，到了结婚日期不回去，坚持完成任务。商相文医生自己带着药品到前线看护伤员和担架员，一天内，看了80个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六区的黄庆文医生，自己病刚好就忙着给伤员看病。这些英雄和模范人物，他们都得了功劳证，受到了部队的慰问和嘉奖。给濮县三区担架队得奖旗一面，部队给他们的慰问信里这样写道："……三区担架队，情绪高涨，爱护伤员，群众纪律也好，大小任务都能完成。我们特向大家表示十二万分的敬意并致崇高的敬礼！"二分区奖给纸烟235盒，派陈科长亲往慰问，县指挥部奖烟90盒、奖旗数面。在总结大会上，全体担架队员一致选三区为一等模范，奖大旗一面，七区、一区分别选为二、三等模范。县9个中队中，三区祖建成的一中队被选为特等模范。在全大会选出于清泉、杨丙南、黄国喜等80名担架英雄，每人都得到奖品外，并分别给予功劳证。他们得到奖品、奖旗后，都认为无尚的光荣，大家兴奋地说："下次来，还要争模范！"

# 冀鲁豫行署关于教育方针的指示信*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鲁豫行署，特于12月11日，向全区专员、县长、教育科长、各校长发出关于教育方针的指示信。全文如下：

自1944年春《解放日报》相继发表了《普通教育改革问题》及《学制与课程》两篇文件之后，本区教育界曾开了很多大会，也反省了各自的教学观点。此后各县即着手推行与生产、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新教育，现已获得了些成绩。特别是冬学运动时期，大部分冬学是以生产组织作为学习的基础，充实了群众教育的具体内容，也提高了教育工作者的兴趣。

日寇投降后，和平观念大增，各领导机关均移住城市，与广大农村日渐隔膜，再加上当时对有些科学知识的迫切需要，思想上多少觉得过去的教学形式与内容上不适合客观环境，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的教育又回到旧型正规化的老一套去了。这表现在我们的中学课程增多，年限的延长，特别是大代数、解析几何、英文等目前还不太需要的科目，列入课程表内。这是我们教育领导者思想还未打通的具体表现。

陇海路出击以来，5个月的自卫战争当中，前方的部队越打越强，后方的各种战争工作亦日益繁多与活跃，但我们的学校却无声无息了。沦陷地区自不必说，中心区的也大部不死不活，有的就干脆停止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家的意见很多，特别对领导上不重

* 本文原载1946年12月18日《冀鲁豫日报》。

视教育工作，使教育干部不能做教育工作，认为是主要原因。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其真正原因，正像边府教育厅晁厅长所说："我们的学校所以垮，就是因为我们实行的还是老一套的旧教育，而不是新教育。"新教育是什么？晁厅长认为只有两句话可以说明："第一，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二，是与实际结合的。"回头检查一下我们的教育，是否真是为人民服务了，为人民服务即是答复人民的要求。广大人民的要求是什么？概括的说是反帝反封建，具体说就是求得翻身，也就是对民主，对生产，对获得胜利果实，对保家自卫的要求。人民这些要求，我们的教育不但没能圆满答复，有的还背道而驰。在平时因为是官办的学校，人民还可以维持局面，战时大家都忙于参战参军，就顾不得再去学习那些旧教条，因此我们的学校就相继垮台。其次是与实际结合的问题。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现在所具备的条件。现在人民要的是翻身，是民主，是生产发家，是守乡自卫，更具体的说，他们要的是割草喂牛，拾柴烧锅，是吃的饱穿的暖，不愿当饥民和愚民。特别是在今天自卫战争大规模展开的时候，他们更迫切需要知道蒋介石究竟能不能打过来？打过来我们怎么办？黄河水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过来？过来后我们又怎么办，等等。我们就应该抓紧这些问题进行宣传教育，使群众心里透亮，提高胜利信心。与实际结合在目前就不能离开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教育就没有能很好的结合这些实际。就中等学校说，学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群运、战勤），可是在学校里学的教的却不是做的那一套，而是与做不相联系的另外的一套，这些中学，可以说是做而不学。高小呢？一般的不参加工作，光上课，学教条，这叫做学而不做。至于初小，以学校为单位说，既没有参加实际工作，又没有经常上课（少数好的在外），这叫作不做不学。这种教育，群众既不需要，学校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我们的教育究竟怎么办？我们以为目前应该解决以下两个问

题：

第一，大家应确实认识，这个新教育方针（为人民服务，与实际结合），必须即刻执行。前面已经说过，过去曾作了一段，但没有贯彻，而且中间又开了一段倒车，这说明领导者的思想还没打通，一有机会就回到老一套上去。至于执行中的困难，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教育上的革命，哪能一蹴而就？不过如打通思想，下定决心，积极创造，那些困难是会迎刃而解的。同时我们所感到的困难，都是从老一套上出发的，如果抛开老一套，困难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多。冀南就是很好的例子。冀南从事教育改革，并不比我们早，到现在单冠县一县就有51处这类新型的小学。可见打通思想，下定决心，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第二，中心工作和部门工作的结合问题。一般教育干部，都认为领导上不重视教育工作，把教育干部当成补丁，不能经常照顾教育工作，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在这里，我们郑重的提出，各级领导者应该把教员和学生看成一批推进工作的力量，整个的把他们组织在中心工作范围以内，不应该零星使用，东拉西凑，致得不偿失。而各级教育干部和学生，亦应该主动的参加中心工作，切勿袖手旁观，因为中心工作就是我们的中心课程，它是最实际同时又是群众最需要的东西。这点深望大家多加考虑。

至于新教育方针的具体执行，还有待于大家的摸索、创造。好在本署的《教育导报》，边府的《新教育》，以及《山东教育》等刊物都有很多典型介绍，使我们在摸索当中少走许多弯路。

以上希切实研究，具体布置执行为要！

段君毅
贾心斋

# 莘朝县合作社村社工作初步总结报告*

（一九四六年）

## 第一部分　合作社发展历史

本县合作社，自创办迄今有4年多的历史了。1941年冬季，总会郭英同志在莘朝县四区夏庄养病时，即在该村发起组织合作社，当时因群众对合作社未有认识，很长时间未被群众所接受。后由于他的长期教育及耐心说服，在个别群众中打通了思想，终于建立了小型的合作社，共有社员24人。他们研究出利用亲家发展亲家的方式，将近一年的光景，社员由1村逐渐发展到30余村，社员有400余人，股金有9000余元。

1943年发动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反"黑地"的斗争，群众得到了斗争果实，生活初步有了改善。改造村政权，群众又初步得到了民主自由，群众组织也进一步健全起来。这时群众与干部都注意到合作社工作，于是引起对夏庄村的研究，并作了初步总结，在干部中进行了教育，接着建立了武家河北庄、化庄、北小文等村的合作社。

1943年，在冠县和朝北一部灾区（朝北现并入莘朝县）组织了灾区合作社。由于1942年天旱不雨，小麦未见，秋季歉收，又兼敌人的抢掠，造成了空前的灾荒。到1943年春荒尤甚，群众

---

* 本文原载《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648—661页。

嗷嗷待哺，日不得一餐。群众因饿致死者有之，失掉生产技能者更有之，形成鲁西北半壁河山无春色的惨状。我抗日政府为了抢救灾胞，缩短灾荒，以大批贷款贷粮组织灾民生产。为了使贷粮贷款运用到生产，起的作用更大，更有保证，便组织灾民合作社。一切贷粮贷款都通过灾民合作社。当时为了刺激灾民入社，高低不入社的不能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很短期间组织起很多村社，仅朝北十区一〔个〕区有20处。

在以上两种情形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由于我们对组织合作社的认识不够，及领导上的主观官僚，很长时间未有发展，并大部逐渐消沉垮台下来。如在组织灾民合作社时，不让非灾民入股；夏庄合作社股金不得超过100股，都限制了资本的发展。未研究合作社资财的使用，无原则的怕好户沾光及起操纵作用。特别值得我们检讨的是群众路线不明确，不是根据群众的要求建立起来的，群众入社不是自觉自愿。合作社的干部，不是群众自己所爱戴的领袖。合作社的业务更不能和群众的要求结合起来。如夏庄在灾荒极严重时群众相继饿死，合作社存着很多粮食，不支持群众生产，走囤积路线，结果遭到群众反对，脱离了群众。灾民合作社垮的更快，款贷完合作社也垮完了。社干拿合作社的款，有的赌博，有的嫖女人、买地、娶老婆，不贪污的很少。总之，是不走群众路线，无民主监督，吃了民办官代的大亏。

合作社垮台之后，造成今后组织合作社很大困难。在宣传上失掉了政治资本，群众不敢相信，失掉了对合作社的信心。我们在领导上作了深刻检讨，便派干部深入到一个村，创造典型，建立榜样，用事实消除群众的怀疑。挽回政治影响，以便顺利开展合作社工作。1944年春冠县同志便到了白庄村社，具体领导建立了纺织组、运输组、贩卖组。有社营、组营，全部贫苦群众都组织到生产中。

社员上下一致发动起来。并所得到王奉□民商店在业务上的

指导及经济上的协助，这一段的努力确实起了核心作用。邻村群众亲眼看到白庄合作社对群众的好处，有的到白庄入社，有的在村里自己组织合作社，如北王奉、袁庄等。

1944年2、3月间，群众响应了上级的生产号召，组织了互助，一块刨地拉犁。在农业生产之余，经营副业，生产情绪大大的提高了，但在生产上主要障碍是本小问题。有的生产没饭吃，有的在农业生产之外，剩余劳动无法使用，因为无资本，不能在农业之余经营副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各村群众便形成了向富者借生产费的运动。如北家头、武家河、余庄等村都在10万元以上，并号召富有者将款投入合作社，入到合作社，支持群众生产。有的群众借出生产费再入到合作社，由合作社有计划的支持生产，这样合作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扩大了组织。如东庄、北安头等村就是在这时建立的，在资本上更壮大了一些。给合作社只依靠公家资财，不相信群众私人资本的观点一个有力的教育。

至1944年6月间，为了加强与统一对村社的领导，发挥合作社资本的效能，又建立了莘朝四、五区合作社区联社。现根据合作社工作的发展及需要，又将联社分开，建立四区、五区合作社区社。合作社工作由于这半年的努力，创造了成绩，储蓄了资本，积累了经验，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

## 第二部分　合作社在根据地建设上起的作用

合作社的建立，是根据我们革命工作的发展及群众的需要，它组织群众的经济，对敌经济作斗争时是对封建经济作斗争，并领导群众与组织群众生产，近几年来确实做了一些成绩，起了不少作用。今分别叙述如下：

一、扶持群众经济发展，逐渐摆脱封建经济压迫剥削。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莘朝县四区1个区，有村社26个，社员5641个

人，男社员4889人，女社员752人，社干159人，资本702.4548万元。这些资本与社干都是为基本群众服务的。今冬在副业上领导与支持了170个组，纺织组63个，磨粉组70个，豆腐组6个，作糖组2个，打油组30个，运输组49个，轧花组3个，商营组10个。就是说合作社的资本支持了这些人的生产，依靠合作社吃饭的有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贫苦群众是没有生产手段的，他们为了吃饭，解决挨饿问题，只得向少数有生产手段的地主、富农出卖劳动力。地主、富农便得以残酷的剥削贫苦群众，贫苦群众终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目前开始有了变化，部分生产手段逐渐转向了合作社。单就打油说，五区过去油榨子纯为地主富农所有，今年由地主富农手中转向合作社者，而且在价格斗争上也有了相当力量。过去集市上物价常常暴涨暴跌，贫苦小商人在暴跌中牺牲很大，这多是奸商的操纵。近来由于合作社的建立，有计划的出卖与购买，物价一般是平稳的。如在麦收、秋收后，贫苦群众为了还债或置衣服，必须出卖粮食。为不使他们吃亏，商店则协助合作社收买，群众将粮食吃完需要购买时，再有计划的出卖。总之贫苦群众需要卖时就买，需要买时就卖，不但不使他们吃亏，还打击了地主、富农及大商人的囤积。这样工作今年做的比较多，在王奉集今春出卖谷子50万斤，收买麦子7万斤，其余的不计。今年6月，很多大商人在王奉收买故棉，有一集上的特别多，奸商便开了个会，联合起来低价收买（每斤40元压至30元），使很多小商人唉声叹气。这时白庄合作社便联合其他合作社，高作价收买，每斤高45元，谁出过这个价谁买全部，故棉都叫社里收买了。奸商又不得不到社里买，每斤得多花2元。不仅给小商人及贫苦群众争取了利益，还给奸商很大打击。这说明了，合作社在国家资本协助之下，有力量在集市上作价格斗争，打击封建经济，培植小农经济的发展。

从劳动价值上也有了变化，去年每个人每天管吃工资15元至20元，今年每个人每天管吃工资50元至100元。运费去年每百斤10里1斤米，还是争先恐后的干；今年下半年每百斤10里2斤米还找不着人，劳动价值提高一倍以上。以上经济上的变化，是与合作社工作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二、开展了群众性的对敌经济斗争。对敌经济斗争主要是统一市场货币、统制对外贸易，要在物力上与敌人竞争。要完成这一任务，光依靠政府是不行的，必须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合作社将群众组织起来，作为对敌开展群众性经济斗争的有力武器。本区合作社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确也起了一些作用。首先在执行政府工商法令上，因合作社是在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后组织的，参加合作社的领导分子，多是有了觉悟，受到了相当的抗日教育，并有组织上的经常领导，在执行工商法令上没问题，是能起模范作用的，比商人是认真的多。

其次，在对物资的掌握上，非让出境的东西，如棉花、耕牛、粮食等，商人在合作社里绝对买不走；报税出境的东西如瓜子、麻子、油料等东西，报不了税起不了税单也不卖，并能做检查工作。

再次，在抵制外货上，能根据根据地的需要发展工业，组织各种小型工厂，如区社民生工厂，白庄妇女社织手巾，各村社组织造酒的、淋盐的，并对社员进行爱护土产的教育，对敌货都进行了有力的打击。

这段工作对发展生产，丰富根据地物资，巩固抗钞，的确起了不少作用。

合作社确实是对敌开展群众性经济斗争的有力武器，当然在开始时也有些偏向，那是极少数。

三、对巩固农民互助组织，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调整了阶级关系。我们这地区为组织生产，渡过灾荒与恢复群众元气，今

春在农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很多劳动互助组，一时非常活跃，不久即消沉垮台了，只是昙花一现。主要是参加互助组的是一切贫苦群众，他们在互助组后，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效力也提高了，他们的剩余劳动力，因为没有资本的支持，无有出路。有合作社的互助组则不然，由于合作社的支持，他在农业互助之余，副业上也能互助；他们的剩余劳动力有地方使用，能创造价值，故组织起合作社是巩固农民互助组织很重要的一环。

## 第三部分　合作社是在几种不同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合作社的建立，是建筑在群众各种不同的要求及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根据检查工作的了解，大致可分下列数种：

一、在借生产费时建立的合作社，所谓“硬拔葱的合作社”。1944年春，上级号召组织生产，大量开展互助组织。进行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无吃、无种籽、无工具。于是不少村庄，贫苦群众掀起了向地主、富农借生产费的运动。群众在借生产费后，为了长期有计划的支持生产，便要求组织合作社，计有南安头、北小文、北安头、余庄等村。

二、在互助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生产运动中有不少的互助组，在副业生产上储蓄了一部分资本，且有的一村数组，没有统一的领导，不能尽量发挥互助作用，在这样的要求下建立了合作社。计有刘庄、南庄及刘店子的妇女纺织社。

三、在民主民生斗争胜利后，得到斗争果实建立的。1943年开展群众运动，经过了减租减息、反恶霸、反贪污、借粮、查“黑地”等斗争，部分群众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在政治上得到了自由。于是要求生产继续改善生活，在这时建立的合作社，计有武家河、北庄、时固、崔马固等村。

四、受其他村的影响，群众有建立合作社的要求，在干部的教育帮助下建立的。本区合作社发展不平衡，有的村有，有的村无，且有早晚好坏的不同，因而互相影响，推动的作用很大。夏庄建立了合作社，影响了白庄合作社的建立，白庄村的建立与发展又影响了邢町、□庄、东西田庄等村的建立。

五、在灾荒时，以贷款号召生产救灾建立的灾民合作社。1943年灾荒时，我政府贷下大批资财支持生产，从生产上拯救灾民。为使这一工作做的好，确实起到生产救灾作用，便组织救灾合作社。一切贷款通过合作社，不在合作社的不能贷款，非灾民不能入社。仅朝北十区组织起20多个，但很短的时间垮台了。

六、以村公有资财为基础，干部组织的合作社。有的村庄，村里有村公产，群众未经过发动，并未有组织合作社的要求，我干部硬叫群众组织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多是不活跃。但因有公产，群众性大，也不容易被干部化了。这样的合作社有前观上、后观上及阎庄等。

在以上几种情形下建立起来的合作社，有的是发展起了资本，社员有些壮大；有的不发展社员，股金形成停滞状态；还有的垮台了，股金被社干贪污。不发展与垮台的原因检讨起来，一般的不外下列几种：

（一）不发展与垮台的原因

有的村庄群众未发动起来，或发动的不好，他［们］仍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与剥削。他们迫切的要求推翻封建势力及封建剥削。这时组织合作社，提倡生产，与他们的要求结合不起来。他们在村里无地位，连说话都受限制，也不敢活动。合作社的领导权，往往被上层人物及流氓商人掌握，这些人是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他们掌握了合作社的领导权，独断专行，自私自利，做自己的买卖，脱离群众。这种合作社不是社干贪污了，就是被群众反垮。如杨庄寺、阎庄、行头等村。

有的村群众刚初步发动起来，村干部是新选举的，没有经过什么锻炼，一般工作能力不高，领导工作也不得法，干部又少，这时成立合作社，社干往往是兼职，因村干本身事情多，对合作社领导不够，不能经常讨论、计划合作社的工作。在这样情形下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就经常停滞不发展，如北庄、武家河、苗头、田庄等村。

不走群众路线，不根据群众要求，干部代替、包办，自上推动建立起来的合作社。社干多数不是群众爱戴的领袖，有的群众参加合作社，认为是一种负担，有的为了贷款。这样的合作社，干部一离开，或是一不贷款了就要垮台，如灾民合作社。

（二）合作社发展起来的原因

群众初步发动起来的村庄，基本群众树立起优势来，群众有了觉悟与认识，并经过斗争的锻炼。这样的村，群众生产情绪一定高，建立合作社，选出的社干，多是群众领袖，合作社的工作也有民主力量的监督。

有公家的资财及领导的帮助。合作社初建时，多是资本不大，经常周转不开，对经营业务也不熟练，能赚不能赔，这时非得有公家物力与人力的帮助不成，如营业上的指导与贷款等，使之营业技术慢慢提高，资本逐渐扩大。

营业上能适合群众要求，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主要是贫苦群众）。合作社的组织对象很广泛，社员包括各阶层的群众，在业务上必须全面照顾，只有这样才能刺激各阶层入股，资本才容易壮大。

具备以上条件壮大起来的合作社：白庄、袁庄、杨庄、罗庄、张鲁、吕村、东田庄等。这些村就比较巩固。

# 第四部分 合作社发展的规律

本地区的合作社历史不够长，尚在摸索期间，领导上还未找出一套规律，仅根据我们的体验，提供如下：

一、由初步感情结合到政治结合，群众由不相信到能获得利润，依靠合作社。如夏庄及白庄合作社都是生动的例子。在起初组织时，群众都不敢入股，恐怕受骗，先入社的不是族家就是有关系的人。另有的人为了捧场，也入一点股，觉着几块钱以后没有了也没啥。至合作社赚了钱给群众办了事，就逐渐由感情结合到政治结合，在入股上也踊跃了。白庄群众竟说出："合作社就是咱的靠山，合作社早成立一年，灾荒时不致饿死这些人。"因此合作社便成了群众自己的组织。

二、由小而大，由分工不科学到科学。合作社初成立时，一下集合很多资本很难，资金的壮大，都是合作社赚了钱，在分红时，社员将分的红再入社股，一次一次壮大起来的。也有的先组织互助组，在互助组里储蓄养本过渡到合作社的。因为资金少，业务也少，故分工也很简单。分工是根据资本的多少，业务的简繁而定。资本是由小到大，分工也是由简到繁，由不科学到科学，这是种必然的结果。

三、由混合业务的合作社，逐渐发展成若干不同性质的单纯业务的合作社。单纯业务合作社建立的愈多，混合社业务愈少。单纯业务的合作社群众性较小，社员会受到限制。混合业务的合作社，群众性较大，组织对象会广泛一些。初组织合作社时，组织混合社比较容易，使业务精粹起来，群众对合作社也有了认识，根据业务性质〔再〕来分别建立单纯社，如白庄在混合社以下建立了妇女纺织社、打油社。

四、由点到面的发展，这个地区的合作社，就是这样发展起

来的。由夏庄合作社的建立影响了武家河、北庄、杨村寺等村社的建立；由罗庄合作社的建立，影响了王店子、刘店子、邵店子、化庄、安上等村社的建立；由白庄合作社的建立影响了北王奉、袁庄、孟庄等社的建立。合作社的发展是一块一块的，总之，群众亲眼看到了合作社的好处，发展比较容易。

## 第五部分　合作社的领导问题

一、领导成份。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应以基本群众为主。领导上应以贫苦群众为骨干。领导权一旦为地主、富农掌握，一定产生囤积居奇、垄断市场、大鱼吃小鱼的现象，使基本群众的经济不能上升。如袁庄富者打油不顾及基本群众如何而遭到反对；固里固村合作社在1月间分红利5万元，竟被富户分去2万多元。此二社无形中变成给地主、富农服务的合作社了。贫农掌握领导权，能适当的、及时的解决贫苦群众的困难，也可能变成只为贫农利益，使富者不投资不相信，资本不能扩大，经营不能扩大的偏向。在群众已发动起来的条件下，这类问题好克服。

二、领导组织系统。本地区合作社的组织系统是村社、区社、县社，有两个区社以上为了统一领导，就建立县社。

村社下设立了很多小型社。村社向小型社中投资扶助也是直接领导关系。

为了便于各村社在业务上取得配合，在村以上区以下建立村联社。它不是一级组织，与村社是配合关系，只是发生横的关系。这样能集中一部分力量，活动范围较大。

三、与政民的关系

（一）各级政府对各级合作社是指导关系。合作社在不违犯政府法令下，政府不得包办与干涉合作社的业务，合作社如有违

犯法令及危害群众利益的地方，政府有监督与取消的权力。但政府领导下的工商管理局及公营商店等，有扶持合作社发展的义务，如贷款、供给原料、推销成品等。因而合作社应主动的与政府领导下的经济机关取得密切联系。

（二）合作社是群众组织，可以参加抗联，与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是配合关系。因为合作社的社员，有各救会的会员。各救会应通过自已的组织，保证合作社的建立与业务经营。合作社本身是一种经济组织，用它来改善群众生活，使群众走向丰衣足食。

## 第六部分　合作社的利润分配

合作社的分红当与否，与合作社的发展、垮台很有关系，兹将本地区的分红办法介绍如下：

一、公家资本所得之红，代卖代买之手续费，这样所获之红，不按股金多少来分，是按社员的阶级成份来分。生活越困难的分红越多；贫农一人算一股半，中农一人算一股，富农一人算半股，地主不分。因为是公家之款，主要是扶持基本群众生产的。化庄、北小文、罗庄，都是使用的这种办法，在影响上一般是不坏。他的缺点是，不容易刺激富有者入股，这只适于新营的方式。

二、股金所得之法，在股金中又分两种，一种是自动入股，一种是经群众力量动员入股的（指借生产费而言）。在股金分红中，在动员股中所得之红，提20%加在自动入股上，再按自动入股的多少分。动员股所得之红抽出去20%后，再按股的多少分。化庄村使用的这种办法，主要精神是奖励自动入股的。

三、工业上所得之红，因这种利润，主要是劳力得来的，为奖励劳动力，在所获利润中，提出一部分作为劳动分红，按劳动

的交易额来分。如白庄妇女纺织社，在整个获利中，提50%，按每人所得工资的多少来分。

四、在总的红利分配上，各种数字的比例是：职干报酬25%；公积金10%（但合作社刚成立时，获红利少，为使股金多得红，刺激多入股，公积金少抽或不抽亦可）；公益金5%。

## 第七部分　合作社的三种经营方式及三大资金的壮大

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还包括着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男女群众。因他们的年龄性别与阶层的不同，故对合作社的需求也不同，合作社要多方照应。否则，不能提高全体社员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在我们的体验中，合作社的经营方式，及各种资金的壮大，对照顾各阶层利益巩固合作社上是大有关系的。兹分别介绍如下：

一、社营是合作社的经营，社干亲手负责。这种经营，因不出工资及另支劳动报酬，社里获利大。对入股多的富有者有利。这种经营股金分红多，可刺激富有者多入股，不退出合作社。这种经营在合作社建立不久资本不多的基础上，可多采用。

二、组营即合作社的小组经营。由合作社拿资本交到社员小组，让他们自已经营，赔赚由他们自己负责。在他们获利中抽一定利润作社里红利收入。这种经营可支持贫苦群众生产，使他们的剩余劳动力有出路。但要特别注意对他们的领导，不要大放手。夏庄合作社大放手后，结果资本有的赔光，有的吃光了，款子集中不起来了，影响很坏，是很大的教训。

三、个体经营是社员个人经营。这种经营是对一些老弱社员的照顾。老弱社员在生活上无办法，需要社里给他们一种业务。如袁庄合作社支持了4个货郎担子，赚钱很多，少的1万元，多

的 3 万元，解决了各家的生活问题。支持他们的办法是：贷给他款；低价卖给他货，叫他再稍低于市价卖，给他一定的利润。前者办法较好。

三种经营方式各有特点。社营能照顾股金分红；组营能照顾劳动者；个体经营能照顾生产力弱的社员。这三种方式混合采用，则能照顾全体社员利益。否则，只社营不组营，则贫苦群众剩余劳动力无法使用，劳动力价值不能提高，富者乘机加紧剥削；只组营不社营，富有者不入股，贫苦群众陷入孤立；只组营、社营不个体经营，则不能照顾生产力弱的贫苦群众。三种方式混合采用为最好。在资金上社营、组营、个体经营各占多少资本要有规定。

所谓三种资金，是指股金、积金、贫苦群众的储蓄金。这三种资金壮大了，合作社才能达到巩固。

积金：在每次分红中提出一部，积金越大，合作社越巩固。合作社如没有积金，则维持不住股金，社员可容易抽股。积金是由全体社员红利中抽来，本身不分红。他所应得之红，凡系社员都能享受之。谁要退股，不能分积金，因而积金能维持股金，同时还能吸收社员入股。如化庄积金9.5506万元，股金23万元，积金占股金1/2，社员谁都不肯退股。

股金：合作社本是经济组织，股金是合作社的主要资本。壮大股金工作是个很重要的工作。本地区在扩大股金上，有它的有利条件，环境好转，地区扩大，农产品贱，工商品贵，又有我抗日政府执行政策的正确，富有者囤积居奇遭到严重的打击。合作社对他们照顾，使他们有利可图，他们是会向合作社入股和投资的。

储蓄金：合作社的组织对象，主要是贫苦群众，改善贫苦群众的生活，使他们经济上逐渐走上独立。但贫苦群众无钱，入很多的股金是办不到的，必须使他们“日集月储蓄”。白庄合作

社，在贫苦群众储蓄资金上很有些成绩。他们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在经营红利中拿出一部分到合作社储存起来。合作社给贫苦群众储蓄资金是万分必要的。合作社如无有贫苦群众的资金，合作社则缺乏骨干，便不能与封建经济作斗争。如贫苦群众储蓄金扩大了，再有相当的积金，即使富有者退股，也一样有力支持群众生产。如袁庄合作社，因为组营合作社一段未赚到钱，富有者想退股，群众已储蓄了部分资本，能以支持生产了，富有者退股也不在乎。总之，储蓄金壮大了，在贫苦经济斗争上，可掌握主动权。

## 第八部分　在业务上划分合作社的种类

一、混合业务的合作社。合作社的业务不是单纯一种，有消费、生产、运输、信用等。这种合作社形式，在村初成立合作社时多都采用，因它的统战性大。

二、交易员合作社。为了加强交易员的劳动观念，削弱他的寄生意识，在王奉集及张鲁集，成立了交易员合作社。交易员合作社只限交易员参加。在任务上除交易外还要生产，在领导上仍不割断事务所对交易员的领导。但有关合作社的一切业务，则有上级合作社负责，在不违犯交易工作及工商法令时，事务所不得干涉。

三、单纯业务的合作社。是在混合业务社扶持下建立的，不论社员参加劳力否，都可入股，混合社也可入股，以资扶持。为了加强领导，参加的社干为当然委员（因也是民选的）。

## 第九部分　现存的几种偏向

一、合作社对农业生产注意不够，不组织劳动互助，单纯营

利观点。

二、合作社光要求政府支持，想接受一切优先权（如贷款、代卖代买等）。但在执行工商法令上，不能起模范作用，有的还走私漏税。

三、合作社的政治教育太差，合作社的社员对抗战勤务不积极。

# 在社会部长联席会上的总结*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

刘晏春

这个会从2月5日召开，因飞机轰炸，直到2月19日才结束。但大家的情绪始终是很兴奋的。我在下面讲几个问题：

（一）**今年反奸工作的总方针是**：结合土地改革、自卫战争（中心），开展群众性的反奸工作。

土地改革、自卫战争，群众敢翻身起来向地主要土地，武装自己，进行保粮、保田、保命的自卫战争。但是隐蔽的大小特务坏分子必定集中一切力量来破坏我们的中心工作。领导这一工作的同志，如果忽视不注意结合反奸保卫工作，就一定会遭到不小的破坏和困难，不能得到应有的成绩，因此各级党委及群运干部，对这一方针必须研究，求得彻底了解。在进行土地改革、自卫战争中必须结合反奸工作，并要坚决纠正过去"单打一"和"过继干部"（即出嗣给别人的意思）的思想。再从保卫工作来说，为什么要结合土地改革、自卫战争，展开群众性的反奸工作呢？说起来很简单，目的是要群众都起来开展反奸工作，把国民党反动派所驱使的特务分子、顽固分子的组织与工作彻底摧毁，建设我们的各种工作，来巩固扩大解放区。要不抓着群众的迫切要求，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结合，群众就不会干。现在中心区群众的要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上）第208—212页。

求是改善生活、要地种，沦陷区的群众要求是保粮、保田、保命，这些要求都非常迫切。我们保卫干部就必须下水去领导群众翻身，使群众得到利益，满足要求。群众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得到土地保得住，群众就敢起来反奸防谍，这样做使群众由不敢翻身达到敢翻身起来要粮要地种，使土地改革、自卫战争的工作顺利开展。这显然对保卫工作是加强，不是削弱。为此必须纠正保卫干部在参加土改工作时，光锄奸不发动群众，光搬大“石头”（特务）不搬小“石头”（坏分子恶霸），以及对土改工作不满意，有奸不锄，消极抵抗的思想。

保卫干部首先要从思想上弄通这个方针，决心照方针去做，毫不犹豫，就不会脱离群众，就能开展起群众性的反奸工作。为了使各级党委及群运干部迅速了解及执行1947年的保卫工作方针，区党委委托你们回去向各级党委传达，并贯彻到各支部中去。

怎样去组织力量？

土地改革群众大翻身，是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一个伟大任务。如不把群运干部保卫干部和一切可能参加土改的干部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适当分工，重点地使用（下缺约36个字——编者）。（1）在群众未起来时，不管群运干部还是县长、区长、助理员、保卫干部，都要为了土地改革进行宣传攻势，打破群众的变天思想，挖穷根，动员大批的积极分子，开办短期的训练班（一礼拜时间或三五天）。干部编进小组中去，在一起住，多用漫谈方式，启发了解他们的思想及村内情况（特务分子、地主、恶霸）。这一段目的主要是使积极分子敢回去带领群众起来要土地，搞特务、坏分子、地主、恶霸。（2）积极分子回村后，普遍宣传土地改革翻身运动，来搞特务、坏分子、地主、恶霸。为了结合群众情绪，必须迅速地处理这些问题。党委必须派专门工作干部，组织反省院、悔过所。处理这些问题时，交给群众去处理。迟了或错了都不能及时结合与满足群众的情绪。因此保卫干部要大胆放手

交给群众去搞，站在群众中帮助群众去搞。在这工作中，逐渐提高群众的觉悟，找特务线索，开展群众性的与经常的反奸工作。（3）在搬大小"石头"的工作中，使群众为了保卫和巩固既得的土地，认识到特务的破坏性，逐渐走向群众性的反奸。在群众中、干部中广泛地进行反奸教育，随时在群众中总结表扬群众的点滴反奸经验，以开展群众性的反奸工作。

（二）群众路线

现在群众路线是结合土地改革、自卫战争开展群众性的反奸工作，比过去锄奸工作所走的群众路线是提高了一步。过去锄奸工作是仅仅放在少数保卫干部身上，所谓走群众路线仅仅是征求一下群众意见，工作仍是包办的，甚至是把保卫工作神秘起来的孤立观点，〔这是〕对群众。对其他干部也不敢放手，认为放手就没有了领导。因此与群众与联合会就都闹工作上的矛盾，特别是在发现特务、坏分子破坏我们工作时，即叫喊："保卫干部不管用，不能制止特务破坏啦！"连我们保卫干部在内，都没有体会到反奸工作是咱们大家的事情，仅仅靠保卫干部是不能把机关各角落的特务、坏分子肃清的。特别目前是进行土地改革、自卫战争，群众都有要地种、保粮、保田、保命的要求，地主、特务、坏分子结合起来，想尽一切办法镇压群众，不让群众翻身。在这时仅靠少数保卫干部去锄奸，工作赶不上广大群众的要求（特别是民主运动高潮快到来），这就必须展开群众性的反奸工作，使特务没有活动的空隙。哪怕对特务只起了一个一小时的镇压作用，或者特务内部发生了恐怖，逃之夭夭，对目前工作都是有利的。在工作中应教育群众认识特务和我们的政策，使广大群众和干部都会做反奸工作（特别村支部同志）。这样放手，领导必会加强。放手是一个领导方法，放给群众去做，还包括着帮助研究、检查、总结经验、提高工作，这就是党的领导。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就是这样做。

在本区来说，有两种情况下的群众路线：在进行土地改革、自卫战争的地区——群众认为对群众镇压不能翻身，要求对这些坏人都要搞（？）。我们为给群众撑腰也必须(下缺约36个字——编者）但另一方面，要防止特务帽子乱戴。为了给群众鼓气，可把该处理的案犯交给群众处理（经公审大会、诉苦方式）。群运高潮到来时，不要怕群众把我们的侦察线索打乱。只要群众能起来，就是对特务分子的镇压，对保卫工作有利。在特务分子、地主、恶霸镇压群众厉害的地方，群众不敢起来要土地，群运发动不起来这时，我们保卫干部要集中力量给群众撑腰，先“搬石头”。特别是对杀人罪犯（主要是对地主），只要能使群众起来，可以使用政府力量，这不是包办。保卫干部在掌握“搬石头”工作中，须注意准备下反奸线索和提拔反奸干部对象。再一种情况，群众认识提高，就要求反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叫群众去反，并派一定的干部去参加掌握，把反奸政策变成是群众的，使群众积极起来，而不是包办群众，使群众束手束脚。没保卫干部时，反奸工作要大胆放给群运干部，保卫干部主动地去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村庄或几个村庄形成反奸运动时，党委和保卫干部责无旁贷的要积极去领导、去帮助，防止逼供信，也防止给群众泼冷水，把群众情绪压下去。对这样的群众反奸运动也不要幻想着一点错误都没有，那样十全十美是不可能。要求得发现错误快，纠正错误也快。所以党委和保卫干部、民运干部共同负责，其中的专门工作由保卫干部负责，政策、领导力量配备由党委负责。在土地改革群运高潮时，保卫干部少，不够用，可多培养群众干部做反奸工作。形成反奸运动时，一般的要具备三个条件：有材料、群众觉悟、干部成熟。这种情况，大部分有打入工作，如南乐〔县〕群众反奸运动就作的比较好。但这种反奸运动，不是我们主观上所愿意有的，应经常注意反奸工作，使这一工作不致发

展到非搞运动不可才好。

**（三）对今后反特的认识（略）**

**（四）要注意以下几项具体工作**

（1）健全社会部门的干部

各地委会上半年要按编制把各级社会部干部配备起来，要拿好干部做保卫工作，犯严重错误的不要。

（2）机关保卫工作

要在干部中、学校中进行反奸教育。规定一定的人，一定的课程，按时间上课，反对保卫工作的神秘化。

（3）外线工作

外线工作就是深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这是决定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过去在全党来说是不注意的，因而使各种工作处于被动。今后望大家注意，各部门中有适宜这一工作的干部，要转移过来。如有可能打入敌内和拉出的关系，也盼随时告知社会部。处于现在的社会情况下，我们的活动更加广泛，国民党统治区不是铜墙铁壁，他们内部也有很多矛盾可利用，要决心去做打拉工作。国民党在战略进攻上来说，很重视这一工作。我们应有敌进我进，敌不进我也进的精神。怎样作？根据具体情况另有布置。

（4）提拔培养干部问题

保卫干部少且弱，必须大胆提拔培养，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提高。区党委办保干校（对外叫政干校），今年准备办两期，每期250人左右。要保证2/3的新转业过来的干部的训练。今年基本上是训练新转业的干部，明年再训练在职干部。

各地委可办短期小型的训练班。四地委去年共办了两期，训练了一百四五十人，在自卫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公安部门要注意培养区村公安员和服务队员。

（5）社会部要经常注意帮助军分区部队做保卫工作，特别要帮助指导县基干队的保卫工作。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一、土地改革群众运动，在区党委民运工作座谈会后，全区轰动起来，规模大，行动快，群众情绪高，成绩很大，这主要是由于我们：

（一）大胆使用行政力量，给群众撑腰"搬石头"，政府出布告，刮大风式的宣传。地主集中悔过所，群众则家喻户晓，行动分地。这种做法正合乎群众要求，启发了群众的自觉行动。

（二）大批地训练与使用积极分子，一区几千人，一村几十人，集中启发其自觉自动，说明土地还家物归原主合理合法，说明中间不动两头动。回村后积极分子敢领群众斗争，就行动起来，局面轰开得很快，真是到处点火，村村冒烟。阳谷又进一步把积极分子会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农村会议，使运动开展得更充分。

（三）领导思想上打破了老圈子，所以能大胆放手，大手大脚的放得开，克服了过去不敢大喊大叫，不敢使用行政力量而单纯的由下而上的攻的方式，克服了死守重点、四面开花、老村干路线等小圈子。正是因为从思想上去除了这些障碍，能从实际出发，能走群众路线，所以才能这样迅速地轰起大规模的土地还家运动。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上）第261—265页。

二、可是运动的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偏向和不够的地方。

（一）干部在领导农民翻身中，对自己的主要责任是启发群众自觉，在群众自觉自动的基础上，领导群众行动。再启发群众的再自觉，把群众运动提高和深入发展的作用认识模糊，以致有的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不放手让群众行动。

（二）有的地方没有真正领会新的精神，甚至传达到村后变了质走了样。有的不宣传，不拘押地主，不“搬石头”，就开积极分子训练班，群众不敢来，区长就下命令要，结果来了许多中农，甚至有地主富农。有的积极分子受训回来不带领群众，就少数人动手，啥话不说先号房子又号树，个别村把中农的树也没收，蛮干一气，可是群众还是大眼瞪小眼，不知怎么回事。

（三）在搞浮财、分粮分地中，忽视结合诉苦清算，不注意启发群众的自觉行动。强调了群众的经济利益是对的，但忽视群众的思想政治提高也是不对的。

（四）时间限制的很短，因此县区干部感到压得□，□得□，这就容易产生求成思想，简单从事等，变成代替□□□□□□，个别地方分了地，没发动群众。

三、对以上偏向我们不应大惊小怪，或是消极批评泼冷水，应该□□□□，迂回动手，从积极方面想法克服，把运动提高一步。为此提出以下意见，望各级党委根据当地具体情形研究执行：

（一）时间问题。不受时间限制，主要把土地改革搞得彻底。已经清算出来的土地，春耕前要迅速完全分给农民保证种上，并且种好。不□荒□地无人种，因为这是脱离群众的。至于没搞彻底的，还要接着彻底进行，不为时间拘限，不要急躁潦草。刚才动手的地方更不要□□，啥时候消灭了地主封建势力才算完（当然也不要认为没时间限制就放松了，□慢牵牛）。至于对春耕生产的要求，只是要求农民互助，种上地，保证不荒地即可，不要

过高要求。目前主要是集中力量彻底进行土地改革。

（二）关于消灭地主封建的大问题。许多地区是对地主封建势力打得不狠，有的对地主还相当客气，还叫他住在高楼好房里，还给他留好地，留近地，还只搬了点桌凳，至于地主分散隐蔽的地和浮财，还没彻底追出来。我们要决心彻底消灭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的认识还不够，因此就不狠。今后在运动中，应集中力量，强调彻底消灭地主封建势力，以满足群众的愿望。除给地主留生活外，其余的东西应彻底清算，并说明土地还家、物归原主是合理合法、理直气壮。党内某些同志可怜地主，一见地主老婆孩子哭叫，就心软说："他好歹也是个人，这不是抢了吗？"这都是阶级观念模糊，阶级立场不稳。

分地分粮是不是抢呢？土地还家物归原主怎么是抢呢？要说是抢，那倒是地主抢的农民的。有的地方说是抢是很不策略的，是不对的。

我们不但在经济上对地主不狠，而且在政治上也不狠，不注意从政治上揭发地主封建势力的罪恶黑暗，彻底打垮。也有人甚至说这个地主没啥罪恶。其实地主就是罪恶，应该让农民对其彻底清算，打垮地主的统治，撕破农民和地主的脸，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要认清不彻底从经济上政治上消灭地主，则农民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

（三）中农政策问题。有个别的地方伤害了中农利益，但不应大惊小怪，消极批评，泼冷水，应该从积极方面解决问题。

为什么每次农民起来即伤害一些中农利益呢？这主要是我们未能满足贫农的要求，未能把中农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行动。因此今后：

一是集中力量向地主封建势力下手（打击对象十分明确），满足贫民要求，这是基本的方向。

一是注意大村向小村调剂土地，启发大村积极分子和群众自

觉自愿向小村调剂，以解决小村贫农的土地问题。

民运工作座谈会上确定的“小村土地分散，富裕中农统治者自动少数土地可以接受”一条，容易引起向中农要地，给违犯中农政策开了口，因此，决定修正，对中农坚决不动。

一是要走群众路线，把掌握中农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启发群众了解中农是自己人，使群众自觉地掌握中农政策。

一是已经违犯中农的利益、果实未分的，则启发群众自觉地退回，不是强迫不是泼冷水；已经分了的坚决不退回，而是在今后分果实时填平补齐或补偿中农损失。这一件事情，应该让贫农和中农面对面地谈个清楚，互让解决，而不是领导干部包办命令，以致引起中农埋怨，贫农雇农对领导不满。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

（四）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充分发动群众问题。只有彻底消灭地主，群众才能在经济上彻底翻身。斗争果实要及时分□干净，绝对不准浪费贪污，如有违犯即应执行纪律。有的地方打算留一部分果实扩军，这是错误的，应即纠正。分果实对贫农要少啥给啥，填平补齐，以便使贫农兴家立业。

要在行动中抓紧每个环节，步步提高群众觉悟。应该认识先政治后经济，或先经济后政治都不恰当，而是应该经济政治结合进行。至于在群众行动中究以何者为主，主要看群众要求。

诉苦会、想想会、庆祝会等是群众教育群众，是领导启发群众自觉，是群众路线的好方法。问题在于我们领导上不要有圈子，群众要先分地后诉苦，我们偏叫先诉苦再分地，那就错了，应该看火候，看群众的情绪和要求灵活进行。

在运动开始，强调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撑腰“搬石头”是对的，这正是群众要求，不是包办代替，只有这样才能启发群众自觉自动。但当运动已经轰起来，就该随着运动的发展，强调群众自觉，强调走群众路线。不包办代替，也不是任其自流，而是

充分地发挥群众的自觉性、自动性，运动才更饱满。

在运动中建立和扩大各种组织，这也要不失时机，抓紧火候，抓紧群众的要求，随时进行组织教育，建立和发展农会、妇会、民兵、支部以及其他各种组织，达到组织多数。组织起来以后必须经组织推动工作，使组织起作用，不要放着不用。在组织里还必须实行民主选举，进行大伙当家的民主教育。对村干积极分子，可以用座谈会、短训班等方式进行民主和组织教育。

总之，在土地改革发动群众中，经济翻身、政治翻身是群众的要求，但必须认识诉苦提高、组织起来也是群众的要求，如果不认识是群众的要求，我们的干部往往好简单，怕精密细致的组织工作，而忽视教育和组织，以致群众发动后，不使巩固。

（五）干部时时保持虚心冷静，深入群众、相信群众的问题。当群众运动轰动起来以后，干部情绪随着高涨起来，这是必然的，但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随着群众的热烈而飘起来，老看好的，光喊好，不再深入群众，不再虚心向下，想歇歇，满足于轰轰烈烈，不再耐心地□问题、发现问题，结果运动自流下去。这样在运动中发生的许多偏向和问题，得不到解决，运动难以提高一步，已得的成绩不能巩固深入，以致一活跃两瘫塌。这是我们的老教训，今后必须不再重复，不再走弯路。我们不只是看积极的、好的，也要看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的（不好的村或犯了错误的村和白板村），从全面和具体出发，以先进的带起落后的。所以当运动起来以后，就应根据情况及时对干部强调提出深入群众、虚心冷静、勿骄勿躁，始终和群众一同把运动提高。

（六）在土地改革发动群众中，要开展立功表模运动，提高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完成好的地方要记大功，明令表扬。在运动中为人民立功，工作模范的好干部，应及时表扬提拔。至于在运动中贪污，收买群众果实的，则应及时执行纪律。只要赏罚严明，则干部情绪才更加饱满。

# 在地委民运座谈会上关于几个问题的发言*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赵紫阳

## 农民敢不敢要地要粮

障碍我们领导土地还家运动的思想，“差不多”、“没搞头”的认识是有的，但由于我区是处于顽后顽侧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主要是“局面不稳，农民不敢要地”、“现在执行太早”等认识。不少的县份，在领导上开始都是犹豫的，有的县（滑县）还是要单纯进行恢复组织、到处恢复农会、提村干等脱离群众的工作。有的县份把土地还家布置到区，区干打不通思想，认为“太早”、“领导上要求过急”。但是昆吾的土地改革哄［轰］开了局面，濮阳不少地区也干起来了，长垣也起来了。特别是昆吾、濮阳的边沿区，敌人不断的扰乱，抢粮、抓丁，冲散农民土地还家的大会，领导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个别也有被抓去的，但群众仍在分地分浮财。这一事实教育了大家，教育了领导，农民是迫切的要求土地和粮食的，不是群众不敢要地要粮，问题在于我们敢不敢坚决的领导群众，为群众撑腰。广大少地少粮或无地无粮的农民，迫切要求是粮和地，只要我们能答应与满足这一要求，群众是会积极的起来的。敌人的存在固然会增加群众的一些顾忌，但无地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四地委所编印的《工作往来》第三期。

无粮更是当前的最迫切的问题。这一点我们认识不够尖锐、深刻，也反映了我们的情绪和群众的情绪还有距离，我们对农民的需要及要求还是不了解的。在敌后敌侧基本上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当然，群众要地要粮不是毫没困难的，顽敌及反动的地主□□统治，特务敌探的潜伏监视，边沿上秩序不够稳定，顽杂援助地主破坏分地分粮，以及从地主及特务方面来的变天谣言的袭击，都给群众要地要粮增加了顾忌，群众就要求我们领导上“搬石头”，为群众撑腰带头，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来减少群众的困难。群众是要地要粮的，我们只要予以大力援助支持，使群众看到有可能时，就会起来干的。如果只看到困难，而不去积极帮助农民解决困难，使群众在困难重重下压抑自己的要求而不动，而单纯埋怨群众不干，是不应该的。

敌人的存在，使群众〔在〕对地主斗争上增加了顾忌。但我们对敌斗争开展的好，地主在我游击战争威胁下不敢坚决依靠敌人。群众一方面看见有敌人，同时也看到了我游击战争的力量（游击战争当年），群众的顾忌就会减少的。因此，敌人对群众的威胁大小，不完全在敌人是否退走了，而重要的看我们斗争开展的好坏。濮阳发言中提出：□是我游击战争开展的好的地方，或是用我们游击战争打开了局面的地区，群众就容易更快的干起来；游击战争开展不好的地区，即是敌人自动撤走了，群众亦担心其再来而有顾忌。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因此，游击区、边沿区的土地还家运动，必须是有积极的游击战争配合，控制地主，为群众撑腰，使群众看到游击战争的力量（当年），群众才会无顾忌的起来干。

一手拿枪一手分田，不是如何困难的，农民要分地分粮，但又要保地保粮，因此就产生了武装要求。农民看的很清楚，分地主的地和粮，揭开了脸，与敌人也就揭开脸干了，没有武装是不行的。农民要分地，就得拿起枪来；不叫农民分地，光叫农民打

游击战争，是打不起来的。濮阳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因为要分地，不少当场提出叫发枪的，这给干部教育很大。有云："土地改革□是万事之本。"因此，分地和拿枪，是不能分开的，缺一不可。

农民敢不敢要地要粮呢？现在证明，只要我们敢领导，坚决撑腰，农民是不怕的。

## 打通老村干　坚决发动贫农

过去民主民生斗争中培养出来的村干部，游击战争中，一部分跟我们出来打游击，一部分留在家中，和领导上失去了联系。〔由于〕敌人的疯狂，顽杂、还乡地主之威胁，这一部分村干部恐怖思想是很厉害的。目前进行土地改革的几个地区，由于游击战争的坚持，地主未敢大抬头，村干部及老积极分子未受到地主大的报复。这一情况就使得不少村干部（尤其未和我们一齐打游击的一部分）思想上起了变化，感到过去斗争了地主，今天人家未大报复，已经够咱的了。不少□在敌人进攻下，低头与地主讲统战，讲条件，双保险，今天和地主的关系不愿再改变。有的存有洗手思想（不干了），有的愿以［意］对地主保持和平共居，过去自己的生活改善了，今天保护果实，想以对地主和平来换得地主对自己的和平。因此，不少的对土地改革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怕将来再变天，地主不和平，果实保不住。土地改革布置下去，有的说："办法好是好，就是年年在上级动员下，不得不干的。"也是不愿对地主□□叫地主自动，不伤和气。村干部这种对地主的和平思想，是障碍他坚决领导群众土地还家的。其实村干部这种想法是错了的，我们应当把他的思想弄通，不应采取一脚踢，或是产生厌恶的思想。因为他们是从多次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曾领导过群众翻身，谋过利益，群众仍是拥护的，在党的教育下，政治上有一些觉悟，今天对地主想和平，不愿斗争，思想错了，

我们应把他的思想打通，不应抛在一边。因为只要把这一思想打通了，他还能成为很好的干部。固然，他们生活有改善，今天没有贫农积极，但如因此而打倒，目前的贫农积极分子，填平后，不也是又要打倒吗？我们的区干部不是也有一些开始思想想不通的吗？区干部可以采用弄通思想的办法，对村干部也应当如此的。积极分子固然是在运动中□要起变化的，但我们应当争取领导骨干能随着运动前进，改变思想，在各种运动中起他的应有的作用。我想一个运动中自然涌现的群众的、与自己利害相关的积极分子，与作为村干部，把自己利益放到大众利益之中，应自觉的为人民服务，其中是有些不同的。因此村干部能否领导土地改革，不仅单纯从其要求生活改善是否同贫农迫切上去测量（其实对干部也是需要填平补齐的），还应当从打通村干思想，使其为人民服务上着眼。过去在处理村干部问题〔上〕，曾经是走过弯路的，单纯的反新贵，把村干打下去，扶植了新的又新贵，再打下去。对区干部的毛病还采取教育，打通思想，对村干部则不负责任，一个新的运动到来后，村干部□思想未转过来弯子，就认为不好，想打倒他。过去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想，对村干部，我们是缺乏一个明确的政策的。

要把土地改革搞起来，应当纠正老村干错误想法，克服他对地主的和平思想。长垣县对老村干提出“只有把贫农团结起来，人多力量大，才能打老蒋”，“对地主愈狠，他愈不敢反攻，不能给［跟］他讲和平”，“地主不敢反攻，因为我有游击战，愈让步愈反攻”，“坚决干的，地主不敢整，受害的都是装好人的”。濮阳有的在干部及支部会上发动反省，启发为群众服务。昆吾发动立功选模，号召为人民服务立大功。以上这〔些〕办法，纠正对地主的和平思想，启发为人民服务，都是很好的，应当互相学习采用。还有不少的村庄，村干部开始不积极，但看到贫农起来了，情绪高，自己也就积极了。一则是看见贫农动大，自己不孤

立，群众支持了村干部；一则是贫农起来刺激了自己，群众督促了村干部。根据以上这些事实，对老村干，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启发教育，打通思想，立功表模，区干部带头影响，一方面发动群众督促推动，老村干大部分是可以得到改造的。

在老村干当中，还有个别的品质很坏，欺压群众，实质上已成为地主反动分子之爪牙，以及有的在敌人到来〔时〕，投敌叛变，主动向地主投降，出卖群众，帮助倒地倒粮者，他们已成为群众之敌人。对此不能以老村干看待，应当坚决的当成“石头”搬去，不应犹豫。

目前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果实及土地的分配是填平补齐的精神，政策是中间不动两头动。这一运动代表着广大农民的要求，尤其是广大无地少地的贫农要求更为迫切，贫农阶层将必然表现得胆大，顾忌少，最积极，要求彻底。因此，要使这一运动能够真正深入彻底的执行，必须充分发动贫农不可。濮阳、昆吾两县在执行此一运动过程中，均深深体会到发动贫农的必要。在过去民主民生斗争中，由于当时的斗争性质，尚不能满足贫农的土地及发财的要求，因此常有极贫的群众对运动的参加抱消沉态度，因而至今还有不少的贫农、赤贫关在农会大门以外，因为领导上以“穷顽固”看待。而在会内的贫农，亦在果实有限或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积极性不高。但他们目前却正是要地要粮最迫切的，他们的态度是“只要能填平他们，一切都不顾忌”。而中农（新升中农亦然），虽然是彻底的土地改革对他们有利而没害的，他们也赞成此运动，但另一方面亦有对敌人的顾忌，因此他们的表现比较贫农犹豫，对地主之清算不彻底。另一方面，果实的分配精神为填平补齐，穷贫多分，如果穷贫农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动，此精神亦难贯彻下去。因此，运动过程中必须坚决的把贫农充分发动起来，并应从运动中及时发现积极分子，让其积极参加这一运动的领导，与老村干结合起来。不少村庄贫农之代表

（积极分子）参加评议会，或是老村干、新的贫农积极分子组成一个集团，一揽子领导（这个集团由于贫农的参加，即可推动老村干的积极性），或是共同组成土地还家会（委员会），都是很好的创造，应当发挥。

坚决的改造、争取老村干，坚决充分的发动贫农，是我们在此次土地还家运动中，发动与组织多数群众，变成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并求得此运动能彻底的开展下去的两个重要问题（没有村干的改造、中农的参加，贫农单独难以形成大规模的运动）。至于此次两方面，哪个重要，哪先哪后，则不应机械，应看具体情况、火候，但两方面都应在运动过程中得到解决。如当前我们大部分村庄，是在打通老村干思想，使其带领群众开始行动起来，但仍极不彻底。目前则应大力来发动贫农，并发挥其积极性，以推动领导，推进运动。有些地区，村干部一时思想打不通，而贫农要求迫切，我们也不能机械等着村干部，亦可先组织与发动要地要粮，敢干愿干的群众先起来，再争取村干一齐前进。在边沿区或过去敌人进攻下我村组织被打散之地区，目前敌人威胁大，村干不敢先领头，我们也不一定采取叫村干领头的办法，我们可以直接的（用合法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把群众□起来，开大会，上大课，我们带头干。群众从行动中情绪高了，新的积极分子涌现了，老村干恐惧的心理也就减少了，自然也会干起来的。

## 自上而下的撑腰要与群众自觉的结合

此次运动中，各地均适当的运用了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用行政及合法的方式为群众“搬石头”、撑腰，给群众壮胆，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回想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组织，是有很大的片面性。根本□□我们工作的及行政的力量，对群众的翻身应当而且能够起他的一定的作用。“把群众自己的运动”当作是不应有上

边的配合与支持的，不应有干部的公开的领导与发□。因此，过去一方〔面〕喊着大胆放手，大规模的去干，另一方面却依然拘泥于小手小脚、单纯的自下而上、地下党的工作方式，政权被排斥的伸不进手去，有力无处用。干部公开出面，□□代替包办了群众，因而让干部站到群众背后，站到群众之外，装得〔若〕无其事，有些地方就发展成了自流、放任与尾巴。

群众愿意要地要粮，但有地主反动分子的统治、监视，群众不敢动，想翻身翻不起来。我们应当把压在群众身上的"石头"搬了，□群众就会马上起来。虽然"石头"先是我们用上层力量搬的，还不是用群众自己的力量，但只要群众一起来，组织行动，信心及勇气就会增强的。过去我们的作法，是明看"石头"压着群众起不来，群众要求我们"搬石头"，我们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不能包办。"硬让群众去办，有的固然是自己起来了，但不少因此□□打不开局面，成为习气，群众也就更加无有信心，消沉了。现在大家都体会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群众起来的障碍("石头")我们搬去后，不是对群众起了限制与包办的作用，而是起了对群众起来的启发、信心勇气的鼓舞，它的作用是更加速的使群众行动起来。有的地区号召群众的同时，一方〔面〕是广泛号召群众翻身，一方〔面〕对封建统治反动分子以行政力量给予打击、限制(悔过所、扣留坏分子)，群众情绪就会高起来的。

群众愿起来，但有的不敢突出去当头，"要干大家一齐来"。群众信心不强时，愿叫我们干部在前边领着，大家觉得有□□，这在过去也是不允许的。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工作都常说干部应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唯独群众翻身我们不带头。有些村子群众已经酝酿要干了，背后干部动员鼓动，说大话，但真干时，干部却躲在一边了。干部是因为上边怕包办、代替群众，但群众却认为背后说大话，到时候你却躲起来，新涌出的积极分子，也会产生顾忌。其实现在证明了：群众要求我们带头时，我们就勇

敢的带头，群众行动起来，胆量一大，积极分子自己敢领头了，这比群众要我们领着一齐干，我们自己偏偏躲在黑影里，硬推群众自己去，好像故意与群众为难一样要好的多。

群众行动，害怕孤立，要干大家一齐干，人愈多，勇气胆量愈大。过去我们的办法是从下而上，一个人一个人的秘密串通，这样，时间常常拉的很长，地主从中极力破坏，先起来活动□□□□□，有的在□□，□□话下中途就消极了。这一套办法是过去地下党的工作方式，偷偷摸摸的，不善于运用公开合法的大规模的工作方式。目前不少地区，不是单纯的自下而上的干或秘密鼓动，而是开大会、□□思想等，公开号召、上大课等，要群众喊口号，造成空气，环境促进农民思想变化。不少地区也不是采取秘密的从下边一个人一个人串通，而是大□包办的环境，□□□□□□受训，□回去村村点火。阳谷的新创造，把中农贫农大集合，地主不能来，□后撤出去，叫做农民大会，农民由分散的集□起来，但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串通起来的，是我们集到一起的。农民集起开大会，上大课，思想有了转变，看到人多力量大，互相发动，情绪就热火朝天了。这个方式很好，各地可根据情况运动。

在我区这一新的领导方式，仅是开始被采用。由于我们过去小手小脚地下党的工作方式已经积久成习，要彻底转变，还须要□□广为提倡，因此今后仍应强调大胆放手、大手大脚、雷厉风行的作风，坚决从过去的偷偷摸摸、小手小脚的作风的圈子里解放出来。在转变当中，某些小的缺点，不应大惊小怪。在会议讨论中，已有不少同志提出，上层的撑腰总有和群众结合不起来的现象发生，有的提出“撑腰过火了”，有的提出今后不应再强调撑腰及带头“搬石头”了。这里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我们运用行政力量，撑腰带头、自上而下、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是建筑在群众需要上，是为群众服务，不能了解成是命令强迫群众。群众

的需要是具体的，是逐渐变化的，因此要给群众撑腰、“搬石头”，就〔要〕了解群众当前的具体要求及障碍群众当前行动的“石头”是什么，不了解此去硬搬、硬撑，显然是不能得到好的结果的。群众已自己能解决事情，我们再去代替，就会限制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因此，是正确运用的问题。

另外，在群众的行动中，还必须注意对群众的阶级教育，步步提高群众的自觉性。这一点是发动群众中极重要的，但应结合行动去进行，要会抓紧火候，在每一个环节打通农民的思想关键，推动运动提高一步。这一点各地亦有创造，如有的先在群众中酝酿诉苦、追穷根，引导到要地要粮；有的先抓住农民的要地要粮的迫切要求行动起来，地主哭脸，再追穷根，说明土地还家合理合法，才理直气壮。追地主浮财是激烈的斗争，必须打通农民思想，认识到地主过去的剥削，过去的一切东西都是群众的，才不致于袒护地主。由分地分粮到政治上与地主揭脸讲理，也是提高一步。有的提出不仅翻身，而且翻心；有的提出要与地主讲理，说倒他，才能理直气壮。总之在行动过程中，要逐步的解决“追穷根”、“土地还家合理合法”、“天下农民是一家”、“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翻身要彻底，必须打老蒋”、“不但分田，而且保田”等思想，使农民不仅在经济上得到翻身，而且政治上自觉，旧思想的逐步觉悟，同时就推动了运动（行动）的提高。行动中会提高农民的，但行动的提高，必须有农民的觉悟作基础。

## 浮财土地一揽子干下去

汇报中，几个县的群众都是先从清算地主的浮财开始的，但地主却事前发觉了，浮财皆已经隐蔽或转移了一些，群众先搞地主浮财，常只能先清算出表面一部分，如要彻底，则必须转上追

浮财。

追浮财是斗争比较激烈的，个别村还才转上去，但大部分村庄要叫马上转上追浮财则是很勉强的。长垣看到了这情况，就提出继续分田分麦子，群众情绪就一直热下去了。有的地区，领导上事前有一个框子，想划分阶段，浮财搞彻底再搞土地。□□群众搞了表面浮财后，马上不愿激烈的追浮财，想继续分土地，领导上一定要把浮财搞彻底，强迫转上追，有些地区群众就消沉了一段。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在整个土地还家运动中，土地、浮财，一律彻底，但执行中应是逐步的，跟着群众要求的，不一定这个彻底后再搞那个，可以浮财土地一揽子干下去，群众要求什么搞什么，以后啥不彻底再搞啥。事先预定，浮财彻底后再去分地，是会限制群众的。

## 立功选模　村村竞赛

昆吾布置土地改革后，总结了半年的工作，选举半年来战勤及游击战争中的英雄模范，个别表现很坏的当场予以处分。好的、坏的皆写到县制定的功劳簿上，领导上表明今后赏罚要严明的态度。这样一来，感动了英雄模范（有的感到党如此表扬自己，竟而流泪），刺激了一般的干部。县即在此基础上号召在土地改革中立功，有过的改过立功。这一精神直贯彻到村积极分子，为人民立功、□功□的空气在全县上下均很浓厚。区与区发动了竞赛，全县干部精神皆饱满高涨。

濮阳在开展〔学习〕夏村屏运动下，表扬了战斗英雄之后，干部情绪亦很高涨。这一新的领导思想及领导方法的转变，是很好的，深值各地学习。

# 冀鲁豫区王、张、张、刘、赵关于扩兵、土地改革等问题给薄一波同志的信*

（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

一波同志：

决定河南河北暂不分后，区党委把今后工作讨论了一下，在工作方面主要的有五个问题：（1）扩兵问题；（2）黄河问题；（3）土地改革问题；（4）游击战争问题；（5）财经问题。兹分述如下：

一、中央局在广平开会时，对冀鲁豫工作指示"翻过身来争取主动"是完全对的。过去工作的困难，是在土地改革落后一步的情况下执行庞大的战勤任务，及在环境动荡、大军进退不定的情况下，扩军各种工作处于被动硬干情况中，因而成绩不大。旧债未清，也就直不起腰来。

经多半年来之摸索，各级同志的努力，目前情况是黄河南的游击战争站住了脚，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口号逐渐成为事实，战争与土改进一步地结合起来。在黄河北，四分区大部为游击战争区，六、八分区全部，二分区一部（3个县）的土地改革大部告一段落，大部分配了土地，有的还分配了浮财。工作关键在于继续深入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充分发动群众。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上)第283—285页。王、张、张、刘、赵即王秉璋、张霖之、张玺、刘致远、赵健民同志。

在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争取从被动的泥窝中跳出来，翻过山头争取主动。这亦是中央局前次指示主要精神。在我们主力一时不能过黄河出击又需扩兵补充纵队的情况下，经区党委讨论，一致认为目前及将来主要被动困难的一环，是武装斗争问题。因为过去扩兵成绩不大，扩大的数目不能满足纵队及军区兵团（主要为独立旅）要求，军直武装的不够（数量）及缺乏拳头（独立旅人数很少），形成在游击战争中的被动地位，及对纵队补充不够而带来的被迫扩兵的状态。为克服目前及将来在这一方面的被动，目前黄河北土地改革告一段落的各县4月份的工作，是全副精力用在扩兵上，争取大大超过8000人的原定计划，争取对纵队补充的主动，及补充独立旅〔使之〕成为坚持游击战争中的拳头，由扩兵工作的主动（超过计划）逐渐争取全面工作的主动。为了塞住部队大批逃亡减员而牵连到地方工作（部队人数少或逃亡多，要求搞归队或扩兵的被动现象），在扩兵结束后来一次（7天到10天）严格的较大规模的归队运动。如扩兵与归队工作能搞到一万三四千人时，我们的工作就可部分主动了，否则，还要被动一个时期（只有纵队的补充，独立旅没有补充，斗争中就无拳头）。

5月份将以每天3万人到4万人修黄河(主要搞北面)，详情由化云谈。深入土地改革工作预定从5月起（修河每天3万人到4万人影响不大）到11月为中心工作（把战勤作为一般工作）。在这一期深入土地改革中强调支部工作，发展党员，加强支部党员的训练等，及各种组织的建立与加强，使农村走向战斗化、组织化。

在黄河南除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外，强调了挖地洞（五分区已有二三个县在挖）及爆破工作及分区的武装建设（大力充实分区现有的团）。

在工作作风思想情况〔方面〕，主要是：（1）狭隘经验主

义作祟，对外区经验及上级指示接受重视研究不够，不是亲身经过不相信，而对上级文件重视不够，使工作走些弯路，不能很快地提高。（2）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较重，思想斗争不开展，组织观念薄弱，不少的人服从抽象的组织，反对领导他的具体人，把组织与〔个〕人完全分开，减少了党的统一及力量。

克服以上不好的作风及思想问题，除注意加强经常教育外，为了有效地克服，我们准备组织参观团（县以上的干部）分别到山东及太行参观，开开干部的眼界。在反对自由主义〔方面〕是找出这种典型（不少）进行斗争，做成决议提到一般（各单位又是具体的）。

财经工作只知亏空很大，这次未讨论，不述。以上问题请指示。

王、张、张、刘、赵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培养与使用妇女干部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一）自抗战以来，特别自发动群众以来，我们培养和提拔了大批妇女干部，这是我们很大的成绩。她们在抗战八年敌后艰苦的斗争中，在领导群众翻身的斗争中，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人口半数的妇女联系着，并成为群众领袖，这对今后革命事业尤其对妇女解放事业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当前在"耕者有其田"的新精神下，农民翻身运动必然形成高潮。在农民翻身运动的高潮中，随着来一个比较广泛的妇女翻身运动。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需要有大批的妇女干部参加领导，以发挥其积极性与创造性。但是目前妇女干部的现状，有的已经转业，有的不关心妇女工作，不愿做妇女工作的现象比较普遍，以致在许多团体的领导机关中缺少妇女干部，使我们工作受到损失。为什么形成以上的现象呢？我们认为：

首先，由于八年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与妇女的生理关系，造成妇女干部身体多病，再加结婚生育等原因，使妇女干部减少了工作时间，影响了自己的进步。这一方面造成了妇女干部自己的不安、苦闷、痛苦，同时另一方面，也使一般同志感到妇女干部工作少，进步不快等。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妇女干部情绪不高。

---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上）第407—409页。

其次，妇女运动一般的是在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开展，这是我们几年来得到并证实了的经验。但是过去我们无此经验，一般的强调了妇女运动的独立性（青年亦如此）。实际上，当农民未翻身，觉悟未提高时，自然不让自己的妇女出来参加妇会。所以妇女运动独立进行，往往只是形式的，不能形成真正的妇女翻身运动。由于妇运不开展，一方面影响妇女干部的情绪，一方面妇女干部又感到党委和联合会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这是过去的一般反映）。而党委和联合会则感到妇女工作有些闹独立性（这也是过去的一般反映），以致在领导关系上多少有些不协调，这也影响到妇女干部的情绪。

再次，由于领导上对妇女干部的关心、爱护、培养、使用不够，特别在使用上不够大胆，如一般的反映由于妇女干部多病及生育等，妇女干部做不了什么工作，妇女干部注意小事，妇女干部进步不快等而不敢大胆使用，所以在边区，妇女干部参加党委、参加政权做负责工作者很少。这自然使妇女干部感到政治地位不高，党不能体贴自己的痛苦，感到无前途而苦闷不满。

（二）为了纠正以上偏向，今后对妇女干部的提拔使用特提出以下意见，望各级党委研究执行：

甲、从思想上转变对妇女干部的观点，对典型的好的妇女干部要大胆提拔使用，对个别不进步的应采取积极善意的教育态度，克服其弱点，帮助其进步。各级党委，尤其是党的组织部门，应主动地有计划地多从政治上、工作上关心妇女干部，从她们目前的具体情况出发，提高其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要多从积极方面去帮助启发教育她们，不要只是消极地批评、放任。

乙、大胆提拔使用妇女干部，要在政治待遇上适当照顾，根据妇女干部条件，将妇女干部配备在适当工作岗位上，以发挥其积极性。因此，应根据德才资各方面条件，大胆吸收她们参加各级党委会，参加各级政权及其他部门工作。至于妇女干部适于做

党务工作、联合会负责者，亦应大胆使用，但须在党内酝酿成熟，配备适当。

丙、目前边区现有妇女干部做群众工作者为数不多，远赶不上工作发展的需要。为开展妇女运动，在一般情形下妇女干部仍做妇女工作。特别指出在此次土地改革、群众大翻身的运动中，妇女干部必须参加，并将各级群众团体中妇干配备起来，以便在此次群运中加强妇会工作。另外应有计划地在群运中提拔一批农村妇女中的积极分子，加以培养教育。在城市中也应大力争取一批知识妇女参加革命工作，这对今后开展妇女运动有极重要的意义。

丁、关于妇女干部的疾病生育等，应很好地照顾，对其困难应尽量设法解决，以求在这一方面减少妇女干部的顾虑与困难。

在执行以上指示中有何意见与反映，希随时报告区党委组织部。

# 让农民自己做主
# 彻底消灭地主阶级*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

周　惠

## 一年来的大概成果

我们区的土改运动，从去年7、8月接到中央“五四”指示以后，到现在已经是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当中，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是得到不少成绩的。我们努力的结果，如果拿比较简单的话概括起来说，是初步的击伤了地主阶级，贫农初步的收回了一批土地，以及初步的发动和组织了群众。这就是我们一年努力的收获，这样一个收获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根据武城、故城、清河、平原、高唐、恩县、夏津7个县1394个村的统计，农民收入土地227140.54亩。另外又根据全分区6个县（缺故城）963个村统计，农民收入房屋20188间，各种资产折款167520397元。照这个调查做推算估计，全分区农民收回土地约在46万亩左右，收回房屋约在6万间左右，收回的各种资财约在5亿元左右。至于农村土地分配的情况，根据夏津、恩县、武城、故城、清河5县82个村统计，一般的有如下变动：

地主：1706人，土改前占有土地17528.75亩，平均每人10.27

* 本文系周惠同志1947年8月7日在中共聊城县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亩；现在地主尚有土地7172.76亩，平均每人还有4.1亩。过去与现在来比较每人减少6.17亩。

富农：3809人，土改前占土地30048.72亩，平均每人7.9亩弱；现在富农尚拥有土地18895.7亩，平均每人5亩。如果同从前来比较，每人减少2.9亩。

中农：未有统计，一般变动不大。

贫农：24089人，土改前仅有土地45792.93亩，平均每人1.9亩；现在有土地64939.96亩，平均每人2.7亩。比过去每人增加土地0.8亩。

以上是农村经济情况的大概变化。

二、根据武城、平原、高唐、恩县4个县710个村统计，共斗争5241个对象（户）。在这里边包括的成份：地主1097户，占全被斗户22.3%；富农2518户，占全被斗户47%弱；中农1472户，比例是27.2%；贫农154户，比例是2.9%弱。这一群人，一般说来，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封建统治或主或次、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代表人物，受他们压迫的农民起来清算了他们。清算结果，一般说把他们在农村里推下了公开合法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农民自己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开始建立了农村革命的统治。根据武、清、故、高、恩、平原6个县1350个村统计，农会、民兵、妇女、儿童团的组织人数有265449人，这些村庄的总人口是576658人，组织起来的人口占总人数的46%强。根据这个比例推算，全分区有组织人口约有635815人，另外还有很多翻身的农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最近全分区7个县的统计，有党员17305人，与去年相比较，一年来增加了8227个党员，将近一倍的发展。上边所说的这些组织，一般说都是从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同时又立即回到斗争里初步得到锻炼。所以应该这样说：地主在农村公开合法的统治地位一般是被推下台来，农民开始走上了统治地位，农会有了地位。村里的群众有了红白喜事，一般

是请农会主任，不像从前去找地主老爷了。

上述这些就是农村政治情况的变化。

三、群众在思想上也有了很大变化，特别在日本投降以后的新解放区看的更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群众因为受了敌、伪、顽的欺骗宣传影响，所以在刚解放时他们还存在有害怕与怀疑的情绪，如在高、平群众怕共产共妻、扭秧歌等等。但这个思想存在的并不久，群众看到我们的实际行动并不坏，进一步反而觉得我们好。但这时又存在着怕我们站不长的思想。经过一年的变化，我们力量的增长，群众更进一步了解我们，说我们“有一帝”的希望，并且开始认识到我们是为群众谋福利的、领导农民翻身的。如有的群众说，八路向穷人，八路比他爹还好。

其次，群众对阶级斗争思想随着前面的思想变化，也有很大进步。最初不敢斗争，即便斗也看作是八路的公事，直到群众对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说是到斗争的年头了，“兴斗争”了。由此又进了一步，一般认识到是该斗争、该翻身了。我们目前正是处在群众运动的这个思想情况下。

总起来看，农民的政治思想，从他们实际比较与对我们一年的考验中，开始认识到我们是为人民办事的，〔是〕穷人翻身的领导者；开始认识到我们比那些旧的好的多，但我们必须看到这还仅仅是开始，在阶级斗争中也仅仅是开始，体验到应该翻身、也能够翻身，但农民在阶级思想上还并没有与地主完全破裂。

这就是群众思想变化的大概情况。

由于以上因素，党与群众关系上进步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是提高了。一年来，我们补充了近万名战士，动员了236384个农夫出征，交纳440106.18斤公粮（6个县的统计，缺武城），破获了特务案件100多起，包括2000多人，巩固保卫了后方。总之，过去一年我们胜利的完成各项任务。如果没有广大翻身农民的觉悟、拥护与支持，这些任务的完成是不可能的。以上就是我

们一年来的大概成果。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们仅是初步击伤了地主，贫农仅是初步收回一批土地，群众初步的发动，距离完成土地革命这个大目标还很远，所以还谈不上什么“基本”，更谈不到“彻底”。我们应该也必须这样估计，这样估计是比较客观虚心的，这对今后工作是有好处的。那么，根据同志们的汇报，我们觉得不彻底的现象，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主〔阶级〕在各方面一般的仅是受到或轻或重的击伤，还没做到彻底消灭。在土地上还普遍的留地过多，根据夏津、恩县、武城、清河、故城5县82个村的调查，地主还平均留地4.1亩强，并且多半还是好地；根据同一调查，贫农仅补到2.7亩弱，地质根本不如地主。

另外，还有少数的地主干属、军属的土地在斗争中没有什么变动。根据清河8个土地比较集中的村的调查，有地主46户，富农54户，共100户。在100户当中干属军属占8户，村干党员12户，共20户，占20%。在屡次复查斗争中，都没动着他们。对地主的房屋、浮资财，在我们这个分区没有怎么搞（搞的是少数村庄）。如果对此不能清算的话，就谈不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也谈不到满足群众经济要求。至于地主在政治上更没有向农民屈服，还在想种种办法隐蔽土地、财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隐蔽财产并非从今天开始，也不是从去年开始，是从多年以前就开始，因为他们早就听说红军要共产，投机取巧的打入我们机关、部队，保护他们的财产，打击农民，利用金钱美女来腐化干部积极分子，来拉拢荣退军人、抗属，挑拨各方面的关系。利用抗属、荣退军人等镇压农民、打击群众，甚至阴谋复辟，组织暗杀，组织暴动。这些具体例子各地都有，在这里不一一详说了。

二、群众发动的还不普遍、不充分。群众组织一般的刚达到全分区人口45%左右。根据恩、夏两个县8个村的调查，群众能够

组织到75%左右，我们距这个目标还差30%左右，也即说还有30万左右能组织起来的群众还没组织起来；至于党的数量也还很少，特别是农民的思想觉悟，还必须进一步去提高。农民过去非常怕变天，变到现在，认为“八路有一帝”，能站长，由不敢斗争变到敢同地主斗争，这是农民思想上一个不小的进步。但这还仅是农民思想上初步觉悟，还必须进一步让农民认识地主就是罪恶，明确阶级界限，与地主从各方面彻底决裂，否则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是不可能的。思想觉悟问题，不但是群众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领导思想与干部思想问题，如果我们不明确这个问题，彻底消灭地主更是谈不到的。

三、果实的分配。我们不是完全按赤贫、贫农所要求的公平合理的先填平、后补齐的办法，有的是按会内外积极程度、功劳大小等等办法。这样分法的结果，使村干、民兵、积极分子以及中农多得了果实，相反满足不了贫农的要求，而且还有不少一部分积极分子、干部——不仅是村干，而且包括脱离生产的干部以及机关部队的机关生产等——贪污果实、窃取果实，甚至霸占果实。因此，贫农得的果实就更少了，这个问题带有相当普遍性，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问题是土改不彻底的很重要一个表现，是改善干群关系实际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我们今后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普遍充分发动群众的重要关键，必须用严肃的态度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群众要求重分，我们就不惜重分，答复群众要求。

总起来说，一年来土改成果与现状就是这样初步击伤了地主，群众初步收回了一部土地，初步组织了群众，距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完成土地革命，还有很大一段路程，必须接受经验，继续努力。

# 回忆与体验

一、过去一年土地改革中，我们往往把成绩估计过高。于是产生麻痹自满，也就是自然的放松了这个历史任务的坚持和贯彻。回想起来我们实际执行中央“五四”指示仅是去年秋冬之间两三个月的时间。去年参军将结束的时候，地委曾发过一个指示说：土地改革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要展开大检查与准备大生产。参军结束后直到今春，虽然还在搞检查运动，但由于思想上已经存在着基本完成的自满情绪，所以在大检查中，就没怎么搞起来。为什么我们往往把成绩估计过高，产生麻痹自满呢？

第一、把土地改革看成太简单太容易的事。对于土改任务的历史重要意义认识不够，认为三几个月刮阵大风就可以解决问题，或“基本上解决问题”，不了解地主对农民有着几千年的统治历史，农民也有几千年的被统治历史，不了解这个斗争的艰苦复杂，没深刻体验到把几千年被统治的农民发动起来，还要把统治几千年的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决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第二、我们缺乏亲自动手与深入检查。没有很好的了解情况，有时把表面现象看成本质，把局部成绩看成全面，或者只按几个不精确的数字、百分比，就过高的估计了成绩，作成肯定的结论。

第三、怕落后于人。看到别的分区或听到别人说基本完成了，转入大生产了，就觉得自己已显得落后。于是牵强附会，找些数目字、局部现象也就来个估计、结论：我们也基本上完成了，或者说再过几个月也就基本上完成了，结果自己骗了自己。

那么，今后怎样纠正这个问题呢？

第一、在思想上必须认识土改是复杂艰苦的任务。宁看难些不要看得太容易了；宁看大了，不要看小了；宁看重了，不要

看轻了；宁可把时间打算的长一些，不要以为三两个月突击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第二、一定要反对官僚主义，力行亲自动手，深入检查。估计成绩或决定工作的时候，必须依具体数字和各种实际的事例。

第三、一定要在每个工作的阶段结束时照例来一次反对“估计过高”、反对“差不多”。

因为自满情绪在每次工作告一段落时，就要抬头就要发生，所以一定要为此加以警惕和积极纠正。

二、过去一年当中，我们总是怕把地主搞翻了不得了，怕特务杀人，怕暴动，怕封建头子惹不起，怕赤白对立。因为这样害怕，就不得不小心翼翼，束手束脚，就形成先照顾地主后照顾群众了。同样也就放任了特务杀我们，而我们还在“仁至义尽”，“教育释放”，无原则的宽大，这些问题虽然逐步求得纠正，但还未得到彻底解决。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因为我们看不到群众力量，夸大了地主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深刻的认识到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地主阶级如果没有群众力量的镇压，没有群众的发动，那我们越害怕迁就，其结果就必定越会搞翻，越会杀我们。这是右倾的错误。

第二、因为我们对贫苦农民的痛苦、贫困、冤仇体会不深刻，不是切肤之痛，再加上右倾害怕，于是就把农民的利害、苦主的利害放在后边，把照顾地主“宽大争取”放在前边了。

今后怎么办呢？

第一、一定不要怕翻。越怕越不行。地主如果要翻，如果要反对，那就一定要镇压，决不犹豫害怕，畏缩不前。

第二、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解决农民问题。一定要在地主完全屈服于农民之下的情况下，才留给以最后生活。

第三、对于反动地主，一定要坚决镇压。不投降，闹反动，就坚决消灭之。对于投降、妥协、屈服于群众的地主应予以生路，

不可不分好坏的"一边赶"。

三、果实分配是个大问题。如解决不好，群众内部就要出问题，干群就要不团结。内部出了乱子，当然敌人就消灭不了。我们必须认识，农民不顾一切的坚决的进行斗争，基本上是为了果实。过去一年我们对此问题注意不够，没完全解决好，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因为我们对中央"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认识不足。"五四"指示的精神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我们分配果实，没有在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大目标下来进行。同时领导思想上对贫农痛苦生活体会不深刻，因此在分果实办法上就出了问题。

第二、村里的领导成份，贫农没形成骨干，不占优势。贫农的要求呼声不能成为决定的意见，我们多半光接近少数村子，听不到更多群众的意见。

第三、分果实问题没通过广大群众去讨论，去民主决定。

今后怎么办呢？

第一、一定要明确今天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要以高度满足贫农要求为出发点，要彻底实行先填平、后补齐的填补方法。

第二、要树立贫雇农领导骨干。分配果实先经贫农讨论出统一意见，然后再交到包括中农的农会去讨论，以及全体农民的讨论通过。

第三、分配果实的时间方法等，都要由群众自己民主讨论决定。

四、在中农问题上，过去一年土改中，我们每次土改会议上都照例的强调了不斗争中农，并且强调了分给中农果实，以达团结中农之目的。但问题解决了没有呢？还是没完全解决，中农对我们还有两种反映：

一种是害怕斗争，怕割韭菜。为什么呢？

第一、中农对我们的政策不完全了解，我们对中农的教育工作很不够。

第二、因为我们斗了一些中农阶层的罪恶分子，使他们受了一些影响。

第三、因为我们错误的斗了一些中农。为什么错误的斗了一些中农呢？

1、因为我们没很好的给群众撑腰，放手让群众狠狠斗地主。因此有的害怕地主（我们束缚群众手脚是很重要原因），不敢斗，于是"吃柿子拣软的捏"，结果斗了中农。有的因为对地主斗的不彻底，没有满足群众要求，于是又斗到中农头上来了。

2、有些地主坏分子故意操纵斗中农。

另外，中农还有一种反映说："白忙了一顿，分的果实少了，杀人白落两手血"等。我们听到这个反映，于是我们迁就了，但迁就的结果，他们仍是有点不满，仍对斗争不积极，或擅自窃取果实。

为什么中农还会有这两种反映呢？

第一、因为我们对中农没好好的进行教育，使他们都了解我们保护中农的态度，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地主是咱们的共同敌人，中贫农是自己人，翻身一定大家都翻身，果实应该先让赤贫农分，赤贫、贫农应该多分，否则大家不能都翻身，地主〔阶级〕消灭不了。

第二、因为对地主斗的不狠。没从各方面狠狠的把地主打倒在地，还有一定力量，还有条件能够挑拨动摇中农与贫农的关系。

第三、因贫农没形成骨干的优势力量。

这就是中农问题上的两个基本情况，因此今后应当：

第一、必须坚决的狠狠的打倒地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不侵犯中农利益。至于斗争中农阶层中的个别罪恶分子，那就不

是对中农的问题了。

第二、必须把雇贫农形成骨干的优势力量。

第三、必须与中农说清楚我们的政策与态度。加强对于中农的教育工作，并在斗争中始终吸收中农全部参加。

五、经过去年一年的土地改革，我们初步的发动和组织了60多万群众，但是尚有数达30万左右的群众没有参加组织，还有不少数量的群众站在这运动的外面，成了所谓“落后分子”。有的因为领导成份不好、做事不公而对干部不满，不愿参加运动；有的因被地主长期统治愚弄，感到穷人没出头的日子，而对翻身没有勇气，对我们领导翻身有点不相信；有的认为穷富命定，不如死受终身；有的因与地主有长期的历史关系，情面难撕；有的受到地主小恩小惠的欺骗太深。我们过去对于这些人的发动是非常注意不够的，对于他们了解是非常少的，但是这些人如果不能充分的发动起来，地主阶级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这些人是地主的防空洞。今后怎么发动这些人呢？

第一、首先在领导干部思想上要十分重视这些人的发动。这些人是最受压迫剥削的，这些人发动不起来，我们就不能充分普遍的发动群众，就不能彻底消灭地主〔阶级〕。

第二、必须深入的接近这些人，耐心的去了解他们的心思和要求。他们有着特殊的思想习惯，不大好出头露面，不大敢说话，整天闷着头受苦。我们必须按照他们的思想和要求，耐心的进行启发教育，方式可采用个别以至集体来进行集训，由他们彼此诉苦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应教育改造做事不公的村干，〔让他们〕向这些群众承认错误。我们能否发动这些人，就看我们能否接近这些人，了解他们，教育他们。简单、急躁、厌恶，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明确这些人因为受的压迫太深，所以顾虑很多，只要我们解决了他们切身利益，他们的斗争性是非常积极坚决的。

第三、必须深入到这一部分人中去发现培养不同的比较积极的分子，作为桥梁，经过他们再来发动更多的人。单依靠我们去接近教育他们是必须的，但效果是很有限的，还必须通过他们，使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因为他们对这一类型的人状况了解得更加深刻。

第四、落后区与落后村。发动落后区首先应以优势的武装肃清特务分子，及时镇压与特务有联系的隐藏分子，解除群众恐怖。对直接当特务的家庭控制起来，在这种地区也要集中力量抓住重点。落后村一般的有三种。一种是穷小村，对这类村应有意识的去发动，吸收他们参加联合斗争。移民倒地的办法均可采用，但必须根据双方关系进行很好的教育，打通思想。二种是中农占优势，斗争不带劲的村。对这类村主要是改造中农领导问题，可采取“个别下台与个别上台”的办法，加强贫中团结教育，树立贫雇农优势。三种是封建势力操纵的村。对这类村可配合行政力量让他们“一齐下台”，追他们的后台老板，树立起贫雇“一齐上台”的领导骨干，摧垮封建统治。

六、以上所谈许多问题，差不多都联系到一个问题，即以真正从事劳动的雇贫农为领导骨干的问题。因为雇贫农最贫苦、最受压迫和剥削，斗争地主最坚决，消灭地主〔阶级〕必须紧紧依靠他们，任何人是代替不了的。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一年我们是多少走了弯路的。在中央“五四”指示以前曾经搞过一段雇佃贫的独立运动，其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强调树立雇佃贫的领导骨干，一个是先雇佃后中农。树立雇佃贫的领导骨干是对的，但分成先雇佃后中农的阶段是不对的，我们曾经吃了亏，使雇佃贫陷于孤立。当时地主杀了我们不少人，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央“五四”指示以后，我们又强调团结中农，而又把雇佃贫领导骨干模模糊糊的放松了。究竟怎样树立雇贫农骨干呢？

第一、一定要把雇贫农形成一个组织力量。以贫雇农会议或贫雇农小组的形式形成农会的骨干，重要问题要先经过他们讨论，然后由他们分头去说服团结中农，在包括中农的整个农会中去讨论。

第二、树立贫雇农骨干，一定要与团结中农同时进行，不能分阶段，也不需要分阶段，以雇贫农为骨干，吸收中农共同组织农会。在斗争中从头到尾要吸收中农全部参加，绝不能因强调雇贫农为骨干而对中农排挤，那样做就是"左"倾错误。

第三、村领导成份，要以雇贫农为主吸收中农共同参加领导。无论新老地区，如果不适合这个情况的，一定要想法加以改造提高，否则地主〔阶级〕是不会被彻底消灭的。怎样去改造提高呢？

1、首先在我们领导上一定要弄清我们是改造提高的方针。既不是简单的"一脚踢开"，也不是"原封不动"的迁就姑息，这并不是调和，而是严肃的依靠群众，根据群众意见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正确的办法。

2、对于那些老村干，可以也必须让他们去追功诉苦。我们要求承认他过去的功劳，在追功诉苦之后，要继之深入查阶级、查思想的教育，要他们站到阶级上来，把阶级觉悟提高一步，站稳贫农立场，进一步为人民立功，否则群众不拥护，我们没办法。

3、一定要在群运中让群众自己选择监视［督］自己的领袖，群众行动就是考验我们的试场。如果群众不拥护，一定取决于群众的意见，但是即使有些干部受群众考试落了榜，我们领导上也绝不能采取落井下石的态度，仍应进行教育、改造，争取他们再为人民办事。

七、干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各种问题都要经过干部与群众发生关系。在去年一年土改中曾经出现了不少的好

干部，党依靠了他们，使党的事业、群众事业有了很大收获。我们对立功表模作的不好，未有及时把这些人进行表扬，因而在我们干部当中还缺乏旗帜。这些旗帜不是没有，而是没有注意发现而把他树立起来。但是还有些干部因出身、锻炼、思想觉悟不同，甚至因为品质不好，也反映了些不好的、很坏的东西，例如对于土改不满意，站在运动之外说风凉话，广播运动中的黑暗点，借口业务工作不大愿意或不去做土地改革工作。有的在土改中收买斗争果实，甚至窃取果实变相贪污。还有因为家庭、亲戚朋友等关系而直接或间接的抵抗土地改革等。这些不好的东西是给了我们很大损失的，在今后一定要严肃解决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

第一、首先要打通思想。把问题与大家说明白，让大家联系自己的过去作反省、作讨论，先从思想上去解决问题。

第二、如工作需要，本身锻炼也需要，本岗位工作也允许，能够抽出或抽到实际运动去锻炼的，必须投入实际运动中去锻炼；如果不能专门这样去做，也要在机关附近做。不如此，则不能真正解决思想问题，不能求得进步。

第三、一定要着重立功表模，鼓励同志们继续前进，但必须辅之以必要的纪律。立功表模不等于取消纪律，没有纪律是不能行的。

八、过去一年中我们对妇女没很好的发动，就是做了也很不充分，为什么呢？

第一、对于妇女也是被压迫的农民（不包括地主、富农的妇女），她们也是受的阶级痛苦，她们也要求反对阶级敌人的认识不清楚，在思想上有意无意的还存有“妇女是统一战线”的余毒。

第二、对妇女的作用估计不够。多数人感觉“娘们”没大作用，不知道妇女也是阶级斗争中的一支强大力量，在实际运动中

妇女也同男的一样勇敢，甚至有些地方还要超过男的。妇女不充分发动，是不可能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与充分发动群众的。

第三、咱们各级干部多数还是男的，对妇女问题缺乏切身的深刻的体会，特别是〔对〕贫苦妇女的痛苦就体验的更差。

这三个原因加到一起，因此在去年一年土改中就没有充分及时发动妇女，只是起了陪衬作用。那么今后怎么发动呢？

1、一定要把发动妇女与发动男农民一样去重视，发动妇女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集训贫苦农民也要集训妇女。

2、妇女组织也是阶级的组织，也要按照组织农会一样的精神去组织她们，也要在她们的组织中树立贫雇妇女领导骨干。

3、要吸收贫苦妇女参加土地改革的领导，要特别注意物色、培养、提拔妇女干部。虽然说男人也可发动妇女，但是如果没有相当数量与广大贫苦妇女密切联系的妇女干部，那在充分发动妇女问题上会遇到不少困难的。

九、在发动群众当中、土地改革当中，要注意与生产结合，特别在农忙时期，尤其要紧。过去一年中，我们对这个问题实际存在三个思想情况：一种是有的说农民讨厌斗争了，斗的还不如生产的多，农民对土地没兴趣了，分的地也不好好种，停止斗争进行大生产吧；一种是只要斗争，不管生产，光开会，上边给的中心任务是斗争，管你忙不忙；再一种是坚持土改任务去结合生产。这三种思想中前两种都是错的，第三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认识清楚，没有土地改革就谈不上生产运动。农民不翻身，生产的积极性哪里来呢？但是当农民已经分得土地以后，自然就要搞生产（个别二流子例外），特别在农忙时要求更加迫切。所以说，前一种思想是没有阶级观点的，后一种思想是看不到群众的思想变化与不了解群众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机械的、片面的对上级坚持中心。这在今年高平斗争与生产的实际结合中完全证明，土改与生产的结合是正确的，应该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其次

一个问题就是在发动群众中要与锄奸反特、建立农民武装相结合，也就是说分田与保田相结合。这个问题在过去一年的斗争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得到的惨痛经验是不少的，我们牺牲了500多名村干、积极分子。凡是对这个问题重视处理得好的，我们不但可以避免死人、少死人，而且群众情绪高涨，土改任务也就搞的更好；否则就要死人，土改也就搞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基本上也有三种思想：一种是离开土改去搞锄奸，去搞农民武装；一种是只要土地改革搞起来，锄奸武装不搞也不要紧；再一种就是在土地改革当中为了土改服务而去搞锄奸，搞农民武装。我们说第三种思想是正确的，是合乎农民要求与实际需要的，其他两种都是错误的。

总之，根据过去一年的回忆，我们应该这样明确，土地改革要与生产、要与保卫果实相结合，这种做法是合乎群众要求与斗争需要的。这样做不但不妨碍土地改革，而且能提高群众思想觉悟，推动运动向更高级与更深入发展，对于斗争是有利和必须的，把群众思想由斗争分地提高到发展生产、锄奸、反特与组织武装的更高的政治觉悟。

十、土改运动必须是群众自觉的起来收回土地运动。一定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任何少数人是包办不了的，因此，我们一定放手给以雇贫为主的90%的群众。怎样才能做到放手给90%形成广大群众运动，不被少数人所包办操纵呢？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在领导上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从实际行动当中多创造经验，多和群众商量，细心研究办法。根据过去的经验：

第一、一般的采取大规模的集训、农民会议、积极分子会议、妇女会议等等形式来针对这些人的思想进行深入的教育。经过启发、经过他们自己的讨论，由个别诉苦到小会诉苦，再到大会诉苦。经过互相诉苦，达到使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组织自己的目的。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思想运动，要想掀起广大群众的解放行动是不可能的。领导上一定要不断的引导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及时解除疑虑，引导指明其行动方向，使群众在行动中提出新的问题，再不断的求得解放。从运动开始到无穷尽，必须这样不断的做下去，才能使广大群众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自己组织自己的力量，自己推动自己的解放行动。诉尽群苦，组织群力，发挥群胆，战胜一切。

在各种不同的集体教育和思想酝酿当中，对贫农村干、中农都要有不同的教育内容，但必须贯串着阶级教育、阶级诉苦，以及时事教育。领导上必须抓住农民诉苦会这个重点，形成农民思想运动，在不断的大规模开展农民思想运动的基础上，去不断的推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第二、一定要撑腰，一定要放手。根据群众要求，运用行政力量与群众撑腰。我们要与群众一齐宣誓，放手让农民行动。如果要我们撑腰，那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的答复群众的要求，帮助群众扫除运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决非要我们脱离群众的进行蛮干）。但是要注意，这样做是为让群众大胆去行动，让群众自己去解决问题。只要是90%群众的意见，那就是政策法律，谁也不能干涉，让群众按照自己的政策法律去解放自己。

第三、领导上一定要抓紧重点深入。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点乱子是难免的，问题在于我们随时了解群众思想变化及运动的发展，倾听群众的意见。据此，再以集体形式连续不断的解决群众思想问题，从积极方面纠正运动中的某些偏差，继续引导群众走向新的方向。如此连续不断的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循环下去，普遍的把运动逐步的推向深入。

最后，一定要从我们思想上想通一个顶重要的顶根本的大问题，就是一切都要和群众商量，一切都要按照群众的心理和群众的要求去决定。一切规定、一切经验都要按照群众的思想和要求

的变化去变化。所以我们就必须注意深入群众，特别是所谓落后群众，随时倾听他们的呼声，不要光听少数干部或者少数积极分子的意见，或者光按上级说的、光按上级规定的、片面的硬搬上级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思想上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们一切适合群众思想的东西，便会因时因地活泼创造无穷无尽了。

## 今后方针

根据中间不动两头动（消灭赤贫农、消灭地主、中农不动）和填平补齐的精神，以及我分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情况，我们的方针今后是："让农民自己当家，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满足贫农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深入落后，充分发动群众，一切权力归农会，切实树立贫雇农骨干，团结群众大多数。"这个方针打算在今年半年后坚持实现，同时要在这个中心下面结合生产节约，结合反特务以及其他实在必要的临时工作。在坚持土地改革这个中心的中心任务中，一定要时刻注意结合搞生产和反特。阶级斗争更加深入了，特务必然要更加剧烈的和我们斗争，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更好的加强保卫工作。至于生产，是关系"军需民食"的大事，不能有丝毫的疏忽。我们今年年成比较好，但是秋粮还没进仓，而且有些地方很可能被淹。即便秋收完毕，也决不能存在麻痹自满思想，一定要克服这个思想。在结合大复查当中，一定要及时收秋，收秋以后，一定要按时种麦，并且在上冻以前要普遍发动秋〔茬〕地。如果能把明年春地都翻过来，那明年春耕运动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于村财政的整理也要经常注意，不能疏忽。至于其他临时重要工作，如秋征、沿河防水或者参军等，我们在这里就暂且不都一一说到了。在这个方针下，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加以说明，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指明行动方向，并非划圈束缚群众手脚，也不应把它当成不变的教条，机械

的去执行。

一、地主。首先在领导干部思想上，必须尖锐的认识地主就是罪恶，是土地犯，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一定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地主阶级，千万不要把箭头指错了方向。其他问题都不能同这个问题一样来平列，更不能轻重倒置。其他问题一般的都要放在次要、附属或有利于消灭地主阶级这个主流的发展中去进行。例如，纠正过去果实分配不公、改进干部关系等问题，均需如此。这决不等于放松缺点，相反的我们的一切缺点要用严肃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就在于纠正这些缺点不能离开消灭地主这个大前提。即便有些特殊问题，必须要在对地主斗争前搞的，也必须及时引导群众转向〔对〕地主斗争，否则那就是方向上的错误。

对地主〔阶级〕的消灭，要从各方面去彻底消灭其经济、摧垮其政治，使他没钱、没势、没地位，消灭其思想，让他完全屈服。有些地主备了战，我们要追查。他们想逃脱地主的罪恶，疏散土地资财，装穷变成份，我们要深入调查、深入歼灭。对地主工商业要清算，一般的可以城镇贫民为主，结合附近穷村及有关村庄农民共同去进行。

对地主之清算，在一般的向群众低头屈服之下，再恩赐他以最后生活，一般留贫农生活；但一定要按各地区土地分配情况、群众意见去处理。农民对于地主让农民自己去做主，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用不着我们做主，更不用我们去调和。我们必须切忌公式主义、千篇一律，右的或“左”的公式主义都要不得，要由群众自己去做主。

对于地主抗属，在农村斗争中，比一般地主有些照顾，群众是同意的，我们也是赞成的，但是照顾是群众自愿的照顾，决不能由我们命令规定，更不能由抗属地主自己去规定。地主出身的干部战士，一定要与家里写信，动员家庭自动将财产全部交给群众处理，并应动员他们向群众低头认罪，任何人决不准抵抗群众

的土地改革。

对于反动的地主，根据群众要求，必须给予坚决镇压，绝不留情。有的同志说：这不是残酷吗？我们说：阶级斗争就是残酷的斗争。过去一年中，他们不是杀掉我们500多个积极分子吗？当然，我们决不能不分清红皂白的乱杀，更不是要我们干部脱离群众的以杀为快，那样做法是不对的。尤其要充分警惕地主封建势力钻空子，借刀杀人，以及宗派报复，假公济私。不能盲目的乱杀，更要警惕地主的借刀杀人。

二、富农。中国农村中的富农，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要彻底消灭封建与满足贫农土地要求，对富农就不能不动，就非挤不可。挤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是挤到以解决农民土地为限制，一个要挤到中农不动摇。在这两个大原则下，我们一般的提出以下四个原则问题：

第一、一般的不完全消灭富农。对于新兴富农或勤俭起家的可留一些；至于留多留少，要按土地分配的情况来决定。

第二、对富农留生活。一般的要高于地主，留中农生活。

第三、一般不用抄家、“扫地出门”的办法。

第四、不采用斗争地主那样的办法斗争富农。

三、中农。中农是农村中的小有产者，也受地主的压迫，也是基本群众，也在发动之列。中农能长期同我们合作，中农的弱点在于反对地主、反封建不如贫农坚决，富于一定动摇性。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夸大了中农愿意与地主一起来反对我们，那是不合乎实际的。如果个别地方存在这种情况，那是由于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所造成的，那就是个大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纠正。根据我们对中农的认识，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联合中农，一点也不能动摇犹豫，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否则我们就要失败。但对中农阶层当中极坏的奸、伪、恶霸分子的斗争，那就不是中农的问题了，那是问题变了性质，决不能因此而动摇了对整个中农的方针。

对于过去错误的斗争了一部分中农的损失弥补问题，在今后斗争中要适当的去解决。解决的办法还是采取积极的弥补方针，而不是消极退回的方针。关于这个问题，在布置复查开始时，只要把方向说清楚就行了，不要过于强调以防束缚手脚，候到相当程度，再从表扬中提出弥补问题。大动中出点错是难免的，我们不要怕错而束手束脚，不敢动弹。对于某些错处，只要积极的及时的加以弥补，就能解决问题。

我们今天的土地方针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一般填平的方针，还不是推平的方针。

四、贫雇农。贫雇农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他们最受压迫和剥削，他们最贫困，“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他们是反对地主、反封建的主力、先锋，最坚决彻底，最富于革命性，我们要衷心的为他们服务和紧紧的依靠他们，以他们为骨干，来完成反封建的任务。

五、果实问题。果实的处理是按照填平补齐的精神，原则上要最高限度的满足贫农的要求，但也要注意使中农满意。具体来说，可把全村土地折合成标准产量，按贫苦程度、人口多少实行填平补齐。按群众意见，适当照顾烈、军、工属和鳏寡孤独。一般要按人口多少去分，单身汉可得两份。分配果实时，可组织果实评议委员会，先行定成份，评富力，群众自报，出榜公布；群众民主公议，再出榜公布；群众再民主公议，再出榜公布，最后定案。这叫自报公议，三榜定案。

对于地主的工商业果实，要根据城镇贫富情况分配给群众，不要勉强要群众办合作社。如群众自愿，可以采取合作营业，但任何人不得操纵，群众有随时抽出股金的权力。斗争地主的工商业果实，直接分配给群众，是主要方针；办合作社是辅助方针。

斗出之房屋原则上不拆（特殊情况例外），也要按填平补齐

的精神分配给群众。

所谓两头赶上的人物，原则上不分果实，具体由群众自己决定。至于村级干部、积极分子，原则上不能多分果实，也不能提奖。否则，不经群众决定规程就是犯法。对贫苦抗属照顾是对的，但我们强迫群众过分的照顾或抗属本身太强调是错误的，究竟如何照顾，应由群众自己决定。

对于穷村，可以采取联合斗争，临时送地、远村倒地、动员移民等办法。

至于在斗争中群众不太需要的东西，如书籍、字画、古书、有保存意义的建筑物等，我们可以与群众说明，收归政府。

对于过去果实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可通过教育、讨论，在今后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当中去处理，去弥补。但在两种情况下要重分：一种是群众因对分配果实不满，成为对地主斗争的主要障碍，可以根据群众意见重分，但必须注意及时引导群众向地主斗争；一种是运动结束，果实分配仍不公平合理，群众不满意，可以重分。至于果实分配的合理与否，不可单从数目字上来看，而应是群众心目中的公平合理，按群众意见处理。

六、对于公田、庙地、学田，原则上都要分给群众。特别是土地较少的县份，可以一点不留；土地比较多的县份，可以斟酌保留一些，以便安置荣退军人。

七、组织问题

第一、以雇贫农小组为骨干，团结中农，组织农会。各地区在运动开始，贫雇小组应当建立起来，在集训中就要进行启发教育。为达到这个组织目的，必须注意，不要因以贫雇为骨干而排斥中农，一定要吸收全部中农参加农会。使贫雇农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主动团结中农，否则贫雇农便失去了地位，便会陷于孤立，那是很危险的。

第二、老村干的改造是个极其重要的而且是个很复杂的事情。

多数村庄运动开始时，一定要做到初步改造，最好在贫农、中农村干集训当中，经过群众酝酿、领导酝酿两者结合进行，初步改造。个别坏村要解散，要根据具体情况。一般多用"一齐上台"和"个别下台"的办法，至于"一齐上台"、"一齐下台"的办法要慎重与少用。

第三、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问题

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一切权力归农会，实行农民专政。不过新老区不同，在新区，村的最高组织——翻身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农民专政，我们应该批准。在老区，各组织存有多年，可以采取变的方法，但对村中一切事情，都要经农会批准，在个别村庄可以去做些经［试］验。

第四、支部要加以改造

1、支部的领导成份。支委会首先要在现有党员基础上面加以初步的改造，增加贫雇农成份，再就是对于领导成员很不好的要把他放下来。一般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一般的说，在今天不能让他担任支部领导工作。至于对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党籍问题，要加以具体区别：抗战期间入党，土改中表现也还可以的，党应给予转变的机会、考验的机会，争取其前进，保留其党籍；对抗战间以及土改中一贯表现不好的，应予开除党籍；至于日本投降以后，为了逃避斗争的投机分子，钻进党内来的，应坚决开除其党籍。

2、在土改中一定要注意大量发展贫雇农党员。在群众中要公开进行党的教育，然后个别吸收。

3、村的工作要统一于支部领导。在今天的情况下，有些问题可以考虑，如果基本上没问题，能执行党的土改的决议，那么我们就可以经过支部去进行土改工作；如果支部虽然不能完全切实执行党的土改任务，但还可以改造的话，可以根据贫农小组的意见，拿到支部去讨论，教育他们尊重贫农意见，团结群众；至

于个别极坏的支部，不但不能积极完成土改任务，相反阻挠破坏土地改革，那要予以解散。分区委对于支部的领导方式，也要适应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有所适当改变，否则就跟不上群众，甚至被扔掉下来。

对于这个方针如何坚持实现呢？我觉得最要紧的是，首先大家一定要好好动员起来，认真解决思想问题，深刻体会与温习过去一年丰富的经验，来检查自己及领导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句话，就是要检查我们的思想，来一个阶级思想的改造运动。这个运动一定要认真的深入到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支部里边去，这是关系此次土地改革是否能够完成的前提。在检查与改进思想问题上，花点时间是值得的，盲目的〔急〕性病不能解决问题，中国有句老话："急则生变。"此次复查一定要把它搞好，不但群众要发动，地主〔阶级〕要消灭，而且要把全部组织改造好，真正在村里扎好根，树立起贫雇农的坚强领导骨干。把党改造好，使我们在农村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

其次，一定要认真的高度的集中力量，抓紧这个中心的中心任务，坚持贯彻下去。这是向地主阶级的一场决战，这是一切工作搞得好不好的关键。从党内到党外，自上而下集中力量，要号召踊跃的投入这一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去进步、去锻炼、去为人民立功。机关同志应尽量抽出来实际参加运动，实在离不开岗位的，亦要到附近村去参加。我们提议，哪县把这件事搞得好，哪县委就记大功一次。

最后，要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不深入。一定要亲自动手，深入群众，及时总结经验，推动整个运动前进。

#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
# 潘复生等来信的通知*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

复生同志等的来信，是根据中央土地会议的新精神，针对本区复查中的弱点和偏向，提出如何纠正的意见，需要不待土地会议结束及早下达，并讨论如何进行具体转变。我们考虑，既纠正偏差，又不泼冷水，既修正对地主富农的对策，又不为党内地主富农思想和党外的阶级敌人乘机复辟反攻，在转变中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肯定我们数月来的复查，地主大体消灭，群众大体发动，成绩是基本的。错误和偏差的来源主要是群众路线不足，工作不深入，领导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所致。

（二）纠正偏向应是眼睛向前，深〔入〕运动，提高工作，而不是大算后帐眼睛转向后去，给予敌人以喘息复辟的机会。

（三）要先在党内打通思想，在放手民主、思想自由、有啥说啥的精神下揭露干部真实思想情况。提倡原则空气，开展思想斗争，结合查阶级、查思想，明确是非，分清界限。叫嚣应与反映工作意见思想情况有所区别。

（四）领导深入群众中去，从翻身检查做起，走群众路线，以充分民主精神发动群众讲心里话，讨论争论判别是非，接受经验改正错误。但地主富农斗争对象不得参与检查和讨论，内外需严格分清。

请将你们意见报区党委。

---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上）第45?—456页。

# 附：潘复生同志等就土改政策致张玺、运北、晏春、云浦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

中央局土地会议，于10月2日开幕，3日开始汇报，5个区党委约5天到7天即可汇报完，然后由一波同志传达中央土地会议精神，再进行讨论。

此次会议内容，首先将中央土地会议的决定，即平分土地、整编队伍这两大基本问题弄通，贯彻到到会干部。然后即在大会上查阶级查思想，求得把到会干部初步整顿一下，这样再回去贯彻。因此这次会议是十分重要，而且是十分紧张的。我们都下决心来虚心学习，并在中央局领导下把我区到会干部的思想打通，组织整顿，以便能正确地执行中央路线。在会议期间，区党委对我们有何指示及应注意的问题，请随时告知。

（一）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新精神，检查我区土改工作，有许多问题必须提高。为避免再走弯路，并准备在中央局土地会议后执行新的决定，中央局已有电报给区党委，指出，目前各地应集中力量进行秋收种麦，分配复查中的果实，并进行调查，搜集材料。这就是说复查运动一般的停止（新区例外）。我们很同意中央局这一精神，希区党委注意布置执行。在布置中，应注意不要生硬地打击了群众情绪。

（二）根据中央对地主阶级的政策，及我区土改中对地主政策执行的情况，须立即在全党贯彻新的精神。

我们在复查中，依靠贫雇，成立贫农小组，发动了贫雇农，把复查贯彻下去，大体消灭了地主，发动了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很有成绩的。在这一基础上，保证战勤支前的胜利完成。

但在复查中，我们对地主留生活，使他在解放区能生活下去这一原则执行上有缺点。据说有一部分地主被扫地出门后，未给留生活。少奇同志说："不给地主留生活，这虽然不是杀□，但使他们生活不下去，即等于肉体消灭。"此点如不说服纠正，则地主无路可走，势必铤而走险，坚决与我为敌，如逃跑投敌，作［引］敌屠杀群众，这对农民大为不利，我们是会脱离群众的。所以中央新的指示，在土改中，"要使地主与农民同样的分得一份土地及浮财"。即是说地主的土地房屋财产等一律交农会分配，但地主同样的分得一份。根据这一政策，我们执行一定有很大困难，但必须说服，农民是会同意的，不过不能从农民手中再倒给地主一份，而是在今后的果实中，抽补一部分给地主。

这一精神各县必须掌握，但这决不能说过去错了，对群众泼冷水。要说明过去对地主狠是对的，不过应留给地主生活，使之生活下去，如何执行希研究。我们意见，这一精神应即明确起来。至于具体问题的处理，则应根据具体情况。给地主留生活是一原则，同时不能从群众手中倒出，不能打击了群众情绪也是原则，究竟如何？希研究。

另外是关于对地主阶级镇压问题：在土改中，对个别的、少数的罪大恶极，为群众痛恨的地主，为最大多数群众所通过，非杀不可，则必须经群众公审，县委批准，杀掉。只有镇压少数最坏的、反抗土改的地主，才能瓦解地主阶级，使其他的地主向农民屈服。如果他们向农民屈服投降，则即给他留生活，这样既瓦解了地主阶级的阵营，又不致使地主投敌，坚决反抗农民，这才对农民有利。至于坚决反抗土改，并进行反革命报复的地主，我们当然也必须给以反报复。

根据这一精神，我们今天决不是肉体消灭地主，这是中央一再指示过的。

不过据来开会同志的汇报，我区个别的地区，已造成肉体消灭地主的错误，或者大有肉体消灭地主的倾向。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不能大惊小怪，但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为正确执行中央的政策及贯彻新精神，特提出以下意见，请考虑：

一、镇压个别的少数的罪大恶极为群众痛恨的地主，以瓦解地主阶级，特别是对地主的反攻，给以坚决地镇压，是正确的，今后必须贯彻。因为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这一斗争必须坚决地依靠贫雇，团结联合中农，及农村中一切反封建的分子的巩固的统一战线，才能孤立及控制地主，充分地发动群众。

二、在土改中，一切特务分子，即地主兼特务者，一律不杀，一律解交上级公安局严格拘押，以□□□□□，避免错误。此点，中央已有决定，必须严格执行。

三、为了更好地执行镇压政策，避免错误，防止偏向，中央决定成立各级人民法庭，由农会或代表会推举一二人，再由政府委派有经验的法官共三人组织之。一切有关土改中的案件，一律经人民法庭，按法律制裁。

四、杀人权仍根据区党委过去的决定，杀人权放到县委，各县与各级人民法庭具体讨论执行，一切有关土改中的案件，要有严肃〔的态度〕，要有为党为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心。

在执行以上两个问题中，党内地主富农思想的人可能乘此反攻说我们过去错误了，即大喊大叫，反攻，因而党外地主阶级看到党内有人支持他，亦反攻，这一点必须警惕，对这些干部要严格执行纪律，不准叫嚣。

以上两点，我们与到会干部研究，不能再延迟，必须及早提出，如果区党委以为正确，我们建议即以指示或通知形式，将上述两个问题指示全党。黄河南的同志提出亦应一样指示河南。如

何？望示。

最后关于扩兵问题，中央局意见，我区上解2.5万新兵，在时间上，最好于10月底或11月15日前完成，以便中央局土地会议后，即集中全力贯彻中央的新精神。

# 关于到达冀鲁豫经过及组织情形向中央局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

李菁玉　陶希晋

一、1月15日我们由冶陶出发，道经武安、邯郸、肥乡、广平、大名、南乐、观城、朝城、阳谷，于1月29日到达聊阳九区（即区党委主持六、九地委干部大会地址）。同来团员78名，今天增加中央局社会部派来5名及两广纵队派来5名，原团员有不能工作者遣送回去1名，现共计有团员87名。统计其中县委以上干部有43名，非党员有10名；女同志有13名；学历在初中以上干部有43名；家庭成份属于地主富农及官僚军阀的有48名；派来机关属于中央局各部处及边府的干部十几名；属于中央局研究室的有17名；属于边府文联文工团的有32名；属于两广纵队的有20名。所有以上团员，均采取混合编组办法，共编为6个小组，准备将来分派6个基点村工作。同时我们宣布，不分党员非党员或任何级干部，在组内均享受同等的政治生活待遇。

二、同志们对这次下乡的态度，我们曾作了初步的了解和分析，大致有如下几种：

（1）不少同志是为锻炼改造自己而来的，但也有些同志是为“赶时髦”而来的。

---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辑文献部分（上）第519—522页。

（2）少数同志因在原机关站队不好，表示此次是“带罪立功”重新过关来的。

（3）也有些是因不安心于原机关工作，想下乡工作过渡改做其他工作来的。

（4）个别同志有“镀金”思想，认为下乡三五个月锻炼一番，便可“一劳永逸”。

（5）个别地方工作干部，或因站队受处分，或因对自己经验批判不足，而是想露一手而来的。

（6）少数文化工作干部，为找自己的写作材料来的。

（7）部分同志有浓厚的任务观点，缺乏对当地群众负责的态度，认为干6个月了事，缺乏长期工作态度。

（8）不少同志或因自己成份不好，或因群众工作经验少，又因感到大会整党的压力很大，害怕下去犯错误，上人民法庭。

以上各种思想，我们已在团员大会及各小组会作了批判，要求一致的全心全意、诚心诚意来为人民服务，在向群众学习和帮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急性病、抢先、居功，以防止包办代替。并说明小心谨慎的态度是对的，但犯错误是难免的，问题在于对错误的态度，如何避免错误与改正错误。

又为肃清那些半心半意与三心二意的想法起见，我们宣布两点：

①中央局并未有三五个月后工作团即撤回的规定，每个同志应有在此间群众中扎根的思想准备。

②中央局已将各同志的组织关系完全交给工作团，我们中间不再存在各机关各部门干部不同任务的区别，每个同志应听命群众的吩咐及工作团的决定，作好在区村政府团体内做任何工作的思想准备。

三、一路来我们曾要求大家在行军休息时间，尽可能注意就

近的居民拉话，以转变“走马不看花”的习惯，综合其间有些道听途说的材料。

（1）我们沿途所驻各城镇，每处市民都反映“稍像个样子的商铺，都是公家的”，有些铺子名义上是群众的，实际上也是公家性质。我们渡漳河及卫河时，两岸几个摊贩均告诉我们：“老百姓只能摆个摊子。”我们在阳谷城中，在一家小饭铺吃面，总以为这不是公家开的，细问之后，哪知也是合作社。和我们同座的有一聊城来卖毛笔的小商人，攀谈之下，他也是为公家作笔贩子的。大名去年斗了30余家大字号，已影响城市人口减少很多，小工商业者（1个小理发店）他们对我们表示，斗了大商号之后，直接影响他们的营业也萧条了。其他小商人也有所表示。

（2）几处城市贫民都反映我们银行贷款是为公家商店的，其次是大字号的。作小本经营的贷款既少，且须铺保，20天内即须归回，故不如不贷。

（3）对土地法大纲，城市中独立小工业者及贫民都很赞成，但他们关心的是房子问题，他们怀疑将来是否能分得一些房子。有些地方反映土地法公布后，地主在高兴，一般村干在恐慌，他们希望快搞，怕地主乘机挑拨打击干部，部分中农在观望。

（4）沿途除武安、邯郸而外，如肥乡、广平、大名、朝城、阳谷等城市，均有不少公有房屋(如教堂、学校等)，且相当完整，但均未加以爱护或利用，一任侵犯破坏，至为可惜。

四、我们的工作计划，已和区党委商定。

（1）确定工作地区在阳谷，先集中力量搞一个区，俟取得经验后再作次步计划。

（2）工作团不采取过去翻身队的作法，将与重新配备的地方干部合并组成新的县区工委会（因为该县县、区党委此次整党后，实际上已垮台），菁玉参加县委任书记，希晋等参加区委，陶并参加县委为委员。

（3）工作团各组除派少数同志参加大会外，将不俟大会结束即开往工作区。先到几个村子，了解情况，准备着手开始工作。

（4）工作团干部将来编入地方组织工作后，生活供给仍由中央局支付，工作上服从地委的领导，除直接报告中央局者外，以后我们工作报告一般分致中央局、区党委及地委各一份。

致中央局并抄致区党委。

# 附：（李）菁玉、（陶）希晋给（薄）一波的信

## ——冀鲁豫工作团干部对冶陶会议的反映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

一波同志：

兹派倪弄畔同志回去接洽工作团的经费问题，托捎报告一份，请查收，并请将指示交其带来。

我们正准备按照今日与区党委商定的计划着手部署，首先搞的一个区，系阳谷〔县〕东南区，闻虽系老区，但双减亦未认真搞过，地主、特务、会门之类的潜势力都很复杂，土地亦较他区为集中。李福祥同志、齐燕铭同志的一个小工作团，正在寿张〔县〕搞开一个村，将来我们工作团即与他们靠近。

从我们工作团干部反映，并从此间各大会情况的观感，我们感觉有一个问题，虽因具体材料不多，考虑不成熟，但觉有向你提一下的必要。工作团干部反映，冶陶会议的压力很大，许多同志的思想是否真通了，尚是问题。这种压力，必然是愈到下面愈大，直至区村干部。过去各地强调打通思想，这次是打不通亦要通，可是发展到下面，则更少说服精神与欢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态度。又因这两种情况，压力会愈大，其一是下面问题，较冶陶会议反映的材料尤为严重，领导上是集中一切火力一开始即整，而各种条例法规《人民日报》上已先发表了；其二是愈是坚持工作较久的区、县干部，一般是问题愈多，他们最难过关，思想转不开弯，面子下不来，于是有的短见自杀，或者是逃跑（此间大

会自杀者已有3人，大名及朝城有逃跑者）。固然这些现象是不足为奇的，更不能动摇我们严肃整党的决心，但我们感觉问题有两个，一是整党是长期的，若企图在此短促时间内一下整的一干二净，则恐易生偏差。下面同志不可能一下觉悟得如此快，一下波及面过宽，对眼前的工作有利亦有害。恐此番中心要求，仍以去掉即将下去实行平分的障碍为宜，目前是不可能把干部各种复杂思想一下清算的。其次是对错误的处罚，必须有各种区别，如过去与今天以后的，坦白承认与坚持错误的，公与私的，地主、富农混入的异己分子与一般半条心的小资产阶级的，屡犯与偶犯的。此外，各地工作环境及历史条件影响尚有不同，我们感觉各地领导上应注意这些区别，而总的精神应贯穿严肃而热情的原则，给犯错误而承认错误者以自新的出路，这样才可防止地主的挑拨（我们沿途来，已有地方反映地主在挑拨打击村干），并有利于实行党的整编队伍的任务。这两日，我们研读毛主席《论查田运动》一书中“查田运动初步总结”第七章。毛主席强调提出“不去有系统地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是“过分”的。现在与那时内容或有不同，但毛主席在这一问题上的“十分谨慎”的精神，我们很受感动。

以上仅属感想（并非完全根据此间大会的情况），不知以为然否？

余容续告，即致

敬礼

菁玉　希晋

# 冠县抗战初期的农民运动*

中共冠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 一、抗战前冠县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

在鲁西平原的西北部，一个历史上开发较早的中等县份，坐落在卫运河与马颊河的襁褓之中，这就是有着"冠州"和"清泉"古称的冠县。

抗日战争前，全县20万人口，地主占1—2%，富农占5—6%，中农占30%，贫农包括赤贫农占50%。全县1.2万顷土地大都霸占在地主阶级手里，他们还开着商铺、银号、当铺以及作坊等，肆意吞噬广大农民的血汗。其中的二十几家大地主，控制着全县的政治、经济命脉。

当时的封建剥削极为严重。其中，出租土地是地主剥削农民的重要方式，主要有下列几种：死租，即地主将土地租给佃户，耕耘、收、种、种子、肥料等一概由佃户负责，地主净收租子，不管年景好坏、旱涝歉收，佃户们都要如数交租。活租，也叫大种地，是土地交佃户耕种，一切收、种和种子、肥料、人畜劳力事项全由佃户负责，麦、秋季各按收获分成，多为三七分成，即地主分七成，农民分三成。小种地，是佃户只出劳动力，其他一切由地主负责，一般为二八分成，即地主得八成，农民分二成，也有一九分成的。大、小种地的佃户，不少是住在地主的庄院附近，

---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专题部分第445—456页。

除给地主种地外，还要为地主出劳役，干零星活，诸如出公差、担水、抱孩子、洗衣浆裳、烧炕、扫院子、碾米磨面、铡草、喂牲口、红白喜事服务、给主人赶牲口、驾车走亲戚等。有的佃户连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也都无偿地给地主家干活。也有一些地主、富农是雇长、短工而自己经营土地的，长工一般的年工价是一二十元，小扛活的一年只有几块钱，多年的"老把式"、"大鞭"也不过二三十元。

放高利贷是一种重要的剥削方式。一般月息3分，也有3.5分或更多的，一年一清，年底交完全部利息。交不上利息，就利息变本一同生息。也有"驴打滚"的，即当月交息，如交不上，这息下月就作本行息。也有加一加二的，即借1元钱，1个月还1元1角或1元2角。也有3个月为期或半年、10个月为期的，到期收息，交不上就从下期起利息作本行息。还有"日夜忙"的，白天算1天，夜间也算1天，1个月按两个月计算利息。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借地主一点钱，结果却是利息越滚越多，成为还不清的阎王债，被逼得家破人亡。

还有一种名叫"放青"的剥削方式。在麦收之前的青黄不接时节，农民揭不开锅，富户就趁火打劫，借粮给农民。借1斗粗粮，麦收后还1斗细粮，还有1斗2升的，甚至还有吃一还二的。有的农民借粮时须用土地作保，到时还不上，就将土地拿出抵押。不少农民为此失去土地，而地主变成债主。遇到荒年，这种情况更多。

农民在身受多种形式剥削的同时，还受着种种敲诈勒索。例如，张义堡村一个农民被土匪绑走，捂上眼睛，弄到白塔集村，放在地窖里。村上将此情报告了县上维持治安的马队，马队就将人给要了回来。虽是公务，但你得出钱。马队队长说，报信的得要钱，出力的兄弟每人得要几块，总共要花五六十块，要不你自己去赎，花得更多。1亩地才值十几块钱，农民们一旦遇上这种

劫难，只得倾家荡产，别无他路。又如，当时县里设有大堂，有时县长过堂，有时帮审过堂。衙役带着受审人上堂之前就问："有照面吗？"意思是，要过你的堂了，县大老爷可能要打你，你花两个，就打得轻，不花钱就打得重。打的时候用竹板子，有打的，还有数的，花了钱的挨打时，他们就数得快，数10下只打两三下；不花钱的，他们打一下数一下，有的几下子就打得皮开肉绽。衙役公开讲："大堂上又不能种谷子、高粱，你们不花两个，我们吃啥！"因此，一般农民根本打不起官司。

地主阶级不仅占有那么多的财富，而且还统治着乡村政权，连县的民政局、教育局、建设局都被地主豪绅把持着。县里有武装民团总部，每区设一个团，后改为联庄会，也全被他们掌握着。地主豪绅还在自己的庄院里，豢养着狗腿爪牙，横行乡里，为所欲为。

在地主阶级敲骨吸髓的盘剥与欺压之下，加上官府连鸡狗都要上捐的苛捐杂税，军阀混战下的兵燹匪患，使整年累月面向黄土背朝青天的农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因此，不少人三五成群地外逃求生，有的携儿带女出走而终年不归。其中，走京（北京）串卫（天津）闯关东（东北），成为不少农民远离故土的去处。约成定俗了，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九、十三、十六，便是所谓"要得走，三六九"的好日子。于是集中在这几个时日，一群群的人离乡背井，哭叫连天，其状惨不忍睹。

面对贫困与黑暗，广大农民曾经进行过多次反抗与斗争。如1875年甘官屯宋景诗为首的黑、绿、蓝、白、黄五大旗起义；1898年干集18村的义和拳暴动，以及后来红枪会的抗粮闹漕。这些斗争，无一不充满着冠县人民反抗强暴、追求改变现状的精神。但是，这些斗争都以失败而终结，农民们仍然挣扎在死亡线上。

## 二、冠县抗日农民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冠县抗日农民运动的兴起，从根本上讲，在于中共冠县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壮大。

这里，党的活动比较早，党的基础也比较好。1934年2月，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生、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在回冠县度寒假期间，发展了孙洪、冯干才、沙延孝、钱洪勋4名党员。从此，在偏僻、沉寂的冠县境内点燃了党的星星之火。一年多的时间，又有20多名思想进步的小知识分子加入党的行列。1936年初冬，中共冠县县委成立，并根据省委指示，注重在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到抗战爆发前夕，全县有党员50多人，其中农民占主要成份。正是他们，成为后来冠县农民运动的骨干与中坚。

九一八事变后，闯关东的人数锐减，并不断回流，广大农民的外逃求生之计受到严重打击。从东北回来的人，谈了许多亲眼见到的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罪恶事实。朱霍三里庄农民郭英闯关东后，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赵尚志领导的抗日联军，1934年又当了中共满洲省委的交通。他每次回乡探亲，都有意识地向农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从而大大提高了一些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如县城北关、三里庄、北田平等村庄的农民，都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影响，为他们后来投身于抗日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七七事变后，县长侯光陆随国民党军队南逃，全县社会局面一片混乱，“绿林”四起，土匪如蚁，冠县境内，各种队伍竟有百起，加上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共计万人之多。最大的两支绿林武装，是石洪典的“北杆”和韩春河的“南杆”，各有一两千人。他们借口保家，名曰抗日，实则敲诈劫掠百姓，互相厮杀、

吞并，扩充自己的地盘。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冠县党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拿起刀枪，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号召，分赴农村，奔走呼号，动员广大农民抗日救亡。8、9月间，代理县委书记郭芳臣组织起6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被并入“北杆”后，郭芳臣在“北杆”任参谋长，后在改造这支绿林武装中起了重要作用。9月，郭英从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获释回到冠县，立即组织了一支十七八人枪的青年游击队。10月，赵健民从济南国民党监狱获释回到冠县，与郭英、冯干才、许梦侠、朱月桐、孙洪、郭林业等共产党员一起，在城东三里庄成立了鲁西北抗日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枪、10多匹战马。这支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行动，即处决了韩景云、张瑞恒、孙英林等5名维持会头子，给亲日派势力以当头一棒，给广大农民起来抗日以极大鼓舞和振奋。

由于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感召和鲁西北共产党人的团结争取，范筑先将军与共产党人携手并肩，合作抗战，为冠县农民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党的帮助下，范筑先将冠县的两大绿林武装——“南杆”和“北杆”分别收编为第五、六支队，并调离冠县。1938年1月31日，以共产党直接创建的近400人的机枪营为核心，加上馆陶县第二区民团李风藻部千余人、冠县第二区民团宋凤歧部800余人，在冠县城内师范讲习所正式成立了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并长期驻冠县。共产党员张维翰任司令兼冠县县长。无疑，这对冠县的农民运动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

1938年5、6月，冠县党组织以政训处的名义，举办了两期政训班，培养农民运动的干部。每月1期，每期受训学员三四十人。学员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小学教员以及一些闲散的小知识分子。政训内容主要是抗日救国。他们还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工人之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排练

文艺节目上街演出。在演出《流亡三部曲》时，不少观众泪流满面，有的甚至泣不成声。政训班结束后，除一小部分暂回原单位从事原工作外，大部分学员都成为县或区抗日群众团体的领导和骨干。

1938年5月1日至6日，鲁西北特委以山东省第六区政训处的名义，召开政治工作扩大会议，要求各县以动员群众为中心工作，自上而下地组织由党所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这时，冠县第一期政训班还没结束，冠县党组织就开始了农民互助会的发动和组织工作。首先，成立了县农民互助会，由原县委书记郭英任会长。接着，各区农民互助会也相继成立，其会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场势不可当的抗日农民运动在冠县迅速地兴起。

## 三、冠县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冠县的农民运动一开始就声势很大。除第八区和第六区的部分村庄外，很快遍及全县各区、各村镇，并波及到邻县朝城北部和河北省大名县的卫河以东地区。广大农民都是以户为单位，加入农民互助会。发展到高潮时，连富农和一部分中、小地主也都入了会。当时全县人口还不足20万，农会会员就达到13万之多。

在农会的带动下，县以及各区、村的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很快成立。这些团体成立后，立即开展工作，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农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团体的工作一开展，广大农村顿时活跃起来。男女老幼齐动手，修好土枪、土炮，擦亮大刀、长矛，到处是操练的队列，村村是嘹亮的歌声。广大农民发动起来了。

在农民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1938年6月，县农会成立了自己的脱产武装——特务队。开始只有30多人枪，后来发展到100多人枪。同时各区农会也都建立了自己直接领导的脱产武

装——特务分队。各分队三四十人枪不等。这些县、区农会武装，在整个农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会的根本宗旨，就是保护农民利益，领导农民进行抗日救国斗争。1938年5、6月，原已调离冠县的经范筑先由绿林武装编成的几个支队，常派人回冠县"抓逃兵"和"起枪"。来人声言，支队调离冠县时，某人逃走回家，并携带枪支；他们当时把枪放在某人家里。来人都是两三人一伙，三五人一群，全副武装，并持有支队某一机关的证明信，可谓气势汹汹。什么"抓逃兵"，"起枪"！都是托词，实则或敲诈钱财，或官报私仇，闹得百姓日夜不得安宁。对此，时驻冠县的第十支队，碍于兄弟部队的关系不便管；县政府无力管。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县农会决定出面处理。县农会指示：凡各支队派来冠县"抓逃兵"和"起枪"的人员，必须先到农会联系，没有县农会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随便"抓逃兵"和"起枪"。几天之内，果然有几起"抓逃兵"和"起枪"的人员，由农会会员陪同来到县农会。这些人有恃无恐，认为冠县境内没谁敢管他们，特来看看县农会到底能对他们怎么样。县委决定，由民运部长高元贵出面处理。高元贵是政训处负责人，身穿军装，佩带少校军衔，还拉出农会特务队，有意安排成威武森严的样子。高元贵代表农会向来人宣布了农会的有关决定和意见，说明了"抓逃兵"和"起枪"的手续和办法，明确指出如不按县农会的决定办，在乡下发生意外，完全由来人自己负责。来人听后，一般都托词回去报告，实际上是逃之夭夭。这样，所谓"抓逃兵"和"起枪"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农村秩序相对安定，群众情绪高涨，农会声威大为提高。

1939年，国民党部队第十军团在冠县根据地内设立了许多招兵处。每处10至20人不等，着军装，携有少数长、短枪。招兵处的给养就地征收。他们整天向驻地附近村庄要粮要款，要酒要肉，奸淫讹诈之事也时有所闻，农民群众不堪其扰。为此，县农

会决定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打坏蛋，解决招兵处问题。

第四区段莱庄设有一个招兵处，这个招兵处还领导其他一些招兵处。为了搞掉它，抗日区政府和区农会分片召开全区农民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坏蛋！""不给坏蛋送酒送肉！"根本不提什么招兵处。随即各村群众由村长、农会长带领，手持红缨枪或大刀，列队向段莱庄进发。队伍从村东头潮水般地涌向村西头，"打倒坏蛋！"的口号响彻云霄。愤怒的人群将招兵处的人团团围住，当场用红缨枪穿死十几人，一举解决了段莱庄招兵处。这一消息，震撼了鲁西北地区，第十军团在冠县的十几个招兵处，就全部撤走了。

抗战初期在冠县影响较大的是清乡运动。清乡的内容是既打击残匪、兵痞、流氓，也打击与人民为敌、不抗日的掌握着区村政权的土豪劣绅。清乡队伍到各村后，首先大张旗鼓地发展壮大农会组织，培训农会骨干，宣传抗日道理。在各村的群众发动起来后，就依靠村农会开展斗争。第一步是打击土匪、流氓等，维持社会秩序。第二步是夺取被坏人掌握的权利。原来的村长一般都是地主或地主的狗腿子，区长、乡长都是地主和豪绅。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抗日救国大局出发，还不能一概采用强硬手段将政权夺过来。鉴于此，农会就通过发动群众，揭发这些人的贪污违法行为、恶霸行为，使那些掌权者劣迹昭彰。这样一搞，使那些平时欺压百姓、作威作福的人声名狼藉，农民有事也不再找这些人了，而是找自己的农会。"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一口号虽然没有普遍提出过，但实际上农会的权力是极为显赫的了。

由于农会声望日高，有的地主、乡绅感到在政权里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引咎辞职，或干脆不再露面。于是，农会就选人上任，接管了政权。凡是和广大农民一心的，或表示悔过、愿与人民同心抗日的人，则予以保留。对那些有罪恶而又顽固不肯下台

的，农会就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为止。1938年底，历时半年的清乡运动基本结束。全县除第八区和第六区的一部分区、村政权没有为我所控制外，其余的区、村政权，全部成为我党领导的以农会为主体的抗日政权了。

清乡运动荡涤了社会上的残渣余孽，整肃了社会秩序，改造了部分旧政权，保护了农民利益。在冠县大地上，农民群众从来没有这样扬眉吐气。

为了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抗战初期，冠县根据地内还进行了减租减息。1939年初，鲁西区党委成立后，首先在冠、馆陶两县颁布了减租减息的法令以及合理负担的办法。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五一增资"的口号。经过宣传和发动，减增运动很快在全县展开。二五减租，即 1 斗租子改为7.5升。五一增资，即雇工 10 元工资改为12元，另增发两身单衣， 1 身棉衣。分半减息，即 3 分利息改为1.5分。减增后，佃农、雇工与不少贫农获得了利益，被剥削的程度减轻了，生活改善了，从而生产劲头大了，参加抗战的积极性高了。同时，农民按规定交租交息，也保证了地主富农的一定利益，对团结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一运动中，不少地主、富农按法办事，带头减租减息与增资增佃，成了开明士绅。但也有的蔑视群众团体，拒不执行政府法令。还有的明减暗不减，明增暗不增，甚至有的勾结日伪顽杂军逮捕杀害积极分子。不打垮顽固地主的嚣张气焰，减增法令就很难彻底贯彻。抗日民主政府支持农会向顽固分子进行斗争。第二区唐寺村恶霸地主孙长贵，一贯欺压农民群众，抵制减增运动。广大农民对他恨之入骨，要求政府逮捕枪毙他。于是政府支持群众召开了斗争大会，广大农民揭发他欺压群众、破坏减增运动、诬蔑抗战人员的罪行。有的控诉说："他夺了我家的土地。"有的诉苦说："他放高利贷，驴打滚的利，还不上，就霸占我家

的房子，逼着我住庙屋。”一位老大娘爬上台去泣不成声地说：“他逼得我儿子逃关东，至今还没有信，叫我这老孀嬷子沿街要饭没法活。”说理斗争之后，群众把孙长贵绑起来，沿街示众。人们扛着钢枪、长矛，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敲锣打鼓，喊着“打倒破坏减租减息的孙长贵！”“枪毙恶霸孙长贵！”的口号，游了这村游那村，直到天黑把他送交抗日政府处理。这场斗争大煞了孙长贵的威风，也教训了其他的顽固分子。他们感到再不执行减租减息和增资增佃不行了，再欺压群众不行了。

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还贯彻落实了合理负担政策。规定每户每人除去1亩基本地不计征外，其余按地亩多少累进计算负担。这样地少的少负担，地多的就按累进率多交粮秣。农村的一应摊派也都照此执行。这对抑富扶贫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北寺地等村的农民代表请求政府实行按土地肥瘦分等负担的办法。政府采纳了农民的意见，评议土地按肥瘦分等，折成标准亩。劣地有的1亩算8分，还有的算6分、4分，那些沙碱不毛之地就不计算负担了。而最好的土地，还有1亩折成1亩2分标准地的。这样地主富农家肥沃地多，就要多负担，穷人劣地多，自然就少负担了。显而易见，这对广大贫苦农民很有好处，特别对广大沙碱地区的农民，减轻了很大负担。

抗战初期的冠县农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给他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切身利益，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战热情。同时，在党的宣传教育下，经过这一阶段的锻炼，农民的民族意识与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他们理解了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明确了作为抗日的农民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应该采取的态度和行动。他们努力保证抗日政府和部队的财政供给。虽然生活困苦，但他们勒紧腰带，节衣缩食，把从牙缝里积攒下来的粮食，一点一滴地聚集在一起，连同布匹、鞋袜、牲口、大车、柴草等军队及政府所需，源源不断地送到抗战最前

线。他们踊跃参战，仅抗战初期的一两年中，在这里组建的抗日部队，除了范筑先所属的第五支队、第六支队、卫队营、第二十六支队以外，还有我党在这里创建的第十支队，县游击第一营、第二营，卫河大队，青年连，农会特务队，农民游击大队等抗日地方武装。而且，这些武装大都是全部升级到主力部队，而后再继续补充和发展。

冠县农民运动的开展，根据地的创建，在当时鲁西北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守，鲁西北的抗日形势转入低潮时，冠县这块根据地成为鲁西北抗日斗争的中心，被誉为鲁西北平原的“小苏维埃”。鲁西特委撤到这里，第十支队撤到这里，经我党改造而争取过来的第五、六支队各一部撤到这里。他们以冠（县）馆（陶）根据地为立足点，同李聚奎率领的先遣纵队、陈赓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一起，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稳定了鲁西北的抗日形势。为此，1939年11月2日，鲁西区党委对冠县的农民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冠县农民互助会的成份相当纯洁——多是劳苦贫农，一产生即是斗争的，首先和行政当局斗争，其次和豪绅地主、顽固分子斗争。……由于基础巩固而终能战胜一切困难。组织扩大起来后，冠县农民互助会是总会以下各区都有支会，乡村分会也都相当普遍。据去年9月份统计，全县互助会人数共13万，占全县人口多数(全县为20万)。互助会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平均摊派。其他系动员新战士配合主力扩军、募捐等工作。同时在互助会下有直接领导的武装——农会特务队（人枪30余），不仅起到了掩护地方工作的作用，而且在锄奸、清匪、维护地方治安上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宋增益　郑文杰　执笔）

# 泰西“红五月”运动*

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40年春，在中共泰西地委领导下，各级农会发动农民开展借粮渡荒的群众运动，5月份形成高潮。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后期出现了一些过火行动。是年秋，在鲁西区党委的指导下，停止了这场运动。史称这场运动为“泰西‘红五月’运动”。

## 一、借粮运动

泰西“红五月”运动是从“借粮”开始的。

1939年，在泰西地委领导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帮助下，泰西地区掀起了建党、建军、建政、统战、群运工作的热潮，有的县、区开展了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合理负担等，根据地建设形势一片大好。到1940年春天，第一一五师已离开泰西，敌人又对根据地连续进行“扫荡”、“围剿”，形势开始恶化。泰肥山区是泰西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驻地，确保这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是当务之急。当时全国在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指引下，已纷纷开展讨汪（精卫）反顽（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泰西地委积极发动群众讨汪反顽，进行抗日斗争。但由于春荒严重，有的贫苦农民缺粮断炊，所以首先需要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当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专题部分第457—469页。

时，地主、富农囤积余粮，高价待沽，一般群众无钱买粮，肥城、长清县的部分基层农会，自发地领导群众向地主、富农家借粮渡荒，并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斗争。

肥城县，地处泰肥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1940年春，肥城第三区被划为地委直属实验区，在这里创造领导群众开展各项工作的经验。这个区率先开展减租减息、借粮渡荒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40年3月，地委在肥城县第五区东尚里村召开泰西活动分子会，地委书记袁振主持会议，并作了反对右倾改良主义的报告。与会人员在分组讨论中，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重点部署了借粮工作，并由实验区的领导人介绍了向地主借粮的经验。会后，一个以改善群众生活为基本出发点的借粮运动，在泰西大部分县迅速展开。

肥城县第五区区委认真贯彻泰西活动分子会议精神，决定组织农会会员向东尚里村大地主李子英家借粮，同时有一部分群众分头到其他地主家去借。当时李子英住济南，家里只有几个掌柜的。借粮这天，区委干部带领群众冲到李家大门前。开始，李家紧闭大门，不让群众进家，后来见群众声势浩大，不得不打开了大门。干部带领群众蜂拥而入，要求借粮。开始不借给，经过说理斗争，终于答应借给粮食。群众还从李子英家借出1万块大洋。这一斗争的胜利，震动了全区，于是全区的借粮斗争很快就开展起来了。运动发展较好的是南部和中部，北部较差。原因是北部靠近县城，敌人经常"扫荡"，群众工作基础较薄弱，借粮工作难以进行。

在第三、五区借粮运动的带动下，第一、二、四区的部分村庄也展开了借粮斗争。据当时统计，肥城县有1619户贫雇农参加借粮，共借到粮食300多万市斤。

东平县的借粮运动，是在1940年4月县委召开全县活动分子会议之后。会上，县委书记王贺成（邵汝群）传达了泰西活动分子会议精神，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并具体部署了全县的借粮工作。会后，各区对借粮工作进行了研究。不久，在第二区西沟流村召开了全县各区区委书记、动委会主任会议，县民运部长强子正传达了鲁西总农会民运工作会议精神。会上，县委再一次部署了借粮工作。

西沟流会议后，东平县第三区一马当先，以村为单位，由农会干部带领会员向本村地主借粮。后来发展到联村借粮。如驻驾村乡和尚庄镇的农会会长带领5000多名会员，到尚庄村大地主尹祚墀家借粮，对他说："眼下青黄不接，乡亲们不能饿着肚子抗日！借给点粮食，以后收成好了还你。"尹开始不同意，后来见群众非借不行，他无计可施，终于从地窖中借给9000市斤粮食。

东平县第七、八、九3个区的借粮运动是在东平湖西办事处领导下进行的。在方法上主要采取说理的方式。第八区区委按照县委的部署，层层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区公所组织董庄附近的农民到董庄大地主董兴孟家借粮，董兴孟态度骄横，拒不借给。愤怒的群众高呼："抗击日军，人人有责！""有粮出粮，有人出人，合理负担！""打倒顽固分子，欢迎进步士绅，抗战一家！"在群众的压力下，董兴孟终于借给了15万市斤粮食。

黄河涯村的借粮运动进行迟缓，区委了解到主要原因是该村地主王永庆势力较大，村民不敢得罪他，村农会长工作缩手缩脚。区委撤了农会长的职，并决定，如果本村借不出粮食，就组织外村的群众来借，黄河涯村的群众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他们消除了顾虑，鼓起了勇气，从王永庆家借出小麦2万市斤，分给了本村的贫困户。

刘塘村的地主刘广隐，不但不借给粮食，反而态度蛮横。区公所将他传讯到区部，由副区长张绍宇跟他谈话，进行说服教育，

使他转变了态度，连声答应借给粮食。

东平县第二区在借粮运动中，农会与地主的斗争较为激烈。双塔村地主王汉章抵制借粮运动，偷偷把粮食藏到李所村天主教堂里，认为农会反正不敢惹外国人，哪料到群众运动起来后，不管那一套，拥进教堂搜出大批粮食，分给了农民。东平县第四、五、六3个区也在某些乡镇进行借粮，但未形成运动。

平阴县的借粮斗争，首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平阿山区的丁泉、白雁泉、大寨等村子展开，后来又发展到湿口山、王楼、宋家柳沟、张庄、展洼和城东靠近大峰山区的毛铺一带。

长清县，南部是大峰山区，是泰西抗日根据地之一，群众抗日组织建立早，基层组织健全。当时第八区共24个村，达到村村有支部，每个支部有四五个党员，多的十几个到二十几个。所以党的号召很快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1940年春，长清县委为了发动群众抗日，巩固根据地，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发扬民主、改善民生，并具体部署了借粮斗争。在这个贫困的山区，庄子较小，村民居住分散，土地不太集中，没有很大的地主。例如第七区小孟村仅有二三十户人家，支部书记董玉印领导群众向那个村的粮户讲了半天道理，才借出2斗粮食，分给了群众。在县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七区介绍了小孟村的借粮情况，结果挨了批评。不久，全县展开了借粮斗争，随之而来的过火行动和红枪会暴乱，使借粮运动停止了。

宁阳、汶上两县地处平原，离济宁较近，是敌占区；泰安（西）县离津浦铁路近，当时大部分已沦为敌占区，群众借粮运动不好开展。特别是宁阳县，1940年3月17日，县工委成员曹广生、韩子安等在宁家庄被汉奸队长姚学柱捕去，文件、枪支全部丢失，工委完全暴露，地委指示转移到汶河以北肥城县境内活动，故该县未能开展借粮运动。

泰西的借粮运动，解决了贫苦农民的生活问题，渡过灾荒，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如肥城第三区借粮运动搞得既早又好，直到1941年泰肥山区变成敌占区后，仍人心向我，村村有我们的堡垒户、联络点，尽管敌人据点星罗棋布，但我们的抗日区政府、区队一直在这里坚持工作，其主要原因就是群众认识到共产党确实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所以不惜用生命来保护我们的党政军干部。

再者，借粮运动促进了泰西的建党、建政、建军工作。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提高了，大批的积极分子要求入党、参军，从而壮大了党的组织、干部队伍和武装力量。如肥城第五区，在借粮运动中就发展党员200多名，使党员总数增加到500人。同时，还有5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加入了抗日部队。在发展党员，建立基层支部的基础上，各地又整顿、改造了部分乡、镇、村政权，大力发展群众抗日组织，差不多村村建立起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自卫队、儿童团。

但是，在借粮运动后期，出现了一些过火现象。有的村贫雇农借完本村的又到外村借，借不到粮食就借家具、财物，以致伤害了部分中农的利益，失去了农村中一部分群众的支持与同情。特别在大峰山区，敌人利用了我们的缺点，制造了红枪会暴乱。

## 二、反特、锄奸、反顽斗争

继借粮运动之后，泰西党组织又领导群众进行了反特、锄奸、反顽斗争。

早在1939年，泰西国民党顽固派的代表人物、肥城县长田家滨就经常与我制造摩擦，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军分区第三营在群众配合下，将其驱逐到津浦路以东。是年11月，其残部张相

兰和肥城县红枪会头子勾结日军，袭击了我肥城第二区动委会，动委会干部李江等4人惨遭杀害，3人被俘，2人受重伤。军分区部队闻讯后立即追击，在肥城县城附近将这股反动势力大部歼灭，红枪会头子张启旺逃脱。

1940年初，肥城县魏家坊一带红枪会头子许光贤、丁传玺等人与张启旺勾结，网罗三四千人，聚集魏家坊，封锁要道，杀害我抗日区长、共产党员高会山及动委会干部5人，绑架我干部家属4人。为了打击顽固派及红枪会的反动气焰，军分区派部队攻克魏家坊，将许、丁等18人击毙，张启旺率残部溃逃。我方也有较大损失。

1940年春，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泰西日、伪、顽串通一气，对我形成夹击之势。当时，由于我武装力量不足，一直未能予以致命打击。借粮运动进入高潮后，泰西党组织看到群众运动力量巨大，可以冲决一切反动势力，便决定引导群众开展反特、锄奸、反顽斗争。

肥城县的反特锄奸斗争声势最大，斗争中，提出了“打倒汉奸”“打倒准汉奸”的口号。大部分人对“特务”、“汉奸”的概念尚不清楚，对于“准汉奸”的概念就更加模糊，以致政策界限不清，出现了少数乱抓、乱杀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肥城县在“红五月”运动中，批斗汉奸83人，杀掉90余人（不含现在的王庄、仪阳乡）。开始，有关杀人的案件要经县委批准，由县政府审讯、处理、发布告，后来出现了滥捕现象，在押“犯人”迅速增加，县政府没有固定地点，也没监狱，逐渐增多的“犯人”的吃、住、转移都成了大问题，所以县政府采取了慎重态度，严格把关，该治罪的就收，不该治罪的不管谁送来的一律不收。原想通过这个办法约束一下乱抓人的行为，不料有的部门和区里借机把生杀大权揽过去，轻信检举和口供，出现了草率杀人的严重问题。王鸿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杀害的。他夫妻原都是教师，后

来他参加了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第四大队，又调到肥城县独立营第二连当文书。1940年“红五月”运动中他请假回家，晚上住到他舅舅董羽生家中，第二天就被人告发，当特务杀掉了。当时独立营对此案很有意见，立即将王的妻子、儿子保护起来，并将此案上报军分区。经泰西地委、专署调查，弄清了真相，原来告发王鸿乾为特务的两个人是为了报私仇而借刀杀人。后将二犯枪决，才稳定了部队指战员的情绪。肥城县还发生了另一桩冤案。原第六区区委书记路雇农(路明堂)，被肥城县汉奸头子张相兰抓去。不久，被他父亲保释出狱。路雇农获释后，回到肥城县委。县委召开了全县区委书记会议，宣布路雇农为投降叛变分子，当晚召开公审大会，时因出现敌情，即将其就地处决。至于路雇农如何叛变投敌的，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对县委此种作法，大家都很有意见。

不久，鲁西行署主任肖华在肥城县牛庄向泰西地委直属机关干部作报告，对泰西在“红五月”运动中杀人不当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不经县政府批准，不准杀人，更不准错杀人。还说，封建社会杀人案子还要逐级上报，重大案件要通过驿站送朝廷批，俗话说“命案跑死马”么！肖华的讲话为纠正泰西反特、锄奸斗争中的缺点起了重要作用。

泰西在反顽斗争中虽然打击了一部分真正的国民党顽固派，但也伤害了一些统战对象。董羽生是知名的士绅，在抗战初期，他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以民族利益为重，同情、支持党的抗日主张。在“红五月”运动中，由于看不惯群众的过火行动，发了些议论，说了些“怪”话。对他进行适当的批评教育是必要的，但肥城县却提出了“大张旗鼓地反对顽固分子董羽生”的错误口号，并在肥城第四区召开了万人大会，对他进行了批判，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在反顽斗争中，还有一些倾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也被揪斗游街。这些做法对统一战线工作产生了不

良的影响。

总之，反特、锄奸、反顽斗争，对于巩固泰西党的领导和各级政权，对于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斗争中的蛮干、偏离政策，以至发生草菅人命的个别现象，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某些曾支持过我们，与我们并肩战斗的人离开了我们，有的人甚至投靠了敌人。敌人则乘机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造谣惑众，煽动暴乱。

## 三、反封建、反浪费、节约救国活动

1940年春，鲁西妇救总会、青救总会、农救总会相继成立，泰西地区建立了相应的分会，并建立了基层组织、发展会员。这些群众团体在“红五月”运动中，开展了反封建、反浪费、节约救国活动。

在“红五月”运动中，广大妇女发动起来了。她们有了粮食渡荒，保住了一家老小的命，对共产党从心里千恩万谢。她们热切希望摆脱封建压迫，争取平等，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泰西各级妇救会为了广泛地组织妇女投入抗日运动，提出了“反封建”、“反虐待”的口号。肥城县第五区妇救会在区委支持下召开了反虐待大会，对米山岭村王泗莲虐待儿媳妇的典型事例进行了控诉。接着，县妇救会在西里村召开了万人大会，发动妇女对万恶的封建压迫进行了声泪俱下的控诉。县妇救会会长李虹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县妇女自己起来教育自己、组织自己，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一个妇女要求解放的运动在全县迅速展开，广大妇女纷纷要求参加妇救会，并积极承担为我部队加工米面，做军鞋、军衣等任务。因肥城县妇女工作搞得热火朝天，被评为泰西妇女工作模范县。但是，肥城、长清等县在号召妇女“放足”、“剪发”过程中，发生了强迫命令现象，个别地方在集市

上当众逼着妇女剪成短发，解下裹脚布。还有的地方出现游斗作风不正派的女人。尽管这样做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容易脱离群众。

“红五月”运动中，泰西青年抗日救国分会积极开展工作。当运动进入高潮后，仅肥城县就有1.2万名青年组织起来。当时，由于肥城、长清县青救会工作扎实，曾受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表彰。1940年5月4日，分局书记朱瑞在《大众日报》上发表的《山东青年的当前任务》中写道：“在组织青年和培养干部上，山东有两个模范县，这就是肥城和长清。”并提出全山东“学习肥城青年，培养青年干部20万”，还号召“每个青年应积极参加改善生活的斗争，或参加斗争并领导斗争”。上级的表扬，使肥城、长清县青年受到了很大鼓舞，工作更积极了。但是，也出现了某些过火行为。肥城县第三区的儿童最为活跃，他们发动5000多人拾柴草5万多市斤，交给了区公所，以供部队、军烈属、贫困户烧用。他们还自发地提出了“抵制日货”、“反对浪费”、“节约救国”、“禁止吸烟”、“破除迷信”等口号。但是有的不分大烟（鸦片）、洋烟（烟卷）、旱烟一律禁止，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肥城、长清两县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拔烟苗”、“撅烟袋”等活动。大峰山区的儿童团把群众供奉的灶王爷、财神爷烧掉，把仙家楼扒掉，对吸烟的、喝酒的乱斗乱罚，这就超出了当时群众的觉悟，引起了一些反感。

反封建、反浪费、节约救国活动，是“红五月”运动进入高潮之后，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掀起的群众运动，是“红五月”运动的扩展。反封建，帮助妇女摆脱封建枷锁；反浪费，禁止大吃大喝，提倡节约，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脱离实际情况，搞过了头，就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

## 四、大峰山红枪会暴乱

“红五月”运动中的过火行动，使我们失去了部分群众的同

情和支持，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大峰山区，有一个出名的红枪会头子朱存祯（绰号朱小辫），他原来野心就很大，早在1938年10月，长清县普遍建立抗日自卫队时，我当地党组织就动员他将红枪会易名为自卫队，团结他抗日，但他坚持自卫队要由他当团长，要配备两名护兵，还提出其他种种无理要求，我当然不能让他遂愿。1939年，大峰山区成了泰西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在这里掀起了建党、建政、建立抗日武装的热潮，朱小辫更找不到机会当“草头王”。1940年“红五月”运动后期的过火行动，给朱小辫以实现野心机会，日伪也乘机利用他。朱小辫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反革命舆论，胡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八路军扒庙拉神。”“共产党连吸烟喝酒都反对，还有老百姓过的么！”一时迷惑了部分群众。在日伪扶植下，朱小辫建立了长(清)肥(城)平（阴）红会总团部，共600余人，由朱小辫任团长，并在各区、乡成立了红会局子，强迫各村建立红枪会。他们的口号是“不反张（张耀南，泰西专员）、不反韩（韩培成，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只反工作员”，也有的说“专反妇女、儿童团”，企图离间我们的党群关系，孤立泰西各级党组织。朱小辫投靠日军后，不断配合敌人“扫荡”，袭击抗日组织，破坏抗日工作，同时，四处骚扰、欺压百姓、搜刮民财。我长清县区级以上干部不得不转移到黄河以西。敌人封锁了黄河，切断了长清县委和黄河东各区以及泰西地委的联系。在肥城、东平、平阴县边缘地区，亦发生了小股红枪会暴乱。

为了扭转泰西形势，军分区陕北营（这个营多为红军干部、战斗力很强）和长清县独立营于1940年8月，到大峰山区卧牛寨打击了朱小辫的反动气焰，并散发传单，揭露朱小辫的罪恶。9月，军分区部队攻打坦山红枪会总团部，俘数百名红会会员，经教育后释放。11月，泰西专员张耀南带领部队再次到坦山平息红枪会暴乱，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经过几次军事打击，加上政治

上的分化瓦解，朱小辫等反动头子渐渐孤立了。这时，长清县委根据鲁西区党委的意见，到群众中去，虚心地进行自我批评，以取得谅解。县、区干部到村子里去检讨错误，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揭露朱小辫的汉奸罪证，终于使群众真相大白。1941年春，朱小辫又率队到长清第三、七区“扫荡”，我区队在群众的协助下，将其击毙。从此，红枪会在大峰山土崩瓦解了，各基层政权又重新回到我党手中。

## 五、“红五月”运动的停止

1940年7月，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由山东去延安路过泰西，在泰肥山区未能及时与泰西军分区联系上，却和肥城县长兼县大队长李文甫联系上了。7月4日凌晨，李文甫把徐向前一行送到杨庄军区司令部，和政治委员李冠元、司令员王叙坤相见。在杨庄，徐向前接见了泰西地委民运部长徐麟村等地委、专署、县、区干部，听取了泰西干部对“红五月”运动的反映，看了地方小报上登出的有关“红五月”运动的消息。在这里，他还得到大峰山等地红枪会暴乱的消息。徐向前认为关于“红五月”运动的有些提法不妥，他语重心长地对泰西干部讲，只有动员更广大的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否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应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推到敌人那里去，我们是不可能夺取抗日胜利的。徐向前的指示，使泰西地方党政干部受到了极大教育。徐向前到达鲁西区党委后，向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提出要尽快纠正泰西“红五月”运动中的缺点错误，从而引起了鲁西区党委的重视。

1940年8月，张霖之根据徐向前的指示，亲自来泰西，对泰西“红五月”运动中的缺点错误进行调查处理。9月初，在肥城县大董庄、固留、尚里一带召开了泰西地区活动分子会议，因当

时敌人“扫荡”频繁，会址不断转移，故有“流动大会”之称。会上，张霖之批评了“红五月”运动中的缺点错误。这次会议，对“红五月”运动的缺点错误指出来了，并且作了纠正，但对主流、成绩方面未作肯定，因而挫伤了部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不久，“红五月”运动停止了。

1940年泰西“红五月”运动，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抗日根据地，战胜敌人的一次了不起的群众运动，尽管工作有某些缺点、错误，但它的主流是好的，历史意义是重大的。

（吴绪伦　执笔）

# 濮范中心区的民主民生运动*

中共范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濮县、范县的民主民生运动，是从1942年9月开始的。当时，冀鲁豫区党委为了在全边区普遍开展民主民生运动，首先组织500余名干部的政民工作队，到濮、范等县搞试点，以取得经验。1943年1月，试点工作结束，除少部分工作队员留在濮、范二县继续工作外，其余绝大多数人被分到全边区各地，成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骨干。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从中心区的试点燃成了燎原之势。

## 一

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严重退缩。由于历史等原因和艰苦的对敌斗争，边区党组织在发动群众方面不广泛，不深入。在敌占区、游击区，实行靠民族观念、国家观念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政策还可以，但是，在一直没被敌人占领的根据地，因民族矛盾不太明显，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比较突出了。我们没有把广大农民真正发动起来，所以他们和共产党、八路军还有一定距离，这就给根据地建设带来一些困难。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中共中央又在党内发出了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专题部分第470—478页。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要求在各根据地发动群众，掀起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6月30日，中央北方局发出了《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要求边区全党全军把发动群众做为中心工作。根据中央和中央北方局的有关指示，冀鲁豫区党委于1942年7月初召开了民运工作会议，决定在边区开展民主民生运动。9月中旬，刘少奇在由华中到山东分局返回延安途经冀鲁豫边区时，就革命战略和策略及当前工作做了指示。关于群众运动问题，他指出，我们对敌斗争的形势，将会日益复杂、严重，艰苦的局面还在后边；如果不迅速地把群众发动起来，给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就很难得到群众广泛的、长期的支持；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根据地就不能巩固，总有一天，敌人会把我们挤垮、赶走；没有牢固的群众观念，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

之后，冀鲁豫区党委立即决定把民主民生运动做为全边区的中心工作，并决定派工作队先在范县、濮县搞试点，创造经验，尔后在全区普遍开展。区党委迅速从边区党校、行政干校、陆军中学及边区抗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中抽调500余人，组成政民工作队（也称减租减息工作团），在范县道口村召开成立大会。总队负责人有信锡华、孙光、刘星、高元贵等。濮县工作队有队员200多人，由边区抗联农救总会生活改善部部长徐麟村和杨锦堂负责；范县工作队也有200余人，由边区抗联农救会总会组织部长杨节任队长，李德胜任副队长，胡传孝任教导员，他们先后于9月下旬到达驻地。

## 二

政民工作队刚到达濮、范二县，敌便于9月27日开始对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大“扫荡”，等“扫荡”过后，10月初，政民工作

队才正式开展工作。

当时濮、范二县总的情况是，我们取得了优势，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比较健全，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也已实行。但在农村，有一部分村庄仍是封建地主掌权，所以各阶层对我们的关系不正常，地主对我们不满，表面上应付，暗中反对、破坏；中间力量有的跟地主走，有的对我采取观望态度；基本群众由于没有得到切实的利益，不是十分依靠我们，这样，我们的治理力量表现比较薄弱。

具体看，濮、范二县因历史环境不同，呈现出来的情况又不尽相同。

在濮县，由于顽军高树勋部长期盘踞（1942年春才撤走），所以，各阶级的情况是这样：（1）地主，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与顽军勾结，不承担抗日负担，鱼肉乡民的恶霸地主；一种是直接或间接掌握村政权，用贪污、减、免等办法减轻或逃避负担的地主；一种是经济地位下降的中小地主。前二者反对民主民生运动，后者要求开展民主斗争。（2）富农，受顽军敲诈，受地主压迫，经济地位下降很大，因此，要求民主，反对贪污，但是对减租增资不感兴趣。（3）中农，经济地位严重下降，一部分下降为贫农，要求实行民主，改善民生。（4）贫、雇、佃农，生活极苦，支差频繁，强烈要求开展民主民生斗争。（5）游民分子，特点是"有奶便是娘"，为各种人利用，但也有改善生活和实行民主的要求。总之，由于受顽军的长期统治与蹂躏，除少数和顽军狼狈为奸的大地主、当权者外，不要说贫、雇、佃农无法生存，就连一些富农、中小地主都感到生活不下去，都有一种要求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欲望。

在范县，由于抗战以来基本上为我们所控制，所以顽固势力长期处于劣势。但我们没有抓紧广泛、深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长期维持了上优（上层占有优势）下劣（下层处于劣势）的形

势，形成各阶级下列情况：（1）地主，或利用我们某些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过于看重士绅、名流，对我们阳奉阴违，采取欺骗手段，找合法代理人；或操纵村政权，蒙蔽群众，并嫁祸于我，造成群众对抗日民主政府的不满；或利用他们传统地位和与我机关接触较多，炫耀自己，离间群众与我的关系，对我们开展工作形成一种阻力。（2）富农，因地主操纵村政权，把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变质，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所以对我们持消极观望的态度。（3）中农，负担较重，支差频繁，政治上历来无地位，有开展民主民生斗争的要求，但因我们没有广泛、深入开展这项工作，所以对我们冷漠、失望。（4）雇、佃、贫农，对减租减息增佃要求迫切，但因我们没有广泛、深入开展这项工作，所以对我们不够相信，不敢依靠。（5）游民分子，还没有被我们掌握和利用。

总之，由于我们在局面打开以后没有真正地实行民主民生，使得顽固分子反对我们，基本群众也没有紧紧依靠我们。

根据上述情况，区党委决定工作队的方针是：协助当地抗联发动农民对封建势力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树立农民，首先是佃、雇、贫农在农村的优势；对地主掌握的村政权，在斗争后予以改造。策略是：先斗争，取得优势，削弱地主的统治和威风，然后再讲团结，一打一拉，先打后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方法是：可以从减租减息入手，也可以从反贪污、查“黑地”入手，依具体情况而定，总的叫做民主民生运动。同时决定，区、村抗联弱的地方，工作队可以直接出面，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政府是“三三制”政权，不出面进行斗争，但应支持斗争。

## 三

10月初，民主民生运动开始。

在濮县，是从反贪污、实行简易合理负担这一民主斗争开始的。反贪污，主要是反顽军在时敲诈、勒索群众，贪污、逃避负担者。实行简易合理负担，是将田赋地分级评议，自上而下派粮。这项斗争，25天完成了370个村庄，占全县88.5%。经过这一民主斗争，濮县除了很快完成了320万斤的屯粮任务外，广大群众生活得到了部分改善。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减租、减息、增佃、增资、查“黑地”、改造村政权等项工作。在范县，因顽固势力的蒙蔽力还较强，中间势力尚未分化，就先从减租、增佃、增资入手，通过给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与顽固势力划清界线，然后再开展反贪污、查“黑地”、改造村政权等项工作。

两个县虽因情况不同，开展工作的起点不同，基本内容是一样的。下面叙述一下具体情况。

减租减息，是先从减租、增佃开始的，一开始没有进行减息。因农村债务关系不固定，债权人不一定是地主、富农，债务人也不一定都是基本群众；再者往往是债务人托人借钱，这样债权人不公开，所以，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时，不便进行减息。

减租、增佃、增资工作，一般经过3个阶段。第一是发动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首先要了解本村地主与佃户的数目，租佃关系和剥削情况，以及佃户的觉悟和斗争情绪，地主的特点。情况了解清楚后，再召开佃户会，鼓动、组织他们。第二是斗争阶段。斗争的目的是减租、增佃、增资。斗争的方式一般是召开群众大会，但对于个别地主，在给他们讲明政策后，愿意按政策办事者，就不开斗争会。斗争中，要壮大佃、雇农的声势，鼓动他们敢于斗争说话。减租，是从1940年抗日民主政府建立算起，过去3年交的租按二五减，即每100斤退给佃户25斤，此后佃户交租，则按原来交的数量的25%减。这是总的标准，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大种地是减去定额地租的25%，小种地则是增加佃户原分

得数的25%（又称增佃）；过去的欠租，年数久的免交，最近者按减租后的数分期交。同时，工作队领导雇工进行增资斗争。第三是巩固与团结阶段。减租增佃后，为了防止地主退佃，工作队鼓励和领导佃户同地主签订长期契约，使佃户有永佃权。这样一来，不只给广大贫苦农民以看得见的利益，改善了他们目前的生活，还保证了他们的长远利益，从而激发了他们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阶级觉悟。

在进行减租增佃工作同时，规定农民按减租之后的数目继续交租，保障地主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和地位。这样，打击了日军、投降派引诱地主投降、反共的阴谋，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在群众基本发动起来后开展了减息工作。减息根据情况分别处理，抗战前的息至今没交的，可按分半计算来交。如年年交息的不再倒，按已交息总额来计算。所付息超过本钱1倍者，可停利还本。分期还，3年或4年还完，这中间不再交息；所付息超过本钱2倍者，可本、利不再付。这样既减轻了债务人的负担，也照顾了债权人的利益，保证了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

查"黑地"，实行合理负担。濮、范二县，地处黄河滩区，临黄河的土地极不稳定，所谓"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三年穷，三年富"，就是此意。地主、富农、恶霸往往强占黄河淤地，但不上地亩册。如范县，偌大个县，地亩册上只有7777顷，其实，能耕地远远地超过此数。再者过去大地主、富农常乘贫苦农民之危，买地不带粮——即买走土地不履行交公粮的任务。这样造成了有地的不交粮，交粮的没有地的极不合理的现象。群众迫切要求工作队解决"黑地"问题。工作队领导开展了反"黑地"斗争。

工作队发动群众在各村组织起清丈地亩小组，把地契和"完粮单"与现实种的地进行对照。同时，一方面发动长工、佃户与

“当家的”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黑地”，迫使他们认罪，补交公粮；一方面明确宣布，中农有“黑地”，只要如实报出，今后按数交纳负担，可不退补过去的。这样团结了中农，孤立了地主、富农、恶霸。

经过反“黑地”，落实了土地数目。仅范县查出的“黑地”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60%以上。例如储洼村，该村在反“黑地”前征税地为2800亩，反“黑地”后增加到4200亩，查出“黑地”1400亩。这一具体情况表明当时“黑地”的严重程度。这样，经过反“黑地”落实了土地数目，为切实实行合理负担打下了基础。

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合理负担有5项原则：（1）富力大的多负担，富力小的少负担，极穷的不负担。（2）最大的地主，负担数也不能超过其收入的30%。（3）以县为单位，有负担的农民，不能少于80%。因为抗日负担是人民的义务，如不拿负担的农民多了，地主、富农必然承担得多，多了就要评超过其收入的30%。这是不符合统一战线原则的。（4）不要因拿负担进而妨碍生产。（5）不论地主和佃户都应按规定比例交纳负担。

根据这些原则，工作队在查清“黑地”后，按土地的好坏进行评议，分等划级，按五等十一级计算出标准亩数。分等划级如下表：（见279页）

按表算出每户的标准亩数后，再按每户全家人口平均，每人去掉1亩基本田，对超过者，每级按二分的累进率来折算负担数。这种按累进率计算合理负担的方法，打破了不合理的平均摊派，符合富的多拿，穷的少拿，没有的不拿的原则，从而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工作队的第三项工作，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改造村政权，把村干部中的恶霸、坏分子，顽固势力的代理人，欺压群众、通敌通匪分子，通过改选换下去，把积极分子选上去。在政

| 等级 | | 收获量（石/亩） | 每亩折标准亩（亩） |
| --- | --- | --- | --- |
| 特等级 | 1 | 2.5以上 | 临时折 |
| 上等级 | 2 | 2——2.5 | 1.8 |
| | 3 | 1.8——2 | 1.5 |
| | 4 | 1.6——1.8 | 1.3 |
| 中等级 | 5 | 1.4——1.6 | 1.15 |
| | 6 | 1.2——1.4 | 1 |
| | 7 | 1——1.2 | 0.85 |
| 下等级 | 8 | 0.8——1 | 0.7 |
| | 9 | 0.6——0.8 | 0.55 |
| | 10 | 0.2——0.6 | 0.3 |
| 劣等级 | 11 | 0.2以下 | 不负担 |

注：第6级为标准亩

治上刹住顽固势力的气焰，保证和巩固农民在农村的政治优势。

通过减租减息，查“黑地”实行合理负担，改造村政权的民主民生运动，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农村中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纷纷建立，且十分活跃。在斗争中，涌现出不少有勇有谋的群众领袖。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如征收等也都顺利地展开。特别是，党的建设也逐步得到了加强，总之，民主民生运动的开展，使根据地焕发了蓬勃生机。

1943年1月，濮、范政民工作队的工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胜利完成了任务。区党委在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后，在全边区铺开了民主民生运动。

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就这样在中心区的推动和影响下，一浪高一浪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张瑞雪　执笔）

# 微山湖区交通线*

**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敌后开辟了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驻地沂水，经冀鲁豫根据地，通往太行、延安的秘密地下交通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微山湖区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东起津浦铁路沙沟车站西的彭楼，西到湖西单（县）虞（城）根据地，水路15公里，陆路100公里。在这条湖区交通线上，活跃着我地方武装——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沛（县）滕（县）大队，他们配合沛（县）滕（县）边县委、沛（县）滕（县）边联合办事处，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朱瑞、肖华、罗荣桓、陈光在内的1000多名往返于苏北、鲁南、延安的我党高中级领导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0月，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在微山湖东岸的夏镇建立了交通站。主传珍、张新华分别担任正、副站长，沟通了鲁南到湖西的交通联系。1938年12月，沛（县）滕（县）边县委成立。翌年4月，县委在昭阳湖东的汇子村召开沛（县）滕（县）边士绅名流和农、工、商各界代表大会，成立沛（县）滕（县）边联合办事处，民主选举苗宗藩为办事处主任，沛县国民党县长冯子固为名誉主任。办事处设在夏镇南三孔桥水火庙。沛（县）滕（县）边联合办事处是联合各界抗日的统一战线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专题部分第538—545页。

性质的县级政权组织。抗战初期，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微山湖区的抗战形势蓬勃发展，不仅基本群众发动起来了，一些上层人物也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从1938年底至1940年10月，是微山湖区抗战形势最好的岁月，也是党组织大发展的时期。1940年10月，沛县、铜山等县日、伪、顽军2000千余人对我微山湖区党组织和武装力量进行了合围，企图一举消灭。我党为保存革命实力，暂避其锋芒，党政军民千余人于10月20日晚乘船撤离微山湖，安全到达湖西抗日根据地。湖东、湖西的交通联系中断。我西撤后，敌、伪、顽三位一体向我根据地发动进攻，沛县地方顽军冯子固派胡子良团占领部城寨子、刘昌庄，徐州伪淮海绥靖区郝鹏举保安团长尹洪兴在夏镇泰山庙、三孔桥、南庄安了据点。伪济南绥靖区派保安第二旅阎成田团在临城、郗山、微山岛安了据点。沛（县）滕（县）边抗日根据地一片恐怖。西撤后留下的以王洪垒为书记的县委转入地下，坚持湖区斗争。

1940年底，鲁南区党委指示沛（县）滕（县）边地下县委，无论如何要建立一条湖上交通线，主要负责接送过往干部，转运物资。1941年1月，湖西地委指示张新华离开教导第四旅独立团，回沛（县）滕（县）边县组建抗日武装。张新华带警卫员杨瑞芳来到湖东夏镇后，即和地下武装人员刘德功、袁振华、黄克俭等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小部队。3月，配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参加了杏园战斗；7月，又协同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参加了攻打小阎团的战斗，解放了微山岛，曾一度恢复了湖区交通线。这支小部队在战斗中发展为微湖大队。

1942年4月，6000名日伪军五路合围微山岛，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峰县大队等我地方武装与敌激战，毙敌300余人，尔后，被迫撤离这一根据地。至此，湖西到鲁南的交通线完全被敌人切断。由于日军对根据地实行分割、“蚕食”政策，所以我鲁南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被压缩成南北10余里、东西一线牵；沿湖一

带，日伪军碉堡林立，沟路纵横。这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微山湖区的党政军民面临着严峻考验。山东分局和鲁南、湖西党组织指示，在微山湖地区活动的抗日游击队，一定要重新开辟一条湖上交通线，要在敌人眼皮底下确保我过往干部的安全。

为了加强微山湖区我地方武装的领导，确保湖区交通线的畅通无阻，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向铁道游击队充实了领导力量，先后委派政治素质高、领导能力强的杜季伟、张洪仪、郑惕等担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湖西地委也委派孙新民、老红军胡桂林到微湖大队分别担任政治委员和副大队长。临行前，湖西军分区首长对孙新民、胡桂林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开辟一条秘密湖上交通线，配合铁道游击队护送过往的干部。"

孙新民来到微湖大队后，同大队长张新华对盘踞在湖区的日、伪、顽势力逐个进行分析，认为伪团长尹洪兴比较好争取。尹团驻扎在夏镇一带，像一扇铁门扼守着交通要道，若将其争取过来对我开辟交通线十分重要。沛（县）滕（县）边县委首先派共产党员刘家廉打入伪军尹团任军医，然后利用工作之便同尹洪兴直接建立了关系。此后不久，孙新民通过刘家廉冒险深入虎穴，同尹洪兴进行了谈判。孙新民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尹洪兴权衡利弊，答应撤掉南庄附近几个据点，双方达成了互不为难、互不侵犯协议。"大门"打开了，我湖区交通线又恢复起来。

## 二

微山湖区交通线，曾安全护送过刘少奇、陈毅、朱瑞、肖华、陈光、罗荣桓等领导人。

1942年7月，刘少奇视察山东工作后，在张爱萍、曾国华等陪同下，过微山湖去延安。

鲁南区党委书记王麓水把湖东一段护送任务交给铁道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政治委员杜季伟、大队长刘金山带领10余名精悍队员，护送刘少奇过津浦铁路，在微山湖边的蒋集移交给微湖大队的大队长张新华。张新华是奉湖西军分区司令员邓克明、政治委员潘复生之命，先与沛（县）滕（县）大队政治委员李明接上的头，然后见到了刘少奇等领导人。

在微山湖边，张新华面对苇荡一击掌，芦苇丛中齐齐地划出几只小船来。刘少奇等坐上船，向铁道游击队的同志挥手告别。小船沿王鲁河，穿芦苇荡，飞驶湖心。1小时后，到达大捐村。大捐村，位于微山湖的中心，是京杭大运河、王鲁河的交汇处，是我抗日模范村，也是湖上交通员的落脚点。到达大捐后，刘少奇又换乘小艒，驶向大捐西南，在一个芦苇包围的沙峪上落了脚，晚上则住在刘钦田夫妇的大船上。

第二天上午，紧张工作了半夜的刘少奇又找来沛(县)滕(县)边县委书记张庆林等人谈话，殷切地说，微山湖区交通线是山东、华中通向延安的唯一通道，一定要保住这条水上交通线；要加强领导，统一行动，坚持斗争；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不断地扩大革命根据地；要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这天傍晚，微湖大队护送刘少奇越过微山湖，同湖西军分区派来接刘少奇的骑兵排相遇，护送刘少奇等到达湖西地委驻地终兴集。刘少奇在湖西地委停留时，对进行减租减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发展群众武装等作了重要指示，对湖西根据地的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2年的秋天，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研究决定让肖华前往太行山，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山东分局对敌斗争的形势和抗战五年来的工作情况，途中就便检查一下湖西的工作，传达刘少奇这年春天对山东抗战工作的指示精神。与肖华同行的有一个警卫员和两个秘书，警卫员叫徐登坤，秘书一

个是康茅台，一个是肖华的夫人王新兰。

肖华一行从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关驻地莒南县十字路上马启程，渡过沂河，便进入鲁南抱犊崮山区。在费县一个小村里，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王麓水向肖华详细汇报了鲁南的斗争情况。由于日军采用“分进合击”、“清剿剔抉”、“铁壁合围”等战术，频繁进行“扫荡”和“蚕食”，所以鲁南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南北最宽的地方10余里，窄处仅有一二华里。听了介绍，肖华概括说：“鲁南的党政军民是站在一条线上了。”这句话把张光中、王麓水给逗笑了。

铁道游击队政治委员杜季伟带10多名身着便衣、腰插驳壳枪的队员，赶到鲁南去接肖华一行。肖华等人换上便衣，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经过一晚上的夜行军，赶到枣庄、峄城之间的丘陵地带。因为天亮了，只好隐蔽下来，等天黑下来，又继续前进，奔波一宿，赶到南沙河附近一个小村里。这一天，杜季伟向肖华详细汇报了铁道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听了杜季伟绘声绘色的介绍，联想到路上所见所闻，肖华事后写下一首诗赞颂道：

神出鬼没铁道旁，　袭敌破路毁沟墙。
深入兽穴斩虎豹，　飞越日车夺械粮。
汪洋大海游击队，　怒火熊熊敌后方。
条条铁轨成绞索，　寇灰满载运东洋。

后半夜里，铁道游击队把肖华一行送过津浦路，又走了七八里，与微湖大队派来迎接的大队长张新华接上了头。杜季伟等完成了护送任务，返回路东。黎明时分，张新华领肖华一行上了渔船，进入了水汽弥漫的微山湖里。肖华等人在湖里饱餐一顿味道鲜美的鳝鱼汤后，听取了张新华的汇报，指示不要贪图打仗，要缩小目标，争取多做一些实际工作；要注意搞好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搞好了，才能确保湖上交通线的畅通无阻，要想法

不要让各方面势力和我们作对，找我们的麻烦。后来张新华这样做了，取得了较好效果。

当天夜里，张新华带领微湖大队队员送肖华过微山湖，弃舟登陆，又走了七八里地，遇到湖西军分区司令员邓克明和政治委员张国华派来接肖华的骑兵排。鸡叫时分，肖华一行顺利赶到湖西军分区司令部。

1943年9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参加党的“七大”，需经微山湖去延安。随行过湖的有两个警卫员和一个交通员，还有当时担任湖西地委组织部长的陈璞如及其爱人苏健，以及一同回湖西工作的李仅有、王效斌、王其仁等9人。朱瑞骑一头大黑驴，从沂水出发时，因是根据地，可以白天行军；进入游击区和敌占区后，就白天隐蔽，夜晚行路。护送的是刘金山、王志胜带领的十几位腰插两支短枪的铁道游击队员。过津浦路时，铁道游击队员每人挟一块长木板，铺到铁路两边的护路沟上，朱瑞等踩着木板越过铁路。过了铁路，来到微山湖边一个叫蒋集的村庄休息吃饭。饭后，朱瑞叫来苏健，对她说：“我的眼看不清，你到老乡家找针线帮我缝缝这个布袋。”说着朱瑞由腰间解下一个黑布袋子，沉甸甸的，破洞处闪出耀眼的金光。朱瑞小声对苏健说：“这里边是金砖，你可要保密，这是我上交党中央的经费。我们党太困难了，处处需要钱啊！”听了朱瑞的话，苏健一边点头，一边一声不响地用针线把两个破洞密密地补好。

第二天晚上，张新华、孙新民带手枪班来接朱瑞。铁道游击队完成了任务撤回铁路东。朱瑞原打算在湖中呆一两天就过湖，谁知情况发生了变化。湖西交通员送来了湖西地委书记潘复生的信，说湖西日军正在进行大“扫荡”，等敌人“扫荡”后，再请朱瑞过湖。这样，他们只好在湖里待着，一住便是十几天。朱瑞利用这段时间，轮流接见活动在微山湖区的我地方武装负责人，广泛深入地了解情况，分别作了一些具体指示。朱瑞对微湖大队

的孙新民、张新华说，你们要加强领导，要注意开展群众工作。

半个月后，朱瑞一行9人，在微湖大队的护送下，安全渡过微山湖，夜行140华里，到达湖西单（县）虞（城）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著名儒将、新四军军长陈毅曾两渡微山湖。一次是1943年的冬天，由铁道游击队的刘金山和独立支队副政治委员杨广立亲自护送过微山湖。陈毅在微山湖，对刘金山、杨广立、沛（县）滕（县）边办事处主任王墨山说了三句话：坚持对敌斗争，确保交通安全，加强部队建设。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陈毅从湖西返回湖东，去山东分局的沂水。陈毅过湖，触景生情，曾留下了两首著名诗篇。一首是《泛微山湖遥望微子墓》：

泛湖遥瞻微子墓，
千古尧称周之顽。
而今滕薛踞倭寇，
投敌蒋党应自惭。

另一首是《夜宿微山湖畔》：

横穿江淮七百里，
征途已到微山湖。
鲁南山影嵯峨甚，
残月扁舟入画图。

抗日战争时期，在严酷复杂的环境中，通过微山湖区交通线，护送了众多的干部，传达了数以千计的情报，奇迹般地没出一次差错，这是微山湖区党、政、军、民对抗战胜利做出的突出贡献。

（李金陵 执笔）

# 鲁西北艰苦卓绝的抗灾救灾斗争*

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鲁西北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重灾荒中渡过的。1939年开始，接连发生了水、雹、疫、旱、蝗5种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是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的大旱灾和1944年的蝗灾。敌祸天灾，曾一度使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多个区的1000多个村庄、约40万人口的骇人听闻的无人区；使冀鲁豫第三专署（即鲁西北专署）的1.8万顷可耕地，荒芜0.75万顷。为了生存，为了抗日，鲁西北各级党组织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灾救灾工作。

## 一

马颊河与冠堂公路交叉一带，在抗日战争时期分别是莘县、冠县、堂邑、武训、聊堂（边）、冠堂(边)、永智等县辖区的一部分（即现在的山东省莘县、冠县、聊城市、临清市接合部），因这一地区是贯通冀鲁豫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以敌我争夺甚为激烈，受敌摧残也更为严重。从1942年开始，日军为进一步侵占冀鲁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对这一地区加紧了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在冠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专题部分第571—583页。

堂公路两侧挖掘深数米、宽数丈的封锁沟，安设了无数碉堡、据点，疯狂地制造无人村、无人区，以破坏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盘踞该地区的国民党土顽齐子修、吴连杰、冯寿鹏、栾省三、周致中、刘中浮等部数万人，也加紧和日伪勾结，积极向抗日军民进攻，在人民群众生活已经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到处烧杀抢掠，看到谁家的烟筒冒烟，便去抢粮；看到哪个群众耕地，便去抢耕牛和种子；实在没东西可抢，便去摘门窗。仅齐子修部在该地区就危害及300余村，张柳邵村原有101户，齐部烧杀3天之后，仅剩30户，而且家家关门不能外出生产；王羡村被烧杀摧残致死1200余人；高庄堡原有200多户人家，经齐部烧杀后，仅剩与该部有亲友关系的3家。另外，这个地区封建地主顽固势力的统治也很厉害，大部村有围寨，有武装民团，有地主控制的村政权，他们欺压民众，额外摊派，迫使大批农民破产。敌、伪、顽三位一体的残酷烧、杀、掠夺，造成了这一带农村经济的严重枯竭，连部分富农都失去了抗灾能力。

正在这时，鲁西北在接连遭受1939年以后的水、雹、疫灾之后，又遇到了百年未有的大旱灾。1941年旱情就特别严重，粮食收成很少。1942年秋至1943年8月，从未下过透雨，马颊河两岸与冠堂公路两侧一带是高亢地，旱情更为突出。1942年夏秋的情况是：秧苗没等到结籽就枯死了，未到秋收季节，田野就变成了一片枯黄，有人说一根火柴能把地里的庄稼点燃。秋季除个别低洼地的早瓜、早红薯有一点收成外，晚秋作物都绝收了。据对莘县天齐庙村的调查，该村1941年平均亩产170斤，1942年平均亩产40斤，1942年冬和1943年春赤地千里。而该村尚属土质和水利条件较好的村。

敌祸天灾的双重逼迫，使这里的抗日军民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毫无抗灾能力的群众和与民同命的党政军民工作人员，从1942年秋后开始，只好以糠菜代食，以草籽、棉籽、树皮等充

饥。后来这些东西也吃光了，群众便开始了毫无目的的大逃亡。去河南、闯关外，从这村逃到那庄，从这城奔往那城，挣扎在饥饿和瘟疫的死亡线上。聊城（包括原聊堂和堂邑县的大部分，下同）逃荒者达64%。许多人为了活命，卖掉了妻子、儿女、田地、家产。1942年冬和1943年春，老人孩子大批死亡，开始还有人掩埋，后来连埋尸也无法顾及了，屋中、村内、路旁到处都有死尸。这时人相食的现象不断发生。据当时在桑阿镇一带工作的马子宽回忆，他曾亲眼看见几个无力的妇女，割了路边一个死人身上的肉，准备带回家去吃。桑阿镇的一个小孩，被袁菜庄的王××逮住烧着吃了。杜庄的牛××，曾吃过3个活人。桑阿镇附近的大花园头村，原有90多户，400多口人，其中逃亡的有80多户，12人被齐子修部抓丁，6人服劳役饿死，32名青年妇女改嫁他乡，6个不满14岁的女孩子被父母卖掉，14个吃奶的婴儿被遗弃，64口人饿死，12户全家死绝。茉莉营村，原有195户，943人，牲畜102头，房1200间，其中饿死212人，被敌人抓去失踪284人，被打死11人，外逃460人，死绝14户，被敌烧房935间，牲畜全被抢光，全村仅剩12人在家吃树皮树叶，有时偷吃死人。据统计，大花园头、烟庄等33个村，饿死1.1万多人；桑阿镇一带的63个自然村，饿死2.1万多人；聊城县饿死6万余人。这时，在以桑阿镇、辛集、堂邑为中心的漫漫大地上，尸横于野，树无绿叶，户无炊烟，呈现出一幅人类洪荒世界的惨象，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无人区。我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 二

鲁西北各级党组织从1942年秋即将抗灾救灾工作做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中心任务。而这项工作又是和恢复建设抗日根据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42年秋后，鉴于主力部队从这一地区撤走，日伪加紧“扫荡”、封锁及齐子修部侵占这一地区等情况，中共鲁西北地委根据上级指示，采取了一系列与敌进行生存竞争的措施：大力开展反资敌、反抢粮斗争；实行“三三制政权”；开展整风运动；实行精兵简政；轮训地方抗日武装，扩大民兵联防；实行经济反封锁，查禁伪钞；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号召群众将树叶、草根、树皮等代食品储存起来，借以充饥，等等。1942年底，八路军主力一部重返鲁西北地区，鲁西北地委积极领导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大胆深入敌后，配合主力打击敌人。经过清水、刘屯、汤村、二十里铺、田寨等战斗，形势开始好转，抗日政权逐渐恢复和建立；齐子修部也因遭我打击和无粮可抢而难以支持，大部撤出冠堂公路以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鲁西北地委及各级党组织派出救灾工作队（组）数十个，采取措施抗灾救灾。

**（一）组织粮款，实施急赈。**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调运350万斤急赈粮到鲁西北。鲁西北专署和各县抗日政府也设法筹集了一部分粮款，有组织地赈济了已建立抗日政权和两面政权村庄的灾民。党组织广泛发动了社会互济运动。在轻灾区，普遍成立了粮食调剂所，展开“一把米一升糠运动”，提出了“根据地是一家人，快快救济受难的同胞”，“一两米能救活一个人，一斗糠穷不了一家”等口号。各部队和机关团体，纷纷响应“一把米”的号召，取消了夜餐费助赈；每人每日节约1两（后改为2两）捐助灾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节约粮食数10万斤。莘县张鲁的文升粮店、王奉粮店，冠县的斜店、桑阿镇、白塔集粮店，在调剂粮食赈济灾民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轻灾区的群众和开明士绅，也纷纷响应厉行粮食节约急救灾民的号召，勒紧腰带支援灾区。仅朝（城）北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就向灾区捐助粮食数10万斤。党组织还组织武工队配合工作人员，昼伏夜出，到敌占区征粮赈济灾民。仅在堂邑

县东南一带，就征集到30多万斤公粮，鲁西北地区共从敌占区征粮上百万斤。上述急赈措施，对于缓和饥荒和机关部队的困难以及恢复生产，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

（二）**开展借征运动，就地自赈。**在成千上万人被饿死，灾荒发展到最为严重程度的时候，而部分地主豪绅却囤积粮食，借机廉价换取农民的土地和家产。为解决这一问题，鲁西北各级党组织根据群众要求和上级指示，开展了一场由党委领导，抗联出面，农会为主，政府调解的向地主借粮运动，借粮给群众，作为政府的预征公粮。借粮以"团结抗战，一致对敌，安定抗日秩序"为原则，以"同舟共济"、"借粮保还"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救济难民就是抗日爱国"等为口号。莘县、冠县都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派出工作组深入到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并对地主豪绅进行分类排队和宣传动员，申明大义，进行借粮。对于早拿出粮食的开明地主，大力进行表彰；对讨价还价的，则进行批评；对顽固的地主大户，群众代表小组即率大批群众登门说理，不借粮不散，甚至要他管饭；对因不满而勾通敌人报复者，抗日政府则依法追究。冠县桑阿镇一带，抗日民主政府大力表彰了主动借出余粮7000余斤的韩学信、刘士洪等开明地主士绅。同时打击了存有大批余粮而对灾民见死不救的桑阿镇民团团长刘延龙和恶霸地主刘世芳，共借粮4万余斤。莘县30个村借粮2.5万余斤、代用食品5594斤。政府将这些粮食赈济群众，并优先照顾烈军属和鳏寡孤独的老人。游击区的灾民，因受根据地借粮的影响，也在我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组织起来开展了借粮斗争。广大灾民通过借粮，渡过了严冬和春节。

（三）**有组织地安置难民逃荒，外地求赈。**对实在无法渡过饥荒的灾民，特别是老、弱、病、残者，抗日民主政府印发灾民证，介绍他们到外地区就食。冀鲁豫行署和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分别指示所属轻灾区设置了招待所或登记处，派遣得力干部办理

入境难民登记，按照难民的多少适当分配到各地区，发给一定救济粮，并以不同方式组织到生产战线上去，从发展根据地生产中解决其生活问题。

## 三

1943年早春，灾荒更为严重。鲁西北地委和专署对灾区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急赈措施，但饥饿和瘟疫仍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蔓延开来，受灾的村庄达1000多个，数十万人断了粮菜，其中上百个村庄已基本无人。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情况下，鲁西北地委根据上级党关于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指示，结合鲁西北碱土多，有存棉等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群众，着眼生产，因地制宜，军民自救的方针，即变消极赈济为积极的以工代赈，变抗灾救灾的死路为活路。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地、县、区都成立了抗灾救灾委员会，并在区设借贷组，村成立了以抗联为主的劳动互助组、合作社，在抗灾救灾委员会的领导下，借贷组和劳动互助组、合作社结合，负责粮、款、农具贷放和以工代赈的具体工作。合作社、互助组的组成主要是因地、因人、因家庭等情况出发，本着自愿结合，等价交换的原则，灵活地组织拨工换工，调剂劳动力，从事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其形式多种多样：有四坊互助组，即磨坊、油坊、粉坊、豆腐坊；有运输互助组，8人为一组，3人为一队，以部队掩护，到冀鲁豫边区中心运粮，来回5天，每人可得30多斤粮食，除自己吃外，还可养活1个人，用这种办法，运到鲁西北粮食280万斤，运输互助组得到约48万斤；有纺织互助组，主要参加者是妇女，由政府供给棉花，各县设点收购土布，织1匹布，可赚30元，按当时米价可买回3斤多米，每天还可以得贷粮2两；有熬硝淋盐互助组，每人每天可收入60元，能

买5斤多谷子；有掘井互助组，掘1眼土井可得贷粮30斤，砖井更多，可得二三百斤，并得到补助粮食八九十斤；有开荒翻地互助组，翻1亩地贷给四五斤粮食，等等。贷粮贷款的来源，主要靠各级政府和合作社出面向地主借，其次是靠反汉奸得来，靠到外地以硝、盐、棉纱、土布等换取，靠从敌人手里夺取。据1943年冠县抗日民主政府统计，通过合作社、互助组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向灾区群众贷粮5.3万多斤，贷棉花9万斤，贷款390多万元（冀南票）；对鳏寡孤独和烈军属发放救济粮15万斤，救济款52万元。

以工代赈政策的实施和合作社、互助组这种新型生产组织的出现，不仅把群众组织了起来，弥补了劳力、耕畜和生产工具的不足，促进了各阶层间的互助，增强了群众战胜饥荒的能力和信心，而且为抗日政府有组织、有领导地实施救灾创造了条件。人民群众称赞说："这会儿，俺们再也不要逃荒要饭了，共产党、八路军把死路变成活路，俺们得救啦！"

受尽艰苦的灾区群众确实得救了，自从开展以工代赈、生产救灾以来，并随着1943年春季来临，万物生长，树叶、野菜等代食品的增多，以及党、政、军、民结网捉兔为食（因土地荒芜、野草很高，野兔繁殖很快，六七人合作，一天可捉几十只），群众生活有了着落，谁也不愿背井离乡，数十万灾民稳定下来，大批逃亡灾民开始返回家乡。结果根据地和抗日武装也大大发展了。

## 四

1943年8月6日，鲁西北大地普降透雨，地委、专署立即下发了突击抢种晚秋作物的指示，号召鲁西北党政军民不失时机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彻底战胜灾荒，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抗

战胜利。

根据会议精神，各县突击组织抢种运动。各级党政机关减少办公时间，并在领导人的带领下，投入所有人力、物力，帮助群众耕种。很快，掀起了抢种热潮，除无人村部分荒地无力耕种外，基本完成了抢种任务。

与此同时，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队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口号下，在桑阿镇、贾镇、烟庄一带重灾区开荒生产，规定生产粮食3个月自给，蔬菜全年自给，一切办公用费及服装等完全自己解决。军分区4009人，种地9982.3亩，1943年秋至1944年秋除投资外，生产折款256万余元，每人平均约638元。地委、专署机关租种荒地700亩。聊堂、武训（1943年11月新建）、冠县、莘朝等县党政机关和县大队的生产也达到了自给或半自给。

党的领导和各级干部的带头作用，有力地带动了群众的大生产运动。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灾区人民，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和创造性，差不多家家户户鸡鸣下地，顶着星星回家，就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坐在地上，抡镐刨地。人与人、组与组、社与社、区与区之间，普遍展开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涌现出了杨培义等一大批劳动英雄。

这期间，鲁西北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战胜灾荒，促进大生产运动的政策和条令、条例、规定。比较重要的有：

（一）**回赎土地、亲人**。大灾荒中，广大贫苦农民典卖土地求生者甚多，但土地典卖价格却为数寥寥（有的几个窝窝即可换地1亩）；买卖人口的现象也相当严重，不少群众失去了妻子、儿女，此种土地变动和人口买卖，显非一种正常现象。灾荒基本解除以后，纠纷日多，直接影响抗日人民之间的正常关系和生产运动的开展，为此，鲁西北专署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于1943年冬农闲季节，进行了初步回地赎人运动；1944年11月至1945年初，又

作出回地赎人的决定。规定：凡地主、富农、汉奸所买农民的土地，汉奸所买地主富农的土地，准许全部赎回；农民互相间买卖的土地，高阶层的准许低阶层的赎回；阶层相等的可赎回一半；地主、富农、汉奸卖给农民的土地不准赎回；因债务关系而转卖之土地也要赎。关于赎人，规定凡因灾荒卖掉亲人者，买卖关系无效，可按原价把人赎回。武训县对辛集一带重灾区发放20万斤回地赎人贷粮。被迫卖掉土地和亲人的群众，看到党和政府的这些决定，无不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高呼“共产党是再生爹娘”。

（二）**与民休养生息**。为尽快战胜灾荒，鲁西北地委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如：招抚大批流亡人口回故土生产，对其中无力生产者，贷给种子、农具及生活粮。1943年11月专署一次就贷耕牛300头、粮食65万斤。对无地种者，政府帮助解决土地，并规定租种公地只交租不交公粮，种逃亡地主及政府没收汉奸之土地，只交公粮不交租，将汉奸之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及烈军属，大力赈济鳏寡孤独。制定了抚战勤务条令，严禁滥用民力，规定除参战外，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农忙季节一律不得用差，军队用差必须经旅以上政治机关和专署批准；民兵由脱离生产改为劳武结合。这些政策首先在辛集等13个村试点，然后在灾区普遍展开，贯彻实施的结果，使群众负担大为减轻，抗灾能力大为增强，生活得到改善，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

（三）**移民垦荒生产**。面临灾区劳动力极度缺乏，大片土地荒芜等情况，地委、专署从1943年秋开始，除要求党、政、军、民机关到灾区开荒生产外，还统一组织各轻灾区群众到重灾区开荒，并号召共产党员和干部带头，规定移民可在灾区安家，也可短期开荒生产。在灾区安家者，除享受当地居民同样的政治、经济待遇外，另有政府解决房屋、种子等问题，贷给一定数量的农具，每人给予50斤生活粮，抗属再适当增加；若租种地主土地，

租期3年，九一分成，并免除负担粮2年。这项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大批群众到灾区安家生产。莘县大王寨村王银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全家5口人到桑阿镇附近的大花园头安家落户，种地30亩，生产取得了好成绩。

（四）**推行吴满有路线**。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的经营地主，有驴6头，雇工3人，善于经营和生产，通过劳动致富，拥护抗日政府。鲁西北地委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吴满有事迹，推广吴满有路线，号召用吴满有办法增加生产，实行以生产粮食为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同时，开展反懒汉运动。从1944年开始不准再向地主借粮，以刺激群众生产，反对“共产党不会叫咱饿死”和“穷了革命，富了反动”等错误思想。大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和评模活动，户评劳动模范，村评劳动英雄，对劳动英雄奖励种子和耕牛等，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这时，在鲁西北，尽管敌我兵力是4∶1，尽管聊城、堂邑、冠县、莘县、临清城内和冠堂公路主要据点的敌人骚扰、“扫荡”不断，尽管环境异常恶劣、艰巨，但由于党、政、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坚决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在旱情基本消除的情况下，昔日的无人区，开始成为抗日反攻的重要基地。

## 五

正当灾区人民沉浸在重建家园和丰收在望的喜悦心情之中的时候，一场蝗祸又无情地袭来。从1944年6月18日至8月底，飞蝗先后有6批侵入鲁西北，整个鲁西北区遍遭蝗灾，特别是原无人区更为严重。最大的蝗虫群飞来时，在天空有六七里宽，数里长，铺天盖地，连月亮也被遮住。蝗虫所到之处，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顷刻一扫而光，蝗虫把卵产在坚硬的地面上或土坑内，7天变成幼虫，成群地往禾苗上爬，繁殖之快令人生畏。

6月21日，地委指示各县迅速成立由党、政、军、民领导人参加的灭蝗指挥部，首遭蝗灾的冠县指挥部在班庄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军民6500余人，8天捕蝗9万余斤。26日，地委、专署召开捕蝗联合指挥部会议，进行了紧急动员部署，发出了"制止蔓延，全部歼灭，虫口夺粮，争取丰收"的紧急动员令。7月，针对部分群众在凶猛的蝗祸面前失去捕打信心和视蝗虫为"神虫"等迷信思想，再度发出紧急通知，指出蝗灾不亚于敌人的抢粮和"扫荡"，灭蝗是根据地人民的生死斗争，多打1斤蝗，即可多收10斤粮，要坚决克服封建迷信等错误思想，动员党、政、军、民的一切力量，采用各种办法展开对蝗虫的歼灭战。为鼓励群众的捕蝗情绪，照顾灾区群众和贫雇农的生活，专署颁布了以蝗换麦办法，即按亩出工，缺工补麦；以村为单位收进蝗虫，根据日平均捕打数确定兑换2斤麦子。于是，一场捕蝗运动在全区展开。

各级领导和数百个灭蝗工作组下到捕蝗第一线，一面参加捕蝗，一面发动群众。地委和专署的领导带头在烈日下捕蝗，军分区首长带领500多名干部，跟踪大的蝗虫群捕打；冠县召开的干部大会，也半天开会，半天捕蝗；武训县在蝗情紧张时，区以上干部连续两个晚上都没有睡觉；聊堂县民教科长李兴因号召群众、恐吓飞蝗，喊哑了嗓子，累得昏倒在地。在党的领导和干部的带动下，所有的群众甚至孩童、老人都发动起来，特别是原无人区的群众，几乎村村都召开了誓师大会，决心消灭蝗灾。大王庄村长张庆福在誓师大会上说："去年春天我们村只剩下几个快死的人，是共产党、八路军搭救，才使我们恢复到200多人，我们只有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和蝗虫拚命，才对得起我们的良心和共产党、八路军。"冠县第三区划分了4大战场，分为昼夜两班捕蝗；第四区43个村组织起5189人，分成766个组，分片包干，6天打死蝗虫1.94万斤。莘县、永智县根据飞蝗动向配合作战，3天打死8.2万斤。武训县5天捕蝗9.6万斤。

在没有农药的情况下，群众想了很多捕蝗办法。开始是用能发出声响的器物赶和用土炮轰，后来改为发动群众捕打。在逐步摸到蝗虫的活动和生长规律后，灭蝗的效果就更显著了。夜晚，点上成千上万的灯笼，燃成一片片大火堆，诱捕飞蝗；白天，在田边地头挖沟，深埋蝗虫，天刚亮时，因露水大，蝗虫的翅膀被打湿，飞不动，就乘机大力捕杀。蝻子是蝗虫的幼虫，不会飞，只会爬，发现哪块地有蝻子，即在地头挖道沟，然后顺着地垄向前赶，蝻子多的时候，赶一次能填满大半沟，然后用土把沟掩埋砸实。群众把这种方法叫做"赶蝻子"。蝗虫产子时，是把尾巴扎到地里，见了人也不动，这时就把它捉住，然后顺着它产子的地方把土撬翻，一下子就可挖到一大堆蝗虫卵，有时一人一天可挖到好几斤。

经过70多天的灭蝗大战，这场罕见的大蝗灾，终于被战胜了！秋季除个别地方外，均获得了丰收。

鲁西北抗灾救灾的胜利，使灾区群众的心同党紧紧贴在了一起，因此，抗日和生产情绪空前高涨。1944年秋征，灾区群众把最好的粮食交给政府，仅莘县、冠县、武训、聊堂等灾区就超额完成任务110万多斤。

（杨明坤 执笔）

# 抗日战争时期
# 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概述*

汪德荣

冀鲁豫边区地处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广大平原地区，这里是黄河故道，土地贫瘠，生产落后，人民贫困，文化教育不发达。但是抗日战争时期，该区的文艺工作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前进着。

1937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救亡的戏剧活动进一步从北平、天津、上海流向内地。以陈荒煤、张瑞芳为首的平津学生流亡剧团曾在济南等地演出。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山东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组成了各种形式的文艺宣传队伍，以文艺为武器投入了抗战洪流。

在鲁西北地区，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在我党推动下，树起了坚持华北抗战的大旗，聊城这个文化古城焕发了新的光彩。1937年12月，党指示由刘定一同志（北师大学生、党员）组建了聊城孩子剧团。1938年初，又扩大建成了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在聊城、堂邑、阳谷、濮县等地巡回演出。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烙痕》、《打鬼子去》等等，随后在冀南的南宫县与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锋剧社和冀南行署、文总宣传队会师。

先锋剧社在朱丹(南)和巩廓如等同志带领下，曾先后在临清、丘县、馆陶、威县、清河等城镇开展宣传，演出话剧、歌舞等节

---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编《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内部稿）第11期第172—180页。

目，形成了一个高潮。

1939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纵队的战士剧社，在任贤璋、苏里等同志率领下随军进抵鲁西。梁山战斗前后，他们在东平、平阴、肥城、泰安、宁阳、汶上等地进行了演出活动，并培训过六支队宣传队的同志。

在鲁西地区，杨勇、欧阳文同志率领的独立旅一团宣传队是一支较老的宣传队，其中还有一些红军宣传员。这支队伍后来改编为三四三旅黄河支队，转战到湖西，成为教四旅火线剧社的基础。1940年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拥有一些较为优秀的文艺人才，如朱毅、徐苓、刘永采、田兵（牧军）等，在湖西地区演出过话剧《第五纵队》、《雷雨》以及歌剧《农村曲》等节目，影响较大。

在泰西，山东六支队宣传队（战斗剧社）是以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一部分同志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们从1938年初就投身于文艺宣传工作，经历丰富，水平较高，有很多骨干如孙健民、李犁、饶子春（女）、刘元仲、王自屯、一芳等同志。同时泰西地区文化教育较为普及，青年学生参军的很多，其中有方萌、刘朗、徐霖、林佐、杨殿基等同志。1939年从抗大一分校又分来了汪德荣、杨志红等同志，一一五师战士剧社的刘痴夫同志曾一度派来任队长，因此这个宣传队也具有较好的素质。

在沙区有杨得志司令员、崔田民政委率领的三四四旅宣传队战友剧社。当时的成员有黄坚、李杰、陈丁波、血波以及吴文同志等。这一地区是河南坠子的发源地，又是河南豫剧的一个流派的故乡，因此，冀鲁豫行署的鸭绿江剧社和救国总会的大众剧社就以演出豫剧现代戏和演唱河南坠子为主。成员中有一批久享盛誉的民间艺人如沈冠英、韩民等同志和一批天赋很好、姿质甚佳的青年演员，如杨霄彤（清善）、任岩（怀顺）、王树群、张金星等同志。由于他们熟练地运用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曲艺形式，

活动十分灵便，因而能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与好评。

从1940年起至1941年底，鲁西军区、冀鲁豫军区的斗争形势日益好转，部队壮大了，地方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了，经济情况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党政军民各系统都重视了剧社的建设，整个边区的文艺团体都有所加强，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局面。

年初，肖华司令员率领挺进纵队从冀鲁边到达鲁西，与杨勇同志所带的鲁西独立旅合编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下辖黄河支队与运河支队共5个团。这时旅、支队、团均有宣传队(剧社)的编制。

旅宣传队即挺进剧社，原来在冀鲁边时叫东进纵队挺进宣传队。队长是红军秦昌银同志，后为张秉寿同志，分队干部也是红军，如王吉充、梁康昌等同志。教员有孟力前、陈克等同志。队员有禹文淮、张书群、戚万新、曹锦才、祃忠庆、宗希贤、刘德侠、马学谦等同志。旅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姜思毅同志，干事董红明、张富忱等同志，都是具有很高艺术修养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在冀鲁边时创作的歌曲《冀鲁边进行曲》，气势磅礴，曲调高昂，反映了边区军民的艰苦斗争和必胜信心，在部队和群众中广泛流行。张富忱同志的宣传画技巧很高，他利用农村的简单颜料石灰、红土、槐豆水、蓝靛水等画遍大小村庄，不仅宣传鼓舞了群众，还为瓦解日军、争取伪军起了有力的作用。他在观城史楼一地主家的砖墙上画的一幅日本兵的家属哭泣的宣传画，"扫荡"根据地的日军士兵看到后，竟然纷纷跪在画前失声痛哭，日军军官用指挥刀赶也赶不走。

运河支队宣传队有来自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丁芬，她是上海人，多才多艺。抗大毕业的陈耕国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音乐舞蹈均很擅长。队员还有谷文达、李洪昌、刘存信、刘存智等。五团宣传队队长是抗大毕业的范伟，副队长伍菲萍也是抗大来的南洋华侨。四团宣传队就是泰西六支队的原班人马，队长是孙健民，教员

是汪德荣、杨志仁，队员有乔学亭、李犁、方萌、曹光、冯先进、乔学温、张基业、郑吉顺、杨殿基、林佐、朱云樵等。

黄河支队宣传队及一团、二团、三团宣传队整编后，由张国华、欧阳文率领南下支援新四军，后来留在湖西地区，以后编成火线剧社。主要骨干有朱毅、徐苓、刘永彩（南野）、田兵（牧军）等，都是从延安抗大或鲁艺分配到敌后来的。先后演出过歌剧《农村曲》，话剧《第五纵队》、《雷雨》等大型剧目，在湖西地区影响很大。

1940年4月，陈士榘司令员率一一五师游击大队（简称陈支队），从晋西南到达鲁西，将二团留在鲁西归三四三旅指挥，参加讨伐石友三战役。二团宣传队队长黄涛，上海人，抗大毕业，骨干有曹小华、张梓、黄秀民、郭万川、王育德、陈锦裳、钟世英、于增荣、鄢烈，葛文智等，他们在12月政变中，曾到贺龙亲自培养的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去学习过，受到了较好的艺术熏陶。以后三四三旅整编教三旅时，二团宣传队改编为八团宣传队。

与此同时，还有三个剧社也先后到达了冀鲁豫。

一个是来自冀中军区的南进支队前锋剧社，社长冯祖华同志，主要成员有许汗青、马书龙、马其恒、靳士衍、陈满池、强守一、刘秉璋、姚国栋、白雪、刘兴华等。他们来自京戏的发祥地河北平津一带，文化水平高，艺术修养好，特别是擅长创作和演出京戏，驰名整个边区。

另一个是回民支队马本斋司令率领的抗战剧社，社长陈波，主要成员有白××、侯利民、朱琛等，到达边区后主要是在三分区朝城、观城、冠县一带活动。

还有一个到达边区较早的赵谭支队的烽火剧社，他们原在晋东南和豫北林县一带，1940年奉命到达鲁西北地区，归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指挥。烽火剧社社长黄铎、王鸣时，主要成员有王沙汀、李治平、崔永昌、霍宝琦、赵辟野、宋真、章明等。其中不少人

当过教师，文艺修养较高。在鲁西南地区创作演出了许多好戏，人民群众至今记忆犹新。1940年后改编为教七旅的剧社。

在此同时，地方政府冀鲁豫边区行署也从部队调了一些骨干成立了“新民主剧社”，社长是八团宣传队副队长于克非同志，成立初期也由部队的挺进剧社代为培训。

冀鲁豫边区文联也于1942年下半年筹建边区文艺工作团，由诗人、边区文联文艺部部长夏川同志兼任团长，丁芬同志任副团长。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是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大发展的历史时期，真可谓人材荟萃，好戏连台，各单位在频繁的反“扫荡”的斗争中，在激烈的讨伐顽军、叛军、打击反动会门的战斗间隙里，坚持演出，为部队为人民群众服务。

挺进剧社在1940年8月鲁西军区建军会议上演出了大型话剧《儿童万岁》和京剧《忠烈传》。尤其是《儿童万岁》影响很大，其中主要角色癞子由禹文淮同志扮演，演得十分成功，所以禹文淮的名字就为“癞子”代替了。过了几十年之后，当他去见杨勇司令员的时候，杨司令员一见面就喊他“癞子”，印象之深就可以想见了。挺进剧社1941年元旦在范县龙王庄又演出了著名剧作家王震之的名剧《流寇队长》。由董红明同志扮演流寇队长，陈克同志扮演陈木铎，李洪昌同志扮演大红鞋，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南支前锋剧社是一个拥有雄厚创作力量的队伍，皖南事变后不久，在冯祖华同志亲自执笔和导演下，迅速创作并演出了大型戏曲剧《控诉亲日派》。这出戏采用戏曲形式写了一个大后方新闻记者亲眼目睹了皖南新四军被围歼的事实，在重庆又亲自看到了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怒斥他们的罪恶场面十分深刻生动。根据人物的身份、环境而配以不同的唱腔，例如新闻记者就唱京剧，而妇救会长就唱河北梆子，老头就

唱曲艺……这样做法十分成功，可以说早在40多年以前就尝试过“南腔北调”大会串了。此外，前锋剧社还上演了歌剧《拴不住》，这是一个音乐性很强的喜剧，乐队水平不高的剧社是演不出来的。由于南进支队冀中籍的战士、干部爱好京剧，所以他们多次上演京剧，如《打渔杀家》、《陆文龙》、《吴汉杀妻》……都演得十分出色。这里要特别说一说扮演陆文龙的青年演员靳士衍同志，他少年英俊、聪颖过人，主演《陆文龙》，唱做念打样样俱佳，备受部队首长和广大指战员的喜爱。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中，他被日军包围在农民房子里，当敌人发现了他，即将抓住他时，他英勇地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日本兵在一声巨响中同归于尽。《冀鲁豫日报》的著名记者马冰山同志专门写了题为《陆文龙与靳士衍》一篇长文来悼念他，发表在当时的《冀鲁豫日报》上。

大众剧社自编自演的豫剧《清明节》，也是边区军民最喜欢的一出戏。内容是通过清明节家家户户上坟哭奠被日军残杀的亲人，来控诉敌人“扫荡”沙区的残暴兽行。任岩同志扮演少妇上坟哭夫，唱腔高亢，凄凉悱恻，十分动人。每演到此处，全场寂然，潸潸泪下，大大激发了对敌的仇恨。

名满边区的沈冠英同志，是一个以说书为生的残疾人。他在旧社会亲身经历了各种苦难的生活，早年参加革命，以说书为掩护，走村串寨做工作。抗战爆发后，他矢志作抗日宣传，身背一把坠琴，自编自唱，走到哪里唱到哪里。那些通俗诙谐、生动风趣的“挖路段”、“放脚段”等唱段，颇受群众欢迎。每到一地，大家还在忙着找房子，烧水做饭，他却在村头上坠胡一拉，梆子一响就唱起来，群众奔走相告越聚越多，一唱就是半夜。一个人就组织一台晚会，在宣传发动群众的战线上，立下了功勋。

在音乐战线上的同志像董红明、姜思毅、丁芬、孟力前、李杰、徐苓、刘文采、张明、霍宝琦等同志，均在艰苦的战争生活

中谱写过许多群众喜爱的流传甚广的歌曲。

1942年初精兵简政中，教三旅各团宣传队也精简了。把各团的业务骨干集中到旅，挺进剧社改编为宣传大队，大队长由董红明同志兼任，副大队长有孙健民和陈耕国同志，政治指导员唐凯同志，副指导员黄涛，教员孟力前、王书琴、汪德荣同志。集中之后，很快就演出了大型历史京剧《亡宋鉴》。这出戏是吕班等同志所编，主要借秦桧害岳飞的故事来揭露国民党亲日派残害忠良新四军，激发人民对他们反共、投降、倒退行为的愤慨。该剧演出3小时，生、旦、净、末、丑各种行当俱全，唱、做、念、打并重。当时大家一鼓作气，由科班出身的王书琴同志把着手教，从走台步、蹁马、起霸到文武场、锣鼓经，一一从头学习，在短时期内完成了排练。宣传科的郑洵(画家)同志又发挥他的特长，把一些蓝布大褂画上花边、海潮，变成了箭衣、靠翅，结果收到了很好的舞台效果。

同年“九一八”在鄄城大石庄举行全旅各团参加的运动大会，孙健民、汪德荣以短时间突击创作了两幕话剧《蚕食》，揭露日军、汉奸“蚕食”我根据地的阴谋。郑洵同志担任了全部舞台美术工作，幕布上用棉花做成一条大蚕正在啮咬着一片绿叶，用绳子一拉，蚕还摇头晃脑，上下摆动，这恐怕是最早的活动布景了。尔后，我们还排演了京剧《八大锤》等节目。

“九二七”大“扫荡”之后，又一次实行精兵简政，教三旅的挺进剧社也撤销了，部分人员调到军区战友剧社。全区只剩下一个专业的剧社，但是，由于剧社的同志分散到部队担任政治、文化干事等工作，于是各单位又纷纷组建了业余剧团，开展了各种演出活动。直到1941年，战友剧社去党校参加整风学习，边区仍然有一个业余剧团，而且在民主大会上演出了苏联名剧《前线》。

在漫长而又艰苦的八年抗战中，边区的党政军领导始终把文

化艺术这一支有力的宣传武器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那时候，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没有召开，但是无论是领导同志还是剧社本身却十分明确的坚持了文艺为人民、为民族解放、为战争服务的方针。

现在回忆起来，这是一条多么艰苦的道路啊！许多同志光荣地牺牲了，许多同志流血负伤，甚至遭到敌人的逮捕、监禁，我们应该怀念他们，继承他们的事业，搞好祖国四化建设。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北京

# 冀鲁豫边区合作社工作简述*

## （一）

冀鲁豫边区的合作事业，在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始，是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和以后的山东分局领导下展开的。1938年，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首次在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发展合作社问题。1939年，中共苏鲁皖分局把开办合作事业列为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开始组织合作社试点。1940年，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把广泛发展合作社列入《战时施政纲领》，制定了《合作社暂行规程》、《合作社暂行规程实施细则》、《县、区合作社联合社章程》，明确了合作社是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其宗旨是为社员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群众入社自愿、股金分红、享受优待；合作社干部民主选举，政府不委派；政府对合作社减税、贷款扶持等一系列比较完善的法规、制度，提交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定，正式通过颁布实施。与此同时，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向全省发出了《关于开展合作事业的指示》，要求普遍建立县合作运动委员会，统一拟订了发展各类合作社的22条标语口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发展合作社的群众运动。鲁西地区的合作事业，在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和各级民主政府的倡导扶持下，认真贯彻山东或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部署，经过各群众团体的深入发动，一批合作

* 本文原载《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下）第539—549页。

社陆续建成。仅据太西、运西、鲁西北、运东四个地区部分县的统计，包括长清、肥城、泰安、东平、平阴、汶上、郓城、范县、寿张、朝城、东昌、茌平、清平13县，共建立各类合作社80余处，计有生产合作社5处，运粮合作社（站）8处，信用合作社9处，消费合作社40处，鞋袜、纺织、土布生产社（厂）18处。办得好的合作社颇得群众的拥护。1940年8月4日，《大众日报》突出介绍了朝城县五区粮食运销合作社的情况，这是鲁西北地区办得最早的合作社之一，这个社是由工农青妇各救亡团体联合创办的。他们运销的粮食，按合作社的优待办法出售，抗日军人家属买粮，按原价减收3/10；贫雇农会员买粮减收2/10；一般社员买粮按原价；非社员买粮按市价。这种办法，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救济了抗日军人家属和贫苦群众，安定了地方生活，支持了生产，增强了合作社的信誉，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大鼓舞了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全社股金由原来的1000余元，很快增加到3000余元。为适应发展合作事业的需要，鲁西行署于1940年10月，在驻地范县张大庙村，由实业处举办了合作训练班，杨寿山、郭月斋等均在训练班授课，向学员讲授合作社基础知识，组织学习生产社、消费社、信用社、运销社四种合作社的章程。学习一个月后，这批学员被分配到各地任合作社指导员工作。到1941年，鲁西各地建立了农村生产合作、信用合作、消费合作、运销合作等类型的合作社共127处，各种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厂）500多个。由此看到，冀鲁豫边区的合作事业，初创阶段是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在抗日的群众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它一开始就扎根于群众、来源于群众，为抗日战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这就为边区合作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二）

1941年7月，冀鲁豫区划调整，隶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从此，冀鲁豫边区的合作事业，在原有基础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41年10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发了《合作社条例》。1942年工商管理总局成立指导合作工作队。1942年8月20日，总局发出《关于指导合作工作队开展各地合作工作的指示》，把开展合作工作，列为总局现阶段的中心工作。同时，冀鲁豫边区合作社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合作事业的最高领导机关。1943年1月，冀鲁豫行政公署颁发了《冀鲁豫灾民合作社暂行简章》。同年12月，又制订了《冀鲁豫区农村合作社章程草案》，同时规定在银行贷款上，在公营商店货源供应上，在税收政策上等具体优待合作社的办法，从组织上、经济上大力扶持合作社。

党和政府所以重视发展合作事业，是由于当时严酷斗争形势所决定的。从1941年开始，日军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攻，妄图摧毁我抗日军民赖以生存的条件。在此期间，我冀鲁豫区又遇到持续三年的大旱和严重的蝗灾。为了战胜天灾敌祸造成的困难，全区党政军民，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救灾运动。首先在受灾严重的沙区，包括豫北、直南的清丰、南乐、濮阳、高陵、内黄等县组织了灾民合作社。凡属政府下拨的救灾物资，由灾民合作社发放，用于救灾的无息低息贷款，通过合作社贷出，组织灾民生产。合作社紧紧围绕灾民的生产活动为中心，首先从解决吃饭问题入手。如灾民合作社组成运粮合作小组，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参加政府向灾区调拨的粮食运输；组织妇女社员，用政府的贷款，购成纺车、棉花、织布机等实物，纺纱织布，公营商店以优惠价格收购推销；工商局委托合作社代售物

资，或向合作社定购产品，用预支价款办法支持灾民生产。灾民合作社还组织合作种地，打井抗旱，开办作坊，编草帽辫，熬硝淋盐等农副业生产。灾民合作社通过生产自救，开展业务，并对社员教育，培养管理干部，使群众学会自己管理经济，进而以灾民社员为骨干，逐步把合作事业扩展到广大农民中去。在创建灾民合作社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有效的做法和经验，这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公营经济的支持，确定以生产为主，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的办社方针；全心全意为生产服务、为群众生活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办社宗旨；以灾民群众为骨干，培养干部，创造条件，逐步发展和吸收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入股为社员，使合作社更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办社道路；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使合作社成为根据地最大的群众性的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广泛团结联系农村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的好形式。沙区合作社的这些做法，为全区合作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特别是把农业生产合作列为合作社的重要任务，从组织生产到组织流通，都纳入各种合作社形式之内，形成了我冀鲁豫边区合作事业的一大特点，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上，在对敌经济斗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边区的党和政府，重视和发展合作事业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是依靠农民，发展根据地生产，以坚持长期的抗日战争。1942年边区党委在中心区开展了民主民生运动，随着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和合作互助组织也普遍得到发展，形成了我冀鲁豫边区普及合作社组织的一个新高潮。合作社组织得到比较普遍的发展，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和骨干；二是在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斗争中，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经济果实，要求发展各种副业生产。加之全区不少地方灾情持续发展，因此，党和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社的领导，从经济上把群众组织起来，利用

分得的经济果实入股集资，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兴办各种合作生产事业。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是一村一社形式组建的，各群众团体发动各自的会员入股办社，以合作社为依托，开展各项生产活动，极大地充实了新建各群众团体的工作内容。特别是妇救会员，在合作社的帮助下，组织起来纺纱、织布、做军鞋、搞编织；妇女会还组织评比，奖励先进，评选模范，以她们为骨干，向群众教唱抗日歌曲，发动妇女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成为基层生产战线上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在中心区，办得好的合作社，特别是妇女纺织合作组织，培养了一大批干部。1943年春，曾由徐达本提议，区党委抽调出五六十名老合作社的妇女干部，到受灾最严重的沙区，帮助组织灾民合作社，指导灾民社的生产与经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与此同时，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也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相继成立了消费、生产、运输等合作社，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开荒种粮、种菜，开办各种小型作坊，打油、磨粉、生豆芽、做豆腐，改善机关生活。合作社的建立，推动了边区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加紧生产，努力苦干，渡过这艰苦的相持新阶段，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的歌声，响彻边区大地，充分表现了我冀鲁豫边区的党政军民，面对极端艰难困苦的局面，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必胜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 （三）

1943年8月20日，冀鲁豫边区合作社推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冀鲁豫边区合作社筹备处，作为全区合作社的专职领导机关。从此，边区合作事业的领导逐步有所加强。会议决定：在群众已经发动，群众团体已经建立起独立领导系统的地区，合作社也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系统，即合作社推行委员

会和合作社筹备处，有条件的地区可立即成立区联社。在工作薄弱的地区，设立合作社指导员，领导合作社的经营工作。在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地区和县，合作社由抗联（抗日救国联合会）统一领导。抗联内设立合作社经营部，专职领导合作社的业务经营。合作社的组织教育，由抗联的同志从基层去做。专署和各县的筹备处干部以及区指导员，由同级合作社推行委员会决定，从政府、民运部门抽调较强干部配备。各级抗联的合作社经营部干部，由抗联负责配备，其经营部部长，要由抗联常委担任。决定还明确规定，农村合作社是农村广大群众的经济组织，要吸收各阶层人民参加，以便团结各阶层人民统一对敌，增强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合作社得到很大的加强，一大批干部充实到各级合作社中去。中心区的十七专署、二十专署和一部分县，相继自上而下建立了各级合作社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形成了合作社独立的领导系统。在工作薄弱的地区和县、区，都逐级配备了合作社指导员，各级抗联设立了合作社经营部。村社的组织教育工作，也由抗联所属的农会和妇会干部负责。边区合作社筹备处成立以来，虽对合作社事业逐步加强领导，但由于区划调整频繁，军事环境尖锐复杂，灾害严重，生产救灾任务艰巨，因之，合作社的独立领导系统，除中心地区外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由政府和抗联总会双重领导合作社的形式，持续到1949年5月，冀鲁豫边区合作总社成立。在此期间，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合作社工作，1944年11月，合作社推行委员会确定，县以上各级合作社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吸收工商管理局和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参加领导，使各级合作社筹备处成为全面领导合作社工作的政企合一的权力机构。各级筹备处是各级合作社领导机关的过渡形式。在一个区，有1/3至1/2的村社建立后，即成立区联社；在一个县有1/3的区联社建立后，即成立县联社，筹备处即自行撤销。

1943年11月边区财经工作会议以后，党和政府加强了向各级干部进行合作社原则、理论和办社宗旨的教育，使合作社逐步走上民主办社、正规办社的道路。当时由于政府委派干部办社，因而使合作社带有很大的“官办”性，很少同群众商量办事，有“恩赐”观点，群众也没把合作社完全看成为自已的组织。办社的干部，大多数不懂业务，缺乏合作社管理知识，因而不少社虽然建起来，但不巩固。有的合作社成了少数干部的商店，甚至有的打着合作社的牌子，走私赚钱，群众很少得益。政府对合作社作为群众经济组织的独立性、民主性也不够尊重。有的政府部门干涉过多，有的包办代替，有的看成政、民部门的附属组织。这使边区合作社运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针对这些问题，区党委和行署从理论上、思想教育上和组织上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断纠正偏向，指导合作运动健康发展。1943年11月边区财经工作会议上，行署副主任徐达本全面阐述了合作社在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充实合作社的力量，任何削弱合作社的做法都是对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害的。1943年年底，冀鲁豫边区党委又召开了高干会议，全面总结了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的工作，确定了党的财经工作重点，也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社工作的领导。要求凡属群众初步发动的地方，立即组织合作社，重点放在村社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并确定了“一村一社”的原则。一个行政村要建立一个合作社，合作社要以生产为中心，围绕生产实行综合经营，以增产粮、棉、靛和大力发展纺纱织布为重点。对于合作社的组织领导系统，还明确指出，政府建立的合作行政部门，是为了研究与掌握合作社政策，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开展，它不能干涉合作社日常工作，更不准把合作社作为附属机构。政府对合作社是指导、扶持和保护的关系。政府颁布的工商法令与政策，合作社要执行。如有违犯，政府要干涉、纠正。出现偏向，政府要帮助解决。合作社的

利益受到侵犯，政府要保护。财经会议和高干会议对合作社采取的一系列决策，不仅极大地加强了合作社工作的领导，把合作社作为组织、扶持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而且按照合作社原则，把边区的合作社运动，开始推向了民主办社、正规建社的新时期。

（四）

从1944年初掀起全区大生产运动，合作社运动按照高干会议“一村一社制”的决定，得到了普遍发展，涌现出一批办得好的典型。这期间，各级领导干部，对村级合作社的建立非常重视，亲自动手，调查研究，总结典型，指导村社建设。冀鲁豫边区联教总会主任高元贵和十七专署合作社负责人孙汉杰先后对村社建设和部分县社、区社的经营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系统地总结了经验，选定了一批代表不同类型的典型单位，为村社、区社建设树立了榜样。1944年11月17日，高元贵在全区合作社工作会议上，阐述了高干会议后一年来村社建设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教条主义的理解“一村一社”的决定，一开始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村综合性的合作社，群众并不欢迎，业务经营也不好开展，往往形成空架子社，或者单纯形成社干经营，不能发挥群众对合作事业的积极性。另一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贯彻“一村一社”的精神，在村里先从组织小组着手，把小组的经营开展起来，再根据群众要求，把各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专业性质的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从小到大，从简到繁，一步一步提高，根据群众的自愿，成立全村综合性的合作社。这样的村社，完全建筑在小组营业和专业合作社营业活动比较扎实的基础上，群众积极性高，是一种自愿联合的经济组织，不会出现空架子，组织一个就能巩固一个。这次会议总结的经验，不论在新区合作社的发展上

和老区合作社的整顿上，都是按照这种精神进行的。合作社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更注重适合当地条件和群众的要求。这时有以行政村为单位组成的综合性合作社，更多的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组成的专业合作社、合作小组，如纺织组、打油组、生产互助组、编织组、运输队等。这种以小组经营为主的合作形式，持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同类型的小组都感到有扩大联合的要求时，经过干部的引导、酝酿协商，很自然的就组成了专业合作社。一大批办得好的村社、区社和一部分县社，大体都经过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莘朝县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典型。这个县从1940年合作社初创时期，就在群众运动中酝酿组建过合作社。1941年为了组织群众生产救灾，上级机关组织了专门干部到该县四、五区选定工作基础较好的一两个村进行合作社试点。这年冬季，联救总会农会负责人郭英在该县四区的夏庄试办合作社，发动群众入股，帮助开展业务。政府也从各方面进行扶持，用组织起来经营生产的成绩，吸引更多的群众入社。经过一段工作，显示了组织合作社的优越性，群众得到利益，周围几个村的群众也来入股。有的还要求到他们村里组织合作社。这样以一两个村的示范影响周围村，逐步扩大范围，很快发展到全区。待大多数村社组织起来了，社干、社员就产生了建立统一领导机关的要求，大家推举代表，共同协商，选出有合作社经验并深受群众信任的人当领导，用民主的方式组成区联社。待联社发展到一定比例，如全县一半左右的区成立了区联社，就成立县联社（当时亦称县合作社委员会）。县社、区社都经营业务，通过经营，为村社服务，扶持村社发展。1946年，边区全面总结推广了莘朝县合作社的经验，以及高干会议以来推广的一批典型经验，包括1943年濮县一区中心镇合作社，1944年莘朝县白庄合作社，四、五区联社，1945年南乐县小孔庄合作社等典型。这批典型从不同角度比较明确地体现了边区党和政府领导合作社服务生产、民主办社的方针，

成为全区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指导原则。

## （五）

在解放战争年代，合作事业的发展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始终站在生产的第一线，开展各项生产救灾、生产支前活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46年日本投降后的短暂和平时期，为恢复城乡经济，一方面抓紧恢复生产，特别是土特产品的增产；一方面组织农产品进城和地区间的物资调剂。为此，专门成立了草帽辫合作社和猾子皮的合作组织。由于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边区，黄河南岸沦为大规模的军事战场，基层合作组织除少数商店物资转移外，几乎全部被摧毁；黄河北岸的各级社，全力投入了组织群众生产支前、生产救灾的任务中。从1947年春季开始，行署拨出大批农贷，至1948年底，共连续放出45亿多元。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合作社在公营贸易公司的支持领导下，把政府扶持农业的资金，用来购置种子、农具、耕畜、煤炭和其他生产资料，在大批青壮年参军参战，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靠合作社，把妇女劳力、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互助种地，纺纱织布，做军鞋，编草帽辫，榨油，熬硝盐等，开展农业和各种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1948年，第四分区和第八分区灾情最重，党和政府通过贸易公司和合作社，拨出货款，供应原料，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仅一个春季，收购土布、草编品、硝盐等各种土副产品达边币30多亿元，扶持群众完成了春播任务，渡过了春荒。1948年全年取得了农业上的较好收成，各种副业生产的收入，折合粮食6.7亿多斤。这不仅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灾害程度，渡过了灾荒，而且保证了前线物资的供应。

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全区战争局面基本结束，至1949年1月淮海战役后，全区开始了发展经济的新时期，合作社也进入到

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行署决定成立供销合作社，自上而下地建立健全供销合作社筹备处，形成合作社的独立领导系统，并决定在濮阳地区试办区、村两级供销社。明确供销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集中力量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流通渠道，保证农村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恢复农村经济，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服务，支援城市和工矿区生产。还决定在供销社内开展农村信贷业务，农村信用合作社归属于供销社体制，农业合作互助组织同供销社分离。经过筹备，1949年5月31日冀鲁豫边区供销合作总社在濮阳市正式成立，主任张承先，副主任刘玉峰。

* * *

冀鲁豫边区的合作社事业，和边区的其他事业一样，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最终发展起来，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长发展，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它的方针始终是为革命战争服务，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服务。在整个战争年代，合作社始终坚持把组织农业生产、手工业、副业生产放到第一位，紧密围绕生产去开展其他各项合作业务活动。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又购又销，实行综合经营的方针，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勤俭办社。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偏向，总结经验，努力贯彻自愿、互利、民主、服务的办社宗旨。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从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吸收地主、富农入社，使农民群众集体经济的合作社，成为从经济上最广泛地团结农村各阶层人民的经济组织。在团结农村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所坚持的办社原则、经营方针，和在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合作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领导和参加开展根据地合作事业的广大干部和社员，他们为革命付出了辛劳和牺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

（张耀华执笔　郭月斋审定）

# 冀鲁豫边区的宣教工作*

姜思毅

我对冀鲁豫边区地方党委的宣教工作知道得不多，虽然在军区任宣传部长5年，对部队宣传工作也未系统地反思过。今天我参加讨论《冀鲁豫边区宣教工作概述》（草稿），只谈谈两点体会，供参考。

## 第一、宣教工作，即思想政治工作，是边区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胜利是党领导下取得的，是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取得的。而发动与组织群众，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思想政治工作。

冀鲁豫边区，在白区党的建设和斗争的基础上，在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的情况下，在抗日战争中，平原根据地从开辟到初步建成，到坚持巩固，到发展扩大，直至反攻；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开始了自卫战争，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迎来了全国解放。我们打了多少胜仗，渡过多少艰难困苦，建党、建军、建政、群众运动、统一战线、瓦解敌军……成绩确实很大。冀鲁豫边区抗战后期一度成为“敌后最大根据地”，又成为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1944年底，军区统计我们的武装力量已有8万多人，

* 本文系姜思毅同志在1989年4月“冀鲁豫边区群运、宣教专题审稿会”上的讲话，原载姜思毅《生命线的探索（政治工作五十年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722—728页。

反攻时号称“10万大军”。解放战争中，二、三两大野战军相当时期都在边区作战。冀鲁豫边区处在敌、伪、顽、会（会道门）、匪的夹击之中，还有特大灾荒。几次大的历史转折都转得较好。从白区地下党的斗争到抗战，从开辟抗日敌后战场到建设根据地，在困难中，在广大的平原，不但坚持了抗日战争，而且巩固了大片的平原根据地，成功地保持了濮县、范县和观城三个县城，形成了连成一片的中心区。这在华北敌后是少有的情况。这一切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好的基础。可贵的是，冀鲁豫边区是几大块根据地合并在一起的，几个地区党政军民各方面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成长了大批建军、治国的人才，产生了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有全国闻名的与我党合作抗战的范筑先，有民族英雄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这一切靠什么？靠党中央领导，靠马克思主义，靠政策路线，靠多方面的工作，而其中一条重要的战线是宣教战线、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战线。

这就是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斗争是中心，但武装斗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而离开了发动与组织群众来谈根据地建设，来谈人民战争，是要落空的，要失败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致胜的根本。这对军队、对地方、对战争、对建设、对过去的条件、对现代的条件，都是如此。我们在这里研究总结宣教工作的经验，首先是为了叫现代的人、叫革命的后来人不要忘了这个“本”，丢了这个“本”。任何轻视群众，不走群众路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都是忘本的行为。

当年，平原分局书记黄敬说的：“发动群众，就是启发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使群众照着党所指出的方向，一致地行动起来。”我想，这也就是宣教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所在。

政治工作的确是我党我军的“拿手好戏”。我们的确有政治优势。其他经济、装备、技术等等，我们长期都处于劣势。要发

挥政治优势，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政治优势实质上是群众优势。群众优势、人民战争是我们胜利的诀窍。这并不是秘密，但帝国主义、反动派怎么也学不到它。冀鲁豫边区是大平原，但我们造成了“人山人海”。冀鲁豫边区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说来，不是他们机械化装备可以任意驰骋的平地，他们遇到的是千百万座难以逾越的“人山”，是大片的可以淹没他们的“人海”。

历史活动是人的创造性的活动，历史的发展最终决定于人民群众。人的因素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士气是部队战斗力的首要因素（当然，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还有武器装备、组织纪律等）。要解放生产力，先要解放人；要发展生产力，先要发展人。见物不见人，目中无人，目中无群众，革命是不会胜利的。

打仗、生产、双减、土改、建设根据地都要“思想领先”。不重视政治工作，不搞“思想领先”，仅仅依靠行政手段、物质手段，是发动不起群众的。

正是由于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理想，有人民翻身作主人的理想，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理想，先进的战士、共产党员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了马列主义的精神支柱，才不是一盘散沙，才心齐心顺，精神振奋，一往无前，革命、战争和建设才万马奔腾，大家向着一个方向前进，而不是你东我西，互相践踏，来个不断的内耗和一场场混战。当年一个“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促使广大农民提高了觉悟，结果掀起了土改翻身的大浪潮，成功地完成了结束几千年封建剥削的历史行动。

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人的精神是振奋的，不是消极的；人的精神是前进的，不是没落的；人的精神是健康的，不是腐败的。因此，尽管在日本侵略者反复“扫荡”和“三光”政策之下，在顽军大军压境，大举进攻，“还乡团”气势汹汹的铡刀之下，边区军民精神不倒，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越战越大，直到全区解放，冀鲁豫边区军队和大批南下地方干部，打出去，支援西南、

华中、华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由此可见，讲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讲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边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定要强化而不能淡化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一定要强化而不能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引导；一定要强化而不能淡化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

## 第二、那时的边区宣教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威力和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和总结一下边区宣教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这可以有多少条，现在我只想强调以下四点：

一、宣教工作的主体部分，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政治工作。宣教工作的领导，首先要有理论思维、有理论研究，要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

边区领导是比较重视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抗战以后，注意宣传和学习《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边区继王稼祥之后，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较早，注意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实践证明，这是指导做好宣传工作的根本，是各级干部和军民思想建设的根本。

冀鲁豫边区的领导人是富有理论思维、理论素养的。有正确的理论的指导，工作才不盲目，才能比较正确，少走弯路，发展顺利。

什么是正确的理论思维？正确的理论思维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中央的指示同冀鲁豫边区的实际相结合。这个工作，

边区党的领导机关不少同志是做了的，突出的代表是黄敬。

黄敬和其他领导同志在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边区的特点和各个时期的情况，即本区的区情上，是下了功夫的。因此，党的指导有力，有的时期发展较大较快。这在抗战的相持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

黄敬于1942年12月深刻地分析了边区的情况特点：这里是广大的平原地区，它又是几个省的接合部。从政治上看，它是汪精卫的伪中央与华北政委会的接合部，它是历史上遗留的大小封建势力的接合部，它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阎、冯、韩、宋)的接合部，又是抗日民主势力与顽固派势力的接合地带。从历史上看，这里历来是战争频繁的地带，“两国交兵，黄河为界”，“逐鹿中原，不知鹿死谁手”。不断的兵祸、匪患，加上水、旱灾害，又不断的爆发农民起义(梁山泊的好汉也在这个地方)，至今敌、伪、顽、会（会道门）、匪同在。而我抗日根据地也是几大块合并而成。所以我们的工作要研究如何发扬传统的优点，利用威胁我之势力的不统一、不平衡的弱点，讲究政策，大力开展反封建的民主民生群众运动，开展人民战争，创造“人山人海”，加强各个地区之间和党政军民的团结等等。

冀鲁豫边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当年陶力、郭绍汤关于边区租佃关系的调查，至今记忆犹新。冀鲁豫军区宣传部组织了一次“一个调查研究报告”的征文活动，评奖了多篇调查研究论文，一等奖的奖金竟发了80元。请想想，那时军区司令员的每月津贴费才5元呀！

在马列主义和党中央指示与边区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才可能是正确的，才是切切实实、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才是有明确的原则性，不是含含糊糊、思想紊乱、软弱无力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强有力的思想领导。冀鲁豫边区的党、冀鲁豫军区部队对“思想指导”是提得很响的。

二、干部教育占首位，整风学习教育了一代人。

边区办了抗大分校、干训班，办了抗日中学，部队一个时期还响应中央号召，在职干部坚持每日二小时学习制度。

边区对整风学习抓得很紧，及时提出“整风就是在全党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方针。领导干部、区党委和军区机关带头学习。后来又建立了分局党校，抽调大批干部离职整风。整风与实践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学习与批评自我批评相结合。这就贯彻了学习理论与改造思想、学习理论与整顿作风、学习理论与改进工作密切联系。整风运动的指导也是有力的，没有犯“左”的过火整人的错误，没有搞“抢救运动”。

三、宣传教育工作从实际出发，同各项任务一道去做。

尤其在历史的转折中更要先把思想工作搞好。朱惠讲，范县由抗日战争转入解放战争，由减租减息转入土地改革，一度发生过“变天思想”，地主盼变天，干部有点怕。范县当时参军支前，县的干部带头参军、带担架队、领导修黄河堤等等，男人在位的少了，土改多是妇女搞。宣传工作紧紧结合各项任务。口号是：“发动群众，保卫胜利果实。”这样，各项任务与保卫边区、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结合起来了。宣传工作、思想工作要全党去做，领导带头做，组成宣传队伍，动员起教员、学生、画庙的工匠，村村墙上画连环画，成本大套地画出地主剥削农民的史实。打堤班组，都有宣传鼓动员，及时广播，表扬好人好事。担架队也有宣传队。这样，思想政治工作哪里会有“两张皮”？！

由此可见，宣教工作由谁去做？宣教工作不单是宣传部门少数人的事，党、政、军、民一体去做。那时党、政、军、民常开宣传工作联席会，书记、首长、各级干部和党员都来做。

黄敬在1944年1月13日的报告中讲道：宣传教育要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水平出发，从已有的体验出发，运用群众喜闻乐见能接受的形式，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从其涣散的不同的认

识，提高到统一。这就是革命化、政治化”。“要看到最高利益，还要从群众的经验出发，始终要保持着比群众高一点点，不能跑得太远和太近。”所以，不是尾巴主义，也不是要求过高的主观主义。

四、身教重于言教。

要言行一致。模范作用是无声的命令。部队干部行军替身体不好的战士背枪，地方干部参加抬担架，灾荒年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言行脱节，口是心非。

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总之，要努力宣传和学习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要以三大作风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 巾帼英雄

——李秀真的革命事迹

**滑县妇女联合会**

李秀真（1900—1973），女。河南省滑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李秀真同志以她机智勇敢、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宣传革命道理，传送机密情报，收买武器弹药，投身土地改革。她的足迹遍布滑县大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业绩，不愧是一位坚持敌后斗争的女英雄。解放后，李秀真一直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她虽身患重病，但仍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她时刻不忘共产党员的责任，时刻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直至献出了毕生的心血。李秀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优秀党员，是千百万普普通通农村妇女的杰出代表。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她走过的历程是一条闪耀着时代光辉的革命大道。

## 一、苦难的童年

1900年，李秀真出生在滑县太平乡界河路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亲、母亲、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家好几口人，靠3亩坟地、2亩路边地过活。由于人多地少，地坏不打粮，生活贫困不堪。

因生活所迫，李秀真七八岁时，就得常常拎着篮子和邻居的穷孩子一起去地里挖野菜充饥。冬天没有烧的，秀真就在北风刺

骨的冻地里拾柴，有时还冒着大雪，手脚常常冻得溃烂。

艰难的岁月磨炼了她反抗的性格，在幼小的心灵里，已萌发出了模糊的阶级意识。李秀真懂得，穷人与地主不是一家人，穷人有穷人的骨气，人穷志不能短。她恨死了地主老财。

她12岁那一年，村里一个武秀才、破落地主李西顺到李秀真家来提媒，要秀真给大铺村一个姓赵的地主做二房。他对秀真的父亲李天忠说："您只要愿意，您先使300吊钱，等大妹过了门还有大便宜、大光沾。"秀真的母亲听了，气愤地指着李西顺道："我们就是饿死，也不卖女！"

母亲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疼爱自己的骨肉，为这事她哭了两天，眼睛都哭肿了。12岁的李秀真不了解内情，问母亲为啥愁眉苦脸，母亲对女儿说出实情，于是母女俩抱头痛哭。正在这时，李西顺大摇大摆地又来提亲，李天忠也不耐烦了："以后再说吧！"李西顺碰了一鼻子灰，只得退出。李秀真早不哭了，她打定主意，决不做地主的小老婆。这时，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怒气，追出来，一把抓住李西顺的绸大袄，一手指着他的脸骂道："你想给人家找二房，你有姐、有妹、有娘、有老婆，任意挑一个都行。别想从我身上发大财。"说罢，手往下一抓，撕烂了李西顺的绸大袄，然后躺在地上哭闹，直到李西顺溜走才起来。

为了从中得利，李西顺贼心不死，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他又来到李天忠家里。这时李秀真正在吃饭，一看是李西顺，二话不说，端起饭碗就甩了过去。李西顺难以招架，从此就不到李天忠家里来了。

这一年，秀真一个9岁的小妹妹患病，因为没钱医治，病饿而死。

李秀真13岁时，个头长高了。一些重体力活，如推磨、挑水等落到她的肩上。同时她也学会了纺花、做针线，她已经能给人家纺花挣钱糊口了。

## 二、结婚以后

李秀真15岁就出嫁了。婆家是董固城东门里的，丈夫叫王立存，弟兄5个，有一个老娘，一家6口人靠4亩老坟地为生。秀真过门前弟兄5个就分了家，每人分得8分地，立存与老母一起生活，秀真去了以后，一家3口人依靠8分收成极坏的土地，生活甚是难堪。

王立存是一个木匠，偶尔谁家有个木工活就去给人家做，干一天的工钱只是一升小米，还不足以糊口。全家人就是这样一天天地熬着过日子。李秀真17岁时，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到20岁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人多日子更难熬，由于地薄不打粮，8分地也卖掉了。全家人只得靠打小工勉强过日子，就是这样的日子也不能久长。没灾荒时穷人家几乎锅底朝天，一遇灾荒就更难以维持了。1927年，遇到了旱灾，为了养家糊口，她离开自己的亲人，独自到焦作谋生去了。

李秀真先来到焦李合，给一个管木材的股长叶开南做工，几个月以后又到市里给一个人称师爷的教授胡为三抱孩子，后来又给一个叫何书三的阔人做工，最后到一个大学教授孙静亚家抱孩子，前后总共9年时间。在这9年的漫长岁月里，李秀真吃尽了人间苦，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同时，也磨炼了她勇于反抗的顽强精神。

在这些老爷、太太们的家里，李秀真每天晚上12点钟还不能睡觉，早晨4点钟又要起来伺候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起床，整天忙得头昏脑胀，就这样每月只给3块的工钱。

何书三家有一个姨太太，十分娇养，又十分恶毒。有一次，姨太太要吃一种8样合成的菜饼，秀真告诉了做菜的李师傅，有一种叫口蘑的东西没买来，老师傅没在意，做好后他对秀真说："你给她端去就是了，不要紧，她能查一查？"秀真端了进来，姨

太太一不见口蘑就火了："怎么搞的，怎么没有口蘑？这么不好吃？"秀真想，决不能连累了老师傅，就说："没有？可能是忘说了。"姨太太大骂秀真是"死老妈子"，秀真又说："这次忘了，下次再做时记清楚。""你敢顶嘴？"说着两个耳光打在了秀真的脸上，秀真那肯屈服，又还了她几句，姨太太又拿公安局来威吓她，秀真不堪忍受，几天后就离开了何家。

孙静亚家4口人，却雇了5个佣工。有一次一个客人的老妈不懂孙静亚家的规矩，坐了一下沙发，正好被孙静亚瞥见。事后，他马上对李秀真说："快去，叫王嫂来，把沙发皮撕下来洗洗！"秀真提醒他说："刚刚才换上的。""不行，老田的屁股多脏啊！"孙静亚就是这样看不起穷人。李秀真意识到，穷苦人在这些"贵人"眼里是多么的低下啊！

1935年底，李秀真再也不愿过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于是决计回家。

## 三、参加革命

李秀真回家以前，滑县的革命活动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地展开，觉醒了的穷苦百姓纷纷参加了革命队伍。革命组织不断扩大。他们通过宣传革命道理，灌输穷人翻身求解放的新思想，武装了大批革命群众的头脑，唤起了穷苦大众的反抗意识。

李秀真回家后不久，就接触到了我地下党员的活动。

秀真的丈夫患有伤寒病，一个人称老饼的扎针先生来到李秀真的家里给他丈夫治病。这就是我地下党员张老饼，他是这一带的好中医，常常利用给穷人治病的机会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开始他只给王立存谈当时的革命形势，谈湖南有穷人的军队，谈一个姓毛的（毛泽东）领导穷人斗富人、分粮食的情况，谈穷人翻身解放的前景……。李秀真在一旁听得入了迷，她向老饼谈了在焦作

时听到的湖南革命的消息，谈了自己的认识。秀真说："我怕饥、怕冷、怕受气，就是不怕死。"老饼说："你只要不怕死，就可以加入共产党。"李秀真对党早有认识，当即表示愿意。

两天后，老饼带着年轻的刘建国（当时化名姓孙）来到秀真家，给李秀真填了表，介绍李秀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是1936年。

1937年春的一天，李秀真第一次参加了党的会议，区委书记张文轩（老饼的儿子）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张文轩给李秀真布置了工作。从此，李秀真真正开始了她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

李秀真的工作开始是向妇女群众进行革命的启蒙宣传活动。抗战时期，国内形势复杂，群众思想混乱，加上一些反动地主绅士的造谣诬蔑，许多人对共产党、八路军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李秀真根据区委指示，针锋相对，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斗争。她有时扮作女巫婆求仙卜卦，把八路军比成红色，把帝、封、反比作黑色，宣传红色一定要占领天下，有时还借神的口气行医治病，趁机宣传革命思想，挫败了反动势力的阴谋，争取了革命的力量。

## 四、红色交通员

日军占领滑县后，人民遭受了惨重的灾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的抗日救国活动纷纷开展起来。革命武装力量采取灵活多样的对敌斗争形式，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敌人的封锁越来越紧。因此，我党传送情报搞联络的工作就非常困难。李秀真根据上级的指示，在搞宣传工作的同时，勇敢地肩负起了情报联络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940年，有一次党组织交给李秀真一份紧急情报，命令她马上送到打入城里敌宪兵队内部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王文宣手里，

李秀真接受了任务。她装扮成去城里烧香拜佛的，把信包好放在篮子里，上面盖着香和黄表纸就出发了。到了县城附近，一见把守严密，她当机立断，装着解手把信件塞进肛门里继续前进。来到城门前，两个女汉奸警察拦住她，把她叫到岗楼里进行了全身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捞到。李秀真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把情报交给了王文宣。

这一年，汉奸孙殿英部三旅3个团进驻董固城村，李秀真不怕担风险，以炸油条为名，仍坚持搞地下联络。她丈夫王立存烧火，地下工作人员王林在这里帮忙，掩护着做工作。

当时，敌伪军驻董固城军需处要员庞健、唐记，是我地下党员。李秀真的工作就是负责传送庞健、唐记搞到的敌伪活动的重要情报，并且转告我党的有关指示。一次庞健、唐记交给她一份情报，说敌人又要向我解放区“扫荡”了，李秀真马上把信藏好，拎着装满油条的篮子向根据地出发了。到了老牛店村西地，突然发现一股敌人从侧面闯来，躲是来不及了。这时，她急中生智，镇静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装着捆腿，从鞋里把信件取出，又拿了根油条，信拌油条吃到肚里。敌人来到她的跟前，几个家伙上前就搜，衣角、布缝、头上全搜遍了，结果是两手空空，败兴而去。李秀真顺利地到达了根据地，把情报转告给党组织，同志们和乡亲们立即迅速转移，使敌人的“扫荡”扑了个空。

李秀真还常到匪军士兵中间宣传，劝他们投奔八路军，为抗日战争效力。部分士兵受了感召悄悄地把子弹送给了她，李秀真再把它送到我军手里。

1941年夏的一天，敌人又要出来“扫荡”了。李秀真得到情报，二话没说，带上从敌军那里弄来的弹药直奔20华里以外的我军驻地吴河寨。到吴河寨，听那里的同志说，军分区第二办事处已挪到吴河寨西南20华里的大王庄。她随即就向大王庄方向奔去。李秀真是个小脚女人，走路本来就很困难，不巧走到王沙河旁，一片

一望无际的大水出现在她的面前。她一心只想坚决完成任务，便把信夹在头发里，把篮子顶在头上，手中拄一根高粱秆蹚水过河，一大晌才蹚过这片足有5里宽的大水。当她来到大王庄时，天已经黑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热情地倒水铺席，让她休息，她却说："别忙，还有紧事呢！"一面取出信件交给郭主任。郭主任问她："大娘，辛苦了。"她说："我倒不算啥累，要过好日子，就得大家努力才行！"

李秀真在炸油条的同时，还常常到军需处给匪兵们洗衣服，以便于与庞健、唐记二同志接触。时间长了，军需处主任张广亮起了疑心。有一次他与庞健、唐记一起来到李秀真家试探，李秀真机智地瞒过了敌人的盘查。以后，她出入军需处更方便了。不久，一个叫程孔安的家伙向敌军告了密，妄图捕捉王林同志。李秀真知道后，当即把王林送走了。到晚饭后，一群敌军闯进李秀真炸油条处，他们找不到什么，就骂李秀真不是好人，私通八路，闹了一通，才离开了这里。

过了两天，李秀真获知敌人要伤害她的消息，报告了军分区第二办事处。郭主任安排她全家离开董固城，搬到了根据地一个叫马胡寨的村庄居住。

在马胡寨，李秀真仍然做着传送情报的工作。一次，党交给她一份紧急情报，要她送到西南二三十里的慈周寨村。那时正是正月，天气十分寒冷。李秀真接到情报后，拿根棍拄着就出发了。一路上白雪茫茫，不见人踪。她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走了一大晌才到慈周寨，把信交给同志们，完成了任务。

在八年抗战中，李秀真对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穷苦百姓不再受苦，她吃苦耐劳，忘我工作，谱写了一曲雄壮激昂的战歌。李秀真坚信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内心总是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她自己所说："虽说身体吃点苦，但心里总是高兴的。"

李秀真并不居功自傲。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没来得及拍掉身上的泥土，就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 五、“三战”时期的李秀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军分区第二办事处给李秀真布置了新的战斗任务。这就是：回乡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面开展土地改革，一面向群众宣传蒋介石要打内战。

李秀真在军分区办事处学习了两个星期，就回董固城投入了火热的工作。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我全体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对蒋军的顽强斗争。

9月，蒋军占领滑县，地方上的土匪杂牌跟着猖獗起来，形势一天天地恶化，我县党政机关被迫撤离到上堤沙区。李秀真接到区委通知，带领本村的八路军烈属、干部家属几十口向北上堤转移。到北上堤丁村，她们找到了八路军第二办事处暂时安顿下来。不久，她们又搬到了当年有名的沙区抗日根据地路洲村，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照顾。李秀真仍担负着教育群众、武装群众思想的任务。

11月间，敌新五军开始进攻沙区，妄图把我军民包围并消灭在这里。一天，李秀真接到军分区第二办事处通知，到丁村参加了党员会议。会上，大家讨论了当时恶劣的形势，决定我大队冲出去与敌人周旋，打游击，家属自寻出路。会后，李秀真回到路洲，给八路军烈属、干部家属们传达了会议精神，于是大家就各自行动了。

李秀真带着几家人由路洲经过丁村向西转移。1946年12月22日（冬至日）他们行至高前营村的南地，不幸被土匪头子王三祝的部下逮捕了。他们被带到郝村，关在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晚

上，敌人突然把李秀真叫走，带进一个戒备森严的屋子里，开始了第一次审讯。李秀真被拉到屋子正中，两边立着十来个敌兵。

敌军官逼问她："你邻村都谁是共产党员？"

李秀真心想，就是死我10个，也不出卖一个同志。她不动声色地回答："老总，你说什么是圆吗？我干了9年的老妈子，见到的生瓜梨枣核桃苹果都不很圆，只有人家少爷玩的皮球顶圆。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圆呢？"

敌人气得一阵吼叫，问："你儿子是不是八路军？快快实说！"秀真愤怒地答道："我儿子荒年时跑出去，听说他干了八路，我也不知道。谁家都有儿子，干八路的也有，干中央军的也有，他爹他娘都有罪吗？要说他爹他娘有罪，要杀要剐要活埋，随你们的便！"

敌军官见威逼不成，又施一计，假作和气地问李秀真："老太太，八路军那里不叫官，叫干部。你儿子那里谁的干部最大？叫啥名？家在哪儿？你说说吧，等中央军来了，你还能享清福哩！"

李秀真决不上敌人的当，她认认真真地说："你说啥是'干木'？我丈夫是木匠，他从庙上拆下的大梁劈成的板是干的。我又听说南天门上有个过木老干板是最干的，到底是不是，我也不懂。"

敌人一再追问，得到的只是"我不懂""不知道"，结果无计可施，只得结束审问。

第四天，敌人突然将李秀真与同伴们隔离，押解到白道口东南的南呼去。李秀真以为敌人要下毒手了，她镇定自若，作好了临死前的思想准备。

到了南呼，竟出乎李秀真意外，一连几天不见敌人动静，并且李秀真的活动也稍微自由了些。一天，李秀真被敌人带到南呼附近的一个地方。她目睹了敌人凶残地杀害我11位革命同志的罪

行。原来敌人是以死来威胁她，她当时肺都要气炸了，只是不露声色。李秀真被带回来的当晚，一个敌军官来到她的住处，又一次盘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八路军干部。李秀真意志坚定，仍然不向敌人吐露一字真情，敌人的软硬兼施全失败了。

又过了几天，敌人一直没得到任何口供，不得不释放李秀真。

李秀真被押期间，曾受到敌军里一个小头目李万盈的照顾。李万盈本是许庄一个穷庄稼汉，十分讲义气。李秀真炸油条时，一度接济过他，后来为了混饭吃，李万盈才当上了敌兵。

李秀真获释后，她先到郝村找到了同伴们，听李万盈说家里还乡团闹得正凶，他们就各自分散了。李秀真到浚县李付营一个亲戚家里隐蔽了下来。

1947年5月中旬，我军攻占汤阴，沙区八路军又打回来了。消息传到李付营，李秀真惊喜万分，5月24日当即赶回了董固城。25日，李秀真参加了在史固召开的土改万人大会。会前，专县区三级党组织召开临时会议，李秀真也参加了，大家过了组织生活，交了党费。

史固大会结束后，李秀真就回家搞土地改革，划阶级成份。当时敌军还不断对我革命工作进行骚扰和破坏。李秀真就把家搬到了落寨。敌人来了，她就去落寨躲避，敌人走后，就回到董固城继续进行革命工作。不久，这里的土地改革工作基本结束。

## 六、李秀真在北京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势在必亡。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也相继召开了。

1948年秋后，滑县召开了县区妇女代表会。李秀真出席了会

议，并且当选为县级妇女代表。之后，冀鲁豫边区政府在菏泽召开了会议，通过代表资格的审查工作，产生了华北妇女代表团，李秀真为正式代表。1949年初，华北妇女代表团由边区妇联主席万丹如带领，抵达刚打下不久的天津，3月中旬到达北平。

在怀仁堂，华北妇女代表团选举了出席全国妇女会的华北代表，滑县代表李秀真当选。

3月某日，东北南下大军路经北平城，为了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彻底打败蒋介石反动派，李秀真在午门上向南下大军作了鼓动演讲。她以自己送独子参军的生动事迹，以儿子牺牲后她化悲痛为力量，决心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教育我们的战士。她还向战士们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号召革命战士要防止腐化，加强团结，为建立新中国而血战到底。

3月24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了。李秀真这位白发苍苍的巾帼英雄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发表了讲话。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经历了长期的对敌斗争，千辛万苦，终于由阔人家的老妈子成了新社会的主人。

在全国妇联大会上，李秀真先后两次讲话。她讲冀鲁豫边区妇女支前的英雄事迹，讲妇女们送子送夫参军，给战士们做军鞋等动人场面，与会代表许多人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4月3日，中国妇女群众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宣布成立。2日晚8时，大会选举出执行委员会委员51人，候补委员21人。李秀真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全国妇代会召开的第二天上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平飞机场亲切地接见了出席大会的全体妇女代表。当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代表们跟前时，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毛主席与大会主席团代表一一握手。此时，毛主席握着李秀真的手亲切地询问她叫什么名字，并且连连说"好"。李秀真激动万分，眼眶里迸出了幸福的泪花。

当天下午，代表们回到住处，高兴地谈论着见到毛主席的动人情景，李秀真兴奋得一连几夜都睡不着觉。

4月4日，全国妇代会全体代表参观了颐和园、故宫等名胜。

1949年4月2日，《人民日报》以《坚持敌后斗争的女英雄李秀真》为题，发表了介绍李秀真革命事迹的文章，同时还刊登了李秀真连环画。

紧接着华北妇女代表大会于4月15日在北平揭幕，李秀真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历时6天，4月21日结束后，代表们赴天津参观。李秀真应邀到一所女子中学讲了话。4月25日，冀鲁豫边区妇女代表团回到菏泽。

5月底，区党委决定让她作为农民代表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接着李秀真与区党委的几位同志一起乘卡车到达北平，住在中南海瀛台对过。

全国政协筹备大会开始了。李秀真作为农民首席代表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讲了话。

在筹备会期间，代表们共同学习和讨论大会的三个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每晚分组学习时，李秀真常常坚持至深夜。在共同纲领草案中，规定了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枷锁，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与男子有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等内容。经过新旧时代交替的李秀真，为这个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共同纲领而衷心喜悦。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662人，其中农民正式代表有16人，候补代表2人。李秀真作为正式代表，在会议上代表解放区农民大众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全文刊登在1949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

9月30日，大会选举开始了。李秀真光荣地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在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李秀真，并且与她及其他几位代表合影留念。

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这天是李秀真最幸福的日子，她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站在一起检阅了陆海空三军。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前走过；飞机在天空排成各种图案，天地相接，十分壮观。广场上歌声、掌声、口号声连成一片，交织成一支雄壮的交响曲。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整整持续了7个钟头，李秀真也同毛主席以及全体代表们整整站了7个钟头。

还是在华北妇代会期间，李秀真就曾被邀去北辛店军政女子大学讲话。在全国政协筹备会期间，她又到一些学校里作了演说。如革大、政法学院、卫生学院、女子中学、军政大学等。还去崔民庄新解放区民主人士家属那里讲了话。10月3日，李秀真和陈毅到清华大学讲话，受到了清华大学革命师生的热烈欢迎，他们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向陈毅、李秀真敬献了鲜花和锦旗。

李秀真到北京，不仅带来了解放区妇女对敌斗争的革命事迹，而且也带来了解放区妇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作风。

在政协筹备会的三个月时间里，李秀真先后在中南海和华安饭店居住。在中南海，她省吃俭用，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一次开饭时，餐桌上放着一样大小的两种包子，一种是肉馅的，一种是澄沙馅的。她听说澄沙馅要比肉馅贵一半（倍），于是她只拿肉馅包子吃。在一旁就餐的罗树章请她吃澄沙馅的，说肉馅不卫生。李秀真说："这就很好，比起俺在区党委吃的红窝窝、红萝卜、红辣椒要强上几倍。"饭后，别人都睡了午觉，李秀真在屋内学习。这时一个华北政府的同志走来对她说："今天吃饭时你说的话可真不简单。大姐，以后有机会要多说几次。"

中南海没有食堂，代表们的饭菜都是从外边包好端进来的，吃饭不便，不久李秀真等人就搬到了华安饭店。在华安饭店，李秀真每天都与张治中的秘书夫妇一起吃饭。他们吃的都是头等的白面馒头，可秘书夫妇俩每次都揭光馍皮，吃过饭再端出去扔掉。李秀真看在眼里，难过极了。为了启发他俩，李秀真连续两次把他们未端出去的馍皮抓过来吃到肚里。他们问时，她就说："好吃。"秘书夫妇深为感动，以后就不再揭馍皮了。

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接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儿童保护工作会议和政法工作会议，李秀真都参加了，并且当选为儿童保护委员会委员和政法委员会委员。

## 七、光荣归来

李秀真离京之前，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到了她耳边：平原省成立了；滑县头号大坏蛋、土匪王三祝被我枪决；自北京至山东、河南的铁路已经修复通车。

李秀真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乘火车经过徐州，到达平原省驻地新乡。在新乡，她传达了全国政协会议精神，介绍了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谈了自己深切的感想体会。

会议结束后，李秀真回到家里。那时她的家还在落寨，李秀真回家的消息早已传来，群众奔走相告。她刚刚到村口，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李秀真与大家拉家常，谈论国家大事，介绍了政协会议的情况。接着李秀真又到县里开会，同样传达了全国政协会议的精神及自己的见闻和感想。

从县里回来，李秀真的家从落寨搬到了董固城。李秀真立即召开了党员会，与同志们谈了工作，随即又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在会上，李秀真不仅向群众生动地叙述了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情况，并且还向群众公开了她过去做地下工作的活动情况。

她说："那时我扮巫婆，装关老爷都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李秀真的事迹深深地融化了乡亲们的心，他们为家乡出了这样的英雄而感到衷心的喜悦和莫大的骄傲。

## 八、晚年的李秀真

1949年11月，平原省妇女代表会召开了。李秀真被推选为滑县妇女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1950年，平原省政协成立，李秀真被选为委员、副秘书长（？）。1951年3月，李秀真全家搬到新乡居住。

由于战争年代的长期奔波和过度操劳，李秀真的身体健康状况开始衰退。到新乡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在医院治疗4个月，病情才有所好转。

平原省撤销，省委工作人员分散到北京、山东及河南各地，李秀真被调到河南省统战部工作。到开封后，李秀真工作十分繁忙。她除正常的工作外，还经常被各单位邀请作报告。她先后到十几个大、中、小学校作过演讲。她讲自己的历史，讲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些感人的革命历史教材，使广大青少年受到了一场又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对新一代的健康成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秀真的身体越来越糟。一次，她正在院中学习，突然心脏病复发，顿时不省人事，立即被抬到河涛街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脑溢血，生命垂危。经过紧急抢救，李秀真才脱离了危险，可是几十天后才能说话。

1954年，李秀真又随医院迁到郑州。1956年她病情稍有好转，就回机关工作了。1957年至1958年，由于工作紧张，过度劳累，结果导致心脏病一天天趋于恶化。1959年11月间，李秀真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她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熬过了六七个春秋，身

体基本恢复。1966年8月，李秀真终于出院了。遵照医生的嘱咐，她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不久，又搬到了西安市孙女家里居住。

1973年9月，李秀真的病情再次恶化，9月14日医治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到河南省省会郑州，9月21日，郑州市人民为李秀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哀悼这位中国农民的优秀儿女，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巾帼英雄和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 中共直南特委工作回忆*

黎　玉

1934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负责同志对我说，直南特委的领导有问题，你去检查、了解一下情况。我回答说不了解情况，请求派别的同志去。省委说现时没有别的人，只能派你去。于是我到了直南。

当时，中共直南特委书记是王子青，他是磁县的老党员。我到特委所在地邯郸后，经了解，同志们对王子青有很多意见，于是就决定召开会议。为了使参加会议的人员发言无顾虑，就没有让王子青出席。同志们在会上讲了一大堆意见，多是领导作风问题。会议期间，省委调王子青去天津另行分配工作，由我代表省委负责特委工作兼直南特委书记，到1936年4月止，我在直南工作两年。

## 一　直南特委的组织沿革

直南地区，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党对这个地区比较重视，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党的组织，党的力量也比较强大。

1933年至1934年上半年，王子青任中共直南特委书记。

我接任特委书记后，王从吾任组织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长（他们二人都是特委的老同志）；纪德贵任工矿职工部长（他是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上）第108—117页。

六河沟煤矿工人领袖）；王明（又名王兴让，磁县人）任秘书长。

李菁玉没有参加特委，仍担任磁县中心县委书记。磁县党组织曾经是直南特委的基础力量，“立三路线”时期，搞暴动失败，受到严重挫折，接头都很难，李菁玉在那里发挥不了作用。由于当时南宫党组织情况不错，因此在1934年9、10月间，特委决定在磁县留个人负责，调李菁玉到南宫工作。南宫成立了中心县委，县委设在顺德（邢台）北面，中心县委由李菁玉、张霖之、刘子厚、张子衡等组成。南宫中心县委建立后，撤销了磁县中心县委。

特委机关那时没有固定住地。邯郸县委被敌人完全破坏了，我们不能久留邯郸。有的同志建议到安阳去，安阳还有一些我们的干部。我们1934年8月前后去安阳，我住在一个木匠家里。住了个把月，敌人查户口查得紧，9、10月间便转移到磁县。

这时的直南特委（后称为“大直南”），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交通、联络不便。“大直南”管41个县，从南面彰德府（安阳）到北边顺德府(邢台),骑个破自行车要跑一天，路上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地盘太大了实在管不过来。我们向省委建议划成两个特委，省委同意。1934年11月，“大直南”划成冀鲁豫边和冀南两个特委。

冀南特委在南宫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辖邢台、任县、永年、曲周、肥乡、鸡泽、南和、隆尧（隆平、尧山）、巨鹿、广宗、威县、南宫、冀县、新河、故城等19县。

冀鲁豫边特委所辖县份，包括河北省的邯郸、磁县、临漳（当时属河南）、成安、大名、魏县，原属河北的清丰、南乐、濮阳、东明、长垣；河南的安阳、内黄、林县、滑县、武安及山东的临清、范县、濮县、鄄城、朝城等22县。

合在一起41县，就是大直南特委的范围。这些县，有些有党

的组织，有些仅有支部或个别党员关系，有些还没有党的关系。冀南部分新河、冀县、南宫都有县委。最初有个鸡(泽)肥（乡）永（年）中心县委，王卓如在那里领导，后来合并到南宫中心县委。冀鲁豫边部分，过去有磁县中心县委，还有六河沟、彭城、西佐、峰峰等矿区有党的组织。濮阳曾经有个中心县委，但是基本上没有工作，你去人，县委就有；你走了，县委也没了，就这么一种状况。濮阳、磁县是暴动搞的最多的地方，党的力量一度很强。经过几次挫折，干部的情绪比较低落。

那个时候兴代表制度，代表制就是个人领导、负责。我是河北省委代表兼冀鲁豫边特委书记，负责两个特委的工作。1935年6月前后，我让纪德贵担任冀鲁豫边特委书记。纪德贵是工人领袖，胆大心细，对党很忠诚。冀南特委书记是李菁玉，宣传部长张子衡，民运部长张霖之。王从吾到濮县、大名、内黄、滑县这一条线去活动。王卓如去濮阳、清丰、内黄一带活动。王明在磁县兼任县委书记。纪德贵兼管六河沟、西佐、峰峰煤矿的工作。我后来去了鲁西。

那时，都是在野外碰头。碰头时间约好哪一天上午或下午大概什么时间，就以太阳为准。

1934年9月，省委派陈少敏到直南来工作。我们过去在北平和唐山工作时就认识。(她丈夫任国祯是党的好干部，在太原被捕后英勇牺牲了。她本人原来是山东青岛的纺织工人，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下，革命很坚决，为人很正直。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见到她，她说想到我家躲躲，我说“可以。”不过我家中也不保险，我也是“专政对象”啊。听说“九大”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时，唯有她没有举手。)陈少敏到直南，是以河北省委妇女代表的名义来的。我是“省代”，她是“妇代”，都参加特委的工作。她来了之后到濮阳井店一带做恢复组织和妇女工作。

后来，又陆续派了一些同志来。如栗再温，又叫李作舟，河

北省平山县人，我在北平工作时就认识他。还有一位从陕北来的，姓白(对外称姓魏)的小红军，在濮阳工作过一段时间。大约1935年底或1936年初，省委派张玺来了，他来后负责峰峰、六河沟、彭城、西佐等几个矿区工作。这些矿区都在磁县一带，有个别支部和一些零星党员。我走以后他曾担任过一段特委书记。①

## 二　直南党的工作的历史教训

大直南地区党、群工作过去是有基础的，虽然发展有不平衡的一面，但一般基层组织发展很普遍。如北面的南宫、广宗、巨鹿、任县；南面的磁县、大名、濮阳、濮县等都是重点县，党的力量比较强，其他县也有党的支部或党员关系。磁县附近有些煤矿、瓷窑，有数万名工人，曾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过多次罢工斗争，规模达到万余人。农村中也有不少支部，如濮阳县就培养了很多干部，活跃在直南以至华北广大地区。

大名七师是直南的文化中心，也是党的一个战斗堡垒，在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同志领导下，为党培养出了很多知识分子干部。他们1930年为抵制"立三路线"被开除党籍，使我党丧失了这块红色阵地。

那时濮阳、内黄一带晒硝盐的盐民、贩硝盐的小贩很多，盐巡查到就没收，还要抓人。盐民、小盐贩靠硝盐为生，因此，与盐巡的斗争也很激烈，组织打盐巡，夺枪支，也有过一些胜利。如濮阳县以三个盐民为核心，联合了井店、化村、千口等18庄，共数万人，开展了大规模的抗盐巡、驱逐盐巡出境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这些斗争最后并没有巩固起来。那时经过直南特委批准，提出的口号是"抓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群众有什么迫切要

①根据张玺同志简历及其逝世后《人民日报》登载的悼词记载，张是在1936年秋到冀鲁豫边特委工作的，先任宣传部长，后任书记。

求，就抓住这个要求发动群众搞暴动。1934年底前后，在南宫、威县、广宗等地都搞过打盐巡斗争。任县、广宗、南宫一带是张霖之和刘子厚等领导的，把盐巡打跑了，群众很高兴，党的组织也发展了。

这些都是经过很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集聚、发展起来的一些可贵的力量。但是，从1930年至1936年初的几年之中，先是“立三路线”，后是更“左”的王明冒险主义错误，使得这些宝贵力量损失殆尽。

1932年10月间，河北省委陈源道看到磁县六河沟工人罢工斗争出现的好形势，就要磁县发展红军，打游击战争，搞打土豪、分田地。白龙庙暴动后的第三天，游击队100多人在向西山（台子寨南）转移途中遭到民团包围，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王维纲等18个同志被捕，使磁县党受到了很大损失。

1934年磁县中心县委恢复了几个支部，但是群众情绪低落，甚至躲避接头，不愿意和上级党组织接关系。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时期，乱搞暴动。今天是什么“五一暴动”，明天又是“彭城暴动”，把暴动当做儿戏，其结果使大批党员、群众惨遭杀戮。接连的失败，在群众中产生了恐怖情绪，甚至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情况给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到1935年，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总算有了一些起色，未搞暴动的县又积蓄了一些力量。结果，河北省委又提出组织红军抗日游击队，夺武器暴动，“声援红军北上抗日”等主张。首先是在冀南的南宫、任县、巨鹿、广宗、威县等地区拉队伍，贴布告，成立红军第一师，说师长是刘文忠(即刘子厚)，副师长是王光华。发动群众，搞分粮“吃大户”，也搞了点枪。什么办法都用，乱七八糟，也用了些土匪的办法。这些活动是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亲自去指挥的。接着，李菁玉担任书记，也是这些作法。那

时党的组织还不是很巩固，游击队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商震和宋哲元的一些师连续搞了几次“清剿”，就把我们这点队伍差不多清没了，很多群众和党员遭到杀害。

与此同时，河北省委负责人亲自到冀鲁豫边特委来布置暴动，组织游击队，结果与特委同志发生了一场尖锐的辩论。

省委提出组织暴动的理由是“牵制北方的国民党军队，支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把暴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特委完成，并且提出要冀鲁豫边地区和冀南来个革命大竞赛，看谁发动的队伍多、好。特委同志比较了解客观局势，感到不行，但省委的口号是“支援红军北上”，谁敢说个“不”字？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愿首先发言。于是，我便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援助红军北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现在敌我力量悬殊，搞不好又要重蹈“立三路线”的覆辙，从我们主观力量上来说，现在不适宜搞暴动。另外，经过前几年暴动失败的挫折，党员和群众的情绪受到打击，党的组织亦没有完全恢复，如磁县和濮阳县等，这些过去有基础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拿少数干部去拚，后果不堪设想。再者，也不可以让冀鲁豫边和冀南竞赛，因为两地区情况不同。冀南过去没有遭受过暴动失败的挫折，在打盐巡等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形下，群众情绪比较高涨。冀鲁豫边就不同了，过去遭到严重挫折，阶级对比力量悬殊。宋哲元的正规军驻在顺德、大名一带，我们暴动成功的可能很小。即使游击队到西山去，没有群众基础，也很难呆得住。这些问题，都应做统盘考虑。

我们那时还不了解应该积蓄力量、等待抗日形势发展的有利时机、发展党的力量这些道理，在当时我们也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远见。因此，争论许久，也不能说服对方，反而遭到省委负责同志严厉批评，我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还受了处分。

在当时党内“左”的错误影响下，会议上没有民主，也不能

实事求是地讨论、酝酿问题，更听不得不同意见。我们开会的结果，是省委负责同志硬性地决定并布置了冀鲁豫边地区搞暴动，要夺取枪支，发展游击队。下级服从上级，既然省委硬性决定，只好执行。

具体的布置是分区负责。纪德贵负责组织发动六河沟、峰峰、彭城和磁县的矿工游击队；王从吾组织发动大名一带的农民游击队；王卓如与陈少敏组织与发动濮阳、内黄、滑县为中心的盐民和农民暴动；我去山东濮县、范县一带发动、组织暴动。

最后的结果，除在濮县取得一些小胜利外，其他各地不是发动不起来，就是发动起来又遭到保安队、警察局的镇压而失败，又损失了一些同志。在顺德一带，由于省委巡视员兼冀南特委书记（这时我已不负责指导冀南地区工作了）的一意孤行，使党与群众遭受更惨重损失，有些领导干部竟由于在当地无立锥之地，而不得不转移到外地。这就是河北省委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和沉痛的教训。

## 三　徐庄的分粮吃大户

我去濮县，也是冒冒险。濮县有三个区，其中一个叫古云集，王士希在那里当区委书记。古云集区委的中心力量是徐庄支部，因此，我就去徐庄蹲点。

当时黄河发大水，群众最迫切的问题是没有粮食吃。我和徐庄支部的同志研究了斗争方案，派人详细调查地主的粮食、枪支情况。经半个月调查研究，决定先后对两家地主采取行动。第一次是从一个小地主那里搞了点粮食、钱和棉被等东西。这次濮县的县委书记刘晏春也来了。第二次搞了个大地主，因为刘晏春要照顾面上的工作，就没有让他参加，小红军小魏参加了这次斗争。

我们要搞的那个大地主，距徐庄有70里路，天黑开始行动，

在天亮前要赶回来。我们动员了七八十个人，告诉他们每人带一条口袋，然后走了70里地到了地主家院后。我带头，背个大刀跳墙进去。别人跟着跳进去。我们进去后就到粮仓里装粮。本来说好的，每人装多半袋，背多了，路远走不动。结果都满满地装了一口袋，背起来“哼哼”地，很有劲头。地主屋里墙上挂着的两支枪，我们也带回来了。

回去后，我们让支部的一个当“羊倌的”同志赶了一群羊走在路上，把我们留的脚印都踩得看不清了。我们连夜赶回徐庄，到家已经是第二天拂晓了。背了这么多粮食，来去140里，都累坏了，我腿肿的好几天下不了床。春节前，有了粮食，能过个好年了，群众情绪十分高涨。我们趁着接连两次胜利的机会，发展“穷人会”，几十个村庄都串通了，短短的一个星期，“穷人会”就发展了二三百人。

接着，另一区委来人对我说，又调查了一个贩枪的有很多枪，而且多是匣子枪。我问到一些详细情况时，他们只说是乡下流氓贩枪，别的情况不知道。我说一定要弄清，冒冒失失，失败了，挫伤群众积极性。有些干部想不通，我耐心说服他们，讲究斗争策略。以后，把已经集合起来的200多人解散了。

在我离开徐庄回磁县以前，赵健民几经曲折到古云集找到了我，报告了山东省党组织被敌人破坏的情况，要求与上级党恢复组织联系，随后我就回到了磁县向北方局转了山东党组织的关系，同时研究暴动情况。

徐庄两次分粮吃大户的胜利，使群众分到了粮食、衣物，又得了枪支，扩大了政治影响，“穷人会”迅速得到了壮大，而未遭到敌人打击。总结一下这个小小的成绩，更加证实了“左”倾冒险主义是不切实际、脱离实际的。我在行动之前，认真研究了“暴动是艺术，不是儿戏”这一精辟的马克思主义论断，在事前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然后制定

了周密的计划方案。在行动时，对队员们做了政治教育，详细交待了要注意的事项。行动对象选择的是距徐庄较远的一个目标，采取夜间奔袭；不撒传单，不贴布告，通过党员、群众，以串亲访友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群众得到了粮食，我们也有了武器，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群众组织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亦得到加强。敌人摸不清是谁干的，也无从打击破坏。

采取这种非公开斗争的策略，在党的力量尚不强大、群众尚未经过锻炼的斗争初期，乃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可取的办法。这种办法与省委布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主观臆想，是完全不同的。

后来，省委负责同志向刚到天津任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汇报直南地区发动红军游击队斗争的情况时，受到刘少奇同志批评，要求省委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并肯定了我的意见，要省委取消对我的处分。

我从濮县回到磁县特委驻地时，省委负责同志向我当面传达了撤销对我的处分的决定，恢复了我省委代表的职权，并转达了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派我去山东恢复党组织的决定。

我叙述冀南、冀鲁豫边这些情况，是为了使同志们了解大直南建党以来的曲折经历，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山东党同样也经过严重的挫折，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没有省委领导的状况，这都是30年代“左”倾冒险主义的必然结果。在回顾党的白区工作时，这是一段不可忘记的教训。

# 直南革命策源地——大名七师革命史（节选）*

晁哲甫

## 一　建校之初

谈大名七师的校史应该从谢台臣先生谈起。谢台臣先生，原河北省濮阳县人，学识渊博，性格坚强，精明强干，办事有毅力，生活俭朴，待人厚道。他是我和王振华（王文麟）等许多进步同志、同学很尊敬的一位领导者。他有时很严厉地批评我们，但谁也不愿意离开他，总觉得和他在一起特别有意义。谢先生很爱护学生，处处以身作则，应该受到尊敬，但开始有很多人反对他，不过他从来不怕。

1923年，谢先生奉命办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并任校长之职。因初办没有校址、校舍，暂借大名县立一高校址为临时校址。一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上）第128—147页。这篇回忆录，起初是1959年由晁哲甫同志口述，大名师范学校校长贾培元记录整理，并经晁哲甫修改定稿的。1982年3月，大名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在《大名史料》第4期上刊登时，进行了修改，对与当时事实有出入的"'挽谢驱张'斗争"部分，按照当时亲身参加并领导了这一斗争的杨友云同志的回忆作了修改，其他无大变动。后在收入《直南党史资料》时，大名县委党史办又根据原七师学生裴志耕、裴味农、成润、李大磊同志的意见，再次进行了修改。此次修改，改动之处较多，特别是"党组织的建立"部分改动较大。

高校长朱振英，曾当过广平县长，是出名的劣绅，吃喝嫖赌，挑词架讼，鱼肉乡里，上巴下压，无所不为。1916年他篡夺了阎承之一高校长的职务，称霸于大名。见七师借用一高校址，便要挟谢先生聘他为总务主任。谢先生早知他的品质恶劣，拒绝了他的要求。这就触怒了朱振英，他为了显显威风，给谢先生一封信，限3天从一高搬出去。许多教职员感到事态严重，有些恐慌，而谢先生却泰然处之，说："不答理他，看他能把我弄到哪里去！"3天过去，朱振英觉得硬压无望了，就又转托大名县长丁春膏出面调停。但谢先生还是不理他，并明白地告诉他：新校舍不建成，坚决不走！朱振英一再碰钉子，更加恼火，就拉拢教员张裕忱共同向教育厅长陈宝全控告谢先生，污蔑谢先生违反教育常规，荒废学生课业等等，要求把谢校长撤职，换张裕忱当校长。

另外，他们还在校内造谣污蔑，极尽挑拨之能事。他们把谢先生的"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说成损害教师的尊严，玷辱教师的清高，把"以作为学"说成是荒废学生的学业，到处煽风点火。当时校内教员如王显周、刘上翔、范楚材以及俟后请来的张泽普、赵熙亭、傅钟桥等，对谢先生"以作为学"的主张是很不赞成的。他们除有所谓清高思想外，还因为这些读死书出身的人，他们自己就没有实践能力，怎能教学生实践呢！特别对师生打成一片、学生能给老师提意见、课外随时能到教师屋里问课感到头疼。

在校外，当时大名十一中学校长武学易听到朱振英等的谣言，觉得谢先生太主张民主，怕影响到他那里，动摇了他的统治，于是也极力反对谢先生。但是谢先生在这些困难面前并没有退缩，一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一面耐心向教职员解释。后来在字纸篓里发现了张裕忱的状稿，便在放年假时把张辞退了。朱振英失掉了内应也就杀威了，一场风波于是平定下来。

谢先生处事果断，待人忠诚，渐渐取得大家的信任。如高韶亭、王显周后来就尊重谢先生，并在教学工作中认真执行谢先生

的"以作为学"的主张，教给学生制革、制胰、照像技术，在指导学生实践上做出了一定成绩。其他如林子仁、傅钟桥等都有很大进步。

谢先生的主张最初学生也很难接受，在学生家长中也有些不好的反应。但经谢先生的耐心教育及召开恳亲会对家长进行解释，终于取得了学生及家长的信任，"以作为学"得以贯彻并坚持下来。七师的学生当时确实比别的学校里的学生多学些东西，现在也应该认识到有益处。从这里也正好说明党后来提倡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正确的。

## 二　谢台臣先生教育主张的实施（略）

## 三　走向社会革命

1925年，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革命。最初，是从抵制日货开始的。五卅惨案以后，各大城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游行示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时闹得轰轰烈烈。运动渐渐扩大到小城市来。本校师生积极响应，并和十一中、五女师、各小学组织了联合会。开始只是分别到各街、各商号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接着中学生联合会与商会联合在关帝庙共同召开了市民大会，一班学生王维纲，二班学生刘介风（刘大风）、赵纪彬（即赵济焱，亦叫赵化南）等都在大会上做了演讲。特别是赵纪彬在讲话时，态度激昂，最为动人。市民一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接着大会主席宣布抵制日货及募捐支持上海工人，全体与会市民一致举手赞成并纷纷表示立即行动。大会胜利结束。

市民大会以后，我校师生立即募捐200余元，寄往上海工会，支持工人罢工斗争。另外，各校分别组织了纠察队，到各商号检

查日货，进行登记。并向他们明确宣布，不准再进日货，凡发现出售没有登记的日货立即充公法办。不过登记日货是困难的。当时各大商号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可暗地里捣鬼。他们表面上也装出一副爱国的面孔，实际上还在暗地里卖日货。如鸿记、兰花记、瑞司、广益成等广货、杂货号及福茂长、福盛隆等布庄，虽都是经过三番五次检查，也没有彻底查清。他们先是把货藏起来，有的把货隐藏在暗仓库里，有的半夜挪到住家户。后来就更加狡猾，竟制造了一批假商标，偷偷地把日货改成国货。一次我在南街亲见学生从广益成杂货庄经理住室的床下找出了换了商标的日本颜料。不过资本家投机取巧的办法虽多，学生的决心可也很大。日货还是一批一批地查出来了，并分别给他们以警告和处罚。后来，他们也就不大敢私进或私售日货了。抵制日货的另一种方法，是向群众宣传不买日货。各校学生经常到各街、各户或附近的村庄进行宣传，并从报纸上选些抵制日货的歌曲，教给儿童去唱，如“日本货，真不好，奉劝同胞别买了，买了回来惹人笑，既不好来又不牢，慢慢就把中国送掉了”，就是当时流行很广的一首。

经过这一连串清查、宣传，日货在市场上消失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大大提高了，而对日本帝国主义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运动坚持一年多，我校师生在亲身斗争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特别是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以后，师生更加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狰狞面目，就由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到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并把抵制日货运动推向抵制一切外货的高潮。在这一阶段，谢先生思想变化也是很大的。运动一开始，他虽大力支持学生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但仍强调学习，还是专心搞“以作为学”。后来却在办学之外，也积极参加了这一爱国运动。后一阶段的对外宣传等工作，就是谢先生亲自领导的。同学当中以二班为最活跃，许多重大倡议多是由二班发起，如组织纠察队、募捐等。表现最突出的有刘介风、赵纪彬、平杰三（平俊义）、解

蕴山（解瑨）、成滋(即成润，亦叫成荣亭)、李世玮（李大山）、裴梦协（即裴志耕，亦叫裴卜祥）等。其他如一班王维纲、李调元，也都表现很好。

## 四　党组织的建立

通过抵制日货的斗争，学生已开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革命。但是，这只是由于“五卅”、“三一八”等事件引起的爱国热情所致，学校里还没有党的组织。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建党前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应该着重谈谈冯品毅同志的宣传和影响。

冯品毅原名冯庆升，大名县冯庄人，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上中学时曾是谢先生的学生，当时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当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冯品毅曾以跨党身份被选为河南代表参加了会议，据说当时国民党开会仪式中的向孙中山默哀三分钟的规定，就是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国民党的广州党代会以后不久，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开始反共。这时，刚回开封的冯品毅就受到了威胁，不能在河南活动了。后来，谢先生听到冯的情况，就毅然聘他来校任教。1926年8月，冯品毅来到大名。

冯来校后，任英语教员，他非常推崇谢先生的教学改革，并认真贯彻执行。他教的英语课，完全抛开了原有课本，换成自己编写的新教材。内容有北伐时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胜利的故事，群众对北伐军的支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对民众的残酷压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革命先烈英勇斗争的故事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等。这些教材都大大有助于学生觉悟的提高，使学生对中国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教学上，他也有一套较好的方法。如课堂上不说中国话，对难懂的英语字眼就用学生学过的意义相近的词语进行启发诱导。这样对学生掌握知识带来很大益处。由

于这些原因，冯品毅很快就成了学生极敬爱的一位老师。课后都愿意接近他，而他就利用课余闲谈的机会，向学生介绍《唯物史观略解》、《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他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不久他又发起组织了读书会，吸收思想进步的同学赵纪彬、刘介风、裴梦协、李世玮、成滋等10余人参加，利用课余时间从事于革命理论的学习。在他亲自指导下，读书会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就取得了很大成绩。赵纪彬等10余名同学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的提高，这就给本校建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冯品毅也喜欢和谢先生谈话，并向谢先生介绍《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书籍，也常帮助谢先生研究教学方法。应该说，谢先生在这阶段也受了他很大影响，对以后领导师生从事革命活动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冯品毅很得谢先生的器重。

不过，冯在校不到三个月就往广州去了。对学校来说，这是很可惜的。他在校时间虽然很短，但对革命理论的宣传做了许多工作。又因师生经过"五卅"、"三一八"的反帝斗争以及谢先生、王振华等我们几个人对学生的培养教育，红色的胚胎已经接近诞生了。

冯品毅快走的时候，先发展了3名党员，他们是赵纪彬、刘介风、李世玮，随后又发展了成滋（成润）、吴益普。由于冯品毅当时的组织关系不在北方区委，所以由他发展的这些党员的组织关系未能转到当地组织，而由他暂时带到上海，交给了党中央。冯品毅离校以后，他们按照他留下的通讯地址，曾经用写密信的方法，写过两次报告，保持联系，并坚持革命活动。他们在学校办读书会①，发动同学读进步书籍，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熊德山的《社会问题》、孙中山著作以及《新青年》、《中国青

①这一段晁哲甫同志原文是："冯品毅快走的时候，他发展了3名党员，就是赵济纂、刘介风、李世玮。成、吴入党，刘介风说是随后发展的。冯走后，他们几个曾一度与上级党组织断了联系，于是就在学校办读书会（以下同）。"

年》、《向导》等报刊，并且出版了校刊《曙光》，登载些反对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文章。当时这种风气曾在校内外引起注意，校内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形成两个派别。校外也有人反对，如南乐县教育局一伙旧知识分子就曾专出刊物来反对《曙光》，但被赵纪彬写了一大篇文章把他们驳垮了。

当时，谢先生、振华等我们几个人还不知赵纪彬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对他们的做法是赞成的，也曾给了他们一些支持。

这年冬，赵纪彬等3人到了北平，经李素若、刘伯庄介绍与北方区委取得联系。原来，在他们去北平以前，北方区委曾派人到大名来过，但因冯品毅已经离校，未能取上联系。他们到了北方区委，一方面汇报了工作，一方面提出去广州的要求。但北方区委认为不能离开学校，应在校内抓学生运动，在校外抓农民运动，以武装民众，响应北伐。最后确定刘介风一人去武汉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赵纪彬和李世玮回大名，并答应很快就派书记来。

1926年11月，冯品毅离校以后，由他发展的5个党员，分别组建了党、团两个特别支部，标志着大名党组织的建立。赵纪彬和李世玮从北京回到大名七师以后，大名的党组织开始接受北方区委的领导。不久，北方区委派李素若来大名，加强党的领导。于是，党的队伍很快壮大起来。为了加强党的工作，在原来的两个特别支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大名党、团两个县委，领导大名和周围几个县的党员开展工作。县委由李素若担任书记，李世玮负责组织工作，赵纪彬负责宣传工作。团县委由成滋担任书记，李青阳负责组织工作，吴益普负责宣传工作。①

①这一段晁哲甫同志原文是："赵、李二人回校不久，李素若也随后来了。1927年春建立党的最初组织'大名特支'，直属北方区领导，后又改为'大名地委'，仍属北方区领导。当时李素若任书记，李世玮任组织部长，赵济猛任宣传部长，他们的工作任务，这时已确定以红枪会运动为中心，武装民众，响应北伐。"——大名县委党史办。

党组织建立以后，就进行发展。开始李素若不打算直接发展教职员加入共产党。一次他曾和谢先生提出，要谢先生、振华和我加入国民党左派，但谢先生拒绝了，当即告诉李：“我革命半辈子了，要加入就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没几天，党终于同意接受我们入党。同时入党的除去我、谢先生和王振华 3 人之外，学生中还有解蕴山、裴梦协、李同朝（李亚光）、甄择栖（曾则西）等。

赵纪彬、李世玮当时在学生中威信是很高的。他们从北京回来不久，在选举学生会的时候，都获得百分之百的选票，这就给以后党的发展打下了有利基础。

谢先生对党是无限忠诚的，党组织建立后的几次重大的斗争，他都亲自领导，并不顾一切，想尽一切办法来掩护革命力量。就这样，学校在党及谢先生的领导下，成了直南革命策源地，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材，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当时在学校建立党的组织及进行革命活动，并不是顺利的。仅以冯品毅到校来说，就曾引起各界反动势力的敌视。但是谢先生不怕国民党、军警势力的迫害，掩护着冯、李等人在校从事革命活动。从这里也更能看出谢先生的坚强革命意志。

## 五　红枪会运动

大名县是冀南军事要地，历来军阀都在大名设有重兵驻守，并设有冀南镇守使，冀南道尹。两次直奉战争，大名皆遭兵劫，而且地临山东、河南边界，匪患甚炽，水旱虫灾不断发生，却无人过问。军阀迫害人民最为严重，苛捐杂税，如房捐、地捐、印花税、屠宰税，以及要人要车，粮秣草料等等层出不穷。谁来谁要，有时一年重征好几次，有的预征好几年，闹得人民终日与捐税打交道，常年不得安生。大名也是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如城

内王老聚、贺秀岑、德政史家、河岸上申家、西江庄聂家、双庙汤家、北峰刘家等，都占有几十顷或几百顷土地，而劳苦群众则过着糠菜生活。大名也是外国侵略者势力很大的地区，如老堤教堂、东街法国教堂都是清末民初设的，北关美国教堂是民国10年左右设立的，此外多数农村都有大小不等的教堂，外国人就以传教为名，享有特权鱼肉人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大名地区人民极为痛苦，已经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1927年大旱，麦收无几，穷人很多逃往山西，人心惶惶。于是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暴动，而大名红枪会的活动则更为激烈。

当时，驻守在大名城里的冀南镇守使、直鲁军阀谢玉田看到红枪会发展很快，恐怕对他不利，就设法镇压。他假托委任红枪会首领刘小辫（刘希贤）为司令，骗刘小辫进城后将其杀死。刘小辫的徒弟听说老师被杀，提出替老师报仇，和广平、成安、肥乡、永年、南乐等县红枪会联合在一起，围攻大名。

红枪会是农民为了反对剥削势力，自发组织起来的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团体。因为它缺少具有凝聚力的纲领和章程，所以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有事一哄而聚，无事一哄而散。当时，红枪会因听到回家学生的宣传，知道了赵纪彬的身份，打算通过赵与北伐军挂钩，找个靠山，得到武器。于是两个头领亲自到学校来请赵纪彬，希望赵纪彬去给他们出谋划策。谢先生和我很赞成赵去，赵也很勇敢地答应了。于是赵纪彬便利用与红枪会首领接触的机会，宣传革命思想，争取改造他们。

当时，正值麦熟季节，城外是黄色麦田，配上红枪会血红的缨子枪，显得相当威风。红枪会在斗争中创造了“风绞雪”的战术，即远了用步枪，近了用红缨枪。城内驻军先是固守，后来由于红枪会声势越来越大，渐感不能支持，就突围逃跑了，红枪会占领了大名城。

红枪会分红、黄两门。红门首领是张志和，黄门首领是宋连

庆。围城时互相配合，但进城后，两门互说对方的道不灵，闹不团结，秩序很乱，常常为一件小事，如争一块门板闹纠纷，甚至打起来。当时打入红枪会内部的赵纪彬、李世玮二人又是初次领导群众斗争，缺乏经验，对解决红、黄两门的纠纷及如何坚持下去，如何解决供给问题等，都未能及时找到很好的办法。加之这时有一个冒充蒋介石代表的人来到大名(实际上他是孙殿英的人)，在红、黄门首领之间制造矛盾。赵纪彬等为了和北伐军取上联系，以得到接应，就向两个首领提出和李世玮一同去河南联系北伐军。红枪会的首领们同意了这个意见。赵、李临走时再三嘱咐红枪会首领不能和任何军阀讲和，红枪会首领也答应下来。

赵、李到东明县，会见了归张发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军军长梁寿恺，和他的政治部主任汪精涵(汪当时是中共党员，解放后曾担任察哈尔省工业厅副厅长)。他们认为很好，愿意接应红枪会，并随即带兵北上打到濮阳。不料，这时孙殿英乘机用笼络手段与红枪会首领结拜为兄弟，红枪会和军阀孙殿英讲和了。孙也立即封红枪会首领张志和、宋连庆二人为剿匪(指“剿共”)总司令。于是这支原来反对苛捐杂税的农民起义军，一变而为向农民要款的军阀了。以后多数老实农民看到起义军性质改变，就纷纷回家生产，只剩下一批地痞流氓充当了军阀爪牙。这次轰轰烈烈遍及大名、广平、成安、肥乡、永年、南乐等县的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就宣告失败了。

这次失败的教训，是我们在打入红枪会内部以后，只注意了做首领的工作，对下层工作抓得不够。不过从这次失败中，也清楚地看到，必须把发动群众当作工作重点。同时经过这次武装斗争，打破了反革命武装神秘的观点，这就给以后发动群众奠定了有利基础。

## 六　惨遭兵燹的七师学校（略）

## 七　对国民党的斗争

学校经过一年半的停顿，1929年初复校开学，师生皆以欣喜的心情重返学校。在停顿期间，不少学生参加了社会工作，有的当中小学教员、高小校长，个别的竟当了县教育局长。没有参加社会工作的则在家乡从事生产劳动。进步的同学如赵纪彬、李世玮、刘介风、平杰三、刘汉生、李大磊（李方成）、裴梦协、成滋、解蕴山，则积极地发动农民的革命斗争，出生入死，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经实际考验，返校时已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当时，赵纪彬、刘汉生、李世玮、王卓如等4位同学曾在濮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我们很关心他们，开学之初谢先生借去濮阳领经费之机会，亲到狱中去探望他们。当狱卒走开时，谢先生难过得掉下泪来，临走对他们说："你们在狱里要站稳立场，我们在外边一定坚持活动，并想法营救你们。"后来他4人解来大名，谢先生拿出自己的400多块钱供他们打官司。但是也有些投机分子，如王照林、李保璐、庞城、王汝章等都混入国民党内，做了"党官"。返校时则戴着眼镜，穿着皮鞋，以显示其阔绰。因此，学校就不像过去那样单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学校中来了。

前面已经谈过，我校广大师生经过"五卅"、"三一八"等反帝斗争以后，爱国热情很高。这时已知国民党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因而进步师生对反动派极为痛恨。庞城、李保璐、樊鸿祺等国民党的"党官"返校以后，非但不觉惭愧，反而恬不知耻，引以为荣，这就很自然地遭到进步师生的反对，除了他们几个以外，

谁也不和他们在一起。有的甚至当面唾之，嗤之以鼻，或怒目视之，或骂他们“无耻”、“败类”，闹得他们整天抬不起头来。有一次，他们到饭厅吃饭，一进门，大家就一齐鼓倒掌，声音劈劈啪啪，给他们弄个下不来台，他们立刻红着脸灰溜溜地跑了出去。

当时学校里虽然有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但党并未放松对革命的领导，进步师生也丝毫未受影响，照常活动。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等外围组织大发展，三者合计200余人，占到全校师生总数的2/3。党、团组织发展壮大了，革命活动自然也增多了。当时经常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大名附近十几个县都有我们的党员、团员去进行工作。有时候进步师生大批地下去，学校就不上课了。

那时候，下去宣传发动群众或散发传单是很危险的，反动军警随时都要搜捕革命人士。因此大家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就想出许许多多的巧妙办法。军警搜查愈严，我们的办法愈多，整天像捉迷藏似的跟军警打交道。有一次几十个同学上街写标语，每人手里暗暗拿着几支粉笔，大家分头先后出发，布满从北门到南关整个街道，一会儿功夫，大家一齐动手，随写随走，从北到南的大街、小巷写的满是标语。等军警知道以后，同学们已绕道返校，有的像没事人一样装着在街上卖东西，闹得军警们无一点办法，只得逼令群众快擦掉。

当然，我们的办法尽管巧妙，有时也会意外地被军警碰上或抓住。侯正寅等同学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并被判处短期徒刑。

1929年“双十节”这天，在县委领导下，全体党、团员一起走向街头，搞了一次统一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在这次行动中，学生王从吾负责在县政府以东到县十一中学这段路上散发传单。当他在十一中校内把一张传单递到一人手里的时候，不

料那人立即抓住了他的手脖子。王一看不好，拔腿就跑，跑到县乡师学校时被追来的人抓住了。乡师校长得知王是七师学生，就交给了七师的训育主任王振华带回学校。经县委和学校党组织研究，为了王从吾本人和学校的安全，决定让王从吾在当天深夜就离开了学校。

双十节行动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恼羞成怒的敌人深惧革命烈火的熊熊燃起，一直伺机要对朝气蓬勃、声名远扬的七师狠下毒手，进行武装干涉。这一天真的来到了，由于一个学生在寄给同学的寻常书信里，引用老师的话吐露了对时局的不满，信被敌人查获，就以此借口，大动干戈，包围了七师。这就是11月“围剿”。

1929年11月，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正当师生忙于备课、学习的当儿，两个大兵端着手提式枪闯进了传达室，并命令工友老王马上带他俩去找校长。老王领他俩到了校长室，谢先生很客气地待以烟茶，大兵却凶狠地说：“奉孟旅长命令，传你和你校学生孙耀宗立即到司令部回话！”说罢即令工友带他们去教室找孙耀宗。

孙耀宗是新招第八班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他初来本校觉得一片新奇，上课时听到一些进步老师的话，就当做新闻似的记在笔记本上。孩子们为了向他们的旧同学介绍分别后的情况，常互相通信，有时也用老师讲过的一些话。但孩子们哪里知道，连这点自由也有人在暗地里注意着，像凶猛的鹰鹫窥伺着春天的鸟儿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美丽的生活就要遭到破灭。孙耀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捕了。

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听说叫他去见旅长，早已吓得混身颤抖，何况两个大兵又是那样凶狠，所以孙耀宗面孔惨白，吓得不会走路了。结果两个大兵连推带搡地把他带走，幸好谢先生与他一同前往，这还多少给孙耀宗壮了胆量。

到达司令部，孟宪吉就问谢先生学校的情况，当然谢先生不

会向他说实话。他见问不出来，又因“主犯”孙耀宗已经带到，就以外押形式派人监视谢先生回校。这时全校师生正在挂念着他俩，见谢先生回来，都来问是怎么回事。但谢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哪知道是什么事呢！因而谢先生只好安慰大家不要惊慌，并说什么事也没有。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弄明白，是孙耀宗给十一中一个同学写的一封信上，引用了英语教员原政亭的几句话，于是就被认为“背叛党国”加以逮捕了。其实孙耀宗哪里知道什么党国呢！

谢先生回校以后，孟宪吉旅司令部特开军事法庭对孙耀宗进行了审讯。后来听说他们当时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甚至搬出了大刑具。堂堂大司令部竟如此对待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简直可笑极了。

审讯的情况是这样：孟宪吉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抽着香烟，他的军法处长坐在一把大椅子上，前面摆一张桌子，一面放一大叠文件、信件（信件是邮局检查出来的），两旁站立着20多名持枪的大兵。孙耀宗被带上法庭后，军法处长按照手续问过孙耀宗的年龄、籍贯等，就拿出一封信问道：“是你写的吗？”孙答：“是我写的。”那个处长板起面孔，大声问：“你为什么反对国民党呢？”孙答：“我没有。”那个处长急了，喝道：“胡说！你还敢抵赖！现有证据在此。”接着就把那封信打开，念道：“……国民党处处皆矛盾，无话不荒唐……”念完更打着不文不白的官腔说道：“你这黄口孺子，竟敢背叛党国，这种叛逆行为定非只你一人，你要从实讲来！”说着掏出手枪，对住孙耀宗的胸膛喝道：“你想死还是想活？”孙耀宗这时已经吓得面如土色，断断续续地答道：“那是我和同学写着玩的，并不是背叛党国……并没有同伙的人。”军法处长看孙耀宗没说出别的人，就“哼”了一声，随即喝令左右搬大刑具，刹时旁边站立的大兵取来杠子、木笼等放在孙的面前。这时孟宪吉从沙发上站起来，装出一副慈善的面

孔，笑着说道："孩子，说实话吧！我不叫你受委屈，我知道那话不是你说的；你说出来那是谁说的话，我就把你送回家去。你不想你妈妈吗？"稍停，孙仍不语，孟宪吉也急了，立刻换了一副凶狠的面孔，说："还不说！告诉你，你要小心我的厉害！……"

就这样，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被他们当成多厉害的敌人似的翻来复去的连吓带哄。孙耀宗后来终于想起那句话是原政亭在讲课时说的，就全盘告诉了他们。于是愚蠢的军官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一面把孙押入监狱，一面派一个叫郎春生的团长带兵一营包围七师，捕捉共产党。孟宪吉亲自下令："一个不能漏网，完不成任务不准解围！"

当晚11点多，一营大兵包围了学校，校外满布岗哨，并下令不准任何人随意出屋走动，郎带着卫队叫谢先生马上交出英语教员原政亭。谢先生就带他们到原政亭的住室，但没有找到。郎随即下令搜查，于是全校各处尽皆遭了殃，大兵任意出入各屋，翻箱倒柜，乱搜乱查。经过两个多小时，也没搜出原政亭，时已深夜，郎只得下令暂停搜查。他自己就住在校长室前侧的两间屋子里，并令两名士兵把谢先生监视起来，就这样乱哄哄地过了一夜。次日晨，郎命令谢先生把全体师生员工齐集操场，挨次点名，结果仍未查出原政亭。这时许多同学都很惊慌，但谢先生仍极镇静，他一再安慰同学不要害怕，说没有别人的事。过了一天还没有找到原的踪影，晚上郎怀疑打铃的工友陶荣可能知道原的去向，就把陶抓到司令部进行严刑审讯。第三日，又集合师生员工，叫陶荣相认，但还是没有效果。于是又派学兵连日夜搜查，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出校，后来在一教员屋里搜到了一张《伙计报》。这个刊物主要是启发工友们的阶级觉悟，认识团结、出路等问题，主编是李亚光。查出后，随即将李亚光抓去了。敌人提出不拿住原政亭仍不解围，已经围困了5个昼夜，学生吃饭均成了问题，大家都非常焦急。不料，原政亭突然挺身而出，自行投案，这样才

得解围。

原来，在七师突遭包围，县委成员和文件、油印机等都包围在学校里的严重情况下，学校用尽一切办法来掩护县委，随时将情况报告县委。因此，当夜县委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委书记甄择栖，组织部长裴志耕，委员解蕴山及团县委书记成滋。会议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党的文件和印刷器材安全秘密地转移到校外可靠的地方；并让原政亭藏到新建教室的顶棚上，由一个学生给他送饭、联系。在县委的领导下，同志们部署周密，行动果敢，方法巧妙，一切都分散转移了。敌人搜查5天，大费心机，所获甚微。可是，敌人一连5昼夜不肯退兵，原政亭不愿长期连累全校师生，乃挺身投案。

这次共捕去师生10余人，后由孟宪吉旅司令部转到大名法院，经过审讯，有些无关的教员和学生被释放了。敌人审讯教师姬德林和王痴吾时，问："为什么你是中国人要教苏联的书呢？"他们回答："因为苏联的书籍重视实际，出版者还不犯法，难道我们看书、教书的就犯法吗？"说得审讯官无言可答。李亚光等学生在监狱里关了20多天，因证据不足就经取保释放出来了，原政亭被判徒刑2年，孙耀宗被判徒刑半年。此外，取保外押的有裴志耕、成滋、吴荫惠、吕鸿安、李清阳5人。孟宪吉一网打尽七师共产党员的计划落了空。

围困学校虽未捕到几个党员，但当时反动报纸却大吹大擂，如天津《益世报》就以显著地位报道什么"破获共产党大本营河北七师"、"捕捉共产党××名"、"搜到带色书刊、传单××箱"。其实，谁知道这都是哪里来的鬼消息！

自此以后，军警不断来校搜查或逮捕教师、学生，闹得暗无天日。图书馆藏书稍有可疑，即被焚毁，师生随时都有遭受不测的危险。这可算作学校遭到的第二次大摧残，虽然较前次更甚，但我们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仍然坚持斗争，从事革命活动。

# 八 “挽谢驱张”斗争

1930年是谢先生、振华和我几个人在革命道路上遭受阻碍最严重的一年。我们曾被开除党籍……

1929年下半年，直南党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一些“左”的斗争口号和方法，如散发传单、飞行集会和搞武装暴动。当时学校党组织也主张发动武装暴动，由师生捐款购买一批手枪，并组织土匪力量，一次曾叫来一个土匪头子在校住了好几天。这事当时学生都不知道。但谢先生、振华和我几个人不主张这样办。我们认为当时革命进入低潮，敌人力量太大，搞暴动脱离实际，结果只会失败。我们还提出“应以学校为掩蔽之所，把党员培养成熟后，派往农村深入发动群众，候机会到来再行起义”的主张。虽然我们仍执行着党的决议，但从此党内便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11月“围剿”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迫害越来越严重。有时白天捕人，有时夜间搜查，但当时学校的党组织仍坚持以前的斗争方式，没能引起足够的警惕。虽然谢先生、振华和我几个人一再建议，却始终未被采纳。因此，我于1930年初趁放寒假的机会，特为此事到天津找到顺直省委的一位罗同志，向他汇报了大名的情况，他听后同意我们的意见。回校以后，在开全体党员会时，我们传达了省委的意见。但没有开完，就令谢先生、振华、高韶亭和我退席，后又宣布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开除党籍。现在我回想起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的主张是比较稳当的，学校党对同志有些惩办主义，如果谢先生还活着的话，继续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是没有问题的。（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435号文件通知濮阳县委和大名县委，恢复谢台臣同志党籍，承认他生前为中共党员。——编者）

我们被开除党籍以后，思想上虽然并没有离开党，但觉得和

党通不上气，不知道党的方针政策，就不能领导学校。于是1930年3月3日，谢先生向教育厅写了辞呈，振华和我也准备同时离校。

谢先生的辞职，正合教育厅的意思。由于七师党的发展和党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的不断进展，引起了省教育厅对七师的注意，并对谢先生产生了怀疑。但当时教育厅还不知道谢先生是共产党〔员〕，只是了解学校的革命活动与谢先生有关，深恐革命火焰会成燎原之势，正打算借故辞退谢先生。不过，他们也深知谢先生在学校中、在社会上的威望，不敢轻易提出。这时见谢先生自己辞职，就立刻派反动透顶的张达夫来校处理。张达夫是以督学身份来的，到校后名义上是挽留，实际是取而代之。

这时，七师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的指示领导和团结进步师生，开展了著名的“挽谢驱张”的斗争。（下略）

## 九　谢先生第二次任校长（略）

## 十　第三次大摧残（略）

## 十一　与托派斗争（略）

## 十二　抗日教育及学校被拆毁（略）

# 直南沙区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的革命斗争*

王从吾

1927年冬，中共濮阳县委成立。在此前后，我们多次发动贫苦农民反对地主、恶霸、豪绅的压迫剥削，进行抗捐抗税的斗争。1928年春，千口、化村等村农民协会首先联合起来，到温邢堌清算民团联庄团总蔡鸿宾的罪行，取得重大胜利。方圆数十里的几十个村镇为之震动，斗争迅速扩大到硝河两岸，革命形势日益高涨。1929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六），县委在温邢堌开庆祝斗争胜利大会时，遭到大地主刘润之等策动的濮阳、内黄、滑县反动民团的武装袭击，县委领导成员赵纪彬、李大山、王卓如、刘汉生同志被捕，革命群众有些伤亡，斗争受到挫折。为振奋群众的革命情绪，压下地主、恶霸、豪绅的反革命气焰，深入开展党的工作，我和河北省委巡视员张含辉、已取保外押的王卓如、刘汉生等同志商定，于1930年2月15日在千口召开群众大会，纪念死难烈士，进行武装游行示威。这次大会吸取了头一次大会的教训，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周密。我们把千口、化村、井店、六村、马集、薛村、店当、邢堌、破车口等二三十个村庄的群众都动员起来，让所有到会群众都带上武器，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拿大刀、长矛。正月初六那天，大概有两三千武装群众参加了大会。会场上搭了个台子，会议由我主持，刘玉峰讲话。大会以

---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上）第183—195页。

后，群众列队向烈士致哀，并到土豪劣绅刘润之和温振刚所在村刘邢捆、温邢捆进行武装游行示威。群众游行队伍一边喊口号，一边骂这些土豪劣绅。刘润之、温振刚等紧闭门户，不敢露头。因为考虑到我们的同志还被关在监狱里，今后我们还要对地主、豪绅继续开展斗争，当时给群众规定了几条纪律：不准冲进地主家，不准烧房子，不准打死人。所以群众队伍很遵守纪律，秩序井然。大会结束后，群众情绪很高。以后，群众组织和党的组织都有发展。张含辉同志把这次大会的情况，向河北省委写了一个报告。

刘汉生、王卓如取保外押，敌人随时都可能传讯他们，张含辉与我们商量决定，把他俩调到邢台中心县委分配工作。1930年2月，重新组织了县委。我是县委书记，平善修、刘玉峰是县委委员，赵桂妮是团县委书记。县委的主要工作是继续发动群众，扩大党的组织。我们提出"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口号，领导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斗争。例如，井店的郭连元，专收屠宰税，我们就在群众中提出"打倒郭连元，杀猪不要钱"的口号。在斗争中，这一带的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

河北省委接到张含辉的报告以后，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有武装，有群众基础，就比较重视这里。直南特委几次派人到这里来，准备组织武装暴动。我们当时认为，虽然有群众组织，群众手里也有些枪，但是搞武装斗争条件还不成熟。到1930年6月以后，省委、特委都派人来贯彻"立三路线"，成立行动委员会，要搞武装暴动。县委变成了行动委员会，实行军事编制，大名一带编为一个军，濮阳编为一个师。7、8月间，河北省委书记郝庆猛（郝青玉）亲自来我们这里，还派了王士英（他在旧军队当过旅长，懂军事）、小郭（冯玉祥部队学校毕业，也懂军事）来，天天研究怎样搞武装。在有基础的几个村（如千口、化村）经常召集会议，由他们讲形势、讲任务、讲怎样搞暴动。这样一直搞了两三个月，

把群众搞得没有情绪了。好在没有行动起来，如果举行武装暴动，非垮台不可，这是完全没有胜利希望的“左”倾盲动。

1930年9月，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河北省委于10月（或11月）开会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是在磁县光禄镇李巨川家里开的（他当时是县教育局长，还是督学，有社会地位，好掩护）。直南特委领导下的各县县委书记都参加了。我代表濮阳县委到会。由河北省团委书记吴正庭传达，说“立三路线”对形势的估计和搞盲目暴动是错误的。此后，“立三路线”就停止贯彻执行了。

1930年下半年，党组织在濮阳县城的学校里有了很大发展。我记得，第一模范小学的刘晏春就是1930年暑假入党的。在这个小学建立了党支部，刘晏春任支部书记。他又发展了王汉涛、王子震、徐连科、王士希等人。濮阳中学也有了党组织，李树皂、管化三、王培志等都是党员，还有了团的组织。女子小学也有党组织，刘俊贤、尚玉峰等几个女同学是党员。在学校，群众组织也有活动，学生里有读书会，教员里有教员联合会。

到1931年，以学校中的教员、学生作桥梁，利用假期，向农村发展党组织，好多村都有了党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在濮阳城里利用国民党抗日救国的一些合法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我党影响。学生们进行抗日宣传，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党、团组织借此机会进行活动。在城南两门、桑村、五星一带的学校发展了党组织，桑村小学、两门小学、霸头小学都有了党员（多是校长和教员）。

城东的官庄、徐镇、保安等地也有了党组织。

濮阳城南一带党组织发展得比较快，也较普遍，到1932年，以桑村小学为中心，两门、姚家、赵庄、八里庄、刘邢曹、徐家花园、五星、执口等地都有了党组织。到1933年，濮阳以南一直到和滑县交界处，99个村有了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

1931年、1932年党组织由内黄、濮阳、滑县发展到濮县。1931年濮阳县委改为中心县委，领导濮阳、内黄、滑县、濮县、东明、长垣几个县党的工作。中心县委之下还建立了滑县县委，由聂真、侯紫宸、冷楚负责。当时我是中心县委书记，刘晏春是宣传部长。

在这一段，党领导群众开展过多次斗争。

1931年濮阳小学教员的"增薪斗争"。这一斗争是刘晏春领导的。他写过一个关于这次斗争的材料(材料在刘晏春的档案里)。这次斗争失败了，但小学教员的组织——小学教员联合会成立了，并且有了行动，为争取增薪而罢教好几个月。利用这次斗争，我们把小学教员组织起来了。

1932年的盐民斗争。

1931年下半年，我们发现"长芦盐业公司"有一个武装组织——"长芦盐务税警缉私队"(简称盐巡)。这个公司为了推销大盐，禁止各地做小盐，在濮阳、清丰、南乐、大名、滑县等地都有盐巡组织。盐巡发现谁做小盐就把谁扣起来，并罚款、捣毁做小盐的工具，闹得群众无法生活。那一带做小盐的群众（简称盐民）很多，盐巡这样一搞，引起盐民的强烈不满。我党从群众利益出发，在盐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反对禁止做小盐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结合起来，反对盐巡抓人，反对捣毁做盐工具，号召盐民联合起来跟盐巡斗争。这实际上是在盐民中搞统一战线（因为盐民的成份很复杂），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

濮阳有三个地方盐民很集中，一个是濮阳城里和城关，一个是硝河两岸包括内黄的盐碱18村，再一个是沙窝故县。我们就在这些地方的盐民中做组织发动工作。直南特委的代表高克林（特委军委书记）和中心县委直接领导这场斗争，多次开会研究，怎样组织群众，采取共同行动，搞垮盐巡，把盐巡驱逐出境，让统治阶级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会议经常是在刘静轩家（他父亲同

情革命）和刘晏春任教的小学（他是模范小学的一个部主任，有单独的办公室，此校的教员大部分是党员或同情者）开。会后党员分头去动员盐民。张会之（大名七师的学生，濮阳西街人）在濮阳城里利用一些上层关系（他叔叔是小绅士）在盐民中进行发动。濮阳北街的郭凤侠、刘静轩、尚玉峰、李树皂等都去做盐民的工作。王培志在沙窝活动。井店一带靠党组织把盐民组织起来，由刘玉峰、郭尚景负责。

其他各县怎样行动？我们研究首先是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搞了一些传单，由一人起草了《告盐民书》。传单和《告盐民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揭露了统治阶级利用各地盐巡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提出了广大盐民的要求。为了斗争的需要，当时我们以县委为主，还成立了一个总指挥部（记不清是叫行动委员会，还是叫什么了）。我、高克林、刘玉峰、刘晏春都参加了，还吸收了一些党外人士。记得还有张会之、王培志、栾传动、张会之的叔叔(非党员)等。对这次行动，研究了一个计划，准备集合盐民去包围盐巡局。

按照行动计划，1932年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城西、城南和濮阳城里的盐民于上午10点左右在城内西街集合（西街一带住的都是盐民）。这天井店、沙窝一带来了大概1000多人，城里盐民也有1000多人，每人都带着武器或者工具。我们又动员了城里的学生、教职员和市民去参观、助威，加起来有好几千人。群众集合好后，我们先开了个会，进一步做动员。会还没开完，消息让盐巡知道了，于是我们赶快行动，几千人从西街往北街跑，包围了盐巡局所在的王家大院。但迟到了一步，盐巡局的人都跑了，门也锁起来了。这时，县政府得知了群众的行动，急忙让各区的保安队进城，连同城里一个连的保安队进行戒备。群众的情绪很高，不断地喊着口号，要砸盐巡局。我们几个负责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给盐巡点厉害看看，就找盐民中的积极分子杨进才，让他站在

墙头上讲几句，号召一下。杨进才向群众讲："这些王八蛋都逃了，我们不能便宜了他们，冲进去，把他们的东西砸烂！赞成的朝北磕头。"盐民们纷纷跪下朝北磕头。只听杨进才一声喊："冲啊！"大家以排山倒海之势把院墙推倒，把门砸烂，冲了进去，把里头的东西全部捣毁。然后举行游行示威，从北街游到西街，又喊口号，又散传单。队伍游到了西水坡，又集合开会。高克林同志讲了一下，意思是这次斗争告一段落，我们取得了初步胜利，虽然没有捉到人，但是砸了盐巡局。怎样巩固这个胜利呢？必须建立组织，成立盐会。会还没开完，县长就带着他的保安队来抓人。群众马上报告了我们（当时我们都躲在盐民队伍里），我们及时结束了会议，号召群众不要散开，赶快上前把县长和保安队包围起来。群众把他们围起来以后，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跟他们讲理，搞说理斗争，向他们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盐巡不许再来；第二，小盐可以做，可以卖；第三，做、卖小盐不犯法，不准抓人、罚款和没收工具。县长看着群众人多势众，义正词严，不但不敢抓人了，而且一一答应了群众提出的三个条件。这样，群众才胜利而归。

在这次斗争中，从盐民里发现了一些积极分子，我们从中选拔扩大了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为巩固斗争成果，首先通过选举代表，成立了濮阳县的盐民协会。然后在濮阳城里西水坡、城南沙窝和城西北硝河坡三个地方分别唱了三台戏，利用唱戏的机会开庆祝大会。濮阳城里先唱的，看戏前开庆祝大会，会上让杨进才（他通过这场斗争加入了党）讲话，他讲得很好。会后唱了三天戏。城南沙窝的庆祝会我去讲了话，首先讲到了盐民的生活和所受的压迫，盐民的反抗和取得的胜利，然后讲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讲到南方已经有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最后号召群众继续开展斗争，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后来，各地都开了庆祝会，

千口、硝河坡的会我也参加了，刘玉峰讲了话，也唱了三天戏。各地每次开会、唱戏都有传单、标语，并散发《告盐民书》。

大约在濮阳、内黄盐民斗争的同时，滑县县委领导滑县盐民砸了道口的硝磺局（国民党河南省的一个税务组织，也是禁止做小盐的反动组织），把硝磺局里的人抓起来一部分，赶跑了一部分。斗争办法和濮阳县差不多，把这个反动组织消灭了，斗争获得胜利。他们也开了庆祝大会，唱了三天戏，规模很大，还请了近100桌客，各村选了代表去参加。我们也派了濮阳盐民代表团去庆祝他们的胜利，我和杨进才都去了。这个庆祝大会开得很好，会场上事先布置好了传单、标语，还挂了一面很大的红旗，红旗上画着做小盐的工具（刮板、铁锨、扫帚）。我们送给他们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濮滑盐民携手奋斗！"会上冷楚同志先讲话，然后我代表濮阳盐民讲话。群众情绪一直非常激昂，不断高呼口号。讲话以后演戏，演罢戏请客、吃饭、敬酒。借此机会，宣传盐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必要性。

还有一个村在开庆祝大会和唱戏时，把他们抓住的一个盐巡绑在台柱子上，并在他脸上刺了"大孬种一个"这样几个字，以泄群众之愤。

清丰的盐民包围了县城，盐巡不敢出来了，答应了群众提出的条件。清丰也开了庆祝大会，我去参加了。

南乐、大名都搞了盐民斗争，但大名是群众的自发斗争，我党没有领导。盐巡和县长联合起来，欺骗并开枪打死打伤了几十名群众。

其他县的盐民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大概是1932年6、7月间，大名、清丰、南乐、濮阳、内黄、东明、长垣、封丘、延津、滑县、濮县等县的代表在清丰开了"两河盐民总会"（指河南、河北）成立大会。濮阳县是我、刘

玉峰和杨进才去参加的。大会进行了选举，我当选为盐民总会的主席，有没有副主席不记得了，还有一些委员。盐民总会号称有10万盐民大军。

1931年至1932年我党领导的这一场盐民斗争，有经验也有教训。从总的来讲，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教训是有些“左”的作法。本来这场斗争是利用合法斗争，建立各阶层盐民的统一战线，但传单、标语和《告盐民书》是用直南特委的名义散发的，在宣传过程中暴露了党组织，以致使敌人发现这场斗争是共产党领导的，敌人为了防止盐民暴动，便加强了镇压。河南省主席刘峙曾亲自带一个团到滑县抄了聂真的家。河南省保安司令庞炳勋带了一个团到濮阳抓人，在井店一带抓了几个，打死几个，又到千口去抓人，到了刘汉生、赵纪彬家，打死了刘汉生的叔叔，把刘汉生以及许多共产党员家的门都封了，又在袁六村抓了两个人。当时河北省委的一个巡视员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批评濮阳县委是“富农路线”，因为在联合会的盐民中有富农。这个批评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在盐民斗争的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发展。

盐民斗争以后，1932年下半年，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濮阳南部两门、桑村和濮阳城周围以及和滑县交界的地方，这里党的组织发展得相当快。这时，县委根据直南特委的决定，准备在桑村、两门一带发动武装斗争（特委决定由磁县、濮阳南部先发动），提出分粮吃大户。县委这时有些改组，增加了几个人，书记还是我，组织部长是刘俊贤（濮阳城内小学教员，当时表现积极，后来叛变），宣传部长是刘晏春，清丰的李杰安、濮阳城里西街的杨进才都参加了县委。磁县先发动武装斗争，搞了几百人，但基础不行，跟当地民团一打就垮了，被民团包围、消灭，王维纲就是这次被捕的。我们当时没有搞，搞起来也是要失败的。

1933年秋天，黄河从长垣的石头庄决了口，大水把两门、桑

村周围五六十里地，包括滑县东部、濮县、范县、寿张一带都淹没了。水灾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又领导了一场灾民斗争。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发动群众，向地主要粮吃，借衣服穿，有的还把地主武装搞过来了。当时，斗争搞得比较出色的是姚家、赵庄等两门周围的几十个村。1933年下半年我已离开县委，县委书记换成田园，农民党员张五参加了县委。县委直接指导了这场斗争。特委派刘同芳，省委派王富元亲自到灾区检查指导过工作。那时，灾区与外面的联系都是通过小船，许多小船都控制在我们手里。党把灾民组织起来，分地主的粮食、衣服，缴地主的枪，利用地主的枪支来武装自己，并且搞掉了一些很坏的地主。在灾区怎样打土豪呢？事先派人划船去调查地主的情况，了解地主罪恶的大小，资财与枪支的多少，然后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对罪恶大的地主，借口给他运东西，船走到半路，就把他推到水里去，东西我们留下分给群众。一方面是灾区群众的斗争，另一方面灾区以外有党组织的地方，我们就发动群众支援灾区，设粥场、发放衣服等等，帮助灾民渡过困难。灾民斗争一直搞到冬天结冰的时候，给了地主阶级以有力的打击。在这期间，我们完全公开了共产党的旗帜，因此，到这一带结冰的时候，地主、民团、会道门等各种反动武装都联合起来向我们进行报复。他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占领，镇压、逮捕参加斗争的灾民，实行白色恐怖。好在县委领导同志都逃出来了。这场斗争最后是失败了。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之下，许多人消极了，动摇了。1933年底敌人逮捕了一批人，一些人（多是知识分子）经不起考验，自首叛变了，组织部长刘俊贤就是其中之一，他供出了许多人，使革命遭受损失。

在1932年、1933年期间，濮阳党的组织从濮阳向东发展到濮县。刘晏春同志利用他的关系在濮县发展党组织，后来又由濮县发展到范县、观城、莘县、聊城、茌平等县（以后这些县都属于

山东了）。当时，直南特委派黎玉同志在那一带工作。

1933年以后，濮阳以南这一带就比较消沉了，党在濮阳城里活动更困难了，但在农村还有活动，城外一些同志还和我们有联系。

从1932年盐民斗争以后直到1933年底，井店这一带基本上没有什么斗争，党组织也没有多少发展。张增敬同志在这一带有活动，他家是太平村的，离化村一里地。他是河南安阳青年团的特委书记，属于河南省委领导。因此，开始我们不知道他，后来通过工作关系才联系上。

这一段除了以上所说的盐民暴动、灾民斗争等大斗争外，还有许多小的斗争。这一段党员到底有多少？记不准确了。1935年在冀鲁豫边特委时，我和陈少敏曾经统计过一次，大概党、团员加起来共5000多人，有党员的县有几十个，有的县党员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其中濮阳和内黄占很大一部分。从当时来讲，豫北有党组织的地方是：安阳、临漳、滑县、内黄、林县、武安。冀南有党组织的地方是：成安、大名、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邯郸等地。山东有党组织的地方是：濮县、范县、观城、寿张、茌平、博平等地。这一带，1935年以前都叫直南特委，1935年以后分为冀鲁豫边和直南两个特委。

1933年至1934年期间，直南特委书记是王子青（外号“老黑王”，农民出身，已死），组织部长是我，宣传部长是王卓如。1934年下半年王子青调走，河北省委代表黎玉兼任直南特委书记。陈少敏也调来，是特委委员。特委开始在邢台，后来先后搬到邯郸、磁县、安阳，都是利用一些社会关系来掩护特委机关。例如，王维纲是磁县一个小学的校长（曾是大名七师学生），同情党（当过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以后参加我党），我们就利用这一关系，经常在他家接头，召开会议。那时，特委脱产的不多，一是因为没有钱，二是因为没有家，大都是找一个公开职业作掩护。特委分工是：王卓如、陈少敏负责濮阳、内黄一带，我负责大名、清

丰、南乐一带。这一段的工作主要是搞游击队，搞武装斗争，提出的口号是“分粮吃大户”。

陈少敏同志到那一带以后，做了许多妇女工作。很多妇女参加革命，加入了党，表现很积极，比男同志发动得还要好。例如，内黄县马集的王爱花同志就很坚决，在困难的时候，经常掩护我们在她家住。1935年有一次我们搞武装运动时，晚上被民团包围了。王爱花很机警，狗一咬她立即起身，知道民团来了，马上悄悄地赶到我们休息的地方通知了我们，使我们免遭敌人的伤害。又如，化村张怀森的爱人，一直表现很好，他家也是我们经常住的地方。从1927年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她掩护了我们很多同志，秘密地为我们做民运工作。当时的妇女工作，搞得是很出色的。

1930年至1933年期间，县委和特委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特委常有人来，住在县委。高克林同志从1931年一直住到1933年，主要是在濮阳、内黄、滑县。这一带，从内战时期到抗日战争爆发，特委领导机关没有遭受大破坏，始终存在。在此期间，人的来往和文件的来往都很频繁，中央的文件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公开的刊物和书是直接从上海寄来的；河北省委的指示，也经常不经过特委而直接发到县委来。这些指示常常是用药水写在四书五经或者旧小说的封皮里，经过邮局寄来。收到后我们用碘酒一刷就看清了，然后再把这些指示印出来，发给有关党组织，用以推动工作。河北省委的机关刊物《火线》，我们一直都有。当时我们领导的一些大的斗争，如“温邢堌事件”、盐民斗争等，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有反映。那几年，我参加过两次特委召集的重要会议，一次是河北省委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另一次是1931年四中全会以后，河北省委派袁晓贤同志来传达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当时我们还不大了解党内的路线斗争的情况，印象深的就是批评三中全会决议是“调和主义”。除了这两次大的会议外，其他都是小的聚会、接头，全是秘密进行的。总之，那时与上级的关系比较密切。

# 在冀鲁豫边群众中坚持革命斗争*

陈少敏

1934年9月，我受中共河北省委的委派，以妇女代表的名义到冀鲁豫沙区工作。那时我的化名叫巷方。我虽然在小时候缠过脚，但参加革命以后就放了。地下工作迫使我日夜奔波，体态发胖，粗手大脚，所以外号又叫我“陈大脚”。这些倒成了我搞地下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虽然年龄不大，但我那黝黑的相貌却像有了些年岁。加上我是直南特委派来的人，所以人们也叫我“陈大姐”。其实党内的同志都知道我的真名叫陈少敏。

沙区以濮阳为中心，包括濮阳县南的两门、桑村，濮阳以西的井店、伦村、井店，内黄以南的马集、张固、太平，以及滑县以北的齐村、邵村等地，属直南特委领导。这里是两省交界的“插花地带”，敌人统治势力较薄弱，但土匪蜂起，“司令”遍地；加上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大众，渴望革命，如久经曝晒的柴草，触火即燃。这正是开展地下工作的有利条件。但是，地主阶级不甘心他们末日的来临，便组织了武装民团，以维护其统治势力，并和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残害人民，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我到沙区以后，去各村串联也好，开会接头也好，总是在自己的行李包里带着一些简单的药品和几本耶稣教传教使用的圣经，

---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上）第257—264页。

如《马可福音》、《唱诗》等，以冒充行路的医生和行路的教徒，来掩护自己的身份。在衣着上，以我特有的粗胖身躯，穿上又宽又大的农妇衣裳，头上扎一白毛巾，脚上穿着适合大脚的粗布鞋，裤腿用带子绑上，加上我那黝容相貌，实像一个农村中年妇女，就连自己的同志看后，也都说像个农村妇女。就是在语言上作了大难。我本来说惯了山东话，突然一改，咋也说不成。虽然尽量模仿当地人的语气，如“这得，那得，小妮得，小鸡得”等，但学得四不像，开头有些同志听不惯，总是发笑，所以在有生人的公开场合，我就尽量少说话。可是不久就和群众混熟了。当时除了经常和王从吾、王立仁、刘玉峰、张增敬等主要同志接触外，还有千口村的张栋、赵兰枝，马集的王爱花，化村的王宪荣、王山兰，南野庄郭法堂的爱人等，都像亲姐妹一样，谈笑也就无忌了。

内黄井店地区党的地下工作一直是很活跃的。原先内黄、滑县归河南省委领导，和我们是横的关系。到1935年春，河南省委组织遭到破坏，自上而下地实行什么所谓“红旗政策”，我及时通知了当时在内黄活动的张增敬同志。就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河北省委意见，将卫河以南、黄河以北的三角地带改称为“冀鲁豫边区特委”。为工作之便，又将上述的“插花地带”划做濮、内、滑中心县委，王立仁、张增敬先后任过县委书记。我以特委代表的身份参加县委的活动。

1934年秋，我到内黄不久，由王从吾、王立仁同志介绍和张增敬同志接头，在工作上发生横的关系，交谈了工作，他让我在太平村帮助做妇女工作。后来，由太平村珍妮家出面串联了十多位中年妇女（大部分是党、团员），我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她们讲述了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重要性，妇女的任务，反对国民党，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压迫，以及穷人都是地主剥削穷了，根本不是什么命穷的道理。同时她们也把太平村一带妇女受压迫的事

讲给我听。

后来我又把自己编的几首革命歌儿教她们唱。如：

纺花车，哼又哼，雪花落到当院中，
大人没衣穿，孩子光吵冷，
都叫地主剥削穷。

穷人难，穷人难，塌的窟窿大如天，
到麦天，要本钱，要利钱，
逼的穷人泪涟涟。

帝国主义，国民党，剥削群众如豺狼，
咱们穷人团结起，打倒这些狗豺狼！

这样对教育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我和张增敬同志根据群众没啥吃的特点，组织了“好人会”、“讨饭队”，像太平、野庄、江村、次范等村都有不少人参加，由一个党员领着，向小户借粮，或趁黑夜武装抢秋。记得有一次，张增敬化装成农民模样，借着农历年关，带领几十个会员到王告村向一个地主借了好多粮食，每人分了二三十斤，让穷人过了一个好年。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镇压人民和奴役人民，他们在冀鲁豫沙区建立了不少天主教堂，以传教之名，行破坏革命之实。我们也就来了个反对教会破坏革命活动的斗争。

千口村赵家祠堂门口悬挂的一口大铁钟，被本村天主教徒不声不响地弄走了，挂在教堂的门口，作为他们跪经作“弥撒”的警钟，每天敲着钟行礼颂诗。特别是“礼拜”，就敲得更响，广大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一天，清丰县一个叫杨玉子的铁匠来千口村打铁，一次谈话中说出“清丰某村女大姑仗势欺人”，这话被教会头头听到了，于是就把杨玉子叫到教堂里，打得遍体鳞伤，并罚请客两桌，取保发誓不再说“坏话”算了结。群众对此无不义愤填膺。我们借此机会，就让张栋同志出面，组织了“叩头会”，在会员中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利用教会压迫剥削穷人的罪行。雇工六麻子、刘玉峰也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叩头会”发展很快，光千口村就有党员40人，团员30人，群众200多人参加。

1935年农历正月十三，晴空万里，东风吹暖了大地，“叩头会”带领数百名群众，潮水般地涌进教堂的大院。屋里院里，人山人海，拉出了教会头头进行说理斗争，痛斥了教会欺压人民的罪行。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无言答对，只得向群众赔礼，并把霸占赵家祠堂的大铁钟送回原处。人民群众看到了团结一致取得的胜利，就在大街上鸣放鞭炮庆贺。

狡猾的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教堂当即向濮阳县当局告了我们的状，说是共产党组织农民暴动，说我是共产党的负责人。结果我遭到敌人的悬赏通缉。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安全很是担心。一位60多岁的赵老妈妈，专门跑到濮阳城里探听敌人的动静，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别管啦，花钱由我出，官司由我打。”

我遭通缉后，敌人的民团如临大敌，布下天罗地网，四处扬言捉拿“共产党女匪首，大脚老方”。开始，我一直隐藏在张栋家后院的一座草屋里，一连十几天没和外人接触，只有雇工六麻子给我送饭吃，有时也把敌人的风声告诉我。一次我在院子里活动片刻，不慎被西院地主赵绍福的老婆在她家楼上看见了，这个泼妇便在大街上到处造谣说：“张栋家窝藏着肉票。”并说：“在俺家西楼上看到张栋后院里有一个可疑的女人。”这件事被我们的同志听到了，都怕我被敌人发现，于是在张栋、六麻子的护送

下，渡过硝河，转移到马集村王爱花同志的家里。

那几年，我就像鱼儿一样，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游来游去，饱食千家粗茶淡饭，身穿百家褴褛布衣。我的衣食住行都是靠人民群众来解决。如马集村王爱花同志把自己纺花赚来的钱叫我花，化村王秀芝、王先荣瞒着公婆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馍偷偷给我吃，千口张栋同志说服她的小姑娘赵云凤给我做袜、做衣服，王爱花、王秀芝把自己的布衫送给我穿。每次在硝河两岸三孔桥秘密开会，她们总是想方设法送些用的东西给我，有时她们还装成挖野菜、串亲戚、走娘家的样子，为我安排好几天的生活；可是她们自己却饿着肚子。曾记得一天拂晓前，我由王秀芝的儿子、我的忠实小哨兵王庆丰带路由马集到化村去，当走到三孔桥西边一座土窑附近时，听村里出来的人说："化村有民团在抓人，群众都往村外跑，你们还往前走干啥？"精明伶俐的小卫士说："家里人病了，我是请大姑看病的。"（这是我们事先说好的，根据我每次不同的化装，规定叫大姑、姨、干妈或先生）那个人没说什么就走了。我果断地决定暂不进村，在土窑内躲起来，王庆丰就在土窑周围玩，装着拔草，监视敌人的行动。谁知一直等到太阳偏西，敌人才离了化村，小王跑回家一看，敌人真的走了，才回来叫我。临来时，给我捎来两个馍（沙区把干粮统称为馍，其实是高粱面做的窝窝头）让我吃。一天没吃饭了，肚里早就咕咕直响，真想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可是又一想他家根本没有吃过馍，是哪里来的窝窝头呢？定是他奶奶讨饭要来的，拿来叫我吃。想到这里，我只吃了一口，再也吃不下了。回到家里一问，果然如此。晚饭时，全家煮了一锅野菜汤，我喝了一大碗。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这沙区群众多好啊！男女老少为革命什么都豁得上，真是革命感情深似海呀。群众是水，我是鱼，只要不脱离人民群众这个汪洋大海，就能海阔任鱼跃。从此以后，我的胆子更大了。有时借取男人衣服，身穿一件大棉袄，腰扎一条黑蓝

大腰带，头戴一顶三块扣的大风帽，脚穿一双大沙鞋，和男同志一道出出进进，或开会，或组织抢秋，或到民团局夺枪。有时也头戴大礼帽，身穿长大衫，手持文明棍，活像一个教书先生四处活动，什么苦呀、累呀，一概没有感觉到过。现在回忆起来，倒是挺有味道的。

1935年冬天，省委要我们在大名、磁县、井店一带搞一个红军师，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特委也明确提出"保卫老沙区，反对内战，共同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签订的'何梅协定'"等口号。我和王从吾、王立仁、张增敬等人，积极发动党团员、积极分子参军参战，组织人力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经过长期革命教育的沙区儿女，觉悟是很高的，一听党号召扩军，纷纷报名参军。人是有了，枪呢？我们几个人商量，一方面筹划买一些，一方面从敌人手里夺，"夺取地主武装，建立工农武装"。

据了解，太平村民团局有长枪5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由王从吾、张增敬、王立仁等带领40多人，到太平村民团局夺枪。到民团局驻地以后，先由一个和民团很熟的人叫开了门，王立仁、张增敬等立即冲了进去，夺取了两支长枪。结果被敌人发觉了，就打起枪来。听到枪声，周围的地主也向这里打枪，王立仁在门外还击两枪，我们就退出了民团局。为了扩大影响，张增敬在大街高喊："大家不要动，不要打枪，张增敬带领红军过来了。如果打伤我们的人，以后就不客气了！"

这次夺枪，虽说只夺了两支，但同志们的情绪很高。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冀鲁豫沙区建立了一支拥有长枪30支，匣枪3支，撅把百十支，造枪所1处，300多人的红色武装。这支队伍经常活动在硝河两岸，向地主借粮和对民团局进行斗争，使我们党的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使地方上的统治阶级日夜不安，闻风丧胆。这支队伍，抗日战争初期正式编到受党领导的河北民军第一路第

四支队。

随着这支革命队伍的建立，冀鲁豫沙区的革命力量更加壮大与巩固。据1935年底统计，千口、化村、破车口、井店、邵村、堂上、马集、邢固、六村、大小柴村、东西姜村等硝河两岸30多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大堤口、董庄、楚旺中学等地发展了党员，此时已有正式党员800多人。

1936年，王从吾调特委工作，后在大名被捕，由张增敬接替王从吾同志的工作。同年6月的一天，张增敬由大名、南乐一带回到井店，约定于21日晚在邵村张怀三家接头研究工作，但因夜降暴雨，未聚集在一块。次日拂晓，因地主告密，丁树本部包围了村子，张增敬和其他十几个同志一起被捕，押于濮阳，我跳墙脱险转移。我记得当时跳下墙，恰巧掉在一个水缸里，弄的浑身是水，我就立即把上衣脱下来拧了拧，裤子上的水用手向下压了压，迅速地钻进了青纱帐。我离开邵村以后，不少同志对我下落不明十分担心。后来听说王兆荣实在放心不下，就扮成一个要饭的穷人，挎着篮子，手拿打狗棍，一直深入到各村四处打听，就是看到一个新坟也要询问一下是谁家的坟，得啥病死的。今天去这村，明天去那村，一直找了一月工夫。我转移到大名、清丰一带坚持工作时听说了，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时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那时冀鲁豫沙区的地下工作虽有很大困难，但刘玉峰等几个工农出身的干部一直在那里坚持，继续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

# 濮阳盐民斗争*

王从吾　高克林　张会之　吴宝合

1932年农历三月十九，濮阳县城里爆发了3000盐民"驱逐盐务缉私队"（简称盐巡）出境的斗争，迫使濮阳县长答复了"盐巡退出濮阳，准许盐民继续做盐"的条件。濮阳的盐民斗争，点燃了冀、鲁、豫接合部地区盐民斗争的熊熊烈火。滑县、清丰、南乐、朝城等13县盐民，揭竿响应，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均取得了"驱逐盐巡出境"的胜利，成立了两河（河南、河北）盐民总会，会员8万多人，号称10万盐民大军，震撼着冀鲁豫边大地。通过盐民斗争，发动教育了群众，发展了党的组织，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冀鲁豫边长期坚持革命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 一　灾难深重的濮阳盐民

濮阳县地临黄河，盐碱地多。"旱天白茫茫，涝天水汪汪，刮风黄沙起，寸草不生长。"碱区农民不得不依靠做小盐谋生。在旧社会，地主的残酷剥削（晒10斤盐交租5斤），官府的苛捐杂税（一个盐池交税银洋一元），逼得盐民走投无路。但盐民为了活命，仍然下苦力做盐。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盐民劳动强度很大，仅盐土一项，就有铲土、耩土、刮土、运土、淋土等一系列工序。砌一个盐池，需推100多车土；晒一池盐，要挑100多担水。为了争取暑天晒盐的旺季，越是炎天烈日，越要去"背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上）第196—207页。

灼”、“足蒸”。盐民一家老小，五更即起，深夜始眠，辛苦几日，晒一池盐，交租纳税之后，换得几升粮米，敷衍三日五日。在晒盐季节，生活得以糊口，若遇阴雨连绵，寒冬腊月，只能用锅熬盐，或改当小贩，高利借贷，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就这样的痛苦生活，盐民也不能安安生生地过下去。天津长芦盐业公司将海盐（大盐）运往内地，并派来了“长芦盐务缉私队”。他们为了使大盐畅销，就千方百计地取消小盐。他们把大盐叫“官盐”，把小盐叫“私盐”，严禁小盐上市。当时的县政府，为了维护盐业资本家的利益，竟然下令：禁止做小盐。到1930年，濮阳的盐务缉私马队，多达40余人。盐巡们天天大喊大叫：“小盐白不咸，一两顶三钱（大盐）。”“小盐犯国法，谁做把谁抓。”另一方面，盐巡骑着高头大马，穷凶极恶，对盐民进行武装镇压。他们砸熬盐锅，掀晒盐池，折断卖盐秤杆，抢走盐民存盐。他们将做盐的工具抢走，又令盐民去赎，有时一天抢走数次，赎回数次，逼得盐民押衣当被，拆房卖地，借高利债，生路断绝。“闯关东”、“卖苦力”、“下山西”去逃荒，卖儿鬻女，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盐民们一提起盐巡的罪恶，无不切齿痛恨。城内盐民李银山，做盐工具被抢，盐池被毁，庄地卖净，带一家老小逃荒到河东，死了五口，儿子李贵迷失无踪，至今杳无音信；千口赵滚伲，在店当被盐巡扣押半个月，因不堪盐巡折磨，回家得病而死。更可恨的是，盐巡勾结地主、官府衙吏，私设刑狱，敲诈勒索，残害盐民。他们把无辜的盐民抓到官府“后大殿”，到那里一不见官，二不过堂，毒打之后，将盐民吊到梁上，或用一面铁枷锁住脖子，放在刑具之内，以此逼迫盐民家属哀告地主，取保赎回。赎不起的，就被毒打折磨至死。仅濮阳西街，受害的就有20多家。李彭宝被盐巡抓到后殿，二百大板打得他遍体鳞伤，卖了亲生闺女，才被赎了出来。一个盐兵闯进李新启家抓人，新启爹娘

拦住求饶，没把新启抓走，但盐兵回去之后，诬告新启一家打了他，身上50块钱被打掉了。一群盐巡又来要钱、抓人。新启一家哪里见到50块钱？又哪里有钱给他们？新启被抓到后殿关了三个月，爹娘把庄地卖尽，才把新启赎出。新启回家一听就气疯了，没过一年，便含恨死去。任老来被抓惨死在盐巡的皮鞭之下。周四被抓，饿死在后大殿中……。盐巡为害之大，旁及其他百姓。刘锁聚是个有百亩地的地主，并不做盐，盐巡看他可欺，就乘他上井打水之际将他抓走，他爹娘不肯花钱，同样死在殿中。

自然灾害，地主剥削，官府压榨，盐巡迫害，断绝了盐民的生路。

## 二　党发动盐民起来斗争

盐民在盼望党，党也依靠盐民。1926年，濮阳就有了党员。1927年，在千口建立了濮阳县委。1931年，濮阳党的组织已发展到濮阳广大农村，盐民中也发展了一些党员。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濮阳出现了抗日救国高潮，成立了“反帝大同盟”。为了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县委及时抓住了正在兴起的盐民斗争。经过调查分析，认为：抗日救国，必须与群众为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长芦盐业公司，是半官半商的性质，盐务缉私马队并不直接隶属于县政府，因此，他们之间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我们应利用矛盾，集中力量打击盐巡，把盐巡驱逐出濮阳，彻底解决盐民做盐谋生的问题。盐巡禁止做盐，也伤害了盐业地主的利益，我们应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开展对盐巡的斗争。议定之后，就派得力的党、团干部，深入盐民，进一步广泛发动。硝河坡、千口、化村一带由刘玉峰、张怀森同志负责；城内西水坡和县城附近，由张会之、吴宝合同志负责；沙窝、故县一带由王墙志同志

负责。定期交流发动盐民的情况，总结发动盐民的经验，解决疑难问题。

盐民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合法观念”非常浓厚。地下党组织一提出驱逐盐巡出境问题，除少数青年和苦大仇深的盐民积极拥护外，多数盐民存有顾虑：信天主教的盐民认为“天主惩罚，只能逆来顺受”；县衙小吏家属认为，“民不与官斗”；多数盐民认为，“布告是官府出的，盐巡是上边派来的，驱逐盐巡，就是越法犯罪。”党组织针对盐民的思想顾虑，集中盐巡累累罪恶，对盐民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指出：农民种地，盐民做盐，都是合法的。农民有好地，就指望种庄稼过活；盐民无好地，就依靠做盐谋生。对衙吏家属，我们借“民生主义”进行宣传：盐民做盐正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盐巡根本不应干涉。盐民不做盐就活不下去，要想活下去，就得团结起来，反对盐巡的无理干涉。对天主教徒，我们依靠其中的积极分子，以对魔鬼（盐巡）作斗争进行发动；对多数盐民，以街道和村庄为单位，用滚雪球的办法，扎根串连，逐层发动，形成核心。这样，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产生了街道和村庄的自然领袖。斗争的实践，更使盐民受到鼓舞，使他们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

盐民和盐巡的第一次交锋，是从盐民党员郭春喜开始的。郭春喜从入党那天起，就牢记党的教导：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他经常向盐民宣传：“不做盐咱吃啥？做盐不算犯法；盐巡逼财害命，咱能活下去吗？”有一天，4个盐巡到西新街，用抓钩去毁坏张跑狗家的淋盐池。张家很穷，就指望晒盐换几斤粮食糊口，淋池一毁，等于砸了他的锅，一时怒火满腔，抓住勾担就喊着跟盐巡拼命。郭春喜看见盐巡要抓张跑狗，就高声呐喊：“哎，来人哪，跟他们打！”他这一喊，一下子来了几十个盐民，有的掂着铁掀，有的扛着盐耙，吓得盐巡仓皇逃走，并且没敢再来。这一下传开了，“西新街把洋马队打跑了！”从此，盐民再不那

么怕盐巡了。

第二次交锋，是盐民对公安局督察长王增耀的斗争。王增耀是濮阳县城西街人，他看到盐民的斗争情绪高涨，十分吃惊，觉得硬法子不行了，就想了个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把盐民斗争压下去。他穿一身警官服装，腰里挂着手枪，大摇大摆，不断在西街游荡。有一次，他走到夹道街，看见郭德胜、杨进才、李银岭三人正在说话，就猜想他们是谈论盐民斗争的事，便愣头愣脑地走到跟前，冲着郭德胜说：

“你们还是安生点做盐吧，要不出了事，政府可顾不了你们。”

郭德胜一听王增耀来意不善，就马上答话：“只要盐巡不干涉做盐，俺就不咋着他！”

王增耀威胁说：“明说了吧，咱街上谁家的锅底门朝哪个方向我都知道。我说您是好意，是向着您哩，您出了事，后悔就晚了。”

郭德胜听罢，头上直冒火星，放大了嗓门说：“王督察长，您请回吧，咱们都是老街坊了。你要在这里丢了人，可别说不好看。”

王增耀狰狞地一笑，说：“您不听我的，那好，那好！”便滚开了。这时已有十几个盐民走出来，看着王督察长灰溜溜的样子，引起了一阵哄笑。

同时，濮阳境内千口、化村（今内黄境内）一带的盐民也组织发动起来，并发生了打盐巡的斗争。

## 三　驱逐盐巡出境

1932年春，以硝河坡、西水坡、沙窝3个盐民集中的地方为核心，南到渠村，西到井店、化村，连同内黄县盐地18庄，长达

140华里的地带，盐民已相继发动组织起来，大规模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县委决定，为开展驱逐盐巡出境的斗争，成立指挥部，负责部署和指挥盐民斗争。指挥部以县委为主，吸收3个地方的负责人和党外人士张春普、郭凤祥等人参加。由张友文、王培志起草《告盐民书》；魏培约、张海波、李宝贵、陈林组织"敢死队"，定于农历三月十九（第373页记为四月初八——编者）起手，开展驱逐盐巡出境的斗争；并通知乡下盐民以村为单位，在十九日前，组织一部分盐民，以做买卖、走亲戚为名进入城里，隐蔽住下；其余盐民务于十九日早饭时赶到城里，通知城内学校党组织，动员学生参加支援盐民的斗争，名为"参观"，实为助威。指挥部成员具体分工，分头行动。十八日夜晚，张友文、吴宝合等同志一夜没睡，写了许多标语，糊了很多小旗，还做了一面大旗，上书"敢死队"3个大字。十九日早晨，天麻麻亮，刘晏春同志就起床，按事前分工到县政府和公安局去了一趟，发现他们对我们布置的这次斗争没有丝毫觉察，便报告指挥部，按计划行动。

三月十九早饭后，3000盐民云集县城西水坡，"敢死队"大旗迎风招展，盐民们拿着铁锨盐耙，有的拿着小旗，有的诵读着《告盐民书》，无不心情激荡，义愤填膺。出发之前，给大家讲了这次斗争的计划和任务，主要是包围盐巡，捉拿盐巡队长，让他们答复我们的条件，达到把盐巡驱逐出濮阳的目的。就在这时，群众跑来报告：盐巡闻讯逃跑。我们商议后，决定赶快行动。魏培约同志举起"敢死队"大旗冲在前头，3000盐民跑步紧跟，指挥部同志也跟随队伍前进，临阵指挥。队伍浩浩荡荡奔赴北街，将盐巡驻地——王家大院围住。盐巡果真跑了，大门锁了。盐民们激愤地说："兔子胆，跑光了。""把老窝给他砸了！""把房子给他烧了！"……指挥部同志听到大家的议论，就地进行了商议：盐巡跑了，我们抓不到人，不能呆在这里，不能烧房子，但要冲进去把东西给他砸了；砸后集合，举行游行示

威。这时，部分盐民看到盐巡已跑，扑了个空，也有些松劲，杨进才急得满头是汗，跑来跑去。我们把他叫到跟前，把指挥部研究的意见告诉了他，并要他给大家讲讲。杨进才听后，浑身是劲，脱去上衣，纵身一跃登上墙头，高声喊道："乡亲们，盐巡跑了，我们能罢休吗？我们要冲进院去，把老窝给他砸了！有种的跟我干，向北磕个头，非把盐巡赶跑不行！谁不干是妮子生的！"盐民一听，哗地跪倒。杨进才一声呐喊："冲啊！"他跳下墙头，拿起长把铲杆，冲在前头。盐民们蜂拥上前，把王家大院的门窗家具砸得粉碎，将盐巡用的锅、碗、瓢、勺摔打一空。王家大院十分宽阔，有一跨院，是盐巡队长住的地方，盐民协力一擩，将跨院的垣墙推倒，砸门破窗，将屋内家具等物又砸了一通，并从床下拖出来两个没跑脱的盐巡。盐民们一阵拳打脚踢，平日飞扬跋扈的两条癞皮狗，顿时鼻青脸肿，磕头求饶。杨进才问："你们队长跑哪去了？"两个盐巡忙答："到县政府报告去了。"杨进才叫人把两个盐巡押下去。

濮阳县长孙培基听到盐民斗争的消息，吓了一跳，见到盐巡慌忙跑来告急，如坐针毡，怕事闹大了，上边怪罪下来，丢官事小，性命难保。他一边急令：电话通知各区保安队，火速进城；一边亲自打电话，通知公安局长赵玉舍：迅速带警察赶赴现场，劝盐民回去，如果不听，可以镇压，但要见机行事，防止事态闹大。

赵玉舍慌得手足无措，带领警察赶赴北街。他听到盐民喊着："到八都坊集合"，就嗥嗥大叫："你们赶快回去，不要再闹了，谁闹就把谁抓起来！"正在这时，黄吉成、孙庆林等人架着两个盐巡从王家大院出来了，后面簇拥着许多人，有的喊："把他活埋了！"赵玉舍一看，急令警察：把盐巡护卫起来！盐民们一下子把赵玉舍和警察围了个水泄不通，叫赵玉舍答复条件。大家高呼口号："赶盐巡出境！""为饭碗而战！""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赵玉舍诡计多端，为救两个盐巡，一边和盐民说好话，答应“盐巡退出濮阳，准许盐民做盐”的要求，一边把被打得昏头昏脑的盐巡夺走护卫起来。盐民们余怒未息，就隔着警察，伸手照盐巡的头上打。混乱中，盐民有意无意地把赵玉舍也打了一顿。赵玉舍不敢停留，仓皇带警察溜走，向县长报告去了。

盐民重整队伍，按原来计划，游行示威。队伍威武雄壮，从北街八都坊出发，向濮阳中心阁挺进，铁锨盐耙，明光耀眼，顺街看去，像一条银色的长龙。盐民高呼口号，迸发出胸中怒火。前来参加支援盐民斗争的教师、学生，也拿着小旗，跟随着队伍游行。盐民的壮举，轰动了全城，男女老幼，倾城出来观看，街道两旁挤得严严实实。识字的观众也传诵着《告盐民书》，无不指斥盐巡的罪恶，全城呈现一派热烈的气氛。游行队伍到达火神庙街后，指挥部同志给大家说明，我们这次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虽没有抓到盐巡队长，驱逐盐巡出境的目的尚未达到，但我们砸了盐巡的老窝，灭了盐务缉私队的威风，取得了初步胜利。要巩固这次斗争的胜利，还必须建立盐民协会，继续开展斗争，坚决把盐巡赶出濮阳。正在这时，群众又跑来报告：“县长孙培基，保安队长张冠三，带300多名保安队员，持枪到了西新街，可能要抓人。”队伍有点骚动，有人高喊：“跟他们拼了！”我们作了紧急商议：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抓人，要和他们辩理，让他们答复我们的条件。为了防止保安队开枪，我们要把保安队包围起来，离他们越近越好，他们若敢动手，我们就立即还手。3000盐民，奋勇当先，成包围之势，迎着县长和保安队而来，迅即将他们围得严严实实。孙培基看着这四周人山人海、铁锨林立的阵势，大为惊恐；几百名保安队员，手端着枪，看着县长和队长惶恐变色的嘴脸，不敢轻举妄动；很多观看的群众都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孙培基说：“你们这是胡闹，破坏社会治安！”群众没等孙

培基说完，就纷纷上前辩理，说："我们赶盐巡出境，只是为了饭碗，对官府没有一点侵犯，咋说胡闹，危害社会治安？"孙培基说："你们砸盐巡住宅，殴打盐巡，这还了得！"盐民一听，怒不可遏，纷纷斥责孙培基说："盐巡掀毁盐池，抢走存盐，抓人罚款，打死盐民，他们算不算危害社会治安？""你身为县长，本应帮助我们解决民生问题，盐巡毁财害命，你为什么不管？""我们盐民，靠天吃饭，量力求财，交租纳税，不偷不抢，哪一点危害了社会治安？"孙培基被大家诘问得理屈词穷，保安队员有好多本来就同情盐民，有的家里也做盐，听到大家的铮铮铁言，也被吸引住了，纷纷放下了枪杆。四周盐民高呼："驱逐盐巡出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孙培基看势不对，连忙拱起双手，对群众说："大家都是好老百姓，我是和大家接头谈话的，我答应你们的要求，盐巡退出濮阳，准许大家继续做盐。"说了之后，就给张冠三使了个眼色，带领300多名保安队员，脱身走了。慑于盐民的威力，盐巡不得不退出了濮阳，不但不再干涉盐民做盐，而且盐民唱大戏庆贺胜利时，也没敢来干涉。

## 四 星火燎原

濮阳的盐民斗争胜利了，盐务缉私队偷着溜回了天津。盐民们笑逐颜开，砌盐池、铲盐土、装淋子、晒小盐，进行着繁忙的劳动。县委研究决定，建立县盐民协会，巩固和发展盐民斗争的胜利成果；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组织；唱大戏庆贺胜利，借以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继续开展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协商，5月宣告濮阳县盐民协会正式成立，选举了杨进才、刘玉峰、李银岭为正副会长。为庆祝盐民斗争的胜利和县盐民协会的成立，在20天的时间里，分别在城里、沙窝、干口3个地方唱了大戏，周围数县派了盐民代表前来祝贺。我们借唱戏的机

会，在开戏之前进行宣传。除写标语、散传单、印发《告盐民书》等宣传品外，还分别在城里、沙窝、干口讲了话。讲盐巡的累累罪恶和盐民斗争的胜利，号召盐民积极参加盐民协会，继续开展斗争；讲日本侵略中国，屠杀百姓，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讲组织起来，像南方一样，成立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号召群众起来闹翻身，求解放。阶级仇，民族恨，点燃了群众胸中的烈火；闹翻身，求解放，使群众看到了前途的光明。

濮阳的盐民斗争，点燃了冀鲁豫边盐民斗争的熊熊烈火。滑县盐民在聂真、冷楚、侯紫宸同志领导下，砸了滑县“硝磺局”，并活捉了局长及其全部属员。滑县同濮阳一样，唱大戏庆贺胜利。濮阳盐民协会派了王从吾、杨进才、吴宝合、周福海4人代表团，前往祝贺，并赠送锦旗一面，上书：“滑濮盐民，携手奋斗！”清丰县也发生了包围盐巡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农历五、六月间，内黄、南乐、浚县、大名、长垣、东明、朝城、濮县、观城、范县都发生了盐民斗争。尽管个别县的盐民斗争遭到盐巡和保安队的开枪镇压，但反动派并不能阻挡盐民斗争的滚滚洪流，13县的盐民都成立了县盐民协会，会员8万多人，号称10万盐民大军。1932年7月，有10个县的盐民协会选了盐民代表，在清丰古城集召开了会议，成立了两河（河南、河北）盐民总会，总会决定：每年开会一次，研究盐民的生产、销售和斗争事宜。总会成立之后，设在濮阳城里。后来，浚县、朝城、濮县、观城、范县也参加了盐民总会。从此，冀鲁豫边13县盐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联合斗争的道路。

1933年春，天津长芦盐业公司对冀鲁豫边盐民斗争进行了反扑，派来一个营的骑兵武装对盐民进行镇压。行至大名七里店，枪杀我盐民4人，先头马队一个连已开到南乐，扬言要把盐民斗争镇压下去。大名盐民协会派杨其祥同志星夜来总会报告，总会立即组织13县盐民攻打南乐，给盐务马队以迎头痛击，迫使南乐

县长答复了总会的三个条件：（一）盐务马队全部撤走；（二）不许干涉盐民做盐；（三）赔偿损失。盐民凯旋而归，沿途各村群众无不远迎远送，燃放鞭炮，热烈庆贺。这便是有名的濮阳盐民斗争。

# 党领导的“王效白打烟款”始末●

**戴晓东**

1932年4、5月间，宿县各地群众自发地反抗“查烟苗”的斗争不断地爆发。在徐州驻防的国民党军第七师师长王均，以筹集军饷为名，派出很多人员到农村，调查登记烟苗，准备按登记亩数征税。开始说种1亩征税1元，后来，他们察觉登记不实，又增加税额，每1亩征税10元。这一来把群众激怒了，用镰刀、锄头打伤查烟苗人员（当时，人们叫他们登记专员）的事情时有发生。群众自发地起来斗争了，我们党当然要参加并领导这一斗争。上级党指示，不放松一切可能发动暴动的机会。我们研究决定选择一个条件适当的地区，参加进去，进行组织、宣传活动，扩大这场斗争，使之形成一次地方暴动。我们选择了古绕集，这里的群众斗争情绪高，有我们党的支部和赤色群众，距离县委所在地又最近，便于联系和指导。为了加强领导，县委书记任训常和徐州特委书记孙叔平都到了古绕集。他们去后，时间不长暴动就发动起来了。召开了近千人的大会，讲话、贴标语、发传单，主要内容是反对剥削压迫，反对苛捐杂税。这时，那些登记烟苗的“专员”都逃窜了，豪绅、地主也隐藏了，群众情绪很高。可惜的是，我们缺乏武装斗争经验，队伍是由一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组成，对敌人将会如何镇压未作应有的考虑和准备。因此，对敌人随之而来的突然夜袭，我们无法应付，队伍溃散了。任训常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孙叔平同志幸免于难，暴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下）第330—334页。

动失败了。

这时，宿县县委只剩我一人进行恢复整顿工作。

两个月后，鸦片烟收割了，敌人又来逼着收烟税，群众的反抗又被激起来。参加的人数较前更多，城东北顺河集和蒿沟、桃沟、柳沟最突出。王效白在这一带素有声望，是反鸦片捐税的倡导者，由于他的号召力和这一斗争正适应群众的迫切要求，群众纷纷响应，几日内聚集数千人。我迅即向特委作了反映，孙叔平马上赶来，我们同去顺河集附近，会见王效白。这时王效白还未入党，我们之间不认识，经该地党员介绍，我和叔平开门见山说明身份和来意，一见倾心。

这时已集中三四千人，群众推王效白为总指挥，马凤山为副总指挥（他当过旧军官，有军事经验）。一切行动，我们几人一起商量。首先宣布：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抗烟税（群众叫“打烟款”，这是群众的唯一要求）；人员按地区编队，自己推选队长；不准骚扰群众，吃饭吃大地主家的粮食，住宿住大地主家的房子（因不少小地主和富农也种鸦片，故亦参加了斗争）；一切行动服从总指挥部的命令。这几条深得群众拥护，队伍不断扩大，最后达到万人左右，活动区域在顺河集到时村一带。

在革命风暴面前，敌人非常恐慌。宿县县政府深怕我们攻城，把全部县大队布置在县城周围，构筑工事，加以防范，不敢侵犯我们。这一带大地主，也都逃到县城去了。群众对这些平日压榨他们的地主，仇恨很大，住在他们家时，不仅吃饭，连家中的财物也分没了。时村大地主马老六的酒店被砸，酒流到了大街上。

这时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党员太少。在这个万人左右的队伍中，只有一二十个党员，有不少大队一个党员也没有，怎能起到核心作用呢？这时王效白同志已是共产党员了，我们通过他来指挥队伍。可是武器大多是中、小地主和富农带来的，一般农民手中没有枪支，实际力量还是在那些小地主、富农和一

些头面人物手中。他们主要是为了“打烟款”，而我们则是要继续扩大斗争，逐步走上土地革命的道路。我们研究，只有设法把枪支逐步转移到农民手中，把实力掌握在我们手里(叫枪换肩)，才好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把斗争引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去。当我们还没来得及行动时，反动政权派出一些与我们队伍中某些领导人有亲朋关系的士绅来进行劝说，说什么政府可以免除征收烟税，不要再闹了，只要大家各自回家务农，一概既往不咎，某些领导人还可以在县府安排职位。这使不少人动摇了。因为他们的要求，主要是抗烟税，烟税免了，目的达到了，又不咎既往，于是军心开始涣散。

正在这时，江苏省委来了指示，批评我们的作法是富农路线，要马上鲜明地提出土地革命口号。我们很为难，认为按当时条件，党的组织力量太薄弱，怎么也行不通。但党的纪律，又不能不执行。经过讨论，决定召开全体队员大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口号，指定一个姓赵的党员在大会上讲话，同时到处贴了标语。

大会是在时村召开的。会后一夜间，那些地主、士绅、富农把他们所能掌握的人员、武器全拉走了，队伍只剩下2000多人。这时，我们一些主要领导人也大大泄气。反动政府趁机进行破坏活动。我们指出，这是国民党的圈套，不能上当，否则，将来会吃大亏。我们的话，阻止不住反动派对一些人的诱惑，个别人口头应付我们，暗中就和反动政府订了协议。这样，所剩余的队伍也就涣散了。反动政府还以较高的职位诱引效白同志，被效白同志拒绝。

之后，我被调到萧县东南乡和铜山、宿县毗连的地区（梅山）去组织地方暴动。不久，反动政府背弃协议，派人暗杀“打烟款”的领导人。有几人被害之后，一些人又去要求效白同志领导再干。效白同志本来就不愿放弃这一斗争，于是把旧部队又号

召起来，重整旗鼓，接着干。这次的口号不是“打烟款”，而是“土地革命”了。这次参加的人数少，约近千人，是我们的基本队伍。他们在宿县东北乡活动了一段时间，得知我们正在北面不远的地区活动，他们就带着队伍到萧县的石相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时，我们组织的暴动，也恰好到了即将行动的时期，于是决定一起干。暴动地点定在萧县东南最边缘的梅山村。这村大地主张文轩，曾当过区长，为一方之霸，群众极为痛恨。我们在一天的拂晓打进村去，捉住张文轩，召集群众大会，宣布罪状，将其枪决。同时进行了宣传，将张文轩家财产分给群众。通过这场反霸斗争，队伍扩大了。

在梅山驻扎了两天，根据古绕暴动的经验，预料敌人一定会进攻我们，于是决定向南转移。夜间出发时，仍然由于没有经验，不懂得布置侦察，及时了解敌人的动向，所以不知道敌人早已打上来。国民党师长王均的一部分部队为主，带领铜山、萧县、灵璧 3 县的警备队，在我们行军中途休息时，向我们扑来。我们队伍的成份和上次古绕暴动时一样，主要是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毫无战斗经验，听到枪声四起，即分头突围。大部分突出去了，还有二三百人和敌人进行着战斗，从夜间 5 时左右打到天明后 9 时许，子弹光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少部冲出，200余人被俘。其中100余人被灵璧县府带去，余下50余名是宿县人，我和效白同志就在这部分人里。

我当时化装成农民，未被发觉。效白同志是公开的领导人，他自己知道是隐蔽不了的，便挺身而出，说明自己的名字和领导身份，并说明我们是干革命的，反对压迫剥削，为人民谋利益。因此敌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了他身上，就把他和他的警卫员——效白同志的侄子，还有个姓窦的队长，带到徐州王均那里去了。到徐州不几日，他们 3 人壮烈牺牲了。

我们50余人被押解到时村后，又被大地主指名控告，当即在

那里被杀害达20多人。最后还有20余人被带到宿县，关进监狱，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化名徐文德，说是宿县人，故被带到宿县）。后来我们都被判了刑，到1936年才假释出狱。

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

# 实现我们的伟大使命*

曾宪辉

## 一、前　　言

1947年1月24日（农历正月初三），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指挥领导六纵队、七纵队到陇海铁路以南的鹿邑、亳州地区作战期间，邓小平、杨勇、张霖之3位首长同我们讲了花园口快要封口了，黄河的水要归故道，我们要赶快造好渡船。部队在陇海铁路以南作战胜利，回到了濮县。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宣布七纵合并到一纵队。张霖之回到冀鲁豫任书记，我回到了冀鲁豫军区。当时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叫我到黄河指挥部去工作。王化云同志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负责指挥领导进行水利建设，筑堤坝，严防水灾。我负责指挥领导造船、组织船工，以便军民渡河作战。任务繁重而紧急。如果黄河水来了，没有船怎能过河。这是张霖之、张玺、赵健民、刘志远4位领导同志交给我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 二、到职工作

我4月初奉命先到了寿张县常楼。在我到达之前早有郭英同志先来进行筹备工作。我到了之后，同郭英同志商量决定，建立

* 本文原载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公室冀鲁豫小组编《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八集第1—12页。

黄河指挥部的组织机构，计划造120只大船需要船工800人，还要组织为造船服务的后勤工作，生产和采购锚、杆、绳、缆等。还得建立一个武装营的兵力（500人）担任保卫工作。并且要去沿河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开设渡口，任务决定之后，就要抓紧时间实现。郭英同志立即筹办机关开展工作。我负责到沿河各地调查了解情况，开设渡口，交涉扩大新兵，了解行署布置造船情况。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建，到5月底就已初具规模，为完成任务打下了基础。

## 三、船只船工渡口的建设

不久冀鲁豫行署副主任、战勤指挥部司令员段君毅同志、副司令员乔明甫同志、黄河水利建设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同志布置造船任务，要求到5月底造好大船120只，还要造1只渡坦克和汽车的大船。我们把700多人组织起来，分成7个大队，分给每个大队造15只大船、10只小船的任务。计划建设的渡口有东阿、鱼山、十里井、万桥、孙口、范县、濮县、昆吾8个渡口，有400多华里长的战线。因战争需要，可以变动渡口，增设新渡口。孙口是中心渡口．有35只大、小船，其中就有1只渡坦克和汽车的大船。

## 四、想方设法解决困难战胜敌人

我们把船只造好了拉到黄河，但是敌人飞机白天夜晚都不断来侦察、丢炸弹、用机枪扫射，企图破坏我们的船只。我们为了保护船只，就在各渡口挖船坞隐蔽船只，使敌人飞机找不到目标，采取这种措施，收效良好。

船上要用钢丝缆，买不到就用麻绳代替；长竹杆买不到，就用柳树杆代替；钢锚买不到，就用土炉打铁锚。在船上靠布篷以风力作动力拉船。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机器作动力拉船，只有

采取这种比较原始的办法来完成我们的战斗任务。

## 五、进行生死战斗的一天

我们的船造好下水到黄河，集中地点在寿张县孙口渡口，存放有50多只大船。在6月上旬的一天，敌人五十五师四十七旅一个团的兵力，用猛烈的炮火向孙口渡口攻击，用两只橡皮船一个排兵力，向北面强渡。我们当时只有10多个新战士、1挺轻机枪。我一面向段君毅同志报告情况，一面指挥新战士坚决地向敌人打，我也拿起轻机枪向敌人射击，把敌人两只橡皮船一排兵力打在黄河里喂鱼去了。正在生死战斗的关键时刻，段君毅同志派来行署警卫排，有30多人，3挺轻机枪，猛烈地向敌人开火，把第二次向北强渡的两只小木船一个排的敌人，又打沉在河中淹死了。敌人要强渡河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船烧光。敌人懂得把我们的船烧光了，解放军过不了河，就实现了他们的防守任务。什么黄河防线等于40万大军，这是敌人的梦想。从上午9时开始，战斗到下午1点多钟结束，敌人失败了，我们胜利了。战斗结束，我向张霖之、张玺、赵健民、刘志远4位领导同志汇报了战斗情况，首长们说：打得好，打得漂亮。乔明甫同志就此写了一条消息在《冀鲁豫日报》登载。

我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坚决地进行生死战斗，一面战斗，一面请求救援，决不能让敌人过河来烧我们的船只。当时敌人是企图过河来烧我们的船，不是大兵力向北进攻。所以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同敌人战斗就是胜利，就尽到了指挥领导的责任。如果不坚决抵抗，让敌人过河来把50多只大船烧光了，就没有负到责任，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刘邓大军6月30日渡河南进作战的战略任务。

## 六、实现我们光荣战斗任务的一夜

1947年6月30日是刘邓大军在300华里战线上横渡黄河，实行伟大战略反攻的一天。从6月20日起，就有野战军司令部和各纵队司令部的同志来黄河指挥部了解渡船、渡口情况及敌人在河南岸的布防情况。我们在25日以前就在船工队伍中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明确责任，实行两班轮换，坚决地完成保证解放军渡河的任务。宣布严格执行组织纪律，对执行任务好的鼓励表扬；对不坚决执行任务的要按纪律处理。全体船工都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自觉性，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下午6时就到了各自的船上，热情欢迎解放军同志上船。当夜渡河的部队是：一纵队杨、苏、潘首长指挥全纵队在魏山、十里井、万桥渡口渡河；二纵队在孙口、范县渡口渡河；六纵队在濮县、昆吾各渡口渡河。当天是农历五月十二，有半阙明月照耀着天空，军队上下船方便，敌人飞机没有来，人定胜天天顺人，紧张的一夜，也是顺利的一夜。人民欢天喜地庆祝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实行战略反攻的伟大胜利。完成了刘邓大军渡河任务以后，刘邓首长奖给黄河指挥部的船工们冀鲁豫区人民币200万元。船工衷心感谢刘邓首长的关怀。

## 七、难忘的7月7日夜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3位首长7月7日晚9时来到孙口渡口过河南进，我同船欢送刘司令员、邓政委、李参谋长过河时，人都站着，没有座位。这是农历五月十九，月亮还是冉冉在东方升起很高，天空明亮，敌人的飞机也没来丢照明弹和炸弹。在船上刘司令员问我：你在这里有多少时间了？我说两个多月。我把黄河指挥部指挥的船只、船工、军队渡河情况及6月上旬敌人过河来烧我们的船，我们坚

决把敌船打沉了，把敌人淹死了，保卫了渡船没有遭受损失的情况向刘司令员汇报了。刘司令员听了以后说：你们组织的渡船船工担负这次军队渡河南进作战任务，完成得很好。你们在6月间保卫渡船的战斗取得胜利，打得好，打得漂亮，你们立了一功。我当时感觉要向刘邓首长道歉的是没有准备座位，首长站在船上，我心里很不好过。另外我感到高兴的是，今夜没有敌机扰乱，安全渡过了黄河。有的船工同志说：刘邓首长有洪福。欢送刘邓首长过河以后，继续组织渡船运送野战军直属部队过河直到天亮。

## 八、紧张战斗的50天

6月30日，战略反攻的序幕揭开了，经过了艰苦的紧张的50天战斗，完成了刘邓大军渡河南进作战的伟大战略任务。在这50个日日夜夜里，敌人飞机是很猖狂的，不时地飞到我们各渡口丢炸弹轰炸，用机枪扫射，在天空中用伞挂上大型照明弹，捣乱我们来往渡河。但是，我们各渡口的干部和船工同志坚决顽强地同敌人战斗，完成运送部队渡河的任务。军队过河以后，又有几万民夫担架过河，把伤员同志抬回河北来，还有广大群众来往过河。在这50天的时间里，往来渡河的军队、政府人员和广大群众共有320多万人次。8月12日，刘邓大军开始向大别山进军，我们到8月20日就基本上完成了刘邓大军的渡河任务。但是，不久又担负着陈粟大军的渡河任务。

## 九、我们担负陈粟大军的渡河任务

从1947年9月开始，到1948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十二）济南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为止，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担负着部队繁重的艰苦的渡河任务。华东野战军各纵队都经各渡口往南渡河和

往北渡河。1947年9月间，十纵队向南渡河；1948年2月24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同志统率一、二、四、六纵队北上；同年5月31日又南渡作战；2月11日两广纵队向北渡河；9月20日至24日吴化文部队在济南起义后，在齐河渡河向西来；民夫担架队到河南抬伤员回河北来几万人。还有部队、地方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来往过河，人数计有900万人次以上。来往渡河的大车、汽车、炮车、坦克计有2.5万辆以上。敌人飞机丢炸弹、用机枪扫射，我们遭受损失的船只有40只以上，随时损坏随时修理好。我们船工和干部伤亡人数计有100人左右。在孙口、李桥、魏山3个渡口伤亡比较严重。5月9日在魏山渡口敌人飞机丢炸弹，船工伤亡9人。25日在李桥渡口敌人从河南岸打35发炮弹，打沉3只大船，伤亡8人，孙口渡口伤亡7人。2月24日夜，我在李桥渡口向一纵队首长汇报了渡口建设及敌人破坏情况。那夜是正月十五，明月当空，万里无云，我们在河边上交谈，他们对我说：你们支援军队来往渡河的工作做得很好，很漂亮。这个渡口建设得很好，你们船工同志们船撑得很好，很有秩序。

## 十、千里行船为实现我们的伟大使命

华东野战军于1948年6月20日至26日在睢县、杞县、开封打了大胜仗，消灭了区寿年兵团。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首长命令我们白天夜晚不停留地赶快拉50只大船到开封接运伤员和缴获的武器胜利品。我接到命令，立即组织船只、船工，要1只渡汽车、坦克的船也拉走。我指挥船只启程，向上水行船靠人力拉，靠一竹篙一竹篙、一步一步地向前用力撑。这时敌机不断在空中捣乱，河南面还有敌人。走到中途，我们要求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派一个连掩护我们前进。全体船工人员有坚决顽强的战斗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一意完成我们的战斗任务。在船上吃不上水，不像现在有水壶

装开水。我们把船拉到了开封，完成了任务，就回到原来的各渡口。

## 十一、保障攻打济南的部队渡河

1948年9月16日以前，华东野战军参谋部派来的领导同志向我们传达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决定9月16日攻打济南，要我们担负运送攻打济南的部队渡河的任务，先把黄河北面的军队运往河南，再把黄河南面的伤员和缴获的武器等战利品运往河北。为完成这一任务，我在9月11日到了华东野战军参谋部，具体明确渡河任务，安排渡口。经过商量决定，把船拉到长清县、齐河县去开设渡口，到了9月16日，攻打济南的战斗打响以后，往南、北的渡河任务就紧张了。9月20日，吴化文部队起义了，就把吴化文部队2万多人从齐河县城渡口渡过黄河。同年12月5日，冀鲁豫行署、军区在赵海开会，布置冀鲁豫地区运送1亿斤小米供给淮海战役军队，采用大车、汽车、船只把小米运到济南泺口上火车。我负责组织船只运送100万斤小米到泺口。当时黄河上有厚冰块，勉强走到泺口，河上冻冰，船被困在泺口一个多月，待解冻了才回到寿张县。千里黄河战线，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以后，由紧张的战斗环境转变为安全的局面。到了1949年4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到了孙口，是用船搭浮桥，炮车、汽车都过去了，日夜不停的过河，比船渡快得多了。

## 十二、欢送粟裕司令员南渡奏凯歌

1948年5月30日，粟裕司令员统率华东野战军由寿张县孙口渡河南进作战。30日夜住宿常楼。粟裕司令员来了以后，我向他汇报了华东野战军要在各渡口过河的情况，在寿张、范县、濮县、昆吾等各渡口的船工和干部不顾敌人飞机的捣乱，坚决顽强地把

部队渡过河去，过河过得很快，到6月3日以前完全可以过完。粟司令员问到后勤部派人来安装机器船的情况，我说，因桨板太小，船抛动不起来。粟司令员听了各渡口部队过的很快后很高兴，当即叫后勤部奖给200万元冀鲁豫区人民币。粟司令员对我说，他指挥几个纵队又南渡，是配合刘邓大军作战，要打几个大胜仗。河南面的敌人有黄维、邱清泉几个兵团。中央领导同志说，在三年内争取全国革命胜利，今年是决定性的一年。现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360万人左右，要把蒋军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我军渡长江南下就更有利，就可能在三年内争取实现全国革命胜利，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指导思想。我当时听了粟裕司令员说了这些十分重要的话，是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指导思想，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气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我最后衷心感谢粟司令员对船工的奖励，这次粟司令员来了，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我向粟司令员道歉。在吃饭的时候，我问粟司令员，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说在阜平县，他5月中旬到中央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汇报工作，春天打算要他带几个纵队执行新的任务。朱总司令这次到濮阳来，向他们军队干部作了重要报告。

## 十三、迎接陈毅司令员过黄河

1948年6月27日（农历五月二十一）夜9点多钟，陈毅司令员一行由南面来到孙口渡口。事先我们没接到通知，又逢天下雨，没有月亮，陈毅司令员他们在河边等了很久。我们干部听了河南面喊开船，赶快找船工开船，费时间长了，没有很快接陈司令员过来，我们干部向陈毅司令员道歉。我当时不在孙口，到西面去了。

陈毅司令员过河以后作诗纪念：

## 渡 黄 河 作 歌

1948年6月

黄河悠悠吾其济，　大军反攻从此去。
江淮河汉入掌握，　南京群丑苦无计。
党团统一竟贪污，　棘门霸上等儿戏。
老贼花甲飞来去，　满眼战局皆丧气。
徘徊古城系人心，　岂知动摇更加剧。
绝望挣扎难苟延，　婉转哀怜求美帝。
杜马困难何其多，　侵略援助索高利。
扶助倭寇事第一，　可怜位置次奴隶。
皇皇华夏岂无人？　解放军旗伸正义。
中原已告堤防决，　长江何处能守御？
国贼授首看日近，　狗党狐群失依据。
人民法庭早安排，　海角天涯难逃避。
吁嚱一歌兮歌黄河，　黄河稳渡不吾弃。
吁嚱再歌兮歌反攻，　革命风雷动大地。
吁嚱三歌兮歌民主，　群众翻身今可遂。
吁嚱四歌兮歌胜利，　华夏独立新世纪。
濡笔淋漓我兴豪，　但恐才薄难抒意。

## 十四、对先进的英雄模范实行表扬奖励

我们计有800多名干部、船工，在这两年的艰苦顽强的战斗中，涌现出不少先进模范。1947年冬和1948年冬，以中队为单位，经过群众评议，选出先进模范单位中队、模范班、模范人物代表出席黄河指挥部召开的英模代表会议。两次代表会议各有250名

左右的代表参加。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冀鲁豫日报》上广泛地进行了宣传。其中，有的光荣牺牲了，有的在执行任务中表现十分坚决顽强，真是可歌可泣，千秋万代美名扬。如：魏山、鱼山、十里井、孙口、李桥渡口的同志，都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尤其是在魏山、鱼山、十里井渡口，敌人13架飞机反复扫射，丢炸弹。在渡口的干部和船工不顾自己的生死，坚决顽强把船撑到河岸，保证军民安全渡河。当时我写有几句歌词：

千里航船渡大军，　　完成军渡震人心。
冲破防线转反攻，　　四十万敌化灰尘。
蒋贼统治乱了阵，　　南京群丑奔逃命。
三年奋战如一日，　　全国解放向光明。

## 十五、最后说明

我回忆刘邓、陈粟大军渡黄河的历史，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写出来的，其中有很多具体问题因没有当时资料，不能具体叙述。写这份资料的言语，对领导同志的称呼，是遵照当时领导同志的职务来称呼的。因为是写历史，是要把历史反映出来。在3年渡河过程中，在军民之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当时如实反映到领导机关，及时纠正了，在此不再提了。

我们在黄河指挥部3年的工作过程中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在此也不写了。

最后我衷心感谢沿黄河各县委、县政府对黄河各渡口的工作积极支持和解决渡河需要的物质问题。有了县委、县政府的积极支持，我们才完成第二、第三野战军和冀鲁豫地区军民渡河任务。这段历史是冀鲁豫人民光荣的历史。

# 阳谷县早期党的活动与群众工作*

申云浦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鲁西地区的阳谷县、聊城县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王寅生、赵以政等回到家乡开展党的工作，发展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聂子政、张干民、袁寿宸、王筱湖、宋励泉等，建立了鲁西县委（实际是鲁西特委）。在鲁西县委的领导下，1928年1月14日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坡里暴动”。起义队伍武装占领了坡里教堂，收缴了附近地主的枪支，并开仓放粮，救济贫民，准备建立民主政权，甚至还想建立鲁西苏区。但这次暴动是在“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发动的，像昙花一现似的，只维持了20多天，就在反动军阀张宗昌和东昌道尹陆春元结合地方民团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起义队伍撤出坡里到大名一带，以后就分散隐蔽了。而后赵以政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杨一斋同志去了东北，袁果、聂子政等也外出了，但袁寿宸仍在博平、袁楼一带坚持活动。虽然这次暴动遭到了失败，但使共产党的影响深入人心。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是解救贫民的，是中国的希望。我入党就是受了“坡里暴动”的影响。所以，我写回忆录把这一段叫做“革命火种”。

1930年我考入聊城师范，1931年参加了学校的一些读书活动。1931年聊师考入了一个共产党员，叫刘子蔚，平原县人，在七级二班。1932年以刘子蔚为首，以聊城师范为中心建立了中共鲁西总支，领导鲁西、鲁北党的活动，支部书记刘子蔚，组织委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编《内部未定稿》第9期第1—7页，原题为《阳谷县早期党的活动》。

员孙方茜（阳谷人，后来脱党了，我就是他介绍入党的），宣传委员桑艮阳。1933年，为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分散敌人的兵力和注意力，省委指示我们贴革命标语。在一夜之间，我们从学校大礼堂、校长办公室，到城内的各个公共场所，甚至李益智的旅部门口、哨兵的后面也贴上了。贴标语是 3 人一组，第一个侦察，第二个抹浆糊，第三个向上贴。标语都编了号，你分 1 至 9 号，他分10至12号，到时一检查，你分的几号没贴上，是要受处分的。只要侦察过去了，浆糊和标语就一定要过去。当兵的在这里站岗，背后是个电线杆，我装着擤鼻子，“啪”就贴上了。这一贴标语不要紧，一下子把刚恢复的党组织暴露了。当时整个聊城有30多个党员。聊城军警围住学校要进行搜查，校长周拔夫怕清查出来他吃不消，就没敢承认，没让搜查。他对外应付，对内却加强了清查，把党员都查出来了，如我们班有申云浦、谢鑫鹤、鲍兴贵、郭庆云等人。这时到了毕业的时候了，他说得给这些人留条出路，考后那时不让他们参加就是了。我就这样毕业了，后来省府换了孙芳时做校长，我又混进去成了后师生，继续在那里搞党的活动。1934年底党组织又暴露了，寒假我被勒令退学(实际是不挂牌子的开除)。他们说：“你是穷人出身，给你留个生路。不挂‘牌子’。如果挂开除的牌子，你就找不到职业了。不过，我告诉你，聪明人恒被聪明误，你不要误入歧途。”我说：“不挂牌子我感谢，但不要说我误入歧途，抗日救亡不是歧途，是正途。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我离开后不准你胡说八道！你要胡说八道，别说我对不起你。”就这样我离开了学校，到崇实小学教书。

1933年，山东省委就有两次叛徒叛变，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第一次是 3 月份，青年团省委书记陈衡舟叛变；第二次是 6、7月间，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组织部长一叛变不得了了，省委大部分同志被捕，山东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但是，

党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赵健民同志。健民是济南乡师的学生，比我晚一年入党，在失掉联系后，他几乎跑遍了整个山东，把失散的共产党员都联络起来，他曾两次到崇实小学和我联系。这些同志联系起来以后，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刘仲莹任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1935年春节，鲁西的党员们在徐运北家里开会，成立了鲁西特委，运北同志任书记，我为宣传部长（我没有到会，也没有到职）。

1935年，赵健民同志两次到濮县寻找党的关系，终于在濮县的古云集找到河北省委代表黎玉。黎玉同志是来这里开展均粮斗争的，他们收了地主的枪支，搞了个游击队。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到济南，5月重建山东省委，省委书记黎玉，组织部长赵健民，宣传部长林浩（原名尹桂璋，解放后任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已离休）。从此以后，我们山东党组织尽管遭到过破坏，但再也没有和上级失掉联系。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拱手让出东三省。敌人进关后，他命令华北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队不战而退，撤到了黄河以南，同时对共产党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闻风而逃，后来在河南被蒋介石当作替罪羊枪毙了。聊城专员范筑先奉命后撤，他不愿过河，到齐河官家庄附近，我党代表到他那里争取他抗战，他当即通电全国坚持敌后抗战。

在范筑先出走期间，鲁西因国民党党政机关都撤了，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土匪蜂起，司令多如牛毛。什么"西北风"（韩春和）、"山根子"（石洪典）、"架鸡子"（栾小秃)都起来了，这些都是土匪。后来，范筑先在我党的支持下，在我党坚持统一战线的情况下，把土匪武装收编为抗日武装，他的部队发展到35个支队，其中第十支队是我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当时号称10万之

师。

阳谷县同别的县一样，县长和县国民党党部的人早就逃跑了。1937年11月，聊城政训处（实际是共产党的办事机关）进驻安乐镇，筹建阳谷抗日政权。县长徐茂里，县独立营长宋励华，县特务大队长赵小舟、副大队长顾寿祯、指导员黄主一，县政府财政科长王润怀、金库主任孙鹏程、公安局长熊义吾（现名张健民）。这是第一任抗日县政府，实际也是共产党的政权（除徐茂里外都是共产党员），可惜时间不长。

在没建抗日县政府以前，我们准备在安乐镇发动党员、农民，成立一支抗日武装。一天下午，日军的飞机到安乐镇低空盘旋，当地民团团长和地主的代表人物都吓坏了。我那个族孙申洪祥在街上下神说"关二爷"附体了。他们问他："申云浦在北街拉大旗好不好？""关二爷"说："大事不好！"于是，他们集合了一批红枪会要治我。事前有人给我送了个信说："红枪会来啦，你快跑吧！"我这一跑游击队就不能集合了，于是我就把一部分人发动到布永言的队伍里，建立第五游击大队，由布永言当队长。那里面有共产党员，也有农民，但大部分是土匪。布永言不是土匪，是个大青皮，牲口经纪，通土匪。部队搞起来后，拉到西关进行改造整编，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整顿纪律，例如不准吃人家的狠子（猪），不能拉人家的两角（牛），不能捉人家的尖嘴子（鸡）。这一整顿不要紧，他们哗变了，拉起队伍到了莘县、朝城一带，汇合了大股土匪。农历二月二晚上，他们又回来了，从阳谷西门打进城内，把我包围在第一小学。我这里都是些政训班的学生，连一支枪都没有，他们推我为代表去开门。还没等开门，土匪就撞开了。一进门就喊："小舅子，拿枪来！"说着朝我"啪"就是一枪，子弹从我头顶上过去了。我说："这里净些学生，哪来的枪！"正在这时，李钟洪进来了，他是我发动参加布永言队伍的一个农民。他说："二叔，你咋在这里？"我

说：“我把你动员到布永言队伍里后就在政训处。你赶快把我送走，我得抓紧到聊城报告。”于是，就把我送出城来。

我步行到聊城汇报了以后，范筑先派来了部队围城，最后和平解决，第二次把布永言收编为第十九支队。这个队伍改编以后成了国民党的了。国民党反动分子朱之梅、熊纪明都混了进去，进去的参谋长孟宪章也十分反动。县长换成了张维周，是国民党顽固分子。这些人占据动委会，开始和我们政训处搞摩擦。他们用美人计收买韩春和，手段很卑鄙，斗争很激烈，很尖锐。后来张维周要把我们的特务大队改编为保安营，要吃掉我们。我一看待不下去了，就叫顾寿祯带领特务大队和保安局的可靠分子拉到第十支队去了。但阳谷的党组织并没有撤，仍然继续坚持斗争，搞抗日武装。1938年“红五月”突击发展党的组织，党员由原来的六七十人发展到800人，先后建立了各区委，接着正式建立了阳谷县委。我任县委书记，赵风升任副书记。不久我就到鲁西北特委任宣传部长。

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守，范筑先与城俱亡，壮烈殉国。此后，我们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领导鲁西抗战。鲁西北特委转移到冠县，我改任民运部长兼抗联主任，从此，我们和范筑先统战的历史结束了。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有两种意见：一种说是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如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标语，当时应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少数的。大多数认为我们和范筑先的统战是成功的，是正确的，我就是这样认识的。毛主席说在统一战线中不能丧失我党的独立自主作用。我们在同范的统战工作中是保持了我党的独立自主作用的。我们发展了抗日武装第十支队、平原纵队、青年突击队等，建立了抗日政权，党员县长就有9个之多。这怎么能是右倾呢？是否右倾的主要标志，看要不要政权，要不要武装，要不要党的组织。虽然在宣传工作上，受了一定影响，但应看问题的

实质，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1939年1月，鲁西党在北馆陶召开了鲁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成立了鲁西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赵鎛任组织部长，朱则民任宣传部长，徐运北任民运部长，赵伊坪任秘书长。接着东进泰肥山区，路过茌平琉璃寺时遭敌包围，秘书长赵伊坪牺牲。1939年2月，一一五师的罗荣桓、陈光带领师部和六八六团杨勇部队挺进鲁西，在郓北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从此，我们鲁西开始了和主力军队配合，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1949年3月29日，我们冀鲁豫南下干部在菏泽晁八寨誓师，由徐运北同志等率领3960个干部随军南下。我们走后至1949年8月，撤销了冀鲁豫区党委，建立了平原省。

抗战八年是冀鲁豫最艰苦的八年。同志们知道，这一带基本上是一望无际的黄河冲积平原，既没有崇山峻岭作屏障，又没有茂林修竹作掩护。但有的是勤劳勇敢、富有革命传统的人民群众，只要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发生了特大灾荒，卖儿鬻女，吃糠咽菜，日军进攻，日、伪、顽夹击。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1943年“十一三”大“扫荡”，鲁西南“五五”大“扫荡”。日本侵略者搞5次“强化治安”，三里一营，五里一堡，实行“三光”政策，有些地区我们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这是最艰苦的岁月，我们冀鲁豫人民，包括阳谷人民，经受了这个严峻的考验。而且我们越战越强，最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日本投降后，我们争取和平民主，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了“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冀鲁豫是重要的战场，在这里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特别是在支援淮海战役中做了很大贡献。全地区动员了30万民工，15万辆大小车辆，运送小米9000万斤，1.5万副担架护送伤员，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指战员、群众，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因此，冀鲁豫地区的历史，就是用广大党、政、军、民的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我们在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应当记取，为我们的革命事业而光荣牺牲的先驱和烈士们永垂不朽！

**说明：**本文系中共阳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根据申云浦同志1984年4月29日在阳谷县县直机关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录音整理。

# 泰西地区党的发展与群众工作*

李明实

东岳泰山，是我国以雄伟壮丽著称的名山。它脚下的泰安城，历史悠久，是津浦路南北贯通的要冲，是山东省会济南的南大门。泰安县铁路以西部分及肥城、长清、东平、平阴、东阿、汶上、宁阳等县的全境或部分称做泰西地区。这个地区的泰安县，我们党的活动较早。1925年8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共青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马守愚到泰安一带发展建立党组织。不久，共产党员王仲修、于赞之也先后被派遣到泰安。王仲修到泰安后，利用在铁路工作的方便条件，首先在泰安火车站动员铁路工人秦少祥、孙建林一起组织地下赤色工会，于同年冬在蒿里山阎王庙成立了泰安铁路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10余人。1926年春，马守愚、于赞之、王仲修、秦少祥、孙建林等5名共产党员在蒿里山秘密开会，建立了中共泰安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泰安建立的第一个支部。火车站工会就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泰安最早的工会组织。同年4月，泰安县党的农村支部——中共大汶口特别支部在卫驾庄建立。同年冬，萃英中学支部建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山东仍处在奉系军阀张宗昌残酷的统治下。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就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1927年正式建立了泰安火车站党支部。1925年秋天，在开滦煤矿的共产党员李鹤年（1922年入党），因罢工失败在天津找不到党组织，回到家乡泰安东向

* 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下）第217—225页，原题为《泰西地区党的产生和发展》。

镇。1927年，省委派武冠英回泰安与李鹤年取得联系，建立起东向镇支部。同年秋，又建立起了北望支部。至此，泰安县境内已有党支部5个，党员百余人。

这一时期，泰安党组织经历了初创阶段的考验，党的活动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由一点到多点蓬勃发展。1926年，在泰安党支部的领导下，火车站的党员以工会组织出面，发起了要求站方补发欠薪的斗争。斗争由党支部书记张俊发所在工务处开始，逐渐发展到全站，并得到德韩段（德州至韩庄）各站工人的响应和支持。斗争持续一两个月，最后取得了胜利，不但如数补发了工人的欠薪，还增发了每个工人一个半月的工资，作为年关"花红"。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凡是国内重大政治斗争，在以萃英中学为中心的泰安城各中等学校，都有强烈的反响。如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广东海陆丰暴动的消息传来，均以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进步学生走向社会，开展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活动。萃英中学党支部秘密印制了《中共泰莱县委告同胞书》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万岁！"的传单，在泰安地区城镇、农村张贴和散发。农民运动不断兴起。卫驾庄、东河北、省庄、北望等村都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农民协会，积极向农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反帝、反军阀和反苛捐杂税等，并向地主豪绅开展斗争。1927年冬，共产党员孟宪尧在省庄领导农民协会进行了向地主借粮斗争，每户贫苦农民分得10斤粮食过年，深得群众的欢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8月，泰安县委在东向镇建立，马守愚任书记，组织委员是李鹤年，宣传委员是武冠英。县委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开始酝酿发动农民暴动。1927年9月，马守愚在蒿里山召集泰安党支部和泰城其他支部的部分成

员开会，根据省委关于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号召，决定发动年关暴动。会上分析了泰安当时的形势，多数人认为泰安地处津浦铁路要冲，反动军警力量很大，发动武装暴动不够现实，决定把党的活动重心转向农村，向西南乡和东邻莱芜、新泰发展。是年冬天，为响应广东海陆丰暴动，党组织布置火车站工会，以破坏军阀张宗昌北撤列车的实际行动相配合。由于赞之、王仲修、秦少祥等人制造脱轨器，在城南泮河桥附近安设，以颠覆军阀的列车，同时砍断电线，中断其电话联络。此一行动，虽未造成火车脱轨，但中断了电话联系，阻止了列车运行，使军阀惊慌失措，在苏、鲁地区影响甚大。之后，以人力车夫袁金贵为首的泰安人力车夫工会建立，该工会与当时泰安国民党操纵的县工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28年5月，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泰安火车站工会在党组织领导下，王仲修以津浦铁路泰安职工筹委会的身份进行活动。工会在车站北工人宿舍门口公开挂起牌子，举起反日救国的旗帜，在街头演讲，组织纠察队查日货，并联合各阶层在泰安城五哥庙成立泰城各界反日会，举行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军阀！”“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至遥参亭，纠察队将查出的不法商人的日货进行拍卖时，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群众愤怒之下痛打了军警，此举增强了群众的反日爱国决心。同年9月，夏张镇农民协会成立，会长是董子奎（后被日军杀害），主要成员有叶子真（已病故）、曹龙骧（已离休）、崔子明（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1930年2月，山东省委遭受破坏，泰安党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泰安党组织在秋天发动夏张农民与地主豪绅进行了算帐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村长杨培贞、乡长范维玉赔偿了农民的损失。这次斗争给周围村庄带来很大影响，北白楼、西牛、南故县等18个村镇，都陆续成立了农民协会。同时与上级失去联系的大汶口特支负责人王汭卿等人，鼓动组

织红枪会围攻大汶口驻军马鸿逵部。虽然遭到炮击卫驾庄和通缉王拗卿等人的报复，但共产党人维护群众的利益和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泰安恢复建立特别支部。泰安党组织划归中共济南特支领导。5月初中共济南市委成立，6月初市委书记胡萍舟（胡允恭）派鲁宝瑛（泰安城内人、原曲阜省立二师学生）到泰安恢复党组织。鲁宝瑛以泰安第三小学教员身份进行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9月下达了《鲁省通告第一号》，要求各级党部建立“反日本帝国主义委员会”，动员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为了贯彻这一指示，9月底，泰安特支书记鲁宝瑛同共产党员、小学教员李扬冰（李宪章）、张丹峰、张克明、梁子文、武冠英等人，以泰安县立第三小学为中心，发展组织，开展反日群众运动。李扬冰是第三小学六年级教员，他介绍本年级学生李盛泉（李明实）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李盛泉同李栋林、马继平、郭兴贞等建立了团支部，李盛泉任书记。在党的领导下，李盛泉以学生身份出面，由县立第三小学发起，串连泰安公、私立9所小学（即县立一小至五小、实验小学及私立仁德、白氏、育英小学）成立了泰安小学反日联合会，各校代表联席会推选李盛泉为主席。接着以泰安小学反日联合会名义同省立泰安三中、泰安师范讲习所、泰安育英中学、萃英中学联合，成立了泰安学生反日联合会，推选师范讲习所进步学生宋绍凯为主席。学生反日联合会建立后，即刻组织各校师生展开反日宣传运动，在主要街口悬挂漫画、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演讲东北沦陷、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党为了扩大宣传，动员全民反日，拟通过学生反日联合会邀集各界，在岱庙召开群众大会。国民党县党部不准开会，遂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分化、镇压，各界反日大会没有开成，以后学生

反日联合会也被解散。就在这时，泰安特支组织领导了省立第三中学、泰安师范讲习所学生300余人，组成请愿团南下请愿。由学生党员庞盛文（后脱党，成为反动军官）和进步学生宋绍凯、白荣璋等人负责组织指挥，经过与校方进行斗争，两校学生在泰安城举行游行示威，然后到火车站卧轨截车，乘南下的列车到南京政府请愿。请愿的学生带铅印的宣言1万份准备沿途散发。12月18日，泰安南下请愿团在兖州受阻。泰安地区7处学校请愿团汇合，其他学校学生一起同反动当局进行交涉和卧轨斗争，迫使津浦铁路停运3日，对苏、鲁震动颇大。泰安师范讲习所学生经过南下请愿的锻炼，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宋绍凯、邱士长、倪灿武（倪冠英）等人先后被发展入党，建立起支部。泰安特支的活动重点由泰安县立第三小学转到县师。特支以县师学生会名义创办了《蔷薇》半月刊，以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同时，鲁宝琪指定李盛泉（李明实）投考私立育英中学去开展工作，并利用学生反日联合会的旧关系领导城区学生工作。当时第一、第三小学都有共青团支部，第三小学共青团支部的负责人是张传斗（张魁三）。这时的学生工作主要是提倡看进步书籍，关心国家大事，以各种形式团结和影响青年同学，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1932年泰安的农村工作也逐渐开展，泰安八区、五区相继建立了区委。同年5月，中共泰安特支改建为中心县委，曹福广（后叛变）任书记。之后，李干臣任书记，宋绍凯代理书记，县委负责人几经变动。1933年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张北华、小张子）到泰安视察工作，改组县委，由裴荣印接任中心县委书记，泰安地区的工作仍能正常进行。由于在1933年，临时省委被破坏，张恩堂等省委领导同志被捕，泰安中心县委书记裴荣印妥协。泰安地区暴露的庞盛文、宋绍凯等部分党员外出隐蔽。原中心县委书记曹福广被捕后叛变投敌，由他带领捕共队到泰安地区先后捕去了共产党员李鹤年（1922年入党）、崔平德（崔子明）、倪灿

武（倪冠英）、张俊发（1925年入党）、李盛泉（李明实）、王仲范、刘来殿（刘乃殿）等22人。此后，虽然在1934年、1935年，赵健民以“济南学生抗日救国会”代表的名义，到泰安与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鲁宝琪（鲁宝瑛的弟弟）联络上，但作为泰安党的组织活动，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又恢复发展起来。

肥城县党的活动，是本县在外地读书的学生党员回到家乡开展起来的。1933年夏，北平左联党团书记李文甫派他弟弟李寿年（团员，北平市共青团交通）回家筹集经费，同时交代他要在家乡注意发展组织。李寿年不久病故，因此没有搞成。同年，共产党员张维之从上海返回肥城第一小学任语文教师，开展了破除封建迷信，提倡男女平等的宣传活动，在学生中提倡阅读进步书籍，并组织学生演进步话剧。进步学生李敏华、张新村等发动了反学校当局会考的活动，并在墙壁上书写了“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引起了国民党县长刘晋的恐惧，遂解散了第一小学，并通令张维之不得在肥城任教。

1935年11月，赵健民因被叛徒在济南跟踪，到肥城玉皇山暂避，他与民众教育馆同情我党的馆长王西城取得联系。经过一段工作，赵健民介绍王西成加入共产党。赵健民在玉皇山北边百福图村办起了平民夜校，教国语、算术，课余时间讲救国道理和红军怎样打胜仗等等。教书期间，发展了玉皇山庙里的小二和尚和一个放羊的人为党员。后又发展一两个人，建立了党小组。

东平县党的活动，是从抗日救国、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开始的。1935年上半年东平县立中学、县立第一小学、女子小学的教师刘德炎、邓影舟、万金墀（万丹如，女）、李蕴石（女），提倡学生看进步书籍，经常对学生进行不当亡国奴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思想活跃，不满现状，要求进步。同时在县立中学发动了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还提倡贫寒出身的学生搞勤工俭学。1936年5月，中共山东省工委巡视员董临仪（张纯成，东

平县张官屯人）到东平县戴庙小学找到其同学蒋典印教师，又通过蒋认识了北刘庄教员高明宇和耿山口开明士绅耿忠诚、戴庙开明士绅（学校管理员）谌祖江，经常和他们一块谈论革命理论及抗日救亡问题。是年7月，趁中共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长赵健民到东平戴庙检查工作之际，由董临仪、赵健民发展高明宇、蒋典印、耿忠诚、谌祖江4人为正式党员。

同年9月，在东平戴庙小学建立了东平县第一个党支部，高明宇任书记，蒋典印任副书记，直属中共山东省工委领导。同时董临仪、蒋典印介绍解庄小学教员杨海岩入党，谌祖江介绍谌祖文入党，董临仪、杨海岩又介绍展庆坤（展玉章）、杨启贤、宋庆明、宋庆亮入党。董临仪又在解庄小学设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联系点，由杨海岩负责，及时传送、收发党的文件。同时，东平县田大店小学成立读书会，由该校教师万明理（万里）负责，学校工作搞得十分活跃，成了党的活动基点。

东阿县党的活动，是1933年秋姚仲明利用在姜楼小学代课期间开展起来的。首先发展了王玉珍、刘方明等十几位同志，建立了第一个支部，苏广才（苏民）任支部书记。支部建立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我党的抗日主张；建立大众图书馆，传播进步书刊；在群众中物色发展对象。1934年，西程铺、归德、柳林屯、谭庄、官庄、广粮门等村，先后建立起党支部。1935年夏，根据赵健民的指示，东阿县委在西程铺成立起来。苏民任县委书记，组织部长是刘万明，宣传部长是何有信（后因怀疑其有历史问题而清除出党），军事部长是谭丙岱（现名新斧）。这时，一些在外地入党的同志，如鲍云、颜华等也回到东阿。他们在县委的领导下，一起开展工作。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东阿已有30多个支部，130多名党员。

泰西地区除上述党的组织活动之外，各地还有一些党员单独进行活动。他们也都为该地区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由于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所以除汉奸、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之外，全国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和贫苦知识分子大都是主张抗日救国的。因而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自然成为中国人民的希望。当卢沟桥上响起抗日炮声的时候，党早已撒下的火种，在泰西的大地上，便迅速成为燎原之势。

**笔者说明：**本着存真求实、立准立好的精神，对泰西党的这段史实，根据1933、1934年在济南监狱中听到的李鹤年（1922年加入共产党，已故）、张北华（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临时省委书记）等老同志的叙述，进行了认真的追忆，并以此为线索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泰西地区已刊材料和成文材料。同时走访了张俊发同志（1925年入党，一级残废军人，现住泰安市七里铺）、李文甫同志（1933年任北平左联党团书记），并与泰安地区、泰安市党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对。但是，由于当时党的活动处于地下，文字材料极少，且多数当事人已不在世，因此，难免有遗漏、错讹之处。殷切盼望知情的同志给以补充、更正。

# 抗日战争时期
# 滨河县发动群众的情况

张延积

滨河县于1943年初建立，管辖长垣、濮阳、东明（原属河北省）、滑县（原属河南省）沿黄河区域，现在除了原滨河六区属山东东明县外，其他均属长垣县。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我任滨河县委书记。现把那时发动群众的情况记述如下，望有关同志特别是当时的老同志予以指正。

## 一、滨河县建立与当时发动群众的历史背景

首先，滨河县是在我党我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日军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建立的。

从1941年起，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始越来越困难，1942年下半年达到极点。当时日军进攻的重点逐渐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转移，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汪精卫投降日本，一时国民党的军队要员纷纷投敌，蒋介石动摇得也很厉害，是战是降举棋不定，我党针对这种形势，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这时，我抗击侵华日军总数的60%，伪军90%。日军对我根据地的进攻办法也变了，学习并发展了蒋介石在江西"剿共"的那一套，一连搞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体战。由定期"扫荡"变

为反复"扫荡"；由单纯军事"扫荡"变为"三光"政策；由数路进攻，变为纵深配合的"铁壁合围"；由临时"扫荡"变为长期占据，在根据地大量修据点、碉堡，修公路、挖封锁沟，实行"囚笼"政策，碉堡有的竟多达在一个村头可以看见3个，向我根据地"蚕食"。加之1941和1942年，河北省、河南省又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有的两季甚至三季没有收成或严重减产，饿死人很多。我根据地的军队及地方工作人员也长期吃不饱，在这样敌情严重、灾害严重的情况下，根据地逐渐缩小了，军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人数也大大减少。毛主席有篇文章题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其中有一段说到这个时期的情况。他说这个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总人数由原来的50万下降到35万。

在这个紧急关头，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不但很快制止了敌人的"蚕食"，而且根据地又迅速地扩大了，我军的人员也由减少转而增加了，日军开始走下坡了。滑县、濮阳、长垣原来也是我们的根据地，后来变了质，我们撤了出去。1943年又重新打开局面，建立了滑县、滨河、卫南、濮阳等县政府。

其次，滑县、滨河发动群众是在冀鲁豫基本区濮（县）、范（县）、观（城）、鄄（城）发动群众取得了一些经验之后开始的。

冀鲁豫边区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是从1942年秋后开始的，军区政委苏振华在动员大会上讲：刘少奇同志批评我们，共产党人不发动群众，就是忘了本。这时，从党、政、军、民系统抽调了几百干部，集中在濮县、范县发动群众。濮县县委书记换了鲁明，县长仍是韩哲一；范县县委书记换了陈瑞（原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县长换了成润（行署的处长），区党委由民运部长信锡华负责。不久，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调冀鲁豫任区党委书记。他亲自抓发动群众的工作，每次濮、范、鄄汇报发动群众工作时，都是黄敬同志亲自主持，区党委正、副科长以

上，行署正、副处长以上，军区正、副部长以上，群众团体正、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全体参加。最后由黄敬同志总结发言。当时的区党委对发动群众的重视，确实到了不能再重视的程度了。

从1942年秋后到1943年秋，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濮、范、观、鄄的发动群众工作告一段落，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时，滑县、滨河的形势也比较稳定了，具备了发动群众的条件。区党委从基本区抽调了一批干部到滑、滨发动群众。那时，我是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科长由副部长兼），调我任滨河县县委书记，也是为了发动群众。

滑县、滨河发动群众在冀鲁豫边区来说，是属于第二批，这时已有了一批发动群众的经验，但还很不成熟，需要继续摸索。

第三，滑县、滨河发动群众是在经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党内的思想水平、领导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的情况下进行的。

经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之后，特别是黄敬同志到冀鲁豫之后，冀鲁豫干部的思想水平、领导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群众观念，怎样是从实际出发，开始学会了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这些问题从今天看，像是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这些提高，滑县、滨河发动群众就不可能在摸索中提出一些问题和解决一些问题，就不可能在濮、范、观、鄄发动群众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

第四，滨河县敌情不太严重，情况日益好转，大大有利于发动群众。

那个时期有两个事件使我军民蒙受较大损失：一是1943年11月胡口战斗，因指挥麻痹大意，误把日军当黄协军，贸然出击，我独立支队二连被打垮，伤亡十七八人，吴副司令牺牲；另一次是1944年10月，日军骑兵大队从滑县南部开始包围，在我二区小渠汇合，把青年壮丁670多人屠杀，制造了有名的小渠惨案。

滨河县周围的情况是：西边与滑县根据地相连，是我们的依托；北部是濮阳，伪军孙良诚部驻扎在那里，经1943年秋末八公桥战斗后，孙部比较老实了，不敢轻易向我根据地进犯。当时，因孙进占我濮县，我军攻下孙司令部所在地八公桥，生俘参谋长以下数千人。

南部是长垣，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主要是伪军刘富山的挺进队约2000多人，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往北来，比较危险大的是国民党的一个专员、顽军邵鸿基的部下何冠三团。滨河是骑兵团的联系县，骑兵团没有其他任务就在滨河县驻防，因为滨河县是粮仓，骑兵团耗粮量大。趁骑兵团不在滨河时，何冠三部经常扰乱我四、五区。1943年6月，把何冠三部狠狠打了一次，缴获枪200多支，俘敌100多人，从此何部也比较老实了。

东部的东明县，驻有少量日军，大部分是伪军，他们只在黄河以东活动，不到河西来。

总之，敌情不太严重，环境日益好转，大大有利于我发动群众，1943年、1944年已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后期，日军走下坡路，已是强弩之末了。

## 二、发动群众的经过和概况

滨河县属冀鲁豫边区的四地委（后又改九地委）。当时地委发动群众的重点是滑县，滨河是个副点。在发动群众的面积力量和发动群众的深度及经验上，滑县都远远超过滨河。

滨河县发动群众是从1943年秋开始的，是当时县抗联主任刘准同志领导搞的，我跟着当时的地委书记张玺同志、专员杨锐同志离开冀鲁豫区党委经昆吾县夜过坝头至濮阳的封锁线后，就到了滨河一区，张玺同志带着我直接到县委作了介绍，于是，我就上任了。紧接着就和张玺同志一起听了刘准同志发动群众的汇报。

他们已经搞了十几个村，减租减息反恶霸斗争都有，由于力量不大，缺乏经验，当然说不上打开局面，但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作了些试探，摸了些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为进一步大规模发动群众作了准备。

滨河县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是从1944年2月（春节以后）传达了冀鲁豫区党委高干会议精神以后开始的。从1943年11月起，区党委召开了两个多月的高干会。地方县委书记以上，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共200多人。会议进一步解决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对敌斗争及小部队活动问题与发动群众问题等。滨河县委在西赵堤召开了六七十人的活动分子会传达了高干会议精神，抗联组长以上，政权区长以上，党内区委委员以上，军队是独立支队（县大队）副政委以上都参加了。会议着重解决了发动群众问题，结合滨河情况强调三点：（一）先搞减租减息增资增佃，通过民生斗争把农会的领导成份搞好；（二）集中力量突破重点，然后用重点带动一般；（三）领导深入重点，从县委书记起都要深入重点发动群众，取得经验，以锻炼自己，提高领导水平。

这时，区党委从濮、范、观、鄄基本区，地委从高内县，又陆续调来一批干部，发动群众的力量大大加强了。滨河可直接参加发动群众的干部有六七十人。活动分子会议期间及以后把发动群众的力量作了调整。发动群众的重点是一、二、三区。一区是大堤以东，由新从观城调来的县委组织部长林远同志兼任书记，原书记刘振东任副书记，李青任抗联主任，秦军光（女）任副主任。二区在堤西，由县委宣传部长张萍同志兼任书记，原书记赵子厚同志任副书记，马青先同志任抗联主任，新从高内县调来的县抗联妇女部长林萍任副主任；三区在北部，由张甫任书记，李俊任抗联主任，不久，王愈明同志也调来了，任县委民运部长兼县抗联主任，原主任刘淮同志任副主任。

3月，首先在二区小渠突开了，是一个以减租减息为主还带

有反恶霸性质的斗争，周围村庄都参加了斗争。一区、三区也来一部分代表参加，二区队也参加了。接着一区的灰池、三区的朱楼也先后突开，运动发展之快出人意料之外，不久就形成了高潮，麦收前一、二、三区普遍建立了农会。麦征时，又快又好地完成了夏征任务。接着发生了蝗虫害，又发动和领导群众打蝗虫，很快把蝗虫打下去了，没有成灾，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初步显示了发动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威力。

麦后，利用青纱帐期间，县委办了3期农会积极分子训练班，每期200人，学习10天，对培养干部和继续深入发动群众起了重大作用。

麦后利用农闲，继续发动群众；另外发动群众挖路，为秋后反“扫荡”作准备，这时一、二、三区加上以前挖的路，任务已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

9月，二区朱口发生暴动。该村有个恶霸地主朱允，当过国民党的联保主任，县政府准备镇压，但为了配合群众反霸斗争，长期扣押没有处理。他的家族和党羽利用群众对挖路不满和抗联一个干部在该村男女关系问题，煽动群众闹事。先挑起骚动，后乘机杀害抗联的那个干部，威胁一部分人投敌。有30多人受骗投敌，我们先后镇压了朱允等共七八个人。

又经过1944年冬和1945年春，一、二、三区的减租减息的民生斗争及反霸的民主斗争基本结束，各村普遍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团和姊妹团，也普遍建立了模范班（民兵）和自卫队，因雇工很少，只在农会设雇工小组。

1945年3月，县委在二区新店召开活动分子会，规模和1944年2月的活动分子会相同，总结发动群众的经验，布置生产。在这个会上，地委副书记赵紫阳同志讲了话。

紫阳同志管地方，主要精力是发动群众，因为发动群众是个新问题，那时冀鲁豫从上到下的党委书记都亲自抓发动群众，而

且力争深入重点。紫阳同志坐阵滑县，深入重点，还兼管滨河，常住在滑县东部滨河老岸以西一带。他有时叫我到他住处汇报，有时我主动到他那里去汇报，有时当天去当天回，有时住一晚上第二天回来。听汇报时，多是他一个人，有时分区抗联主任李进宝同志赶上也参加听。除汇报外，相当多的时间放在交谈上，最后由紫阳同志系统谈谈，我作记录回来向县委传达。县抗联主任王愈明同志也到分区抗联汇报，有时紫阳同志赶上，也参加听，最后也由紫阳同志谈，王愈明同志记录，回来向县委传达。很可贵的是林远同志现在还保留着那时的传达记录5份。我记得赵紫阳同志到滨河县两次，一次是1944年冬，一次是1945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内，地委没专开过群众工作会议，紫阳同志1944年秋曾到平原分局（冀鲁豫区与冀南区合并为平原分局，黄敬同志任书记，宋任穷同志任副书记）汇报发动群众工作，汇报后，他写了《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包括滨河一部分经验。分局印成小册子，发到冀鲁豫、冀南的各县区。

滑县、滨河发动群众是成功的，提出和解决了不少问题，紫阳同志的文章概括和总结了这些问题。

## 三、发动群众的政策

（一）民主民生斗争的政策（略）

（二）划成份（略）

（三）农民的根本要求是土地

农民的根本要求是土地，随着运动的深入，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怎么办？是当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农民的要求是正义的，不适当满足这一要求，就不能进一步的发动群众，解决吧，中央没政策，上边没文件，当时还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紫阳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确有独到之处。根据林远同志最近整

理出来的紫阳同志关于滨河群众工作意见，其中有两段是谈这个问题的。紫阳同志说："因为土地比较集中，仅靠减租减息增佃，不是（足？）以削弱地主经济，支持农民翻身，我们走了民生斗争的道路，它带有极大的经济意义，它要部分的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这不等于均产。""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思想，但在目前必须约束，如果不加以约束，便会斗中农，影响生产情绪。"

我记忆犹新的是他谈这个问题时，给我举了滑县一个村的例子。他说："有个地主，经过减租减息增佃以后，土地量仍很大，但又无其他斗争内容。于是农民就想办法，查到他以前曾将长在地边上的一棵树砍了自用，就给他算了这笔帐，罚了他几十石豆子。斗争的方法当然是文斗和批评的形式。你说合理不合理？我说完全合理，农民清楚地主也清楚，目的是削弱地主的土地。"

在紫阳同志这种思想指导下，滨河县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民主斗争的后期，实际上经济意义已是主要的了。另外，有意地压低地价，二三斗（每斗25斤）豆子，可以买一亩地（农民、地主都说这是平圪塔）。就这样，部分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 四、发动群众的方法和策略

（一）先搞民主斗争，还是先搞民生斗争

先搞民主斗争，还是先搞民生斗争？在冀鲁豫是长期争论而未解决的问题。先搞民主斗争的好处，群众易于发动，打击面窄，只打恶霸地主，贫农、中农都拥护，富农地主中也有一部分人同情，缺点是领导运动的积极分子容易出问题，老实的贫农不敢动，也没有威信，领导权很容易落到游民分子手里，甚至是另一派地主派的人掌握。先搞民生斗争的好处是领导成份好，都是

佃户、贫农和雇工，但缺点是阻力太大，除佃户、雇工和受高利贷剥削的人外，别的贫农不太积极，中农很多中立，甚至有顾虑，地主富农都是斗争对象。濮、范、观先搞民主斗争，后来农会干部中出现了新贵，脱离群众。滨河1943年发动群众，组织的农会，领导成份也有问题，结果在民生斗争中大换了班。1944年春，滨河先搞民生斗争是成功的，受到了地委的表扬，但1944年秋后在四区先搞民生斗争时却碰了壁，发生了邵占群众闹事，也没有打开局面。边区青年总会有个同志搞民生斗争时，提出雇、佃、贫桃园三结义。许多同志对这个说法也有保留。

（二）突破重点，带动一般

1944年2月，滨河县发动群众一开始，就强调集中力量，突破重点，带动一般，经验证明是成功的，很快形成高潮，也受到地委的表扬。方法是从重点村积极分子形成力量的时候起，就叫积极分子到重点村去串联组织，区干部只居于指导地位，然后重点村走一步，周围村跟一步，重点村斗争地主时，周围村都来参加，这样一个重点村带动一片村，然后波浪式的发展向更大范围。这个办法也是逼出来的，因为滨河县发动群众的力量小，又没有经验，能单独到一个村发动群众的干部不多。

（三）反对包办代替，让群众自己充分动

在整个发动群众过程中，反对包办代替始终是个大问题，克服一次，群众的发动程度就深入一次，干部和领导的思想水平也提高一次，但在另一阶段或者另一种场合，包办代替就以另一种形式又出现了。包办代替问题是个领导思想水平问题，当虚心的时候就好一些，胜利了骄傲了就包办代替更厉害。什么是包办代替，就是不从实际出发，用自己的想象，代替群众的思想，代替群众运动的规律，定框框，定模式，让群众走过场，结果必然影响群众觉悟的提高。冀鲁豫区党委很强调重视这个问题，1944年《冀鲁豫日报》有篇社论《站稳脚跟，放下圈子》，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的。紫阳同志也很重视这个问题，林远同志整理的当时紫阳同志对滨河工作指示中有几段话是谈这个问题的。紫阳同志说："事实上滨河群众已逐步提高，作超阶段的要求，只是主观愿望，仍然是包办代替不民主问题，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他还说："滨河在使用干部上比较放手大胆，提出反对包办代替问题，提出让群众自己充分动的问题。"他还说："滨河有两个问题未解决，即：一次彻底论，把运动制定一套的意见形式，不合此点就硬来，不管群众觉悟程度，地主已经退却，还要拉着斗，这都不是从群众的实际出发。""关于群众自己动的问题。这次滨河的民主运动是空前的，由于村干的活动，群众的酝酿，我们只作一般号召，由村干主持，这种领导方式是比较好的。"

（四）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会一成立，甚至在农会酝酿成立的过程中，积极分子就首先抓枪，解除地主武装，把自己武装起来，成立模范班（民兵班）。中国的农民很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

农会斗争初步胜利后，第二步就是抓政权，把村长换成农会的人，有的由农会直接派，有的也通过选举形式。政权是刀柄，武装是政权的支柱，农民都懂得。

妇女开始是农会的一个小组，斗争胜利后就正式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随后成立青年抗日救国会，接着成立儿童团、姊妹团。妇女会、青年会都是不分阶层的，但农会的妇女、农会的青年是骨干（前边也说过，雇工因人数少，只在农会作为一个小组）。

60岁以下男壮丁组成抗日自卫队，站岗放哨，负责战勤。不管哪个组织，都不准单独搞斗争，不准单独罚款，一律要由农会统一，都要在农会的领导之下。紫阳同志对这一点也有独到的看法，他向我们举过滑县妇会斗争罚款的一个例子。一个村的妇女会斗争了一个压迫儿媳妇的婆婆，并罚了款，结果儿媳妇在家里更孤立了。一有机会就讽刺她，譬如吃饭吃的不好时，就说今年不能

和往年比了，一样吃吃不起了；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说今年和往年不能比了，买不起这样的东西了。弄得儿媳妇上不上，下不下。紫阳同志主张妇女会主要是搞家庭和睦，是通过批评教育的方法搞和睦，不是用斗地主的办法斗争。青年会主要是生产、学习。他不赞成儿童团、姊妹团参加斗争会，说他们一切都是为了游戏，冲淡了说理斗争，往往乱打一气而结束。

（五）好得很，糟得很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好得很，糟得很，在这次冀鲁豫发动群众过程中，又在不同程度上重演了一番，广大农民都说好得很！凡参加发动群众的干部也都说好得很！但没有参加发动群众的干部中就有一些同志有不同看法了，认为有些"左"，有些不顺眼。他们这样认识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些做法确实是政策上没有规定的。但因为是在党委领导之下搞的，他们也不便多说。1946年中央发了《五四指示》，提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认为农民要求土地是正义的，中央批准农民的这一要求，只提出要照顾九条，如军属、民主人士等要予以照顾；1947年华北土地会议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尖锐地指出：对群众运动不满是地富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不少人因此受到批判，有的还受了处分。

这里有一条重要的教训，每个同志都应记取，就是要警惕自己当革命转历史弯子的时候，千万不要掉了队，不要这也看着不顺眼，那也看着不顺眼，不要当历史的绊脚石，要往前看，要全面看，不要抓住一点不放，光找缺点，一时不通，要多看看。

**作者说明：**这篇文章是应长垣县党史办特约写的。初稿写出后，适逢我去北戴河疗养，路过北京、天津，又请当时的滨河县委组织部长、后天津市统计局长林远同志及当时的民运部长、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愈明同志看了，提了意见，又修正定稿的。

# 回忆冀鲁豫边区各界参观团赴冀南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的情况

刘东明

1940年11月，冀鲁豫边区（鲁西南、鲁西北尚未合并的冀鲁豫边区时期）党政领导决定组成一个各界参观团，赴冀南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他们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参观团很快组成了，并开了会。

## 一、参观团的组成人员

| | | |
|---|---|---|
| 刘法尧 | 团长 | |
| 白映秋 | 副团长 | 冀鲁豫日报社长 |
| 何青峰 | 成员 | 政府方面 |
| 张如理 | 成员 | 公安局 |
| 姚恒光 | 成员 | 边区总会（农总） |
| 梁伯祺 | 成员 | 边区妇联（妇总）（因身体不好，行军至南乐县东某村时留下来） |
| 唐秀卿 | 成员 | 边区妇联 |
| 刘东明 | 成员 | 边区青救总会（参观团党支部书记） |

## 二、参观团的任务

参观团组成后开会时，领导上指示，冀南根据地建设得很好。学习他们工农青妇组织建设，政权组织建设，民兵地方武装建设，还有防奸和锄奸的经验等等。参观团的活动方式，视冀南的形势，

由冀南区党委决定，可以分也可以合。安法乾同志指出，冀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各方面经验都要学习。冀南区党委去年还派过一个参观团到我们这里，现在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学习怎么活动，由冀南区党委安排。

## 三、赴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经过

参观团组成后，正赶上"南下支队"（讨逆石友三叛军部队）二十四团要回冀中领棉衣。部队有几个团，赵承金为司令员，谭××为政治委员，又简称为赵谭支队。南支是二十四、二十一、二十团，这些部队大部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子弟兵。二十四团回冀中，一定要经过冀南地区的。这样，我们参观团就跟随该团行动，由该团护送我们参观团，我们也就成了该团的一部分，和团直属队一起行动。

我们出发了，行军是经过清丰县、南乐县，达到大名县东郊、龙王庙东北一片村庄住下。住下后进行了整顿，准备了干粮，并简单地动员要经过敌占区，今后几天都要夜行军，白天睡觉，当时所到附近村庄住了许多部队。后来知道有山东的兄弟部队，还有华北民军的一部分。一天下午，通知准备渡卫河。

夜里，月色朦胧，我们部队到了袁湾村西边、卫河东岸，脱衣服渡水过河。当时集中在河边的部队很多，还有一些马车、担架等。当我们脱衣服时，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过河了，听到一些喊声，人呼马叫，十分乱杂，渡河部队序列是山东友军先过（后来听说是徐向前将军的部队），开始时很有秩序，速度也较快。当轮到我们二十四团和华北民军一团渡河时，出了问题，由东西两岸上打下的木桩子动摇了，中间系的一根粗绳子也断掉了。渡河部队的指战员是拉住绳子渡水过河西岸，这样绳子一断，许多人被激流冲下去了。因为经过调查测量，只有那个地方水浅，不到1米深度，而下边10多米处水深都在2米以上了。被激流冲下去的同

志，凡不会游泳的许多同志被淹死而牺牲。因为许多同志没有思想准备，尤其不会游泳的同志。会游泳的同志被冲下去后，除了受点寒冷外都会游出来的。华北民一团的文政委就是被水冲下去而牺牲的。后来据说华北民一团牺牲的同志多一些，还丢失了许多法币和药品，损失不少。

我们参观团的唐秀卿同志在快要渡到河西岸时，绳子断了，被激流刚冲下时，被我抓住用力将她推向西岸，白映秋同志也用手拉她，才上了岸，救了她这个不会游泳的。正当渡河出了问题的时候，盘踞在下游小滩镇的日军、伪军出动了几辆汽车，沿着河西岸的公路大堤攻击而来。因为渡河的部队多，渡河的时间又长，人喊马叫，灯光闪闪，被敌人发觉，而来攻击，我们的阻击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出击。因为是夜间，敌人很快退回据点里。

渡过卫河之后，一直穿过敌占区或接敌区，夜间行军，白天睡觉，因系大部队行动，住宿营地都是一片村庄。一般日伪军和小据点是不敢袭击大部队的。经过两个夜行军，达到南宫县东南一个村庄住下。这里就是根据地，早晨已看到儿童们在站岗、放哨，还听到了抗日救亡的歌声。

二十四团的首长向我们告别，他要我们到北边的小刘庄（？）找"太湖"（冀南区党委的代号）。我们很快找到了区党委机关所在地，接待我们的是区党委副秘书长李世英同志和组织科长李光禄同志。我把组织关系交给李光禄同志，他当即对我说，都是党员同志，就便利参加党的重要会议了。

## 四、参观活动

李世英同志除了安排我们住宿生活外，还安排领导同志的接见。刘建章同志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讲了话。之后，各系统领导人接见并介绍经验。分头介绍经验是由代表团成员代表的方面分别进行的。我是代表边区青救总会的，故由冀南青救总会的领导人

藏育生同志接待并介绍经验。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辛明出差不在机关，又安排到附近村庄了解青救组织情况、活动内容等。着重了解青年组织建设情况和青年的特点，如何发挥青年先锋作用问题。听了介绍和下去看了两个村庄所得到的印象是：青年组织形式、儿童团的活动和边区的差不多，但没有冀南村、区、县组织健全，青年干部也比较多。还有青年组织的垂直性强，独立性大。青年武装组织名称不一样，但其任务和领导关系大体相同。冀南区青总会领导机关还出版一个青年工作的专门刊物——《冀南青年》。我当时写了一篇稿子：《叛军魔爪下的边区青年》，内容是揭露叛军石友三枪杀边区青年的暴行，登载在《冀南青年》上。

经过几天的分散和小集中的活动，又回到了机关。这时，辛明同志也回来了，和我见了面，谈了话。代表团的成员也都回来了，又集中讨论参观的心得和了解的情况。同时，还通知我们先后出席了两次重要会议。我们听了当时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同志的报告，听了刘建章同志的形势报告；还有宋任穷政委和陈再道司令员的讲话等，使我们参观团的同志受到了教育，提高了对抗日战争长期性艰苦性的认识。经过了以上这些活动，代表团已基本完成了任务。我们回来前还开了欢送会，代表团参观学习任务就基本结束了。

## 五、满载而归，安全归来

代表团是分别分散回来的，所以其时间不一，但都安全。只有因我是支部书记，区党委组织科长李光禄同志叫我带的文件太多，一大包10多斤重。他指定我从冀南区党委通向冀鲁豫边区的地下交通路线走，还派一同志送我至馆陶县北一个村庄地下站，把我交给地下站的负责同志才回去。站里同志说，附近伪军里边，我们的工作很好，过河没有问题，我们自己控制有船只，要等黎明时，等人到齐才能渡河。黎明时，站里一位负责同志带我

们几人一起过河，由他撑船，我们四五个人谁也不认识，都是自己同志，都是由站上送过河的。我们上了船，由站上郭同志撑篙，快到达河对面河岸时。突然有一队巡逻的伪军沿河而来，喊叫船只开过去。撑船的郭同志当然不听他们的，他们开枪向船上打来。船上的几个人和撑船人都很紧张，因为虽然此时船离对岸仅有几米远了，但我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郭同志用力很快把船撑到东岸，伪军打了些枪，幸而没有打中一个人。郭同志对我们说："快走吧！再走几里路就安全了。"我们上了岸，走不了几里路朝霞已挂在东方的天空上。我按照指定的路线，又找到地下站，就安全了。经过大名县、南乐县、清丰县的广大村庄，我终于到清丰县西南沙区抗日根据地，到达总会机关了。

经过了几天休息后，我们代表团的成员都回来了。我向青救总会汇报了参观学习的经验和心得，姚恒光也向总会作了汇报。成员们也各自在各系统进行了汇报。经过参观活动，了解到冀南青年活动和民运工作都搞得很好。他们的组织建设比较健全，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很有生气，根据地建设中的政权建设也很好，县、区、乡和农村的政权也比较健全，征粮和各项战勤工作都很好。据介绍，叛军石友三被赶跑后，乡村的政权很快就恢复起来，发挥了职能作用。听了报告也了解到德石铁道上的"交通战"也很紧张，武装斗争在接敌区也很激烈，日军还不断地进行"扫荡"，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

一九八九年三月

#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
# 纪登奎同志在鄄北

**常 邦 国**

1942年的秋天，鄄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日伪军不断向我中心区“蚕食”，大小“扫荡”非常频繁；旱灾严重，军需民食遇到很大困难；特别是减租减息政策没有认真贯彻，广大农民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严重影响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了扭转这种险恶的局面，县委决定坚决贯彻执行边区党委的指示，紧缩机关，抽调大批干部下到农村第一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鄄北是冀鲁豫边区中心区的南部屏障，是反“蚕食”斗争的前哨阵地，打好民主民生斗争这一仗，不仅对鄄北根据地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而且对保卫冀鲁豫边区中心区，粉碎日军的“蚕食”政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纪登奎同志来到了鄄北。

纪登奎原任冀鲁豫边区青救总会的组织部副部长，抗联成立后，调任二分区（即运西分区）抗联分会组织部长。他到鄄城后参加县委，参与对全县民主民生运动的领导，然而，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在农村搞重点。我的家乡旧城集，又是他搞重点时间最长、最成功和影响最大的地方。

我认识纪登奎最初是在1941年冬天，地点是在边区中心区青救总会驻地，当时我在鄄城中学（后改为运西中学）任学生会主任，到边区青救总会去是为了参加成立边区学联的筹备会。纪登奎主持了这次会议。

他到郵北后，先在杨屯搞民主民生运动的试点。1942年的12月间，我曾特意去看他，他让我介绍旧城集阶级关系的情况，并说杨屯试点即将结束，县委准备把旧城集作为全县重点，工作组不久就要移师到旧城去。

1943年的春天，春节刚过，以纪登奎为主，包括县抗联主任陈东升、六区区委书记阎迎瑞以及辛晓村、黎明等同志在内的工作组就进驻旧城。他们分街负责，纪登奎在前街，就住在我家里，使我有机会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耳闻目睹了许多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壮观场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将旧城作为全县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重点，是纪登奎精心选择的。旧城是一个有800多户、3000多人的大集镇，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声势大，影响也大，可以对整个郓北的民主民生运动起推动作用。同时，旧城处于郓北根据地的西部边陲，是对敌斗争的前沿地区，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便可有力地支援联防前线的西刘楼、七里庙、周桥、杨屯等一带村庄的对敌斗争，对于巩固郓北根据地的西部屏障，打击敌人的进犯，进而把民兵联防线向南推进都有重要的意义。

工作组进村之初，纪登奎就强调要认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决定斗争策略。他亲自找许多人谈话，开了许多座谈会，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了解到旧城集人多地少，贫农多，佃户、雇工少；贫农要求翻身迫切，而佃户、雇工顾虑较多；村政权前台多为“街棍”，而后台则多为地主恶霸，长期帐目不清，群众怨气很大。根据这些特点，他决定斗争从反贪污反恶霸入手，适当时机结合减租减息，以便迅速发动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农民革命大军，避免过去只动员少数佃户、雇工搞减租减息，陷于孤军作战、冷冷清清的局面。以后斗争的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在反贪污反恶霸斗争初战告捷之后，随即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这时佃户、雇工的阶级觉悟大为提高，

在农会的支持下，胆子也大了，他们理直气壮地向地主、富农清算，地主富农再也没有人敢于抗拒或搞明减暗不减的把戏了。减租减息斗争一经发动，便势如破竹，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在发动群众组织农民阶级队伍方面，他强调自下而上的发动，改变过去某些地方所采取的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工作方法。他率先垂范，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在前街他发现和培养了任金玉、张俊山、常邦才、肖金家等一批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再去串连发动其他农民群众。这样，使农民队伍像滚雪球似地迅速壮大起来，起初先建立了一些农民小组，条件成熟后就公开成立了农会。

在发动组织群众的过程中，他始终抓紧阶级教育这一主要环节，用访苦、开诉苦会和揭发地主恶霸剥削压迫群众的事实，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群众起来斗争的自觉性。同时，他也很重视保持农民阶级队伍的纯洁性。当发现原来的假农会主任×××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时，他就领导群众彻底揭穿其阴谋诡计，将其清除出农会。后来又发现新的农会干部×××暗中与地主勾结，他又采取断然措施，带领群众揭露批判其严重的错误行为，并当场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这样，使农民阶级队伍得到纯洁，战斗力得到提高。

纪登奎十分重视对群众进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教育，他反复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讲解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分化孤立顽固势力的原则，强调在斗争中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强调在斗争中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人不骂人；强调打击面不要过宽，对一般守法的中小地主、富农不要乱斗乱罚；对斗争对象，在其低头认罪，接受处罚之后，也要留有出路，争取其抗日。他曾亲自找守法地主孙在兹及牌长常邦信等当地中上层人物谈话，做争取团结他们的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

在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方面，纪登奎强调大胆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放手让骨干分子去组织指挥，放手让群众上阵去讲理、斗法，而他自己在斗争大会上从不出头露面。他事前努力做好准备工作，力争战则必胜，但也不怕失败，一旦斗争受挫，便引导群众总结经验教训，重整旗鼓，奋起再战。

他善于把握战机，一旦条件成熟，便迅速动员群众，掀起斗争高潮。由于前街形势发展最快，斗争首先从前街开始。在举行了控诉大会和大示威之后，由农会出面找旧村长邢大汉算帐，发现帐目漏洞百出，便追查到管帐先生、地主分子郭思义身上。经过一番斗争，郭低头认罪，并接受了罚粮罚款处理。接着，后街、东街的斗争也相继展开。在后街斗争了邢耀品，在东街斗争了旧村长赵海宴，并追查到管帐先生仪茂立，对他也作了斗争和处罚。在各街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又联合起来成立了旧城总农会，统一领导全村的斗争。

正当群众斗争初步展开的时候，一天夜晚，孙在朝院子里突然爆炸了两颗手榴弹，后经查明是孙的老婆搞的鬼。孙的老婆平时勾结坏人，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称之为“女霸王”。在群众运动面前，她心怀鬼胎，恐慌万分，故勾结坏人，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以此威胁群众，并企图将工作组吓走。在群众的检举揭发下，她原形毕露，由农会主持召开了大规模的联合斗争大会。在群众强烈的要求下，我政府依法将其判处死刑。当时的《冀鲁豫日报》在头版头条以《旧城集千人控诉女霸王》为题发表了这一消息，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时隔不久，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一天夜里，地主高连明的打谷场上，其佃户×××被人残酷杀害，经群众揭发与公安人员的侦察，查明杀人主犯就是地主分子高连明。原来在减租时，高连明强要佃户将分走的粮食再偷偷送回给他，佃户不从，高连明由此怀恨在心。后来高连明又调戏佃户的姐姐，佃户大怒，

扬言要与高连明算帐。高连明则先下手为强，伙同其表弟，乘夜将佃户杀死。案发之后，群情愤激，又召开了数千人的联合斗争大会，揭发控诉高连明的残暴罪行。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我政府依法将其处决。

经过大大小小的许多斗争会，农会声威大振，人们的精神面貌及社会风气也大为改观。贫苦农民一改过去自卑自弃的精神状态而扬眉吐气了，广大中农也迅速改变过去观望态度而积极向农会靠拢，一些过去为地主跑腿的“街混子”，也多次找农会干部赔礼道歉，要求允许其加入农会。此时，地主、富农分子精神都很紧张。当工作组刚进村时，他们满不在乎，他们看纪登奎年轻，轻蔑地称之为“通讯员”，看陈东升衣服破旧，便称之为“老伙夫”，扬言说：“过去来多少大官，都没能损我们一根汗毛，一个通讯员，一个老伙夫能办成啥事？”经过几次大的斗争，他们如雷击顶，惶惶不安，开始有的收买积极分子，有的分散财产，有的逃之夭夭。经过一番工作，他们也迅速发生分化，有的低头认罪，听任处罚，有的表示作守法户，拥护政府，为抗日贡献力量。

纪登奎十分重视重点村工作与一般村工作相结合。在旧城集农民斗争浪潮的推动下，周围村庄的贫苦农民迅速觉醒，跃跃欲试。有的主动找工作组或旧城农会干部，请求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斗争。此时，纪登奎不失时机地决定：用“派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发动周围村庄的农民起来斗争。他多次派旧城的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分头到北关、老宅庄、聂庄、赵庄等村去找贫苦农民搞串连发动，并请周围各村的积极分子来旧城参加农会的一些活动，以后发展到共同举行示威和联合斗争大会，使民主民生运动由一点发展到一片，一时形成处处集会、村村斗争的形势，斗争高潮此起彼伏。每当夜晚，都可听到四面八方传来集合开会的钟声、哨声、激昂雄壮的革命歌声和口号声。在一些斗争大会上，苦大仇深的农民沉痛的控诉伴随着伤心的哭泣，充分的讲理伴随着愤

怒的斥责，此情此景，动人心弦，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群众长期埋在心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封建统治被摧毁，顽固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旧城集及其周围村庄的民主民生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民主民生斗争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纪登奎及时地抓紧进行建党、建政和建立各群众团体的工作。

经过一番激烈的阶级大搏斗，涌现出一批政治觉悟高、道德品质好、工作能力强、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这就为建党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纪登奎亲自主持和具体部署建党工作，把一些发展对象组织起来上党课，指定干部做具体的组织发展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发展了一批质量很好的党员，党支部也先后在各街建立起来，而后又建立了全村党的总支部。党组织一经建立，很快便成为全村群众斗争的领导核心。

在地主恶霸所操纵的村政权被摧垮之后，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局面。但这毕竟是一种过渡状态，经过一番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之后，纪登奎及时地抓紧进行村政权的改造工作。他反复向群众讲解改造村政权的重要性，帮助群众考察物色村政权的干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选举产生了正、副村长及村政委员会，设置了民政、财政、文教、公安等部门。从此，村政大权便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了。

整顿和发展民兵，是纪登奎所一贯重视的。先前，旧城也成立过模范班和青抗先，但那是旧村政权为应付我们而成立的，人员少，素质差，没有什么战斗力，且部分枪支还直接掌握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民主民生斗争开展以后，纪登奎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下决心选派一批在斗争中涌现的优秀分子充实到民兵队伍中来，将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清洗出去，同时选派优秀党员担任民兵的领导骨干，将民兵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新的民兵组织，肩负着支援联防前线、参加对敌作战的任务，同时也积

极维护社会治安，镇压恶霸地主的破坏活动，民兵成了党组织手中的斗争工具和群众运动的坚强支柱。

运动开始，大多数农民青年、妇女都参加了农会，儿童们也跟着父、母、兄、姊用各种方式参加了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这种单一的形式，已不能满足广大青年、妇女和儿童的要求。此时，纪登奎便提出建立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的问题。他认为经过斗争，青年、妇女、儿童们的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他们特殊的利益和要求，需要用适合他们特点的方式进行活动，因此建立他们的独立组织是十分必要的。根据纪登奎的意见，旧城的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很快建立起来。这时，青年、妇女、儿童们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他们不但在以农会为主的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且在维护他们特殊利益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此外，还发挥他们的专长，在学习文化、搞文艺宣传活动、拥军优抗、参军支前等方面都特别活跃，成为一支英气勃勃的生力军。

旧城集民主民生斗争的胜利，对全鲁北的群众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有力的推动。县委对旧城的工作十分重视，县委副书记白桦同志亲自到旧城考察和总结经验，并向全县各区推广。县委还于1943年麦后的张苏尹楼举办农村干部、党员训练班，由李夫主持，纪登奎是主要讲课人之一。我当时参与了训练班的工作，聆听了纪登奎的报告。他根据旧城集工作的经验，理论联系实际，讲得有声有色，听者无不为之振奋。他还将旧城斗争中如何发动组织群众、如何开展斗争、如何掌握政策和策略等问题，编成了四言长篇诗歌，读起来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便于大家记忆和传播（此长篇诗歌底稿，他赠送给我，可惜在解放战争期间遗失了）。

与旧城集的斗争相呼应，其他区重点村如杨老家、杨河口等地的斗争，也相继展开。重点带动一般，由点发展到面，短时

间内，民主民生斗争的烈火以燎原之势，席卷整个鄄北。

民主民生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大生产运动迅速展开，军需民食得到有力的保证。参军参战高潮风起云涌，“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情景动人心弦。人民武装迅速壮大，对敌作战捷报频传。从此，彻底摆脱了鄄北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

区党委、地委对鄄北、旧城的民主民生运动十分关怀，不断派人来考察了解情况。边区各新闻单位也常来人采访，《冀鲁豫日报》等报刊时常发表鄄北有关运动开展的消息和经验。特别是于1943年麦收前，地委书记万里同志来到旧城，仔细地听了纪登奎等同志的汇报，召集部分村干、积极分子座谈，然后作了重要指示。他对旧城集民主民生斗争的成绩和经验作了充分肯定，并提出进一步巩固斗争成果和发展胜利的意见，这对旧城集的干部和群众是很大鼓舞。

为了全局工作的需要，区党委于1943年秋天将纪登奎调离鄄北，先后派往一、四分区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去开创新的斗争局面。

在鄄北期间，纪登奎与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特别是与旧城的贫苦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不但领导群众进行了胜利的斗争，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了对群众的热爱。他关心群众的疾苦，发现谁家有生活、疾病等方面的困难，便尽力想法帮助解决。当见到老人行路艰难，便上前去搀扶，有时看到天真活泼的幼儿，便抱起来亲一亲。而群众对纪登奎也产生了喜爱的感情，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为了他的安全，一些群众在夜间自动为他站岗。当看到他工作繁忙，深夜不眠时，一些群众便悄悄给他端汤送馍。当他奉调远离时，许多群众热情相送，依依不舍。在此后的许多年月里，他先后调往河南，调往中央，还常有人打听他的消息，谈论他当年在鄄北的往事。当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后，鄄北广大群众都深感悲痛和惋惜。

# 苏鲁豫边区（湖西）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回顾（节选）*

郭影秋　郝中士　陈璞如　秦和珍

苏鲁豫边区地处苏鲁豫皖4省边境，紧靠津浦、陇海铁路干线交叉点之战略要地徐州，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鲁西根据地的屏障，是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连接太行山区和延安的重要通道，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人口近千万，境内河流纵横，东滨微山、南阳、独山、昭阳4湖，水面180万亩，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沃野百里，交通方便，物产丰富，素有"丰沛收，养九州"之称，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但由于长期在反动统治下，人民受尽封建剥削，经济落后，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紧迫，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革命历史的各个时期，党的领导十分重视这个地区党的建设和发展，领导并坚持了公开与秘密、武装与非武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尤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是敌顽我激烈争夺之地，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这一地区党的领导隶属关系及管辖范围，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亦几经更迭。抗日战争前，徐州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先是隶属徐海蚌特委，后为苏鲁特委领导；鲁西南地区党组织隶属山东省委领导。抗日战争开始后，于1938年7月，徐西北工委和鲁西南特委合并为苏鲁豫特委。1939年5月，建立苏鲁豫区党委（亦称山

---

* 本文原载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公室冀鲁豫小组编《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一集，第1—45页。

东分局第五区党委），辖湖边、鲁西南两个地委；萧（县）宿（县）永（城）、金（乡）嘉（祥）巨（野）和沛县3个中心县委及丰县、单县、砀山3个直属县委共22个县，这是该地区所辖范围最大时期。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后，为适应斗争形势变化，山东分局于1940年11月3日决定，将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1941年7月，从鲁西划出归山东分局领导。1942年10月，又从山东划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直至冀鲁豫边区撤销，平原省成立。这一时期所辖地区陆续调整，东抵津浦铁路，西至菏（泽）商（邱）公路，南起陇海铁路，北达济（宁）菏（泽）一线，主要包括：丰县、沛县、铜北、砀北、沛滕边、金乡、鱼台、单县、成武、嘉祥、巨野、曹县、济（宁）南等10余县，人口约350万，大部位于南阳、独山、昭阳、微山4湖以西，故称湖西地区。

苏鲁豫边区（湖西）的党和人民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写下了艰苦曲折、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的光辉史迹，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

现就湖西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的斗争历程，作一简略回顾。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br>抗日救亡团体的兴起

1937年8月，国民党设立第五战区，李宗仁到徐州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辖苏鲁皖3省。李来后，随即建立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聘请苏鲁豫皖的知名人士担任委员。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以地方名流身份被聘为总动委会委员。特委秘书郭影秋担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总动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战勤部。我们利用这一合法组织，一方面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同时，向基层选派大批党员参加各级动委会，掌握实际领导权，

组织了职工抗日联合会、农民救国会、妇女联合会、青年救国团、儿童救国团等各界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宣传、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青年救国团设总团部，刘剑、唐秉光（唐君照）先后任总团长。我党以总动委会名义在徐州举办第五战区青年训练班，培养训练干部，共办了两期，约600多人。第一期有300人，其中30多名党员，其他为青救团员。训练之后分配到各县组成民众动员工作团，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到1937年底，铜山、丰县、沛县、萧县、单县、鱼台等县相继建立了县动委会和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萧县开办抗日训练班，仅韦道口、路套、醴泉3个区就训练骨干500余人；沛县举办抗日救国训练班，先后受训的有千余人；单县办3期约500余人，培养了大批青年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这就出现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对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培养干部、组织抗日武装起着很大作用。

同时，各地来徐州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艺术团体和著名抗日爱国人士，都与苏鲁豫皖特委及其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里的党、团组织取得联系，如中华民族救亡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北平移动剧场、上海歌咏队、上海话剧演出二队、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等，相继来到第五战区活动。不少团体中有我党的组织、党员和进步人士，如电影演员张瑞芳、金山、王莹；音乐家冼星海；共产党员荣高棠、杨易辰、张振寰、武衡等；社会名流有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张金铎等。积极开展演出活动、讲演活动，对于动员和宣传群众，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组织抗日团体、训练班、宣传队的活动中，上级党及时派从延安学习和临汾军兵团回来的干部苗宗屏、尹夷僧、赵前等，还有平津来的赵勉、苏刚、周亚明等到各县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7月，金乡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发起成立金乡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推举国民党县长郑发经担任主任，共产党员耿荆山担任总

务长。9月，金乡县县委直接发动组织建立了农民救国会、民众动员委员会，并动员了李旭、李如炎等一批青年去延安抗大学习。同年8月，济宁民先队成立了济宁学生抗敌后援会，发展会员80多人。10月，扩大为济宁各界抗敌后援会，共产党员刘庆珊从济南回到济宁主办了《济宁抗日新闻报》，组织了募捐活动，支援慰问抗日将士和难民。11月初，山东民先总队到济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动员当地的一些地下党员、民先队员、进步青年学生约五六十人，分批去延安、徐州、泰安等地，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工作。同年10月，在鱼台县中心支部发动组织下，成立了鱼台县抗日救国运动委员会，由共产党员马霄鹏任名誉主任，郭耕夫任副主任。

同一时期，对国民党各县县长或武装部队利用各方面关系，联合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派出干部到其部队或政权部门工作，如对沛县冯子固部，丰县黄体润、董玉珏部，砀山蒋嘉宾部都进行了大量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对各县社会贤达、开明人士加以联络，他们是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如单县的朱筱舫、朱鸿铎、金乡的杨汉章、鱼台的聂峨亭、丰县的王茂岭、刘铬盘、沛县的张天易、砀山的孟仰陶等，都对当地开始发动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从济南失守到徐州沦陷前后的时期，日军大举南侵，国民党地方官吏纷纷逃避。鲁西南、徐西地区暂偏安一隅，我党的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发展，由几十人发展到千余人，由秘密转向公开，各地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建立，群众抗日自卫团纷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发展，为湖西地区抗日武装的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 湖西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 人民义勇队的组成与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沛县、丰县、铜山、萧县的党组织在积极发展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同时，于1937年11月先后举办农民游击训练班，培养组织武装骨干。在夏镇，抗战前的党员郑安良、张云海利用国民党区长白赤霞组织夏镇保家自卫团的机会，打入其内部，使自卫团成为我党掌握的抗日群众武装。单县党组织了抗日自卫团，举办抗日训练班，也为建立抗日武装准备了群众条件和骨干。

1937年底，郭子化、张光中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在徐州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处取得"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利用这一合法的名义，在微山湖两侧的沛县、夏镇、薛城一带发展抗日武装。早在1935年夏，中共苏鲁特委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在沛县首先建立党的地下武装，在特委宣传委员张光中的具体领导下，筹集长短枪十五六支，组织了地下武装，在微山湖西岸昼伏夜出组织武装夺粮斗争，处决叛徒、特务，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到抗战前夕，这支武装发展到五六十人，成为发展抗日武装的基础。

1938年1月，日军大举南侵，韩复榘拥兵10万不战而退。4日，日军侵占兖州、曲阜、泗水。5日占领邹县。11日攻陷济宁……鲁中南大片国土沦陷。中共邹县县委毅然举起抗日武装起义旗帜，在邹西南亢阜、冯家庄一带数十个村庄组织建立"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冯起任团长，彭建华负责政治工作，约200人枪，活动于邹西、济东、兖南一带。2月5日，刘星、陈伯衡、曹志尚等在汶上、嘉祥一带发动100余人武装成立"汶上县

人民抗日自卫队”。2月15日，金乡县工委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与金乡董楼开明士绅董元的武装汇合，共100余人，40支枪，编为“第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由陈笃卿、董元分任正、副司令，马霄鹏任政治部主任，耿荆山、王鉴览、翟子超分任组织、宣传、民运干事。

**创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

1938年2月，日军炮击夏镇，形势紧张，张运海、郑安良、王志成率沛滕边抗日自卫团三四十人，转移到湖西沛县宋庄，与张光中领导的沛县抗日武装汇合，共100余人。3月，正式成立“抗日义勇队”，张光中任队长。5月17日，即徐州沦陷的前一天，根据苏鲁豫皖特委的指示，由张光中带队过湖到达滕峄边的滋里、北辛一带，与褚思沛、褚耀斌、褚子方等在张阿、沙沟一带发动的抗日武装会师，合编为抗日义勇队第一大队，约300余人，谢文秀任大队长。

1937年12月，李乐平、王贵池、于公、渠玉柏、王思欣等在滕县东部组织农民抗日武装，至1938年5月，发展到150余人，编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大队，于公任大队长，渠玉柏任教导员。

1937年8月，朱道南、刘景镇在峄县二区组织邹坞乡农学校起义，建立“鲁南抗日自卫团”，约100余人枪。随后，枣庄矿区部分青年相继参加，队伍有了发展。至1938年3月，日军进犯滕县时，自卫团曾配合滕县守军在城前作战。3月18日，枣庄被日军侵占时，自卫团在郭里集一带，配合川军四十军与日军战斗两天，随后即转移到鲁南山区的大北庄，与郭致远、褚雅清、邱焕文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五六十人）在峄县西北的墓山会师，合编为抗日义勇队第三大队，共350余人，朱玉相（后叛变）任大队长，季华任教导员。此时，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工作人

员，以及其他零星武装也编入该部。

1938年5月下旬，苏鲁豫皖特委调集上述各部队在墓山以北的凤凰庄、南塘一带汇合，正式成立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特委委员兼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任政委，韩文一任参谋长，李浩然任政治部主任。全总队（包括直属机关及宣传队）共600余人。这支部队以后主要在鲁南山区活动，归属鲁南军区。

抗日义勇队成立之初，就在党的领导下，奋勇开赴前线，积极开展游击战、破袭战。在台儿庄会战时，我刚成立的义勇队二、三大队，依靠滕峄边山区，南袭临枣铁路，西破津浦铁路，破坏敌人的主要运输线。为阻敌进犯徐州，义勇队曾夜袭临枣铁路、公路，白天在邹坞附近公路北侧伏击敌辎重部队，取得毙敌数人，缴获满载军用品辎重车辆、军马4匹的胜利，使义勇队声威大振，鼓舞了鲁南、湖西人民的抗日斗志。

## 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的组成和大发展

张光中率第一、二、三、四大队在湖东、鲁南山区活动为第一总队；湖西地区新发展起来的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建成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当时，各县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筹集枪支。1938年6月13日，在徐西北区委和鲁西南特委的领导下，调集丰县、沛县、铜北、萧北、砀北、鱼台及金乡、单县等地抗日武装在丰南城南渠楼宣告成立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任政委，郭影秋兼政治部主任，张如任参谋长。下辖从五大队到二十三大队，共千余人。7月下旬，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成立苏鲁豫特委，王文彬任书记，由郭影秋接替王文彬兼任第二总队政委。从此统一了湖西地区党和武装的领导。第二总队下属大队及领导人为：

五大队（沛县大队），苗宗藩、郝中士；

六大队（丰县大队），李贞乾、康文彬；

七大队（砀山大队），孟宪琛、孟宪理；

八大队（单县大队），王华瑞、高文甫；

九大队（丰北大队），渠时湘；

十大队（曹县以西），王石钧；

十三大队（金乡大队），耿荆山、翟子超；

十七大队(萧县大队)，季恩(十五、十六大队并入十七大队）

十八大队（萧铜大队），孙象涵、顾寒星；

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这4个大队，于1939年2月，自萧、宿来陇海路北活动，编入苏鲁豫支队四大队。带队人分别是王香圃、汪怀九、丁禹畴、王凤舞、许智远、吴信容；

二十三大队，韩方元、杨海天；

三十一大队，鲁雨亭。

第二总队成立后，各大队向敌伪展开英勇斗争，先后在马良集、黄庄、华山、河口、旧城等地重创日伪。其中黄庙战斗中，我义勇队十七大队的5名队员，暗携枪支，伪装群众送礼，巧妙地进入黄庙敌据点，将日军1个小队全歼，缴获轻机枪1挺，三八式步枪18支。捷报频传，鼓舞了湖西广大人民纷纷参军，义勇队很快发展到约5000人，成为坚持湖西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

沛滕武工队（亦称湖上游击队），是一支具有丰富的湖上武装斗争经验的精干部队，运用公开武装斗争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控制着横跨微山湖两岸的交通要道。为加强地下交通线，保证华东、华中和中央的联系，地委决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完成。

建立秘密交通线——从湖边的大捐村到泰山庙，经华庄、朱新庄、霍楼、魏吴庄，到达湖西丰县的大刘集、小刘集。这是一条秘密交通线，必须通过敌伪和顽军占领区，但却安全、可靠，因

为沿途均有我党组织和秘密武装。同志们常备不懈地进行护送、掩护、情报和保卫等工作。在一般情况下，均能顺利通过，完成任务。在湖边中心县委所在地大捐村，有县委机关及著名的小五队（短枪武装）队长李耕川；到泰山庙、华庄、朱新庄、霍楼、魏吴庄等，这些地方都有党员负责，如胡玉岭、孙廷选，过了魏吴庄就到湖西地区丰县大刘集、小刘集，即安全进入了根据地。这个时期，华中、华东和中央的联系，主要依靠这条秘密交通线。在最艰苦的时候，从湖东到湖西一夜进军100多华里才能到达根据地。涨水时微山湖水面宽40华里，护送和交通工作一直完成得很出色。刘少奇、陈毅、朱瑞、陈光、肖华、李林等领导同志，以及延安、山东、华中的大批干部的往来，曾经过这里。1942年7月间刘少奇同志过湖时曾指示："要保障鲁南与延安大后方的联系，加强微山湖湖上交通的控制。"这条微山湖区的秘密交通线，于1943年5月，受到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的嘉奖和中央军委电报嘉奖。

由于抗日义勇队迅速扩大，出现了以我为主的抗战局面。国民党地方势力惶惶不可终日时，不得不依靠我们。我们先在萧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在其他地方也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把一部分南逃的国民党官员挽留下来，仍让他们掌握政权，这是当时"只抓武装，不要政权"的失误。1938年7、8月间，我们与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丰县县长董玉珏、丰县常备队队长黄体润、砀山县长窦雪岩等，先后建立了以我为主的5县联防办事处及抗日联军等组织，并由二总队、丰常、冯子固部胡子良团各派出一个连，组织对陇海线的联合出击。此外派了大批干部（党员）到这些国民党部队进行工作。但由于当时党的领导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明确的认识，未能抓住有利时机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至后来在工作上造成一些被动。

正当湖西抗日武装斗争扩展的时候，曾干过旧军阀师长的王

献臣部纠集一部分土匪武装盘踞在丰县北部扰害人民，暗中与日军勾结，不断向我挑衅。为了除此大害，在义勇队第二总队统一指挥下，以丰、沛、鱼三县联防办事处名义，联合冯子固、黄体润等部出兵2000余人，于1938年9月间，组织了讨王战役，将敌包围，群情振奋，斗志很高，在战役进行中并有新参军战士，后因将临冬季，缺少棉衣、粮食，弹药供应困难，激战21天，主动撤出战斗。

1938年11月间，山东分局电令，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

## 恢复“肃托事件”的创伤 为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和恐慌。皖南事变发生后又接连掀起反共高潮，频频向我发动进攻。尤其1941年以来敌、伪、顽合流，不断向我根据地“蚕食”、“扫荡”，在敌、伪、顽夹击下，我湖西根据地日趋缩小，成为“一枪打透”的根据地，湖西地区的斗争进入最艰难、复杂、激烈的阶段。我党坚定地领导湖西广大抗日军民，在友邻地区部队的支援下，团结奋战，坚持不懈的斗争，正确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巩固建设敌后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政策和法令，开展了精兵简政、武装建设、减租减息、民主建政、生产自救等运动，加强了党的建设，逐步恢复“肃托事件”的创伤，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粉碎了敌、伪、顽、会、匪的联合夹击，终于渡过了难关，为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1、在罗荣桓、郭洪涛同志处理湖西“肃托事件”后，为稳定局势，进行恢复整顿工作，决定重建苏鲁豫区党委，暂仍由白子明任书记，常委郝中士、郭影秋，委员刘剑、孔真，所辖地区缩小。

1939年12月，恢复建立了金乡县委，秦和珍任书记；鱼台县委，张子敬任书记；丰县县委，先由康文惠、后由王效斌任书记；单县县委，任子健任书记；沛县中心县委，鹿渠清任书记；并恢复沛滕边、砀北、铜北、邹西、滕西等县的县委组织。

1940年8月，山东分局派潘复生同志到湖西接替白子明的工作，因路经微山湖受阻，随同一批干部在沛滕边领导湖区反顽斗争。经山东分局批准建立湖上5县工委，潘复生任书记，组织部长李文，宣传部长李剑波，下辖沛县（书记李广德）、沛铜（书记李振扬）、沛滕（书记黄天明）、邹西（书记丁平）、滕西（书记生碧泉）。

11月3日，山东分局决定将苏鲁豫区党委改建成湖西地委，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由潘复生任书记，郝中士任组织部长（1941年初陈璞如接任组织部长，郝中士改任宣传部长），郭影秋任统战部长，李贞乾任专员，鹿渠清任民运部长，刘剑任青年部长，赵玉琴任妇联主任，白新才、赵金才负责工会工作。这时湖西地区以单东为中心区仅辖单县、沛县、丰县、沛铜、砀北、金乡、鱼台、单西南、沛滕边等10县。

1941年1月由潘复生同志主持召开了湖西全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了山东分局负责同志关于处理湖西“肃托事件”的指示，并决议恢复整顿党组织，实行合理负担，发动群众等事项。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经过组织整顿，基本上恢复了从地委到县、区党的组织，并进行整顿支部工作，加强地委党校工作，轮训了大批党的干部，各县都开办了训练班，轮训党员，以提高其战斗堡垒的作用。

2、贯彻山东分局关于民主建设的指示，总结前段建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正确地开展了建政工作，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1939年12月，鱼台县政府成立，李贞乾任县长。1940年3月24日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推选吕英为县长。1940年4、5月

间，单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孟静之代理县长，随后正式选举高文甫任县长。1940年6月23日，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选举王效斌任县长。1941年4月15日苏鲁豫边区宪政促进会在金乡宣告成立，选举孟仰陶、朱德三、郭影秋为常务驻会代表。并决定组织边区参议会，改善政治机构，民选各级政权等提案17起。同年秋，在单县朱油坊召开参议会，推选郭影秋任参议长，杨汉章任副参议长。同时，正式选举成立湖西专署，李贞乾任专员。至此，湖西统一了行政领导，为加强政权建设有了个良好的起步。

3、苏支南下，黄河支队接替苏支到达湖西，对坚持湖西地区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进行地方武装的整顿、发展。1940年6月5日，苏鲁豫支队奉令南下华中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湖西地方武装再次充实主力部队。区党委警卫营及鱼台县刚发展组建起的一、二、三大队全部编入苏支南下新区，从湖西输送的指战员共8000余人。此时，地方武装力量甚为贫弱，经过整顿大力发展县、区武装，至年底全区约有近3000人的武装力量。

黄河支队是4月30日在鲁西改编而成的，支队长彭雄，副支队长邓克明，政委张国华，政治部主任欧阳文。下属3个团：一团由一一五师独立旅一团改编而成，约2000人，团长李金铎，政委戴润生；二团由一一五师独立旅二团改编而成，约1500人，团长匡斌，政委刘仁贵；三团为八支队编成，不满千人，团长芦迪，政委刘星。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掀起反共高潮，铜北千里井惨案，是铜北国民党保安团长耿继勋部在湖西打响的军事反共的第一枪。1939年11月21日，耿继勋纠集顽固派武装五六百人，配合丰、沛顽军，夜袭包围我铜北办事处驻地千里井。我部队及机关人员仅200余人，仓促应战，英勇反击，血战一夜，终因寡不敌众，除少数突围外，大部遇难，20余人壮烈牺牲，百余人被俘。办事处副主任阎树棠、财经股长贾廷祯、警卫连指导员周立生等惨遭杀

害。

1940年3、4月间，国民党投降派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部，被我冀南、冀中、冀鲁豫部队讨伐追击，逃窜至曹县、单县边境，唆使十一专区专员朱世勤充当反共先锋，扣留我采买人员，杀害我辛羊区区长，并向我蔡溜驻军进攻。苏北各顽军亦向西逼进，大有对我夹击之势。在此形势下，苏支于4月29日向顽军展开反击，在王小庄侯楼、张庄一带，全歼朱部刘测灵旅2000余人，并将刘击毙，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迫使苏北顽军不敢轻举妄动而暂守中立。

在苏北由于国民党新任苏北专员、特务头子汤铁飞的阴谋策划，6月13日沛县顽固派县长冯子固下令将五区区长李剑波(中共党员)撤职，取消我五区政权，沛县的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组织群众万余人游行示威向县政府请愿，冯子固令其部队向群众开枪，杀害了工会干部朱恒新。同时，包围我沛县警卫营，屠杀我党政军干部和抗日群众，酿成“六一三”事件。丰县常备队黄体润部也乘机侵入我根据地边沿，在丰北便宜集和孙庄一带修筑据点。此时，我派入胡团和“丰常”的干部也被迫撤出。

黄河支队到达湖西，为了打开局面，惩罚顽军，于1940年6月14日拂晓，对驻孙庄、便宜集的“丰常”顽军发起进攻，一团迅速攻下便宜集，毙俘顽军千余人；二团因未与“丰常”内部我党组织取得联系，以致一日进攻6次未克。黄昏，顽军大部突围逃窜，仅俘顽军100余人，我伤亡200余人，我乘势攻克丰县西孙庄顽据点，俘200余人。

这一时期在反顽军事斗争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斗争的策略上是有失误的。有单纯的军事观点，错误地选定丰县常备队作为打击重点。那时朱世勤已公开通敌，又与石友三勾结向我进攻，与我统战关系已完全破裂，而铜北耿继勋制造“千里井惨案”有待惩罚，冯子固、黄体润虽已向我挑衅，但苏北顽军与朱世勤之间

也存在着利害冲突。据此暂时不打苏北顽军，采取集中力量打击朱世勤部，则对我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而我却先打击“丰常”黄体润部，因此，反而加速了苏北顽军与鲁西南朱世勤的反共步调渐趋一致，使我处于四面对敌，分兵把口，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非常被动的局面，根据地也日渐缩小。

在这一艰苦、困难、复杂的斗争境遇中，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稳定局势，站稳脚跟，开展建设、巩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调整统一战线及军事斗争策略，采取了“稳定苏北、打击鲁西南”的方针，缓解和打开了斗争的局面。

1941至1942年，是侵华日军最猖獗的时期，也是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湖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

4、坚持十字河地区的斗争。（略）

5、根据形势的变化，地委决定开展敌占区工作，建立徐北中心县委，加强地下党工作的领导。（略）

6、巩固中心区，开辟新区，发展游击区工作。在单东、金南、丰北、巨南等中心区，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以消除“肃托”带来的严重影响，解除党内党外的思想疑虑，增强创建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信心，开展以合理负担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整顿群众武装和农青妇组织，加强各级党的领导，于1941年夏组建曹芳(县)工委，书记李克，办事处主任丁禹畴；单虞（县）工委，书记丁涧桥，办事处主任孟静之。加强开展根据地和农村党的建设工作，在巩固党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农村党员。1942年8月，根据刘少奇同志到湖西时的指示，广泛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组织工作队，以单县王小庄一带、丰县便宜集一带和曹芳王寨一带为重点区发动群众组织斗争，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改善农民生活，随之各县区乡普遍展开，群众的发动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发动群众中发展和整顿农村党的组织，加强了抗日武装的建设，发展了民兵组织，这

对于巩固抗日根据地和中心区，开展各项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开始注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工作，整顿税收，建立工商机构开展贸易工作，向敌占区购进药品、食盐、布及部分弹药等物资，以支持抗战的需要。

巨南泛指巨（野）、菏（泽）公路以南，巨、菏、嘉、成、金、定6县接合部，东西百余里，南北六七十里，为湖西与鲁西连接的通道，开辟与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40年8月中旬，运河支队奉鲁西军区的命令，曾到巨南开辟工作，营里集、贾庄战斗消灭了一部封建武装，并打垮巨野出动的日军，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黄河支队三团于1940年秋末，由郓（城）、鄄（城）边开进巨南，因杆子会活动甚烈，部队一边宣传瓦解争取会众，一边在大刘庄一带挖沟筑寨，防敌进攻。12月，金乡日伪军千余人突然包围我大刘庄，三团顽强抵抗激战终日，毙伤日军200余人，打击了敌伪嚣张气焰，而后转至湖西，部队整编后编入教导四旅十团。这些战役坚定了群众抗日信心，打下了开辟巨南工作的基础。

1941年初，教三旅九团，由曾思玉率领再次南下巨南，掩护配合地方干部开展工作。2月下旬鲁西区党委和行署决定成立巨南工委和巨、菏、金、嘉、成5县联合办事处。由杨海鹏代理书记，不久改由颜竹林任工委书记，杨海鹏任组织部长，王探丽（谭立）任宣传部长，牛连文任办事处主任，吴克任副主任。

在此期间，九团曾于5月1日打退金乡日军100余人、伪军200余人的奔袭。昌邑集的战斗，击毁坦克1辆，杀伤日伪军30余人。随之部队以营为单位协助地方党政工作人员到接敌区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争取地方上层势力，配合地方建立县区政权，深入开展群众工作。于1942年初，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巨南划归湖西地委领导，辖区未变，裴志耕任地委（常委）工委书记兼九团政委，地委调去一批干部加强巨南地区开辟建设根据地的工作。

7、平息会道门暴乱的斗争。由于我斗争策略的转变，对丰、沛顽军争取其中立，而鲁西南朱世勤部却于1941年6、7月间利用我地方工作中征粮过重、破路频繁、铲除鸦片烟苗有强迫命令现象等，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组织反动会道门无极道（亦称红枪会、杆子会），煽动群众反对我党我军和抗日政府，企图以此破坏我抗日根据地。他们以“反挖路、反征粮”的口号蛊惑煽动，成武（以田集为中心）、单县（以陈满庄、曹马集为中心）、金乡（以鲍楼为中心）共3县50余村，纠集万余会众暴动。8月2日，金乡城南会众5000人，包围我驻冯庄的金乡抗日县政府，杀害我干部数人。同时单县龙王庙一带的会众也蠢蠢欲动，金乡日军也指使羊山一带的会众出动配合。湖西地区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地委、教四旅的领导决定采用以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双管齐下的方针，迅速平息暴乱。经教四旅十一团赶赴金南冯庄，打垮会众，解金乡县政府之围；十团也配合地方武装在樊庙、盛楼一带扫平会众之乱，乘胜转向黄庄、杨家庄一带进击，先后经5天7次战斗，配合政治宣传，会门瓦解。被骗群众纷纷逃散回家。会首田生水等被活捉处决，骚乱迅速平息。

8、巨南讨顽（孙良诚部）战役。（略）

9、1941年，党政地方工作，以军事工作为中心，进行党政军组织整顿、扩军、组织部队整训升级，组织群众武装。加强农村党的建设，发展党员，整顿支部，取得了很大成绩。加强党对军事工作领导，规定县委设军事部长兼任县武装科长及县大队长。区委军事委员兼任区中队长。支部的军事委员兼乡军事干事或乡分队长及乡村自卫团正副团长。1941年春，经过3个月的发动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全区共组织了525个村自卫团，共计10868人。自卫团担负起站岗放哨，维持地方治安，打击敌伪及顽固分子，并能经常配合县区武装作战。此外，全区组织起上百个游击小组，配合基干武装破路、割电线、骚扰敌人。这一时期，全区县、区

武装及地专警卫武装经过整顿共约2000余人，为主力部队补充、扩军、升级先后输送约1300余人。1942年底为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和对敌斗争，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至1943年，在对敌斗争中民兵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各级都建立了自卫团领导机关，从18岁至45岁的青壮年组成自卫团，共有5万余人。民兵蓬勃发展，妇女儿童站岗放哨、通讯联络，互通情报，形成"平原人山"全面抗战的形势，配合主力和武工队打击敌人。如枣庄区中队和民兵配合主力十一团，取得全歼日军1个小队的胜利。

10、粉碎日军12月"扫荡"。（略）

11、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加强城市和敌工工作。（略）

12、文教事业的兴办、发展。抗日初期，兴办了《团结日报》，1940年底改为《湖西日报》，收录新华社新闻，及时在湖西根据地传播，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战斗消息，阐述各个时期湖西地区的斗争形势，宣传、团结人民，唤起抗日斗争的热情，鼓舞人民革命斗志。

湖西中学于1940年冬筹建，李贞乾兼任校长，刘尹斋任副校长。1941年3月正式成立，任命杨经元为校长。先后举办8期，毕业学员约千人，培养新生力量，扩大干部队伍，以适应发展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在根据地内举办党校和青年、妇女等各种训练班，为抗日战争培养各种人才。各县、区、乡小学教育工作普遍开展，在校学生近万人，并举办各种识字班、冬学，以加强成人和学龄儿童的教育，普及提高人民大众抗日文化、军事知识及政治思想水平。开展抗日民主政策的教育，以广泛团结抗战力量。团结剧社、火线剧社演出抗日活报剧和进行各种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活动，对开展部队文化、教育工作，对鼓舞斗志，对活跃根据地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苏鲁豫边区(湖西)具有战略位置的特殊性，它是连接华中、山东到冀鲁豫太行、中央的必经通道，又地处徐、济、商、菏等敌之重兵据点的接合部，威胁津浦、陇海干线，而使敌我斗争愈加激烈、频繁、残酷。湖西地区的党和人民继承先辈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发挥了战略地位的重要作用。

这一历史的回顾，着重于1937年至1942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的敌进我退阶段和进入相持阶段的简略概述。1942年底，根据党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将湖西地委划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在冀鲁豫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曲折复杂的斗争，伴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夺取了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的胜利。

# 回忆冀鲁豫边区人民在淮海战役中的支前工作*

韩哲一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后，刘伯承、陈毅同志于1948年12月21日由淮海战役前线途经冀鲁豫边区，去河北省西柏坡村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路过单县时分别题词，对我区支前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誉。刘伯承同志的题词是："冀鲁豫人民为完成解放战争的胜利，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还是努力于支前工作，十分难得，特致敬佩。"陈毅同志的题词是："胜利在望，继续作战，继续支前。"英雄的冀鲁豫人民没有辜负两位老总的最大褒奖和鼓励，胜利地完成了淮海战役以及以后的各项支前任务。

## 一、冀鲁豫是个好战场

冀鲁豫边区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共有1469万多人，4000多万亩耕地。它位于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5省的接合部，处在泰山、太行两大山岳腹地，平汉、陇海、津浦3大铁路干线中间，黄河、京杭大运河呈十字形纵横穿流其中，是联接华北、华中、中原3大战略区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1925年开始，我

* 本文最早发表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河南党史研究》（1988年2—3期）上，摘自《战勤工作资料选》，黄河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390—404页。

党就在这块土地上点燃了革命的火种，轰轰烈烈的农民、盐民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时高时低，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使抗日的烈火燃遍冀鲁豫大平原。在八年抗战中，冀鲁豫边区的人民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正当边区人民在我党领导下，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之际，蒋介石却在全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内战，巨大的灾难又降临在人民头上。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爆发后，冀鲁豫边区西部和东部的平汉、津浦线，成为国民党军北犯我华北各解放区的主要运兵线；边区南部的陇海线，成为国民党军东西往返调兵的大动脉；边区之间的黄河，则是蒋介石大作文章的地方，他于1946年提出的所谓黄河战略，就是借黄河归故之名，行以水代兵之实，妄图淹没我华北解放区千百万人民，并企图以重兵肃清黄河以南地区的我军，达到其确保陇海线，集中用兵于山东解放区的目的。这便在客观上决定了冀鲁豫边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御敌北犯的南大门，是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也是我军高度机动作战和转入外线作战的基地。

在解放战争初期，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压境的黄河南岸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在黄河归故问题上，与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挫败了蒋介石以水代兵的阴谋。与此同时，我区地方部队配合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仅在淮海战役之前的两年时间里，就在边区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濮滑、巨金鱼、豫皖边、豫北、鲁西南、沙土集、豫东等20多个战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冀鲁豫边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尚未得到很好恢复的情况下，力排万难，勒紧裤带，全力支援了解放战争。战争头两年，全区除动用浩繁的人力、畜力和物力，进行了复堤治黄、破道挖路以及后方勤务外，仅支援战役行动，就动用人工6517万多

个，畜工658万多个。济南战役前，黄河以南的二、三、五、七分区，支前民工即达39.5万多人，平均每个整劳力出工78.7个，支前时间占总时间734天的10.7%。邓小平同志称赞说："冀鲁豫是个好战场，到哪里都有饭吃，都有翻身农民的支援。"的确，冀鲁豫人民是尽了最大努力，支援了前两年的解放战争的；是克服着严重困难，竭力支援了淮海战役的。

## 二、数十万民工、担架队随军出征

淮海战役，是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和豫皖苏、冀鲁豫、江淮、豫西、陕南等军区部队参加，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自临城，南达淮海，方圆几百里的广阔地带进行的。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我军首歼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切断徐蚌线；继歼黄维兵团于预设战场；再歼杜聿明集团军于逃跑途中。整个战役历时65天，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国民党投入战场的7个兵团和两个绥靖区的部队，共80多万人，被我歼灭了5个兵团和1个绥靖区的部队，计22个军，56个师，55.5万余人，其中包括4个半师，2.3万余人起义。至此，长江以北的残敌纷纷溃逃，我军基本上解放了华东、中原地区，使华北、华东和中原3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进至长江北岸。

淮海战役有两条主要战线：一条是我野战军和地方部队的前线作战；一条是人民群众的后勤支援。我军参加此次战役的部队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36个师，42万余人；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20个旅，13万余人；豫皖苏、冀鲁豫、豫西等军区部队5万余人，计60余万人；加上民兵、民工等，在前方的总人数达150余万人。每天消耗食粮、畜料约350万斤至500万斤。这么多的军队和后勤人员，云集在如此广大的战场上高度机动作战，通

常须在很短的时间里，将众多的人力、大量的物资集中于某一地区，需要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草料和军用物资的供应，有伤病员的抢救护理和后方转移，有人抬车推的交通运输的保证，以及后方安全的保障等，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工作，是难以办到的。为适应战役的需要，华东、中原、豫皖苏、冀鲁豫四大战略区的人民，都做出了最大努力。

淮海战役前，冀鲁豫边区就开始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准备工作。9月间，区党委根据上级意图，向下属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具有历史意义的淮海战役即将开始，我区党政军民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足够的准备，尽一切人力、物力，完成艰巨复杂的支前任务，以保证战役的彻底胜利。"10月中旬，区党委、行署召开后勤会议，对支前工作所需柴粮油盐、被服鞋袜、弹药棺木的准备，对车辆、担架、民工的动员，对公路、桥梁的修护等，一一作了详尽的研究和周密的布置。根据中央军委11月9日的指示，区党委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支前工作，并抽调大批干部，充实了冀鲁豫边区战勤总指挥部。此时，战勤总指挥部由刘致远任司令员，袁子扬任副司令员，韩哲一任政治委员。区党委再次明确由他们共同承担冀鲁豫边区支援淮海战役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

淮海战役打响后，冀鲁豫边区所属黄河以南、陇海路以北地区，成为淮海战役主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指示我区，主要负责在这一地区作战的华东野战军三纵、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所辖两个独立旅的粮食供应，以及全部战勤支援。我区数十万经过短期集中训练的、成建制的常备民工、担架团，按时随军出征，开赴前线。时逢秋末，细雨连绵，广大支前人员不畏道路泥泞难行等困难，在数百里战场上，日以继夜地给我军运送给养弹药，转运伤员。

勇敢的担架队员们，在火线上冒着枪林弹雨，舍命抢救伤

员。在途中，他们不休息，不睡觉，甚至忘掉吃饭，尽快将伤员早日送进了医院；在夜间，有些担架队员情愿冒风受寒而将自己携带的被褥、大衣给伤员盖上，使伤员睡暖睡好。六分区担架团班长王兰彬同志在卫家河战斗中，带领两副担架冲过敌人的机枪封锁，接连抢救了9名伤员。东明县一副担架，在转运伤员的途中，遇到敌机尾随扫射，他们4人护在伤员身上，1人受伤，掩护了伤员的安全。黄河以北六、八分区两个担架团，有担架队员3500余名，随军转战3个多月，行程7000余华里，抢救转运伤员近万名，使伤员及时得到了住院治疗。

英勇的运粮民工们，积极响应"保证前线吃饱穿暖"的号召，冒着敌机的轰炸和炮火威胁，日夜不息地把粮草、弹药、被服和鞋袜等运往前线，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 三、紧急筹集1.05亿斤小米赶运前线

随着战役的顺利进行，战场的迅速扩大，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下，并肩协同作战。到12月间，因为部队频繁的调动、参战人员的剧增、战场的移动，前后方越距越远，出现了支前物资一时接应不上的情况，如何保证作战部队的供应，便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这时，华东、中原野战军已进入豫皖苏三分区战场，吃粮人数约在120万人以上，加上马匹等消耗，实际相当于140多万人需要食粮。每人每天以食2斤加工粮计算，每日需要加工粮280多万斤，1个月即需要加工粮8400多万斤，折合原粮1.1亿斤。战役从11月初至12月中旬，已进行了1个半月。如果还需要进行3个月，那么，尚需要加工粮2.94亿斤，折合原粮3.085亿斤。当时，数九隆冬，天寒地冻，运输线延长，供应单位分散。南战场围歼黄维兵团和阻击李延年兵团的我军，就有11个作战单位；北战场围歼邱清泉、李

弥、孙元良3个兵团的我军，有13个作战单位；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位于亳县以西，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位于古饶、符离集一带。加之气候影响，运输艰难，还必须使每个部队备足1个月的过冬粮，才能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这么多部队需要粮食，分别由冀鲁豫、豫皖苏、山东、华中等地区筹集起来，并由支前民工用小车推、担子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不停地赶运到战地，确实是一项非常困难和十分繁重的任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粟裕同志于12月15日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应有一个支前机构，在总前委的直接指导下，统盘运筹，解决粮食等供应中的复杂问题，并建议召开一次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4方面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中央军委于12月20日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如刘伯承、陈毅同志尚未动身去西柏坡，请邓小平同志考虑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讨论今后3个月的粮食供应，弹药补给，交通运输及其他有关后勤支援问题；并指出：如你们认为有开联合支前会议的必要，即由你们直接召开华东、华中、中原和冀鲁豫4方面支前代表会议，商讨解决有关问题。淮海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由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部长刘瑞龙同志负责筹备和召集这次会议，主要研究解决统一调节中原、华东野战军的粮食供应，几个地区支前工作的协同配合，继续作战中的支前准备工作，以及我军南进时的支前机构等问题；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张震同志，后勤部长刘瑞龙同志，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政治部长张雨帆、粮食部长张劲夫、人力部长魏思文、财政部长程照轩同志，豫皖苏行署主任杨一辰同志，苏南行署负责人方毅同志，江淮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同志，华中行政办事处主任贺希明和副主任李干臣同志，冀鲁豫行署副主任韩哲一。

联合支前会议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刚解放的徐州召开，刘瑞龙、傅秋涛同志轮流主持会议，就战役后期大围歼战中的军需问

题、民工组织、人力和物力使用、其他后勤工作等问题，作了统盘安排，与会地区和单位分别承担了筹运粮食、出担架、派车辆及收容伤员等任务。我在会上汇报了冀鲁豫区前段支前情况，说明已供给淮海战役前线小米500万斤，华北局决定我区继续支援前线的小米为1亿斤。为保证战役胜利，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其他均按会议决定执行。会议结束的当晚，刘瑞龙、方毅、张劲夫等同志和我骑马赶到前方总指挥部，粟裕同志接见了我们，并交待了战勤支援工作的具体任务及要求。尔后，我急速返回，向冀鲁豫区党委作了汇报。1月10日，邓小平同志对徐州会议作了"我完全同意该会所作决定，请即依照执行"的批示。区党委据此召开紧急会议，认真讨论和研究了这项重大任务的组织领导，决定由冀鲁豫区战勤总指挥部负责，按地区分配我区所承担的支前物资，规定运输方法等，并在会后逐级进行了动员。

华北局于11月下旬责成冀鲁豫区调拨1亿斤小米火速南运的命令，我们已布置下去。华北局还决定我区筹运部分粮食，支援平津战役，我们增加了靠近淮海战役南线各专区的任务，免得将来南粮北运，过多增加劳力负担。此外，在陇海路以南的地区，我区支前民工所需柴草，也由我们自筹供应。冀鲁豫区战勤总指挥部对如何运粮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各专区必须在1至1个半月内，把1亿斤小米运到陇海铁路沿线各粮站和屯集点。其中，二专区的2000万斤运至马牧集，三专区的1400万斤运至黄口和李庄，五专区的1000万斤运至朱集子，七专区的1000万斤运至砀山，四专区的700万斤运至开封，八专区将昆吾、尚和、濮阳3县的600万斤运至民权，六专区的2500万斤和九专区的800万斤分别由陆运或河运运到济南。如果我军移动，追击敌军，再由各粮站负责转运、跟运上去，确保部队需要。徐州会议决定，由我区负责从鲁西地区运粮1000万斤到涡阳、蒙城和阜阳一带，供应中原野战军作战部队；由已运到开封至黄口间的6700万斤粮食中，第一批

拨送2000万斤，第二批拨送1050万斤，给华东野战军北线部队和徐州、砀山的休整部队。根据会议要求，我们又调整了运粮计划，给二、三、五和七专区，就是黄河以南地区，增加了1000万斤的运粮任务，并具体确立了嘉祥至砀山，巨野至砀山，郓城至马牧，鄄城至马牧，聂谷堆至民权5条运粮干线，明确了各干线所承担的运输数量，避免了运输拥挤的问题。各专署分别于12月上旬召开各县指挥长、财政科长、仓库主任紧急联席会议，落实了筹集粮食、设置粮站等事宜，并号召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作出最大努力。

任务下达后，冀鲁豫全区立即行动起来，筹集粮食。后方机关为完成这一任务，每人都自动减少了食粮数量，改吃粗粮。黄河以北各专区、县、区、村，由党员、干部带头，展开了广泛地筹粮碾米热潮。六专署首先提出了“快筹、快碾、快交、快运”的口号，并创造了由专署筹发统一粮袋到村，写明县、区、村的经验，其好处是，每袋粮食数量一样，便于统计和检查，战勤总指挥部推广了这一经验。大部分区、县因为每个村只有一两盘碾子，群众怕误了时间便划成小组，在碾子上轮流碾米，在场地上挖坑轮流舂米。没有牲口的小组，就全用人推碾。八专署在布置到县区村的3天内，就碾米104万斤。寿张县东金斗营村接受的是4000斤的碾米任务，4天时间便碾好5000斤小米。该村还领取了300条装米布袋的缝制任务，村妇女会主任张秀英同志，组织妇女小组连夜挨家按市价收购足布匹，次日全村妇女连裁带缝，半天就做齐了。在碾米运米中，这个村的干部还分了工，有的收米，有的派车，有的装载，用300条口袋、7辆大车，以最快的速度将5000斤小米运往前方。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黄河以南地区的广大群众，连年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蹂躏，生活极为困苦。当听到淮海战役前线大捷的消息，他们欣喜若狂，主动把藏粮从地洞里扒出来，连夜碾米、舂米，圆满完成了筹运粮米的任务。

在筹粮碾米热潮中，有200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起了"半边天"的作用。黄河以南的妇女，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筹粮碾米任务下达到齐滨县二区时，各村男女老幼争先恐后地碾米、舂米。大家边碾米边唱歌，欢天喜地，像过年一样。有些妇女的手磨出血泡不肯休息；有些儿童忘掉劳累，推着碾子睡着了。该县妇女还想出了用新砖搓米，用磨盘上扇拐米等好办法，加快了碾米任务的完成。曹县五区后张庄村70多岁的翻身妇女张秀英，土改分得11亩地，过上了好日子。她见村里装米急需口袋，便把新媳妇做的新被子剪开做成了口袋装米，并对儿媳说：前方用米当紧，咱在家怎么都好对付，等打倒蒋介石，咱再不用趴豆棵了，不愁没好日子过。

到12月14、15日，各县都先后开始运米。运米一般以区为单位，组成班、排、连、营，不分昼夜地运往前方。巨南县堂村区是新解放区，群众刚从敌人的长期残害下解放出来，支前积极性特别高。他们将分到的30万斤米，分3批用5昼夜的时间就运完了。曹县、齐滨、复程等县，在12月底以前亦都完成了运米任务。全区在运粮中，涌现了很多护粮模范。安陵集梁玉家有两辆手推车，运粮中途蒙蒙细雨下个不停，他们怕把米淋湿，便将自己穿的棉袄脱下，盖在米袋上，说："棉袄淋湿了还可以晒干，米要淋湿了，就不好吃了。"他这一举动对运粮民工启发很大，不少人用被子、棉袄盖在米袋上，保护了军粮。

冀鲁豫边区在淮海战役支前工作中，除保证供应了粮草、弹药、担架、棉衣和鞋袜外，在筑路修桥、充当向导、补充兵员等方面，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整个战役期间，冀鲁豫区先后共出动民工30余万人，计人工5850多万个，畜工1243万多个，担架1万多副，大小车15万多辆，筹运小米1.05亿斤，每村每户每人都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尽了力。在淮海战役的后勤战线上，展现了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

## 四、几点值得汲取的经验

英雄的冀鲁豫人民和兄弟战略区的人民，为什么能以分散的、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支援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用扁担、手推车、石碾创造了奇迹呢？这里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

首先，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战略方针的正确，对支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统盘安排。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一向注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有后勤的可靠保证。淮海战役发起之前，毛泽东主席就指出，要充分做好后勤工作。战役发起之后，中央军委于11月9日指示华东局、中原局和华北局要备足130万人3至5个月的食粮、弹药等物资，以及10万至20万伤员的转运治疗工作。为搞好这项工作，周恩来同志派杨立三同志专门负责后勤，协同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长刘瑞龙同志和中原野战军后勤部长刘岱峰同志筹办后勤事务。战役进行之中，党中央又在西柏坡召开了关于淮海战役后勤业务的专门会议，由华东、中原野战军以及有关军区的后勤部长参加，周恩来同志主持，毛泽东主席作了详细具体的指示。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和淮海战役总前委的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都直接指导了战役的支前工作，淮海战役总前委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了战役支前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充分估计到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可能条件，把人力、物力和财力科学地组织起来，建立严格的节约民力、节约粮食的制度，做到有计划地调度和合理地使用粮食；支前是长期任务，要作长期打算，直到全国解放；坚持自力更生，以战养战，耕战互助，公私两利，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把土改、生产、支前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动员教育人民等。正因为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淮海战役总

前委对支前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调度，才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其次，是党的政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自觉自愿地支援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当人民将自身的最大利益和战争的最高目标联系起来，看清支援前线是他们最根本利益之所在，便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支援战争中去。这主要来自正反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8年底，冀鲁豫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土改和土改复查运动，确定了地权；黄河以南地区，则在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开展了分田、保田、保家的群众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生活有了保障，阶级觉悟空前提高，从思想上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打倒蒋家王朝，才能真正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因此，便自觉自愿地积极踊跃地担负起了支援前线的各项工作，直至全国解放。

另一方面，蒋介石军队惨绝人寰的暴行，把人民群众逼得走投无路，人民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死里求生。解放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先是要水淹我华北地区的千百万人民，冀鲁豫边区人民则首当其冲；继之国民党屯兵于冀鲁豫黄河以南地区，对我解放区实行彻底破坏和战略摧毁，无恶不作。仅在1946年9月至11月，国民党军队就在湖西地区的11个县，杀害群众1.1万多人，湖西人民在这3个月里蒙受的损失，超过该地区八年抗战所受损失的总和。鲁西南地区2/3的村庄、房屋被烧毁。敌人暴行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人民便成了埋藏蒋家王朝的掘墓人。

第三，是不惜以局部的代价，换取全局的胜利。局部事小，全局事大。如果只从或是多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或是少从全局利益出发，不但有损全局利益，而且局部利益也保不住。反之，全局好了，局部也跟着好了。正因为这样，冀鲁豫区党委、行

署、军区和群众团体，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全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反复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动员和巨大的组织工作。经常讲形势，讲利害，号召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识大体，顾大局，情愿为全局利益牺牲局部利益，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要求农村党员和干部带头参军、参战，防止特务、地主破坏活动，安定后方秩序；要求军队中的党员要勇敢作战，执行命令；要求工厂、兵站、医院中的党员，要带领群众，紧张工作，多造枪炮子弹，尽快治愈伤员，保证前方供应；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大力完成战争动员和扩军任务等，从而使全区党政军民明确认识到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树立了必胜信心、全局观念和自力更生、长期作战的思想。同时，全区以支前工作为中心，把土改、生产和支前结合起来，在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和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注意了科学地支配战区与非战区的力量，尽可能使负担平衡合理，既不使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又保证支前力量不致枯竭。为此，区党委始终重视抓紧生产，坚决改变了单纯地取给、就地供应的办法，建立了强有力的统一支前机构，切实实行了合理负担和节约，有计划地动用支前力量，认真组织支前人工与生产人工合理交换，广泛动员妇女和半劳力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并给缺劳力的军属代耕代种，做到了生产和支前两不误。在努力增产粮食的同时，还建立了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严禁虚报冒领和浪费粮食，保证了粮食的供应。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华东、中原、华北 3 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废除了贸易禁运，统一了货币，加强了市场管理，促进了物资交流。各解放区互通有无，进一步发展繁荣了冀鲁豫边区的经济。这就为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提供了越来越雄厚的物资基础。

第四，是在军事队伍发展建设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建设好战勤队伍。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之所以能够克敌制胜，就是因为有根据地作依托，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军事力量是随着群众力量的发

展而发展的。所以，冀鲁豫边区的战勤组织，并不是在淮海战役期间才成立的，而是一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起来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人民就从事了许多支援前线的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战争规模愈来愈大，冀鲁豫区又是主战场之一，支援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便成了我区当时各项工作中心的中心。1946年7月20日，冀鲁豫区党委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的指示，组建了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由行署主任段君毅同志兼任司令员，军区副政委赵健民同志兼任政治委员，人民武装部部长乔明甫同志兼任副司令员；各专署也相应地建立了分指挥部，由各专署专员兼任指挥长；各县、重要村镇则设立了兵站。在战勤总指挥部成立后的一年里，先后组织支援了刘邓野战军在冀鲁豫战场上发起的十几个战役。每次战役动用的民工均不下10万人，每天供应粮食、饲料在30万斤以上，经常储备的军鞋也多达7万余双。

1947年7月中旬，鲁西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前，邓小平同志在郓城同段君毅、赵健民、乔明甫、傅家选等同志和我谈话说：晋冀鲁豫野战军南进后，华东野战军要转移到鲁西南地区作战。你们留在鲁西南地区，要随华东野战军前方指挥部行动，同鲁西南党政军民一起，为华东野战军服务。8月7日，刘邓大军从巨野、郓城地区出发，27日到达大别山区。冀鲁豫区党委除从各地、县抽调了一批干部随军南下，配合开辟中原新解放区外，由冀鲁豫区干部为主组成的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系统的大部人员亦随军南下，并就地分配了工作。为继续承担起冀鲁豫区的战勤任务，支援华东野战军转战鲁西南的作战行动，区党委、行署于1947年7月21日，决定重新组建了冀鲁豫区战勤总指挥部，由赵健民同志任战勤总指挥部司令员，后由刘致远同志接任，何光宇、秦和珍和袁子扬同志任副司令员，韩哲

一任政治委员。

自从冀鲁豫区建立晋冀鲁豫军区战勤领导机构后，我区特别注意了战勤队伍的建设。通过对历次战役支前工作的总结，逐步制定了一整套较完整的战勤工作规定、制度和办法。这是组织淮海战役如此大规模战争支前工作的深厚基础。例如总结了邯郸战役在濮阳设总兵站，在各县或每隔几十里设一小兵站，并分几条线，不停地运转伤员、粮食和弹药等经验，便在以后的几次战役中推广和应用，效果很好。陇海战役后，全区又开展了学习齐滨县长李荣村带头支前的运动，使绝大多数干部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对战勤民工队伍的建设，注意加强了党的领导。在常备民工组织中配备一定数量的党员，保证了支前队伍的素质。在支前队伍中，经常进行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通过回忆对比，使民工弄清"为谁打仗，为谁支前"的道理，提高了民工的阶级觉悟和支前的积极性。为解除支前民工的后顾之忧，我区行署和战勤总指挥部于1946年8月23日，决定切实解决支前民工的食宿等问题，规定在民工行进的路线上，每隔二三十里设休息站，每隔五六十里设宿营站；并在一些重要地区，如南乐、清丰、濮县、濮阳、郓城等地设转运站。同时，指示各专署、县政府，对参战阵亡的民兵、民工，按条例抚恤，主要干部要亲自到死者家中慰问，开追悼会，对其家属按军属待遇；对在前线负伤者，治疗费由政府报销，并给予慰劳。

1947年10月，我区战勤总指挥部具体规定，常备担架组织，700副为1个团，设团长、政委、供应部主任、供应员、会计、文书等一整套工作人员，团以下分营、连、排、班，仿照部队建制，配备干勤人员。常备民工组织，2000人为1个团，编制与常备担架团相同，对常备担架和常备民工的动员、待遇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这样，便使战勤工作纳入了有计划的统一领导，使担架团、支前民工做到了不脱产的常备化。战事一来，就能迅速

把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投入使用，大大加强了民工队伍的稳定性，适应了大兵团高度机动动作和任务多变的需要。

第五，是搞好四个结合，作到以战养战。进行敌强我弱的正义战争，更须十分爱惜民力，不因战争使人民负担过重，影响群众温饱，而要使群众在战争中，得到可能得到的眼前利益，看到长远利益，赢得群众的拥护。为此，冀鲁豫边区在解放战争中，一直坚持了部队后勤供应与地方支前，取之于人民群众与取之于部队自身，取之于我方与取之于敌方，部队打仗与爱惜民力，这四者紧密结合，尽量做到以战养战。在淮海战役期间，中原、华东野战军坚决执行以战养战的方针，用俘获敌人的大部兵员和全部武器、装备、粮食和物资等补充部队。部队还特别加强了爱护根据地，保护群众利益的教育，反对本位主义，纠正一切浪费现象，动员组织全体指战员都做后勤工作，将每人经常携带1至3天的口粮和一定数量的弹药，以及认真搜集战利品等，作为制度严格执行了。部队在作战间隙，还积极参加地方工作，帮助群众担水砍柴，打扫院室，进行生产，同群众一起搞土改运动等。我军处处关心群众、爱惜民力的优良作风，同国民党军队打骂群众、糟害人民的豺狼行为，在人民心目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大地鼓舞了新老解放区广大群众支援前线的积极性。由于前后方配合得好，党政军民协作得好，同心协力搞支前；加之把粮食等物资的后方前运、就地筹措、部队自带和获之于敌这四个方面统筹起来，进行了合理安排，因此，淮海战役结束后，为战役准备的粮食等还有不少结余，留作以后渡江、为挺进大西南之用。有一部分粮食一起带到江西、贵州，充作了开辟新解放区的公粮，减少了新区人民的一些负担。

对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是冀鲁豫边区在解放战争时期最大一次支前工作。冀鲁豫人民和全国各战略区的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从解放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将人力、物力、财力都用

上了，是全部、全力、全程的支前。在整个支前过程中，上万民工立了功，许多人被评为英雄模范，大批积极分子成长为干部，部分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在支前途中或战争前线。我们将永远怀念为支援前线而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

# 忆鄄城解放后的群众运动

宇　光　谢春风　董兴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0日鄄城解放。全县10个区，三、四、五、六区的绝大多数村庄和七区的部分村庄为老区，其余的为新区。老区群众在抗日战争中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他们的生活与生产条件急需改善；新区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长期遭受日军、汉奸的蹂躏和地主、恶霸的压榨，迫切要求翻身。根据中央指示和上述情况，地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以反奸反霸、土改为中心内容的群众运动。

## 一、反奸反霸

鄄城人民对汉奸、恶霸早已满腔怒火，切齿痛恨。鄄城解放后，他们纷纷要求伸冤报仇。新区经过自下而上的发动，普遍开展了诉苦、清算斗争，对汉奸以及与汉奸勾结残害群众的地主恶霸，依据罪恶大小和情节轻重，分别进行了处理。对罪大恶极的汉奸李明奎、孙连科和李子才、周方略等人，除没收其财产外，还先后于1945年11月与1946年5月，在城里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审这些民族败类，会上苦主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控诉，会下群情沸腾，一致要求讨还血债，依法严惩。县民主政府根据上级批示和群众要求，先后分别判处李明奎、孙连科和李子才、周方略死刑，立即执行。对一些罪恶虽然很大但当地民愤不大的人判了有期徒刑。对罪恶较轻，又有悔改表现的，从宽处理，当场释放，

体现党的政策。如城区枪决了何李庄与汉奸勾结、奸污妇女、强占人妻、行凶杀人等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李行蛟后，其他各区也都先后处理了一批汉奸恶霸。群众看到压在头上的汉奸恶霸一个个被打倒了，减少了怕“变天”的顾虑，增强了胜利信心，纷纷起来与汉奸恶霸斗争。一些小的汉奸恶霸慑于政府的政策与群众的压力，有的向政府自首，有的向群众认罪。在张殿庄据点当过汉奸的人，有的主动自首，受到宽大处理后，又现身说法，动员隐藏起来的人向政府悔过自首。反奸反霸斗争逐步深入。群众经过诉苦复仇以后，正气发扬了，邪气被压倒。

## 二、减租减息

随着反奸反霸斗争的深入发展，群众对减租减息的要求日益强烈。老区虽然进行过减租减息，但有些村庄明减暗不减，走了过场；新区群众还受着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当时的租佃形式主要有“大种地”、“三堆地”、“三七地”三种。“大种地”是对半分成，地主只出土地，耕畜、农具、种子、肥料及农业税都由佃户负担。“三堆地”是把劳动成果分为3份，两份给地主，一份归佃户；地主出土地、耕畜、农具、种子、肥料和农业税，佃户出劳力并带镰、锄等小农具，还给地主们养牲畜、打水、磨面、修房、拉粪。“三七地”是三七分成，地主分七成，佃户分三成。此外，还有“倒四六”、“倒三七”、“秋三七麦二八”和九一分成的。在债务关系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借钱，一种是借粮。借钱一般是年利40%、50%，少数是100%，个别急用钱的人按月计息50%，甚至100%。如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就“驴打滚”利上加利。借粮，有的借粗还细，有的借二还三，也有借1斗还2斗的。借钱借粮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高利贷，压得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来，甚至有的被迫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正像当时

流传的歌谣："农民身上两把刀，地租重，利息高。面前只有路三条，逃荒、要饭、坐监牢。"农村雇工的景况也不比他们好。雇工虽然一般劳力强、技术高，能挣点工资，但多不能维持全家人口的最低生活，所以他们也难逃脱高利贷的剥削。

为了铲除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剥削，从经济上解放贫苦农民，县委决定，在老区进行减租减息复查，在新区深入发动雇、佃、贫群众，开展"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的斗争。为了贯彻这一决定，各区选派得力干部深入农村访贫问苦，与雇、佃、贫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一起讨论"劳动创造世界"、"谁养活谁"等问题，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展诉苦运动。经过这样一发动，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与政策水平迅速提高，积极分子也随之增多，农会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与地主富农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由村到片逐步展开。城区（即九区）宁业村、土桥诸庄、熊楼等村开展得很好，斗争轰轰烈烈。如宁业村雇工李明朝、土桥诸庄佃户任怀启和崔广田、熊楼贫农熊春玉等，在斗争中有勇有谋，很快形成了群众自己的领袖。其他区的情况，也大致这样。在公开场合，一般都由他们出面，县、区干部从不同角度给以指导和支持。他们一般能掌握党的政策，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所以运动进展比较顺利。经过这一斗争，农村封建势力受到削弱，贫苦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促进了农业生产，政治觉悟也随之迅速提高。

为了贯彻合理负担政策，结合减租减息，还开展了反"黑地"斗争。经查对"完粮单"与实种田亩，查出了许多"黑地"。对地主富农隐瞒的"黑地"，根据数目多少和情节轻重，分别让其补交粮款或给以不同的处罚。补交和处罚的粮款，一部分交给政府，其余分给群众。"黑地"不光地富有，中农也有，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政府明确宣布，中农如有"黑地"，只要

如实报出，除以后按政府法令纳税外，不补不罚，并宣传"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道理，中农也跟上来了，逐步形成了"桃园三结义（雇、佃、贫），后续赵子龙（中农）"团结战斗的局面。在斗争中还解决了一些贫苦农民因高利贷被夺去土地而不准"过粮"继续纳税的问题。至此，多数村庄群众组织普遍建立，政权大部得到改造，群众优势初步树立起来。

## 三、土地改革

为了贯彻中央1946年5月4日《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6月下旬，县委在城里天主教堂召开了区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五四指示》和划阶级文件。会上，着重讨论了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的重要意义，坚决进行土改。并研究了土改中如何防止侵犯中农利益，对富农与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及恶霸与非恶霸实行区别对待，对开明绅士和军、工、烈属适当照顾，保护工商业等问题。当时有的同志把《五四指示》概括为"一条批准九项照顾"，就是既要坚决没收地主土地，又要注意政策。在学习农村划阶级文件中，在弄清什么是地主的问题后，着重研究了区别富农与中农的标准。明确了从解放之日起往前推算连续剥削3年、每年剥削量占全家每年总收入的25%为界，超过者为富农，不足者为中农。大家领会了《指示》与文件精神，又研究了具体做法。会后，各区一面训练骨干，进行试点，一面召开各种会议，向党员、村干和积极分子传达动员、具体部署。然后，按照依靠贫雇（包括佃户），团结中农，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的原则，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土改斗争。

首先平分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全村人口平均数量为标准（一般3亩以上）没收地主的多余土地，分配给无地与少

地的农民。在平分土地中，各地还找地主成份的开明绅士和军、工、烈属座谈，肯定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向他们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动员他们争取主动。他们中有些人，如扬河口的扬冠准、吉山的谷子惠、许堂的郭凤娥（军属）等，主动献地，把多余土地的文契拿出来，交给群众，受到了政府鼓励与群众欢迎。对顽固地主，发动群众控诉，揭发其罪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迫使他们低头认罪，交出多余土地文契和其他财物。对破坏土改的地主，依法给以严厉打击。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广大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与其他浮财，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开始崩溃。

其次，土改复查，抽肥补瘦。由于土改开始照顾较多，特别是群众发动不充分的地方，封建势力还未彻底摧垮。有的村庄，如城区赵堂，地主还掌握村政权，什么都以假的来对付我们。减租减息时他们明减暗不减，土改中他们明改暗不改。有的村庄地主多留地、留好地，隐瞒重要财物。有的村庄地主对村干和积极分子采用挑拨离间、威胁利诱、攀亲结友甚至美人计等恶劣手段，进行反攻倒算，致使土改不够彻底。同时，在分配土改的果实中，有些干部多分多占，分好地好房，引起群众不满。为解决这些问题，各地又逐村进行复查，对假土改的地方，如赵堂村，进行土改补课，派工作组进去，重新发动群众，经过几个回合，才真正分配了地主多余的土地、房屋和其他浮财；对反攻倒算的地主，除迫使他们如数交出倒算的东西外，还分别不同情况依法给以制裁；对地主多留地、留好地和一些村干部多分多占、分好地好房等问题，用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办法，把地主多留和干部多占的土地、房屋和浮财，以及地主多留和干部多分的好地、好房与其他重要财物，按平均标准抽出来，并按平均标准补给少分土地、房屋和浮财以及分坏地、坏房和其他财物的贫苦农民，使之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大致达到了平均水平。通过土改复查，取

得明显进展，但在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中，“左”的情绪又有所滋长，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都是一样坏。有些该照顾的不照顾了，该区别的不区别了，有的村给地主少留地、留坏地，甚至“扫地出门”。这种情绪，在以后的“拉锯”斗争中又有发展，失去了一些群众同情和支持。

其三，保卫土改果实，开展游击战争。从1946年10月至1948年2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我们鄄城人民7次进犯，5次“拉锯”。1946年10月和1947年7月，敌先后进犯鄄南富春一带和江苏坝等地，分别被刘邓大军围歼和被分区及县区武装打跑，未占县城。其余5次，占领了县城及一些重要村庄，都是敌驻我打，敌走我来，形成了频繁“拉锯”的局面。每次“拉锯”，敌方都有鄄城和濮、范、观、朝等县还乡团跟随，危害极大。在1946年11月、1947年3月、4月、8月和1948年2月的5次“拉锯”中，以1947年3、4月的两次为最残酷。3月敌新五军突击合围，占领县城，封锁黄河，在全县安设70多个据点。他们所到之处，无不疯狂屠杀、反攻倒算。县、区领导干部仪惠亭、彭敬修、皇甫奎一、边运民、杨东岱、董作亮、许登山等20多人，民兵、积极分子、群众领袖任怀启、崔广田等300余人，壮烈牺牲或惨遭杀害。枣寨、万全庄等村有许多积极分子被活埋，有的还活活被钉在寨墙上。许多翻身农民被赶出新房，大批土地和财物被地主倒算或抢走。在家的党员和干部家属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卫群众的土改果实和生命安全，全县军民和干部根据“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原则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方针，与敌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以县民主政府的名义出示布告，对地主、还乡团约法三章：残害干部和积极分子者杀，反攻倒算者杀，向敌人告密、指门点户和报出公粮者杀。县区武装深入内地打埋伏，掏“老窝”，彭庙、双庙、义和村等连打了几个胜仗，振奋了群众，吓得不法地主、还乡团人员失魂丧胆。如敌区长张汉杰，

险些被擒，只带警卫员一人逃窜。此外还组织小型武工队，见缝插针袭扰敌人，先后枪决了一些违犯约法三章、民愤较大的反动地主，并广贴布告，杀一儆百。如枪决了杀人、倒算的八区李庄李忠义和九区五胡同地主等，起到了威慑敌人的作用。在“百日游击”中，打击了敌人，保卫了群众。为了配合刘邓大军过河，1947年6月底前后，县委选派干部，发动群众收集、制造船只，寻找、训练船工，派人给大军带路、送情报，胜利完成了任务。大军过河后，鄄城的工作稍加恢复整顿，又继续按照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方针，在“拉锯”的空隙中，组织群众，进一步开展土改斗争。

## 四、党的建设（略）

# 我们的青年工作团*

魏　克

1938年4月，我在济南目睹耳闻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后，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为了寻找生路，父亲带着我逃离虎口，跑到肥城贺庄我哥哥魏麟甫那里。哥哥是战前入党的共产党员，当时担任地下党贺庄交通站的站长。不久，他又参加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队，跟着威震泰西的张北华同志打游击。我在哥哥的教育和影响下，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也想参加游击队，当一名抗日救国的兵。5月18日，哥哥带我参观游击队，张北华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热情地对我说："就留在这里吧！这里正在办一个青年训练班，都是青年学生，你学习一点抗日的道理，咱们一块打日本吧！"这话正合我的心愿。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一员了。

我到青年训练班，正赶上郭洪涛同志从延安带了一批干部到鲁中去，途经泰安边家院时，给自卫团留下了段君毅（董君毅）、孙光、何光宇、李国厚和张正福5位同志。他们都到青训班任教。段君毅同志给我们讲抗战形势、党的任务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孙光同志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何光宇同志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等内容。这些革命道理对于我们刚参加游击队的青年人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启蒙教育。我们除了学习政治和军事之外，还学唱抗日歌曲，这也是重要的一课，因为它大大鼓舞了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情绪。

---

* 本文原载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公室冀鲁豫小组编《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八集第130—136页。

1938年5月，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政治部把青年训练班第一、二期的大部分学员组成了青年工作团——宣传队。团主任左平，队长张有壬，袁振(袁彰武)曾担任短时间的指导员。下设三个小队。队员中有宁阳县的徐其昌、徐洁(徐其洁)、徐侠（徐其霞）兄妹三人，王琳(王全珍)、吴延敏、郑士才、朱忠心、郭军、冯连仲等；泰安县的安春华、吴静安、王照华、李若峰(李秀梅)、明旭、刘朗（刘常其）、王非（王慧芝）、张大姐和她的女儿张秀兰、张秀玉等；肥城县的孙泊(孙逢远)、尹孤萍、尹元麟等；长清的张峰（张延贵)以及济南的李瑞环和我等男女队员30多人。我们的任务是：鼓舞部队的战斗意志、担负战地勤务，宣传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以及瓦解敌伪军等工作。同时也是一所没有校址的政治干部学校，随时为各大队输送政治工作干部、工作团成立后，很快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我在6月便由张峰、徐其昌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大家的抗日革命热情很高，首先在驻边家院的部队和附近群众中展开了工作。当时工作条件很差，我们因陋就简，用苎麻捆扎成笔，把老乡的锅底灰刮下来作颜料，在各村的墙壁上刷写：“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对部队和群众教唱抗日歌曲。这里到处都可听到战士们唱着：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

战士和群众随着这些慷慨嘹亮的战斗歌声，胸中抗日的革命烈火也燃烧起来了。我们还演出小话剧《父与子》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左平、孙泊和刘朗同志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很受群众的欢迎。我们影响传出去了，各大队和各地的群众都要求我们去进行演出和宣传。6月初，我们经过村到夏张一带，向

崔子明、夏振秋、张绍三、邹筱孟、张魁三同志领导的一大队及当地群众进行宣传和演出活动，然后又到东向、高游和汶河两岸去工作。当时在这些地区的有自卫团的五、六、七大队，他们的领导人是武冠英、李正华、明光普、王国璋等同志。7月，我们到安驾庄、孙伯、张侯一带，向武麟轩领导的十三大队、赵宝树领导的十四大队和武圣域领导的十五大队及驻地群众进行演出和宣传。这时自卫团团本部移到了护鲁山口，我们工作团住在一座大庙里，每天到宁阳、汶上、东平、泰安、肥城5县交界的地区积极开展工作。接着又到肥城的安临站和大董庄，向自卫团的二、三大队去工作，这里的领导人陈经运、辛俊卿、孙士轩、乔寿青、安振田等都是我认识的人，工作更方便了。我们走到哪里，就把标语写到哪里，把戏演到哪里，把战歌教到哪里，把抗日的烈火点燃到哪里。虽然我们的条件很差，生活也很艰苦，干什么都是自己动手，走到哪里找座破庙、祠堂、学校甚至草棚住，没有被褥，就借点谷草麦秸，男女同志挤在一起，真是起来是一身，睡倒是一铺。吃饭更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筹借粮食或现成的干粮，弄到什么吃什么。大家都学会了做饭吃。同志们风趣地说："我们吃了百家饭，可以长命百岁！"不管条件多么困难，生活怎样艰苦，工作怎么紧张，由于同志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比兄弟姐妹还亲热，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受到广大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家的革命热情更高，心情更愉快，生活充满欢乐，都无忧无虑地进行抗日的宣传工作。

8月初，我们青年工作团在大董庄，见到了山东省政府巡回宣传队的同志们。他们由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不抗日，要从鲁西到鲁南去，在里面工作的党员同志，决定不随沈走，便从阳谷的张秋镇来到了泰西。在南尚任同我们团合并在一起。记得他们来的同志有队长周持衡和邹鲁风，队员有王少云、张心田、赵其麟、穆忠信、窦秀岩、阎严川、沈鸿绪、郑洵、章茂桐、宫

钧民、王麟东、赵钱孙、张力、李立和女同志王桂荣、王满、金淳、金薇、隋波和从我们团到省宣传队去的徐杰等同志。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高中学生，文化程度比我们高，合并之后，我们的工作更活跃了。在肥城三、四区工作一段以后，根据党的需要，他们多数同志调到由于会川同志领导的十七支队去了。

9、10月间，我们青年工作团在东平三区尚庄和四区夏谢地区工作时，又和东平县战地青年工作团合并了。他们来的同志有田子珍、田怀先、田仲贤、米次忠、李蕴石、孟凡九等同志。东平县土地集中，大地主多，有的大地主的土地多到挂千顷牌，甚至双千顷牌。我们住过的一个名叫响场的山村，当地群众说，这是地主为了夸耀他富，用木板铺成打麦场，板下挂满铜铃，当牲口拉着石磙在上边压麦子时，全场就响起铃声，因此而得名。群众还告诉我一个地主荒淫无耻的故事，说地主为了寻欢取乐，让使女把红绒线剪成碎片，然后从楼上撒到院子里，称做下“红雪”，再让丫环们脱光衣服，赤身扫起这些所谓的“红雪”，以求得快乐。这些残害人们的奇闻，听了实在令人吃惊。因为当时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共同抗日！”的口号，来促进这些地主们为抗日多作贡献。

我们青年工作团的生活也是充满乐趣的。10月8日，我们在东平尚庄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节。虽然当时没有酒宴，但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唱抗日歌曲，讲有趣的故事。左平同志是我们团有名的“活宝”，他讲的一些笑话，把大家逗得笑破肚子。当时刘星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晚会，他独唱了流亡三部曲，虽然这是大家常唱的歌曲，然而他唱得特别有感情，深深打动了每个同志的心。这些斗争生活都镌刻在我的脑壁上。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敌后的斗争日趋于紧张和复杂。我们青年工作团的任务也加重了。二、三大队在尚里一带同肥城出来的日军作战时，我们就到战场上做救护伤员的工作；当国民党

的光复军和荣别队不抗日，在东向同我们进行磨擦时，我们就在枪林弹雨中向他们唱《国共合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歌曲，进行喊话，宣传“共同抗日、团结对敌”的主张。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留在敌后的军队不去打日本，相反地更加紧反共，制造磨擦，在肥城撤了于会川同志的县长，派来田家斌，接着又来了山东第一行署的特派员郁仁智，他们专门进攻自卫团的部队。为了进行自卫，我们青年工作团改成教导四连，男女都编成班排，配发了武器弹药。我在一班当战士，班长是米次忠同志。他去鲁中学习，我就担任了班长。全连在尚庄进行了实弹射击，打的成绩不错，提高了大家的战斗信心。11月15日，日军攻陷聊城，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光荣战死。郁仁智的部队便乘机向驻在大峰山的四大队和十支队的机枪营进攻。为了反击郁仁智的进攻，自卫团的部队、十七支队和十支队的东进梯队都会合到大峰山，我们教导四连也连夜赶到房头，参加反击郁仁智的战斗。由于各部队同心协力，英勇作战，迅速消灭其一部，其余逃出泰西地区，我们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

1938年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曾针对山东抗日起义武装的情况指出：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成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的番号，目前可组成4至5个支队，县、区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游击队名义出现。用抗日联军名义不好（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在1938年4月曾改“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的番号）。6月8日，毛泽东同志再次电示：凡属我党领导、已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否则，各地国民党均将控制，如使用普通名义，则不得不听其指挥，甚至通令解散，八路军亦无权过问，用八路军名义则无此弊。① 根据上述指示，党所领导的泰西地区的几支部队，在反击国民党第一专署特派员郁仁智部进攻的胜利后，于1938年11月

①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299页。

26日，在长清县大峰山的岚峪地区，光荣地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司令员刘海涛，政治委员张北华，参谋主任马继孔，政治部主任李冠元，供给处长程重远，组织科长周持衡，锄奸科长辛俊卿等。六支队下辖4个团、1个特务营和各县的独立营。这些部队是以原东平、汶上的起义武装，后为范筑先十支队的东进梯队为主，加上我们教导四连，编为一团，团长陈伯衡，政治委员刘星，副团长曹子尚，政治处主任邹鲁风。原自卫团的四大队、十一大队、十七大队改为独立营后和十支队机枪营编为二团，团长曹洪胜，政治委员张谭，政治处主任魏金三。原自卫团的二、三大队和十七支队编为三团，团长于会川，政治委员李文甫，副团长刘继河，政治处主任王少云。原自卫团的十三、十四、十五大队编为泰安独立团，团长武圣域。原一大队和先锋连编为特务营，营长高特拉。加上各县的独立营总计约有6000人，成为泰西地区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我们青年工作团改成的教导四连，除调支队部和一团宣传队的外，编入一团四连。我被调到一团政治处任青年干事。当时支队青年干事唐晶、二团青年干事孙连捷、三团青年干事孙泊、独立团青年干事张延积，做朱德青年队的工作。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这是我一生值得骄傲的一天。

六支队成立后，各团立即分别开赴各个地区，大力去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我们一团进入东平、汶上和宁阳地区，二团在长清、平阴和东阿地区，三团到肥城、泰安地区，各团在各自的地区，广泛发动各界各阶层的人民，组织儿童团、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积极建设各级抗日人民政权，在工作深入开展之后，也开始了建立地方党的工作。这样一来，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在泰西各县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了，为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泰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冀鲁豫区八年抗日战争财产损失统计表

（一九四六年五月）

| 类别 | 数目 \ 区别 | 第一专区 | 第二专区 | 第三专区 | 第四专区 |
|---|---|---|---|---|---|
| 粮食损失 | 斤数 | 6484232600 | 6401592900 | 5321102500 | 4270683180 |
| | 折价 | 648423260000 | 640159290000 | 532110250000 | 427068318000 |
| 牲口损失 | 头数 | 86650 | 62423 | 36988 | 37363 |
| | 折价 | 17330000000 | 12484600000 | 7397600000 | 5265800000 |
| 农具损失 | 件数 | 122594 | 83011 | 61033 | 56485 |
| | 折价 | 6589960000 | 5372180000 | 3401300000 | 3023470000 |
| 房屋损失 | 间数 | 639580 | 495325 | 293260 | 346147 |
| | 折价 | 18701370000 | 14859750000 | 6013560000 | 10384410000 |
| 共计损失折价 | | 691044590000 | 672875820000 | 548922710000 | 445741998000 |

• 本表原载《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上），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643页。

续表

| 类别 \ 数目 \ 区别 | | 第五专区 | 第六专区 | 荷泽市 | 合计 | 说明 |
|---|---|---|---|---|---|---|
| 粮食损失 | 斤数 | 4888180200 | 16108815000 | 4135830 | 43478742210 | 1、粮食斤数均按小米计算。<br>2、折价均按本区5月间物价折成法币（鲁钞1元合法币10元）计算，房子每间合法币3万元，牲口每头合法币20万元，米每斤合法币100元。<br>3、此次损失统计，仅系农村的主要损失项目，至于被服、棉布、金属、家具、农具、树木、柴草、钱款等（包括被抢夺欺诈勒索），以及工商业、文化建设等项损失均未统计在内。 |
| | 折价 | 488818020000 | 1610881500000 | 413583000 | 4347874221000 | |
| 牲口损失 | 头数 | 35368 | 57785 | 269 | 316846 | |
| | 折价 | 7073600000 | 11657000000 | 5380000 | 61213980000 | |
| 农具损失 | 件数 | 48591 | 87222 | 233 | 459169 | |
| | 折价 | 2844070000 | 4880840000 | 12500000 | 26124320000 | |
| 房屋损失 | 间数 | 209070 | 384622 | 1098 | 2369102 | |
| | 折价 | 6057100000 | 11538660000 | 32940000 | 67587790000 | |
| 共计损失折价 | | 504792790000 | 1638958000000 | 464403000 | 4502800311000 | |

# 第四专区各县人力畜力支差调查统计表*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 项目 | | 数目 | 滑县 | 高陵 | 卫南 |
|---|---|---|---|---|---|
| 战勤支差 | 担架 | 次数 | 8 | | |
| | | 副数 | 630 | 221 | 208 |
| | | 人数 | 3800 | 4243 | 1680 |
| | | 折工数 | 34290 | 26742 | 12780 |
| | 车辆 | 大车数 | 14826 | 9206 | 1276 |
| | | 小车数 | | | |
| | | 人数 | 29632 | 24139 | 2552 |
| | | 牲口 | 44448 | 32445 | 4386 |
| | | 人力折工 | 59264 | 24139 | 8352 |
| | | 畜力折工 | 81360 | 37042 | 14660 |
| | 合计 | 人力工数 | 93554 | 50881 | 21132 |
| | | 畜力折工 | 81360 | 37042 | 14660 |
| 运输 | | 大车数 | 1030 | 107 | |
| | | 小车数 | 886 | 3566 | |
| | | 人数 | 2946 | 7462 | |
| | | 牲口数 | 3090 | 321 | |
| | 折工 | 人力 | 11780 | 15167 | |
| | | 畜力 | 12360 | 321 | |
| 修堤 | | 民工数 | 5000 | | |
| | | 天数 | 13 | | |
| | | 折工 | 65000 | | |

* 本表原载《战勤工作资料选》，黄河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206—207页

| 项目 \ 数目 \ 县别 | | | 滑县 | 高陵 | 卫南 |
|---|---|---|---|---|---|
| 修堤 | 运输 | 大车数 | 671 | | |
| | | 小车数 | 579 | | |
| | | 人数 | 2425 | | |
| | | 牲口 | 2383 | | |
| | 折工 | 人力 | 7275 | | |
| | | 牲口 | 7149 | | |
| | 合计 | 人力工数 | 72275 | | |
| | | 畜力折工 | 7149 | | |
| 破城 | | 人数 | 3500 | | |
| | | 天数 | 12 | | |
| | | 折工数 | 22500 | | |
| 零杂 | | 人力天数 | 3558 | 20020 | |
| | | 畜力天数 | 5339 | | |
| 总计 | | 担架副数 | 630 | 221 | 208 |
| | | 大车数 | 16527 | 9313 | 1276 |
| | | 小车数 | 1265 | 3566 | |
| | | 人数 | 50861 | 55864 | 4232 |
| | | 牲口数 | 55258 | 32766 | 4386 |
| | 折工 | 人力 | 203667 | 86068 | 21132 |
| | | 畜力 | 106206 | 37363 | 14660 |
| 说明 | | 滑县是1、2、3、4月份的支差；高陵是1、2、3月份的支差；卫南的材料不全 | | | |

专员　　　副专员　　　财粮长　　　制表人

# 冀鲁豫〔黄〕河北地区战勤调查统计表*

（一九四八年八月底）

冀鲁豫〔黄〕河北部分支前实力及2年来之负担总计：

## 一、实力方面

根据北办统计材料(见505页表)，〔黄〕河北四个分区共有壮丁434894人，牲口257524头，民兵84370人。其中四分区之壮丁146444人，牲口95813头，内3/4的处于敌占游击区中，未有怎样负担过战勤任务，因之〔黄〕河北地区实际支前壮丁牲口中，须减去四分区之3/4，则壮丁数为434894人－四分区146444人$\times\frac{3}{4}$＝325061人，牲口数为257524头－四分区95813头$\times\frac{3}{4}$＝185665头。

〔黄〕河北部分之支前实力壮丁325061人，民兵84370人，牲口185665头。

## 二、负担方面

〔黄〕河北办事处对战勤负担无详细统计（整个数字），仅有一个九分区之统计材料，因之以下负担数字是根据九分区负担平均比例数推算出来，（见冀鲁豫〔黄〕河北九分区支前实力及2年来负担统计表）即九分区每人每头平均负担数乘〔黄〕河北总人畜力数。

再则须要说明的，平汉远征前(1947年6月底以前)〔黄〕河

* 本文原载《战勤工作资料选》，黄河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228—230页。

北支前负担由前总指挥部和〔黄〕河南部分的统计一处了，因之须分别计算。平汉远征前〔黄〕河北、〔黄〕河南共负担3447800人工，其中40%是〔黄〕河北负担的，应是34478000×$\frac{40}{100}$=〔黄〕河北在平汉远征前负担13791200人工。平汉远征后（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底，〔黄〕河北地区根据九分区的材料推算负担数（推算标准见九分区统计表）。

根据九分区材料，平汉远征后至1948年8月底〔黄〕河北每个壮丁平均负担（前方差、后方差、地方差、村勤差）126.34天，每个民兵平均负担64.71天，每头牲口平均负担38.97天，应是：

〔黄〕河北总壮丁数325061人×126.34天=壮丁工41068206日。民兵数84370人×64.71天=民兵工5457582个。牲口数185663头×84.83天=牲口工15749961个。

除去地方差（治黄、修堤、疏渠、挖河等地方建设）、村勤差（代耕、带路、打更送信……），而前方差、后方差（即战勤差）壮丁仅占总差（前后方差、地方差、村勤之总计）40.23%，民兵仅占总差69.18%，牲口占总差38.97%。因之则为壮丁总工41068206个×40.23%=壮丁战勤工16522739个民兵，总工15749961个×38.97%=牲口战勤工6136359个。

〔黄〕河北2年来总负担战勤人工：平汉远征前13791200个+平汉远征后至1948年8月底，战勤工壮丁16522737个+民兵工3776138个=34040877个，牲口工6136359个。

# 冀鲁豫全区二年来支前实力负担统计

（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

| | 分区别 | 县数 | 区数 | 村数 | 支前面积 | 总人口 | 壮丁 | 民兵 | 牲口 |
|---|---|---|---|---|---|---|---|---|---|
| 〔黄〕河南部分 | 二分区 | 5 | | | 3个全县又6个区 | 965733 | 112560 | | 52437 |
| | 三分区 | 6 | | | 3个全县又5个区 | 1016424 | 116888 | | 56479 |
| | 五分区 | 6 | | | 2个全县又10个区 | 699386 | 80429 | | 38855 |
| | 七分区 | 4 | | | 2个全县又2个县的各1/2 | 745236 | 85702 | | 41402 |
| | 小计 | 21 | | | | 3426779 | 395579 | | 189173 |
| 〔黄〕河北部分 | 九分区 | 6 | 34 | 1980 | 全分区 | 836439 | 71440 | 13383 | 38206 |
| | 八分区 | 7 | 42 | 2169 | 全分区 | 1181312 | 89189 | 23626 | 57138 |
| | 六分区 | 8 | 77 | 3532 | 全分区 | 1388294 | 127821 | 19932 | 66367 |
| | 四分区 | 9 | 56 | 3249 | 全分区之1/4 | 431162 | 36611 | 27429 | 23953 |
| | 小计 | 30 | 209 | 10930 | | 3837207 | 325061 | 84370 | 185664 |
| 合计 | | 51 | | | | 7263986 | 720640 | | 374837 |

**备注**

〔黄〕河南部分：

1、此表系2年来经常支前的基本区之民力，但由于敌人经常侵入及战役往往处于中心区进行，则往往支前地区因之大缩。

2、二分区系由分指登记后之实际数字。

3、总人口系各县财政科在征收中之人口负担数字。

4、三、五、七分区之实支前壮丁数是根据几个典型材料实支前壮丁占人口11.5%推算的。

5、三、五、七分区之牲口数字是根据二分区之牲口与人之比推算（即每18人1头大牲口，小牲口不在内）。按19个村的典型材料每人平均为32亩地，每头大牲口平均为40.6亩，应合地57.6亩，实际大牲口数不会少于此数。

〔黄〕河北部分：

1、〔黄〕河北总人口是3730694人，壮丁434894人，牲口257524头。其中四分区总人口1724649人，壮丁146444人，牲口95813头。内3/4是敌占区、游击区不负担战勤者，表中数字是除去四分区3/4不出战勤者之后的数字，而不是自然壮丁和牲口数字。

2、〔黄〕河北壮丁系除去村干、教员、中高学生、免差军工烈属、老少残以后的数字。

3、村数系指行政村。

# 冀鲁豫边区抗战颂歌

王 鲁

## 一、边区概谈

冀鲁豫，三省边，根据地，美名传。面积广，近百县，东津浦，西平汉，北面缘，德石路，南边跨，陇海线。古运河，南北穿，大黄河，东西贯。山峦少，湖泊罕，大部分，是平原。可耕地，四千万，产粮棉，出煤炭。有人口，千余万，粮秣丰，广兵源。地冲要，位置显，自古来，兵家羡。人勤劳，兵强悍，常聚众，而揭竿，反压迫，反封建，好传统，历代传：汉黄巾，倾东汉；唐黄巢，克长安；隋瓦岗，旗帜鲜；宋梁山，聚好汉；清代末，义和团，灭洋人，杀赃官；黑旗军，宋景诗，克州城，十余县。至近代，社会变，半殖民，半封建。帝官封，三座山，重重压，民涂炭。土匪扰，军阀战，边区苦，社会乱。水旱蝗，灾连年，上横征，下暴敛，高利贷，重剥盘，老百姓，苦难言，失土地，破家产，不聊生，受饥寒。反压迫，不间断，其结果，失败惨。

## 二、星火燎原

旭日出，曙光现，党诞生，天下变。边区内，各师范，发展党，为策源。从学生，到工农，从城市，到乡间，

党组织，渐发展，道曲折，路艰险。四一二，政变前，
好多县，有党员。王尽美，在济南，建执委，发宣言。
杨介人，徐向前，在安阳，活动繁。徐州市，为策源，
西北部，党发展。七一五，政变后，从黄埔，从武汉，
边区籍，党团员，被派遣，回故园，闹革命，做宣传，
领人民，抗税捐。星星火，渐燎原，党组织，日发展。
工农运，烈火燃，规模大，影响远。二五年，五月间，
上海市，发惨案。彰德府①，大声援，反帝会，人如山，
参加者，七八千。大名府，学生联，又游行，又募捐。
二七年，二八年，濮阳县，西北边，党组织，大发展。
办夜校，做宣传，领农民，抗税捐，农协会，掌实权，
斗劣绅，战民团，农村事，说了算，其影响，深且远。
二八年，一月间，东临道②，阳谷县，党领导，农会员，
占教堂，分粮款，抓洋人，平民怨，发文告，倡民权。
南宫县，金谷兰，搞武装，办“红团”，打土豪，除贪官，
杀盐警，震全县。三〇年，下半年，陇海路，黄口站，
民暴动，打商团，歼团丁，二百余，正规军，一个连。
三二年，濮阳县，盐民们，好几千，浩荡荡，冲进县，
驱盐巡，争盐权，得胜利，奏凯旋。冀鲁豫，十几县，
盐民们，十余万，建总会，敌震撼。三三年，大暑天，
河决口，在长垣，淹临黄，四五县，沿河村，水连天，
老百姓，如倒悬。濮与滑，两县边③，党带领，民揭竿，
夺枪支，控渡船，向地主，借粮款，济灾民，渡水患，
暴动长，达半年。三二年，上半年，在安阳，在磁县，
煤矿工，人逾万，为增资，发现钱，大罢工，好多天。

①彰德府即今安阳市。
②东临道即今聊城地区。
③濮阳和滑县接壤的姚家、两门、曾小邵和亓村一带。

三一年，起硝烟，九一八，大事变，东三省，日侵占，民沸腾，呼抗战。学子们，发冲冠，在济宁，在泰安，学生集，两三千，组织成，请愿团，赴南京，去请愿。至兖州，受阻拦，怒卧轨，路中断。"左"错误，搞冒险，教训痛，损失惨，鲁省委，被破坏，徐州党，近瘫痪。革命者，斗志坚，死如归，义凛然，屡屡仆，屡屡站，既可歌，又可赞。直南党，抓枪杆，日隐蔽，夜出现，秘密搞，游击战。鲁省委，破坏后，其条件，极困难，党员们，自为战。其斗争，从未断，建工委，坚持干，到各地，密串联。三五年，春节间，鲁西区，特委建。赵健民，李济安①，徐运北，鹿省三，寻找党，不停闲。上北京，下江南，赴鲁西，奔泰安。赵健民，下濮县，半年间，两往返，三五年，隆冬天，上级党，终找见。北方局，做决断，派黎玉，来济南，鲁省委，得重建。湖西党，关系断，建特委，独立战，寻上级，到西安。三五年，十月间，华北区，事态变，民族危，如累卵，北平城，怒冲天。一二九，达顶点，学生们，好几千，大游行，高呼喊："打日本，停内战"。全国人，皆支援。三六年，在西安，双十二，大事变，张与杨，搞兵谏，迫使蒋，对日战，国与共，同抗战，抗日史，转折点。刘少奇，离延安，来华北，抓党建，纠"左"倾，搞统战，播火种，培骨干，为抗日，把基奠。全民族，齐抗战。

## 三、七七事变

三七年，七月间，卢沟桥，起烽烟。党中央，发通电，七月末，平津陷，侵略军，无忌惮，沿津浦，沿平汉，

①李济安即刘仲莹。

如虎狼，向南犯。双十日，占石门①，十一月，占邯郸。十月初，占德州②，至年末，占济南③。国民党，片面战，大溃退，一溜烟。我边区，遭浩劫，同胞们，蒙灾难。党中央，于洛川，作决定，旗帜鲜，全民族，来抗战。北方局，在太原，开会议，作动员，搞武装，抓政权，唤党员，脱长衫，到敌后，游击战。张经武，到济南，找老韩④，与之谈，晓大义，述困难，终释放，政治犯。铁窗内，我党员，赴抗日，第一线。我边区，形势变，起义火，到处燃。在泰西，大峰山；在鲁西，大平原；在湖西，苏鲁边。豫之北，直之南，义勇队，自卫团，春笋般，遍地现。四支队，威名远，袭南乐，铲伪会，打清丰，锄汉奸。小濮州，夺洋马，小常庄，漂亮战。鲁西北，十支队⑤，总人马，两三千，作战勇，纪律严，老百姓，皆盛赞。三八年，值元旦，张北华，在泰安，拉武装，自卫团，袭肥城，杀汉奸，摸界首，闹车站，显神威，大刀片。三八年，四二三，国民军，四十万，台儿庄，大会战，歼日军，近两万。侵略军，失败惨，更疯狂，更野蛮，五一九，占徐州，沿陇海，向西犯。李贞乾，在丰县，集资金，购枪弹，游击队，迅组建。二总队⑥，捷报传：马良集⑦，缴汽车，华山边，毙敌官⑧，

---

①石门即今石家庄市。

②③日军10月3日占领德州，12月28日占领济南。

④韩复榘当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⑤全称为山东第六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是中共领导的骨干武装。

⑥1938年6月11日李贞乾领导的丰县抗日武装和砀山、单县的抗日武装在丰县南梁楼会师，组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李贞乾任总队长。

⑦马良集在单县、砀山的交界处。

⑧8月5日二总队在丰县华山附近截击日军，毙其小队长1名、士兵数名。

送西瓜，进黄庙，巧计袭，敌据点。

## 四、惨绝人寰

日本军，最凶残，烧杀抢，绝人寰。如观城，如浚县，如金乡，诸惨案，大屠杀，人几千。四一二，大"扫荡"，沙区人，受害惨，被杀者，四千过，树被砍，约五万。仅内黄，一个县，烧民房，两万间。杨固村，情最惨，六口井，尸填满。南乐县，东节村，七三〇，大惨案，烧房屋，八百间，见人杀，逢人砍，活埋者，一百八，村为墟，坟满田。恶满盈，罪滔天，罄山竹，书不完。

## 五、统一战线

国与共，统一战，开历史，新纪元。抗战初，一两年，鲁西区，为典范。第六区，范筑先①，爱国家，为政廉。三七年，十月间，范奉命，撤河南，我党员，苦相劝。范率部，毅然返，向全国，发通电，坚守土，誓抗战。党派员，协助范，抓武装，建政权，抓宣教，搞训练。编游杂，五六万，对日伪，屡开战。为配合，保武汉，曾进军，到济南。其幼子，把躯捐，人闻之，皆赞叹。鲁西北，几十县，抗日火，熊熊燃，人谓之，小陕北，称聊城，小延安。毛泽东，亲致函，对范老，备称赞，并赠书，《持久战》。卡尔逊，美武官，到聊城，细察看。三八冬，聊城陷，范筑先，殉国难。鲁西北，皆痛挽，

---

①范筑先，鲁西北馆陶县人，1936年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聊城县县长。

修祠堂，建陵园。河北省，十七区，丁树本，任专员。二月九，濮阳陷，丁率部，出逃难，留与撤，难决断。直南党，与谈判，订协议，共抗战。我与丁，配合战，濮阳城，得复还。统战中，有缺点，忽视了，自主权。洛阳会，形势变，丁树本，把共反。陈曙辉，在滑县，有武装，几个连，赵紫阳，做动员，陈率部，开井店①，与我党，共抗战。湖西区，苏鲁边，与二李②，搞统战，建动委，总动员，李宗仁，任主任，郭子化③，为委员，郭影秋，总干事，办事者，多党员，我为主，来抗战，全区呈，新局面。

## 六、神兵来边

八路军，来我边，根据地，得创建。三八年，一月半，陈再道，李菁玉，率东纵，到冀南，建支队，名“津浦”，进卫东，袭车站，协徐州，大会战。宋任穷，三月间，率八路，骑兵团，到河北，南宫县。五月初，徐向前，率主力，到冀南。八月间，于漳南，东进纵，青年纵，六八九，新一团，发战役，打伪顽，歼伪军，五六千，新解放，六个县。一一五，三四三④，辟鲁北，开津南，根据地，十五县。一一五，一个团，三八冬，到丰、单⑤，支队长，彭明治，崔韩庄，首次战，王献臣，顷刻完。湖西人，拍手赞，称神兵，来天半。三八年，年终端，

①在濮阳县西北，内黄县境内，直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

②指驻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游击总指挥李明扬

③郭子化当时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

④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八团的一个营和两个连

⑤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于12月27日到丰县、单县一带。

刘与邓①，齐下山，率主力，来冀南。召开会，于威县，传决议，研抗战。组纵队，曰先遣，李聚奎，司令员。给陈赓，三个团，鲁西北，游击战。三九年，春节间，敌“扫荡”，民不安。陈赓设，巧机关，香城固，伏击战。“扫荡”队，一锅端，二百敌，上西天，活捉敌，一个班，战利品，堆如山，军与民，皆狂欢。杨得志，三九年②，率部队，来直南，在井店，搞整编，支队名，“冀鲁豫”，有人枪，近五千。三九年，仲春天，由陈光，罗荣桓，率师直，杨勇团，来鲁西，大平原。见面礼，樊坝战，八百敌，一夜歼。老百姓，争相传，忙慰问，把军参。杨、张、匡③，留运西，运西区，大发展。陈与罗，到泰西，傍东湖，依泰山。打游击，拔据点，订纲领，搞统战。建六个，县政权，扩武装，达四千。日本军，急红眼，集兵力，五六千，分九路，来围歼。我将士，浴血战，毙伤敌，一千三，乘黑夜，跳出圈，敌围歼，大破产，陆房战，威名远。建军节，第二天，陈与罗，于梁山，对日军，猛开战，三百敌，全部歼，俘虏敌，两个班，毙少佐，曰长田④，其缴获，更可观，集总发，嘉奖电。四〇年，三月间，赵支队，伏击战，毙司令，名阪田⑤。四一年，刚过年，在郓北，黄河边，潘溪渡，伏击战，毙日军，一百六，歼伪军，一百三，毙少佐，名软原。

①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三八六旅主力和先遣支队一部，进至南宫县一带。

②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部于1939年2月16日挺进直南、豫北地区。

③杨勇、张国华、匡斌。

④敌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

⑤赵谭支队1940年3月下旬于郓城丁里村村北伏击日军，击毙驻济宁日军司令官阪田。

敌报复，喷毒焰，日伪军，两三万，上飞机，下坦克，大"扫荡"，二十天。教三旅，特务营，苏家村①，阻击战，百余人，殉国难。

## 七、反顽作战

顽固派，讨人厌，光捣乱，不抗战。鲁西区，王金祥，在郓设，鸿门宴，搞阴谋，夺兵权。在莘县，搞兵变，杀县长，我党员②，派特务，马泽远，害我党，张丙元③。郜仁智，搞磨擦，进驻我，大烽山。四〇年，一月间，我反击，重创顽。齐子修④，大收敛，李树椿⑤，远逃窜，根据地，连成片。宋任穷，在冀南，反顽军，石友三，乘胜追，连续战，毙伤俘，近两万，使鲁西，和直南，根据地，相通连。顽固军，在铜山，千里井，制惨案。朱世勤⑥，在单县，四二八，闹事件。我反击，痛打顽，刘瞎旅⑦，全被歼。顽固军，在丰县，杀我人，夺我权。我"黄支"⑧，对其战，歼顽敌，逾一千，根据地，始得安。据"三有"⑨，来反顽，人不犯，我不犯，人若犯，我必犯。顽固派，石友三，与日军，定密款，侵占我，濮、范、观，

①苏家村在原观城、朝城县交界处，现属莘县。

②1938年11月17日，李树椿、王金祥唆使莘县反动分子杀害莘县县长、共产党员吕世隆。

③张丙元，中共鲁西一地委书记。

④齐子修，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一旅旅长。

⑤李树椿，鲁西行辕主任。

⑥朱世勤，国民党山东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⑦1940年4月29日，我苏鲁豫支队向朱世勤部发起反击，全歼其刘则岭旅2000余人。刘则岭又名刘瞎子。

⑧即黄河支队。

⑨即有理、有利、有节。

四〇年，三伏天，打顽军，石友三，歼其部，三四千，
顽实力，大大减。闹内讧，石高变①，其部队，渐撤南。
四三年，正困难，李仙洲，来捣乱，率顽军，一两万，
向湖西，大举犯，我反击，多次战。歼其部，一千多，
俘官兵，三四千。李入鲁，成梦幻，我拓区，一大片。

## 八、全民抗战

老与幼，女与男，贫与富，回与汉，全民族，来抗战。
有力者，出其力，有钱者，出其钱。为抗日，培骨干，
训练班，各地办。张承先，在恩县，任校长，做教员，
办学校，"军政干"，广招生，短训练。晁哲甫，自筹款，
在家乡，搞训练，先后办，五六期，受训者，人近千。
直南区，濮阳县，在文留，在井店，都办有，训练班。
鲁西南，郓城县，在飞集，搞训练，窝窝头，为主食，
人称之，"窝窝班"。陈玉璋，吴云汉，在单办②，青训班。
六专区，政干校，规模大，影响远，副校长，张郁光，
正校长，范筑先，教育长，齐燕铭，任夷等，做教员，
三个月，为一期，每一期，好几班，年培训，一两千。
最活跃，为群团，农救会，工救会，文救会，回救会，
妇救会，儿童团，搞宣传，做动员，筹武器，搞募捐，
学打仗，搞训练，站岗哨，查行人，送情报，捉汉奸，
拥军队，优抗属，搞慰问，护伤员。各救会，迅发展，
上到下，逐级建。冀鲁豫③，救总会，负责人，安法乾，

①高树勋、孙良诚等将石友三处死，高继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谓之"石高事变"。

②在单县黄后楼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

③这里指的是老冀鲁豫，即习惯称的小冀鲁豫区。

总务部，逯昆玉，宣传部，许敬贤，青年部，王与杨①，妇女部，陈与范②。湖西区，青救会，参加者，人过万，遍四省，三十县。鲁西区，各总会，四〇年，皆健全。青救会，四月四，农救会，四五诞，组织严，数"民先"，总队长，徐少岩。两区合，领导变，工救会、王震宇，青救会，王、杨干③，妇救会，郭、吴、范④，高元贵，主农会，鲁西良，筹文联。四二年，九月间，大联合，组抗联⑤，各群团，久锻炼，其作用，更明显。最突出，为宣传，形式多，花样繁，群喜闻，众乐见，搞集会，做讲演，写标语，撒传单，画漫画，办报刊，组剧团，把戏演。大标语，村村有，宣传画，到处见。张富忱⑥，画之《念》，日本兵，围着看，念及家，泪不干，跪在地，赶不散。《抗日报》，《行军报》，《鲁西报》，《灯塔》刊，《湖西报》，与《战线》，应运生，相继诞。从部队，到民间，办剧社，建戏班。《陆文龙》，《忠烈传》，《流亡曲》，《亡宋鉴》，《打鬼子》，《放下鞭》，抗日歌，到处唱，抗日戏，到处演。群情愤，呼抗战，抗日潮，达沸点。武装部，各级建，组民兵，全民战。自卫队，模范班，站岗哨，捉汉奸，打游击，拔据点，送军火，筹军粮，又参军，又参战。东节村，民兵连，拔据点，智勇全，缴机枪，把敌歼，杨司令⑦，特嘉勉。张楼村，民兵连，有枪支，

①王师然、杨泽江先后任青年部长。

②陈友菊、范世钧先后任妇女部长。

③王克、杨泽江。

④郭军、吴亚菊、范世钧。

⑤1942年9月5日，边区工、农、青、妇各救会决定组成统一的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

⑥张富忱，军区宣传部干事，边区著名画家。

⑦1942年7月，南乐县东节村民兵一举拔掉日军炮楼，缴机枪一挺及其他武器弹药，打死日军9人，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传令嘉奖。

百余杆，有土炮，有炸弹，搞联防，惩敌顽。敌报复，把村犯，几千敌，大围歼。全村人，总动员，三昼夜，浴血战，牺牲者，三百三①，英雄村，美名传②。泰西区，长清县，游击队，矫而健，毙敌酋，少将官，朱、彭发③，嘉奖电。

## 九、渡过难关

四一年，至四三，我边区，最困难。敌伪会，匪与顽，此五鬼，闹中原。敌疯狂，达顶点，经济上，大封锁，军事上，大围歼。四一二，和四三，九二七，年终端，大“扫荡”，不间断，派特务，遣侦探，修碉堡，安据点。封锁墙，高而长，封锁沟，深且险，纵与横、几百条，总计长，两三千④。如网格，如棋盘，将边区，细割散。顽固派，心不端，反共潮，接连掀。四一年，一月间，在皖南，生事变。边区顽，乘机乱，蚕我地，犯我边，搞摩擦，频而繁。敌伪顽，暗通连，骗会门，搞暴乱。敌伪侵，顽军犯，根据地，大缩减。“开一枪，可打穿”。人祸多，天灾旱，古稀有，今少见。四二年，天大旱，久无雨，河渠干，塘龟裂，地生烟。四三年，七月间，从西北，到东南，大面积，生蝗患，上飞蝗，下蝗蝻，蝻之多，地盖严，蝗虫飞，遮蔽天，飞蝗落，禾不见。蝗旱后，生霍乱，大流行，大传染。鲁西北，到直南，

①共333人。

②张楼村属茌平县。

③1941年6月22日，长清县第十区游击队击毙日独立第六混成旅团兼团长土屋马兵少将，荣获朱德司令、彭德怀副司令员嘉奖。

④两三千华里。

灾最重，情最惨。灾民们，眼饿蓝，当土地，典家产，
鬻妻女，卖儿男。为活命，出逃难，下关东，上西山，
灾区里，荒无烟，"无人村"，不稀罕。冠县东，聊、堂边，
无人区，一大片，鸦住堂，兔宿院，平原地，野狼现。
搞救灾，坚抗战，全边区，总动员。救济粮，数百万，
发贷款，几千万。向地富，借粮食，到敌区，征粮款。
组灾民，齐自救，工代赈，搞生产：打水井，抗干旱，
搞运输，运粮棉，捕蝗虫，拿粮换，发棉花，加工线，
刮盐土，熬硝盐。党政军，总动员，齐节约，济民难。
共节米，两千万①，灾民谓，雪中炭。中心区，濮范观，
运出粮，几百万。借民力，减负担，党政军，大精简，
区党委，与军区，只剩下，五十员。党与政，各机关，
都开展，大生产。自种粮，自种棉，学织布，学纺线，
破封锁，渡难关。赵紫阳，在滑县，抓群运，搞试点。
减租息，增资佃，救灾荒，搞生产，雇、佃贫，好经验，
全边区，都开展。四二年，十月间，高干会，细讨研，
其策略，大改变。学悟空，肚里钻，到敌后，去作战。
大化小，整分散，又小巧，又精干，能打仗，能宣传，
小部队，威力显。敌阵营，被搅乱，白天惊，夜难眠，
坐不宁，卧不安。对敌伪，攻心战，伪军们，多生变，
人在曹，心在汉。被俘敌，做教员，组同盟，名"反战"②，
办小报，散传单，起作用，不一般。有敌人，无敌区，
敌占区，建政权。讲策略，广宣传，五鬼联，终拆散。
秘密建，交通线，送文件，传信函。护干部，到延安，
刘少奇，邓小平，陈老总，罗荣桓，过往者，人上万。

---

①两千万市斤。

②被俘的日本官兵组成反战同盟，对敌进行宣传。

发货币，搞贸易，反封锁，办商店，查“黑地”，搞清算，
反贪污，改政权，反资敌，反汉奸，反“扫荡”，反奪犯。
四三年，冬月间，八公桥，掏心战，伪总部，被攻占，
缴马匹，三百余，俘伪军，三四千，获粮食，数百万。
二百里，范围内，拔敌伪，百据点。根据地，大发展，
若干块，连成片。全边区，三年间，大小战，超六千，
拔据点，六五三，毙伤俘，六万三。被动局，彻底转，
我取得，主动权，难关过，坦途见，军和民，尽开颜。

## 十、创建关键

根据地，得创建，党领导，是关键。党方针，和路线，
顺国情，合民愿。为适应，抗日战，党组织，大发展。
七月七，一周年，发展党，做纪念。搞竞赛，比数量，
十百倍，大增添。御敌侮，赴国难，我党员，做模范。
不图名，不图利，不怕死，不畏难。撤在后，冲在前。
党队伍，日扩大，党组织，日增建。县一级，党机关，
抗战初，猛增添，三七年，十八个，三八增，三十三，
三九年，五十八，四〇年，已普遍。三八年，三月间，
冀鲁豫，省委建。三八年，阳春天，党中央，派骨干，
到边区，来抗战。在延安，临行前，毛泽东，亲动员。
此次行，非一般，责任重，道路远。要大家，记心间。
像柳树，易繁衍，如松树，挺而坚。董、孙、何，到泰西①，
泰西区，大发展。三九年，一月半，鲁西区，党委建，
张霖之，为书记，赵鎛等，为委员，辖特委，共计三，

①董君毅、孙光、何光宇。段君毅当时化名董君毅。

七地委，四一县。同年秋，八月间，区党委，众委员，于东平，小安山，开会议，细析研："平原地，无高山，根据地，能否建？"罗荣桓，作发言，站得高，看得远，平原地，虽无山，但民众，有千万，组长城，铁石坚。说无海，也有海，说无山，也有山，有人海，有人山，推不倒，砸不烂！游击战，能开展，根据地，可创建！作决定，齐拍板，散会后，没停闲，按决定，立即办。军和民，女和男，为破路，齐参战。抗日沟，村村连，四尺深，八尺宽，冀鲁豫，大平原，转眼间，地形变。边区里，肃托案，亲者痛，仇者欢，教训大，损失惨，错必纠，案已翻，株连者，皆平反①。为抗战，领导便，其区划，不断变。四一年，七月一，冀鲁豫，和鲁西，两地区，合一起，张霖之，任书记。四一年，九月间，冀鲁豫，行署建，晁哲甫，为主任，副主任，贾与段②。四二年，九月间，刘少奇，过我边，作指示，指缺点，强调要，搞"双减"，抓群运，不容缓。四二年，十月里，派黄敬，来边区，区党委，任书记，勤思考，善调研，集群智，抓关键，被动局，迅扭转。四三年，冬月间，建分局，曰平原。红庙村，集高干，开会议，一月半，起作用，谓关键。冀鲁豫，和冀南，两区合，四四年，开水东，辟水西，根据地，大发展。党领导，一元化，抓三建，与两环③。三三制，建政权，倡民主，让民选。四五年，六月间，邓小平，复来边，讲成绩，指弱点，查原因，谈意见，大促进，大策鞭，我工作，大发展。

①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山东省委先后对直南、湖西、鲁西肃托事件发出了平反的文件。

②段君毅、贾心斋。

③"三建"即建党、建军、建政。"两环"一是整风，二是生产。

解放区，艳阳天，党风好，军纪严，民风好，官清廉。遗不拾，户不关，根据地，坚如磐。工农商，大发展，文与教，尤为显。有报社，有书店，有剧团，有医院，有抗大，有建院，有军校，有师范。有抗中，十一所，有抗高，上千班，有初小，上万处，有冬学，识字班，全区约，六十万。四五年，八月间，苏对日，宣了战。日投降，把字签，全世界，尽开颜。党中央，发急电，我边区，总动员，占城市，与要道，对敌伪，全面战。八年间，艰苦战，其损失，难计算。英烈们，有万千，为救国，把躯捐。终胜利，偿夙愿，大庆祝，大狂欢。保果实，把军参，新任务，巨而艰。解放史，谱新篇。容日后，再续编。

# 河北省联络组
# 关于“群众运动”、“宣教工作”
# 专题征编情况向工作组的报告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

根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1985年11月洛阳会议的精神，河北省联络组承担了“群众运动专题”、“宣教工作专题”的征编任务。联络组委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的同志分别编写，组成了专题编写组，在刘洪声同志的帮助下，拟定了“专题编纂方案”，并邀请若干原从事群众运动、宣教工作的老同志组成指导组，参与专题资料的研究、审定工作。几年来，在徐运北、张承先、郭超、王克东、杨泽江等同志具体指导下，经过努力，专题的征编任务业已完成。

“群运专题”、“宣教专题”的征编工作，在边区党史办公室的指导下，在省内外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几年来，专题组的同志在正常工作之外，辛勤劳动，共征集了约700多万字的资料，编印了“群众运动资料”五辑、“宣教工作资料”三辑，内部刊行，使这些历史资料得以利用和保存下来。撰写了《群众运动概述》和《宣教工作概述》，编纂了《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及《宣教工作资料选编》，已纳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系列。

《群众运动概述》、《宣教工作概述》，在中共河北省委和

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在杨泽江同志具体指导下，八易其稿，于1988年印发了“征求意见稿”，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及指导组和原在边区从事群众运动、宣教工作的老同志审阅。1989年4月在保定召开了审稿会，徐运北、张承先、姜思毅、许梦侠、苗春亭、张增敬、陶力、罗定枫、吴肃、陈越平、张赤侠、白桦、金风、白林、逯昆玉、刘镜西、王克、王传忠、夏川、李明实、周子明、白映秋、方玉亭、冯培昌、杨泽江、王克东及杜文远、高恒等40多位同志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老同志提供了很多史实，对《概述》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两个专题组根据会议精神，对《概述》又进行了修改，于1989年10月、12月在北京请杨得志、段君毅、赵健民、徐运北、张承先、姜思毅、李明实、邢子言、高元贵、李进宝等同志座谈审定。前后又修改了4次，于1990年4月拟定了“送审稿”，分送段君毅、徐运北、张承先、姜思毅同志审定。1991年初，《群运概述》经徐运北、张承先同志审查定稿；《宣教概述》经张承先、姜思毅同志审查定稿。《群运概述》经过12次修改，《宣教概述》经过13次修改，都尽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反映了边区群众运动和宣教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概述》是边区群众运动和宣教工作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是老同志和研究人员的集体科研成果。

在“群众运动专题”的征编上，为了全面反映边区群众运动的面貌，又按原来群众工作范围——工、农、妇、青、文、武几个团体，分别进行专题总结。边区工会只有方玉亭一人健在，他写了一篇总结性的资料，概括地介绍了工会的情况。文联方面鲁西良写了边区文联活动的基本情况，现已成遗作。农会和农民运动是当时群众运动的基本内容，《概述》叙述得比较详尽，未再专题总结。青运方面由王克、史杰、常邦国、高桓等同志经过3年多的时间，写出了《青运史纲》，在中共山东省委、省团委和顾委主任梁步庭同志及有关方面关怀下，1989年5月在济南召开了

原冀鲁豫边区青救会主要负责同志10多人参加的审稿会，审定出版。妇运专题的编写由范世钧等几位老大姐负责，范世钧大姐以多病之身，亲自征集资料，亲自动笔，4年多来，辛勤耕耘，写出了《妇运史纲》，令人钦佩。人民武装方面，由郭乐天、白晶五、冯培昌等同志经过4年的时间，几次易稿，写出了《人民武装史料》，在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及申云浦等老同志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1990年8月在贵阳召开了审稿会。曾宪辉、乔明甫、夏德义、金风、杨泽江、白晶五、冯培昌等15人参加了会议，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经过修订以后，由原军区武装部长乔明甫同志审核定稿。这些资料都是老同志自己动手、分析总结，内容真实、生动、活泼，充分反映了边区群众工作的面貌，是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历史的宝贵遗产，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工、农、妇、青、文、武几个方面的资料，在对标题和文字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后，均收入《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妇运史纲》及《人民武装史料》根据老同志们的意见另印制专集，内部刊行。杨得志、段君毅同志为《妇运史纲》题了词，张承先同志题写了书名；乔明甫同志为《人民武装史料》题写了书名并题了词，还拟请杨得志、赵健民同志题词。《妇运史纲》以客观的事实和英模人物的真实事迹，记述了无数的巾帼英雄，是边区妇女干部和广大妇女群众在战争年代英雄形象的真实写照，是边区妇女干部的集体创作，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教材。

在"群众运动专题"、"宣教工作专题"征集、编纂过程中，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以及在史实、政策方面严肃认真的态度，使编辑人员深受鼓舞。冀鲁豫边区党史办公室，原边区所在省、地、市、县党史部门、档案部门及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热情提供资料，是编纂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的有力保证。尤其是边区原从事群众工作、宣教工作的老同志

均年事已高，但是都亲自动手，提供资料，总结历史经验，留给后人，这种对历史负责，对党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
河北省联络组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日

# 冀鲁豫党史文艺组八年工作小结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文艺组**

文艺组成立八年来，在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的领导和许多老同志关怀、支持下，现已完成预计要完成的各项任务。经研究并报请党史工作组批准，确定于今年年底结束。为了善始善终，做好扫尾工作，使大家对文艺组工作情况有所了解，特简要小结如下：

## （一）

1984年6月，在承德召开的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会议，决定结合编写党史搞些有关边区革命斗争的文艺创作，由申云浦同志负责，李明实、夏川同志协助。经过筹备，于10月19日在河南省新乡市召开了文艺创作座谈会。参加会的大多是过去在冀鲁豫边区从事过宣传、文化、新闻工作和专业创作的老同志，以及热心反映边区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青年作家共43人。大家谈到冀鲁豫边区军民在战争年代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对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时，都认为有责任组织创作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来歌颂党所领导的边区军民的光辉业绩、英雄人物，以宣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根据大家意见，正式成立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文艺组。文艺组选出领导小组，组长申云浦，副组长李明实、夏川、张延积，成员有鲁西良、李定坤、马冰山、邢立斌、田兵、万力、

张明权、王燕飞、陈勇进、姚力文、许法、汪德荣、杜文远、许平、田牧军、张世珠、侯存明、刘立平、刘文渺、牛星斗、严朴、吴振全、殷步实、方萌。决定组织创作出版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拍摄一两部电视剧，并制定了初步规划。后又增补副组长杨泽江、徐雷健和成员张国础、韶华、周雁如、王钦裕、刘世龙等同志。为便于加强领导，开展工作，经研究确定李明实、夏川、徐雷健为常务副组长，主持文艺组日常工作。从此，散在各地的文艺组同志，积极展开了各种创作活动。1986年6月，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第五次会议，做出《关于加强文艺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对文艺组工作，又有很大推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原杨得志总长和迟浩田总长，济南军区有关领导同志的关怀照顾，于同年10月，在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建立了办事机构，文艺组更有计划地开始了多方面的工作：

一、文艺组办公室建立后，立即组织力量，建立必要制度，如轮流值班，修订和充实创作出版计划，解决经费开支和有关制度等，以推动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1、1986年10月开始执行值班制度，有计划地邀请各地老同志来办公室值班。通过召开座谈会、印发征稿信、确定专题专门写信约稿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联系，组织创作以反映冀鲁豫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传记、纪实文学和影视文学作品，并认真进行审阅，提出意见，反复修改。

2、编印内部刊物《文艺组工作通讯》，明确创作思想，交流写作经验，介绍文学界动态，以加强文艺组成员的联系，推动创作活动的开展。每期发放130多份，共出15期。每次新书出版后，均及时赠送有关领导、老同志、文艺组成员和冀、鲁、豫、黔4省党史部门。

3、根据1986年党史工作组济南会议决定，抓紧催办由山东、河南、河北和贵州4省筹集的文艺经费。并到东北有关部队、

冀鲁豫3省联系征订文艺组出版的各种书籍。

4、在文艺组经费筹集和开支方面，除拍摄电视剧筹集的经费专款专用外，根据财务制度和文艺组经费管理规定，对冀鲁豫黔4省及聊城地区提供的31.3万元，一切都本着少花钱、多办事、勤俭节约的原则办理。到现在为止，共支出31.69万元，包括印刷、出版补贴、拍摄电视剧、值班人员生活补助、差旅费和象征性的编审费、稿酬等及文具购置。所筹集到的经费，已全部用完，现尚有卖书收回的1万多元，准备作为继续出书补贴和处理扫尾工作中问题之用。

二、组织创作编辑出版《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截至1991年12月底，文艺组先后收到各种作品来稿34件，约计538万多字；除经过审阅及时退稿者外，现已编辑完成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约计400多万字。已出版的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有《范筑先将军传》、《鲤鱼湾的故事》、《地狱归来》、《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渔火》、《乱世姻缘》、《红三村传奇》、《血染黄河》、《卫河静悄悄》、《冀鲁豫影视文学剧本选》等11本。《冀鲁豫抗战史话》和《黄河之滨》两本已送出版社，可望于1992年上半年出版。《将军之死》也已送交出版社，正在联系协商有关问题，力争1992年将计划编辑出版的14本丛书全部出齐。

三、文艺组在编辑出版文艺丛书的同时，还在山东、河南两省有关领导同志和聊城地委、安阳市委和市政府支持下，协同安阳电视台，山东电视台，微山县委、县政府，河南电视台，濮阳市委宣传部，中原影视创作研究会，通过多方面筹集经费、提供条件，前后拍摄完成电视连续剧《智渡微山湖》、《特殊的战场》、《陈少敏在沙区》3部，前两部已先后在山东、河南电视台播放；《陈少敏在沙区》已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

四、文艺组还受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委托，负责编辑出版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冀鲁豫分卷的任务。经广泛征集资料，多次派人去北京、郑州、新乡、石家庄和原冀鲁豫边区地、市、县采访搜集；又和在冀鲁豫边区从事过宣教、新闻、文化艺术工作的老同志进行联系。搜集到历史文献资料、文艺社团史稿、文艺刊物介绍、文艺活动回忆录、优秀文学作品等资料近百万字。根据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统一要求，通过多次审阅筛选，选用文献史料86篇、文学作品143篇，约有66万多字，印发编委会成员征求意见后，编辑出版《冀鲁豫文学史料》和《冀鲁豫文学作品选》两书，并在1988年12月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中，获得解放区文学研究史料专集优秀成果奖。

## （二）

回顾八年来，文艺组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成果。其所以能够如此，是和山东、河北、河南、贵州4省省委的领导，济南军区的支持，一些老领导的关心支持，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文艺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首先是一些老领导的关心与支持，特别是中顾委宋任穷副主任在百忙中仍然为文艺组负责编辑的《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冀鲁豫分卷写了序言；中顾委常委杨得志和原铁道兵崔田民政委非常关心文艺组的工作，不仅先后在北京、济南帮助解决文艺组办公用房这一难以解决的问题，还亲自写信给有关军区、部队征订书籍。中顾委委员赵健民、人大常委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张承先、原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和珍，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姜思毅同志，也都非常关心文艺组的工作，帮助文艺组解决问题，参加文艺组主持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年已八旬的原山东省党史征委会主任高克亭同志，不顾年老体弱，多次认真审阅《泰山儿女》和《智渡微山湖》电视文学剧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还帮

助解决拍摄电视剧《智渡微山湖》的经费，指导电视剧的拍摄工作，令人钦佩。

山东、河北、河南和贵州4省以及济南军区、北京军区等有关领导同志，对我们文艺组工作给了很多帮助。迟浩田总长在济南工作期间，对文艺组的工作关怀备至，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便，还经常问长问短；原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也为我们召开会议集体审改稿件提供了条件。文艺组编辑出版各种文艺书籍，进行各种活动，都是在各省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和一些老同志热情关怀下进行的。我们为编辑《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冀鲁豫分卷，得到了原河北省委李文珊副书记和省顾问委员会杨泽江主任的支持，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提供优惠条件出版了《冀鲁豫文学史料》、《冀鲁豫文学作品选》。原空军副司令王定烈同志，对文艺组工作十分关心、认真，为出书多次与出版社联系协商，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从不嫌麻烦；原二炮副政委阴法唐同志为《冀鲁豫文学史料》、《冀鲁豫文学作品选》和《晋察冀文学史料》等书召开首发式提供条件，进行了周密安排，影响极好；空军政委朱光同志，在文艺组困难较大情况下，为出版文艺丛书，也给予很大帮助。河南省原顾委副主任张赤侠同志对拍摄电视连续剧《特殊的战场》给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再就是文艺组成立后，各地许多老同志主动来信联系，撰写稿件。如王定烈、徐仲禹、乔学亭、郄晋武、李洪昌、王化棠、万清洁、邓愧余、戴克强等和叶辛、李津生、窦致平、陈炎、高志超、王永仁、刘长岭、胡敬洪、孔祥书等一些中青年同志。周雁如同志家有病人，仍然坚持为自己在编辑《冀鲁豫文学作品选》所选用的作品，进行反复修改。应邀先后到北京值班的有李定坤、汪德荣、吴振全等同志；到济南值班的有李定坤、汪德荣、方萌、孔祥森、牛星斗、李德厚、鲁光、殷群、陆迪伦、李慧敏等同志。他们虽然多数已年过花甲，生活条件较差，仍然夜以继

细地审阅稿件；对已选用的稿件，反复修改加工，对不能采用的，也认真提出退稿意见，切切实实地做到件件有交代，事事有着落。特别是在翻阅战争年代保存的报刊资料中，因《冀鲁豫日报》、《战友报》和鲁西北1938年出版的《抗战日报》，本来印刷质量不好，又年久变色，字迹不清，有些老同志一丝不苟，用放大镜一字一字地辨认。《冀鲁豫日报》是影印卷，无法复印，对所选用的资料，都要亲手抄写下来，工作非常辛苦。

取消值班制度之后，分散在各地的文艺组主要成员李定坤、汪德荣、许平、牛星斗、刘文渺、侯存明、吴振全、方萌等同志和办公室同志一起，继续审改稿件，保证了编辑出版计划的顺利完成。

## （三）

我们在完成编辑出版文艺丛书和拍摄电视剧这一任务的同时，也有不少的体会，主要是：

第一、进一步认识到编辑出版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的重要性，因而更加增强了从事这一工作的紧迫感。自从党中央决定征集党史资料以来，各地普遍进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这样，就为我们利用党史资料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在全党普遍进行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今天，我们有责任利用党史资料所提供的丰富素材，组织力量创作出以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为四化大业服务。通过实践，逐渐认识到有必要把党史题材文学或党史文学提出来，并把她看作是伟大祖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枝新绽的花朵，而加以认真扶持。

第二、我们组织以革命斗争历史为题材的文艺创作，首要问题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保证作品的质量。作品的形式和表现

手法，尽可以多种多样，但都必须有鲜明的主题，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大的历史背景、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事实，和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方面，一定要真实。在这些大真实的前提下，可以允许艺术虚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真实，小虚构”。如果离开了“大真实”，去任意编造，就会丧失作品的生命，还可能带来不良后果。

文艺组同志始终以明确的指导思想，认真地审阅稿件，严格把关，逐件提出修改和处理意见。

第三、组织拍摄以革命斗争历史为题材的电视剧，是反映我党、我军光辉历史、英雄业绩，形象化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种良好形式。正如赵健民同志在电视连续剧《特殊的战场》开拍仪式上所指出的：“拍摄电视剧，再现我党、我军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甘苦，共患难，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光辉历史，对继承党的革命传统，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会起到积极作用。”但组织拍摄出一部比较好的电视剧，十分复杂、困难。既要有较好的文学剧本，从多方面筹集经费，还要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更要能找到一个有共同愿望的合拍单位和认真负责的剧组，还要有关领导部门、单位的支持和协作。否则，就往往会出现互相扯皮，费力不小，效果不好的结局。

第四、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要文艺组负责编辑出版的《冀鲁豫文学史料》和《冀鲁豫文学作品选》，我们认为非常及时、重要。宋任穷同志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指出，丛书出版“不仅可以把一些珍贵的文化财富保存下来，提供有关部门进行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当年发表过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反映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军民、军政亲密团结，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敌人顽强搏斗的英雄业绩，这对继承和

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年轻一代，都有重大意义。”不少同志对编辑出版这两本书，给以良好的评价，说“文艺组做了一件好事”，“是一种抢救性的工作”。

## （四）

总的说来，文艺组七年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获得了一些经验与体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编辑出版的文艺作品中，有的作品质量还不够理想；由于经验不足，考虑不周，对丛书版本大小、封面设计，都缺乏统一要求，这在编辑出版丛书时本来都是应该重视和解决的。

其次，新书出版后，没有打开发行渠道，在发行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书籍销路不畅通，以致造成书籍的严重积压。

再次，在拍摄电视剧工作中，由于对这个工作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致使在有的电视剧拍摄过程中，花费精力很大，但拍摄的电视剧却不够理想。

目前，还有三本书尚未出版，文艺组虽然结束，但结尾工作必须搞好，因此有的同志还要继续辛苦。具体要求：

1、将文艺组工作小结印发给有关领导同志和文艺组成员；

2、抓紧与出版社联系，争取尽快出书；

3、全面清理现存书籍，加以妥善处理；将年内陆续出版的几本新书，分发到有关同志手中；

4、抓紧结算文艺组帐目，列出清单；在文艺组办公室撤销前，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办公室撤销后，文艺组同志仍然要保持联系，以保证善始善终地搞好全面的结束工作。

最后，我们在总结文艺组过去几年工作的时候，要向对文艺组工作一向关心和支持的领导同志和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同

时，对给文艺组工作热情支持，并付出不少心血的老领导崔田民同志、申云浦同志，以及鲁西良、李定坤、周雁如、周子芹、张明权、万苇舟、孔祥森、高志超等同志的不幸逝世，寄以深切的怀念和哀思！我们一定要像文艺组长申云浦同志在世时所说："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的工作。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 在《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再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杨泽江**

同志们：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再版，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我们首次公开发表了邓小平同志1945年6月6日《在中共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小平同志在抗战期间关于群众运动的讲话，能够在党史资料上首次公开发表，是件可喜的大事，我们特此表示祝贺！

“冀鲁豫党史群运专题”是《冀鲁豫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河北省承担了这个专题的征编任务后，委托省党史办的冀鲁豫联络组具体组织实施，社科院历史所、规划办的同志承担编辑任务。几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档案局、档案馆的支持帮助下，承担编辑工作的同志们，在正常的工作任务之外，辛勤劳动，征集了大量的资料，编印了五辑党史资料，内部刊行，使这些资料得以利用和保存下来，深受有关同志的好评。1991年6月出版了《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下两册，88万余字，列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序列。6月中旬参加了《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出版座谈会。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万里、薄一波、杨得志、陈锡联、段君毅、胡绳等领导出席。吕传赞同志出席并代表省委讲了话。会上将《选编》分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以及原边区老同志，深受他们的好评和肯定。

在《选编》的编辑过程中，我们曾请示赵紫阳同志，拟使用小平、紫阳同志的讲话和文章。当时紫阳同志答复：我的文章不要发表，在概述中提到就可以了。因此没有选用紫阳同志《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一文。1991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我们使用小平同志1945年6月6日的讲话。但此时，《选编》第一版已经出版，并已分送有关领导同志，未能收入。因此在征得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后，决定再版，将小平同志的讲话作为历史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

再版在省档案局、档案馆的支持帮助下，负责编辑工作的同志们精心编辑、印制，并对几篇资料和文章与原件再进行核实，加以修订补充，旨在提高史料价值。书中并收入了邓小平、刘伯承和陈毅同志的题词。这些题词都对边区的群众运动作了充分的肯定。

《选编》再版样书送给原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后，深受他们的肯定和赞许。

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边区的群众运动做了精辟的分析和历史性的总结。1945年北方局为了更多地了解和掌握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的情况，组织大批机关干部深入滑县、濮县、濮阳三县，调查研究群众运动问题。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大量掌握具体情况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了成绩，指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地剖析了当地群众运动的情况，阐述了群众运动的规律、方法和群众路线问题；指明了群众运动的方向，使边区的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加蓬勃发展。这篇讲话，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根据边区群众运动发展的情况，首先提出了必须坚持抓住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放手发动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抓住有利时机，认真地解决这个多年来未能解决好的问题。

讲话中指出，冀鲁豫有些地区满足于1940年以前大发展的形势，曾在一个时期，一度忽视了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没有认真执行1939年冬中央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丧失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时机，形成1941年、1942年的大退缩，以后边区党组织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情况很快好转，根据地又得到了很大的扩大，这是非常之好的。对于边区的群众运动，要在分局的指导下，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务求把减租减息的政策贯彻到底。要紧紧抓住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这个中心环节。已发动很充分的地区，也要对不平衡的状况有正确的估计，不应放松对群众的指导，认真地解决发动群众、组织教育群众的问题，把减租减息贯彻到底，以适应于将来斗争的需要。

讲话着重指出，必须认真地坚持群众路线，更好地解决群众观点、相信群众的问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自己的运动，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一般说来，克服了包办代替的毛病，在干部中树立了群众观点，相信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因此运动表现了很大的群众性，成为群众自己的运动，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培养了自己的领袖。运动规模之大、之普遍、进展之快，为前所未有。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滑县的雇佃运动做得很好，正是因为他们不仅放手形成了广泛的群众自己的运动，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领导与群众结合得好，及时注意把运动中的经验集中起来，用以指导一般，既大胆相信群众又发挥了指导作用。这证明了他们运用毛主席的领导方法指导运动，所以运动的结果很好，收效很大。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党的路线，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区别对待地解决问题。在没有进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地区，仍应坚持发动群众的方针，通过典型

经验指导运动，避免或少走弯路。在地主富农已有很大削弱，贫雇农已获得大量果实，但群众并未发动或未充分发动起来的地区，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仍较低，无产阶级的骨干作用并未真正形成，这类地区首先应解决悬案、遗留问题，加强群众的组织和教育，树立优秀分子的领导地位，切实团结好中农，防止地主反攻，运动才能正确地发展。在群众发动比较充分的地区，贫雇农真正发动起来了，获得了大量的果实，生产情绪较高，已经树立了骨干作用，这些地区应适时转入生产。南乐县较早地转入生产，已获得成绩。在伤害中农比较厉害的区域，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地团结中农，恰当地解决一些悬案，才有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生产运动要有一个准备阶段，认真研究毛主席有关生产的学说，如组织起来，论合作社及陕甘宁边区和本地的一些经验，宣传、教育群众树立新的劳动观念，这是指导运动的基础，否则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弯路。各级领导机关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具体指导。

小平同志十分关注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1961年12月27日又在《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文中指出：“……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3 年解放战争打胜了，这是在长期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集中了一切力量才实现的。如渡黄河，群众把门板都贡献出来，光冀鲁豫的门板还不够，连济南的门板也下下来了。那时群众吃得很差，还是拿出粮食供给人民解放军。这没有长期工作的基础是不行的。国民党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摘自1991年 3 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

现在我们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在中共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

议上的发言》，联系当前的实际，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坚持学习小平同志有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坚持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要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认真做好群众工作；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

# 后　　记

当我们把《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增订本》奉献在读者面前时，回顾整整八年来的工作历程，确实是感慨万端。

1985年11月27日，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在洛阳召开会议，责成河北省承担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两个专题的征编工作。在中共河北省委和杨泽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河北省很快组成以有关部门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专题编写组，具体承担征编任务。河北省冀鲁豫联络组负责组织、协调工作。

坦率地说，我们投入这项工作，最初主要是为着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但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从大量丰富、生动的史料中逐渐认识到：冀鲁豫边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根据地和解放区之一，在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在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蔚为壮观，宣教工作灵活多样，蓬勃发展，创造了许多典型的经验；冀鲁豫人民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我们愈来愈深切地感到，不把这些真实、丰富、生动的史料认真整理出来，传之于世，昭示后人，我们就愧对冀鲁豫这块英雄的土地，愧对为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无私奉献和重大牺牲的冀鲁豫人民，愧对成千上万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思想认识的升华，使我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愈益增强。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投入到艰苦的工作中去。为了挖掘更多有价值的史料，我们奔波于北京和山东、河南、贵州等地，采访、调查、座谈，翻阅档案，查检当年的报刊

杂志及各种油印、石印材料。许多老同志奉献出珍藏多年的历史材料，使我们备受鼓舞。为了立准立好史料，我们对得到的材料，逐字逐句地进行核实，绝不疏忽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为了使征集来的大量史料能够科学地编纂起来，我们吸取了过去编辑晋察冀、冀热辽根据地史料的经验教训，于1986年7月制定了《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专题资料历史文献资料部分编辑细则（试行稿）》，从而为提高编辑史料的系统性、科学性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在《党史工作简报》1986年第10期上转发了这个细则，予以肯定，并要求各专题组"仿照执行"。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的表彰，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八年来，经过紧张、繁杂而有序的工作，我们征集到有珍贵价值的档案资料700余万字，编印了5辑《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3辑《冀鲁豫边区宣教工作资料》，内部刊行，使这些历史文献、资料得以利用和保存下来。在此基础上，以刘少奇同志1942年4月对冀鲁豫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充分发动群众的指示和邓小平同志1945年6月6日《在中共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精神以及有关中央指示为指导思想，撰写了《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概述》和《冀鲁豫边区宣教工作概述》，经八次修改，印发了征求意见稿，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和各省联络组，以及原在边区从事群运、宣教工作的老同志审阅，并于1989年4月在保定市召开了审稿会。在审稿会上，两个专题编辑组的同志还将《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和《冀鲁豫边区宣教工作资料选编》的编辑方案及选篇目录提交大会审议。与会领导同志和老同志们基本同意两书的编辑方案及目录，并对两篇《概述》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们根据这些意见进行修改后，又于1989年底两次赴京，请原工作组领导同志和部分老同志座谈审定。嗣后，又进行了四次修订，完成了送审稿，由段君毅、徐运北、张承先、姜思毅等领导同志终审定稿。两篇《概述》是边区

群运、宣教工作的全面总结，是《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和《冀鲁豫边区宣教工作资料选编》两书的总论。

经过两年多紧张的编辑工作，1991年6月、7月，《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和《冀鲁豫边区宣教工作资料选编》两书先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序列。同时，为了全面反映边区群众运动的面貌，又分别编印了"青运"、"妇运"、"人民武装"专题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有关老同志亲自动手编辑整理或执笔写成的，内容翔实，是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出版后，在史学界和原冀鲁豫边区所在省、地（市）、县产生较强烈的反响；1991年6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中央领导同志万里、薄一波、杨得志、陈锡联、段君毅和胡绳参加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出版座谈会上，得到一致好评。

1991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我们使用邓小平同志1945年6月6日《在中共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但此时，第一版已经成书，并已分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未能收入。因之，征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后，决定再版，首次公开发表这篇讲话。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对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做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史料价值很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再版还同时增补了刘伯承、邓小平同志1946年在冀鲁豫的合影，邓小平同志1947年元旦为冀鲁豫军区《战友报》的新年题词和刘伯承、陈毅同志1948年12月21日的题词。这几个题词，对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均给予肯定。

《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再版问世后，又深受原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领导同志和原在边区工作的老同志的赞许。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当年冀鲁豫边区群运、宣教工作的情况，根据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决定再编印《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

作资料选编增订本》，以补不足。《增订本》的编辑工作，继续得到了有关方面和老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

回顾八年来的征编工作，我们的感触是相当深刻的，体会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党史资料的征编工作，必须紧紧依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老同志的指导与帮助。我们这些党培养起来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虽然有满腔的工作热情，但毕竟未亲身参加当年如火如荼的斗争，缺乏对当时当地斗争情况的深切了解和实际感受，更兼我们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所以在工作中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当这时，中共河北省委和冀鲁豫党史工作组都及时给我们以指导和帮助。八年来，我们这两个专题的征编工作，始终是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原边区党史工作组杨得志、段君毅、赵健民、徐运北、张承先、秦和珍、郭超、姜思毅、王克东和杨泽江等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并得到原边区从事群众运动、宣教工作的老同志以及原边区党史办公室和王传忠同志的热情支持。原在边区从事妇女运动的老同志范世钧、吴亚南、程墨芝、李虹以及沈言同志，从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王克、史杰、常邦国、高桓、李静轩，从事人民武装工作的老同志郭乐天、白晶五、冯培昌等，他们虽年事已高，但都亲自动手，积极提供资料，订正史实，编纂了《妇运史纲》、《青运史纲》、《人民武装资料》等专题资料，全面地反映了原边区各项工作的面貌。这种对历史负责、严肃认真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使我们深受教育。在他们的带动和鼓舞下，我们在正常工作之余，埋头苦干，精益求精，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有关方面的肯定和表扬。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党的领导，没有这些"老冀鲁豫"的帮助与支持，我们的征编工作是很难顺利完成的。

我们还深深感到，要想搞好党史资料的征编工作，还必须紧紧依靠档案和党史部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山东、河南、河北等省档案馆，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河南、

山东、贵州三省及其所属各地、市、县党史工作部门，以及有关地、市、县档案部门，积极为我们查找资料，热情地提供咨询，保证了征编工作的顺利进行。

河北省人民政府、原中共河北省委顾问委员会、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新闻出版局、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出版、发行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各种有力的保证。

参加群运、宣教资料征编工作人员的所在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陆军学院政治教研室，从人力智力物力上给予了很大帮助。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联络组的李运亨同志，担任两个专题征编的联络、协调及选篇、审定工作，几年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参加“群众运动”专题征编工作的有：谢忠厚、张圣洁、安炳增、田苏苏、胡克夫、陈旭霞、王潮、陈士楷、雍兰利、谢嘉、孙恒民、李桂芳和池笑琳。参加“宣教工作”专题征编工作的有：管春林、姜尚文、弓国宏和温瑞茂。

此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张俊杰、郝瑞丽、郭丽娟、刘丽敏、魏丽君、段颖、王一平，热情地为我们复印、打印，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加快了工作进度。

值此本书梓行之际，我们对所有关心、指导、支持、帮助过我们的革命前辈、史学界同仁和各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今后，我们将在征编工作的基础上转入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我们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将继续得到各级党委、各有关部门和老同志、新老朋友们的关心、指导、支持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
作者=谢忠厚　张圣洁等主编
页数=545
SS号=10380691
DX号=
出版日期=1994年01月第1版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目　　　　录编辑说明

第一部分历史文献晋冀鲁豫边区合作社条例……………………………………（　　1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边区青联关于加强青联与军队朱德青年队联系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加强我们党报的党性………………………………黄敬（8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介绍减租增佃工作中的一种方式——集体倒粮&吕　　冰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冀南地委书记联席会群众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黄敬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冀鲁豫边区农村合作社章程草案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鲁西南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初步调查&陶　　力
（一九四三年）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姜思毅
（一九四四年六月）关于滑县群众运动向中共平原分局的汇报提纲&纪登奎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冀鲁豫行署关于处理因灾荒买卖人口纠纷的规定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赵紫阳
（一九四四年十月）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冠北工作队总结&杨易辰
（一九四五年一月）介绍某庄合作社&吴振全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冀鲁豫边区农村合作社组织简章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加紧生产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齐滨县向庄合作社初步调查＆李春兰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黄河工作给冀鲁豫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全力进行复堤工程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救救２３万修堤工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沿河二［六］县修堤工人中涌现大批英雄模范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冀鲁豫边区工农青妇联合总会、武委会总会告全体会员、团员和民兵书为紧急动员起来参军参战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濮县涌现大批担架英雄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冀鲁豫行署关于教育方针的指示信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莘朝县合作社村社工作初步总结报告

（一九四六年）在社会部长联席会上的总结＆刘晏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地委民运座谈会上关于几个问题的发言＆赵紫阳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冀鲁豫区王、张、张、刘、赵关于扩兵、土地改革等问题给薄一波同志的信

（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培养与使用妇女干部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让农民自己做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周　　惠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潘复生等来信的通知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附：潘复生同

志等就土改政策致张玺、运北、晏春、云浦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关于到达冀鲁豫经过及组织情形向中央局的报告＆李菁玉　　陶希晋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附：（李）菁玉、（陶）希晋给（薄）一波的信——冀鲁豫工作团干部对冶陶会议的反映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第二部分专题资料冠县抗战初期的农民运动＆中共冠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泰西“红五月”运动＆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濮范中心区的民主民生运动＆中共范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微山湖区交通线＆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鲁西北艰苦卓绝的抗灾救灾斗争＆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概述＆汪德荣
冀鲁豫边区合作社工作简述
冀鲁豫边区的宣教工作＆姜思毅
巾帼英雄——李秀真的革命事迹＆滑县妇女联合会
第三部分回忆文章中共直南特委工作回忆＆黎玉
直南革命策源地——大名七师革命史（节选）＆晁哲甫
直南沙区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的革命斗争＆王从吾
在冀鲁豫边群众中坚持革命斗争＆陈少敏
濮阳盐民斗争＆王从吾　　高克林　　张会之　　吴宝合
党领导的“王效白打烟款”始末＆戴晓东
实现我们的伟大使命＆曾宪辉
阳谷县早期党的活动与群众工作＆申云浦
泰西地区党的发展与群众工作＆李明实
抗日战争时期滨河县发动群众的情况＆张延积
回忆冀鲁豫边区各界参观团赴冀南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的情况＆刘东明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纪登奎同志在鄄北＆常邦国
苏鲁豫边区（湖西）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回顾（节选）＆郭影秋　　郝中士　　陈璞如　　秦和珍
回忆冀鲁豫边区人民在淮海战役中的支前工作＆韩哲一
忆鄄城解放后的群众运动＆宇　　光　　谢春风　董兴武
我们的青年工作团＆魏克
第四部分附录冀鲁豫区八年抗日战争财产损失统计表
（一九四六年五月）第四专区各县人力畜力支差调查统计表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冀鲁豫〔黄〕河北地区战勤调查统计表
（一九四八年八月底）冀鲁豫全区二年来支前实力负担统计
（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冀鲁豫边区抗战颂歌＆王鲁
河北省联络组关于“群众运动”、“宣教工作”专题征编情况向工作组的报告
冀鲁豫党史文艺组八年工作小结＆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文艺组
在《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再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杨泽江
后记